第 九 章

551

斯大林亲自参加1937—1938年镇压的组织活动

1937—1938年的镇压使所有苏联人大为震惊。在许多人看来，这是突然降临在我们党和国家头上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灾难。很自然，围绕着三十年代悲剧马上产生了许多神话和传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与其说是寻找真理（当时无论政治气氛还是心理状态都不会促使人们去从事这种探索），还不如说是企图躲避真理，躲避这无情的真理，而去寻找一个能对发生的一切加以解释的公式，使对党和斯大林的信念保留下来。

必须对其中的一些神话和传说作详细分析，尤其是由于其中许多说法至今还保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一、斯大林是1937—1938年镇压活动的组织者和鼓舞者

一种说法是，斯大林似乎不了解席卷苏联的犯罪和恐怖的浪潮，说人们对斯大林隐瞒了真实情况，说这些罪行都是背着斯大林干出来的。这种传说在苏联人民中广为传播。

显然，认为能够支配我国一切事物的斯大林不知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捕和被枪杀，多数苏联人民委员被枪决，几乎所有州委和民族共和国中央被粉碎，高级军事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活动家被逮捕，许多著名作家和科学家牺牲以及他本人的亲属和朋友 552

身亡，——这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把斯大林描写为绝对脱离生活，不知道在我国土地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人，那是很幼稚的。去崇拜这样的领导人是可笑的。但是对某一高级人物的认识和迷信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认识有自己的逻辑，同正常人的逻辑和事实没有什么共同点。正是用这种宗教认识的特点，才能去解释斯大林不了解我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传说的出现。伊·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曾经想（显然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考虑问题），斯大林不知道对共产党和苏联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这种不可理解的迫害。"① 许多人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钻进了一些破坏分子，他们未经斯大林同意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消灭我党的优秀干部。二十九步兵师的政委Ф·А·斯捷别涅夫和维亚杰姆斯克军区军事委员安·雅·韦杰宁（他后来是克里姆林宫警卫长）的一次谈话对当时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有关这次谈话，韦杰宁在他写的《年代和人们》② 一书中是这样回忆的："斯捷别涅夫见到我，问道：'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他在房间里焦急地走着——'我不相信，我们党内有这么多敌人。不相信。也许，在党的上层某一环节里，在安全机构里钻进了异己分子？非常象，是要把党的干部有意消灭掉。我敢用脑袋担保，约瑟夫·维萨利奥诺维奇不知道这些情况。提醒、申诉、抗议都被扣下了，他收不到。应该想办法让斯大林知道这些情况。否则都要完了。明天要抓你，接着抓我。不能再沉默了。'"党内成千上万的负责人和普通党员以及许多已经被捕的人都有这样的意见。Д.А.拉祖尔金娜（过去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负责干部）在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我被捕时……感到非常可怕，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党。我想不通，为什么要逮捕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我替自己解释，党内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显然是一种破坏。这使我很不安。在监狱关押二年半期间、以及后来在集中

553

① 《新世界》杂志 1962 年第 5 期第 152 页。

② 安·雅·韦杰宁：《年代和人们》莫斯科 1964 年版第 55 页。

营和流放地，我连一分一秒都没有怪斯大林。当其他犯人、流放者和关在集中营的人骂斯大林时，我竭力保护他。我说：'不对，斯大林不可能允许党内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①

关于斯大林不了解国内所发生的悲惨事件的幼稚想法也反映在"叶若夫暴行"这个词上，这是人民用它来称呼三十年代的悲剧的。叶若夫突然被撤职和被消灭也似乎证实了这样的传说，但这只不过是早已被革命破除了的、普通老百姓迷信沙皇的新版本，他们曾说沙皇是善良的，只是在他周围的部长是虚伪和凶恶的。

还应该指出，这种说法也是以斯大林本人的行为的许多特点为依据的。遇事不露声色和性格孤僻的斯大林并不企图、也不愿意太多的露面。尽管斯大林的名字是有口皆碑地被人们传颂着，但是他本人的活动主要是沿着人们看不见的渠道进行着。斯大林力图从幕后指挥事态的发展，重要的事情都是他本人亲自或者在他的少数助手圈子里决定下来的。1936—1938 年斯大林很少在会议上讲话，他从来不夸耀自己参与了这些大规模的镇压，而宁肯把这些罪行的其他参与者推到前面去，因而使自己保留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况且，斯大林的许多讲话和行为都使人们想到，他不太了 554 解国内镇压的实际规模。例如，在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斯大林要求不要镇压那些早已和托洛茨基断绝一切来往并停止反对派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可是就在这时成千的原反对派，包括早已停止反对派活动的人，仍然在全国各地被逮捕。斯大林在全会上嘲笑那些轻易把几万人开除党籍的人。可是就在这时被开除和镇压的共产党员不是以万计，而是以几十万计。国内战争英雄达·费·谢尔基奇被捕前不久，斯大林在一次招待会上建议为他的健康及和他"建立个人友谊"而干杯。② 在镇压勃柳赫尔前

---

①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3 卷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119 页。

② 见И·Д·奥恰克：《达·谢尔基奇》莫斯科 1964 年版。

'建立个人友谊"是一种风俗习惯，两人挽臂喝建立个人友谊酒，进行过这样的仪式的朋友，两人即成为知交，不互称"您"，而称"你"。——译者

几天，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很热情地说了他的好话。画家M·萨里扬告诉伊·爱伦堡，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亚美尼亚代表团时，问过关于诗人叶·查连茨的情况并且说不要动他。但几个月后查连茨被捕而且被枪决了。奥尔忠尼启泽的副手A·谢烈布罗夫斯基的妻子证实，1937年当她的丈夫住院时有一次晚上她突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说："听说，您现在步行出门。这不好，人们会想出不应想的事情来。如果您的汽车在修理，我给您派一辆汽车。"果然，清晨克里姆林宫车库派来了一辆汽车，归谢烈布罗夫斯基妻子使用。又过两天，A·谢烈布罗夫斯基被逮捕，他直接从医院里被抓走了。

根据P·Г·阿里哈诺娃的证实，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里曾任斯大林副手的布罗伊多，当半夜里内务部有人来他家时，他马上打电话给斯大林说："柯巴，有人来抓我。"斯大林说："胡闹，谁会说你有什么罪过？你安心地去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助他们把真实情况搞清楚。"以后，布罗伊多再也没有回家。根据C·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证实，在贝拉·库恩被捕的前几天，斯大林打电话给他，要他接待一个法国记者，为他（贝拉·库恩）被捕的传说辟谣。在接见记者几天后贝拉·库恩被捕了。根据И·П·阿列克萨欣证实，著名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尤·米·斯切克洛夫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大逮捕而感到很不安，他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接见他。斯大林和斯切克洛夫很熟，说："好啊！你来。"斯大林在接见斯切克洛夫时说："你怎么了，党是了解你，信任你的，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斯切克洛夫晚上回到家里，亲友们正在等待他。就在当天夜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带着逮捕证来他家里。很自然，斯切克洛夫的亲友们首先想到去找斯大林，因为他显然是不了解所发生的一切。那时当然更容易相信斯大林什么都不知道，而并不相信他的这种险恶的用心。根据M·B·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证实，原苏联检察长，后来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И·A·阿库洛夫1938年滑冰时跌倒了，受了几乎是致命的外伤。为了抢救他，根据斯大林

555

的建议，从国外请来了一些著名的外科医生。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复杂艰苦的治疗，阿库洛夫康复了并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此后不久阿库洛夫被捕了，并于1939年被处决。

亚·米里恰科夫于1937年突然被基层党组织撤职并开除了党籍。几天后当他和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坐在区委接待室里等待区委常委找他谈话时，党委书记异常着急地跑进区委接待室。他找到米里恰科夫说："快到克里姆林宫去，斯大林要见你。"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接见了他们。斯大林告诉卡冈诺维奇说："岂有此理，把米里恰科夫这样的人开除了。"然后告诉米里恰科夫："我们派你到黄金管理局担任副局长，去执行你的任务吧。"几天后，米里恰科夫成了黄金管理局的局长（在谢烈布罗夫斯基被逮捕后）。两个月后米里恰科夫被捕了。类似的事情还可列举出许多。 556

正是斯大林建议在1938年1月即镇压高潮时召集联共（布）中央特别全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关于党组织开除党员党籍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者申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态度及克服这些缺陷的措施》。

此项决议说："不少事实表明，有些党组织不经过任何审查，因而是毫无根据地开除党员党籍，撤掉他们的工作，还时常毫无道理地宣布他们为人民敌人，对待党员使用非法手段，为所欲为……这一切事实说明，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和他们的领导者至今没有学会辨别和揭露巧妙隐藏的敌人，可是敌人正在企图用提高警惕性的喊叫作为掩护自己敌对情绪的烟幕，以便使自己能留在党的队伍中，这是第一。第二，这些敌人企图用镇压的办法打击我们布尔什维克干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传播不信任和过分猜疑的情绪。

这种隐藏的敌人是凶恶的叛徒，他们往往大声疾呼提高警惕性，他们喊的调子比谁都高，急急忙忙去'揭发'，而且越多越好，这一切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对党的罪行，把党组织的视线从揭发真正的人民敌人方面转移出去。

这种隐藏的敌人是可耻的两面派，他们用尽各种办法企图在党组织内造成一种过分猜疑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下当一个党员站起来保护另一个被诬告的党员时，他马上被指责为失掉了警惕性，而且被指责和人民敌人有联系……

应该明白，在解决开除党员党籍和恢复某一已被开除的人的党籍问题时，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不仅不排除高度的谨慎和同志式的关怀，相反是以此为前提的。

557 联共(布)中央全会要求所有的党组织和他们的领导者全面提高党员群众的布尔什维克警惕性，彻底揭发并根除一切有意和无意的党的敌人。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顺利解决这一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毫不保留地消除那种反党的做法，即在对待人和党员问题上采取千篇一律的，不加个别分析的成批解决的态度……"①

尽管这个由斯大林定稿，甚至部分是他亲自写成的决议，有许多提法是模棱两可的，但它在千百万苏联人们心中产生了一种希望：觉得镇压要停止了，过去已进行的逮捕要进行复查了。当1938年1—2月报刊中出现了关于恢复一些原共产党员的党籍及惩处一些诬陷者的通报时，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但是这些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1938年1月的中央全会只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政治避雷器。他根本没有停止非法镇压。相反，在整个1938年镇压都普遍进行着，而且比1937年更加厉害。大规模的(开着名单)开除党籍的运动也在继续发展。我们坚信，当斯大林恐怖的牺牲者的数字统计出来时，历史学家会看到，1938年被开除党籍、枪毙和逮捕的共产党员比1937年还多(包括中央委员)。

1937—1938年期间在州和共和国许多党员干部会议上都提到了斯大林有力地参加和亲自干与镇压机构的活动。到地方来领导镇压运动的卡冈诺维奇、安德烈也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什基利亚托夫等不断强调，他们是受了斯大林的委托而行动的。可是这

① 《真理报》1938年1月。

些讲话当时很少在报刊上登载。

大概我们报刊的宣传只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夕，即在叶若夫被撤职后，才强调了斯大林在粉碎“人民敌人”方面的领导作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时也指出了斯大林在粉碎“人民敌人”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例如，什基利亚托夫在大会发言中说：“这项从党内把钻进来的敌人清洗出去的工作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斯大林同志教育我们怎样用新的方法向新的暗害者进行斗争，他教育我们，怎样迅速而坚决地消灭这些敌对分子。”① 党的个别代表还兴奋地讲了斯大林如何亲自参加消灭我党和国家干部的许多详细情况。前面我们已提到的米沙科娃② 说：“1937 年我在楚瓦什③ 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帮助共青团揭发在楚瓦什的人民敌人。隐藏在共青团中央的科萨列夫匪帮全力以赴地企图救出这些人，使他们不被揭露。由于我揭发了楚瓦什的人民敌人，科萨列夫匪帮对我组织了残酷的迫害，而且终于把我从共青团中央机构中赶了出来。我写信给斯大林同志，把团中央内部的混乱情况告诉了他。斯大林同志在百忙中抽时间看了我的信……共青团第七次全会通过的斯大林决议就是对共青团中央内部情况调查的结果。”④

558

---

①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39 年版第 175 页。

② 参见本书第 329 页。——译者

③ 指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译者

④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39 年版第561页。

注：米沙科娃的揭发材料首先交给了什基利亚托夫去审查。他虽然支持了米沙科娃，但只建议为“迫害”米沙科娃给科萨列夫以警告处分。他为此事给斯大林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写道：“敬爱的约瑟夫·维萨利奥诺维奇：象往常一样，我给你写了这张条子。如果欠妥，请您改正。”结果斯大林“改正了”。在共青团中央第七次全会上，什基利亚托夫发言时已经完全用另外的调子谈米沙科娃的问题了，他喊道：“你们企图把米沙科娃身上的一切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加以扼杀，但您，科萨列夫，您办不到，因为斯大林亲自干预了这件事情。”

（引自B·Φ·皮金娜在革命博物馆纪念阿·科萨列夫诞生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63 年 11 月 21 日。）

559 但是就在这时斯大林仍然继续粉饰自己的罪行。据说，有一次斯大林和部分大会代表谈话时，出人意料地说，叶若夫逮捕的人比“允许”他抓的要多得多。在大会后，特别是在卫国战争前夕，许多重要军事和民用建设项目出现了急需的人手严重短缺的现象。斯大林虚伪地企图把责任推到叶若夫身上。正如著名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1940年夏天，斯大林在同我谈话时一字不差的说过下面的话：‘叶若夫是坏蛋，在1938年消灭了许多无辜的人。为此我们把他枪决了。’”

雅科夫列夫接着写道：“这些话是我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马上就记下来的。”①

三十年代末，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一次在霍登卡视察新的战斗机。设计师尼·尼·波里卡尔波夫对飞机的性能做了解释，A·B·纳达什克维奇解释了飞机的装备问题。两位设计师当时都是在押的囚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二十九号中央设计局工作。解释结束后，斯大林突然向离他站得较近的纳达什克维奇问道：“在这里你们不受到迫害吗？”② 表面上看来，斯大林似乎同内务部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些人至今仍然相信，斯大林不知道叶若夫背着他干了些什么。可是今天，同意这样的幼稚说法已是不可能了。

现在，许多新的详情和文件都已了解清楚，它足以证明三十年代的一切重要的镇压活动不但为斯大林所知，而且是直接按他本人的指示办的。下面是З·Г·谢尔丘克在苏共二十二大宣读的文件：
560

“呈斯大林同志。

送批四个名单，是属于军事委员会法庭审判的：

---

① 亚·谢·雅科夫列夫：《生活的目的》（设计师笔记）莫斯科1966年版第179页。

② A·沙拉金（Г·A·奥杰罗夫）：《图波列夫的禁闭棚》《播种》出版社1971年版第38页。

1）第一号名单（总的）

2）第二号名单（原军事工作人员）

3）第三号名单（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4）第四号名单（人民敌人的妻子）

请批准按第一类判决所有的人。

叶若夫。”

众所周知，第一类判决就是枪决。

这些名单得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批准。在每个名单上面都有批示："同意。约·斯大林，维·莫洛托夫"。类似的政治犯名单，斯大林在1937—1939年期间亲自签字的约有四百件。仅在这四百份名单中就有四万五千人，主要都是党和苏维埃骨干，军事和文化界的活动家。

斯大林亲自领导国内镇压时不断催促地方上他的助手。亚美尼亚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很典型的。在帖尔-加布里埃梁被撤掉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职务及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汉德然被暗杀后，共和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迫害党和苏维埃的忠诚干部的恐怖活动。当时领导亚美尼亚党组织的Г·阿马图尼、С·阿科波夫、Г·察图罗夫和К·穆戈杜西，为了在斯大林和贝利亚面前邀功，杀害了共和国许多著名活动家，包括帖尔-加布里埃梁。但是斯大林对他们的工作还是不满意。1937年9月8日他给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常务局发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亚美尼亚经济和文化建设很糟糕，共和国的农业正在崩溃，正在修建的工业企业已经停工，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党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同时斯大林还对亚美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庇护"人民敌人表示不满，说什么"人民敌人帖尔-加布里埃梁是有意被灭口的，为的是保护仍然逍遥法外的敌人不被揭发出来。信中写道："不能允许亚美尼亚的人民敌人在亚美尼亚逍遥法外。"此信后，阿马图尼和阿科波夫被撤了职，被开除了党籍并被逮捕了。Г·А·阿鲁丘尼扬被任命为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下镇压的规模更大了，性

561

质也更残酷了。[1]

在摧毁乌兹别克斯坦党和苏维埃干部队伍时，斯大林也同样积极地参加了。根据斯大林亲自指示，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法·霍扎也夫被捕了。诚然，这次逮捕没有引起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阿·伊科拉莫夫的惊奇和抗议。这是因为法·霍扎也夫过去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青年布哈拉党（扎吉德)的组织者之一，是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当红军到达布哈拉后，霍扎也夫才成为民主布哈拉共和国的领导人，他是在1924年才加入共产党的。这使人认为，霍扎也夫的被捕可能是有一些根据的(实际上没有什么根据，法·霍扎也夫现在已被彻底平反)。但在这件事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当内务部机构又把新任的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阿布杜拉·卡利莫夫也逮捕了时，伊科拉莫夫打电话给斯大林说，他对内务部的行动想不通，因为卡利莫夫是久经考验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人，他不可能牵连到任何反革命事情里去。不知道斯大林是怎么回答伊科拉莫夫的。但是，此后尽管伊科拉莫夫仍任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再也接不通斯大林的电话了。[2]不久以后塔什干接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秘密信件，这封信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召开的专门全会上宣读了。信中，中央第一书记阿·伊科拉莫夫受到指责，说他在对待所谓以法·霍扎也夫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问题上政治上麻木不仁，说他还同已被逮捕的原反对派布哈林、安蒂波夫等人有联系。在宣读此信后马上就在全会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匆匆忙忙地“证实了”对伊科拉莫夫的指责是正确的。根据上述理由，全会开除了伊科拉莫夫的党籍并把这件事交付法院处理。[3]全会后住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人们获悉，在会议上曾发言为伊科拉莫夫辩护过的那

562

① 见《亚美尼亚共产党(布)的历史片断》埃里温1964年版第355页。

② 引自K·伊科拉莫夫(阿·伊科拉莫夫的儿子)的回忆录。

③ 见《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历史片断》塔什干1964年版第295—296页。

些人就在会场上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逮捕了。

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在1937年支持了恶毒的诬告者尼古拉恩科，就是她诬告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基辅市委和州党委许多干部并为此被开除了党籍。① 但当时斯大林不仅支持了尼古拉恩科，而且把她当成"揭发英雄"号召全体党员以这个诬告者为榜样。1937年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斯大林发言时说："尼古拉恩科是什么人呢？她是一个普通党员。她只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整整一年她不断发出了信号，说基辅党组织内情况很不正常，揭露家长式的工作作风，对待工作人员的小市侩庸俗态度，压制对他们的批评，揭发这些单位被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所把持。但是对待她正如对待讨厌的苍蝇一样，不断地轰开她。最后，为了轰走她，干脆把她开除了党籍。无论是基辅组织，还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都没有帮助她追求真理。只是党中央的干预才帮助解开了这个错综复杂的结子。对这件事的调查搞清楚了什么呢？搞清楚，尼古拉恩科是对的，基辅党组织是错的。情况正是这样。那么尼古拉恩科是什么人？她当然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人民委员，不是基辅州党组织的书记，她甚至连任何支部书记都不是，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 563

你们看，普通人往往比一些高级机关更接近于真理。"②

斯大林不仅指示逮捕了这些人，而且十分关注对许多著名布尔什维克案件的侦查过程，亲自看了审讯记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曾亲自审问过一些被捕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组织了对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向自己的朋友讲述过下面的情况："斯塔尼斯拉夫·柯秀尔被带到斯大林办公室里去审问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也在他的办公室里。人们叫柯秀尔坐在椅子上。他萎靡不振地坐在椅子上，看得出来他已经受过了不少折磨。'好吧，讲啊！'柯秀尔答道：'我说什么呢，我不就是波兰

① 见《乌克兰共产党的历史片断》基辅1964年版第466页。

② 《真理报》1937年4月1日。

间谍嘛！'彼得罗夫斯基问柯秀尔：'斯塔希克[①]，你为什么要诬告自己和我？'柯秀尔说：'我已作了交代，我不翻案。'这时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说：'你看，彼得罗夫斯基，你还不相信柯秀尔已成了间谍。现在你相信他是人民敌人吗？'彼得罗夫斯基回答道：'是的，我相信了，他是和我一样的敌人。'斯大林命令把彼得罗夫斯基档案拿来。档案里只有一张纸。斯大林不耐烦地问：'就这些吗？'对方回答：'对，只有这些。'斯大林朝彼得罗夫斯基喊道：'象你这样的人我们是枪毙的，可是我饶了你。'"[②]

这次对质后，彼得罗夫斯基回到乌克兰，他的职务被撤掉了，住房和别墅都被收回了。

564 在个别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指示对党的某一活动家要用什么样的酷刑。如果侦查员还是不能得到所需要的交待，斯大林就责怪内务部工作人员，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他们工作中的废品"。

当被告人和被捕的人在酷刑下交待出多达几十个"同谋者"的姓名时，斯大林并不要求进行调查，就亲自在侦查记录上签署"逮捕"或"全部逮捕"。[③] 当叶若夫在某次他的例行的汇报中告诉斯大林逮捕了一批干部（列举名单）并同时说，又得到关于另一批人的情况，现在正在对他们进行逮捕前的调查时，斯大林把叶若夫最后一句话勾掉了，写道："不是调查，应当逮捕。"

老共产党员巴·伊·沙巴尔金在集中营里遇到一个原契卡人

---

① "斯塔希克"是柯秀尔名字"斯塔尼斯拉夫"的爱称。——译者

② 引自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孙子——历史学家列·彼得罗夫斯基的材料。Д·M·巴采尔根据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妹妹的说法，对这段插曲的描写有些不同。根据这一证实材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是因为向政治局会议写了一份申诉书而被召到克里姆林宫的。听完他的申诉后，斯大林粗野地告诉这位列宁时代的老干部说："我们还同你客气，人们交待的关于你的材料已绰绰有余。"彼得罗夫斯基问："谁的交待？"斯大林答："就说柯秀尔吧"，并转身命令叶若夫："让他和柯秀尔对质。"这样，根据以上说法，上面讲的对质场面是在叶若夫办公室里进行的。

③ H·P·米罗诺夫：《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和继续加强法制和法律程序问题》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7—8 页。

员，他在1937—1938年是斯大林警卫队的成员。这人告诉沙巴尔金说，1937—1938年期间叶若夫几乎每天都夹着厚厚的文件包来见斯大林，他们两个人总是连续三、四小时地商量问题，他们商量的内容是可想而知的。

不能不指出，斯大林不仅指示对不称他心的人进行逮捕和用刑。在"审讯"结束后他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给他的名单，时常还在审判前就批示内务部建议给以什么惩罚措施。这样，法院要做的事，只是在几分钟以内在斯大林已批了的，早先就准备好的判决上盖印而已。

1935—1938年期间，斯大林几乎没有就科学问题公开发过言。但是现在已经清楚，正是因为他的亲自干预决定了大部分科学辩论的悲惨命运。在镇压和专横年代牺牲的所有稍有名气的苏联作家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被逮捕的。 565

大家知道，许多著名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对国内的镇压深感忧虑和愤慨，他们多次请求斯大林本人过问并停止国内的目无法纪的行为。对待这些请求斯大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他答应去搞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并不采取任何措施，有时让这些人去找莫洛托夫和叶若夫。但在多数情况下，他制止了这些申诉，要求不要干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在做什么。1937年9月斯大林和远东区委书记瓦雷基斯进行的这类性质的对话是很典型的。瓦雷基斯的妻子问瓦雷基斯："他怎样回答你的？"瓦雷基斯说："说起来真可怕，我最先以为说话的不是斯大林，是另外一个人。但这正是他……是的，是他。斯大林喊道：'这不是该你管的事。''你不要过问不该你管的事。内务人民委员部知道在做什么。'后来他又说：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辩护的人只能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就把电话筒扔开了。"[1]

这次对话几天后，瓦雷基斯被紧急召回莫斯科并被逮捕了。

---

[1] 见《真理报》1964年9月18日。

四天以后他的妻子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也被逮捕了。

斯大林不仅很了解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侦查过程中使用的严刑和残酷的逼供手段，正是斯大林，是这种非人道的"侦查"方法的创造者。在叶若夫被撤职后，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对被捕的人使用了严刑。这时斯大林给各州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各民族共和国的党中央，各内务部人民委员及各内务局局长发了密码电报，内容如下："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566 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并不隐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是在走资本主义之路，或更精确地说，是走法西斯惩罚机构的道路。)

所以说，斯大林不仅完全知道1937—1938年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形成的惨无人道的情况，而且是形成这种情况的实际祸首。当1938年初一批克累马的工作人员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反映新来的远东建设局局长巴甫洛夫和他的助手加拉宁在克累马专横霸道、违法乱纪行为时，斯大林给他们回了电报说："那加耶沃，《苏维埃克累马报》。奥西马科夫、罗马舍夫、雅格年科夫收。同时抄送远东建设局巴甫洛夫……收到奥西马科夫、罗马舍夫和雅格年科夫的长文电报，他们对远东建设局的工作状况及巴甫洛夫本人工作缺点提出了意见。电报并没有考虑到远东建设局工作中的困难和巴甫洛夫工作的特殊条件。我认为，电报是煽动性的和毫无根据的。报纸应该帮助巴甫洛夫，而不是设绊脚石。斯大林。"[1]

---

[1] 见《苏维埃克累马报》1938年1月17日。

这份电报导致了克累马的恐怖行径更加肆无忌惮，而且不仅是对待犯人，甚至于对契卡人员也是如此。

当然，斯大林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些年代在我国所发生的一切镇压活动和违法行为。其中许多是由于“地方的首创精神”造成的。但是一切主要镇压活动及指导镇压活动及逮捕的主要文件，首先是出自斯大林本人之手。正是斯大林在我国造成了并支持了如此的专横霸道无法无天的局面，因而导致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苏联人死于非命。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三十年代镇压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叶若夫或者由背着斯大林干了坏事的什么人负责。无疑，这些违法行为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斯大林自己负，然而这显然不等于说，在这些肮脏的勾当方面，充当斯大林的推行者和积极助手的人没有什么责任。不是叶若夫欺骗了斯大林，而多半是斯大林欺骗了叶若夫，无论如何，后者具备“无产阶级最灵敏的嗅觉”。斯大林在利用叶若夫实现了他的阴谋之后，按通常做法，消灭了执行者本人。 567

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斯大林犯下了这些史无前例的罪行，他大规模消灭掉的不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是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的基本干部队伍，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的呢？

二、关于“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问题

我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来的斯大林的形象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揭发出来的可怕的现实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无论使我国还是外国党内许多人自然会想到如何去填补这个距离，减轻这一沉重的精神上的打击和震惊，正如一个人突然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或自己最好的朋友，或自己敬爱的师长的暴行一样。出自这种符合人之常情的愿望，因而产生了一种新说法，而且这种说法至今还残留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这里我们是指“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这一有名的说法。

坚持这一说法的人不否认斯大林消灭了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人们，而且正是斯大林下达了逮捕，使用严刑和枪杀我党的许多杰出的活动家的指示，他应为三十年代大规模的镇压负个人的责任。

568 但是他们（坚持这一提法的人）认为：斯大林当时的行为并不是由于他居心不良，而是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冒险家和野心家以及敌人侦查机构的间谍所欺骗，上了他们的当，正是这些人为了消灭我党和国家最宝贵的干部队伍和使全国人民精神瓦解而炮制了那些假的诬陷材料。因此，可以设想，斯大林只是各种冒险家和间谍手中的工具，然而他自己却完全没有怀疑到这方面，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的时日他还坚信自己是同人民和革命的真正敌人进行了斗争。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书中写道："了解事态的钥匙最可能是在于纳粹第五纵队确实广泛地钻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构，在于确实有许多暗杀阴谋，以及在于这些阴谋对一个异常多疑的人所起的作用。他看到，有人阴谋要杀害他，并相信使用残酷的清洗是为了挽救革命。"① 安·路·斯特朗写道："斯大林是残酷无情的，这是因为他生在残酷的国家里，童年时代经受了人们对他的最残忍的对待。他不易相信人，因为他曾五次被捕和被流放，应该说他还不止一次地成为叛卖行为的牺牲者。（好象其他布尔什维克没有经过同样的，甚至更艰难的考验似的！——罗·麦·）他原谅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人们所进行的暴力行为，但是还没有人证明，斯大林知道这些人是无辜的。"②

甚至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有些著作中还在重复"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这种说法。

例如，И·韦尔霍夫采夫在他写的小册子中说道："斯大林的粗569 暴和病态的疑心正好符合外国间谍机构和野心家、冒险家、敌对分子的心意，他们钻进了苏联的安全机构并开始大量的，一个接一个

① 安·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莫斯科 1957 年版第 71 页。

② 同上第 138 页。

地炮制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卖国和叛变的事件。”①

作家B·塔利阿诺夫在他写的关于契卡的书中说道："直到几年以后，尼古拉才知道，在这一连串的悲惨的'偶然事件'中有着自己的体系；他才知道一伙冒险家制订了一套'从地下搞出来的，伪造交待材料的复杂方法，这些交待都是从完全无辜的诚实的苏联工作人员口里逼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打出来的，以便向斯大林说明：他被'间谍'和'阴谋家'所包围，只有他们——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和他们的同伙，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叶若夫、美尔库洛夫等——才能抢救领袖于暗害，挽救国家于灭亡。然而，正是这些野心家才是真正的阴谋分子。”②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在她逃往国外后出版了她写的有关她父亲的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这本书中她也企图强加给读者同样的关于“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的说法。斯·阿利卢耶娃在列举了许多亲友的被捕和枪决（这些事都是斯大林知道的和同意的，）之后，叹道："父亲怎么能这样做？我只知道一点：他不可能自己想到这些。”接着，阿利卢耶娃企图断定，这一切镇压都是叶若夫和贝利亚歹毒阴谋的结果。斯维特拉娜写道："可以不断向他灌输：某人不是好人，我们多年都认为某人是好人，错了，其实他是个坏人，只是我们曾经觉得这人不坏，而实际上却是敌人，仇人，他说了你许多坏话，这里有'材料'，这是事实，某甲和某乙已经'供出'了他……至于为什么这某甲和某乙在内务部的院墙内什么都可能'供出'来——这些事父亲就从不深究了。这已经是贝利亚、叶若夫和其他刽子手们的事了，这些人具有这方面的专业才干。……非常奇怪，我父亲在贝利亚的阴谋诡计面前是多么束手无策！”她接着写道："我说父亲受他的影响，而不是相反，不是随便说的。我认为贝利亚为人更狡猾、更背信弃义、更奸诈、更无耻、更死不回头、更顽固，也就是说胜父亲一筹。父亲有他的软 570

① И.韦尔霍夫采夫：《党内生活中的列宁规范》莫斯科1962年版第29页。

② B.塔利阿诺夫：《看不见的战役》莫斯科1964年版第74—75页。

弱之处，他遇事比较多疑，比较轻信人，比较粗暴生硬，但他也比较简单，因此容易上贝利亚这种诡计多端的人的当。”①

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一些西方共产党员的假设走得更远，他们企图把叶若夫和贝利亚说成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组织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资产阶级侦查机构直接布置下来的任务一贯地欺骗了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公开”审讯也似乎是根据这些侦查机构的布置进行的。

这一些愚昧无知的解释归根到底是要用各种办法把斯大林粉饰一下，不管他的犯罪行为是多么异乎寻常的残忍，性质是多么严重！

显然，斯大林不是什么预言家，他在许多方面都有他的局限性，同时，他又是一个极端多疑的人。所以毫不奇怪，就是在斯大林的“宫殿”里，正如其他任何独裁者和暴君的宫殿里一样，曾不断地制造出各种阴谋，在他身旁的一些人中间也不断地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斯大林是脱离人民的，是用固若金汤的围墙和人民隔绝了的，他对党内和国家情况很不了解，这为蒙骗他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所以可以设想，在某一些情况下斯大林的心腹可能用造谣惑众的 571 办法使他对某些原来他信任的人发生怀疑，并坚持斯大林批准对那些斯大林本人可能原来并不想排除的人进行逮捕和枪杀。众所周知，在搞阴谋这种事情上贝利亚堪称老手。例如，1955年在格鲁吉亚审讯贝利亚同伙时查出，当斯大林和贝利亚乘汽艇在黑海游览时发生的那桩企图暗害斯大林和贝利亚的事件，原来是贝利亚一手制造的，因此，这件事对斯大林的生命并没有任何威胁。一些被贝利亚雇用的骗子，有意躲过目标在山上朝天放了枪，后来他们去领奖时被消灭掉了。可是这件事给贝利亚提供了镇压阿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拉科巴和其他许多忠于党的同志的良好机

① 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纽约1968年版第70、130页。

会。

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材料，国外侦查机构也采用过类似的蛊惑人心的办法欺骗斯大林。例如，保加利亚法西斯的反动侦查机构也曾把各种伪造材料塞给叶若夫的侦查人员。根据费·拉斯科里尼科夫证实，这些材料诬陷了诚实的工作人员，使苏联驻保加利亚使馆几乎所有工作人员，从司机 M.H. 卡扎科夫到武官 B.T.苏赫鲁科夫都被捕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阴谋和奸计放在首位来解释三十年代的镇压的话，那就会犯很大的错误。

在这方面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的悲惨遭遇是很典型的。还在二十年代，为了从政治上诬陷图哈切夫斯基资产阶级报刊费尽了心机。亚·伊·托多尔斯基写道："文痞们对他非凡的人品发生了卑鄙的兴趣，别有用心地强调他出身望族，用低级趣味解释他那神话般的军事生涯，甚至说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怀有拿破仑式的用心。从 1920 年夏天起，图哈切夫斯基对资产阶级说来早已是极不受欢迎的人物了，因为他在追击波兰白军干涉军时，领导了西线神话般的军队，当他出现在华沙城下时，使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胆战心惊。从那时起出现了'红色拿破仑'的喧嚣一时的作品。"①

572

德国的将军们企图同苏联作战时，很清楚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许多德国将领对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及其他苏联军事将领都很熟悉，在苏联军队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以及当苏联的军事将领在西方的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他们都和这些人见过面。

法西斯德国的领导设想过，斯大林的充满虚荣的计划和奢望会和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这样的将领发生冲突。这促使盖世太保去组织一个阴谋事件，其目的是毁坏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的名誉。

---

① 亚·伊·托多尔斯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莫斯科 1963 年版第 5 页。

现在我们已知道，1937 年盖世太保确实炮制了所谓图哈切夫斯基致他的在德国的“朋友”的一封假信，在这封信里似乎写着图哈切夫斯基本人和他的同伙企图通过国家政变摆脱文职人员对他们的监护。在这封信里，盖世太保不仅模仿图哈切夫斯基的笔迹，而且使用了图哈切夫斯基所特有的风格。假信上面还有德国反间谍机关的真印章：“绝密”“机密”，还有希特勒的真批示——命令对同图哈切夫斯基保持秘密来往的德国将领加以监视。现在甚至还弄清楚了伪造图哈切夫斯基签字的雕刻师的姓名。为了把图哈切夫斯基的所谓的这封“信”及其它附件转到斯大林的手里，假造了一次德国反间谍机关大楼失火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侦查机构的人员就乘机把图哈切夫斯基档案卷宗从楼里偷了出来。贝奈什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证实，早在1937年 1 月他就得到了非正式的消息，说希特勒同图哈切夫斯基、李可夫等人正在谈判如何推翻斯大林并成立一个亲德政府。贝奈什马上把这些情报告诉了苏联驻布拉格代表亚历山大罗夫斯基。①

这样一说，可以设想在图哈切夫斯基问题上斯大林确实被欺骗了，上了法西斯侦查机关的当。但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牺牲的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其中许多问题还未搞清楚。第一，我们现在从国外发表的材料中知道，想出图哈切夫斯基“阴谋”这个主意的不是盖德利赫②，而是一个白俄侨民尼克·斯科勃林将军“抛”给盖德利赫的。③西方报刊也公布了有关斯科勃林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盖世太保的关系的相当详细的材料。正是从斯科勃林那里盖世太保知道了所谓图哈切夫斯基“阴谋”并决定去帮助斯大林。④

1937 年初斯大林已得到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叛卖的“确凿材

---

① 见《贝奈什回忆录》伦敦1954年英文版第 19—20 页。

② 德国纳粹头目之一。——译者

③ 见A.M.涅克利奇：《1941年 6 月 22 日》莫斯科 1965 年版第 86—87 页。

④ 见B.哈根：《秘密战线》，B.亚历山大罗夫：《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等。

料"，但是他那时没有撤掉图哈切夫斯基国防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况且，我们现在知道，装着图哈切夫斯基的假信等的著名档案卷宗并没有在审讯图哈切夫斯基时拿出来，也没有在1937年6月1—4日举行的军事委员会上拿出来，这次军事委员会在审判前研究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叛国案件。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他的讲话中毫无根据地控告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人并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要把他们处理掉。此外，叶若夫给军事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发了已经被捕的军事干部的假"交待"，这些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伪造的材料"揭发"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波列维奇等人出卖祖国和企图进行国家政变。至于盖世太保的假材料，当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被枪杀后才被放进图哈切夫斯基的案卷中去的。这样，我们看到，仅就这件事情来说，事实也完全驳倒所谓"被欺骗的"斯大林的悲剧的说法。 574

* * *

斯大林是个人感情从不外露，遇事不动声色、极不坦率的人，他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讲过他自己真正的意图和真正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没有同谋者，没有任何他信得过的朋友。这样的情况在解释斯大林的行为的动机时，自然就给了各式各样的设想以很大的天地。大家也知道，斯大林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日，无论在讲话中还是在他的著作和信件里都继续断言，被他消灭的人都是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但是就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斯大林的意图、言论和他的真正行为的不一致表现得多么典型。斯大林的全部精力是致力于如何保持自己无限的权力，因此他对自己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持蔑视态度，总的来说，他对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因此消灭掉成千上万，乃至于几十万人对他来说并不构成什么大的道德上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无疑地懂得并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勃柳赫尔、波斯蒂舍夫、邱巴尔、斯瓦尼泽、雅基尔、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李可夫，还是其他根据他的命令而被捕的几千名我党的著名活

动家，他们都不是间谍或叛徒。斯大林的这种断言只不过是造谣，而他的全部行为只是令人信服地表明，这是一种蓄意预谋的造谣。

斯大林去世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里发现了大量的诬陷我党和国家的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著名活动家的材料。如果从当时的侦查案件考虑，那么在几乎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都存在着所谓星罗棋布的“右派托洛茨基的、间谍恐怖的、破坏和暗害的组织和中心”网，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为首的通常都是州委和边区委员会以及民族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

575

例如，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内务局“揭出”了所谓“乌拉尔起义司令部——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宗教派的联盟机关”，它的领导人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这时不难发现这个组织的绝大部分诬陷材料不是外面提供给内务部机构的，而是在内务部里面由侦查员和他们的领导炮制出来的。在这里有一个真正的造谣工厂，它生产了几十万份各种“阴谋”、“恐怖案件”、“间谍活动”和“暗害活动”的伪造材料。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制造这样或那样的“假案件”后，竭尽全力企图在喜剧般的侦查过程中以及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受到各种检查时强迫那些落到他们手里的人们去重复内务部机构炮制出来的“神话”。出自这样的目的，这类“检查”有时由内务部侦查人员自己进行排演。

例如，共青团创建者之一——Ш-В 后来被调到俄罗斯联邦一个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他被捕后，经不起残酷的折磨，作了不仅毁坏自己名誉，而且也毁坏州委其他领导者名誉的交待。他清醒过来以后非常难过，等待时机以便推翻他交待的材料。有一次Ш.被提审，在场的有一个人，说他是联共（布）中央的代表。Ш.急忙推翻了他交待时说的假材料。几天以后他又遭到严刑拷打，而且在侦查员要求他签字的所有材料下面签了字。后来Ш.因为继续审理他的案件，被转到莫斯科，此刻又有一个人似乎是代表联共（布）中央找他谈了话。Ш.又鼓起最大的勇气推翻了假材料和

诬告。可是当他在莫斯科也因为说了真话而遭受了毒打之后，他是多么绝望。他明白了，在这里也只不过是一次排演。所以当他第三次和代表中央的人谈话时，这个人告诉他，说中央很关心这一案子，他已经不打算再说真话，就一口确认了他的假供词。当被提审回来后他万分恐怖地发现，这次和他谈话的，坐在阴暗的角落沙发上的那个人确确实实是联共(布)中央书记之一安·安·安德烈也夫。 576

类似的事情传来传去确实在许多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人们之中造成了一种幻觉，似乎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的人民敌人蒙骗了，使他迷失了方向。但是今天，只有很少一些原来被关押的人保留了类似的幻觉。

如果认为正是在内务部里面炮制出来的诬陷材料是我党和国家优秀人物牺牲的主要原因，而斯大林只是相信了这些诬陷材料，那么这确实是极大的错误。不是这样，对斯大林不称心的人们的诬陷材料是伪造出来的和受到鼓励的，这些诬陷只是作为逮捕和加罪于人的理由，而镇压的真正原因则隐藏得更深。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斯大林本人制造出了主要的说法，用以调查被诬陷的最著名的国家和党的活动家。而内务部侦查人员不是去核实斯大林的这种或那种说法，去比较和研究事实、罪证和文件，而他们只是应该“再补充地想出”斯大林说法的一些细节，并且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得到被告人的承认。

例如，只要认真调查一下斯大林抛出来的希特勒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假材料，就不难识破它。各国罪行调查人员早已有足够的方法用以辨别这类假材料。但是斯大林不愿意也不委托人进行这类的证件鉴定，况且当他们得到上述假材料时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已经被处决了。

内务部诬陷诚实的苏联人炮制的许多其它材料的虚假性就更加容易搞清楚。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最亲密的助手不进行也不愿意进行对这些材料的检查。 577

当斯大林批示逮捕或处决他的原来的战友和朋友时，他很少表示要亲自和这些人见面并审讯他们，亲自向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难道不奇怪吗？斯大林密切注意整个调查过程和许多被捕者的表现，他很了解，一些人虽然经受了最恶毒的严刑和虐待，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斯大林还是批准枪决这些人。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曾收到他许多原来的战友的申诉和临终的书信，在这些信里他们说自己无罪，自己忠于党和斯大林，并请斯大林亲自接见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斯大林总是拒绝这些请求，甚至不愿意回答这些信件和申诉。

这其中有一份申诉是1939年10月29日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写给斯大林的，这封信在二十大上宣读过。埃赫在申诉中写道："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是被指控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从来连卑鄙的影子都未曾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待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了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非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我的交待大部分是乌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

578

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炮制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乌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

……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能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这一声明同许多其它类似的声明一样，斯大林都未加理睬。它被转到贝利亚手中，因此没有能阻止对埃赫进行残酷迫害，埃赫于1940年2月4日被枪决了。

政治局另一个候补委员卢祖塔克同志也在法庭上完全推翻了自己被逼出来的交待。在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开庭审判纪录中录下了卢祖塔克如下声明："……他对法庭的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也没有人理睬。斯大林不愿意和他谈话，所以卢祖塔克也被枪决了。

579

里昂·费赫特凡格尔在他写的书中证实，斯大林告诉他，拉狄克给他写过长信，使斯大林相信自己是无罪的。但是斯大林不愿

意和写这封信的人见面。可以设想，斯大林对这封信真正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正如斯大林告诉费赫特凡格尔那样，说拉狄克第二天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一切完全可以证明，对斯大林来说，所有根据他的命令而被镇压的人们的命运是早已决定了。

如果从这样的设想出发，即斯大林坚信根据他的命令而被镇压的人确实有罪，那么有一点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即他为什么要对案件的侦查如此关心地采取保密措施，使任何旁人，甚至连检察长都不能看一眼内务部监狱？为什么斯大林决定对所有政治犯废除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审理？为什么他剥夺了这些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以此证明自己无罪？为什么判决政治“罪行”的审判就在监狱里进行，而且往往只进行四——五分钟？为什么许多政治犯不经任何审判而被所谓的“三人小组”的决定判决长期徒刑？为什么 560 从1937年到1938年逮捕的一切党和国家干部于被捕后，审理还远未结束时就马上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因此被开除党籍？为什么在恐怖年代斯大林规定了这种违法的程序，即内务部机构自己就能逮捕人，自己审理，自己审判和判决，并且自己执行这一判决？如果我们从“被欺骗的”斯大林这一说法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对这些问题永远不可能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回答。

有些州由于应付不了镇压的庞大“计划”，把一切调查工作都简直是极端简化了。例如，根据原军事检察长M·M·伊绍夫的证实，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内务局，一些工作人员不仅自己编造各种臆想天开的事情，而且自己替犯人在审讯记录上签字。然后不和犯人见面，就背地判决，而且经常是被判枪决，不用给犯人用刑，也不审问就把人枪杀了。在外地逮捕和搜查经常都不必经过检察长或检察机关的批准。

但是在莫斯科和其它许多大城市，多数“大”案件还是遵循一定的“法制”手续。例如，内务部的侦查人员在逼犯人诬供自己有罪和假造出各种“阴谋”之后，还要求这些不幸的人亲自在这些臆

造出来的假记录上签字。在遇到反抗时，如达到上述目的，有时需要好多天、甚至是好多个月的虐待和非刑拷打。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可是在这里，不仅要摧残犯人的意志，从精神上消灭他，而且是由于坚决和有意识地想掩盖罪行，逼迫被捕的人自己伪造多少说得过去的“故事”，以便那怕从表面上给枪杀诚实的苏联人们的事以某种法律根据。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和逼迫自己的“实在的”和“潜在的”敌人交待假口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开始使用非刑和进行虐待。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动机，根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所有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等地方规定了那种残酷到可怕程度的生活制度，因而使多数犯人死亡。

581

大家知道，当希特勒分子把几百万人送往奥斯威辛、迈达涅克、特列姆勃林卡等死亡集中营时，随犯人送达的文件上写道：“不希望回来。”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的做法是伪善的。在许多“人民敌人”的档案上面写道：“只能分配重体力劳动的工作。”但是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因为在当时集中营的条件下“重体力劳动”等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犯人死亡。

这难道不告诉我们，斯大林是在有意识地消灭自己罪行的一切痕迹？这难道能和“被欺骗的”斯大林之悲剧的说法相吻合吗？

1955—1958年间，在我国各城市都进行了对原内务部工作人员的一些公开审判，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斯大林时期担任过国家安全机构的负责职务。这些审讯又一次证明，在个人迷信时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班子已经成了各种冒险家和野心家的汇集之处，而其中也有一些人则是政治上最黑暗的人和刑事犯。

内务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丑恶的精神面貌是和他们极低下的智力水平相符合的。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说：“不久以前，也就是我们的大会的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审理柯秀尔、邱巴尔和科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了来，并审问了他。这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目光如鼠，一个道德堕

落的败类……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等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做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 贝利亚的亲密的助手帕拉莫诺夫长期高踞苏联内务部侦查局局长的职务，他连完全的中学教育都没有受过。苏·奥·加扎梁证实，有一次有人要叫他出丑，就和帕拉莫诺夫开了玩笑，写了个小报告，控告了格奥尔基·萨阿卡泽是坏人，帕拉莫诺夫宣布通缉这位格鲁吉亚十七世纪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显然，当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法院和检察院中也有具备相当高的知识水平的人，如安·亚·维辛斯基和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员列·舍伊宁，舍伊宁甚至还从事写作活动。但是在道德面貌方面这些人同侦查员罗多斯没有什么大区别。）

582

处于斯大林亲自监督之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为什么会是冒险家、暴徒、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人占了优势呢？

这不是偶然的。在惩罚性机构，斯大林正是需要这样的人。如果说在个人迷信时代冒险家"钻进了"这些机构并把斯大林置诸自己影响之下，那简直是笑话。不对，是斯大林自己把这类人推荐到这些机构中去的。此时，他很明白，他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尽管他是非常多疑的人）。按斯大林的看法，这些人具备一种不可估量的优点，就是他们完全从属于他，他授与他们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不加思索，也不受良心的谴责去完成斯大林的任何命令。

我们还附带地指出，斯大林把这类可以干出任何罪恶勾当，而且只是从属于斯大林一个人的家伙搞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的这种作法并不是斯大林所独具的特色。过去的暴君都是这样干的。例如，可以回想一下法国专制制度的创始人路易十一和他的警察总长特里斯丹。我们还可以回想起伊凡雷帝和他的禁卫军，其中就有雷帝的最宠爱的近臣，贵族社会的贵族马柳塔·斯库拉托夫，他几乎是一切暴行的参加者。

我们知道，斯大林把惩罚机构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常一面消灭其中的一些干部，一面又提拔起另一些干部。这一切事实再一次证明斯大林的罪恶活动和命令是有意识进行的，这一切绝不能用所谓的“被欺骗的”斯大林这一无知的说法进行解释。 583

要描绘一个神经脆弱，疑神疑鬼，心慌意乱、坐卧不安的人的形象并不困难，描写这个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由于重大的责任压在他的双肩，而使他不知所措。这个人性格摇摆而软弱，他开始到处看到敌人和阴谋，他徘徊不定，辗转不安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把他自己的最好的和忠实的朋友杀害了，并把国家交给了骗取了他信任的一小撮毫无才能，但却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在我们国家出现这样领导者的可能性(抽象地讲)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种神经衰弱的领导者。斯大林无疑是神经坚强的人，他是具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和自制力甚强的人。他是一个铁腕人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周围的人才有那么大的影响。斯大林的一切重要的活动和命令不是来自他的恐惧或受骗，而是一个决心不屈不挠无论如何也要达到自己目的的人的有计划、有意识的行为。他在他写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时说：“‘蒙蔽斯大林同志’并不那么容易。”①

三、斯大林是精神病患者吗？

我们很了解，过去历史科学不止一次被迫求助于精神病学。确实如此，历史上有不少例子说明某一国家出现过精神不正常的首脑人物。历史上的一些暴君和独裁者，如萨那赫—哈里布和尼禄，卡里古拉和菲力浦二世，伊凡雷帝和保罗一世，由于他们的不良遗传倾向在享有无限权力的条件下得到发展，他们的行为和活动显然具有病态的征兆。近代史上，在希特勒及其一些助手的行为里 584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02页。

也很容易发现明显的病态征兆。

所以毫不奇怪，在解释斯大林行为时有一些人提出过并继续提出关于斯大林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的说法。尼·亚·阿列克谢也夫(1897 年入党的党员，职业是医生)在老布尔什维克同二十二大代表座谈时就提出：说斯大林患有精神病和"无责任能力"。同样，监禁十七年后返回莫斯科的老党员И·П·阿列克萨欣于 1961 年 11 月 17 日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也提出关于斯大林是精神病患者的说法。

苏共二十大后，国外的共产党员也提出了斯大林是神经不正常的人。美国共产党员古·迈耶尔在他的书中写道："为了懂得为什么在赫鲁晓夫报告中的揭发后引起了全世界共产党员的无限愤怒，那么首先必须弄清楚，报告中的什么内容引起了这样的愤怒。是否有些人，当他知道了斯大林如何肆无忌惮地追求自我颂扬而觉得震惊呢？斯大林是如何坚信自己是无罪的呢？他犯了什么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错误？在把印古什人[1]，伏尔加河沿岸的日尔曼人和鞑靼人迁移到西伯利亚时，斯大林表现出什么样的残酷的复仇心理？……显然，愤怒的风暴并不仅是因为这些揭发而引起的。引起震惊的是：斯大林参与了把成千无辜的人处以极刑，他无情地镇压了党内的分歧和批评，他同意使用非刑作为逼供的手段，他的病态多疑状态以及他一手制造的普遍恐怖的气氛。这些残酷的非法行为不可能而且也并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些罪行的

585 产生乃是历史的偶然性，即斯大林的妄想狂，这是非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因素，即通常称之为客观历史条件以外的因素。"[2]

* * *

根据医学手册上说，妄想狂是这样的一种精神错乱症，其临床表现主要是带着浓厚色彩的系统的妄想，但只包括一定的观念范

① 印古什人为高加索的少数民族。——译者

② 古·迈耶尔：《赫鲁晓夫的报告和美国左派运动的危机》莫斯科 1957 年版第 15—20 页。

围，其发展中不出现或很少有幻觉，就个人性格来说没有明显的变化。①

我们知道，妄想狂更多的表现在四十至四十五岁年纪上的性格坚强，但喜怒无常的男人身上。这些人在患病前就一般倾向于过高的估价自己，过份自信，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对伤害其自尊心的事物特别敏感，容易热衷于某一想法，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病后的发展一般一面表现为自大狂，同时也表现为迫害狂。妄想狂患者同时还有这样的特征：自我为中心、记仇、乖僻、固执和坚持、渴望领导别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对这样的人来说是否有意义，只是以其是否对他们的思想和对他们的自我颂扬有利为转移。妄想狂病人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则不择手段。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解释为不怀好意，对别人的态度总是异常的猜疑，特别热衷于揭发自己的"敌人"，并引以为乐事。违 586 背妄想狂患者的意愿往往导致患者不可遏止的仇恨和愤怒，在患者掌握大权的情况下他对敢于反对他的人进行野蛮的迫害。妄想狂患者坚决要求人们承认他的功劳和"发明"，一般来说这种患者仇恨那些庇护过他或者他应该感谢的人。精神病学教授П·И·科瓦列夫斯基写道："妄想狂患者没有朋友，他也没有交往亲密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为他服务的，但是他却不为任何人服务……这是冰冷无情、残酷的自私自利的人，只想做一切事都是为了自己……残忍、冷酷、会打小算盘，是他们性格的特点。在妄想狂患者的行为中处处都表现出猜疑、不信任、心怀莫测和残酷。心怀莫测是妄想狂患者的相当典型的特征。他的残酷程度超出我们想象中对残酷的一般概念。他们就是为了残酷而活着。他们长期地策划想办法以求表现出他的残酷。他们醉心于自己的残酷，在实现了他的残

① 《医学大百科全书》1961年第23卷第242页。关于斯大林患精神分裂症的说法应该马上排除，因为精神分裂症的表现是情绪和意志领域的障碍（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意志冲动的降低），思维的逻辑性和目的性被破坏，发生幻听和其它幻觉，个性消失。这些特征在斯大林身上显然是没有的。

酷手段时，则感到十分愉快。这种残酷成性往往和渴望流血连在一起……与此残酷和渴望流血事件的同时，妄想狂患者有时还表现得很狡猾，谨慎和阴险，甚至胆怯，但这不妨碍他们去策划复仇和搞阴谋诡计。"① 除了妄想以外，妄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受累及，② 不发生个性的丧失，记忆力，注意力和智力也仍然保持良好状态。就是妄想狂患者的妄想也通常不带有荒唐的性质。因此许多妄想狂患者活到很老也没有进精神病院，他们甚至时常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有些妄想狂患者在自己的工作中甚至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是也有这样的妄想狂患者，他们因某种587 程度的自大狂和迫害性，越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职业对他周围的人进行危害。有些患者甚至去凶杀自己想象中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妄想狂患者通常被认为是无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并送进精神病院以便进行强迫治疗。

许多历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认为伊凡雷帝是典型的妄想狂患者。③

从上面对妄想狂症和它最典型的症状的描写可以看出，关于斯大林患有严重精神病的说法并不是绝对没有根据的。今天，当我们分析斯大林的全部行为时，不难从中发现明显的妄想狂因素。病态的猜疑，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最后几年更为突出，他不能容忍批评，记仇心理，近于自大狂那样对自己的过高的估计，达到虐待程度的残酷——斯大林的这一切特征似乎在证实关于斯大林是妄想狂患者的说法。即便如此，我们认为这种设想的根据还是不够充分的。

---

① П·И·科瓦列夫斯基：《历史中的精神病方案》第3卷（哈尔科夫1893年版）第65—75页。

② 这里用了医学术语，即表示：心理活动不受影响。——译者

③ 例如，见上面已提到的П·И·科瓦列夫斯基所著书中的一节《伊凡雷帝及其精神状态》，也见A·利奇可的文章：《精神病学家所看到的》，《科学和宗教》杂志1965年第10、11期。

大家知道，医学认为：在真正精神病（患者被认为是没有控制能力的并应该送进精神病院的）和属于反常情况下的一个人的各种变态心理（这时该人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变态心理往往是精神上的变态的表现，一般是由于周围环境对某一人在童年时代的有害的影响。变态心理患者是处在神经健康的人和精神病患者边缘上的人。但是他被认为是能自持的和有行为能力[1]的人。妄想狂病学 588 也承认变态心理和真正的精神病之间有区别。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所谓的妄想狂变态心理，也就是说精神病学专家面对一个有妄想狂性格的人，但他并没有妄想的表现。诊断这类精神上变态现象是非常困难的。根据精神病学专家的观察，许多有妄想狂变态心理的人，一开始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只有在与之经常接触后，才发现他是一个凶狠的，不满一切的人。这样的人并不表露他的真正的妄想，但是他们在如饥似渴地搜集谎言、诽谤、谣言，并善于去利用各种小的误会。他们所讲的话往往显得很真实。他们很容易欺骗善良的人，只有经过非常仔细的调查才能发现他们的谎言和诽谤。这些具有变态心理的人和明显的妄想狂患者一样，他们的特征也是病态的不信任，残忍的自私自利，不可一世的骄傲、虚荣心，没有人性，在同妨碍他的人做斗争时，使用可耻的方法。

在评价斯大林的行为和个性时也应该考虑这种变态心理和精神病之间的区别。尽管斯大林本人的变态心理在最后二十年已完全具有妄想狂患者的变态特点，尽管他的行为肯定不仅反应了严重精神上的变态，而且反应了严重的精神失常的现象，但是我们深信斯大林毫无疑问是有控制能力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任何法庭，包括历史法庭都不能借口斯大林无控制能力而为他的行为辩解。

---

[1] “有行为能力的人”指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面前能够负责的人。——译者

很明显，不管斯大林如何多疑和不信任人，他在行动上是有很大自持能力的。选中了一个牺牲品后，他从来没有不经过预先的周密的安排和准备就去打击他。他的做法不是一个完全受迫害狂589的力量所支配的反常人的行为。不是的，斯大林行事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和谨慎的，还在惩治受害者之前他就组织对他的陷害——有意识地夸大他的"敌人"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力图使不合他心意的人威信扫地并受到诬陷和诽谤。

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镇压地方、州和共和国一级的党和苏维埃组织时，在镇压中央一级国家和经济组织部门时，根据不同情况，他们主要使用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可以假定称之为"从上而下"。这一方法就是，对某一州、共和国或机关的整个领导班子给以出其不意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根据莫斯科炮制出来的所谓某人的交待)。州或机关的领导人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人民敌人，间谍。紧接着就是州的各组织部门的干部，编辑部干部，企业和机关的领导，区委和区执委会的领导以及莫斯科的中央机关的各局、处的领导和普通工作人员均遭逮捕。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多年领导某区或某机关的"人民敌人"到处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种方法可以假定称之为"从下而上"。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开始时，内务部机关不和州领导、共和国中央和人民委员部的人进行任何协商就逮捕一些被宣布为暗害者、人民敌人和间谍的普通工作人员。同时，中央报刊，常常也和地方报刊一起大喊大叫起来，表示困惑不解：不晓得州的领导，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部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敌人的活动?接着逮捕范围渐渐扩大起来，越来越多的诚实的人们被推进"敌人"之列了。州委机关和共和国中央机关的个别工作人员及人民委员部各局局长也遭到590逮捕。和他们同时被镇压的还有一些接近州、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部领导的人们。这可能是某人的司机，某一科长，编辑，秘书或

亲属。州、共和国、人民委员部领导自然力图保护那些诚实而他所熟悉的人免遭迫害，因为他们毫无疑问是忠实于党的人。但是这就被看作是包庇人民敌人。报刊的调子越来越肆无忌惮、咄咄逼人。报刊在散布猜疑因素并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暗示说：州、共和国中央和人民委员部组织严重不纯，某一领导显然是在帮助人民敌人等等。在一些文章和材料里公开表示对州、共和国中央和人民委员部的某一领导人不信任。然后就出现一些暗示这些党内有名望的人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其它一些足以罗织罪名的关系。而这一切，自然就鼓励了各种诽谤者，和鼓励那些因抱有私仇去陷害人的分子，鼓励他们这些人写诬陷材料并送交内务部机关。在个别情况下中央报刊越过州委和州人民委员部去邀请普通党员起来反对自己的领导。在这方面，《真理报》上有一篇文章是很典型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是奥姆斯克布尔什维克应该大声疾呼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说："如果奥姆斯克州委的领导对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不采取措施并包庇他们，那么奥姆斯克布尔什维克应该大声疾呼了。"①

在1937—1938年的条件下，这样的长期或短期的诬陷运动导致某一领导在普通党员和人民中被孤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使这些领导人解除了精神上的武装，使他们不知所措，对现实百思不解，因而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与此同时，这种运动动员和团结了各种野心家和大骗子。最后，事情就以斯大林和内务部机构圈定的受害者的身亡而告终。

不必多说，这样的行为和妄想狂患者的行为很少有共同之处。 *591*

还有一点是很说明问题的，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开始时只是撤除某一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职务，尽管他已经掌握了足以证明某一活动家"有罪"的诬陷材料，但他暂时还不去逮捕他。那位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被调到另一个不太重要的工作岗位，有时也被

---

① 《真理报》1937年9月28日。

调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从莫斯科下放地方，或者相反，被调回中央。这样，斯大林就把他的“对手”从他所习惯的环境里和了解他并信任他的集体中调了出来。1937—1938年就有过这样的情形，某一著名的共产党员曾三、四次从一个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领导岗位，从一个州委调到另一个州委，从一个人民委员部调到另一个人民委员部。例如：德宾科于1937年被解除伏尔加河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但几个月后他又因“缺乏警惕性”被免除了这一职务，又被任命为苏联林业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并被派到乌拉尔去了。而1938年4月德宾科终于在乌拉尔被逮捕了。① 大家知道，波斯蒂舍夫于逮捕前被派到古比雪夫州委任第一书记，邱巴尔被派往索利卡姆斯克任市委书记。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枪决前几周从莫斯科调到古比雪夫市任伏尔加河区军区司令员，柯秀尔在免除他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后，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并从基辅调回莫斯科。亚哥达在免除其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后也没有马上被逮捕，1936年9月他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1936年9月27日他的像片和叶若夫的像片并排登在所有的报刊上。阿·科萨列夫在共青团中央第七次全会后实际上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但也没有马上被逮捕。根据科萨列夫爱人的证实，在他的别墅里每一棵树后边都有人在监视他，但暂时没有动他。甚至连叶若夫1938年12月被免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后，过了几周才被捕，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内河运输代理人民委员的职务，甚至有时和斯大林一起露面。这一切也不象是无控制能力的人所能做出的行为。

592

我们知道，许多和列宁关系亲密，但都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也没有被逮捕，尽管他们和那些已经被捕的“人民敌人”关系密切和友谊很深，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些人只是不能参加党和国家重要问题的决策工作，他们被任命担任次要的职务。1937—1938

---

① 见《军事史》杂志1965年第10期。

年斯大林没有逮捕象波德沃伊斯基、柯恩、彼得罗夫斯基、斯塔索娃、米哈·茨哈卡雅、菲·马哈拉泽等都是过去党的负责干部和列宁一代党的老干部的代表人物，虽然这些人的名字不断在诬陷材料中和已被逮捕的许多共产党员交待的材料中被提到过。

许多人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在命令逮捕和处决列宁一代老布尔什维克中的一部分党的活动家时，却“饶恕”了属于同一代老布尔什维克的另一部分著名党的干部呢？为什么提交斯大林批准逮捕的名单中，他有时划掉一些人？为什么当斯大林“着迷似地”阅读审讯记录时，看到犯人几十个“同谋”和“同犯”的姓名时，在一些姓名旁边没有批写逮捕他们的指示。也许斯大林和许多暴君一样，陶醉于所掌握的无限权力，他不仅在摧残和枪杀不合他心意的人时感到陶醉，而且当他高抬贵手，让这些人活下去时，也同样感到陶醉吗？这是让这些人知道，正是他，斯大林给他们保住了生命和自由，是他有权“处决和赦免”。我们想，主要原因当然不在这里。在这种情形下，无疑基本和主要的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对斯大林来说，由于他有意蛊惑人心，把自己说成是列 593 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因此，就有必要和最好是让一定数量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真正的朋友和战友活着，以便用此表示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之间的继承性。这些人常常被迫去讲吹捧斯大林的话，在斯大林过生日时，他们要集体发表声明以及给“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发贺信。这一切再一次证明，斯大林的行动不是象反常的人那样受着妄想狂的指导，而完全是出自某些政治打算。

在这方面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亲密战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马·李维诺夫的命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内务部机构在1937—1938年间就逮捕了一些著名的外交家，他们无论从个人关系还是从工作关系上说和李维诺夫都很亲密。但是1939年5月2日李维诺夫被撤除了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后，他领导的外交部才受到真正的镇压，外交部的几乎所有主要干部都被捕了。与此同时内务部的审讯人员逼着被捕的人签署陷害李维诺夫的交待，说

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中的首席间谍，是间谍组织的头子。一些外交官员和外交部的干部受不了非刑拷打签署了这样的交待。在这几个月里马·马·李维诺夫每夜都等着逮捕他，并且已经准备好一箱衣服，以待这一情况的发生。但是始终没有逮捕他。为什么斯大林饶恕了李维诺夫？有人说，早在 1907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期间，在一次斯大林和伦敦港口工人打架时，李维诺夫救了他。三十二年之后，当李维诺夫实在不能再等了，就去问了斯大林，为什么至今还不逮捕他，斯大林似乎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忘记伦敦那件事。"如果斯大林和李维诺夫确实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么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心怀并不坦率，因为在他的身上从来没有感激这种情感。但是他明白，李维诺夫作为外交家，他是需要的（如同他需要伊·迈斯基一样），要找到一个人去代替李维诺夫，并不象找人去代替其他部长和州委书记那么容易。那时，对斯大林来说，从政治上考虑把李维诺夫留在外交岗位上更为重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命运。

594

根据 A.叶甫斯达菲也夫证实，苏联著名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米·叶·柯尔佐夫受不住审讯，他屈服了，他交待说：有一批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在三十年代中期被邀请到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局局长康·亚·乌曼斯基家里，他们在那里制定了所谓的反政府阴谋，其头目是乌曼斯基本人。但是乌曼斯基在 1938—1939 年没有被捕，反而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后来调任驻墨西哥大使。乌曼斯基不幸牺牲后还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下。

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也有类似情况。现在我们知道，被逮捕和牺牲的作家、画家、演员、电影活动家的假交待中也提到了几百名其他有名的文化界人士，但是他们没有被逮捕。例如，在被捏造的所谓的文学工作者破坏组织案件中，除了因该案件牺牲的巴别里和迈耶尔赫利德外，作为他们的同谋者已经指出有鲍·帕斯杰尔纳克和尤·奥廖沙。但是斯大林没有下达指示去逮捕这两个作家。斯大林也不允许逮捕许多著名的苏联电影导演，虽然内务

部机构已经为他们不止一次立了“案”。众所周知，斯大林特别喜欢在暇中看电影。有些他“喜爱”的电影他看了五十遍以上(并强迫他的近臣和他一起看)。① 看起来，正是斯大林的这个爱好救了许多苏联电影演员的命。

还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可以说明，斯大林的犯罪行为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并非因无控制能力所致：斯大林出于恫吓的目的，往往只限于把某一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妻子或近亲逮捕起来，但他本人还被留在领导工作岗位上，并继续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和他见面。例如，米·伊·加里宁的妻子是1937年被捕的。同类的事实还有：阿·米高扬的两个小儿子的被捕，奥尔忠尼启泽的哥哥被捕和被处决，奥·库西宁的妻子② 和儿子的被捕，维·米·莫洛托夫妻子的被捕，A·B·赫鲁廖夫妻子的被捕，亚·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被捕以及其它类似的迫害等等。 595

很值得指出，斯大林有时为了表示宽大为怀，允许释放他周围亲信的某一亲属。例如，加里宁的妻子在加里宁逝世前几天被释放了(不过，后来又被流放)。根据尤·卡里亚金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在和奥·库西宁谈话时问他为什么不为释放他的儿子而奔走一下。库西宁说：“可能有逮捕他的重大理由。”斯大林微笑一下，就指示把库西宁的儿子放了出来。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例子也很说明问题。众所周知，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和托洛茨基的儿媳妇是亲姊妹。但这并没有妨碍波斯克列贝舍夫成为斯大林一个最亲近的人。后来斯大林还是下命令逮捕了波斯克列

---

① 根据米·伊·罗姆的证实，斯大林喜爱的电影有：《翠堤春晓》、《城市之光》、《列宁在十月》、《伏尔加河！伏尔加！》。

② 奥托·库西宁的妻子艾娜·库西宁是作为共产国际工作者而逮捕的。根据M·A·索恩采娃证实，艾娜和她同躺在一些木板床上，于1938—1941年期间一起来往于一些流放站。她收到过奥托寄来的包裹，这些包裹是他们家的女佣人寄给她的，包裹上有她的签字。M·索恩采娃写道，有一次在新年前夕她们的工棚里安了一架旧的收音机喇叭。衣不蔽体的艾娜·库西宁听到了奥托·库西宁从克里姆林宫里发出来的新年祝词。

贝舍夫的妻子，但是他本人仍做斯大林的私人秘书。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几个月波斯克列贝舍夫才被撤了职，但也没有被逮捕。

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亲属也没有逃过斯大林的"关切"。大596家知道，拉·卡冈诺维奇的弟弟米·莫·卡冈诺维奇战前任航空工业部部长。他是一名斯大林分子，对镇压许多诚实的苏联人的问题上他应负责任。虽然如此，远在战前，米·卡冈诺维奇就受了警告处分，被免除了部长职务，关于他的撤职通报曾发表在报纸上。米·卡冈诺维奇在战争年代担任很不显眼的职务。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忘记他。结果一些被诬陷为属于"法西斯中心"的战后被捕的干部，在审讯过程中被授意作了交待说，如果希特勒分子占领莫斯科的话，那么法西斯政府的副总统的职务已计划任命米·莫·卡冈诺维奇担任。（任命一个犹太人为俄国法西斯政府的副总统对希特勒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斯大林在得知这一显然是早已等待的供词后，就给拉扎尔·卡冈维诺奇打了一个电话，说他的弟弟可能要被逮捕，因为许多被捕的人的口供揭发他和法西斯有联系。拉·卡冈诺维奇说："好吧，如果需要，那就逮捕他吧。"

阿·伊·米高扬告诉过A·B·斯涅戈夫，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表扬拉·卡冈诺维奇有"原则性"，他没有被兄弟感情所纠缠，同意逮捕他的弟弟，但是斯大林又马上补充说，不要急于逮捕米·莫·卡冈维诺奇，他是老共产党员，在党内已经很长时间了，要再一次审查所有的供词。所以委托阿·伊·米高扬主持米·莫·卡冈诺维奇和那个供出他的人进行对质。

这一次对质是在米高扬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那个人也被叫来了（斯涅戈夫忘记他姓什么了）。他当着米·莫·卡冈诺维奇的面重复了自己的供词，还补充说，战前一些飞机工厂有意建在离边界不远的地方，为的是使德国人容易去占领这些工厂。米·莫·卡冈诺维奇在听了这些交待后，要求允许去一下米高扬办公室里的小卫生间。几秒钟后从那里传出来了枪声。

597 这一切事实首先说明斯大林对自己助手们极为蔑视，而根本

不是在他们面前有所恐惧。不管怎样，这些事实显然不能和斯大林无控制能力的说法相吻合。

过去和斯大林关系很密切的一些人在1936—1938年期间都是斯大林下令逮捕的，但是几个月或几年以后，当他们受到非刑拷打和判了刑后，同样是斯大林不与任何人解释就又下命令释放了，甚至他们又被任命担任很高的职务。斯大林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夫塔拉泽（他是斯大林在外高加索工作时的战友）的做法是很奇怪的。卡夫塔拉泽在地下工作年代给予斯大林不少帮助，有一次在彼得格勒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斯大林躲过密探。但是二十年代卡夫塔拉泽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并直至托洛茨基中心号召它的拥护者停止进行反对派活动时才脱离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基洛夫被暗杀后，卡夫塔拉泽作为原托洛茨基分子被流放到喀山。他从喀山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说明他现在已不进行任何反党活动了。斯大林在收到卡夫塔拉泽这封信后把卡夫塔拉泽从流放地调了回来。不久，在许多中央报刊上登载了卡夫塔拉泽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回忆了和斯大林共同从事地下斗争的一些片断。斯大林很喜欢这篇文章，虽然如此，但是卡夫塔拉泽没有再写有关这一题材的新文章，他甚至没有重新入党，只是靠从事很一般的编辑工作过活。1936年底卡夫塔拉泽和他的妻子突然被捕了，在受尽非刑之后被判处极刑。卡夫塔拉泽被指控为和布都·穆迪瓦尼一起准备谋害斯大林。判决后不久，穆迪瓦尼被枪决了。但卡夫塔拉泽长期被关在死囚牢房里。后来突然被贝利亚叫了去，在那里他见到已衰老得无法认出的妻子，并和她一起被释放了。 598
释放后开始他住在招待所，后来在集体宿舍里给他分了两间房子，他又工作了。在卡夫塔拉泽被释放后，斯大林用各种办法向他表示关心和好意。卡夫塔拉泽也被邀请去参加斯大林的午宴。有一次斯大林和贝利亚甚至去看望了卡夫塔拉泽，事先并没有通知他。这突然来访引起集体宿舍的一片混乱。他的一个女邻居昏倒了，她说是因为在宿舍门口看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像片”。

根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己的说法，斯大林和他共进午餐时，亲自给他盛汤，并和他开玩笑，回忆许多往事。但有一次吃午饭时，斯大林走到自己客人面前说："不管怎么说您想要谋害过我。"

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句话里可能看到斯大林躁狂性疑心症的证据。但我们认为这样解释是极不准确的。斯大林很明白，卡夫塔拉泽从来没有想谋害他。但是他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重新复查已被处决的布都·穆迪瓦尼和其他与此案件有关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原谅"一个卡夫塔拉泽，事情就更简单得多了。

我们知道，在阿廖沙·斯瓦尼泽被处决前不久，把斯大林的话转告了他，斯大林说，如果他能向斯大林道歉的话，斯大林会"宽恕"他。但是斯瓦尼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罪过，他拒绝去道歉，于是被枪决了。这一切行为，对一个蔑视人们的暴君来说是很典型的，但是这些行为完全不象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的一个精神病患者所做的那样。

我们知道，斯大林一般不接受要求释放这些人或那些人的上诉和申请。

例如，他坚决拒绝了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雷德里克和伊599林·若里奥·居里等这样著名科学家要求释放在苏联遭到逮捕的两名外国物理学家——弗·霍乌特尔曼斯和亚·魏斯贝尔格的请求。（我们在第七章中已写过这件事。）不仅如此，1939 年这两位物理学家同一批德国反法西斯分子一起被引渡给盖世太保。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有所让步。例如，彼·列·卡彼查院士坚决要求释放物理学家Л.兰道，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一要求被内务部机构执行了。后来Л.兰道回忆说："根据荒谬的诬告，我被逮捕了。我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我坐了一年监狱，很清楚，我连半年也再拖不下去了，我简直就已经走向死亡了。卡彼查到克里姆林宫去了，他声明，他要求释放我，否则他自己就离开研究所，我

被释放了。"[1] 显然，影响斯大林作出这个决定的与其说是卡彼查作为科学家的声望，还不如说卡彼查作为研究所领导人，乃是斯大林所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不得不作出让步。

工农红军防空管理局总工程师——发明家П·К·奥谢普科夫的案件拖得时间很长，他是领导建立雷达装置工作的。奥谢普科夫是三十年代末被逮捕的，国防的主要研制工作被拖下来了。其结果我们的军队是在没有雷达装置的情况下开始作战的，因而不得不向美国和英国购买。当苏联政府作出关于尽快建立自己雷达的决议时，一些科学家请求释放П·奥谢普科夫。А·Ф·越飞院士特别坚持释放他，越飞是物理技术研究所的所长。他在给政府的关于建立雷达装置工作进度的专题报告中，特别指出了奥谢普科夫能起什么作用，并要求释放他。越飞给关押在萨拉托夫监狱的奥谢普科夫写的信中说道："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会按您的功劳来评价您并能找出真正有罪的肇事者。寄给您在我这里能找到的一些食品，现在什么也买不着了。如果您患了坏血病，喝点蔷薇果酒，用热水冲服但不要用开水。我很快就要到莫斯科去，在那里 660 我将再一次提出您的问题。不要悲观失望，把身体养好——在您面前还有巨大的和迫切要做的工作和沸腾的生活。"越飞的奔走虽没有马上见效，但是获得了成功。战后奥谢普科夫被释放了，并从事自己专业，作负责的工作。[2]

苏芬战争后和卫国战争前几个月内斯大林"批准"从集中营监狱里释放几千名红军指挥员。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在战争过程中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斯大林会见过他们并同他们谈过话。[3] 但

---

① 《共青团真理报》1964年7月8日。

② П·К·奥谢普科夫：《生活和梦想》莫斯科1965年版第118页。

③ 原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鲍·万尼科夫被释放一事的片断是很有意思的。万尼科夫是1941年7月中旬被释放和被平反的，他出了监狱就立刻去参加了政治局的会议。斯大林对他说，要他接受工作，因为现在国防工业情况很不好。万尼科夫拒绝了。斯大林转过身来对其他政治局委员说："他是生我们的气了。"（引自万尼科夫的助手A.X.的回忆录。）

另一方面，根据康·西蒙诺夫的证实，1941 年 10 月和 1942 年夏天，斯大林命令把关在集中营的大批红军著名指挥员枪杀了，他认为在苏德战线不利的情况下，这些人对他本人是危险的。不必多说，这样的行为和一个患迫害狂的人是不相符的。

难道上面我们说过的那种一贯地，顽强地企图掩盖自己犯罪的行为不正是说明这些罪行是有意识地进行并经过周密考虑过的吗？难道这样的做法能够典型地说明一个人深信自己确实是消灭了我们国家的危险的敌人——间谍和破坏分子吗？

关于斯大林在 1936—1938 年时期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经常出现迫害狂症和无控制能力等的说法也和下面的事实不相符合：斯601大林在这个时期消灭了成百成千的忠实于党的领导者，但同时他却把许多政治历史有很大问题的人，道德上腐化堕落的人，例如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等人，吸收到国家领导中来，而且他们和斯大林的关系十分亲密。然而，斯大林已经掌握了不少材料，足以说明这些人的真正面目。难道苏联卫生部人民委员格·卡明斯基（1922 年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和巴库苏维埃主席）没有在 1937 年的 6 月中央全会上讲过贝利亚和平等党的暗探局之间的可疑的关系吗？① 孟什维克维辛斯基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担任阿尔巴特区警察局长职务，而且在 1917 年夏天还签署过逮捕布尔什维克的拘票，难道这些事情对斯大林是秘密吗？为什么斯大林信得过这个人，把苏联总检察长的岗位交给他了呢？为什么斯大林宁愿选择维辛斯基和贝利亚这些人民和党的真正的敌人，而不选择列宁一代的老干部的代表人物呢？不管怎么说，其中主要动机绝不是病，也不是迫害狂，而是完全出于某一政治打算。这是一个走上篡权道路的人之有意识的行为。他很了解只有借用象叶若夫、贝利亚或维辛斯基这类人之手才能够去收拾我党和国家的列宁的基本核心。

说明斯大林其他许多助手和他的意志的执行者——伏罗希洛

---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65 年第11期。

夫、卡冈诺维奇等不是好人的材料，难道提供给斯大林的还少吗？根据B·沙拉莫夫的证实，有些军人把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写进自己的假供词中。根据老党员Ф·扎斯廷科尔的证实，仅在斯维尔德洛夫州就"准备好了"关于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几普特的交待材料。古比雪夫州也准备了关于莫洛托夫和哥尔金的不少"备用"材料。审讯人员在刑讯加里宁的妻子时要从她口中逼出害人的材料，其中包括诬陷她丈夫的交待。斯大林很了解所有这些情况，许 602
多交待还是斯大林本人授意写出的。但是某个时候他对这些交待又是置之不理的。

现在我们很了解，斯大林是一个病态多疑的人，他的这一缺点对他的近臣并不是秘密。作为一个粗暴和自私，记仇和残忍成性的人，斯大林是以己度人的，所以他总是怕人。克雷洛夫在一篇寓言中写道："一个人的心里不能感受爱情和友谊……他就能把任何人都看成恶人。"

许多犯过严重罪行的人，以后都开始惧怕周围的人，他们怕自己被揭发，而这种恐怖又常常成为更多新罪行的基础。斯大林身上无疑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斯大林排挤和消灭了列宁一代老干部的大部分代表人物和几乎全部自己原先的朋友和战友，他抛弃和践踏了党和国家的一切法律，一切同志间的关系和普通的人之常情，因此他有根据惧怕人们，这种恐惧心理在他整个一生中在不断地增长。东方智者说："凶恶的统治者永远惧怕他自己的下属"。斯大林无疑是惧怕揭发和复仇，而这种恐惧又进一步推动他犯更多的新罪行。三十年代镇压的主流我们当然不应该用躁狂性的多疑症和迫害狂来解释。任何暴君，任何独裁者都是多疑的。但是用多疑和恐惧去解释暴政本身当然是不对的。

四、关于斯大林"不断"革命的神话

本书作者十五年前曾听到关于三十年代血腥"清洗"的一种相

当奇怪的说法，它是出自一位负责干部之口的。和我谈话的这个人说：是的，斯大林很了解被他处死的人不是间谍，也不是暗害分603 子。这些指控是为了给镇压以方便条件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当然，从普通的道德标准和国家准则来看问题，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虽然如此，这些做法到底还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革命所必需。受斯大林排挤的人都是掌握大权的并且也很有威望。他们和斯大林一样，参加了革命。所以对他们不能简单地去撤他们的职或开除他们的党籍。必须指控有骇人听闻的罪行，指控他们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指控他们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勾结，从事间谍活动等等。然后通过欺骗人民的办法去消灭这些人。

“可是为什么”，我问道，“革命需要摆脱掉它的积极的参加者呢？”

和我谈话的对方说：“这是一切革命的逻辑。原因在于，斯大林所排除掉的许多原革命者到三十年代中期已不是革命者了，他们已蜕化为官吏和官僚。这些人已经把我们党和国家机器不是推向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推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把它不是推向前进，而是引向后退。因此在斯大林面前就出现了这样的任务，排除那些已妨碍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发展的人，提拔那些有能力把我们的革命向前推进的年轻的干部。”

后来，我必须相信，在三十——四十年代被提拔的，现在还在职工作的和已退职的国家和党的活动家当中，这样的说法是相当普遍的。这样的说法一般不是公开说出来的，而是在“信任的气氛”中，特别是在同年轻的党的干部谈话时说的。也许，关于斯大林“不断”革命的这一神话是在斯大林时代产生的，也许根据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一些外国作家也持类似的观点。例如，伊萨阿克·捷依奇尔在他的《流放中的先知》一书中在谈到斯大林“清洗”的原因时企图证明，似乎是斯大林害怕官僚主义者演变为604 新的阶级。所以斯大林借口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做斗

争，开始反对自己的官僚主义者。捷依奇尔认为，正是斯大林的“清洗”阻止了当权派变为新的社会阶层。他写道：“这是不断恐怖的最阴暗的、很少被人讨论的、但又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① 捷依奇尔继续写道：“这样的恐怖不仅消灭了布尔什维克队伍，而且使官僚们处在流动状态，不断更新其人员组成。正如斯大林用他那独裁者的野蛮的方法消灭富农一样，也不断消灭新阶级的萌芽。”

关于这样的神话还能说什么呢？它和中国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说法，和毛主义者“炮打司令部”并推翻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号召是多么相象。

当然，在革命胜利后的时期，苏联出现了许多党和国家负责干部蜕化变质现象，下面我们还要详细分析这种变质的原因、性质和规模。党和国家机构的这种局部蜕化变质在一个大的，然而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国家里仅仅在1917年里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几乎增加为一百倍，从一个反对派的地下政治组织变成了一个执政的党。这个执政党从1918年起未和任何其他政党分享过政权，而且是用专政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

这种官僚化的蜕变在革命后触动了什么人呢？首先它触动了那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参加了革命，但不能和无产阶级先锋队一起渡过一切艰难困苦，遗憾的是，这种蜕变也触动了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同沙皇制及资产阶级斗争中表现得无比坚强，但是不能胜任交给他们去完成的参与管理国家的责任。

605

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几十万旧官吏，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吸收他们参加自己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他们根本不需要“蜕变”，因为他们基本上只会用官僚主义的方法进行管理。

但是部分党和国家机构的蜕变根本不应该就是命中注定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政权和党的蜕变。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在前十年里进行过反对官僚主义、名利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蜕化变质现象的

---

① 见该书伦敦--纽约英文版第306页。

激烈斗争。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内整个一代年轻有为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他们是完全忠于苏维埃政权，是按列宁主义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培养起来的。

也许，斯大林还不满足于我们党内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蜕变的斗争吗？也许，他不惜用野蛮的方法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里进行新的迅速的清洗，以便为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新的可能性吗？

这些设想经不起任何批评的。

第一，1936—1939 年的镇压，除了一些真正官僚化的领导人外，触及了大量的忠实的苏维埃干部，以及军事将领，经济工作人员、科学家和文化界活动家，他们是我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优秀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的不仅有高级领导人，而且有大量的年轻的中层干部。在被镇压的人们当中，不仅有一些异己阶层和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知识分子的最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为了培养他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曾经予以很大的重视。

606

第二，这样，就不难看清楚，那些被斯大林消灭了的干部的工作岗位上在多数情况下换上了经验较少的，不那么坚强的，在无产阶级斗争中锻炼较少的，文化水平往往较低的干部。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而且在几乎一切的党、国家、经济机构的各上层环节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和血统的无产阶级家庭的干部比例减少了，而出身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干部的比例增加了。斯大林周围的亲信的道德水平也显著下降了，因为镇压的结果把莫洛托夫、贝利亚、叶若夫、麦赫利斯、巴吉罗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等这样的人被推到首要的位置，但他们是我党和国家机构的最坏的一部分干部。正是这些人和斯大林一起，首先都成了蜕化变质分子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

显然，触及百万人的大规模镇压造成了过去从未曾有过的干部匮缺现象。这就要求把几十万干部从“下层”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三十年代中期和末期成千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人成为企业的厂

长，车间主任。普通红军战士成了排长和连长，而原排连长被提拔上来指挥营和团，原营长和团长成了旅长和指挥全军的军长。许多普通科研人员现在不仅领导实验室和研究室，而且领导大型的研究所。这是几十万人飞黄腾达的时代，他们都成了领导者。当然，1936—1939年多数的“新贵”从主观上说，他们是诚实的人，他们愿意为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而工作的。即使是这样，也仍然没有理由赞同这样的干部“更新”。因为三十年代的镇压以后，在我们国家及我党内形成了完全另一种局面。许多被“提拔”的人，包括从普通工农及职员中提上来的人，在接触了政权之后，比前二十年蜕化变质的速度要快得多，而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还要详细谈到。 607

五、关于斯大林行为的又一种说法

众所周知，沙皇暗探局在反对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时，广泛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奸细，其中一部分是潜入党内的特务，另一部分是由于恐惧或其它某种卑污的动机而同警察相勾结的一些党内动摇分子。这样的奸细和敌人情报员在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地方直至中央机关中都有。1918年莫斯科《大家族》出版社根据莫斯科暗探局的文件出了一本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书。① 就在这次公布的警察和暗探总局的文件中列举了在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的密探名单。书中提到的有十二人：M.И.勃朗津斯基、雅·阿·日托米尔斯基、M.Г.克里沃夫、A.И.洛波夫、P.B.马利诺夫斯基、A.K.马拉库舍夫、A.A.波利亚科夫、A.C.罗马诺夫、И.П.谢希茨基、M.E.切尔诺马佐夫、B.E.舒尔汉诺夫，及一个不知真名的奸细，绰号：瓦西里。根据莫斯科暗探局的材料，一些内奸参加了布拉格党代表大会，并把这次会议的全部决议和具体措施告诉了暗

① 《布尔什维克》。原莫斯科暗探局关于1903—1916年布尔什维主义历史文件。《大家族》出版社莫斯科1918年版。

探局。

在社会民主党及社会革命党内的多数奸细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马上被揭发出来了。但是暗探局的一些特务是相当晚才被揭608 露出来。例如，二十年代才查明了奸细谢烈布利亚科娃的案件，她把许多布尔什维克出卖给沙皇警察署。

在违法的大规模镇压的年代里，无论斯大林还是内务部机构都极为广泛地利用了苏联人对奸细的仇恨。时常诬告一些有功劳的党的老干部，指控他们是为沙皇暗探局服务的。受这种诬告的包括三名中央委员：捷连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和拉祖莫夫，还有许多现在已完全恢复了名誉的党和国家活动家。甚至于1938年指控迈耶尔霍里德，诬陷他和沙皇暗探局合作过，说他的所谓代号是"谢尚内奇"。斯大林的许多政治对手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也提出过类似的指控。这类事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

早在二十年代，俄侨的报纸就报道过说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著名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诺依·若尔达尼亚也是最早对斯大林进行类似指控的人之一，他举的事例中包括他和斯捷潘·邵武勉谈过的有关邵武勉在梯弗里斯被捕的一些情况。根据若尔达尼亚证实，邵武勉告诉他，他是在秘密来梯弗里斯的当天被捕的。邵武勉到达梯弗里斯的日期和停留的地址，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人就是斯大林。诺依·若尔达尼亚的类似证实曾于三十年代初在达什纳克党人① 办的杂志《艾里尼克》(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上和《最新消息报》的文章《H.H.若尔达尼亚回忆斯大林》② 里发表过的。有关斯大林有可能和暗探局有关系的某种暗示还可以在格鲁吉亚孟什维克Г.乌鲁沙泽的未发表的手稿中看到，此稿保存在美国古维罗夫大学。乌鲁沙泽觉得奇怪的是，在巴统示威游行之后，609 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同其他二十一名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一起受到审判，而是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单独处理，没有经过法院只采取了行政

① 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译者

② 《最新消息报》巴黎1936年12月16日。

措施流放到西伯利亚。当然，这些事实也可以有与斯大林同暗探局有关系的设想完全不同的解释。众所周知，1918 年斯·邵武勉在他不幸牺牲前一直和斯大林保持友好关系。有关巴统示威游行事件的几乎全部的警察局的文件在苏联都已经公布了[1]，这些文件无论如何不能证实关于斯大林同暗探局有关系的说法。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西方报刊公布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很多的材料。有些作家甚至力图把大家感到意外的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说成是许多军人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结果，似乎是他们提出了关于斯大林早期叛卖行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例如，原苏联侦察员亚·奥尔洛夫就是企图发展这种观点，他在美国有名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斯大林轰动一时的秘密》[2]。亚·奥尔洛夫在这篇文章里企图证明斯大林在革命前的许多年中和沙皇暗探局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三十年代上半期是内务部的重要干部之一，他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苏联侦察机关的领导人在国外渡过的。在镇压运动高潮时奥尔洛夫决定不回苏联。1953 年以前他没有露面揭发什么问题。但是，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奥尔洛夫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文章，这批文章后来编成题为《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在许多国家出版了。这些文章中，斯大林被指控组织了大规模的镇压，暗害谢·米·基洛夫，但是没有提到斯大林为暗探局服务过一事。但是在他新发表的文章中，亚·奥尔洛夫把三十年代的一切镇压活动力图说成是斯大林害怕他的暗探局特务身份被揭露出来所致。

根据亚·奥尔洛夫的证实，早在 1937 年 2 月当他因脊椎受伤住在一家法国医院时，他的表兄吉诺维·波里索维奇·卡茨涅里松来看他。卡茨涅里松当时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重要干部，是内务部在乌克兰的特派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卡茨涅里松是

610

[1] 《1902 年巴统示威游行》莫斯科 1937 年版。

[2] 《生活》杂志 1956 年 5 月 14 日。

斯·柯秀尔的非常好的朋友，他经常能见到斯大林。他告诉奥尔洛夫说，当斯大林同亚哥达一起准备第一次的莫斯科案件时，斯大林仿佛告诉过亚哥达，如果内务部能证明这一案件的某一被告人过去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的话，那么这是很有好处的。为了使这一指控显得更加真实，亚哥达决定寻找一名那怕是原暗探局的军官，根据当时的条件，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最大一批旧警察局档案是保存在亚哥达的前任明仁斯基的路比扬卡[①]办公室里。翻阅这些档案材料的工作委托给内务部一名姓施泰恩的工作人员。结果，施泰恩在翻阅暗探局档案时突然看到一个卷宗，其中是一名叫维萨里奥诺夫的沙皇暗探局的领导人保存的，这些档案只能由他亲自审阅。奥尔洛夫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这里保存的是致维萨里奥诺夫的汇报和信件，这些汇报和信件是我们的独裁者的手迹，这笔迹是施泰恩很熟悉的。经过施泰恩的鉴定，认为这一份卷宗确实和斯大林有关，但不是和革命者的斯大林有关，而是和特务奸细斯大林有关的，他自愿为沙皇暗探局效过劳。"

根据亚·奥尔洛夫的说法，事情后来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施泰恩到乌克兰去找他的原上司，也是他的朋友巴利茨基，他当时领导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巴利茨基对维萨里奥诺夫卷宗里的文件进行了鉴定，确定文件和笔迹都是真的。接着巴利茨基把文件交给吉·卡茨涅里松看，也给约·雅基尔、斯·柯秀尔等一些高级干部看过。他们将揭露斯大林问题的材料翻拍了许多份，约·雅基尔飞往莫斯科，把这些材料又交给米·图哈切夫斯基、加乌尔尼克、科尔克等人看过，这样了解这一情况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这些著名的军事将领制订了消灭斯大林的计划。他们设想挑选忠实于他们的红军两个排，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克里姆林宫实现政变，而不引起国内的动乱。

611

这一切卡茨涅里松似乎是1937年2月告诉亚·奥尔洛夫的，

① 路比扬卡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关政治犯的监狱。——译者

即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之前，在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之前，也是在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遭逮捕前四个月。

亚·奥尔洛夫写道："几天后我回到西班牙。一周接着一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我注意看每天的报纸，并利用一切闲暇的瞬间注意收听我的短波收音机。1937年6月11日我乘汽车从法国西部边界去巴塞罗那。我正在看路边闪过的山丘并听法国电台悦耳的音乐。音乐突然终止，法语播送了最后新闻号外：'图卢兹电台……特别新闻……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及红军其他将领被指控有叛卖行为，已被逮捕。他们将受军事法院审判。'……后来得知，在暗探局档案中找到有关斯大林卷宗的内务部军官施泰恩开枪自杀了。柯秀尔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也被镇压。加乌尔尼克自尽了。巴利茨基被处决。约在七月中旬我得到消息说，我的表兄卡茨涅里松被枪决了。在全部消灭了那些知道'暗探局斯大林卷宗'之事的、而且进行了秘密活动的骨干队伍之后，紧接着开始大批逮捕和镇压那些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卷宗一事的人以及那些已被镇压的人的朋友。每一个直接或间接受到那些被已处决了的将领提拔的军人都成为死囚的候补者。有几百，甚至几千名军官被撤了职并且从自己家里赶出来，送进了牢房。"

这样一来，根据奥尔洛夫的说法，我国三十年代后半期的多数镇压活动是因为当施泰恩根据亚哥达布置翻阅了暗探局档案时，突然发现这份卷宗造成的。

亚·奥尔洛夫在《生活》杂志上写的文章虽然开始时会给人以一定的印象，但是不用十分深入去研究一下事实就很容易把它推翻。首先可以指出，卡茨涅里松在1937年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被奥尔洛夫列出来的"参与阴谋的人"不是一下子被逮捕的，是在一段较长时间里逐渐被捕的，而且没有一个"阴谋的参加者"在知道阴谋被破坏之后企图躲藏起来。柯秀尔是在图哈切夫斯基被捕几乎一年后才被逮捕和枪决的。根据奥尔洛夫的证实，当时"维萨里奥诺维奇卷宗"里的文件有许多翻拍的照 612

片。但是没有一张照片保存下来或送到国外，虽然许多"阴谋的参加者"按他们的地位有可能把任何文件转移到国外朋友手里，也有可能保存任何一个文件。我们现在不仅清楚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柯秀尔和许多其他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逮捕的，而且了解他们在法庭上和审讯过程中，甚至了解有些人在被枪决时的表现。这一切事实完全推翻了这样一种说法，似乎高级军事领导人和行政领导人有一个庞大的阴谋，目的是暗杀斯大林。那些似乎是被施泰恩在维萨里奥诺维奇卷宗里发现的文件的内容也完全不真实。如此重要的沙皇暗探局的档案直至1937年没有人清理，这是难以置信的。我们还知道，许多和柯秀尔及雅基尔关系密切的乌克兰的干部并没有被逮捕（例如：格·彼得罗夫斯基）。甚至奥尔洛夫对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报告内容的叙述也是极不准确的。如：大家很了解，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说什么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雅基尔、乌波列维奇、科尔克等人有关的事情。一直到1957年他们才被平反。亚·奥尔洛夫的文章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不准确和歪曲之处。奥尔洛夫在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长期沉默，为什么甚至于1953年在他写的讲斯大林罪行的书中也没有提到卡茨涅里松讲述过的"维萨里奥诺维奇卷宗"一事，——他的解释也极没有说服力。这样，显而易见，奥尔洛夫的整篇文章乃是一篇编造得很不高明的假材料。

613

同年（1956年）纽约出版了一位"苏联问题专家"及外国第一本长篇斯大林传（1931年）的作者伊萨克·顿·列文的书。这本书的题目是《斯大林的巨大秘密》，其中列举了据说落到伊·列文手里的俄国警察局的下述文件。用现代书法将这个文件抄写如下：

亲收件

关于社会民主党问题

"内务部　　绝密

警察局特务司司长。　　亲收

1913年7月12日。　　叶尼塞斯克暗探局局长

№2898　　　　　　　　　　　А・Ф・热列兹尼亚科夫

尊敬的阁下——阿列克塞・菲多罗维奇：

采取行政措施[①]流放至土鲁汗斯克边疆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里——斯大林于1906年被捕后向梯弗利斯省警察局提供了重要特务情报。1908年巴库暗探局局长又收到斯大林的一系列情报，以后斯大林去彼得堡任彼得堡暗探局特务。斯大林的工作特点是准确，然而是断断续续的。斯大林在布拉格被选为中央委员回到彼得堡以后已明显成了政府的反对派，完全与暗探局断绝了关系。敬爱的阁下，上述情况向您呈报，以便在您的侦查工作中供您参考。

完全忠实于您的　叶列明”

首先应该指出，叶列明书信的内容和上面所说的奥尔洛夫文章中的《维萨里奥诺夫卷宗》的内容是完全不符合的。例如，叶列明写道，斯大林在回布拉格以后已明显地成了政府的反对派并断绝了和暗探局的关系。但是，奥尔洛夫在摘引《维萨里奥诺夫卷宗》材料时，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断言，正是在布拉格会议以后斯大林作为一个奸细，表现特别积极，甚至越过自己顶头上司维萨里奥诺夫和内务部部长助理佐洛塔列夫进行联系。伊・列文写的书中的片断和奥尔洛夫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期的《生活》杂志上。列文企图在不否认奥尔洛夫材料的前提下，解释这种矛盾时，则显得十分没有说服力。 614

伊萨克・顿・列文异常详尽地分析了他所列举的这份文件的性质和内容，它的墨水成份和纸张。他还叙述了此文件通过什么途径从住在中国的俄侨M・Π・戈洛瓦切夫教授那里转到他的手中。但是，伊・列文怎么样也没有向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文件在三十年中尽管换了几个主人，可是一次也没有公布出来？叶列明所讲的1906年斯大林被捕的事也得不到任何证实。

① 指行政处分，而不是法律宣判。——译者

伊萨克·顿·列文认为，斯大林这次被逮捕可能发生在出名的1906年4月阿夫拉巴尔斯克印刷所被捣毁的时候。但许多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肯定说，阿夫拉巴斯克印刷所是叶努启泽组织起来的，斯大林和印刷所没有直接关系。和此印刷所事件有关于1906年4月被捕的有二十多人。所以斯大林的被捕不可能不被人发现。此外，大家知道，1906年4月斯大林正在参加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联合代表大会。

伊萨克·顿·列文企图证明，1913年热列兹尼亚科夫和叶列明都确实在俄国暗探局里工作，签署上述文件的确实是叶列明。住在巴黎郊区的原宪兵部队斯彼里多维奇将军也证实了这是叶列明的签字。但是很显然，政治性假材料的炮制者往往会利用确实存在的或存在过的人们的签字，并且非常巧妙地进行模仿伪造。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确认伊·列文在他的书中所指的叶列明的那封信是手稿真迹，而不是巧妙伪造的假材料。况且，列文只讲这是他自己鉴定的结果，但是为了证明如此重要的文件的真伪，必需组织与本事件无关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来进行鉴定工作。

615

最后发表的与此问题有关的材料，大概是爱德华·埃里斯·斯密特写的于1967年在美国出版的名为《年轻的斯大林。一个神出鬼没的革命者的青年时代》的书。本书作者多年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工作，并且正如序言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俄国暗探局历史方面的专家。爱·斯密特告诉读者许多有关斯大林的传记性的材料之后，分析了有关斯大林同暗探局可能有关系的各种猜疑和证明。他引用了乌鲁沙泽和诺·若尔达尼亚两人的材料，但他极不重视而且还推翻了亚·奥尔洛夫和伊·列文的证明。爱·斯密特对1901年3月21至22日夜间梯弗里斯大规模的逮捕事件中斯大林没有被捕一事，表示奇怪。斯密特认为，1904年1月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跑之事更象是警察局的伎俩。斯密特也详细分析了和阿夫拉巴尔斯克印刷所被捣毁有关的事件。这个印刷所存在的时间是从1903年到1906年。斯密特说，起初是受孟什维克控

制的，直到1906年2月才转到联合委员会手里，可是这以后，过了二、三周的时间暗探局就已经知道存在这样一个印刷所了。在警察局袭击了这个印刷所之后，一切和它有关的人员中，只有斯大林和妮娜·阿利德扎洛娃未遭逮捕，妮娜家是斯大林的秘密接头地点。这一切在斯密特看来都是可疑的。1906年4月，不顾警察局如何阻挠，斯大林往返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那里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在斯密特看来就证明斯大林和暗探局的联系。但是代表大会的许多其他代表也都是冲破了警察局的重重阻挠去参加大会的。1908年斯大林被逮捕和又一次逃跑之后，他被关进了巴库的巴伊洛夫监狱。斯密特写道，在有些回忆录中，斯大林这次被关进监狱则被认为是非常可疑的（？）的现象。根据斯密特的看法，到了1913年，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当斯大林必须在暗探局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选择时，斯大林才断绝了同暗探局的关系。于是1913年7月2日他被逮捕并被流放到土鲁汗斯克边疆。 616

但是不难看出，爱·斯密特列举的全部间接的"罪证"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完全不能成为斯大林和沙皇暗探局有任何关系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说法和证明，也开始在我国部分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流传起来。

我们在上面已说过，1918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一书提到在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的有十二名大奸细，其中有一名未破案的特务，他的绰号是"瓦西里"。根据这一线索，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回忆起1912年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彼得堡以后曾和阿伦·索尔茨同住在T·A·斯洛瓦廷斯卡娅家的一间房子，当时他的党内的化名正好就是"瓦西里"①。

本书作者还听到一些与此有关的类似故事和说法：

① 见尤·特里佛诺夫：《篝火的余辉》莫斯科1966年版第52页。

1. 三十年代初，历史教授谢普(《十月革命文件集》的编者)有一次在档案库中似乎偶然碰上一份某宪兵局特务约瑟夫·朱加什维里的"档案"。在"档案"中他发现朱加什维里写的请求释放他的呈文。呈文上有一个批示："如果在押犯同意帮助宪兵局了解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予以释放。"谢普当时在格鲁吉亚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他去找了贝利亚，把卷宗给他看了。贝利亚拿了卷宗，乘飞机去莫斯科找斯大林。斯大林一面看卷宗，一面销毁了全部文件，同时对贝利亚说，这一切都是胡扯，但是要和谢普算这笔帐。贝利亚回到梯弗里斯后，谢普就被捕了，以后被处决①。

2. 三十年代中期，外高加索内务部工作人员根据贝利亚的布置在原警察局和暗探局档案中搜集有关社会民主党革命活动的材料时（当时为了准备写一些外高加索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历史的书，贝利亚需要这些材料)，在库泰依斯市的警察局档案中似乎是找到了一批秘告社会民主党人的材料。这份密报上有约瑟夫·朱加什维里的签字。这份告密材料被送交贝利亚最亲密的助手卡布洛夫手里，卡布洛夫又把它交给了贝利亚本人②。

3. 老布尔什维克B.说过，有一次他去斯大林在梯弗里斯的秘密住所时，在那里看到一名高级宪兵军官。宪兵军官走后，这位布尔什维克就向斯大林说："你和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共同的事要办？这个宪兵军官来你这里干什么？"

"嗯……，他在宪兵队帮助过我们，"斯大林答道③。

4. 1916年底由于前线的形势越来越恶化，当局决定征调一批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到作战部队去，其中就有斯大林。在流放者被押解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以后，斯大林请了一天假进城去了，但他没有回来，于是没有到前线去。他尽管住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几乎没有躲藏起来，但是警察局对他在本市的活动没有表示出什

① 引自1918年入党的苏共党员E·П·弗罗洛夫的材料。

② 苏共党员苏·奥·加扎梁根据卡布洛夫家庭某一成员的讲述。

③ 引自E·П·弗罗洛夫的材料。

么明显的兴趣。①

5.奥尔忠尼启泽在1912年布拉格会议之后接受了党中央一系列重要任务，他到俄国许多城市去进行活动。一过边境，他马上被暗探局的密探"钉上"了，他们在谢尔哥② 的整个长长旅途中监视着他。在某一车站上，斯大林上了车来找奥尔忠尼启泽，谢尔哥向他传达了会议决议。他们就在车厢里躺下睡了，但是次日早晨谢尔哥发现斯大林不见了。后来在二月革命后，奥尔忠尼启泽问斯大林，他那会儿到哪里去了。斯大林答道："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怕连累你。"后来，在暗探局档案中发现了密探监视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以及描写他这次整个旅途情况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似乎一字也没有提到谢尔哥和斯大林的会面。③ 618

6.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斯大林是一系列剥夺行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布尔什维克认为：为了革命的需要这类剥夺行动在具备革命形势的条件下是允许的。)在一些剥夺行动过程中枪杀过看守。按沙皇时代的法律，这类"剥夺行动"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直至判处死刑。斯大林参与一些"剥夺行动"之事，对宪兵队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但是，1908年初斯大林被捕后，他受到按当时情况是非常轻的惩罚——仅仅被送到沃洛戈德斯克州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市流放两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暗探局的这种轻判不是偶然的。

对斯大林时代的多数检察长来说，如果斯大林本人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领导人，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话，上述这些材料足够给约瑟夫·朱加什维里签发逮捕证了。但是今天，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步他们的后尘。不难看出，上述这些关于斯大林同暗探局有联系之"证明"的依据是很值得怀疑的、是间接的，都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材料。这类证明正如至今在西方报刊中登载的有

① 引自老布尔什维克Б·И·伊万诺夫的回忆录。

② 奥尔忠尼启泽的爱称。——译者

③ 引自Т·费尔索娃转告Г·Л·麦哈尼克关于她同季·格·奥尔忠尼启泽(谢·奥尔忠尼启泽的妻子。——译者)的谈话。

关报道一样，很不近乎情理。例如，为什么斯大林命令枪决了谢普，但留下贝利亚和卡布洛夫？谁能担保老布尔什维克B.所谓在斯大林住宅里见到高级宪兵军官的情况是准确的，是绝对真实的。斯大林经常对自己的老战友进行骇人听闻的诬陷和问罪，这就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可能有了以牙还牙的愿望。

斯大林1912年在党内的化名和不知名的那个奸细的化名相吻合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斯大林有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党内化名。另外，“瓦西里”这个代号当时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也可能这样叫过。根据暗探局的材料，那个时候斯大林通常被称为“科巴”或者“高加索人”。

T.菲尔索娃讲的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一同乘火车之事也不太有说服力。实际上，暗探局里有关于他们这次会见的材料。根据暗探局的材料，斯大林于1912年4月9日在莫斯科和谢尔哥会面并一起去彼得堡是扎瓦尔津上校打电报把这一情况通知彼得堡暗探局局长的。为了暗中跟踪斯大林和谢尔哥，派了三个有经验的密探。谢尔哥于1912年4月14日在彼得堡被逮捕。斯大林是4月22日被捕的，比谢尔哥晚一周。这可能正是因为斯大林从火车上逃走所致。

毫无疑问，在中央宪兵局里，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每个领导者都建立了专门档案。但是革命者没有得到这些案卷。众所周知，在二月革命期间，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和士兵群众闯进了彼得保警察局档案楼，把大批材料从柜子里及保险柜里扔到院里焚烧了。理所当然，这时许多文件无可挽回地被销毁了。诚然，还有人证明，中央宪兵局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者的基本档案在二月革命期间被原驻法国的俄国大使H·A·马克拉科夫偷了出来，带到国外去了。据说，马克拉科夫把这批档案加封后交给了美国古维罗夫俄罗斯学院图书馆，并且说现在还不是公布这些材料的时候。将来会表明，这种说法究竟确实到什么程度。不管怎样，我们几乎没有掌握有关斯大林活动（审讯他的记录，密告他的材料等）的多少

是实质性的重要的"警察局"的材料。

在我们的档案中能够找出来的少量这类的文件，暂时还不能证明斯大林同沙皇暗探局联系的说法。例如，下面是1911年莫斯科和沃洛格达两个暗探局局长之间两封信：

绝密

亲收

"内务部

莫斯科公安局长

1911年8月17日于莫斯科

———

沃洛格达省宪兵局局长收

根据我下属局掌握的可靠秘密特务机关多次报告，一名正在受行政上流放处分或已处分期满的流放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相当重要的积极活动分子，化名'科巴'的人现住在沃洛格达市。

'科巴'和国外党的中心建立了直接关系，现在他已收到通知，作为中央巡视员将来国外执行相应的指示和完成某些任务。

和'科巴'的接头地点是：沃洛格达市，伊什梅马托夫商店，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奇日科夫收；'科巴'需要的路费将寄此地址。"

绝密

621

"沃洛格达省宪兵局局长

1911年8月21日

———

莫斯科暗探局局长收

您在8月17日第260990号通知中所指出的暂住在沃洛格达市的化名'科巴'的人乃原政治流放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里。关于他的材料梯弗里斯省宪兵局局长于3月14日已由警察局局长送到您处(第53号)。

从我属局的档案中得知，朱加什维里是1909年2月27日被解送至指定的流放地——索尔维奇戈德斯克市，并于7月24日潜

逃，于1910年3月24日在巴库被捕获，押回索尔维奇戈德斯克市。1911年7月27日期满后被释放，携带通行证到达沃洛格达市。根据他自己的请求，允许他在这里暂住两个月，限期至今年9月19日止。

根据侦察机关的材料，我们得知，朱加什维里同其他流放者（伊万·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伊万·米哈依洛维奇·戈鲁别夫、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伊利因、亚历山大·扬克列维奇·舒尔、伊罗基恩·伊萨阿克维奇·哈希莫夫、费多尔·伊格那捷维奇·夏波诺夫斯基、米哈依尔·阿列克塞也维奇·卡朗达泽、格奥尔季·阿列克塞也维奇·柯罗斯蒂列夫，以及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扎沃伦科夫）企图在索尔维奇戈德斯克市共同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党派别，召开会议，在那里宣读报告和讨论政治问题。这些集会的目的在于培养有经验的宣传员。我的前任于今年5月17日已将上述侦探机关的材料送到区里（第216号）。朱加什维里于7月19日到达沃洛格达市后住在马洛科兹连斯卡亚街勃布罗娃房子里，从7月24日起已将外号为‘高加索人’者列为监视对象。

……可以预言，朱加什维里不久将离此去圣彼得堡或莫斯科会见当地组织的代表，离开沃洛格达市后将继续对他进行监视。

考虑到朱加什维里行事谨慎，因此有可能脱梢，所以最好能趁他在沃洛格达市时，对他进行搜查和逮捕。鉴于上述理由，请您告知我们，您那里是否有关于朱加什维里什么材料，足以作为立案的根据？您对马上进行搜查是否有什么不同意见？

附带要说明的是，在沃洛格达市对他进行搜查不能预计结果会很顺利，因为此人的活动是异常秘密的。

在搜查朱加什维里的同时，打算对其他和他有关系的人也进行搜查。

科尼斯基上校。”①

---

① 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影印102号，档案编号267/1911，存档时间1911年。

很难设想，从这类的通信里可以证明斯大林是一名奸细。

这样一来，我们不能同意一些人坚持说斯大林和沙皇暗探局有什么秘密联系，因此不能同意说他由于似乎害怕别人揭发自己而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斯大林不是给那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暗探局服过务，他只是为了他自己和他那毫无止境的虚荣心服过务。

但不管怎样说，就是我们把斯大林是否和沙皇暗探局可能有联系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去进行彻底的研究，我们在本书中也应该指出，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内奸，但我们说的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内奸。

这就是说，斯大林进行争夺权势的斗争时，最喜欢使用的武器就是奸诈行为，而且使用得异常巧妙。 623

早在二十年代党内斗争时期，斯大林用尽一切伎俩煽动党内的分歧，挑拨一部分党内著名活动家去反对另一部分活动家，使党的领导人之间保持相互间敌对和仇视关系。

不管我们在基洛夫被暗杀问题上持哪一种看法，我们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利用这次暗害事件以达到他的阴谋教唆的目的，他巧妙地把苏联人民的愤怒引向反对原反对派。至于所谓的三十年代对原反对派领导人进行"公开"政治审讯问题，那么按其后果来说，毫无疑问是世界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阴谋暗害行为。

根据彼·雅基尔①证实，斯大林于1937年在一次苏联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称，他似乎收到了一封密告勃柳赫尔的信，签署告密信的人是勃柳赫尔的一名副手。斯大林当时宣布，他不相信这一份密告。实际上斯大林并没有收到他所说的那个人的密告。他讲这样的事是为了挑拨勃柳赫尔和他一个战友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位战友在勃柳赫尔的默许下不久被逮捕了。大家知道，斯大林经常给自己的代表和下级（当然，是口头命令）下达这样或那样的罪

① 彼得·约诺维奇·雅基尔（生于1923年）——著名苏联军事将领约·埃·雅基尔的儿子，历史学家。——译者

恶的命令，这些人则因为执行了这些命令而受到惩罚。但是在审讯过程中他们不可能指出斯大林来，不然的话，除了已有的罪行外，他们还被逼迫承担诬陷之罪。

斯大林的阴谋伎俩和他的各种声明这类例子不可胜数。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实践中也广泛使用了阴谋伎俩。侦查员不仅对犯人进行非刑拷打和百般虐待，而且条件允许时，他们也采用了阴谋伎俩。他们利用了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们的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请他们帮助揭发危险的"人民敌人"，并为此提供所谓需要的伪造供词。叶·金兹堡写的《陡峭的征途》一书中叙述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伎俩。①

624

非常复杂的阴谋手段用于陷害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贝塔尔·卡尔梅柯夫。人们知道，贝塔尔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白军军官，当时住在巴黎。她和前夫生有一个儿子，在莫斯科学习。不知用什么借口内务部把这个青年叫到白俄罗斯去，然后在这里的边界上的一个车站把他抓起来了，指控他企图越境逃到他父亲那里去。此后，就炮制了一个贝塔尔·卡尔梅柯夫参与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案件。

同样，用这套阴谋诡计对付内务部自己的干部，一旦他们对斯大林或他的亲信近臣来说是不称心的了。例如，内务部某少将接到任务叫他尽快到国境线去同哨所领导人一起组织捕获一名据说应该在某一地点越境的危险间谍。当这位少将立即动身去边境地区后，他被该哨所领导人为首的边防军拘捕了，并被指控为企图逃往国外。

战后时期的所谓"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案件"都是典型的阴谋诡计，是斯大林同一些内务部的负责干部共同制造的。

这样，我们看到，斯大林经常象一个内奸一样挑拨苏联人们之间的关系，离间和分裂党，并不是去团结全党，使之实现大联合。

---

① 叶·金兹堡：《陡峭的征途》一书中的一章：《普加乔夫之塔》。

所以毫不奇怪，今天许多力图弄清楚斯大林行为的性质和动机的人们，不仅把他同伊凡雷帝等过去的暴君相比较，而且还把他同过去的较有名的奸细相比较。例如，格·波梅朗茨在他写的那篇很有特色的抨击性的文章《一个历史人物的道德面貌》里，把斯大林同阿杰夫（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同时又是秘密警察的特务）相比拟。米·巴·雅库波维奇在他写的一篇关于斯大林的很有趣的文章中也作了完全相同的比较。雅库波维奇写道："能把斯 625
大林同哪个历史上的活动家相比拟呢？把他这个人物，从其内心世界说，同什么人加以比较，才能给人们一个形象的认识呢？我认为，不必为此去深挖历史，追溯到遥远的年代，如到伊凡雷帝和彼得一世的时代去寻找同类的人物，用不着去惊动他们的阴魂，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去研究一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这个革命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而且是至今还活着的一些人亲眼见过的。

在这一运动中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敏锐的目光不能不集中在二十世纪初期参加这一运动的一个最著名的活动家、悲剧性的而且是凶险的人物上面，此人无疑是智慧过人，具有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冷静思考和非凡的自制能力，他善于使人们服从于他，跟随他，使他们相信他，相信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极端蔑视这些人，嘲笑他们的思想。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叶甫盖尼·菲力普维奇·阿杰夫。多少年来他不仅是'战斗组织'的头头，而且是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者！他是这个党的实际领导人——是党中央的实际的首脑……他用阴森的尊严接受青年人对他的崇拜，他冷酷无情把自己的青年同志和崇拜者出卖给警察局——他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地把他们送进监狱，送上绞刑架，但是他如果只把自己革命组织的同志出卖给沙皇警察局，他就不可能保持其'战斗组织'的头头及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人的地位，因为他很快会被揭发出来并被消灭掉。

不是的，为了保持自己革命的威望，他把不少的恐怖暗杀活动坚持搞到底，他十分灵活巧妙地组织了对一些沙皇制度的活动家

626 的暗杀，被杀害的不仅有某些第二流的活动家，甚至还包括领导沙皇帝国国家暗探局机构的内务部部长。阿杰夫本人恰恰就是为他们服务的下属，他向这个机构出卖了无数忠实的革命者，因而深受他们的信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暗探局不可替代的忠实的仆人，他用这种手段使自己成为完全'经得起考验的'的人。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对两个内务部部长——希彼亚金和普列维的暗杀。最后又组织了暗杀皇亲(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莫斯科省省长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这在'战斗组织'和整个社会革命党看来是伟大功绩，使阿杰夫在革命者中间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信任，革命对他的信任如同阿杰夫在沙皇政府警察局那里受到的信任是一样牢固的。

……为什么阿杰夫要玩弄人的生命，从两方面把人消灭掉呢？他为什么一方面消灭自己的革命同志，另一方面消灭自己的警察局头子呢？我想，他在这样的活动中首先和更多的是满足他的权力狂，他的权势欲，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没有可能利用其它形式去得到这种满足。这是权力一切可能的形式中的最大的权力。而杀人则是权力欲的最大最充分的满足。当然，如果具有权力狂的人的性格中还具有血腥残忍之特点，遇事惨无人性，那么这就表现在对人们的蔑视，不相信任何一种思想，而是去玩弄这些思想并根据自己实用主义的需要随心所欲地综合地加以处理。

叶·菲·阿杰夫充分地掌握了这一切手段，约·维·斯大林也在同样程度上具备了这一切特点。正如阿杰夫把自己的同志送上沙皇绞刑架一样，斯大林以同样的冷酷的心，毫无怜悯地把党内的同志送去枪杀。这两个人的动机完全一样，这就是不能遏止的、无限的权力欲，从事杀人的行为是最能满足他们的这种权力欲。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他们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活动的：斯大林通过他所属的国家安全机构实行自己的权力，而阿杰夫 627 是通过沙皇法庭及沙皇警察局或者借'战斗组织'成员之手实现他的权力。如果阿杰夫掌握国家政权的话，他肯定也采取和斯大林

同样的方法。”

六、再谈斯大林的个性和他的犯罪动机

总而言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无论是斯大林周围人物的阴谋或他自己的病态的怀疑心理都在1936—1938年事件中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些因素的作用当然不能完全否认。

那么，在这些悲惨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斯大林犯罪的基本因素是什么？

首要的和主要的因素是斯大林的漫无遏制的虚荣心（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米·巴·雅库波维奇的看法）。

斯大林这样的虚荣心，这样的不可遏制的而又小心隐藏起来的，任何人、任何事情都限制不了的权力欲不是1937年才出现的，而是早在这以前就存在了。斯大林在国内及党内的权力和影响虽然已相当强大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他想的是绝对的权力和对他的意志的百依百顺。列宁所制订的党的生活准则总是使斯大林感到拘束。他需要考虑其他党领导人的意见和批评，这一点总是使他恼火，列宁逝世后，他在这些人当中只不过是与之平等的人们之中的第一位而已。

斯大林在1937年以前虽然已经腐蚀了我党的许多老的领导人，但他还是很懂得，这些人不可能成为他所设想建立的国家机器的简单的不声不响的螺丝钉。因为这些人也认为，他们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十月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工作。所以他们要求在这个党和这个国家领导中也要有自己的一份。

斯大林并不是因为患了迫害狂后认为周围的人全是卖国贼和叛徒，因而在国内篡夺了全部权力，不再信任他周围的人了。不是这样，他很早就有意识地追求独裁，追求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权力。彼得·察金提供了这方面很有趣的证明材料，他过去是列宁 628

格勒党组织的一名重要干部，是和基洛夫很接近的人。察金说，在基洛夫被选为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后不久举行了一次午宴，出席的除了基洛夫、察金和列宁格勒其他一些同志外，还有斯大林和托姆斯基。谈话涉及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后如同当时许多党内同志谈话时一样，不久归结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列宁怎样领导党？"所有的人理所当然地一致认为，应该是集体领导党。斯大林起初没有参加谈话，但后来他站了起来，围绕着桌子走了一圈说："不要忘记，我们住在俄罗斯，一个沙皇的国家。俄国人民喜欢国家为首的是某一个人。当然这个人应该执行集体的意志。"（非常典型的事实是当时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想到，斯大林指的俄国这样的领袖就是他自己，他们甚至于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有这种想法。）

可以设想，斯大林是认真地对待他的如下的命题的，即：在我国社会主义越是获得成就和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是尖锐化。由于斯大林认识现实的方法是倾向于抽象公式化和对实际情况的简单化和机械化，所以他往往深信他自己创造的这些公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是，当斯大林把这一命题不仅用于原剥削阶级代表人物身上，而且扩大到老革命家，党和苏维埃国家基本干部队伍身上时，毫无疑问，他则是别有用心了。

使人奇怪的是，甚至在后来当斯大林提到那些被他消灭掉的人们时，还表现了对他们的某种尊敬。根据亚·伊·托多尔斯基的证实，1938 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关于亚·伊·叶哥罗夫的问题，他当时刚被撤除总参谋长和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斯大林在这次会议发言时谈到叶哥罗夫的前任图哈切夫斯基，他说：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天才是不容怀疑的，他对所接受的任务高度的责任感和力图在理论、技术和实践上走在发展着的军事的前面。有一次在乌波列维奇被枪决之后斯大林告诉季·阿·麦列茨科夫说："你们要象乌波列维奇在世时那样培训自己的部队。"[①]

① 《军事将领乌波列维奇》莫斯科 1964 年版。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至死为止，对待那些成为他的暴政的牺牲者们的态度总是满怀恶意和仇恨。

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确实害怕自己的许多战友，害怕他们有阴谋勾结。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内务部机构对全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都进行系统的监视。斯大林住的别墅里通常有几个卧室，每张床上都放着一套床上用品，斯大林自己铺床。睡觉前，斯大林时常检查床下面，他为了便于进行这种检查，卧室的灯没有灯罩，而且电线的长度可以放到地板上。斯大林的别墅有两个出口，一年四季都被严密守卫着①。政治局委员彼此见过面，喝过茶，作过客就可能受到怀疑。但是斯大林的全部行动说明这不过是一个独裁者和暴君怕失去自己权力的恐惧心理，绝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领袖的过分的警惕性。

上述一切事实足够明显地向我们证明，消灭老党员队伍对斯大林说，这是他的一种政策，并且这一政策是完全自觉地实行的。所有事实说明，斯大林和内务部的领导有一个消灭党、苏维埃和军事干部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根据亚·托多尔斯基的说法——按其规模不亚于动员一次强大的军队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思考的，物质上得到充分地保障并巧妙地付诸实践的。这是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先例的、有计划地实现着的暴行。 630

* * *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或那个政治活动家的不受约束的虚荣心不会自动地导致大规模镇压该活动家的敌人和反对派，甚至当他采取镇压和暗杀手段也不会遇到任何严重障碍时，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在分析三十年代的镇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时，不仅应当指出斯大林的虚荣心，而且也应当指出他的骇人听闻的残忍的天性。还应该谈到斯大林毫无止境的虚荣心和他过分享

① 关于斯大林的生活，请参看他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美国发表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该书中描写斯大林只有一个房间，开会、会客、休息都在这里，晚上就睡在沙发上，和此处写的不同。——译者

有的虚名同他的才能有限及对党的贡献是相矛盾的。因为正是这一矛盾导致斯大林和这样一些人发生冲突，斯大林并不是毫无根据地把这些人看成是他当时的或可能是将来的对立面，而且也导致斯大林和那些对斯大林本人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冲突，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并且几乎是执行了他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应该指出，斯大林从少年时代起，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他的虚荣心很早就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凶狠和嫉妒的性格。斯大林没有受到认真而系统的教育，他不懂外文，但到 1917 年他参加了一个这样的政府，这个政府连敌人都不是毫无根据地称之为欧洲教育水平最高的政府。斯大林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地想领导一切的欲求，而却是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讲家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点产生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

631 具有嫉妒心理和虚荣心的斯大林，渴望的不仅是无限的权力，而且还渴望无限的荣誉，所以他身边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历史舞台上起任何较大的作用。因此，许多人往往成了斯大林的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和党面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的证实，我们知道，罗马的皇帝尼禄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是演员和伟大诗人，他经常不仅杀害那些不给他鼓掌或怀疑他的才能的人，而且也杀害那些在作诗或舞台表演方面真正超过了这位虚荣心很强的皇帝的人。尼禄为了不使人民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任何过去伟大演员痕迹，他命令把这些人所有的全身像和半身像都砸烂了。他甚至想把罗马改名为尼禄堡。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就其实质来说也是和他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仇恨和想杀害的不仅是在某时反对过他的人，而且也有那些按其革命贡献来说完全可以和斯大林平起平坐的人，有时甚至是比斯大林有

更大的贡献的人。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妨碍着把斯大林奉为神明，因此这就成了他们应该被消灭的理由。斯大林在世时，全国各地都为他树立了纪念碑，成千的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都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个人迷信时代多少城市都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斯大林尼尔、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纳康、斯大林、斯大林诺瓦罗什，简直数不胜数。

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到1912年才第一次被选为党中央委员，实际上他当时还不属于那个在列宁周围形成的党的基本领导核心。斯大林在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中所起的作用，也比后来的神话中所讲的要少得多。在革命前，总的说来列宁很少知道斯大林（后来说列宁同斯大林的“友谊”是从他们在塔墨尔福斯会议上第一次会面后就开始的，这种说法和实际情况不一样）。1913年初，列宁又一次见到斯大林，并读过他写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当时列宁写信给阿·马·高尔基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格鲁吉亚人，他收集了全部有关奥地利和其他的材料，坐下来给《教育》杂志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列宁的性格中有着过于偏爱某些人的地方，在这方面他常有失误。大家知道，列宁这一时期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印象也很好，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马林诺夫斯基却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1913年，列宁和斯大林的交往是很短暂的，所以列宁很快甚至于把这位“很奇妙的格鲁吉亚人”的姓名都忘记了。1915年7月列宁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您记得科巴姓什么吗？”① 但是季诺维也夫大概也忘记了他的姓，所以列宁几个月后又问维·阿·卡尔宾斯基：“有件事求您：请打听一下‘科巴’（约瑟夫·朱……？？我们忘记了）姓什么（请您问斯捷普科或米哈）。这件事很重要！！”②

632

但是，当斯大林在建立和鼓励个人迷信的时候，他渴望而且设法不仅把当前的活动，而且把自己过去的全部活动都无限地进行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101页。

② 同上书第161页。

吹嘘。这样，建立斯大林迷信的需要和我党的历史就显然有了矛盾。斯大林同那些和他关系亲密的人一起，开始直截了当地不知羞耻地伪造历史。他不仅亲自伪造党史的许多材料，歪曲和掩盖许多历史事实，而且还鼓励出版了有着这类内容是伪造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

但是还有不少人，他们对党史中的事件都非常熟悉而且自己就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这些人妨碍斯大林的事，他们知道的太多，所以他开始有意识地制造阴谋，把这些人从生活中排挤出去，也许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也从历史上排挤出去。

例如，在1935年我国出版了一本贝利亚写的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书，这本书到处散发，大肆宣传。（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那位完全不善于从事写作的贝利亚，而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贝季亚和一些其他的人。贝季亚的书出版后，他本人被诬陷身亡了。）在这本作者被认为是贝利亚的书中，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真实的历史被粗暴地歪曲了。书中的内容包括这样伪造的说法，即在我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还存在着第二个中心，这个中心是由年轻的斯大林领导的。那份只出过四期，而且篇幅只比一张传单大一点的《战斗报》，却和列宁的《火星报》相提并论了。贝利亚还宣布：斯大林是有名的巴库地下印刷所的创建人，尽管斯大林在那些年代一次也没有到过巴库。

理所当然，受到斯大林完全赞许的这类伪造不能不引起我党、特别是外高加索许多著名活动家的愤慨。斯大林和贝利亚一起并不想费点心思去给这些伪造的说法找证据，相反，却决定去消灭掉党的那些活动家，而且把他们的功劳归为己有。

同样，从肉体上消灭了几乎是所有的中央委员和许多杰出的国家和党的活动家之后，斯大林就为推行那种说十月革命有两个领袖的假话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红军许多杰出的将领的镇压也可用同样的动机（当然是部分的）加以解释。只有在对这些人进

行诬陷和杀害的前提下，斯大林才能“修改”历史，并把红军在内战各战线的决定性功绩都窃为己有。

不能不指出，看来，斯大林从他的政治生涯最初几年起就抱有作一个和上帝一样的领袖的幻想。斯大林在1924年谈到他和列宁第一次会面时，写道：“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我是多么失望呵……通常，‘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① 那时，1924年，大家知道，斯大林很赞扬列宁的这一朴实和平易近人的性格。但是，这样的赞扬并不是诚恳的。我们知道，斯大林成了“伟大人物”之后，为自己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原则和秩序。凡是不同意这些原则和秩序的人都遭到了他的残酷镇压。 634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导致斯大林犯有骇人听闻罪行的基本动机，当然不是唯一的动机。

*　　*　　*

现在许多写回忆录的人在评价斯大林的时候不仅指出这个人很虚荣，喜好功名，生性残忍，而且还指出他性格粗暴，文化水平不高和没有知识、没有教养。康·康·奥尔忠尼启泽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众所周知，斯大林和谢尔哥是亲密的朋友。我经常到我的哥哥谢尔哥那里去，我不仅认识了斯大林而且认识了共产党和我国的许多著名活动家，首先是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斯大林于1926年6月到梯弗里斯来过一次。他是6月1日到梯弗里斯的，住了一个多星期。和他一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9页。

起来梯弗里斯的是阿·伊·米高扬。谢尔哥那时住在加诺夫斯卡亚街（现在这条街叫塔比泽街），斯大林和米高扬晚上就住在谢尔哥的寓所。那时我和他们已经比较熟了。

由于斯大林的来访，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的负责干部都聚集在谢尔哥的寓所里，大家一起吃饭，喝了很多酒，并在酒席上合唱了一些歌子。斯大林给我倒了一杯格鲁吉亚葡萄酒，我一口就把 635 它喝干了。后来他又给我倒了一玻璃杯酒，我也一下子喝干了，继续同大家一起唱歌。

趁着大家停止唱歌的时候，斯大林用格鲁吉亚语唱了一支歌。这是一支不堪入耳的歌。他不管这里还坐着一些女同志，继续唱他的歌。玛·普·奥拉赫拉什维里不需要翻译，但是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的妻子）不懂格鲁吉亚语，她请谢尔哥给她译成俄文。谢尔哥起初不愿翻译，但她非要他翻译不可，因为她看见许多人都表现出很难为情的样子，在座的人的反应都很异常。当谢尔哥小声告诉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这首不堪入耳的歌曲的一些句段时，她羞得面红耳赤了。

斯大林说话很下流，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这次我是亲自了解到：他是如此习惯于说下流话，甚至还唱那些满是不堪入耳的歌词的曲子，更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因为当时还有象玛丽娅·普拉顿诺夫娜·奥拉赫拉什维里和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泽这样的高尚的妇女在场而觉得害羞。

斯大林离开梯弗里斯时，大家又一次到谢尔哥家里作客。又摆好了丰盛的宴席。后来，客人们从谢尔哥家走出来又到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里那里玩。马米亚·德米特里也维奇那时住在帕斯科维奇街（现在这条街以菲力浦·马哈拉泽的名子命名了）离谢尔哥家不远。斯大林不愿意去马·德·奥拉赫拉什维里那里，但是谢尔哥说服了他。斯大林可能是被谢尔哥的下面的话说服了，这些话我至今都不能忘记，谢尔哥说：'这怎么行！他是我们地方政府的首脑，不好意思不去看看他！'马米亚·德米特里也维奇·奥

拉赫拉什维里当时是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以后的年代证明，斯大林恨透了奥拉赫拉什维里。看来，他很久以前就不喜欢他了，所以当时斯大林同意到他家去是非常勉强的。”

同时，在许多回忆录里都指出了斯大林的意志十分坚强。1939年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的最基本 636 的心理特点使他象狮子在荒漠中能成为动物之王一样，能够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这一特点就是他具有非凡的超人的意志的力量。他总是知道他想做什么，并且以不倦的超人的毅力逐渐达到他的目的。有一次他告诉我：'因为权力在我手里，我是渐进派。'在那安静的办公室里，完全与人隔绝的环境里，他仔细思考自己的行动计划，并且进行非常细致的安排，然后就突然给予非常准确的打击。斯大林的意志的力量压服了和消灭了那些受他影响的人们的个性。他很容易就'压服了'不仅象米·伊·加里宁这样软弱的和个性不强的人，甚至也'压服了'拉·莫·卡冈诺维奇这样有毅力的人。斯大林不需要顾问，他只需要执行者。所以他对亲近他的助手要求他们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们，他用他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他文化水平不高……他没有列宁所具备的那种现实主义，李可夫虽然不如列宁，但至少具备现实主义的观点。他没有远见。他在采取某一步骤时，没有能力去考虑它的后果。他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他不能象列宁那样预见事态的发展和指导自发势力，而是跟在事态发展的尾巴后面，蹒跚着，顺着潮流往下游。正如所有一知半解的半知识分子一样，斯大林仇恨真正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斯大林没有国家活动家应有的那种灵活性。他的心理状态和杰林木汗一样，是一个夺取了独裁权力的高加索强盗。[①] 他对人们是蔑视的，他认为他是对他们握有生杀全部权力的主人。一个狭隘的宗派主义者，总是从带有成见 637 的教条出发的。他和尼·伊·布哈林一样也是公式主义者，差别

只在于布哈林是有理论修养的人。斯大林力图把生活套在他已准备好的框框里。活的生活越顺从了他，被'削足适履'，他就越歪曲和摧残了它，他就斩断了它的肢体。他知道形式逻辑的规律，他的结论是从前提，用逻辑推理得出来的。但是，在那些较杰出的当代人物的背景上，永远看不见他的智慧的光辉。可是他异常狡猾……在'狡辩'艺术方面谁也不能和斯大林相比。他同时又阴险、背信弃义和打击报复。'友谊'这个词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连叶努启泽这样的好朋友都能一把扔掉不管交出去杀了。在家庭生活中，斯大林要求的只是一个流放者所需要的东西，他的生活很简单朴素，因为他象一个严厉的禁欲主义者一样蔑视生活福利；无论是生活上的方便条件，还是饮食，他简直都没有兴趣。他甚至于连朋友都不需要。"②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对斯大林很熟悉，他对斯大林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上述描写当然还不是很全面的。

是的，斯大林是一个意志力量坚强的人，当他追求他要达到的目标时，他坚定不拔，是不可动摇的。斯大林的意志坚定，不露声色和沉默寡言是许多布尔什维克都佩服的，这些特点使他取得了坚韧不拔的战士的声誉，在许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的心目中，对斯大林的这一形象有着某种好感。但是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消灭一部分党的领导人，又使另一部分领导人顺从他，并非因为在这些人之中，他的毅力最强，并非因为他比基洛夫或奥尔忠尼启泽，邱巴尔或卢祖塔克，勃柳赫尔或雅基尔更坚强和更有毅力。从背后打枪

---

① 在这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看法是错误的。杰林木汗不是一个强盗，他代表了高加索反沙皇政权的民族压迫和恐怖的反抗力量。参看切梯族作家 M. 马马那也夫《杰林木汗》一书，格罗兹内依市 1971 年版。总而言之，在国外的一些写斯大林的书中，早就企图把斯大林的行为解释成什么"高加索"的教育的特点是山区人的复仇精神。说斯大林是半欧洲人半亚洲人，诸如此类。这一切解释是经不起批评的。残忍和虚荣心完全不是什么高加索人或亚洲人的特点，这些品质，很遗憾，在世界各洲到处皆是。

② 1964 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妻子把他的日记交给了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文学遗产整理委员会。

的凶手也并不是比他的牺牲者有更强的毅力的人。同样，诚实的人不去犯罪，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他不过是不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目标，他的性格和毅力是用在另外的事情上。我们往往会把一个能轻易越出人和人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的公认准则的人，以及越出诚实的斗争原则范围的人当作是最坚强的人。而这个或那个人践踏公认的原则和标准越多，他周围的一些人就越会把他看成是“有毅力的”坚强的人。然而大多数犯下的罪行并不证明毅力坚强，而只能说明这个或那个罪人的道德原则和观念的薄弱。 638

是的，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坚强的人物。但他根本不是什么象一些当代人所描写的那样是具有“超人”毅力的超人。只不过是斯大林从来没有过任何坚强的道德原则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从来没有过对人们的爱和尊重，也没有想要为他们服务，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也从来不承认有什么公认的政治斗争标准。斯大林利用自己在党内地位的优势，从背后去进行突然和阴险的打击，用这种手段，他摧残和消灭了很多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斯大林自己也有机会在内务部刑讯室里遭到他加诸于自己往日的朋友和战友的那些折磨时，他的表现是怎样的呢？在那样的情况下，他的“超人”的毅力和坚强性格又会是怎样呢？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埃赫、邱巴尔、卢祖塔克、勃柳赫尔、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毅力比斯大林薄弱而牺牲了。只不过是我党和我国所拥有的足以能够防止象斯大林这样的人成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障和有效措施，实在是太少了。

* * *

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斯大林为人狡猾，他说得太不够了。斯大林不简单是为人狡猾的问题，他是一个异常奸诈的人，正是因为他善于给自己戴上任何一种假面具，他才能够得到他想取得的许许多多的东西。 639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斯大林是非常残忍的人，他不爱人们，

而且蔑视人们。他那残忍性格的发作早在大规模镇压之前就不止一次表现出来过，其中也包括对待他周围最亲近的人的关系上。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是他那残暴本性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她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十分诚实的女子，她在1932年自杀身死了。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泽对她的朋友说过，她在斯大林家里作客时她的心情总是很沉重的，因为斯大林总是喜欢嘲弄自己“最亲近的人”。恶作剧的对象往往就是他自己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有一次除夕，斯大林想出了如下的方法取乐：他坐在桌旁，把纸卷成小圆筒，套在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手指头上。然后他把这些纸筒当作新年蜡烛点燃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痛得都直不起腰来了，但他不敢把这些纸筒子甩掉。

这些恶作剧“玩笑”的对象往往还有那些首次被邀请到斯大林家里作客的新选出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为了“取乐”，他甚至于能够把一位“新人”推到斯大林别墅的池塘里，或者晚上吃饭时，请他站起来举杯祝酒，这时就在他的椅子上放一块蛋糕，或至少放一个西红柿。

但许多人也说，斯大林同时又可能是最殷勤的主人，可能变得非常迷人，对他的客人温柔体贴，说恭维话，款待他们，在就餐期间给他的客人亲自端上这样或那样的高加索菜餚，有时亲自在自己花园里为客人剪下玫瑰花，做成花束，亲自献给客人。(在这里可指出一个偶然巧合，即希特勒也喜欢赠送玫瑰花束，他喜欢闻玫瑰花的香气。)斯大林特别是在接待外宾时，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殷勤好客的主人的角色。这就扰乱了许多人的视听。我们已讲过：里昂·费赫特凡格尔描写他对斯大林的印象时真是百般赞赏。就是伟大的英国幻想小说作家赫·威尔斯也没有能够了解斯大林，他于1934年到过美国，和罗斯福谈过话，不久他就到了苏联。斯大林接见了他。威尔斯描写了他这次同斯大林会面留下的印象，他写道：“我承认，去见他时，我对他有怀疑，而且是有成见的，在我的头脑中斯大林的形象已经形成了，我认为：他为人异常谨

慎，狂热地崇拜他自己，他是一个暴君，一个心怀嫉妒，疑心甚重的寡头政治家。我倾向于同意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看法……我曾等待见到一个冷酷无情的、心地凶残的空论主义者（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看见一个自鸣得意的格鲁吉亚的山民，这位山民的精神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摆脱他那故乡的山谷。"①就是这样，威尔斯终于见到了斯大林，并且和他谈了话。

"……结果，那些长期期待看到的不会给人带来吉祥的山民的一切特征，都无影无踪了。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他的像片或画像会和他本人完全不一样。描写他是很不容易的。许多对他的描写夸大了他的阴暗和沉静。他不喜欢多与人交往，他的纯朴的性格对于那些比较健全的、但缺乏幽默感的头脑无法理解，这些特点，就使他成为虚构各种最奇怪的故事及编造各种丑闻的对象。他那不为外人知晓的、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的私生活比起他那异常重要的国事活动更加保守秘密，于是，当一年前他的妻子因脑部损伤突然去世时，那些有极强的想象力的人，就编造出她是自杀的神奇的传说，因为这样的事，在苏联国内是完全不可能大肆声张，对社会公布的。可是，当我们和他只谈了几分钟的话之后，那些似是而非的传说，那些说他过着秘密的过度的感情生活的怀疑就永远不复存在了……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更诚恳、更正派和老实的人；他身上并没有什么阴暗的表示不祥的东西，也正是应该用他具有这些品质去解释他所以能够在俄国享有巨大的权力。过去，在见到他之前，我想也许人们说他不好是因为他们怕他。但是，我确实已经弄清楚，相反，并没有什么人怕他，大家都是相信他的。俄罗斯人非常稚气，然而却是狡猾的人民；也许俄罗斯人惧怕他们自己和别人的阴险诡诈行为是有道理的。斯大林是一个一点也不狡猾，一点也不阴险的格鲁吉亚人。他的坦率的正统思想是他的战友们安全的保障……他们被列宁的思想所陶醉，所以，起初他们很

641

① 赫·威尔斯：《自传之实验》纽约1934年版第684—689页。

怕会偏离他能出奇致胜的路线……”。我们看到，这样一来，威尔斯对于他和斯大林会见的描写，与其说是给斯大林画了像，还不如说是给自己画了像。

不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和文化界人士（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在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被提拔起来的干部）也被斯大林的殷勤和关怀的态度所迷惑。例如，1947 年一位在自己别墅里休息的元帅接到电话被邀请去参加“主人”的午宴。午饭是在较随便的气氛中进行的，斯大林经常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他突然走到元帅面前问道：“我听说您不久前还被关着呢？”元帅答道：“是的，斯大林同志，我被关起来了。您看，我的事情搞清楚了，我被释放了。可是有多少很好的、很优秀的人才在那里牺牲了！”元帅突然用这样的话结束自己的答话。

斯大林慢慢说道：“是的，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很优秀的人才呵！”斯大林突然转身从房间里走了出去，他到花园去了。在桌前就坐的人都吓得不说话了。马林科夫愤怒地小声说道：“您对斯大林说的是什么呀！这可是干什么?!”几分钟后斯大林回到房里。他手里拿着玫瑰花。他把一束花送给了这位元帅，另一束送给了元帅的妻子。本来已经作好各种坏的准备的这位元帅弄得惊奇不已，然而，此后他在斯大林面前就永远没有再提过牺牲的同志了。

斯大林为了给这样和那样的一些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有时，简直在他们面前演出一场又一场的戏。例如，在战后，他正在自己的 642 办公室里接待一位海军上将，突然，斯大林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了来，波斯克列贝舍夫把一叠有关语言学问题的书放到斯大林的桌子上。把这些书名（其中有一些是革命前的书）讲了一遍之后，说有些书暂时还没有找到。“真是没有斯大林不研究的问题”，这位海军上将这样想。

E·瓦尔加院士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他的桌上总是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

还在战争年代，有一个关于飞行员的故事曾经广为传播，故事

说这位飞行员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之后，当天夜里在莫斯科街上开枪打死了一个缠着一个姑娘不放的男人。巡逻兵拘捕了飞行员并把他送到了卫戍司令部。这件事向斯大林上报了。斯大林问，按“苏联法律”他能为飞行员作些什么？人们告诉他，斯大林只能办一件事：在开庭审判之前取保释放飞行员。斯大林亲自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了一份申请，提出由他担保，要求释放飞行员。飞行员返回自己部队，不久他在空战中牺牲了。①

还在1935年，斯大林在那次为军事学院毕业生举行的宴会上，突然为布哈林举杯祝酒，他说：“同志们，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干杯，我们大家都爱他，熟悉他，有谁如果要纠缠老账不放的话，那就叫他滚开吧！”

643

亚·科萨列夫的妻子在为纪念科萨列夫的晚会上举过一个说明斯大林要两面派的极典型的例子。她在发言时说：“1938年夏天当巴巴宁探险队②回到莫斯科时，在克里姆林宫里首长会见了队员并举行了盛大宴会。莫洛托夫为包括科萨列夫在内的所有出席宴会的人，依次举杯祝酒。当为某一个人干杯时，这个人走过去和斯大林碰杯。萨沙③也走了过去。斯大林不仅和他碰了杯，而且拥抱了他，还吻了他。当萨沙回自己坐位以后，他脸色苍白、恐慌万分，他对我说：‘咱们回家去吧。’当我们坐上车回家的时候，我问

① 有关这一被遗忘的故事最近空军元帅A.E.格洛瓦诺夫把它作为斯大林尊重苏联法律的例子写进他的回忆录里。（《十月杂志》，1970年，第5期，第195页。）在战时曾经有人称赞不已地讲述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格洛瓦诺夫赞许这件事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很清楚地了解，斯大林在战前是多么残酷地镇压了苏联空军的领导人，在战后苏联空军的许多领导人又受到迫害，当时，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甚至把空军大元帅诺维克夫都抛进监狱里去了。

② 巴巴宁·伊万·季米特利耶维奇（1894年生），苏联著名的研究北极地带的专家，1919年入党，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苏联北极探险研究站站长，五枚列宁勋章的荣膺者。北极探险队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

③ 萨沙，即科萨列夫的爱称。——译者

他，为什么他一下子情绪坏成这个样子？他说：'当斯大林吻我时，他在我耳边上说：如果你叛变——我就杀了你'"。几个月后科萨列夫确实被害了，虽然他一点也没有反对斯大林。①

斯大林这类非常善于耍两面派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 * *

这样，我们看到，把斯大林说成是具有"不可摧毁的毅力"的某种"超人"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提醒大家，要防止对他作出其它一些片面性的评价。

例如，如果认为斯大林就是一个以阴谋和罪恶的手段钻进党的领导里面来的一个普通的虚荣心很强的暴虐之徒和两面派，那就不对了。作为一个人，及作为一个领袖，斯大林是一个复杂得多的，充满矛盾的人物。理所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无论如何不能再称斯大林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了。遗憾的是，不仅中国的领导人，就是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和党的工作者继续断言，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斯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的时候"列宁主义者"这一概念他们不大提，就是提也说得不清楚）。为了给他们的这类断言找根据，往往引用那些早已出版的斯大林的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等等。

644 我们不认为把斯大林当作政治活动家对他进行评价时持这种态度是正确的。首先，已出版的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公式化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如果列宁讲到布哈林时说他的理论观点"如果也能称之为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就大大应该怀疑了"，那么这样的评语用以评价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就更加有理由了。（关于这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谈。）但事情当然不仅在这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斯大林说的话和作的文章无疑都是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能不考虑到我党的思想体系，

① 见革命博物馆1933年11月21日为纪念亚·瓦·科萨列夫诞生六十周年而举行的会议速记稿，第49页。

不能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就其本质来说，斯大林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他活动的最后的二十五年。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这个或那个概念的体系，而且是观念和道德原则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的道德原则之一就是热爱人民，忠于人民大众的利益，力求为全体劳动人民谋自由和幸福。但是斯大林从来没有具备过的，正是这样的道德品质。大概可以说，斯大林的政治观点的体系在他活动的前一个时期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他的这些政治观点并没有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念和思想、道德的原则体系。所以毫不奇怪，当斯大林掌握了政权他很容易就蜕变了，迅速的失去了他在自己活动的前一时期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表面的特点。我们之所以说是表面的特点，是因为斯大林从本质上看，从来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实际上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路人。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些动摇的和不忠实的人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从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蜕变为暴君和独裁者。难道拿破仑政府和波旁王朝中握有无限权力的警察署长，法国最富有的人约瑟夫·富歇不也曾经是一个最激进的雅各宾党人吗？难道富歇没有号召平等和友爱，没有没收富人的财产，没有枪杀成百的被他宣布为革命敌人的人吗？难道不正是富歇在 1794 年被选为雅各宾派俱乐部主席吗？可是七年后正是这个富歇到处搜捕和迫害了雅各宾党人，再十年之后又去搜捕和迫害了波拿巴党人。

看来，斯大林在评价富歇时，对他表示了尊重，这并不是偶然的。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在读了斯·茨威格写的《约瑟夫·富歇》一书的俄译本后说："这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骗过了所有的人，他愚弄了所有的人。"

大家也知道，墨索里尼在他的政治生涯初期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时他正是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左的、最激进的一翼。可是1922年正是这位墨索里尼成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专制主义者。

645

陀思妥也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魔鬼》中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面描写无疑是被极端歪曲了的。但是这一小说的个别细节和人物无疑是很值得引起重视的。这是因为俄国革命运动中不仅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所刻划的人物——拉赫美托夫、吉尔沙诺夫、罗普霍夫和薇拉·巴甫洛夫娜。遗憾的是，在这一运动中也有过象利普金这样的人物，用陀思妥也夫斯基话说，他是一个省里的小官吏，是个好嫉妒、粗野的独裁者，是一个吝啬鬼、一个高利贷者；此外还有象魏尔霍文斯基这样的两面派、骗子手，卑鄙无耻之徒和杀人犯，他已准备好在"新的"俄国由他来"接受政权"，他想的是把自己少量的支持者团结起来，不是用共同的思想和良好的目标，而是把他们用共同负责罪恶活动这一点团结在一起。这类的"社会主义者"是存在的，可以举俄国革命者涅恰也夫(1847—1882)为例，他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秘密团体《人民的惩罚》的组织者。涅恰也夫曾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号召他的拥护者："为了社会主义'抛弃掉'那些缠绵娇弱的感情，如：亲属关切、友谊、爱情、恩德、甚至于荣誉本身。"涅恰也夫宣称："革命者只知道一门科学：消灭和摧毁的科学。他只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而生活在世界上，片瓦无存地毁掉一切，让世界上出现尽可能多的废墟，多数革命者会无影无踪地遭到牺牲——这就是前途。毒药、刀斧、绞索都会变成圣洁的，因为革命使一切事物都受到圣洁的洗礼。"①

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涅恰也夫式的方法和条件是：个人迷信，盲目顺从"领袖"，被联结成为一个链条的每个环节上的社会主义者们，他们之间建立相互的监视制度，对组织的全体成员层层进行欺骗，耍弄阴谋伎俩。

阿·马·高尔基于1917—1918年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

---

① 引自 Ю. 卡利亚金论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文章（《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1963年第5期）。Ю·卡利亚金告诉本书作者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被认为已丢失的涅恰也夫档案，1953年后从"斯大林办公室"退回原处。

646

上写了不少文章。高尔基当时反对十月革命，他的主要观点正如他当时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高尔基显然是在许多问题上迷失了方向，但是他的一些观察和言论还是很深刻和精确的。例如，高尔基在1917年末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观察我们今天的革命者的工作时，可以很明显地分辨出两种人：一种可以说是永恒的革命者，另一种是暂时的，今天的革命者。属于第一类的人，他身上体现着普洛米修士的取火思想，是推动人类走向完善的全部思想的精神的继承人，这些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理智之中，而且体现在他的感情里面，甚至于体现在下意识的领域里。他是充满活力的思想之无限的链条上的一个生气勃勃的，闪闪发光的环节，在任何社会制度里，他那思想和感情的综合，使他终生都会对现实不满，因为他知道并且相信：人类有力量能无限地把美好的事物创造得更加美好。

他热爱那种青春永在的真理，这不是那感情冲动的，肉体上的爱，不是那用拳头打进人们的心灵和头脑的爱，不是要叫人们受到已经过时的僵化了的真理的奴役或者是叫人们不可救药地去眷恋那已经陈旧的曾几何时是真理的思想……

647

永恒的革命者是一种促进人类的头脑和神经奋发的酵母，或者说，他是那摧毁他以前存在的真理之天才，他去建立新的真理；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人，他心情平静，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心上燃烧着一团几乎是看不见的小火，然而这火光正在照耀着通往未来的道路。

暂时的革命者，即今天的革命者是属于这类的人，他病态地尖锐地感受到社会加诸人们的苦难——欺凌和污辱。他的理智接受了时代提供给他的革命思想，然而他的全部身心的感受仍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个悲哀的，往往是悲喜剧型的存在，他之来到人间，似乎是专门为了对革命思想的文明的，人道的，全人类性的内容进行歪曲；毁坏它的声誉，把它变成可笑的、庸俗的、荒谬的东西。

首先，他就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没有天才，没有力量，因为他受到了污辱，甚至于因为他坐过牢、流放过、曾经有过一个流亡者的困苦的生活和处境。他象一块海绵，全身吸饱了复仇的感情，渴望对欺凌过他的人百倍地进行报复。那只是在理智上被他接受了的思想，并没有在他的心灵里生根，因此，他的这样的思想就和他的行为、他和敌人的斗争方法发生了直接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用以对敌人的方法就是敌人对付他的方法，其它的方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他的思想在他的此生此世里，迫使他在生活中或某一个人的身上首先去寻找那些反面的特征和现象；在他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对这个人的鄙视，因为这个人曾有某一次或百次地使他受过苦，然而这个人为了发现和研究另外一些人的苦难曾不知遭受过多少苦难，这他就不管了……

……他对待人们，象一个没有才能的学者对待那些供他进行残酷的科学试验的狗和青蛙一样，然而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区别就是：没有才能的学者毫无益处地折磨这些动物时，他是为了人的利益也这样做的；可是那位今天的革命者拿人们进行试验时，往往远非是诚心诚意去做的。

人们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材料，这种材料越是用起来方便，它（材料）就越少崇高的精神。如果一个人的个人的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已经提到能去抗议那纯属表面的、形式的革命性时，今天的革命者就毫不客气地威胁那些敢于抗议的人，说要惩处他们，象许许多多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曾经做过和正在做的那样。

他是一个冷酷而疯狂的清教徒，他阉割革命思想的创造力，当然，他不能称之为历史的创造者，他绝不会是新历史的理想的主人翁。”

高尔基对“暂时的革命者”做过的精辟、准确的令人惊服的定义，这定义对斯大林也完全适用。然而非常奇怪，高尔基本人以后确实没有发现这一点，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成了一位和斯大林关系

相当亲密的人了。①

近几十年中科学幻想文学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出了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蜕变为暴君和独裁者的问题。在这方面写得特别有趣的是赫·威尔斯的小说《上帝的惩罚》。我们在前面已写过，威尔斯在1934年会见斯大林以后，他用多么尊重的口吻说他为人诚恳、毫不阴险，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三十年代后半期他对斯大林的看法显然改变了。看来，正是苏联发生的事件反映在他1939年写的那本《上帝的惩罚》的小说中。这本小说所描写的是某一"具有创造精神的革命"，新的世界战争导致了在知识分子领导下的这场革命。当交战双方的国家正在缔结和约，前线的战士在进行联欢的时候，"具有创造精神的革命"的领导人拉德·乌易尔图消灭了想成为新独裁者的联合军总司令。但是革命又面临着新的危险。

由拉德领导的小组开始领导世界上一切事情。他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包括最大的和最小的改革，如日历改革，一年中多出来的三天用人类诞生的三个最大的人物命名——达尔文日、列宁日和拉德日。这个小组的力量就在于他不断地实现那些已成为人

---

① 上面我们提到过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伊萨克·顿·列文在他写的《高尔基的一生》中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似乎因为高尔基试图从警察的残暴中不但营救他的朋友，甚至于拯救敌人，"他坚决地站了出来反对斯大林，"所以他于1936年被斯大林杀害了。列文断言，因此，应该在大审讯之前使他（高尔基）永远沉默。

高尔基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十分了解他的朋友一点也不能证实这样的说法。高尔基不喜欢斯大林身上的许多东西，不喜欢三十年代初苏联现实中的许多事物。然而，虽然有某些保留，高尔基已经倾向于斯大林，而且还受了斯大林的影响。高尔基不愿意去听进行集体化时的那些残酷的方法，不想知道1932—1933年间的大饥馑，他也没有保过1929—1931年间被逮捕的"资产阶级社会党人"。相反，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尔基说出了他那可悲的著名的话："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这句话在大镇压年代，被那些审讯人员恰当地或不恰当地不断重复过。高尔基在1936年曾经号召对被诬陷杀害基洛夫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最后的判决。高尔基于1936年因患肺炎逝世。可是我们毫不怀疑：如果他活到1937—1938年的话，他也会公开谴责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皮达可夫以及其他的"人民敌人"。

类共同需要的一切事物。拉德本人以“一个最普通的人”闻名天下。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他的战友中突出自己。报纸上很少见到他的像片。他不仅发表政治问题讲话，而且在生活问题上给人们出主意。拉德的人数众多的秘书班子学会了模仿拉德签字的笔迹，答复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的信件。拉德在革命面前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他的为人如此使人倾倒，所以他的战友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他创造了特殊的地位。这时全世界的宣传机构都对拉德个人歌功颂德起来。他得到完全不受监督进行活动的可能。他自己也慢慢相信了自己具有特殊的才能，是一个天才。于是敢于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持有自己见解的教授被开除出大学。他组织了秘密警察——保卫革命部。所有社会组织都被解散了。所有和拉德一起共同开始革命活动的人都被枪决或被撤职。政府的医生也被枪决了。后来已经没有什么人可镇压。但是拉德已患有迫害狂症。所以他这位以前的反法西斯分子，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犹太人大屠杀。在实现这一计划的前几天拉德去世了。后来发现，他是被童年时代的好朋友毒死的。他说，我想从那位曾经为革命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人的手里挽救出革命。在拉德死后，由于幸存的革命者的努力，民主和思想自由被恢复了，这次是永远地被恢复了。①

650

我们深信，斯大林从来没有企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斯大林的罪恶的方法和行动给社会主义事业及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代完全取消了十月革命取得的一项主要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斯大林因为首先依靠了惩罚机构并给他们以无限的权力，他就使党的领导作用受到相当的破坏。同样，他给我国的工农联盟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在他摧毁和破坏那些列宁和党创立起来的许多东西的同时，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都还是被迫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① 见Ю.卡加尔利茨基：《威尔斯·赫伯特生平和创作概述》莫斯科1963年版第263—265页。

和劳动大众的情绪和要求。斯大林不仅在口头上被迫提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而且在一系列情况下，在形势的影响下，不能不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去行动。我们已清楚知道，斯大林沉重地打击了我们的苏联科学和知识分子。但同时他也不能没有知识分子。所以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我国文化革命的实现，促进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立。斯大林因镇压了红军将领和共产国际活动家，帮了法西斯的大忙。但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起来反对了法西斯，这样他就帮助和支持了欧洲及亚洲国家的劳动者的反帝反法西斯的斗争。 651

斯大林所关心的不仅是保持自己的权力，而且也要保持自己的声望。他对当代人及后代人如何评价他自己是万分关切的。他曾想为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建立起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当然，他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十年后，苏联人民会去摧毁那为他建立的一切的纪念碑和许许多多还存在的(尽管离全部还差得很远)对他个人迷信的残余。

事实证明，人们经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原因走向社会主义。列宁之所以走向社会主义不仅是因为他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确性，而且也由于在他身上培养出来的、对全世界劳动者及被压迫者的热爱。

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是列宁的产儿。正如老布尔什维克叶·德拉勒金娜所写的那样："它（党）是他全部的爱。列宁象爱党那样，如此爱护地对待党员们——这些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生命每时每秒都是属于革命的。对列宁来说，他们是最高类型的人，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是'茶里的咖啡因。'"①

斯大林对待党和他的干部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因为斯大林走进革命队伍，不是因为他热爱受苦受难的人类，热爱工人阶级，而由于渴望权力和虚荣，企图出人头地，想置人们于自己的意志之

① 《新世界》杂志1963年第7期第5页。

下。斯大林从他革命活动最初几年起，他的突出的特点就是漫无边际的虚荣心和自命不凡。

652 米·伊·罗姆的一个朋友，他是著名的莫斯科地下干部、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儿子，他曾向米哈依尔·伊里奇[1]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1912年某一天，当米·伊·罗姆的朋友只有九岁的时候，有一个高加索人来到他们莫斯科的家里。他同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马上就出去了。高加索人留在家里，就和男孩谈起来了，这男孩很机灵，因此获得了他的好感。大约过了四小时之后门铃响了。男孩跳了起来，但是那个高加索人把他按住了。"等一下，等一下，"他对男孩子说，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使劲打了他一记耳光说道："不要哭，不要哭，记住，今天和你讲话的是斯大林"。

母亲回来了，后来父亲也回来了，但他们马上和斯大林一起出去了。男孩子后来把这客人的奇怪举动告诉了他的父母。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在格鲁吉亚许多小山村里有这样的习惯：如果一个公爵来到农舍里，农民就把自己的儿子叫到房间里来，然后使劲打他耳光，并且还一面说："记住，今天某某公爵来过我们的家。"

对斯大林来说，布尔什维克党永远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是的，我们知道，个人迷信的宣传者为了把他描写成一个经常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一个朴实、平易近人和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作了不少的努力。但现在也同样知道斯大林本人和创造出来的斯大林形象离现实差得多么远。实际上，对普通劳动者来说，他是高不可攀的，他从来不同普通的人见面，也不觉得有任何需要去会见这些人。那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方——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都没有去过。斯大林对人们的命运是无动于衷的，对他来说，这不过是那架巨大的、没有灵魂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些小螺丝钉。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已失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给予的含义，这些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只是枯燥无

① 即罗姆的名和父名。——译者

味的教条而已。

斯大林终于相信了自己的特殊性，他显然认为，和他建树的历 653
史功绩的伟大意义相比，那些似乎是他不得已才犯下的罪行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只不过是运动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学费。实际上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

655

第 十 章

对人民各阶层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一些其它原因

我们在前面讲的主要是有关列宁老一代革命者牺牲的原因，他们大部分都是斯大林很熟悉的人们，他们这些党和国家较著名的领导人都被杀害了。但是镇压的对象，如已指出的那样，并不只是限于我国的最上层。在 1936—1938 年间这些镇压已形成了异常广阔的规模，牵连到各阶层大批的人。这时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死亡，然而斯大林从来都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斯大林的政权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那么，三十年代镇压有着这样广泛和普遍的性质，应该怎样去解释呢？这些大规模地被杀害了的人们，他们的地位和政治观点相差如此之远，这又怎样解释呢？这些年代牺牲者的名单中，为什么我们既能看到反对派领袖、国内战争英雄、政治局委员和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能看到几万乃至几十万普通的农民、工人、职员、下级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呢？

镇压的这种性质只能说明原因和过程是很多的，又是错综复杂的。下面我们只讲其中的一些原因。

656

一、逮捕的一连串反应。"森林被砍——木片纷飞"

斯大林在世时，传播最广的，似乎能解释许许多多矛盾的那个

公式是大家都知道的俄国古老的谚语："森林被砍，木片纷飞"。①人们设想，我党那些被捕的比较出名的活动家，他们确实是人民敌人，我国确实存在着异常秘密、又广泛分布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建立在原反对派的基础之上，并且把许多"蜕化变质"的国家、党、军的干部吸收到他们的队伍里去了。同时还设想，在迅速、坚决地粉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一些过分和过火的行动，因而使一些诚实的苏联人受害了。

不能不指出，这类说法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自己散布出来的。例如，叶若夫在一次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干部讲话时说（老布尔什维克 E.П. 伏罗洛夫证实），苏联正处在严峻的年代，反法西斯的战争即将来临，所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应该在我国消灭一切法西斯的巢穴。叶若夫说："当然在与法西斯暗探作斗争时，会有无辜的牺牲者，我们是向敌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所以如果我们胳膀碰了什么人的话，请不要抱怨。那怕有十个无辜的人受害，也比漏掉一个间谍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是有的。"

当然，现在这样的什么"城门"和"池鱼"的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了。现在我们已很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的"城门"是怎样失火的，"池鱼"是如何被殃及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说法在另外的某种意义上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看到，我党每一位杰出的活动家被害身死时确实引起和他直接和间接有关的几百，有时几千人受到镇压和逮捕。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1936—1938年 657 间斯大林为了解释我党和国家著名的、有声望的活动家为什么遭到逮捕及被处决时，曾提出一个说法：在我国存在着一个广泛分布的法西斯地下组织——第五纵队。根据这种提法，苏联国内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建立了所谓群众性的反革命地下组织，他的各个环节已渗透进苏联社会一切毛孔。所以每一个被捕的人不单单应该被看成是国家罪犯，而且首先被定成某一地下组织，恐怖小组，

① 俄国古老的谚语"森林被砍，木片纷飞"（直译），相当于汉语成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译者

某一敌对党的"中心"或"联盟"的成员。就是因此，在调查期间对被捕的人使用了骇人听闻的虐待，摧残手段，不仅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还要他们供出"同案"和"同谋犯"。有些内务部的局还规定了一定的标准：如果州委第二书记应在审讯过程中至少供出二十名"同谋犯"，那么第一书记就至少应该把他那"地下组织"的四十名"同谋犯"供出来。许多人经过严刑拷打或者害怕受重刑，精神上就完全解除了武装，于是在审讯过程中能供出几十个人的名字，然而这些人当然是和任何反革命或间谍组织都没有关系的。

在这里也不能不指出，部分被捕的人甚至有一种理论，而且他们还力图把他们的理论灌输给自己的难友。这些人号召大家自愿承认各种实际不存在的罪行，并且供出几十名甚至几百名无辜人的姓名，说他们是"同谋犯"。他们认为，国内被无辜逮捕的人，被关在监狱的党员各种假口供记录越多，党就越能迅速地去搞清楚所发生的这些事件都是荒谬绝伦的，因此就会抓住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问题。

叶·谢·金兹堡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布哈林的一个学生，他是生物学家，姓斯列普科夫；他仅在喀山受审讯时，就供出了一百五十名"同谋犯"。他和那些被他供出因而逮捕的人对质时说："你们要在党的面前放下武器"，虽然这些人都从来没有"武装起来"去反对过党。哥尔巴托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1964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中写道，他在被关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就是这样诬陷了三百多个苏联人。

658

叶·亚·格涅金在路比扬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监狱的牢房里遇到一个机械师，据他自己说，他"把全体船员都写上了"，就是说他把轮船的全体船员都说成是所谓反苏组织的成员。

苏·奥·加扎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个从萨姆特列迪阿市来的被捕的人，他叫格基亚，他在审讯过程中诬告了区里的全体干部和他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共产党员。他也相信，被捕的人越

多，侦查机构和法院就越早会发现他的供词是假的，是荒谬的，会发现一切发生的事件都是荒谬的。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法院认为格基亚的供词完全属实，判处了他死刑。被他诬告的所有的人都受到沉重的迫害。

老布尔什维克 Я.И. 德罗宾斯基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底明斯克中央监狱里有着两种观点在斗争着………一种观点称：多写一些，完成和超额完成审讯向你提出的要求，因为正在进行的镇压活动是一个阴谋，这个大脓疱疮，它熟的越快，就破得越快。为了使它熟透，要把更多的人卷进去。作用和反作用是相等的……另一种观点是：斗争，不要有任何妥协。自己不要胡说、也不要诬陷别人。经受住一切非刑拷打、虐待、饥饿、经受不住了，摔倒了——再爬起来，挣扎着站起来，就是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只要你还有一口气，拿出你最后的力量，去斗争，斗争，斗争。"

在其它监狱里也都进行着类似的争论。根据 Н.К. 伊柳赫夫的证实，他在被关的时候遇到过格·索柯里尼柯夫，他劝伊柳赫夫不仅要在审讯记录上签字，而且还要编造各种诬告材料，去诬告那些斯大林的助手，如波斯蒂舍夫以及斯大林党的机关干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等等。索柯里尼科夫说："尽可能多的把坏人拖进去，把好人保护下来。" 659

显然，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不仅不符合任何道德标准，而且完全符合斯大林本人当时的计划和打算。使斯大林有可能不仅消灭原反对派，而且消灭了党的基本骨干队伍。镇压的巨大规模吓不住斯大林。我们在这里且不谈这种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自愿合作的态度会如何瓦解在押犯人本身，会使他们在专横和违法行为面前丧失团结一致的能力。

不过，就是没有这些自愿的"供词"和"交待"，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往往为了进行"审查"和采取"预防措施"逮捕所谓"人民敌人"的许多同事、朋友，乃至偶然相识的人。这样，几乎每一次的逮捕

行动都导致一连串的新逮捕，阻止这样越来越扩大的可怕的株连过程是很困难的。

* * *

1936—1938年间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还同另外一种可耻的做法联在一起，即逮捕和流放"人民敌人"的亲属，首先是妻子，成年子女，往往还有兄弟、姐妹及父母。例如：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一家遭遇非常悲惨：他的妻子和弟弟在狱中身亡，他的女儿和四个妹妹被逮捕了。阿·叶努启泽的亲属有八人被捕。几十万其他无辜的人们也遭到了同样的不幸。

卡列金娜－什维尔在回忆她生活的这一可怕的时期时写道："1938年5月，在我的丈夫被捕七个月之后，我也被捕了。萨申卡①被拉走了，他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儿童收养所里……牢房中有四十至五十人，都是'卖国贼的家庭成员'。我们咬紧牙关忍受了一切侮辱和嘲弄。我们相信会有好的结局，我们在等待着这样好的结局的来临。但是过了三个月，我们被送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运小牛的车箱里度过了两个星期……长长的列车，塞得满满的，全是妇女……有一次列车在田野里停下来。有一个军官爬进车箱，打开图囊，拿出卷宗，呼唤姓名并说明服刑的期限……'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进入我的心灵里。'八年！八年！五年！八年！八年！五年！'我听到了自己的姓名：'卡列金娜－什维尔，八年！'

不知有谁问道：'为什么有些人判八年，有些人判五年呢？我们的罪过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们中间许多人自己也是共产党员！'

军官稍停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回答：'受宠的妻子判八年，不受宠的判五年！'这个专横暴政的代言人还在开玩笑呢！……我们被送到阿克莫林斯克。又从那里送到三十公里外的'第二十六号据

① 卡列金娜－什维尔的儿子。——译者

点'，这里有被铁丝网围起来的工棚，这些工棚可以容纳三百至四百人。集中营里已经有八千个人的妻子。我们把这个集中营叫做'阿尔及利亚'——即阿克莫林斯克卖国贼妻子集中营！"①②

根据同一个集中营原女犯人M.E.列别婕娃的证实，在此集中营关押的还有克列斯廷斯基、德宾科、希塔罗夫、皮利尼亚克、库德里亚策夫和苏利莫夫和许多其他人的妻子。

我国其它边缘地区也建立了不少完全一样的关押"卖国贼的家庭成员"的集中营。几十万妇女被送到克累马从事挖土方和农业劳动。

瓦·格罗斯曼写道："妻子，妻子，她们是莫斯科人、列宁格勒人、基辅人、哈尔科夫人，她们有的很悲哀，有的持正视现实的态度，有的完全不能适应现实处境，这些在上帝面前有罪的、软弱的、温顺的人，脾气大的，性好嬉笑的俄罗斯人、非俄罗斯人，她们是穿着囚服的妇女。她们是医生、工程师、画家、农技师的妻子，是元帅、化学家的妻子，检察长和被剥夺了财产的村民的妻子。俄罗斯的，白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种粮食的农民的妻子。她们这些人是踏着她们丈夫的足迹到西徐亚的工棚坟墓的黑暗中来了。死于非命的'人民敌人'越是有名，踏上他的路途来到集中营的女人就越多，其中有妻子、原来的妻子、第一个妻子、姐妹、女秘书、女儿、妻子的女友、第一个妻子的女儿等等……"③

661

在个别情况下一些有名的"人民敌人"的未成年子女也被逮捕。如：伊科拉莫夫的儿子，雅基尔的儿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女儿都只有十四至十六岁，他们也被逮捕了，还有波斯蒂舍夫、柯秀尔、加米涅夫、麦德维基、加尔卡维、鲍曼、科达茨基、托姆斯

① 这是"阿克莫林斯克卖国贼妻子集中营"的缩写词，和"阿尔及利亚"同音。——译者

② 鲍·嘉科夫：《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莫斯科1966年版第180—181页。

③ 瓦·格罗斯曼：《时变境迁》（中篇小说），西德《播种》出版社1970年版第110页。此小说未在苏联发表。

基、索斯诺夫斯基、波波夫和其他许多人的未成年子女也被抓了起来。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不仅枪决了"人民敌人"的妻子和成年子女，而且也枪决了未成年的青少年。例如，拉乌伕·拉科巴、坚吉兹·拉科巴、尼古拉·拉科巴和尼古拉·伊纳尔-伊纳于1937年在阿布哈兹被捕。他们的年龄都在十四至十六岁之间。起诉书称："侦查结果证明，拉乌伕·涅斯托尔维奇·拉科巴的父亲涅斯托尔·拉科巴是人民敌人、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反革命、间谍恐怖右派组织的领导人。他父亲被揭发之后，他在自己周围纠合了一批具有反苏情绪的被镇压的人民敌人的子弟，和他们一起在学校里进行破坏活动，不断地进行旨在破坏党和政府各项措施的威信的反革命宣传。"同一文件中还说："本案全体被告继承了他们的父母——人民敌人的反革命观点，他们是现存制度的凶狠敌人，他们于1937年结成反革命小组并且开始进行反革命破坏工作……鉴于被告在犯罪时尚未成年，本案送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处理。"1940年贝利亚下达了命令，把这四个少年枪决了。

662 对"人民敌人"的妻子及儿女的这种惩罚性和"预防性"的措施，真是令人发指的违法乱纪行为，这是一目了然的。诚然，还在大规模镇压时期的前几年我国实施一条法令：卖国贼家庭全体成员迁居边缘地区。无论从这条法令的内容或字面来看，这里指的是逃亡国外那些人的家庭。因此对这些人我们的法律是力所不及的。（显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去打击卖国贼本人，而去打击在多数情况下完全无辜的亲属，这是很不公平的。）但是1936—1937年间，甚至在以后的年代，这残酷的法令往往也非常不公正地推广到许多所谓的"人民敌人"，他们都是在国内生活和工作，并没有想逃到国外。

许多"人民敌人"的孩子以后在四十年代被逮捕并被流放。例如，布勃诺夫和洛米纳泽的孩子于1944年被逮捕。1949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批地抓了"人民敌人"的子女。这次逮捕并流放的

年轻大学生是以下这些人的子女：作家阿尔焦姆·维肖雷，军团司令员巴季列维奇，原"工人反对派"领导人施略普尼科夫等人的子女，彼得·斯莫罗金的女儿，尼·伊·布哈林的女儿，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子女。

二、关于非法及恣意扩大政治罪行概念问题

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几乎任何个人迷信和几乎任何专制的个人独裁政体的建立，往往跟着来的就是不仅大规模地惩治和镇压新独裁者周围的人们，而且大规模地惩治和镇压那些离他很远的人们。这多半是因为新政权通常把许多新的精神加进政治罪行这一概念里面去。数不清的许多新禁令和"禁区"源源而来，人们还没有习惯于这些新规定，因此不仅要用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改造的形式使他们顺从，而且还要借助于刽子手的暴力办法。 663

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建立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在我们法庭的实践中早在二十年代就有过反苏政治罪行的极为广意的解释。但是到三十年代这一概念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到没有任何界限的程度。

卡·马克思早已写过："根据宗教和政治信仰，任何人不能被关进监狱，或者剥夺他的财产或法律的权利。"①

但是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却违背了法制精神并且抛弃了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最起码的原则。不是人们的行动，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和信仰，对他们追究了刑事和政治责任，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了他们。开始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反民主的论点是为了给当时进行的镇压找出法律根据。但是后来它就成了新的大规模镇压的法律根据了。确实如此，在整个个人迷信时期，不仅那些积极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但作者未注明卷数。——译者

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从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积极活动的人被认为是国家罪犯和政治罪犯，而且许多只是持不同政见，不同意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同时对苏维埃政权完全忠诚的人也被定为国家罪犯和政治罪犯。这当然是很大的错误和违法行为。随着我国集中化、官僚化及个人迷信的发展，被定为“人民敌人”，不可避免地遭受到镇压和追究的不仅有持非社会主义观点的人，而且也包括这样的苏联公民和党员：他们只是反对苏维埃国家的个别措施，联共(布)中央的个别决议，只是不同意当年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些方面。但是因为个人迷信年代无论国家还是党的组织常常会通过某些错误的决议，所以这类假的“人民敌人”的数量必然是很大的。

664

况且，从1934—1935年起任何一个人，尽管他极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但只要他反对斯大林个人，对他的活动不大赞同，或者有可以解释为直接或间接的侮辱和贬低斯大林个人和他的功绩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国家罪犯和政治罪犯。到后来这种维护“领袖尊严”的做法变成完全畸形的了。只要讲一个和斯大林有关的笑话中的情节或者不小心损坏了斯大林像①，或者对斯大林提出来的某些论点的正确性表示了怀疑，就足以把这个人置于“人民敌人”的地位。这样，正如德国法律科学院宣布的那样，“对元首的爱戴”是法律概念，因而“对元首的不爱戴”就被宣布是一种罪行。我们的国家在斯大林迷信年代里，对斯大林的爱戴和忠诚实际上已被宣布为全体苏联公民都必须遵循的法律。另一方面，对他的不爱戴或者对他的活动稍有指责，都被宣布为罪行。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罪行”甚至被看成是比反对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更为严重的罪行。

早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在我党的政治实践和一些领导人讲话中就提出一个错误的命题：即认为某一党员和非党员的

① 1922年当列宁知道某一妇女因为对他的像片表示不够尊重因而在诺沃格勒德被捕时，他马上打电报要求立刻释放被捕的这位妇女。

行为中主观和客观是一致的。这一有害的命题在个人迷信年代是特别顽固地被推行起来。不仅在"领袖们"的口头讲话中，就是在一些文件里：这个或那个人主观上忠实于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这方面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党的领导认为他在理论上、实践中——不管是真是假犯了错误，因而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某种损失，因而所谓帮助了我国敌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不管自己主观上的动机如何，应当被看成是苏联人民的敌人。一些"调和派"，也就是指那些自己没有犯任何理论或实践错误，而只是号召用温和与和解的态度团结那些斯大林正在批判和镇压的党员，他们也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有时也被关押起来。 665

三十年代末大规模的镇压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几乎所有的斯大林签署的进行政治性镇压的"法令"和秘令在制订以后，立即产生法律上的回溯效力。

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开始惩罚那些"侮辱"斯大林的苏联人之后，收到了关于二十年代激烈辩论时期，即许多年以前说过的贬低斯大林的那些评价，于是就开始惩罚这些二十年代说了这些话的人。

大家知道，二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也伴随着大量的政治性镇压。其它政党的几千名成员被关在政治隔离室或被流放，不少犯人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虽然这些人绝大多数到1934年时已刑满释放，虽然这些几乎所有的原犯人这时表现"良好"，但是在 1934 年 12 月 1 日后，特别是在 1936—1937 年间，二十年代的多数政治犯再一次被逮捕了。对他们通常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指控，但是他们再次被判刑五年、六年、甚至十年（而那些于1940—1941 年被释放的人又于 1947—1948 年因同样的"罪行"被逮捕，直至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才被释放或者死后被平反——为后两次"刑期"平反）。 666

三、关于斯大林的一些助手

斯大林围绕着这些假造出来的人民敌人问题，在党内及国内煽起了群众的狂热感情，他企图利用所形成的局面以消灭一切不称心的人们。但是在斯大林周围的许多人为同样目的也企图利用这个局面。这些野心家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或者在他默许下急于和自己的一切对手算老账，用以巩固他们在党内及国内的地位。

斯大林在吸收这些人参加自己的罪恶活动时，就必需让他们握有"无限的权力"，使他们也能够和自己的敌人及一切不称他们心的人算帐。应该指出，这些恶棍广泛地握有对苏联人们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例如，在格鲁吉亚几千个不合贝利亚及其匪帮心意的人被消灭了。阿塞拜疆在恐怖年代里只因诬告"谋害"巴吉罗夫而被枪决的人达十万多人之多。①

显而易见，个人独裁政体不可能只是指政权的上层机构的权限，成千上万的人在个人迷信年代取得了过大的权力以及受到全权的委托。新的人民委员，大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州委和区委书667 记，各级国家安全局的干部，特务处的处长等都得到支配苏联公民命运和生命的权力。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在自己的州、区、机关、企业，在自己活动的圈子里成为握有几乎无限权力的主宰。许多在个人迷信年代得到极大权力的人滥用了这种权力，利用它对付那些他们不称心的干部。在许多共和国、州和区，在许多国家管理机构里逐渐形成了由毫无原则的个人野心家组成的真正集团，他们在夺取了权力之后，企图把自己所有的敌人和对手统统排斥掉。

也不能不指出，我们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里，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领导人，他们模仿斯大林的样子为自己

① 1937—1938 年，大规模镇压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大概比其他共和国更加紧张。而非常奇怪的是，现在却正是这些共和国最顽强地力图恢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建立“小范围的个人迷信”，把对他们的任何批评都看成是犯了国法。这一切就为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创造了坚固的基础。

和这一问题有关，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斯大林最亲信的助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一些其他的人在三十年代镇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知道，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把有关二十大以前二十年中的罪行的真相全部都揭发出来。大会的材料给人的印象是：三十年代镇压活动的全部责任应该只由斯大林、叶若夫和贝利亚来负。不仅如此，大会之后立即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政治局其他成员不仅没有参与大规模的违法行为，而且甚至力图尽可能地抗拒斯大林的作法。这样的说法也反应在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恶果》的决议中。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参与下（他们于1956年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制定的这一决议里说：即使在斯大林时代中央也保存了列宁的基本核心。这个“列宁的核心”似乎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和抗拒斯大林，但是它没有能够把斯大林排除于党的领导之外。

663

今天去重复这样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它们无可辩驳地证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不仅没有阻止和抗拒斯大林从事违法乱纪的活动，而且积极地帮助了他，并且帮助时还表现得非常积极、并且百般投其所好。亚·尼·谢列平在大会上说：“我们所掌握的许多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反党集团的成员在大规模镇压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军事的和共青团的干部的非法行为问题上是有罪的，他们对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么多干部应承担直接责任。”正如亚·尼·谢列平向大会代表所报告的那样，正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斯大林在一起共同批准了把大批党的著名活动家交付法庭审判并处以极刑，含冤而死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物：波斯蒂舍夫、埃赫、柯秀尔、卢祖塔克、邱巴尔、克雷连科、温什里希特、布勃诺夫等。当雅基尔写信给斯

大林，说自己完全无罪时，斯大林在这封信上写上了下面的话："坏蛋和妓女"。伏罗希洛夫补充了："完全正确的评价。"莫洛托夫在下面签了字，而卡冈诺维奇补写上了："对叛徒、恶棍和……（接着写上了一个不堪入耳的下流的话）只能有一种惩罚——死刑。"①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什基利亚托夫、麦赫利斯、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斯大林的其他一些亲信们毫无条件地执行了斯大林的任何的、甚至最卑鄙的指示，而且他们自己在打击最优秀的党的干部的可耻的活动中经常表现得"积极主动"。在斯大林专横的历史中莫洛托夫所起的作用尤其大、尤其见不得人。此人在他的早期活动中就已表现出善于搞阴谋、耍诡计、煽惑人心和官僚化的倾向。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过一个下格罗德省②党代表大会有关谴责莫洛托夫不知分寸，搞煽惑人心活动和阴谋伎俩的决议。③列宁在他写的一封信中指责莫洛托夫说："就在他的鼻子底下繁殖着最可耻的官僚主义"。④党的老干部K.莫罗佐夫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弗·伊·列宁在世时，中央委员会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党的机关。甚至在列宁称赞是伟大组织干才的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工作时，手工业方式也占主导地位。斯塔索娃从早期秘密时期继承了这种工作方法，革命后就把这种作风带到新的复杂的环境中来了。总之，在党的机关里工作效率是不高的，按党章规定，在集中制（当然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却完全没有集中起来，而党的纪律也有待巩固。根据列宁的建议，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之后，党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克列斯廷斯基。他当时任中央书记，直到 1921 年 3 月以前他是耐心地作这项工作，但是他也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保证对

---

①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2 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 399—408 页，亚·谢列平的发言。

② 是高尔基州革命前的称呼。——译者

③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2 卷第 351—352 页。

④ 《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4 卷第 392 页。

地方进行正常领导的党的机构。党的集中制很难实现……所以列宁选中了莫洛托夫。十大的时候第一次把他选上中央委员，中央又决定由他代替克列斯廷斯基任组织书记。莫洛托夫在建立机构与此有关的党的集中制和巩固纪律方面都做了很大的努力。然而，他是一个死心踏地的官僚主义者和脱离广大党员群众的人，他就在自己工作中日益把这些特点顽固地灌输给自己这个婴儿并且用这种官吏式的顺从精神培养和教育他的部下以及在地方上工作的从属于他的人。列宁眼看着莫洛托夫管理着中央机关一切工作如何日益巩固起来，但同时也看见了一切都在日益官僚主义化，要改变一些什么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九大以后，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他以加倍的努力进一步推行官僚主义的和使党的机构脱离广大党员群众的路线。"①

三十年代初期莫洛托夫被提拔到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这样高的岗位上来，在这个岗位上他马上就表现出是一个冷酷无情和愚蠢的官僚主义者，在斯大林犯下各种罪行方面，他不愧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老布尔什维克格·伊·洛莫夫的命运，它是很说明问题的。正如亚·尼·谢列平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当斯大林收到国家计委一个干部指控洛莫夫的信后，他在这份诬告材料上写了下面的批语："莫洛托夫同志，怎么办？"莫洛托夫写道："同意马上逮捕这个混蛋洛莫夫。维·莫洛托夫。"几天后洛莫夫被捕了，被指控为参加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并且被枪决了。根据谢列平的证实，提议逮捕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伊·德·卡巴科夫，远东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克鲁托夫，轻工业部人民委员康·瓦·乌汉诺夫的正是莫洛托夫。根据米·安·苏斯洛夫的证实，莫洛托夫不仅和斯大林一起批准审判并处决许多国家和党的活动家和他们的妻子，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尽其所能使自己能成为比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例如，在一份 670

① 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

批准长期关押大批被镇压的干部的妻子的文件上，莫洛托夫在一人的姓名旁边写上了“BMH”，即处以极刑。根据Ш.奥尔金的证实，莫洛托夫早在奥尔忠尼启泽自杀之前就已开始对他进行真正的迫害。为了阻挠他的工作，莫洛托夫拒绝批准这位重工业人民委员提出的对国家极为重要的许多申请事项。奥尔忠尼启泽因为害怕个人纠纷会影响苏联国民经济的情况曾向斯大林提出申请辞职。

正是莫洛托夫为了迎合斯大林，于1937年提出一个理论：如果一个人积极赞同党的一切决议，积极维护国家各机构的一个决议，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任何敌对表现，那么一切努力是为了受到提拔，以便以后有朝一日更准确地去打击苏维埃政权——他们这样的人也是“人民敌人”。正是莫洛托夫在中央二、三月全会上宣称，每一个党组织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受到暗害行为的感染。

671

卡冈诺维奇积极地参加了消灭党的优秀干部的勾当。大家知道，早在二十年代初期，被提拔到党中央负责岗位上来的卡冈诺维奇对同志的态度就很粗暴和很蛮横，到三十年代初期，他已成为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为了自己能够飞黄腾达，他什么罪行都干得出来。

K.莫罗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具有斯大林精神的、(比莫洛托夫）有着更大能力的组织工作干部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做工作比莫洛托夫更细致，因为做工作时他更会谄媚和奉承。他善于讨好工人、普通党员，人们叫他‘莫斯科布尔什维克舵手’，他经常连斯大林本人都能随便哄骗。卡冈诺维奇还在列宁在世时就开始在中央机关里工作。但那时他还没有象斯大林领导中央之后所取得的地位。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被选成中央书记的卡冈诺维奇的一切表现说明了他灵魂中最为丑恶的一面。正是他能拿得出来斯大林为实现其罪恶目的所需要的那种商品，而斯大林用极高的价格收买下了他能拿出的一切。”

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提到过在1932年卡冈诺维奇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北高加索进行粮食收购运动。回到莫斯科后，他把这些强制收购的经验推广到莫斯科州。例如，正如老党员И.П.阿列克萨欣所讲的那样，卡冈诺维奇以莫斯科党委书记的身份于1933年秋天来到叶伏列莫夫斯基区(当时属于莫斯科州)。卡冈诺维奇首先剥夺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区委书记乌特金同志的党证，并警告他，如果粮食收购计划三天内完不成的话，乌特金将被开除出党，免除现职而且还要去坐牢。乌特金提出了合情合理的意见，说粮食收购计划不现实，因为收获量是在5月粮食刚种上时估的产量，可是粮食和土豆实际收获量少了一半。为此，卡冈诺维奇破口大骂起来，满口下流话，指责乌特金是右倾机会主义。 672

莫斯科市委的特派员一直到深秋都蹲在农村里进行工作，他们甚至连口粮、土豆和种子粮都从农民和集体农庄中抢走了。尽管如此，区的粮食收购计划还是只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八。这以后，乌特金被开除了党籍。在"收购运动"以后，该区几乎一半人口都把自己房子的门窗钉上板子逃出该区迁往它乡去了。区里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破坏，叶伏列莫夫斯基区的种子粮和土豆连续三年都得从外地运进来。在当时用这种"方法"进行党的领导对卡冈诺维奇来说是很典型的。所以毫不奇怪，在大规模镇压年代里，他成了斯大林的右臂。

卡冈诺维奇的良心应对车利亚宾斯克、伊万诺沃、雅罗斯拉夫斯克等其他党组织的干部队伍受到摧毁负有责任。有关卡冈诺维奇如何轻率而残酷地对待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命运问题，可以从他伊万诺沃之行的后果去判断。他刚刚到那里就马上往莫斯科给斯大林打电报，电报上说："初步翻阅材料表明，必须立即逮捕州委书记叶潘奇科夫。必须立即逮捕宣传部部长米哈依洛夫。"不久，第二个电报随着发往莫斯科："了解情况表明，右倾托洛茨基暗害活动在这里已达到广泛的规模，包括工业、农业、供给系统、卫生、商业、教育和政治工作。州的各种组织的机关和州党委都严重不

纯。"①卡冈诺维奇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以后，就开始对伊凡诺沃州党委进行了真正的毁灭性的打击。1937年8月初，卡冈诺维奇在那人已所剩无几的州委全会上讲话时指责整个州党组织怂恿了“人民敌人”。《伊万诺沃党组织的历史片断》一书证实，1937年8月州委全会“是在极端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例如，伊万诺沃市委书记A.A.瓦西里也夫刚刚一开口说他不相信被逮捕的联共（布）党的干部会有‘敌对活动’，卡冈诺维奇就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就在这次全会上，A.A.瓦西里也夫被开除了党籍，后来也以‘人民敌人’的罪名被逮捕了。1905年入党的老党员，伊万诺沃州工会主席И.Н.谢马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②尼·米·什维尔尼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自从卡冈诺维奇任交通人民委员后，铁路运输系统开始大批逮捕干部。他毫无根据地亲自对无辜的人们进行政治性的指控，并且一定要逮捕他们。卡冈诺维奇要党政骨干相信，在一切领域都有隐藏的人民敌人在进行活动，并且要求扩大和深入揭露这些敌人的工作。

卡冈诺维奇于1937年3月10日在一次铁路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不能指出哪一条干线没有托洛茨基、日本的暗害活动，不仅如此，没有哪一个铁路运输领域没有发现这种暗害者在活动……"

在卡冈诺维奇主持工作的年代，是拿着名单去抓铁路运输的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卡冈诺维奇把他的副职，几乎所有铁路局局长，政治部主任和铁路其他领导干部都逮捕了。

根据尼·米·什维尔尼克证实，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1961年掌握了三十二封卡冈诺维奇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亲笔信，要求逮捕八十三位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干部。

卡冈诺维奇于1937年8月10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信很能说明他是如何用罪恶的轻率态度、毫无事实根据就给人们加以罪

①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卷第153页。

② 《伊万诺沃党组织的历史片断》伊万诺沃1967年版第296页。

名的。在这封信中他要求逮捕十名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干部。仅仅因为卡冈诺维奇个人对这些人的行为有怀疑，就毫无根据地把这些人定为间谍和暗害分子。他们的命运和其他许多人的命运一样，都很悲惨。

674

亚·尼·谢列平在苏共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声明说："材料说明，卡冈诺维奇在审判工作会议结束之前对各个案件亲自审查判决方案，并随心所欲地进行修改，例如，改成似乎准备对他本人进行恐怖活动。"①

马林科夫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镇压活动。还在1937年他和叶若夫一起在白俄罗斯真正洗劫了共和国的党组织。在他积极参与下，白俄罗斯共和国党组织一半以上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而且被镇压了。

正如尼·米·什维尔尼克向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的那样，在马林科夫领导下白俄罗斯党和苏维埃干部受到严重摧残之后，又在亚美尼亚对党和苏维埃机构进行了同样的洗劫。这时马林科夫同他的密友贝利亚一起所依据的是他们自己罗织的亚美尼亚有分布很广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罪名。马林科夫亲自参加了对犯人的审讯并使用了不能允许的审讯方法。苏共党员И.皮亚特尼茨基在致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信中证实，列沃尔托夫监狱原典狱长说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轮流到监狱来拷打在押的共产党员，而且这些非刑拷打并没有办传讯的手续。

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摧毁和消灭我们最优秀的军事干部方面是最积极的一员。伏罗希洛夫不仅批准逮捕杰出的军事将领。这些将领中的一些人曾应召去莫斯科向人民委员汇报工作时，就在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里被逮捕的。根据M.伊绍夫的证实，苏联驻蒙古大使馆武官(他原是某军团政治委员)A.П.普罗科菲也夫就是这样被逮捕的。

675

---

①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62年版，亚·谢列平和尼·什维尔尼克的发言。

三十年代中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外，还有日丹诺夫、加里宁和米高扬。

大家知道，在斯大林亲信之中，日丹诺夫以理论家自居。在个人迷信时代的特点是理论研究水平极低。在这种情况下，日丹诺夫的一些理论著作和讲话在叙述方面具有某些独到之处，而且文笔清晰。但是日丹诺夫按其工作方法无疑是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在三十年代的大镇压中的作用远不是最后一名。

米·伊·加里宁的表现是个很复杂的、暂时还不完全清楚的问题。当时他任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后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席卷全国的可怕的镇压洪流，对加里宁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936—1941年间每天有几百人经过他的接待室，每天有几千封信寄给他。到处都是为了一件事——告发和抗议当时发生的违法和专横行为。现在保存下来一些证明材料说明，加里宁在某些情况下曾设法保护了一些人，使之免遭不幸。正是加里宁亲自进行干涉，外交信使约翰·马赫马斯特里才得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和捷奥多尔·涅杰一起当白俄袭击苏联外交邮件时保护了这些邮件。① 加里宁也设法挽救他的朋友——阿库洛夫、绍特曼、叶努启泽和其他一些人。但是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加里宁，命令他不要干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事情。斯大林利用了加里宁的优柔寡断，没有毅力以及其它弱点，牢牢地控制了他。

斯大林借口保护加里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在家里软禁了他，甚至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就住在加里宁家里。于是加里宁退却了，顺从了，他完全服从了斯大林，他就这样用他的很高的威望遮蔽和掩盖了斯大林的罪行。

676

象叶·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党这样的老活动家也在许多方面帮助了斯大林。E.H.戈罗杰茨基于1962年在全苏历史学家的讨论会上部分地阐明了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相互关系的历

① 《涅瓦》杂志1963年第4期第187页。

史。大家知道，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二十年代写的党史的著作中并没有突出斯大林的作用。而且在他写的《联共(布)党史》第四卷中还提了斯大林在1917年3月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所以毫不奇怪，斯大林在他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猛烈地抨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说什么在他写的党史的著作中也有错误。斯大林虽然没有说他所指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什么错误，但是此信发表后，我们的刊物开始真正围攻雅罗斯拉夫斯基，指责他犯了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和其它一系列严重错误。雅罗斯拉夫斯基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但是没有得到回信。在诽谤围攻的情况下，雅罗斯拉夫斯基很快就妥协了，他发表了一封信，承认了一切归咎于他的错误。不久他写了一本斯大林传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初稿，正如他致中央委员会信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些著作中他完全反映出斯大林所起的作用。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仅作为党的历史学家，而且也作为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完全服从了斯大林。党员就党内所发生的违法乱纪行为写给监委的许多申诉，通常是得不到答复的。以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本来应该维护法制和党员的权利，他这样做，就是从"后方"掩盖了叶若夫和贝利亚匪帮在全国范围的为非作歹。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有关尼·谢·赫鲁晓夫在1936—1939年各种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1936—1937年间，作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和1938—1939年间作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的尼·谢·赫鲁晓夫在镇压莫斯科和乌克兰党及苏维埃干部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是最小的。他在"摧毁人民敌人"方面的功劳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已提到过。因此在党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时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精神，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来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正是赫鲁晓夫发起了给斯大林专横政治的无辜牺牲者进行平反昭雪和从集中营及监狱中释放一切幸存的人们。 677

可以设想，赫鲁晓夫在三十年代作为一个较年轻的，易受诱惑的（和没有什么远见的）政治家，受过斯大林很大的影响，他相信斯大林，同时也惧怕他。我们也知道，赫鲁晓夫自己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以后也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他也推行了专横政治和唯意志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赫鲁晓夫再次违犯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在我们党内恢复了个人迷信的因素。诚然，现在是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虽然犯了这一切严重的错误，但他在揭发斯大林罪行，从集中营和监狱里释放几十万完全无辜的苏联公民以及给几百万在斯大林专横年代牺牲的人们，包括我国许多最优秀的人才恢复名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一切无可辩驳的是尼·谢·赫鲁晓夫个人的功绩，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正是这一切使我们今天在评价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时不得不对尼·谢·赫鲁晓夫及阿·伊·米高扬持完全不同于评价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一些接近和帮助斯大林的人的态度。

四、广大群众参与镇压活动和对告密行为的鼓励

三十年代镇压活动的最可怕的特点之一，就是相信党和斯大林的群众用各种办法被卷进揭发和粉碎“人民敌人”的运动里去。在这些年里开展的反对“人民敌人”的政治活动使几万、几十万普通的真诚的人们（多数是有着最善良动机）迷失了方向。几百万人中了怀疑一切的毒。这些人相信斯大林提出的说法：在苏维埃国家里存在着分布很广的地下组织，他们也染上了当时在全国流行的间谍狂症、反对“人民敌人”和“暗害者”的运动带有群众运动的性质，如同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样。

中央报刊不遗余力地煽动人们的全面的变态心理。《真理报》和《消息报》几乎天天在号召劳动人民去寻找和揭发人民敌人和暗

害者。《敌人和他们的庇护人》，《人事安排方面的暗害活动》，《敌人在电站的破坏活动》，《谁在普利亚任斯克区搞破坏》，《彻底挖掘商业人民委员部里面的敌人巢穴》，《这里有敌人的活动》，《人民敌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敌对行动》——连篇累牍的这类文章，是为了"发动"群众起来和"敌人"斗争。

报纸号召在一切能够寻找"人民敌人"的地方去寻找他们。例如，《真理报》在社论中写道："我们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任何一个事故。我们知道，联动机不会自己停下来，机床不会自己被损坏，锅炉不会自己爆炸。在这种事件后面，每次都暗藏了某人的黑手。这是不是敌人的黑手——这是我们每人在这类事情发生后所应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①

西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罗·伊·埃赫于1937年1月25日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要记住……我们掌握了如此丰富的技术装备和如此忠诚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在任何方面不能发生什么毛病。在开始不断出毛病和事故的那些组织或企业里，你首先要观察，并且去寻找敌人。"② 679

在这种号召的影响下，许多人不仅患了间谍狂症，而且也患了暗害狂症。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干部的甚至最渺小的过错，工程师的计算错误，编辑或校对人员疏忽印错的字和出版了坏书——都被视为有意破坏，成为遭受逮捕的借口。在这些日子里，到处都寻找密码和法西斯标志。在书籍和笔记本的图画中，少先队徽章上都会找到这些东西。有些人甚至把许多客观困难，如教师的低薪金，费用的缺乏，大批学生离校，设备的迅速消耗等等都别有用心地企图解释为有意破坏。过分的怀疑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正如尼·尼·沃罗诺夫炮兵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从某一军区来了一个报告，说步枪上的刺刀容易弯曲，似乎这显然是'破坏性'的事故，这种刺刀不适用于作战。于是从莫斯科去了专

① 《真理报》1937年2月2日。

② 《苏维埃西伯利亚报》1937年1月。

门的委员会，它在现场弄清了情况，结果是，刺刀不适用之说法是某一个制造武器的技术员叫喊出来的。有一次他把刺刀尖夹在虎头床上，然后把身体压在枪托部分，他想把刺刀弄弯。他达到了目的，刺刀弯了，于是就大喊大叫起来。委员会在详细地进行了检查之后，得出结论说：刺刀坚度的安全系数很大，完全适用于作战。"①

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罪名都会加到人们的头上。例如，在一份匿名的密告吉尔吉斯共和国一名军事干部安·雅·韦杰宁的材料中说，仿佛他有意在军队里搞一些花斑马，以便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在敌人面前暴露红军骑兵队伍。②

680 一名共产党员，消防队队长，在政治学习时他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说1917年莫斯科红色近卫军指挥员是尼·穆拉洛夫（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马上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

根据作家A.彼西缅内证实，战后他在乌拉尔认识了一个姓波杜恩的矿山工程师。他于1937年被逮捕，大约是因为他的姓象外国人的姓，尽管实际上他是俄国有名的语言学家波杜恩·德·库尔特耐的侄子。让这位乌拉尔的工程师坐在一块铸铁板上达一年半之久（他受的是冻刑），直到他承认了自己是阿比西尼亚皇帝的间谍为止。

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可以遇见一些因为"散发帕斯杰尔纳克和叶赛宁的诗"，"和伊里亚·爱伦堡有联系"而被判刑的人（尽管，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无论是帕斯杰尔纳克还是爱伦堡并没有被镇压）。还有因"准备旨在恢复奥匈帝国的阴谋"，甚至因"怀疑企图背叛祖国"而被判刑的。在乌发市一个监狱里Р.Г.扎哈罗娃遇见了一名女教师，她被指控为和芬兰有联系，并且在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之后将宣布自己为马里③女王。根据Я·德罗宾斯基证实，在

① 尼·尼·沃罗诺夫：《在军事岗位上》莫斯科1963年版第118—119页。

② 安·雅·韦杰宁：《岁月和人》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版第58页。

③ 指苏联马里自治共和国。——译者

明斯克市一名老裁缝共产党员索尔内什科夫被指控的罪名是：为了引起人民的不满，他设计了一种裤袋很窄的工作服。根据M.伊绍夫的证实，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检查长库兹涅佐夫被指控为：他于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的是为了“从内部爆炸党”。在诺沃西比尔斯克有一批1913—1914年出生的年轻建筑工人被指责为：支持过高尔察克白匪军。戈梅里市某产院院长被指控为：他似乎指示产科主任，让他把所有新生婴儿都传染上梅毒病。著名画家B·И·舒哈也夫和他的妻子被指控为：他们似乎参加了鲍罗齐巴派。① 这位天真幼稚又很不能适应我们的艰苦生活条件的画家 681 总是企图从同牢的犯人那里搞清楚鲍罗齐巴派都是些什么人。在莫斯科根据诬告材料逮捕了一大批集邮者，因为他们和外国集邮爱好者交换邮票。根据列·马·波尔特诺夫的证实，集邮者被指控的罪名是：以交换邮票为掩护，把秘密情报送到国外。根据作家B·T·沙拉莫夫证实，在莫斯科还逮捕了“世界语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仅“世界语”这--人为的创造出来的语言本身显然就使公安机关胆战心惊。根据荒谬的诬告材料，几十名运动员被逮捕，特别是那些参加过国际比赛的运动员。对那些无耻的体育工作者来说，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密告是摆脱自己的对手的最容易的办法。(这样被镇压的有：国际记录创造者游泳运动员谢苗·波依钦科，“斯巴达克”足球队队员斯塔罗斯廷兄弟，运动健将A.波利亚科夫等以及其他著名运动员。)

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家电影院放映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里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出现了于两个月前被逮捕的莫斯科

---

① 鲍罗齐巴派是1918年5月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一个独立政党。该党中央机关报叫《鲍罗齐巴报》(《斗争报》)，所以该党叫鲍罗齐巴派。1920年3月，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农民群众中影响的增长，鲍罗齐巴派只得解散了他们的党而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决定接受鲍罗齐巴派入党，但所有被接受入党的人都经过了登记。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96页。——译者

某领导干部。这就足以使《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敌对行为》的文章，这篇文章号召人们注视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中，海参崴电影界中及莫斯科新闻电影委员会里是否有隐藏的敌人。甚至连《中音乐器和抒情古提琴参考书索引》这样看来完全是无害的书，《真理报》也宣布它为搞破坏的法西斯小册子，仅仅是因为在介绍时引用了一些现代德国音乐家和音乐界人士的著作。

《真理报》和《消息报》在围绕所谓"人民敌人"问题煽起人们的狂热心理的同时，还仔细观察其他中央和州的报纸的立场，而且还督促那些表现不积极的报纸。例如，《真理报》写道："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基辅州的全套《无产阶级真理报》时，就会一目了然地看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报纸没有揭露出一个敌人，而通常只揭露已经被揭发出来的敌人。"

682

被卷进寻找"人民敌人"狂热之中的不仅有党员，而且有共青团员，甚至学生。例如，1937年夏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讲了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选问题的文章。报纸写道："一千五百二十五个基层组织已进行了选举……但是能够尖锐而有战斗力地讨论共青团工作中的问题，能在讨论候选人过程中揭露钻进共青团内的法西斯暗探余孽的会议，则简直是屈指可数的。"① 毫不奇怪，在这样的号召之后，共青团员和共青团领导人中间被逮捕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起来。

反对"人民敌人"的群众性运动把不少区一级和州一级的干部搞得晕头转向。当时，全国各地派出了几千个各种特派员，他们狂热地在寻找敌人和暗害者，检查地方来的告警的消息或报刊中发表的材料。一些特派员显然是出于最良好的愿望进行活动，另一些则是因为愚蠢或有个人野心而进行活动，第三种人，他们简直是被吓得失去了理智。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发出指示和批准逮捕完全无辜的人，成批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

---

① 《真理报》1937年7月10日。

某一个姓捷姆佐夫的特派员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很典型的。捷姆佐夫除了手上有一篇没有进行过核对的，说某一农业区有“敌人”的活动的报刊上登的文章以外，并没有其它任何材料。他就这样到这个区去了。他未作任何调查召开了该区的党员会议，并且宣布说，区里的领导是敌人。然后，他命令逮捕区委书记，这一命令马上执行了。捷姆佐夫没就此罢休，他开列了一个要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并且建议区委成员实现他的意见。到当天晚上已经有十七名共产党员被开除了党籍。作完了这些事之后，捷姆佐夫把区委成员身上的钥匙和区委印章拿走了，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区内务局，他在区委的大楼上加了封条之后走了。这样一来，他在一天之内就消灭了一个区委会。①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好象是一个拙劣的笑话，但那些更高级的特派员，如卡冈诺维奇在库班和伊万诺沃州，马林科夫在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不正是这样行动的吗?!

683

基辅的各区委会里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任务是搜集毁坏党员和候补党员名誉的材料。这些委员会收集了几千件诬陷材料。基辅的彼得罗夫斯克区收到科学院党组织寄来的诬陷一百一十一人的材料，尽管科学院编制中只有一百三十名共产党员。②

大家知道，中世纪为“保护”基督教信仰而建立的“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竭力鼓励密告，还有一种情况，即裁判所迫害任何一个拒绝向裁判者密告关于“异教徒”情况的人。根据当时的规定，没收异教徒财产的时候，其四分之一作为奖励分配给密告者。办案的宗教裁判官得到三分之一，其余归教会或者某一和教会有关的组织。③ 当时裁判所的审理程序建立在变怀疑为罪行的基点上，也就

---

①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39 年版第 569 页。

② 见上书(缺页数。——译者)

③ 三十年代末从“人民敌人”没收的大部分财产估价很低，主要是卖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值得提出的是，在靠近路比扬卡的街道上，镇压活动比莫斯科其它区更加紧张。被腾出来的住所基本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员占领。

是说，不是当权者去证明被追究人是否有罪，而是相反，被追究的人自己应证明他无罪。根据裁判所的规定，不能告诉被指控的人谁是密告，这样一来，就为用向裁判所密告的方法进行私人报复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

684

斯大林的惩罚机构在1936—1939年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即依据“神圣宗教裁判所”精神办事的。毫不奇怪，当诬告了诚实的人不仅不受到惩罚（1938年初进行的几次对诬告人示范性的审理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而不是基本政策），而且相反，在多数情况下，诬告人反而得到鼓励，诬告行为被看作是警惕性高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爬上高级职位的人，而且几乎所有不诚实的人，形形色色的坏蛋和野心家千方百计利用诬告以达到消灭自己敌人和不合自己心意的人的目的。遗憾的是，这些坏蛋和野心家在我国公民当中还大有人在。想得到有利的工作岗位，得到邻居的寓所或房间，因为个人恩怨而进行报复等等——这一切都是形形色色的坏蛋写诬告材料的动机。一些有病态心理的人也爬了出来，把他们写的几十封信，几百份密告材料到处寄发。在恐怖和没有法制的环境中人们身上出现了各种最卑鄙的本能。法律和法令实际上已被废除了，形形色色的坏蛋和野心家都去急急忙忙地利用这一情况。

大家知道，列宁过去特别警告过全俄非常委员会机构，提醒他们应如何对待假的密告。他建议对提供假密告的人规定最严厉的惩罚，直至死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多数最卑鄙的诬陷者和写匿名信的人都是逍遥法外的。所以当时诬告材料才潮水般地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里来，甚至在内务部的接待室里还设有很大的所谓“申诉”箱。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首先逮捕这个或那个被诬告的人，然后才去“审查”对他提出来的指控。

应该公正地指出，在1937—1938年间，就已经有不少人起来抗议这种诬陷潮流和鼓励诬陷者的行为。反对诬陷、反对丧失天良的行为、反对进行假揭发的人，反对看风使舵保自己命的人的最鲜

明的例子是米哈依尔·柯尔佐夫的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 685 坚决反对那些到处写诬告信的匿名密告者、坚决反对那些用“揭发”诚实的人们的手段企图捞取政治资本的野心家。①

但是米哈依尔·柯尔佐夫一类的文章当然不可能阻止住席卷全国的诬告，陷害和镇压的潮流。反对恐怖运动的个别的抗议行动并没有表现为任何具体行动，仅仅是提出书面和口头申诉，这些行动只能导致被镇压者数量的扩大，因为苏联人们的申诉和抗议恰好都是向那样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呼吁的，而这些人恰恰就是非法行为和恐怖政策的主要组织者。

① 例如，见《真理报》1937年1月17日。

687

第 十 一 章

使斯大林便于篡权的条件

一、问题的提出

1936—1938年的镇压完成了斯大林预谋已久并分期进行的篡党篡权计划。早在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就被称为独裁者，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三十年代末所确立的斯大林的完全不受约束的个人专政是史无前例的。斯大林在他的血腥统治最后十五年里，在我国生活各个领域里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和近千年来任何独裁者所没拥有过的。斯大林手中不仅掌握了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领导的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和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

但是至今为止，一些关于苏联历史及苏共党史的书籍把1936-1939年这一时期仍然看作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时期，这是多么离奇。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仅仅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苏联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但没有阻止它的发展。我688们在一本这类的"历史"著作中读到下面的话："个人迷信……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不能动摇党的列宁主义基础。党及其地方机构过着积极的自主的生活。党所依据的真正列宁的原理和在同个人迷信所产生的不健康倾向进行经常的冲突中，总是占了上风。"①

1965—1966年在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直接领导下(编委：Г·Н·格里科夫、А·И·蒂托夫、Г·А·德波林等)编写的一本供学校教科书用的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书《苏联共产党简史》尤其粗暴地篡改了苏共党史。该书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巩固》一章叙述了1936—1939年间的事件。这一章里提到：通过了更民主的新宪法，选举制的民主化，联共(布)党内民主的发展，但是一点也没有提到罪恶的大规模的镇压，我党和苏维埃国家最优秀的干部被消灭的事情。教科书的作者在本章中没有提到斯大林专横政策的任何一个牺牲者。只是很笼统地提到斯大林关于苏联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看法和他的滥用职权。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贬低新宪法的意义。但同时我们知道，过去的多数独裁者在他们组织了某种暴力政变之后，往往保留了那怕是形式上本国早已存在的许多民主制度。这一传统早就从科尔奈利乌斯·苏拉开始了，他成为罗马的独裁统治者之后，几乎没有改变地保留了原来的全部民主制度。苏拉时代保留了执政院，但是被选为执政官的是苏拉自己或者他所指定的人。元老院也保留了，但是参加元老院的三百名新成员，都是苏拉的拥护者。平民议会也保留了，但是它已失去了大部分的影响和权力。平民大会也继续召开，但只是为了听取苏拉的意志。

689

斯大林也同样追随了这一古老的传统。他没有废除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可是却完全不去执行它。他既没有撤销联共(布)中央，也没有撤销最高苏维埃及我党和国家形式上民主的其它最高机构。他只是强行改变了这些机构的人员组成，并完全不考虑这些机构的合法权力。

例如，斯大林完全无视联共(布)中央的一切权力和特权。大家知道，过去联共(布)中央是作为民主的集体机构而建立起来的。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定期召开。为了阻止党内

① 《战斗的劳动和功勋年代》。摘自《青年学习苏共党史》丛书，莫斯科1966年版第9页。(加重号是我们加的。——作者)

任何专横的发生，党章上还规定：任何中央委员不经过中央全会的同意不能被开除出中央。

但是在1937—1938年期间对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镇压，以及把他们处决时，斯大林并没有请求中央全会去批准，他独断独行或者在很小的圈子里就决定了有关中央委员的命运问题。所以，对多数中央委员来说，逮捕他们是完全出乎预料，甚至连最起码的法律形式都没有遵循。例如，联共(布)中央委员约·雅基尔突然被召回莫斯科，他在勃良斯克车站上，直接从高级车厢里被抓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半夜里进入了雅基尔的车厢。有一个人从正在酣睡的这位军团长的枕头底下拿走了他的手枪，然后把雅基尔叫醒，并且向他宣布说，他被捕了。“中央的决议呢？”雅基尔问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蛮横地回答说：“到莫斯科后，一切决议和批准书都会给您看。”①

690 联共(布)中央委员扬·卢祖塔克是在他别墅的办公室里被捕的，当时他正和画家B·H·梅什科夫、亚·米·格拉西莫夫和П·М·舒赫明在一起进行热情的谈话。②

根据原联共(布)中央视察员Д·Ю·佐林娜的证实，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农业部部长B·A·雅柯夫列夫③就是在联共(布)中央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的。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问道：“难道我们这里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我是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你们有什么权力不经中央批准就逮捕我？”但是他的抗议显然得不到回答。

象安·布勃诺夫这样著名的中央委员，他的命运也很有代表性。1937年10月布勃诺夫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是联共(布)中央委员)被克里姆林宫警卫挡住了，不让他们去参加中央的会议，说他

① 《雅基尔军团长》(回忆录文集)莫斯科1963年版。

② Г·А·图鲁坎：《扬·卢祖塔克》莫斯科1963年版。

③ 这里可能指的是联共(布)中央委员Я·А·雅柯夫列夫，第一个字母打错了，参看212页——雅·阿·雅柯夫列夫。——译者

们已得到上面的指示。不安又难过到极点的布勃诺夫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去了，在那里他一直待到天黑。晚上布勃诺夫从电台的最后消息中得知，他已被撤除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几天以后，布勃诺夫就被捕了，不久死在狱中。①

斯大林对待多数联共(布)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行为也是如此粗暴，无法无天，蛮横到了极点。

斯大林也完全无视联共(布)党章所规定的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在列宁时代十月革命后前六年里举行了六次全国性党代表大会，五次代表会议和七十九次党中央全会。列宁逝世以后的前七年里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五次代表会议和十三次中央全会。但是后来的二十年中，即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统治时期(1934—1953年)总共只举行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一次代表会议，而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间隔了十三年之久！在这二十年里只召开了二十三次中央全会，这些全会多数是在战前召开的。1941、1942、1943、1945、1946、1948、1950、1951这些年里连一次中央全会都没有召开过。②

换言之，斯大林把本应是民主机构的党中央逐渐改变为庞大的，机构臃肿的官僚化的党的办公衙门。 691

*　　*　　*

早在国内战争末期，白卫军运动的一些理论家们就谈论过，说十月革命和过去的多数革命一样，最终仍以建立一个新的君主制而告结束。有名的保皇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瓦·舒尔根在他写的《一九二〇年》一书中，叙述了他在1920年底同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使馆一个工作人员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舒尔根力图证明，由于客观条件的原故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恢复俄国原来的强大的军事实力，把俄罗斯强国的边界恢复到“自然的境界”，而且将为“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上台”准备条件。但是无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

① 《安德烈·布勃诺夫》莫斯科1964年版。

② 《历史百科全书》第8卷1965年版第275页。

不能成为这样的专制君主。根据舒尔根的说法，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抛弃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借助社会主义推翻了旧的一切，夺取了政权。他们必须把这一包袱背到底……而这个大包袱会压死他们……到那时会出现一个某人，他会继承他们的'法令'……他们那敢于承担作出不可思议的决定的胆量，他们的残忍、即执行已在某种场合作出的决定的残酷无情……但他不会把他们的包袱拿过来。他按其意志能力来说，会是真正的红卫军，但按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则会是真正的白卫军。他按其充沛的精力来说，将是布尔什维克，按其信念来说，则是民族主义者。这种结合体，我知道，它是艰难地出现的……是的，正是这样……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现在所出现的可怕的事实，现在在俄国的头上笼罩着的可怕的威胁——这只不过是可怕的、艰难的、把人折磨得不堪的……分娩……，一位专制君主的诞生……一位真正的专制君主，而且是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诞生是容易的事吗"①

692 毫不奇怪，住在国外的保皇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一些代表人物，把斯大林在苏联的篡权看成是某种君主制的政变，是迈向建立新王朝的步骤。1945 年在布拉格的叶·德·库斯科娃② 档案中发现了帕·尼·米留可夫于 1936 年 9 月 18 日写的信，米留可夫在这封信里写道：

"在您看来，这些枪决是因为抛弃了路线。路线还继续存在，因此不必惊慌，让他们继续相信自己的路线，直至送上断头台。当评价这一方法（从表面上），说它是野蛮行为时，我认为采取这些方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正确的……我更加祝愿斯大林长寿，为的是不要再倒退回去……"（根据苏共党员 C·彼得里科夫斯基证实。）

一个从 1920 年起就不断坐监狱的老保皇分子，他是一个军官，在布蒂尔卡监狱里告诉当时和他同牢房的一个年轻的共产党

① 瓦·舒尔根，《一九二〇年》列宁格勒 1927 年版第 269—273 页。

② 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论家，"经济派"《信条》的起草者。——译者

员 M·Б·库坚茨说："我很幸福，我们敬爱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①] 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由于他的软弱，没有能实现。看，现在的监狱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你们难道不懂吗？现在进行的事，正是在俄国建立新的王朝。"

显然，这些人搞错了。斯大林并不想恢复君主制度，并不打算把驱逐出去的地主和资本家请回苏联。他是力图用某种方式把新的社会制度同反民主的绝对独裁制度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将斯大林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大家知道，拿破仑取得政权以后并不想把法国农民已夺取到手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地主。拿破仑也保留了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切主要成果，当时，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拿破仑甚至在解散执政内阁和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时，也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所以这一新统治阶级全力支持了拿破仑，政变后第二天交易所提高了几乎所有的股票行市，这是他们响应政变的表示。所 693 以拿破仑所做的事都是公开进行的，他不怕宣布自己为终身独裁者，而且还把皇冠加在自己头上了。相反，斯大林篡权和消灭相当一部分革命干部，无论如何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斯大林的全部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及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因此在拿破仑敢于公开活动之处，斯大林被迫去随机应变，进行欺骗活动。斯大林没有给自己封王称帝。从形式上他到三十年代末除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后来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行政职务。直到战争前夕斯大林才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后来授予元帅称号，最后甚至授予大元帅称号。与此同时，斯大林虽然没有君主称号，但最后十五年里他手里所集中的专制权力是拿破仑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掌握的。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谈到这一历史反常现象时，写

---

① 指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译者

道："布尔什维克知道，法国革命是以拿破仑专政而告结束的，所以他们害怕，他们自己的革命也可能步其后尘。他们因此不相信托洛茨基，因为在全体领导人之中他最象拿破仑，他们相信斯大林，因为他最少象拿破仑。"①

* * *

上面我们已讲过了三十年代镇压运动的基本性质、以及导致斯大林进行镇压的动机。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怎样能够实现其罪恶计划，什么因素促使他对党给以如此沉重的打击？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没有遇到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及国家其它领导机构的坚决反抗？为什么党允许它的那么多优秀儿女流了这么多的血？为什么党在专横的威胁面前如此软弱无力？在这可怕的悲剧中什么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什么又是偶然的呢？

大家很了解，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就不止一次提出过：革命如果不是在适合它的理想的客观历史条件下进行时，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蜕变。年轻的格·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的争论中也不止一次讲到这点。普列汉诺夫确认：如果人民在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夺取了政权，那么"革命有可能导致政治畸形，就如古老的中国或秘鲁帝国那样，也就是说出现以共产主义为背景的新的沙皇专制。"②

今天，那些和我们在一起谈论过这个题目的人们认为，这些话是有预言性的，他们力图证明在二十年代的苏联象斯大林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夺取政权。作家 В·К·－夫告诉我们："如果列宁再活十至二十年，那么他一定会被'新人'挤出领导之外，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大林。"经济学家 И·对我们说："十月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以直接专政，即以暴力为基础的。无视一些最起码的民主制和法制，必然会产生斯大林专政。正是斯大林最完美地走向了这个制度，他只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了这

① 爱·卡尔：《什么是历史？》纽约 1962 年版第 90 页。

② 格·普列汉诺夫：《哲学文选》第 1 卷莫斯科 1956 年版第 323 页。

一专政中所具有的可能性。”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的人继续写道：“事情就在于，俄国这样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为时过早了。在一个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里，多数人民是文盲和没有文化，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它还是在得不到其他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过早地破坏了一切旧的社会生活[695]方式之后，发动了、并且解放出来如此巨大的力量，使这巨大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或那种斯大林主义的形式。现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对我国来说，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斯大林主义，而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其它的发展的可能性，这一切又都是严格受到决定论的支配的，那么我们同时必然要接受另一种观点，即十月革命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也是由原来的俄国君主专制的畸形体系严格地被规定了的。这样一来，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二月革命完全不是什么为时过早的偶然事件。换言之，为了阐明斯大林主义，我们就要追溯到我国历史上的更早的时代，直至鞑靼侵略为止。但这是不正确的途径，是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开脱责任，而不是谴责它。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几乎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都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看来总是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这时某种可能性的胜利不仅由这样或那样的客观因素及条件决定的，而且还有许多主观因素和条件，其中某些因素显然是偶然的。

二十世纪初期甚至连俄国的沙皇制度也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善于领导，实行较明智的让步制度，我国也许不会发生二月革命。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同样有两种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战争结束得早（或者政府决心签[696]

订和约），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向农民作出更大的让步，如果弗·伊·列宁未能及时地回到俄国，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可能在我们国家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巩固下来。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因此，在从某一时期起，十月革命实际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理所当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各种政治发展的可能性里面，哪种可能性大一些？那种小些？在每一个别的情形下，需要对这一问题的全部客观和主观条件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是，这一或那一事件发展的甚至是最小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事件的这种发展乃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家 А·Я·古列维奇公正地写道："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事先、而且是一劳永逸地铺好了的路或轨道。任何人都不会使历史按计划或预先决定好的那样去发展。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偶然性和不同的路子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和无限'选择'的自由体系……已完成的事物，在我们想象中是必然的，但这只是因为其它可能性没有实现罢了。自然，历史学家寻找已经发生了的事件的根据，并对他加以解释，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当一定的潜在可能性实现了，而其它可能性被排除了，就会产生一个观念，即已发生的事态发展的途径是唯一可能的，而这一思想随着我们发现的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内在逻辑之后就变成为越来越坚定的信念了。历史过程的已实现的方案得到自己的解释并被宣布为符合规律的。但是认为历史过程是某种不可避免性，而且断言，已完成了的事情是先此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唯一可能结果，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合理地排除其它的那些未曾实现的可能性，而不去研究社会中永远存在的各种发展趋势，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①

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我们看来斯大林主义完全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也远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所形成的

① 见《历史科学的哲学问题》（文集）莫斯科 1969 年版第 74—75 页。

政治观点是没有任何缺点的。革命初期的苏维埃政权制度中也有不少缺点。但是这一制度也有许多重要的优点。所以苏维埃国家后来的发展道路根本不是受决定论的支配，即必然会转化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我们的观点是：十月革命后不久所形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家，当时存在着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而各种可能性中最坏的形式——斯大林主义在其中并非唯一的甚至并不是主要的可能性。还在列宁时期我国和我党已发生了革命发展的各种不同趋势和不同方向的斗争。如果列宁在1924年没有逝世的话，这一斗争以后必然会尖锐化。但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在我们看来，可能性最大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化趋势的胜利。

同样的问题——即关于我们革命发展道路中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的比例问题——也是许多国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其中当然有共产党人。还在1956年3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陶里亚蒂在他接见《新论据》(Нуово Аргументи)编辑部人员时发表的著名谈话中说：

"……当我们实质上只限于揭发斯大林本人的缺点作为最初原因时，我们就仍然停留在'个人迷信'范围内。过去一切好东西都被解释成出自某一个人的超人的优点；现在一切恶果都归结为他的如此特殊，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的缺点。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指导。真正的问题，即苏联社会为什么能够走到而且已经走到了离开了他曾经为自己制订的民主生活和法制的某种形式的问题却没有被我们注意到。他为什么甚至已经走上了某种蜕变的形态……在我们看来，斯大林的错误毫无疑问是和苏联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可能首先是在党的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的比重过分增大相联系的。很难说，哪里是原因，哪里又是后果。某种现象已经逐渐地成为另一种现象的表现。 698

这种过分的官僚主义比重有没有必要也追溯到来自旧俄国的政治组织形式及其风气的某种传统呢？可能，这一点不必排除掉。

此外，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是艰难的年代，是充满了几乎是非人所能经受得起的艰难岁月。这是外国侵略、军事冲突和内战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还是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为了战胜反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一时期，一切工作都是象在战时条件下那样进行着；如果某一任务没有完成，那么对于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就采取迅速的法律审理的非常措施。列宁自己在他致捷尔任斯基的信（现在已经公开发表了）中就曾估计到：当反革命和外国侵略彻底被战胜后，有必要转变作风，这种转变在他去世前几年就开始实行了。有必要看一看，这种转变是否已经实现了?!还是相反，应该被改变的或应该完全抛弃的东西反而更加巩固了?!……也许，如果肯定地说：正是在党内开始出现了限制民主制度的有害因素，以及官僚主义组织形式逐渐占了上风，这一点可能是不会错的吧！……那么，与此同时斯大林就是某一特定地位的体现和创始者，形成了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官僚机构战胜了民主生活方式的时候，他是这个机构的较有经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还因为他给了这一错误路线以理论根据，而且后来他就把他的个人权力建筑在此基础之上……这一切说明：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同情他的圈子，这种同情一直继续存在到他逝世为止，也许至今还保留了一定的力量。"①

699

南斯拉夫的一些研究人员，曾力图证明三十年代的悲惨事件有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受决定论的支配的。这个问题，他们讲得很肯定（虽然在我们看来不太公正）。例如，南斯拉夫理论家 B·科拉奇在 1964 年写道："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具有非凡魔力的'个人迷信'公式的背后，实质上隐藏了什么东西呢？这里存在着一个整的体系。……'个人迷信'标志着对社会主义民主最粗暴的消灭，是某种独特的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暴政，自由创作精神和伟大的人类宝贵财富的被消灭，在为了某种具有魅力的未来的名

① 引自帕·陶里亚蒂的书《当前国际运动中的问题》(1956—1962) 罗马 1962 年版第 99—106 页。

义下，冷酷无情地消灭人类，政策和思想的绝对化，否定人民的自由……这种否定一切的思想，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发生呢？因为这个国家向全世界表示过：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而是历史的必然性。”B·科拉奇继续写道：“一个力图加速经济发展，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国家存在的艰难条件，要求它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和权力去弥补物质基础的薄弱。这就导致政策的绝对化，把它变成某种神话和神学。技术进步只是更加巩固了技术官僚阶层。国家逐步形成为控制社会的绝对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公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都失掉了作为自由的人讲话的合法权利；人道主义被粗暴地践踏，人道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弱点。国家权力如此强大，使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服从于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把马克思的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体系，把自己变成这些教条的唯一的和绝对的解释者。”作者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这样一来，“个人迷信”这一神秘公式掩盖着的一切畸形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历史的任性行动或沙皇独裁制度传统的某种压力，而是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就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原故。”①（着重点是我们加的。——作者）

700

B·科拉奇文章中提出的某些论点很难不同意它，因为他正确地指出了：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遇到了这些历史和经济的条件。但是，在我们看来，B·科拉奇的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当他断定：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别的发展道路，只能沿着斯大林时代的道路发展，而这一条道路在许多方面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近了，而是远了。这样，他就不正确了。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革命必然要伴随着群众性的暴力行为，伴随着践踏最起码的民主准则，伴随着专横暴虐和对待人民大众、劳动者及知识分子的

① 《实践》杂志萨格勒布市1964年第1期第300—301页。

强制行为。

三十年代中期和末期规模巨大的镇压绝对不能说明是对斯大林专横暴虐和违法行为的某种明显的反抗——这只不过证明斯大林和他的许多亲信的无限的残酷的本性。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实现其独裁和毫无止境的个人专政时，并没有遇到任何较强的反抗，不仅党和人民，而且那些成了惩罚机构镇压对象的党和国家活动家们都是如此。反对斯大林的仍然只有那些以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我们所指的是国际范围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白俄侨民。那些认为自己是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余势力对斯大林的反抗也是极微弱的。这样一来，斯大林在国内的篡权行为相对地说，是轻而易举的。这种情况当然要求有比B·科拉奇的文章及一些类似的材料更加深刻的解释和论证。

列宁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的体现，斯大林则相反，他是进入俄国革命运动中一切最坏的品质的体现。总而言之，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了党和国家这一事实本身，我们深信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但是这一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性的本身，以及促使斯大林得以成为党的领导并且得以巩固了他这一领导各方面的因素是什么，这一切当然要求作最细致的分析。这是因为在我们党的面前不仅提出了应该谴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罪恶的任务，而且还要排除一切使他得以违法乱纪和滥用权力的条件。

在我们面前必然还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斯大林虽然犯了我们今天已经清楚看到的、如此吓人听闻的罪过，那么他是如何得以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政权，而且还保持了多数苏联人民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呢?! 斯大林从来不是一位仅仅依靠力量来维持的暴君，这也是事实。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整个时期里，他同样是依靠自己在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当中的威望和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况且，这个冷酷地一批接一批地消灭了几百万人的暴君在我国统治的时

间越长，看来，多数苏联人民对他的忠诚和热爱就越强烈。现在，回忆过去，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在党内人们对他的这种感情达到了顶点。所以当他于1953年3月逝世时，国内外亿万人们的悲伤是完全真诚的。

世界历史中这一没有先例的历史性的讽刺又如何解释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促使斯大林在国内篡权的一些条件。但是，这一问题有必要更加仔细地加以分析。

二、再谈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允许斯大林较容易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的首要的和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无限膨胀了的、对他的个人迷信。

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里常说个人迷信，而且说得很多，在1938年以前、正确地使用'迷信'这个词时，是指它最初的宗教上的含意。以后，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斯大林成为神话般的人间上帝，大家开始战战兢兢地念叨他的名字，他们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拯救苏维埃国家，使之不受侵略和解体。"①

把斯大林个人神化，使党和人民失去监督他的行为的权利和可能，他做的一切和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一切事情预先就都被宣布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成就和优越性都归于他个人的功绩，这就使党员和党的领导的政治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使他们变成了瞎子，看不清楚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这种状态要求他们不是自觉地遵守纪律，而是盲目地相信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迷信和其它一切迷信一样，使共产党变成了某种宗教组织，而且出现了一种趋势，即以绝对正确的"教皇"——斯大林为首的一群僧侣——即党的领导人和教徒，即普通的党员群众清楚地区分开了。 703

① 《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5期第152页。

确实如此，在斯大林迷信年代里，党的组织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宗教教阶制度的一切特点。

这样一来，斯大林迷信不仅掩盖了他已经犯下的违法行为和错误，而且为新的罪恶和滥用权力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个人迷信在这种理想的形式下不仅巩固了斯大林和他的亲信远远地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状态，而且加强了脱离人民的状态，把斯大林抬到凌驾于党之上的望尘莫及的高度。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的一切事情离人民如此之远，对无法了解真情的人是如此神秘，尤如同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事情一样。

在个人迷信的条件下，我们人民的社会意识里出现的（和被灌输的）正是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点是人们有各种幻想，自我安慰，没有批判地分析形势的能力，不能容忍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具有宗教的狂热性等。正如尤·卡里亚金在他的文章中公正地写的那样，在我们国家里出现了宗教意识的世俗版本。①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实的反映是被歪曲了的，事实和现象取得另一种色彩。例如，苏联人民不那么容易就相信扣在老布尔什维克头上的那些吓人听闻的罪行。但是，他们更难相信，这里的问题却是斯大林一手预先阴谋制造出来的，而且正是他决心去犯罪，把自己昨天的朋友和党内战友消灭。

704 对斯大林的宗教迷信必然伴随着贬低一切其他人的作用，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作用。在苏联人民之中必然会产生并被灌输给他们一种形式主义，对他们要求有统一和规范的言行。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成为斯大林服务，不是斯大林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斯大林服务，为斯大林而工作；斯大林的表扬、鼓励和微笑一下都被认为是最高的奖赏。这样，一切合理的关系全紊乱了，因此出现一种完全特殊的对人对事的评价的制度，这种评价是和是否能为“上帝”服务相联系的。这大概帮助了许多人去克服和忍受艰难的生

① 尤·卡里亚金：《现代思想斗争中的一件事》，引自《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4年第9期。

活，但这同时又帮助了斯大林实现他的罪恶阴谋。因为狂热的迷信者不仅不断地对自己的上帝祷告，而且能很容易使他去杀害"渎犯神灵的人"。

任何宗教的另一个特点是脱离世俗，不是关心实际福利，而是关心拯救灵魂。尤·列瓦达写道：多数宗教通常宣布尘世的生活同永恒的天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在这样的尘世生活中，人们应该以对上帝的虔诚和顺从态度准备迎接上帝的裁判。任何宗教都宣传要听天由命地去忍受生活的艰辛。① 对苏联人民也同样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幸福的未来的世界，为此，可能而且应该在现世的生活中，忍受任何艰辛和困苦。

把斯大林神化之后，人们就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待他的行动，甚至于对那些用任何合理的理由不能辩解的事情都力图为之开脱责任。当然，几乎一切人在自己的周围都不仅会看到好的东西，而且也看到许多坏的东西。但是正如对待万能和至善的上帝的信仰那样，多数教徒中不会因他们在自己周围看到人类苦难和不幸就不再信仰上帝，——这是因为他们把一切好的事物都归功于上帝，而一切坏的事物都归罪于魔鬼的原故；在斯大林迷信时代他们把我国发生的一切好的事物都算在斯大林账上，而把一切坏的东西都和那些斯大林本人与之斗争的罪恶势力联在一起。例如著名的苏联作家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就是这种真心实意的人，也就是受骗上当的人。M·Д·拜卡里斯基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所有的朋友中，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大概是最大的积极分子……他是一个心地纯洁的人。我和一些敖德萨的朋友们，即参加过反对派的人，我们对斯大林的信仰有过裂痕，后来裂缝被弥补起来，所以我们就不能发出那样清脆的声音。可是鲍里斯在三十年代初期，如同他十年前还是共青团员时那样，他的声音仍然那样纯洁……

705

① 尤·列瓦达：《宗教的社会本质》莫斯科 1965 年版。

在鲍里斯的性格中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他热爱顿巴斯有时到了可笑的程度，他能够一下子就激情满怀，对朋友文质彬彬，很有分寸，他有着经久不衰的少先队员般的激情和喜悦——这一切都从来没有改变。这是时代刻划在他性格中的特点。时代变了，但是人的特点保留了下来，在新时代的形势下，这是很悲惨的，因为他们帮助了那些隐藏在真诚的人们背后的两面派去欺骗年轻人，青年人是惯于相信真诚的人的。几代人都相信戈尔巴托夫，相信他的直爽和真诚，但却不知道他自己受人蒙蔽了，而且不自觉地帮助坏人进行欺骗。

现在读戈尔巴托夫书的人少了，因为现代青年人不喜欢戈尔巴托夫的高调，他们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但是不对，鲍里斯不是装腔作势，他只不过是那个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代的儿子。

他是信仰宗教的人。信教的人能设想庙堂里搬进了魔鬼吗？当信教的人突然看见金色的法衣下面露出了魔鬼头上的尖角时，他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想，这是他的幻觉。于是他在胸前划了三次十字，祷告上帝祈求拯救他。他就这样使自己相信这不过是幻觉，于是魔鬼的镀金的尖角在他眼里消失了，变成了圣者头上的圣光。他自己祷告上帝，并且迫使孩子们也去祷告。可惜那根本不是圣者。”

“斯大林万岁！”——一些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当他们被带出去枪决时，他们是喊着这样的口号死去的。

这种掌握了群众的宗教意识也束缚了这样一些人的思想，他们已经不相信斯大林，开始觉醒起来，虽然还是模糊地但已经有些看到斯大林将会把党引向哪里去。为什么奥尔忠尼启泽会自杀，而不去杀死斯大林呢？为什么斯大林十五年罪恶的血腥历史中没有一次是能够多少有效地排除斯大林的各种意图呢？这不是因为人们想保住自己的生命，而是担心自己采取这一步骤在个人迷信时代会引起难以预料到的后果，也许这就使那些能够采取这样行动的人裹足不前了。Г·巴克拉诺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叶梅里亚诺夫

706

说："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帮助人们去巩固了对他的盲目的崇拜，而现在，我们本人在自己造成的崇拜面前变得束手无策了。神圣的真理如果不符合当代人的认识的话，就会变成可怕的谎言。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现在敢于把斯大林做过的一切事情都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去宣布，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从那一分钟起，连动摇的人也会相信：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会去相信人们讲的一切事情。这样一来，任何惨无人道的行为都算不得什么了。"① 如果这样，正如伊万雷帝时代一样，人们在塑造了一个世俗的上帝之后，却无力监督他的一切行为，而且也无力去惩罚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在谈到伊万雷帝时代写道："最可怕的是：如此怪诞无稽的思想(即指沙皇政府是上帝造出来的)不仅暴君自己拥护，而是人民也相信的。伊万雷帝这一疯狂的野兽虽然把自己的统治变为惨酷、凶杀和纵欲的真正狂欢酒宴，虽然他卑鄙无耻和胆小如鼠，因而到处怀疑别人在搞反对他的阴谋，于是他把他的几千个部下鞭笞致死，对他们所使用酷刑连后人读起来都会令人发指，……虽然他连续不断地整整做了四十年的坏事，但是，在这一吓人听闻的统治时期，没有听到一个反抗的声音，没有人起来反对他，没有人为了报仇雪耻挺身而出去惩罚他。伊万四世的牺牲者有时幸运地逃了出去，但是历史学家没有发现一点痕迹能说明曾经存在过反对他的什么策划。他们这些人并不是胆小鬼。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勇敢的久经沙场的战士，在战争中立过功因而英名远扬，他们在牢房里受刑时、在刑场上，一般都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勇气，他们身上具有难能可贵的精神力量。但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灌输给他们的错误观念的精神力量使他们能克制自己那种自然产生的想起来造反的冲动，压下自己的愤怒，因为对沙皇的屈辱性的服从是他们神圣的信念，这是他们从幼年时代起就已经形成的不可动摇的观念。当

707

① 《旗帜》杂志1961年第1期第16页。

列普宁公爵被插在木橛子①上，当他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死去时，这个不幸的人还赞扬沙皇，他的统治者和刽子手！”②尼·米·卡拉姆辛在他写的《历史》中就此问题写道：“曾有过这样的沙皇！曾有过这样的臣民！我们不必为有这样的沙皇，这样的臣民而感到奇怪。如果说沙皇在残暴地虐待他的臣民方面超过了所有的人，那么臣民在忍耐方面也超过了所有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帝赐与的，任何反抗都是违法的。他们把伊万的暴行归于上帝的愤怒；自己应该悔改自己的罪恶；他们带着信仰和希望等待着上帝的饶恕；他们不怕死，因为有一种思想安慰着他们，他们认为，美德是另一种幸福存在的形式。”③

*　　*　　*

大家知道，把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代表神化，使他们具有非尘世所有的一切美德和力量，这样的宗教意识形式远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阶段各民族就出现了，到了奴隶君主政体条件下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沙皇或国王个人在封建欧洲的条件下也往往被神化了。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神化政权的代表以及政权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很早以前就在许多国家里为人类的性格中最坏品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为最残酷的独裁和暴政创造了条件。 708

在现代，宣扬这个或那个超人，对“伟大人物”神化般的迷信往往被形形色色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掩盖自己的扩张计划（法西斯德国对希特勒迷信，法西斯意大利对墨索里尼迷信，战前日本对天皇迷信等等）。希特勒公开写道：“个人迷信

---

① 当时的一种刑罚，把人插在削尖的木橛子上，从下部直穿肺腑，使之慢慢死去。——译者

② 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思想》出版社莫斯科 1964 年版第 56—60 页。

③ 尼·米·卡拉姆辛：《俄罗斯国家的历史》第 9 卷圣彼得堡 1892 年版第 106 页。

是统治的最好形式。”

遗憾的是，领袖是神，而他领导下的人是群氓的说法过去经常在革命运动中出现（俄国民粹派关于“英雄”和“群氓”的理论，德国对拉萨尔的迷信，诸如此类）。

但是，必然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个人迷信的产生和长期存在，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苏联的条件下出现宗教意识的一种世俗方案的问题，应该如何解释呢？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支持了这种个人迷信呢？这个党曾经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的，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有关“英雄”和“群氓”的错误思想作过斗争，并且在这一斗争中发展起来，受到了锻炼。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三十年代前半期所开始的那种说得天花乱坠地歌颂斯大林的运动不完全是自发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斯大林本人以及一批和他关系密切的阿谀奉承的人组织和发动起来的。这一组织得很全面而完善的宣传得到了预期的结果。对斯大林的信任是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灌输给人们了，从小学低年级就教育小孩说：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斯大林给的。

但是如果把我国产生和巩固对斯大林的迷信只是解释为我们善于进行新的“社会主义”宗教的宣传，那就太幼稚了。过去不是也曾把基督教首先企图解释为教会对人民的欺骗，而不是从它产生和巩固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解释它的起源吗?!

709

某些历史学家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国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革命后的十至十五年中沙皇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继续存在的原故。他们还提到：基本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不久前才摆脱独裁专制压迫的国家缺乏足够稳固的民主传统。许多历史学家公正地认为，多少世纪以来在俄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沙皇、皇帝的迷信思想，存在着专制集权政体思想，这一切也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在这里如果只说群众没有文化或者说俄国农民和小手工

业者等有宗教的幻想，那就要犯大错误。因为我们不能不看到蕴藏在革命本身里可能产生个人迷信的一些前提。

我们知道，革命使我国人民精神焕发，变化很大。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多少世纪形成的习惯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摧毁了。这一切变化如此伟大和非凡，因此，在人民的心目中，领导这一革命的人，往往已经不是普通人的那种形象，他已经变成了某种天神般的英雄。看来，任何一次真正群众性的，并取得了胜利的革命，在人民群众中都出现一种歌颂和推崇自己领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多数情况下是自发的，产生于人民之中的。对领袖的歌颂首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极大的热情，反映了他们为自己的革命而感到自豪的心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那些为他们的解放付出如此巨大努力的人们的感激心情。

普通的革命者，他们响应了自己领袖的号召，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于自己的生命，他710 们必然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的领导人理想化。对人民群众来说，这些领导人是人类一切美德的代表。可惜的是，远不是所有领导人在革命发展的后来阶段，都是无愧于人民的这种巨大信任的。

理所当然，如果认为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对革命领袖的推崇，必然会导致对领袖的迷信，然后迷信又会超出任何理智允许的界限，接着产生偶像崇拜，那是很错误的。把革命领袖变成全能全知，绝对正确的神的形象不是革命的规律性，这在很多方面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情况及领袖本人的性格、世界观和他的毅力。

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归根结蒂，他自己所犯的罪行本身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这样说看起来是显得多么反常）。

斯大林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犯下了他的罪行。斯大林利用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对他的信任，利用了党和国家纪律的巨大力量，此外，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他还利用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把几百万人拖进了他的犯罪活动。不只是惩罚机构，我

国整个党和国家机构都积极参加了三十年代的全部政治运动。几千个党和国家干部参加了所谓的“三人小组”，几万个党的积极分子，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参与了粉碎“人民敌人”的斗争。还在1937年的时候，政治局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当需要逮捕这个或那个部(局)的工作人员时，必需得到本部(局)的领导人的批准就足够了。这样一来，部长可以批准逮捕自己本部的工作人员，州委书记可以批准逮捕州委的党的工作人员，作家协会主席也可以批准逮捕许多作家了。

几十万共产党员在那些年代都举手表决赞成把“人民敌人”开除出党。几百万普通苏联人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他们都要求对“人民敌人”进行严厉的镇压。当时，人们交付政府审判的不仅 711 是自己不认识或不熟悉的干部，而往往是他们昨天的朋友和熟人。

当然，那时绝大多数苏联人都信任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他们真诚地对“人民敌人”的活动表示愤怒。但是也有不少心里有怀疑的人，如果说他们没有怀疑镇压的大方向，但是他们却怀疑这个或那个单独的镇压事件是正确的。甚至在内务部工作人员当中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良心面前，他们的言行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当中一些人用不同方式反对这件或那件镇压活动。另一些人顺从了，不说话了，他们用自己的沉默帮助了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去摧残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

但是，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怀疑和动摇，他们往往不能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同谋犯。所以他们强迫自己相信斯大林，因为他仿佛什么都知道，不可能犯任何错误，他们在对他的个人迷信中为自己寻求安慰。

作家A·彼西缅内伊在他的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写道：“我不能相信伊万·卡塔也夫、扎鲁金、古别尔、潘特来格尔或者米哈伊尔·洛斯库托夫、或者谢尔盖·乌尔尼斯，或者我的其他许多朋友是几内亚的间谍，或者比如说是准备谋害斯大林的企图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在自来水厂下毒的卑鄙的罪犯，或者是企图复

辟利亚布申斯基和冯·美卡政权的敌人暗探。至今，不管我怎样讽刺我自己当时的彷徨(已经没有什么要隐讳的了，因为一切已说得明明白白)，如何寻求精神安慰，但我还是首先想弄明白，是的，我再重复一遍，不仅应该相信今天讲出的事实，而且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在那些年代，弄明白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时，我可能成为被诬陷的人，会发疯、会自杀，但是如果想活下去，那么对一个不幸的、惊慌失措的，又拼命想在社会上还有个立锥之地的诚实的人来说，那么最方便的方法(我再重复一下，而且还要重复一千次)就是信任斯大林。不加思索，不回头，不要去证明我的信任是否对，正如迷信的人相信各种预兆，相信上帝，相信鬼神，相信来世一样。一切社会行为可能是出自一个篡夺了全部权力的人的罪恶动机，而这个人就是斯大林，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亵渎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事。”

712

确实如此，这在斯大林恐怖年代产生的各种相互矛盾的感情和心理的错综复杂的混合体是斯大林迷信得以如此长期存在并得以巩固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党和国家机构干部当中，这种迷信思想至今还在他们许多人的心中得以保存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一来，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正是对斯大林的迷信帮助他篡夺了权力，并且消灭了一切他不称心的人。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党和国家机构的支持下以及在被欺骗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犯下的种种罪行却反而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个人迷信。换言之在斯大林的恐怖和迷信之间有着正面和反面的两种因果关系。

当然，在另外的条件下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个人迷信也可能不会一定发生大规模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和对人民的镇压运动。在这方面有许多因素决定于这个人的品质，即决定于这个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的性格和道德面貌。过去被神化的皇帝或法老不一定每人都是血腥的、残酷的暴君。但正是因为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个人的行为决定于这个人的品质，与其说是决定

于法律和党和国家的生活标准，还不如说是决定于成为迷信对象的个人的无法无天的专横暴政。所以，这种情况就成为个人迷信最危险的后果。因此，我们的党和我们的苏维埃国家绝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下去，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是每个党员和公民的权利，乃至他们的生活本身的唯一保障。

三、在个人迷信年代重大问题对群众封锁、群众没有批评的自由

713

一个人提出某些反革命的口号，想在这些口号下去篡夺国家的全部权利和消灭我党的列宁的核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想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用欺骗党和人民的办法，他只能提出这样的口号，说要保卫苏维埃政权，似乎是有暗害者和间谍钻进了政权机构内部来了。据此，斯大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帮助下筹划了、而且实现了这一吓人听闻的阴谋。

我们知道，真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重要的武器，真理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实现了十月革命。

但是斯大林不需要这个真理。他取得政权的时候，是把欺骗党和人民，把阴谋和蛊惑人心作为自己政策的主要工具。

许多苏联人不仅仅因为信任了斯大林和党的领导而相信他所作的一切。伪造事实和欺骗群众规模吓人听闻，也很影响了共产党员。那些遭到镇压的活动家被指控的各种罪名，真是多如牛毛，而且没完没了的被重复地说，使许多人完全不可能想象，这些都是有意识地挑拨离间和欺骗活动。

与所谓的"政治犯"有关的全部案件对群众进行封锁，这种情况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关"政治犯"的案件的调查工作是特别保密的，任何想了解这一秘密的意图本身，当时被看作是政治犯罪行为。

例如，关于波斯蒂舍夫、柯秀尔、邱巴尔、埃赫、卢祖塔克的命运一直是被沉默的墙壁包围起来。关于我党和国家其他几十名、乃至几百名杰出的活动家遭到逮捕的事实，没有一家报纸登载过，人们只能根据各种迹象进行猜测，或者从区委和市委那里得到口714头简短的通知。无论斯大林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都不敢在全国面前公开地指控他们的这些多数的牺牲者究竟犯了什么罪。所以甚至那些比别人消息灵通一些的人，一般也只能知道本系统、本部门范围的镇压情况。可是镇压的整个情况，恐怖的史无前例的规模，他们是想象不到的。随心所欲地经常调动工作，把干部从这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这个工作岗位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是这一动荡时代的特点，而这又促使人们不了解情况。苏联人们往往不知道：我党的某一活动家是被逮捕了，还是被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去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连被捕者的亲属和好朋友都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卑鄙无耻地欺骗被捕者的亲属，通常犯人的死亡或被处决的消息都不通知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利用了这些不幸的人们的期望心情和存在着的幻想，编造一些说法，似乎是被捕的（和实际上已被枪决了的）"人民敌人"已被流放到遥远的集中营去了，这些集中营是"不允许通信"的。

在许多情形下斯大林和内务部机构宁肯使用秘密恐怖方法，而不实行直接镇压和逮捕。相当一部分人被捕时既没有逮捕证，也没有检察长的批准。在侦查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某一犯人的案卷中，侦查员把伪造的心力衰竭死亡或患其他病死亡证明放了进去。在某些情况下，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排演一场"强盗"袭击这个或那个他们不称心的人的住宅，并且在"抢劫"时把他打死。例如，迈耶尔赫里德的妻子、演员季娜伊达·莱赫就是这样被打死的，因为她为了她的丈夫获得释放一直进行斗争。根据伊·爱伦堡的证实，那些袭击她的住宅的奇怪的强盗，并没有去动迈耶尔赫里德妻子的许多珍贵的东西，却是把她打死了——她身上有十七处刀伤，而且抢走了她所准备的文件和材料。为了谋害那些斯大林不称心

的俄侨，外交人员和苏联侦探机关的密探，甚至专门往国外派出一些装备齐全的暗探。个别政治活动家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在旅 715 馆里，打猎时或在办公室里被杀害的，有些人被扔出窗外摔死了，有些人被毒死了，事后就发布某人患心脏病逝世的讣告（涅斯托尔·拉科巴就是如此，他的遗体被隆重地从梯比利斯运回苏呼米），或者制造原因，说是身遭不幸事故，或自杀等等。

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阿·汉德然的悲惨命运在这方面也很典型。亚·尼·谢列平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阿·汉德然是1936年7月9日在梯比利斯的贝利亚办公室里被贝利亚亲手打死的。根据党的监察委员会机关的原工作人员A·伊万诺娃的证实，在汉德然被打死那天，她正在贝利亚隔壁的办公室里办公，她听见了枪声，然后汉德然的遗体被送到一个旅馆去了，亚美尼亚党的干部通常都住在这家旅馆里。贝利亚的同伙把汉德然的遗体放在床上并往空中开了枪。根据苏·奥·加扎梁的证实，两封预先准备好的信被放进死者的衣袋里：一封是给他妻子罗沙的诀别的信，另一封是致贝利亚的绝命书。在这第二封信里汉德然"写"道：他似乎处境困难已经不能自拔了，所以决定自杀。贝利亚及其一伙背信弃义地谋杀了汉德然之后，又对这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横加辱骂，把一个被他们自己打死的人，说成是可耻的意志薄弱的人，说成是畏罪自杀的人。1936年7月里整个外高加索都在进行集会，谴责汉德然的"软弱表现"。亚美尼亚党的机关报《共产党人》发表的社论说："7月9日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汉德然开枪自杀身死。布尔什维克党一向严厉谴责党员的自杀行为，因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当党组织的领导人允许自己作出这样的叛徒的胆怯可耻的行为时，这就更加卑鄙了……近三、四年来，在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的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为首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给予亚美尼亚共产党及其原领导人汉德然的工作以极大的帮助。然而阿·汉德然恰恰在这样的时刻， 716 当他受到了党的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时，当他被提拔到该地区整个

党组织领导人的岗位时，以开枪自杀的行为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打出的这一枪我们无法称之为是别的什么行为，只能说这是叛徒打出的一枪。"[1]当然，这里就已经暗示说：汉德然大概是已经和有嫌疑的人关系不清不能自拔了，所以他自杀不是偶然的。几个月后，汉德然就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据此理由几乎整个亚美尼亚的党组织遭到了粉碎性的打击。

显然，这一切已经是真正的政治土匪行为，它和社会主义真正目标，和真正的革命警惕性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斯大林式的"国家"活动家，他们除了从事政治犯罪和恐怖外，还犯有不少各种"普通"的刑事罪。他们为自己建造豪华的私邸和别墅，为此非法地耗费几百万卢布人民的财产。他们在莫斯科附近还建立了（如格·费·亚历山达罗夫，他是执牛耳的"思想家"，也是斯大林行政机构的有名活动家）道德败坏、荒淫无耻的巢穴。而贝利亚这个坏蛋坐着他的轿车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寻找年轻的妇人和少女，以后她们就被送到他的别墅里去。正是因为我国的许多事情对群众严加封锁，以及没有批评自由，这就首先帮助了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得以干出许许多多坏事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涅恰也夫主义时，说道："对付这一切阴谋的只有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却有着摧毁的力量，这就是完全向社会公开。"[2]

717 列宁在谈到给党的领导培养称职的干部时指出，应该创造这样的环境，使党"对每个准备担任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熟悉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要光明磊落，要光明正大一些！"[3]列宁在谈到一切党的领导人时说，群众应该有权利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步骤，甚至于是非重大的步骤。

---

① 《共产党人》1936 年 7 月 15 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13 卷第 2 册第 540 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00—101 页。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都提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口号。还在法国革命时期《人权宣言》的第5条说："召开和平会议的权利和宣布自己观点的权利——无论是通过报刊或通过其它什么途径来行使这种权利——这是人的自由原则非常必要的结果，宣布这些权利之所以必要，因为现在还存在着专制制度或不久前还存在过专制制度。"①

对卡·马克思来说，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争论的问题。卡·马克思还在他最初的革命活动时期写道："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象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末，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②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也提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伟大口号。弗·伊·列宁还在1917年9月的关于出版自由的一篇专门文章中写道："……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第二是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20万选票的大党。第三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③ 713

① 见中·布奥那罗蒂：《平等名义下的阴谋》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8年版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4—9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69—370页。

许多书刊检查的庇护者至今还在引用十月革命几天后通过的，由列宁签署的有名的列宁《关于出版的法令》。大家知道，根据这条法令关闭了几家资产阶级报纸。但是这一法令仅仅具有临时的局部性质。这一法令中说："新秩序一旦确立，对出版事业的任何行政强制就会停止——依据有关的最广泛和最进步的法律所建立的法庭所规定的出版事业责任范围内，出版界将获得完全自由。人民委员会议考虑到，即便是在最关键时刻，对出版业的限制也只能在绝对必要的限界内，因此会议决定：1.只有以下报刊予以关闭：a、公开号召对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b、用明目张胆地诽谤和歪曲事实的办法扰乱人心；c、号召从事显然是罪恶的，即刑事犯罪的行为。2.关闭报刊机关，无论是临时还是永久性的，都要由人民委员会议通过。3.本规定是临时性的，一旦社会生活恢复正常

719 条件，它将由特别法令撤销。"①

但是不久内战爆发了，使这条法令的有效期延长了几年，甚至为对付其它党派的机关报刊而采取的行政措施更加强了。例如，1918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和出版社暂时被关闭了。但是内战结束几个月后，列宁就计划在我国采取一系列扩大党内民主的措施，以及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措施。诚然，书刊检查（主要是军事方面）在那个时期还保留着。卢那察尔斯基在1921年初在他的纲领性的文章《书刊自由和国家》中写道："书刊检查！这是多么可怕的词汇！但对我们来说，象大炮、刺刀、监牢、甚至国家这些词汇，也同样是可怕的……可是，当我们把刺刀和大炮、监牢本身和我们的国家当作破坏和消灭这一切的手段时，我们认为它们是神圣的。书刊检查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连伟大文艺作品都能令其拖期的书刊检查，如果这些作品中有明显的反革命成份的话，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而这会使无疑是必需的书籍的出版比急需书籍拖期，排到第三、第四位，——那么

① 《苏维埃政权的法令》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24页。

这人的话是正确的。而如果有人说：‘让那些关于言论自由的一切成见靠边吧！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所适应的是对文学的国家领导，书刊检查不是过渡时期的可怕的特征，而是经过调整的，社会主义化了的社会生活的所应具备的因素，’——如果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批评本身应当成为某种告密行为或者让文艺作品按低级的革命需要削足适履，那么这只能表明，这人的共产党外衣下面——只要是轻轻地搓一下——实质上是一个杰尔治摩尔达①，这种人在取得那怕是微不足道的权力后，他就只会去从中索取玩耍、享受、专横，而特别是‘硬拉着去做些什么’，和‘禁止去做些什么’……我们当然有这些征兆，而且也不可能没有，因为我们是 720 文化太低下的人民。在低级的代理人和偶然的代表人物身上存在把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变成警察式的和阿拉克切耶夫式制度的危险。这一威胁是实际存在的，应尽力避免其发生。”②

遗憾的是，斯大林恰好属于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提醒我们的那种“较年轻的代理人”。斯大林没有从任何方面去继承二十年代初期所安排的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正确的和健康的趋势。相反，在斯大林的直接安排下我国重大事件向党内和社会公开化，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已经不断受到限制，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党和国家政策中的基本问题时，更是如此。斯大林很明白，公布和公开化对他是多么危险的事。所以当他获得了独裁权力之后，他把对国内的各种情报来源和出版事业进行的个人监督，也同样发展到闻所未闻的规模。我国的公民和党员除了斯大林本人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有必要向他公布的情报之外，他们得不到任何其它的情报。无产阶级垄断出版事业的思想被斯大林歪曲了，而言论自由实际上也被取消了。我们的出版事业对于那些显然持敌对的批评和丑化我们的态度的写作是关门的，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从党的立场出发的批评，对批评在个人迷信年代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和文

① 果戈里著喜剧《钦差大臣》中的警察，以粗暴为特征。——译者

② 《出版与革命》杂志 1921 年第 1 期第 7 页。

化生活方面的许多歪曲现象也是关门的。

恩格斯早就写过，在一个一切知识的源泉都服从于政府，在一个不经政府事先允许就不能说话、不能教学、不能出版和发表任何东西的国家里，是很难获得正确观点的。但是，斯大林也不愿意我国公民形成正确的观点。他很明白，对社会封锁情况不仅使他得以更好地隐藏起他的一切罪行，而且苏联公众，包括最负责的工作人员在内，不知道那些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掌握的情报，这一切在许多情况下使斯大林成为局势的主宰。大家以为，斯大林比他们自己知道的多得多，这使人们失去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主动性。

女作家莉·柯·丘科夫斯卡娅在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在《致"消息报"编辑部公开信》中写道："什么因素把我们引向了这场空前的灾祸？什么因素使人们在向他们猛扑过来的这架机器面前完全束手无策？又是什么因素使三个机构史无前例地合并起来、熔合在一起，化合在一起的呢？这三个机构：其一是国家安全机构（它每分钟，日以继夜地都在犯法），其二是为维护法律而建立的检察机构（它在许许多多的岁月里，都在迎合奉承，对一切都采取盲从的态度），最后是负有主持正义职责的报纸。但是这些机构却不去尽它们的天职，而是有计划地、机械地向受到迫害的人喷射各种造谣和诽谤——它们对现在已被平反的那些'怙恶不悛'的、'卑鄙的'、向'外国暗探机构''出卖了灵魂的''人民敌人'制造的谎言真是罄竹难书。毫无疑问，这是科学家所发现的一切化合物中最危险的一种，但它是什么时候、又怎样成功的呢？为什么这竟成为可能的呢？……扼杀真实的言论，这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也就是说，从那该诅咒的斯大林时代开始的。这是几十年中发生的最凶恶的一种暴行。在斯大林时代没有自由思想的权利，不许人们怀疑，不许提出问题，不许大声疾呼，发出警告，而代之以自负的，毫无羞耻的，大量的和不断重复的谎言。每小时都在重复着的谎言妨碍人们去了解那些在他们的祖国的同胞们发生着一些什么事情；一些人是因天真幼稚而不了解情况，另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实在

不想知道这些情况了。而那些了解或者猜出了真情实况的人们，他们因处在明天就有可能遭到杀害的恐怖下只好沉默了：他们将遭受的不是工作中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不是会失业或物质上发生困难，而是最普通不过的、从肉体上把人消灭掉。看！那个时候给了'言论'多么伟大的荣誉呀，因为为言论要被杀头"。

这样一来，斯大林把党对出版事业暂时的垄断，用于迫害党和人民了。

四、三十年代后半期我国的国内国外形势

722

由于对人们进行了封锁，苏联公众很少了解斯大林是一个残忍独裁者，也不了解他的罪恶活动的内容。与此同时，苏联公众很清楚地看到了三十年代我国现实中另外的、好的一面，加以宣传机构总是把这些好的方面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大概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象三十年代前期那样，可歌可泣的和悲剧性的因素如此错综复杂而又相互联系在一起。

作家谢·谢·斯米尔诺夫现在回忆三十年代中期的事件时，描写过这一充满矛盾的时代，他说："……一方面是震惊世界的真正伟大的事业，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和力量的高速增长，几百万人民诚挚而真实的冲天干劲。另一方面，不仅因为紧张而危险的国际形势，也纯粹由于内部复杂的因素，人们心中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失去了信心，而且还有许许多多遭受的灾难和悲剧的命运。一方面是宪法的诞生，按其条文确实是最民主的，应该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权利和最安全的生活条件的宪法。另一方面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践踏人们的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最起码的和必需的权利，并且企图把不信任和怀疑一切的原则成为公民生活中的最高原则和标准。一方面是人们真诚地深深地相信列宁主义思想、信任党和他是代表这一切的个人化身，一位形象高大的然

而却是残酷的和充满权势欲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当时是列宁的思想和党的化身。另一方面，他不过是一个卑鄙的人，他有时穿着代表保护革命理想的军便服，有时穿着代表国家警惕性的、所有的扣子都紧紧扣上的上衣，有时穿上代表普通人的破旧、满是油污的上衣。"①

723 时代的这类矛盾性（它不仅是一定政治的反应），以及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都在斯大林的言行和活动上打下了烙印。

一往无前的历史发展的坚定不移的潮流也拖着斯大林及他周围的人跟着自己的方向。斯大林虽然是主张独裁和专制的，而且是蔑视人们的，但他很明白，在我国具体的条件下他只有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马列主义拥护者的时候，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斯大林还必须不仅只用言论去证明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任何一个罪犯并非只是不断地犯罪。斯大林的活动也不只是由罪行构成的。因为他不仅仅只是下命令去镇压和枪杀人们。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决策，他解决的这许多问题是和惩罚机构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的。例如，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问题以及国际工运问题等等。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即有关这些问题的决议，斯大林也犯了不少错误，苏联人民也因为这些错误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是不应该否定斯大林在决定这些提到他面前的许多问题时，甚至在脱离人民和党的时候，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不从总的方面考虑我党的思想体系和集体意志，考虑列宁的指示和遗愿及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意向。因此斯大林迷信虽然阻挠了我国和我们社会较快的发展（至少在某些方面），但没有使这种发展完全停止。这种情况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又造成了揭发斯大林罪行和迷信的困难，而官方宣传机器又把苏联人民的一切成绩和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例如，全体人民都知道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部

① 见《共青团真理报》：《一个女共青团员之死》1966年11月16日。

分党和苏维埃领导人遭到逮捕之事。可是大家也看见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正在如何成长和强壮起来，大家看到处处都是正在建设起来的新学校、工厂、文化宫。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间谍"的军事领导人遭到逮捕的事。可是大家又都看到党对 724 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的关怀，使它有能力抵抗任何敌人的侵犯。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暗害者"的科学家遭到逮捕。但是大家也知道年轻的苏联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在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它正在迅速地发展起来。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作家遭到逮捕，但就在此时我国不仅出现了美化实际生活的作品和书籍，而且也出现了永远进入苏联文学宝库的反映现实的真实作品。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民族主义者"的加盟共和国的干部遭到逮捕。但是大家也看到从前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如何向前发展起来，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如何巩固和发展起来。而这一切为大家看得见和摸得着的成就，使苏联人们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这些成就在人民心中产生着对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信任，而且也产生着对当时是我党和国家领导的人的信任。

从镇压的角度看，1937 年是最可怕的一年，但它也是战前收获最好的一年，甚至连这个也许是偶然的事情也帮了斯大林不少忙。因为他打击了党的干部的时候不是在危机和萧条的年代，而是在高涨的年代，这也帮助了他去欺骗人民。

克洛德·鲁阿写道："在野蛮的战争中，敌人有时为了保护自己强迫他的敌人的妻子和孩子走在队伍的前面。如果向敌人开枪，就是向你所爱的人开枪。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他不是叫人们仅仅去迷信他个人，在他的身上体现着社会主义和革命，他乃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化身。多少世纪以来的理想和希望养育着的高尚的目标成为支持他的力量。幻想和实际，善和恶，崇高的乌托邦和失望缠成的一团乱麻没有办法解开。斯大林迫使那些从愚昧落后的深渊中得到解放的人民走在自己的前面，于是出现了那些水坝、学校、卫星、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但是这样的现实背后

却隐藏着形成为政府制度的杀害，作为政治原则的谎言，流放，725 假案……以及独裁政治下的教条主义的铁丝网和集中营的铁丝网。”①

当然，克洛德·鲁阿在这里描绘的时代面貌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的话大部分是真实情况。

* * *

有些作家和回忆录的作者，首先企图用人们在恐怖面前的恐惧心理来解释三十年代苏联人们的行为。例如，尼·阿谢也夫在他写的《忠于列宁》的诗中，这样描写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逝世时的情绪和感情：

……“为什么灵柩前那样拥挤？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为了深信不疑，亲眼看一看：
他死后留下了什么遗愿？
……然而，在遗体面前，
我们不知，我们将怎么办？
由于恐怖还象块石头呢
还是大声呼喊？”

对不久前发生的事件的这种描写是错误的，也是言不由衷的。当然，许多人，特别是接近斯大林的人们都怕他，因为斯大林善于使人们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他象一个雷帝。许多人怕内务人民委员部，怕镇压。另一诗人叶·叶甫图申柯在《恐惧》一诗中很形象地描写了这种恐惧心理：

“在那谎言春风得意的宫殿里，
我记得他们有权有势。
恐怖到处象一片阴影掠过，
渗透到各个阶层。

---

① 《自由报》1963年6月25日。

人们悄悄地百依百顺

一切打上了驯服的烙印。

那里是沉默——就要习于叫喊，

而沉默的地方，本来应当叫喊。”

原红军总参谋部一个处的处长B.A.诺弗布拉涅茨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了三十年代的情景，他说：“毫无疑问，这时起作用的是：在个人迷信年代控制我们一切人的那种复杂的恐惧心理。我们怕自己被指责缺乏‘警惕性’。我们怕自己违犯党的纪律，老同志运用他们的威信使我们感到有压力。我们怕自己被指控为犯有‘右倾’或‘左倾’错误，怕说我们搞‘右派和左派的联盟’。人们拿‘托洛茨基分子’这样的字眼吓唬我们，如同用‘大灰狼’吓唬小孩一样。我们最后又怕自己的平静受到威胁，怕紧张的学习时间充满对那些我们不明白的问题和疑问的分析。”作家A.彼西门内依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在复杂的、更确切地说、甚至是病态的过程中学会相信、学会坚定不移地服从，而同时又是值得怀疑的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逻辑中这大概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大概是与动物保护自己的本能相类似的一种东西。也许，这也正是最不能容忍的。在一切高调、广泛的推论、思想政治上的臆测的背后，在我的崇高的思想意识中隐藏着一个小魔鬼，这个魔鬼手舞足蹈，它就是最普通的恐怖心理。这个魔鬼并不信仰崇尚的原则。这个魔鬼也不倾向于当时习以为常的论坛上的无稽之谈。这个称之为‘保护自己的本能’的小魔鬼，它的面貌是丑恶的，它却又是天真而有远见的。它并不从事政治分析。在他的健康思路中生活智慧比在几十本学术书籍中还多。他对周围世界所持的怀疑论的态度被迫地隐藏了起来，因为这按常理也许最接近真理，但却只能把这些思想看成是庸俗的，甚至是反动的。”

726

还需要指出，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害怕遭到镇压的心理并不简单是保护自己性命的盲目的动物本能，这点A.彼西门内依在他回忆录里还继续谈了许多。有许多害怕现在被镇压的布尔什维

727 克，他们在沙皇统治的年代，勇敢地走向监狱，走向苦役营和刑场；在参加革命运动时，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在威胁着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害怕。可是在个人迷信时代这些人时常被一种害怕给抹得满身漆黑的心理控制着。因为多数苏联人民相信斯大林，相信他是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苏联人民在自己周围看到社会主义力量正在成长壮大，他们怕自己被排除在这个洪流之外，他们怕自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怕自己被人民唾弃。这是非常矛盾的感情的复杂的混合体，我们的文学暂时还没有充分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画家鲍·叶·叶菲莫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能够担负起再现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们的思虑和感受，那就必须是真正的、而且是天才的作家，人们当时是痛苦地感到迷惑不解，又渴望明白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怀着说不出的恐惧，同时也相信自己的健全思维；他们内心充满着期待，同时又感到灵魂的空虚的失望。怎样描写人们的状态——他们完全感觉到可怕的灾祸已经临头，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如何自救，他们如在恶梦中一样，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怎样描写人们的情绪——他们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而不可能作出任何解释，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也就不可能为自己作出什么辩解；他们已完全理解自己处境的可怕，明白已临到他们自己和亲人头上的可怕的危险，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装出一种样子，似乎没有任何使自己不安的根据，一切都很正常，他们还要保持一种精神焕发的样子和充沛的工作能力……"①

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文学家B.斯特拉达写道："斯大林在他的活动中，运用了社会主义思想，然而在我看来，他的活动无论从目的上或方法上来说，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整个被压迫人类以斯大林的名义为实现真正的和诚心诚意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他本人和制度）是 728 工运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非凡的人物，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这样的

① 《米·柯尔佐夫其人》（回忆集），莫斯科1965年版第69页。

荒唐的和充满血泪的矛盾的局势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说历史是狡猾的，而它的这种狡猾往往是很残酷的。"①

*　　　*　　　*

为了懂得斯大林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欺骗党和人民并使苏联人民相信国内存在着星罗棋布的法西斯地下组织，不仅必须回忆一下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任，而且也必须回忆一下三十年代中期及末期的严酷的"暴风雨前"的形势。

亚·波格达诺夫还在1907年(当时他是布尔什维克)在他的空想小说《红星》中说过：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因为取得胜利的那些国家还是"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甚至部分乃是资本主义前世界中的岛屿"，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将出现内部的困难。波格达诺夫预言："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阶级因为害怕失掉他们的统治地位，将拿出全部的力量去毁灭这些岛屿，他们将不断地组织军事进攻，并在社会主义民族的内部找到足够的随时准备出卖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是原来的大大小小的财产私有者。这些冲突的结果很难设想。甚至在那些社会主义得以坚持下来并取得了胜利的地方，它的性质，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长期的、在许多年里都处于被包围的状态，由于必要的恐怖手段和黩武主义精神而被歪曲……这远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② 遗憾的是，亚·波格达诺夫的许多预言和实际情况太近似了。

众所周知，不仅在整个二十年代，而且在三十年代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亚、非、美、欧各国几乎全是帝国主义统治着。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紧张工作的苏联人都很清楚，同法西斯的你死我活的战斗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迫在眉睫了。这在国内不仅形成了一种高昂的气氛，而且也引起了紧张的气氛。

729

三十年代，在人们的脑子里二十年代的尖锐而残酷的阶级斗争还记忆犹新。到处还有不少旧社会的残余，还有不少被击溃和

① 《复兴》1965 年第 45 期。

② 亚·波格达诺夫：《红星》圣彼得堡 1907 年版第 119 页。

被消灭了的剥削阶级的余孽。

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对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情绪的人们在城市和乡村组织了一些(通常是小而分散的)反革命团体。

帝国主义侦探机构反对我国的间谍破坏活动在这些年代也达到相当的规模,特别是法西斯国家。

这一切情况苏联人民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一切情况要求人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当然,三十年代的严酷和紧张形势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即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间谍,人为地煽风点火,挑起人们的狂热,特别是大规模地进行镇压。夸大我们敌人的力量,夸大敌对组织和侦探机构的力量,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普通苏联人民和多数领导干部很难区别那些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行为中的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他们并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所以在复杂而危险的三十年代的形势下,斯大林指控自己的政敌是间谍、他提出国内 730 存在着星罗棋布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苏联人民都会认为这是完全真实的。作家康·西蒙诺夫在注释1941年军事日记时写道:“从季米特洛夫案件到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止,我完全不怀疑同法西斯打这场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作为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文学家,我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以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为指导的。我也正是用这一不可避免性去解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去解释我们目睹的和参与了的那个高速度、紧张的工业化。也正是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里,我们力图寻找1937—1938年镇压的答案。

不管怎样,当我在1937年春天知道对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其他军事将领所进行的审讯,我这个在二十年代还是少年时不止一次见到过图哈切夫斯基的人,虽然感到震惊,但是我相信我所读到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我相信确实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军事阴谋,参加阴谋的人们都和德国有联系,而且他们还企图在我国发动法西斯政变。当时我对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另一种解释。”①

多数苏联人不仅相信了我国存在着“第五纵队”，而且斯大林提出的，说我国存在着地下组织网的耸人听闻的谎言，也使人们大为震惊。他们不仅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且更为自己的祖国、党、革命的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对“反革命分子”和“人民敌人”义愤填膺。换言之，我国已产生了使斯大林更容易实现其罪恶居心的心理上的气氛。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的残忍和多疑心理不仅没有引起许多主观上都是真诚的干部的抗议，相反，他们把这些性格看成是正面的品质。

一些共产党员现在称斯大林为反革命，对 1937—1938 年事件总的评价，说成是反革命政变。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说明他们对待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持有简单化态度。 731

实际上斯大林，不是简简单单地阻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关于“阻挠”这一广为传播的说法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在许多情形下，斯大林和他同伙的行为把革命拉向后退，迫使我们远远地离开了十月革命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样看来，从某些方面说，确实可以称斯大林为反革命。不过在回顾三十年代全部复杂而矛盾的现实情况时，我们看到，斯大林在 1936—1938 年期间，甚至在消灭一切他不称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笼络那些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人们，置他们于自己左右的时候，他仍然是继续主要依靠那些被他欺骗的革命群众。斯大林把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的伟大热情用来达到他个人自私的目的。这是斯大林的行为之所以能成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的残酷性之所在。他把他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行为和他的教条主义总是用非常革命的语言掩盖着。正是这点粉饰了他的行为并妨碍了我国劳动者看清楚他的罪行。就是说，斯大林在他反对那些所谓“人民敌人”的斗争中，利用了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巨大革命热情，利用了苏联人民想尽快消灭掉党和革命的一切敌人的愿望。

---

① 康·西蒙诺夫：《军事日记》是在1966年第10期的《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但是本期杂志没有出版，被销毁了，只保存了几份“样本”。

这一切使斯大林得以比较轻松地消灭掉自己的政治敌人并巩固了个人权力。但是人民的这一支持并不允许他的行动超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范围，不能允许他把主要的革命成果全部消灭干净，然而，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即使象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也不能在我国维持其统治。斯大林在欺骗了人民之后，向革命老干部开了枪，把他们说成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不能公开反对革命本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列宁和他的党。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历史车轮向前发展（如果就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说），但他不能让历史车轮倒转。

732

当然，斯大林用暴力篡夺了权力，从这一点说，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看成是国家政变，但是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政变，它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进行得十分缓慢，而且持续了许多年。这一政变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是以保卫革命和社会主义为借口的，尽管它在客观上是走向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目标。这一政变消灭了革命的某些成果，但它并没有把消灭一切主要的革命成果和复辟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正是这一点帮助了斯大林去继续欺骗人民群众，而且他得以相当牢固地把全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　　*　　*

三十年代严酷的"暴风雨之前"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老一辈的当时还是党和国家的干部也在思想上麻痹了，他们看见了党内和国内正在发生着极不正常的现象，看到完全无辜的人们被消灭掉了。这些干部看到对所谓"人民敌人"提出来的指控是假的。但是在我国四面八方被真正敌人包围着的情况下，当我们的国家处于象一个被包围的堡垒的情况下，这许多干部不能也不愿意站出来反对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行为，看来，他们认为，在敌人面前共产党员不应该暴露自己内部的斗争。格·波梅兰茨在他写的短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道："斯大林已牢固地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了，所以打击斯大林就等于打击苏维埃制度。然而苏维埃制度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和法西斯发生冲突。这并不

是由于斯大林不喜欢希特勒，也许在1941年以前，他感到希特勒对他有某种奇怪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制度本身比斯大林的意志更为强大所形成的逻辑的结果。因此，不能在希特勒面前，即或是为 733 了医治病痛去打击苏维埃制度以及对它进行手术。"①

格·波梅兰茨在他的短文中，同时谈到了战时和战前的年代。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论点只能承认一部分是公正的。出现了这样的抉择，选择斯大林还是希特勒，这样的情况只能而且在战争年代的确出现了，因为那时需要一切反希特勒的人们团结起来。甚至在白俄侨民面前也出现了一个选择的问题。这时我国一些最凶恶的敌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站到希特勒那方面去了，另一些人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侨民中以米留可夫为首的许多著名人士都站到苏联军队方面来了。

如果说一些侨民在战争年代赞成了斯大林②，那么那些反对斯大林，但是坚定地站在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方面的苏联人就更必须这样做了。但是，在战争前的年代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抉择，至少，这一问题还没有这样尖锐地提出来。三十年代斯大林犯下的罪行是如此之大而骇人听闻，如果人们知道这些罪恶的话，那末，就是说存在着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来的危险，他们也不会再支持斯大林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几乎没有什么共产党员 734 当时知道这些罪行的实际规模和懂得它们的危险性。因此这些人虽然痛苦地思考国家命运，但这通常没有引起什么具体行动。一

---

① 格·波梅兰茨：《历史人物的道德面貌》，引自格·波梅兰茨的《未发表的材料》第223页。

② 米留可夫在战争年代主张苏联军队取得胜利这样的事实，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说明他的这种选择罗列的道理是很有意思的，他写道："为了建立统一的党，斯大林摆脱了自己党内的竞争者，然后为自己提出摆脱党本身的任务，使自己凌驾于党之上……当他野蛮地对付了那些1917年的、和他平起平坐的革命的老思想家之后，他笼络了一批有专业知识和实际才干的人。这就是'独裁'专政的形式，这一专政形式毫无疑问在俄国国家演变中是新的一步。"（文章是在1942年维希政府时代法国的一家报纸上发表的。）

位老布尔什维克——他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工程的参加者，后来许多年里，被囚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他告诉本书作者说："当然，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如此居心叵测。但是我们在自己周围还是看见了存在着许多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我们为什么没有马上反对它们？我们在三十年代仍如在战场上的感受一样，似乎在和整个旧世界作战。我们认为：战时就应该象打仗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骂领导的错误，但不是在打仗的时候，而应该是在战后骂；然而，当战斗正在进行中，在这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无论如何都要遵守铁的纪律。我们认为下面提到的现象是自然的，那就是说，我们对敌人取得的战果往往保持沉默，而对我们的、暂时还不算大的胜利则往往从多方面加以夸大。战争中不总是这个样子吗?!"①

共产党员叶·弗拉吉米罗娃在她的一首名之为"监狱"的诗中，在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她的说法有些不一样：

"……害怕破坏
　习惯思想的体系，
害怕看到
　赤裸裸的真理，
为了保持心灵的宁静，
为了逃避思想的分歧，
我在寻找着根据。

我胆怯地将头
　藏在翅膀下面
我驯服地受着苦难，

① 连已经从苏联被驱逐出去的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初期也写道：在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官僚化平衡的失调，会对反革命有利，不能作为战斗号召提出"打倒斯大林"的口号。

我们说：‘让我们去历尽千难万险
　我们都会原谅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故土家园。’

……啊！原谅
原谅谁？原谅什么？
如果是祖国需要我们
　承担这种种苦难，
我们会毫不踌躇
　接受任何熬煎、
　乃至于监狱、刑场，
不会向任何人乞怜。

当苦难、危险
　高悬在祖国的上空，
当我们处在威胁我们的
　战争乌云的下面，
我们不应该原谅，
我们必需作出回答：
　何处是真理？何处是谎言？
　哪里是康庄大道？哪里是万丈深渊？

我们必须作出回答：
　整代人的可怕的死亡，
　竟为谁所需要？
我们的祖国，
　在战斗中，在工作里
　严峻而温柔地

培育了他们，
为此，花费了韶光二十余年。”

但是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思考席卷全国的镇压运动可怕洪流，正确地想到斯大林篡夺了权力，想到过去一些政治运动和斯大林个人迷信都是错误，——这一切思考在更大的程度上出现在犯人中间，而不是出现在享有自由的人们中间。因为只有人们被监禁起来以后，才突然看到了斯大林专政的可怕的反面的恐怖运动的异常巨大的规模。正如波兰作家叶日·列茨所说的那样，“有些思想是在被押解的刺刀下才出现的。”

五、集中化和长期执政

还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化的原则之上的，这也正是党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问题，即党内民主和集中比重的问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许多争论的中心。当时孟什维克中有不少人反对党内有非常严格的组织，反对党的中央机构扩大他们的权力，反对把党员变为“齿轮”和“螺丝钉”的民主集中制，诸如此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集中制还是波拿巴主义》。[①] 但是列宁坚决驳斥了这类抗议，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涣散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

736

必须设想，列宁是很明白过分集中的危害性的。但同时他在同孟什维克争论中不断指出，就是由于有集中化和纪律，而其重要性不亚于正确的政策，党才有可能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

十月革命后的前几年中，党的集中化不仅被保存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我们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严

---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3卷第81—93页。

格的集中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当时抵挡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必须把被已经消耗殆尽的遭到破坏的国家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以对付敌人，在这时期政权的集中和对民主的某些限制不仅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是必须的。

卢那察尔斯基在1921年写道："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革命思想是和自由思想联在一起的……然而在实际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建立自由的制度，也不能够建立这种制度。革命就是内战，而且不可避免地随革命而来的是对外的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把结束一切战争和取消一切国家政权形式作为自己最终目的的革命，在它的初期也必须加强某种军国主义的精神，强化国家权力的专政，甚至可以说是强化政权的警察性质。"①

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最初几年里，也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制的原则之上的。列宁在起草各国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写道(第十三条)："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②

737

当然，可以提出疑问——把在沙皇俄国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些布尔什维克集中化的因素搬到共产国际来，并在那里实行的过分集中化到底其合理程度如何？这些共产党都是在另一种政治、经济和历史环境里进行自己的活动的。但不能不指出，列宁和我们的党都把我国对党内民主的许多限制看成是临时的，是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着的。所以毫不奇怪，国内战争结束后，党马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用以削弱党和国家生活的集中化，并发展全民的和党内的民主。尤其是，在俄共(布)第九次全

① 《出版与革命》杂志1921年第1期第3—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85页。

俄代表会议（1920年9月22—25日）的决议里规定了扩大党内辩论和批评自由的措施。半年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指出国内和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许多消极方面，并规定了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新措施。十大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里说：在党组织中的过分集中和缩小党组织是集体机构的作用，会使党朝着官僚化和脱离群众的方向发展，会使党朝着滥用不必要的强制方法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党的精神生活的削弱。所以党的十大认为有必要实现符合于向和平建设过渡条件的党的改造，扩大党内民主，恢复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①

738

理所当然，当时根本没有提到过彻底根除任何党和国家领导的集中化。有过这样的社会党人，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集中领导的某种自治公社的结合体。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无论如何也不适于我国的条件。苏联曾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社会主义堡垒，所以它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最残酷的冲突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国一定的政治集中就是在国内战争胜利后也是不可避免的。某种集中的必然性不仅出自政治原因，还出自经济原因。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就不能迅速建立发达的现代工业，因为实现工业化需要动员其它经济部门的积累和人民的储备。现代社会的巨大而越来越增长的经济机器为集中制建立了客观基础，这架机器要求有高度工作效率的、统一的、有威信的、内行的坚强领导。

当然，一切事物都要求作得适度，也包括有关集中化的形式和程度的问题。现在，写我党历史的一批著作，甚至包括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持敌对立场的著作，这些著作企图从经济角度为斯大林的集中领导方式加以辩解。我们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下面的话："用很快的时间进行快速的经济发展要求整个社会进行这样的集中，使之完全排除长期培养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和富农逐渐

739

① 《苏共决议案……》第1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517—519页。

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这是因为要在极端尖锐的国际关系条件下挽救民族于危亡。在这方面斯大林是正确的，他修正了列宁和布哈林的计划并很快废除了新经济政策。正是因为这一点，党政等级制度以飞快的速度形成了，它的一切措施是严峻而强硬的。但这只是集中化的行政管理的必要制度的操纵杆罢了。"①

这样的看法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显而易见，在新经济政策还远没有完全发挥出它的优点以前就把它废除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错误无论如何也不会加速我们的工业发展。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苏联的条件下，集中化确实是必要的。但是这里我们主张的不是盲目的、极端的、包罗万象的和毫无限制的集中化，而是善于把集中化同地方积极性，同个人创造性，同发展独立性结合起来。这样，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就需要寻找一种办法，把集中和民主，国家纪律和个人自由，服从需要和自由选择合理地结合起来。但是斯大林没有找到，也不去寻找这样的合理结合。所以二十年代前半期开始的我国社会和党的生活民主化的工作，后来没有再继续下去了。相反，斯大林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论点为掩护，不断地、片面地坚持要加强集中制，并逐渐地把越来越大的权力夺了过去。三十年代的镇压结束了夺权的过程，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则起源于更早的年代。我们很清楚，由于镇压运动，我们的集中制达到了专制主义的程度。但是我们不是随时都看得清楚：这些镇压活动只是在斯大林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已经超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能允许的任何合理的界限时，才能实现的。掌握过分的权力可以腐蚀掉最好的人。如果权力集中在野心家和虚荣心很强的人的手里，集中在目光短浅、心地阴险的人手里，这样过分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滥用权力和犯罪。 740

长时期的当权也助了斯大林一臂之力，大家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里的许多政党中，党的领导是由某一领袖终身任职的。但是

① 我引用的手稿是以《瓦尔加院士的信》的名义传播着的材料。已去世的瓦尔加院士和这封信无关。这一手稿的真正作者不详。

在许多国家内，对国家高级职务，往往也对党的职务规定了一定的期限。这一传统来源于罗马共和国，在那里两个执政官只当政一年，而且不能连任。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过去没有规定党和国家领导定期更换的制度和作法。

列宁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是我们党的连任领袖。但列宁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他是天才，是政治舞台上至少是百年以来不曾有过的天才。所以给列宁的继承人规定执政的另一程序和期限就更有其根据了。① 可是 1924 年以后，我们 741 党内仍然保留了这样的秩序，即对这个或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当权期限没有作出任何限制。这就使斯大林这样的人有可能为篡夺国家全部权力作好准备，并一个接一个排挤掉自己的对手。

也不能不提几句有关我党对国内政治活动的垄断权问题。

大家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坚决反对建立一个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一政府应该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

① 现在我们观察社会心理学各部门的迅速发展，正在研究群众、社会和职业团体等的心理学。对掌权的心理学，即领导的心理学，对其正常和病态的形式，看来都应该加以分析和进行科学研究。阿·马·高尔基已对此问题开始有过注意。1934 年他同一批作家谈话的时候，曾力图在“领袖”和“领袖主义”这两个概念之间划一条界限。高尔基说：“作为了解实现人民提出的目标并且找到一个实现目标最短的途径的领导人、带头人和领袖是必须有的。人民提出了目标，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是‘领袖’个人提出目标，不是为达到个人的目的！劳动人民的领袖从来都是具有高尚的牺牲精神的典范，我敢断定，人民领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的谦逊，他痛恨空话连篇和装腔作势。可是假领袖喜欢荣誉和颂扬。身居高位使他陶醉，他如同女巫一样，丧失了自己剩下的最后一点智慧……这是很复杂的现象”。高尔基继续写道：“但是毫无疑问，领袖主义是心理的病态，这时利己主义如同肿瘤一样不断在扩散、毒害和腐蚀着人的意识。患领袖主义病症的人，个人的一切会膨胀起来，而集体的一切在萎缩。毫无疑问，领袖主义是一种慢性病。它还会不断发展下去……患了领袖主义的人继而患自大狂，接着如同幽灵一样，迫害狂就会出现……原来是人，现在已经没有人的样子了！”（见伊·什卡巴著的《和高尔基在一起的七年》一书，1964年版第249—250页。）显然，在研究领导主义心理学时应该考虑到治疗各种病症的方法，其中包括治疗患有极权欲病的那种极重要的方法，即定期更换当权的人。

代表参加。但是列宁当时并没有提出一党组成的政府。正是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底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人民委员会议。此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政府的十八个职位中得到了七个职位，包括土地、司法、市政管理和地方自治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职务。十月革命之后也并没有禁止许多其它党的政治活动。直至1918年6月14日，由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决议，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一切苏维埃组织中开除全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1918年7月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对他们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但就是在被从苏维埃组织开除之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还继续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存在于苏维埃之外，并且是公开进行活动的。况且，当孟什维克于1918年底以中央的名 742 义提出反对侵略和同资产阶级合作并放弃了召开立宪会议口号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废除了对孟什维克的1918年6月14日的决议。1919年2月的同一决议中对于提出主张反对侵略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废除了原来对他们采取的措施。

1919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曾起过领导作用的所谓的伊尔库茨克"政治中心"，起来坚决对抗高尔察克军队。崩得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一最高纲领派也起来反对高尔察克。我们的党并没有拒绝同这些团体的暂时合作。1919年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党代表大会和会议在苏维埃共和国是公开举行的。

现在分析弗·伊·列宁在1917—1921年期间的讲话和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根本没有设想将来只保存一个党—布尔什维克党，并完全禁止其他任何政党的政治活动。相反，列宁指出，国内的基本革命改造结束后应该进行自由选举。列宁不怀疑在这样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会获胜，但是列宁认为其他党派在选举中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纲领，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国内战争、破坏和饥馑，这一切推迟了这一选举的完全实现，但是并没有排除实现这样的选举。

可是在苏维埃俄罗斯及其它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的各党派的发展在国内战争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1920年左派社会党，最高纲领派以及民粹—共产党人等党派通过了自行解散的决议。

1920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鲍罗齐巴派在乌克兰被吸引到乌克兰共产党(布)内。1921年崩得分子的左派也决定参加俄共(布)党。

743 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党派后来的历史，需要认真和客观地加以研究。我们看到，这几个党在二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们制订不出多少是固定的纲领和建立稳固的组织。这些党的相当一部分左派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有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由于看到布尔什维克是执政党，出于个人野心而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多数组织要求同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斗争。例如，1919年合法化了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在它的第十届大会上(1921年8月)宣布："关于用革命方式推翻共产党专政问题以其铁的必要性具有的全部力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一问题已成为俄罗斯劳动民主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性命攸关的问题。"① 部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了喀琅施塔得反革命暴动。在唐波夫省社会革命党组织拒绝服从党的纪律，支持了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领导的富农暴动。无政府主义党支持了马赫诺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切武装叛乱都用武力进行了镇压。契卡机构也砸烂了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秘密工会和罢工委员会的企图。总而言之，应该说，在我国同反革命的斗争采取了如此强硬的形式，使不仅同资产阶级政党，就是同小资产阶级党(它们常常持敌对的态度)的任何妥协，看来，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胜利之后也是不可能的了。可是应该公正地指出，苏维埃政府对某些"社会党"的政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① 《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第1期第142页。

从这个角度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进行的对右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案件的公开审理。大家知道，列宁从1922年5月底起，整个夏天都病得很重。看来，案件审理的准备工作是在总书记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的主席是格·皮达科夫，公诉人是尼·瓦·克雷连科。 744

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案子引起了一系列的严重抗议，包括阿·马·高尔基在内。必须指出，到1922年初为止，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犯下了一系列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罪行。只提一下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于1918年企图暗杀列宁，他们暗杀沃洛达尔斯基之事，1918年夏天社会革命党政权在伏尔加河区域犯下的罪行，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的罪行，就已经足够了。尽管如此，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赦免他们的罪，并允许右派社会革命党成为合法的政党，于是他们在莫斯科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人民的事业》。可是，1920年国内许多州又开始发生富农暴动事件，其头目又基本上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920年在社会革命党的会议上又发出了恐怖的号召。1920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建立了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在筹备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社会革命党人，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然，这一切事实已足够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送上苏维埃的法庭。当然，苏维埃法庭应该仔细地和客观地分析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头头们提出来的一切指控，必须把有意识的犯罪行为和一些政治上确实是糊涂的人区分开来，必须把列进起诉书中的罪行，一个一个搞清楚，社会革命党人每一个头脑人物应负的个人责任(这个党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集中化的组织)。遗憾的是，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案件审理，在许多方面违背了这样的做法。看来，为了给这个案件赋与更大的政治上的意义，审理案件的组织者甚至借助了阴谋手段。被告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真正的头头，如：阿·郭茨、E.季莫菲也夫、Д.顿斯基等人，他们企图为

745 自己党的活动辩护并想为它开脱责任，然而被告中也有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头面人物，一些被告也有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革命党的人，只是作为社会革命党人暴露身分的。这些人说什么承认什么，他们同意起诉书中指控的任何罪行，而且俯首认罪，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桩罪行。其中有一个"被告"名鲁菲娜·斯塔维茨卡娅(即法伊娜·斯塔夫斯卡娅)，她并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一共产主义者，她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同许多著名布尔什维克人都很熟悉。1922年她提出要求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请求。鲁菲娜·斯塔维茨卡娅的丈夫，老布尔什维克B.巴兰钦科在自己的未发表的回忆录①中证实，有人建议她在审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时起来"揭发"，作为对自己的一种"考验"。鲁菲娜同意了这一建议。今天，她的丈夫却想为她的作法开脱责任，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桩可耻的行为。巴兰钦科在自己的手稿中是这样写的，他说："1922年对鲁菲娜·斯塔维茨卡娅来说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她年轻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总是忙于想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时她不仅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要献出对每一个革命者来说，是某种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需要献出的是革命者的荣誉，老革命和老政治犯是持这种看法的。服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意志，她不得不尽自己的力量参加审理这次重大的案件的工作。这次案件揭发了，并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了当时最凶恶、危害最大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不久，她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在这以前，她曾尽自己的力量为党工作。"

其他一些被告的行为及供词也值得怀疑（如严格隔离监禁的746 Г.谢苗诺夫）。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中说："至于谢苗诺夫、科诺普列娃、叶菲莫夫、乌索夫、祖波科夫、费多罗夫-科兹洛夫、彼列文、斯

① B.巴兰钦科：《恢复名誉。法伊娜·斯塔夫斯卡娅的生平及牺牲》(手稿)。

塔夫斯卡娅、达舍夫斯基，最高法院认为：该被告在犯有严重罪行时，乃系无意所犯错误，曾认为自己乃为革命利益而斗争……该被告完全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的严重性，法院完全相信，他们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为苏维埃政权勇敢地、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故法院请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免除对他们的任何惩罚。”果然，在审判结束后，斯塔维茨卡娅被释放了，派到克里米亚去工作并接受她加入联共（布）。她后来任历史博物馆的馆长，1937年被逮捕和被处决了。

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多数成员被判处枪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判决，但延期执行。1924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把极刑判决改为五年监禁。

这一案件结束之后，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遭到禁止。从此时起，只有联共（布）党是唯一能够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的政党了。

当然，如果某一个党在人民中间生了根，任何禁令也不会把它消灭掉。但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已经同群众失去了过去的联系，所以他们多次企图恢复秘密活动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这两个党实际上被分裂成为许多小组，它们没有统一纲领和统一策略。无论在社会革命党或孟什维克党内，这时都有一部分从主观上说是诚实的革命者，他们确实向往社会主义，但他们所设想的建设道路和性质，与布尔什维克党有所不同。这些党的传单和各种秘密出版物，在国外出版，国内秘密发行，在这些报刊中（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导报》，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的俄罗斯》），都对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一些完全公正的批评意见。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在赞同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同时，反对斯大林在合作化中推行的方法。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反对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反对对技术专家进行镇压，反对“工业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的诉讼案件。当时，大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恐怖政策，他们自称是“有道德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们认为，

747

达到某一目的不能不择手段，而应该采取能够培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那种途径。他们也反对任何专横，甚至反对国家，他们继续把拉夫罗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吸取自己思想的源泉。

可是，尽管我国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形势异常艰难，尽管城市和农村大部分居民当时充满不满情绪，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中的宣传和鼓动毫无成效。他们的出版物份数很少，他们的宣传员很容易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捕获，他们的秘密组织在成立几个月后即被取缔。这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还不能对人民群众感兴趣的和关心的问题，给予满意的答复。他们每个党过去所犯的罪行和错误成了他们沉重的包袱，人民总是把他们的活动同可恨的临时政府联在一起，同企图暗杀列宁和十月革命其他领导人联在一起，同国内战争期间在北方和伏尔加地区进行恐怖活动联在一起，以及同那些和资本家进行妥协的行为联在一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批评布尔什维克时，谩骂了十月革命及苏维埃政权取得的巨大社会成果。因748此，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孟什维克在二十年代没有得到群众的同情，到三十年代初时，这些党的本来就不大的秘密组织，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虽然我们能够找到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其他民主党问题上的一些弱点，但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垄断权是历史的产物，而这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苏联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条件。然而，当我们谈我国历史形成的一党专政的某些长处时，我们同时不能不指出一党专政的某些不好的趋势。这些趋势来源于一党垄断的长期存在，它们妨碍着公开揭露我党在领导国家方面的许多严重错误和缺点。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执政党的领导对待自己活动的责任感不可避免地会降低，他们的官僚主义的蜕变，和甚至转变成专制管理制度，毫无疑问是很容易的。斯大林统治的这种演变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毫不奇怪，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欧共产党都宣布自己反对一党制。

六、斯大林歪曲了列宁对党的统一的理解

在分析斯大林做为联共(布)领导人的活动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歪曲了列宁对党内纪律和统一提出的要求。

如果对党内纪律这一问题赋予某种压倒一切其它问题的意义，把它同共产主义信仰和党的良心，同认识党中央的政策有多少是正确的，多少是错误的等问题分开来，那么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在自己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举了革命党的纪律得以能够实现的必要条件。这是，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政治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写道："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①

749

如果把共产党的统一说成是：不看具体历史环境和条件以及不看某一个党的领导人在某一时期执行了什么政策，就完全和绝对地禁止党内一切派别和思潮的存在，这也是错误的。

理所当然，统一会给任何政党以很大的力量，因为在统一的情况下，所有的人会统一行动。但是还有这种情况，缺乏对问题辩论和争论，党内没有不同的思潮，——这种党的统一并不说明党有力量，而说明他的软弱，特别是在某一政治领袖或形势的影响下，全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7页。

体共产党员前进的方向是走错了的时候。

正是列宁坚决反对对党的统一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解释。

还在 1911 年列宁在一篇针对托洛茨基仅仅在口头上反对派别活动时写的《党内的情况》一文中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刚刚组织了自己派别的人们大喊大叫反对派性，这真是一片空话。他们是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即空喊反对派性，只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重要的问题，从党内或者说反党的各派别的工作内容上引开。"① 我们也知道，还在 1912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会议时，就提出了（什瓦尔茨曼提出的）谴责党内各集团之间的斗争的提案。正是列宁提出反对这一提案。列宁说，不能一概反对党内的斗争。我们只应该反对非思想性的斗争。如果一概反对集团之间的斗争，就等于也谴责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斗争。②

750

还在列宁领导我们党时，我党总是有各种派别和集团，而当时这被认为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现象。列宁在争取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参加统一战线时，从来没有实行宗派主义政策并不要求把基本上同意党的纲领，只是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同党的领导人有分歧的那些同志从党内开除出去。只是到我们国家结束了国内战争之后，到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当所有困难和矛盾激化到极点，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分裂已经实际威胁我们时，列宁才起来反对当时在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的没有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辩论和争吵，并建议通过关于党内统一的专门决议，决议规定了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的要求：解散当时存在的、在已被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否定过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切党内派别和宗派。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期，非党的自发势力很容易受在俄国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影响。我们应该记住，从一定意义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20 卷第 300—304 页。列宁此文 1956 年才首次发表。见《共产党人》杂志 1956 年第 5 期。

② 《苏联历史问题》1965 年第 2 期第 34 页。

上说，内部危险要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所带来的危险还大，所以我们必须表现出不仅是形式上的团结，而且是更加深入的团结。为了造成这样的团结，我们非要通过这样的决议不可。”①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包括其秘密的第七节（即允许在特殊情况下甚至连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也开除出党），常常被斯大林用来对付党内的争权斗争。必须指出，当时，斯大林把这一决议已经歪曲到了极点。

首先，在反对宗派和他们的宗派主义纪律时，列宁关于党内统一的决议，并没有取消任何一个党员讨论和批评党的总的方针和个别政策的权利。这一决议也没有取消每个党员在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上保留自己的个人意见，甚至于保留与中央观点不同的意见。这一决议不仅没有取消党内辩论和争吵的可能性，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党内有这种争论。②

列宁在反对宗派时，特别是在反对“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时，并没有号召这些反对派集团的代表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而只是建议他们停止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广泛宣传自己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出版专刊和小册子——这是另一回事。“在不造成非常形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搞清楚，党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战斗的政党内部的思想宣传还是在专门小册子中交换意见……有些理论家常常给党提出有益的建议。这样做是需要的。我们要出版两、三本大的专集，这样做也是需要的。但是，这样做难道等于思想宣传吗？难道这等于不同纲领之间斗争吗？难道能把这样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吗？”③

---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21 页。

②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72—573 页。

③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523页。

752 第二、列宁在建议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决议时，还专门强调说：这一决议只适用于党目前所处的时期，只适用于当前的分歧，列宁坚决反对把本决议的意义扩大化。当达·波·梁扎诺夫建议在关于党的统一决议里写上专门一节，说明决议不仅谴责宗派活动，而且今后要禁止按政治态度实行选举大会代表时，正是列宁拒绝了这个建议。列宁在大会上说："我想，很遗憾，梁扎诺夫同志的这个愿望是行不通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们不能剥夺党员及中央委员向党提出问题和意见的权利。我不能设想，我们怎样才能办到这点。我们本届大会不能用任何办法去束缚下一届代表大会的选举。假如说，今天出现象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到那时，也许要按政治态度进行选举……如果事情涉及引起根本分歧的话，难道能禁止把问题提交给全党讨论吗？不能，这种过份的建议是行不通的，我认为应该否决。"①

这样，就不难看出列宁关于党的统一的真正理解同斯大林对十大决议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差距是多么大啊！在这里我们且不提列宁对党的统一的看法无论如何不是指某个人的领导，而是指集体管理党。而党的集体领导必然要求经常交换意见和批评错误。

* * *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在二十年代初期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但是这个决议并没有挡住后来的年月党753 内出现新的严重分歧和新的反对派。几乎一切反对派在我们党内是公开存在的，和他们的斗争通常也是公开进行的。当然，从一开始，就有人在对付这些反对派时，经常企图别有用心地和教条主义地去解释十大决议。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3—1924年对付托洛茨基分子时，就是这样作的。例如，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党的骨干会议的讲话中谈到托洛茨基分子的时候说："如果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540页。

你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能把宗派和小组织公开化的时候了，那么你们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们认为，这一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永远不会到来(热烈的掌声)。这一时机不会到来，因为这一问题和出版自由以及和整个非无产阶级的居民的政治权利问题等有关系。谁不懂这些，在这一总局势下谁就会不理解一切事物。"①

季诺维也夫提出的这些极端的有倾向性的公式（这些公式远离了列宁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解），后来就被广泛用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派及"联合"反对派。

尽管如此，二十年代中期大多数党的骨干还是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时，党员有权利批评党的上层领导，批评联共(布)中央的政策，即有权建立反对派。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1926年6月23日关于拉舍维奇问题的决议是很典型的。

决议说："党本来希望，反对派在实际工作中会认识和改正错误。这样，在出现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时，反对派完全可能通过正常的党内途径维护自己的观点。尽管反对派还继续坚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指出的错误看法，而且把明显的宗派不可调和的因素带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来，但是这是反对派在党中央内部用正常的党内途径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法，因此没有引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能否保持团结问题的严重不安。 754

2.但遗憾的是，反对派在自己斗争中并没有坚持用合法的方式，在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观点。最近以来，他们转向直接违犯十大和十四大所通过的关于维护联共（布）统一的决议。他们在同党斗争中企图建立秘密的宗派组织，把它同党对立起来并把矛头指向党的统一。"②（加重号是我加的。——罗·麦·）

我们在这里不去分析这一决议提出的谴责反对派秘密活动的

① 格·季诺维也夫：《我们党的命运》莫斯科1924年版第95—96页。

② 《苏共决议案……》第2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161页。

实质。我只想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不否认反对派的存在，而且承认了在“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在中央委员会和党内有维护自己观点的合法权利。

然而后来，当斯大林巩固了他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之后，他就坚决改变了他对党的统一的解释。斯大林成为局势的主宰之后，他就不仅越来越反对某一个反对派的言行，而且一切反对派他都统统要反对。“反对派”的概念越来越包含着不祥的意思。党员的自觉纪律被盲目的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所代替。党，党的中央和总书记都不可能犯有错误，这样的信念被灌输进全体党员的头脑中去。因此，任何反对派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所以最后，归根到底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在我党内的代理人。这显然是对列宁的决议完全错误的解释，它在我党历史中起了非常可悲的作用。三十年代初期，以斯大林主义形式出现的机会主义恰好在我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党的统一越来越被一种情况所代替，即党的统一就是全体党员无条件地完全服从党的总755 书记。共产党人的统一团结的口号用教条主义去解释，成为斯大林巩固他在党内和国内个人专政及粉碎国家和党领导中的列宁分子的重要手段。这样，共产党人的统一团结的伟大口号实际上被斯大林利用来分裂党，砍掉和消灭他所不称心的一切领导干部和党员。

七、斯大林亲自监督惩罚机关

斯大林建立起来的独裁专制制度真是异常复杂和铁筒一般巩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斯大林在进行大规模镇压时，首先依靠的是被蒙骗的劳动者群众。中央和地方的党和国家机构也是斯大林的最重要的支柱。然而，也不能忘记，斯大林亲自监督的专门的惩罚机关在个人迷信时代起了特殊的作用。正是这些机关成为三十年代中期落在我国、我党的头上的这一史无前例恐怖运

动的主要工具和执行者。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政府就建立了专门惩罚机构（全俄非常委员会）。全俄非常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1917年12月召开的。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称这一新机构为同反革命和怠工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内战时期(1918—1920)的活动的规模非常大，特别是前沿地区的非常委员会机构的行动是最坚决的。那时的非常委员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是什么与审判或侦查有关的机构，而正是军政惩罚机构，它们的任务是发现内部隐藏的敌人并消灭或孤立他们。非常委员会的机构必须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上发现和消灭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正如前线的一个士兵一旦在对面发现穿着敌人军装、手拿着武器的敌人就马上 756 要杀掉他一样。

全俄非常委员会保密局局长，菲·捷尔任斯基的亲密助手马·扬·拉齐斯(苏德拉布斯)，1921年在解释全俄非常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能时写道："非常委员会不是侦查委员会，也不是审判委员会，也不是法庭。这是一个战斗机构，是在内战前线活动的机构，它在自己的斗争中使用了侦查、审判、法庭和军事法庭的方法，也使用武力。它不是去审理敌人，而是打击他们。对任何在敌对营垒中的、手执武器的人、对那些丝毫无益于我们的人，它不会去饶恕他们，而是把他们变成齑粉……然而，它也不是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进行杀头的断头台。不是的，它或者是不经审判就地把敌人消灭掉，或者把他们关进集中营，使之和社会隔绝，或者在需要进一步作详细调查和公开案件时，提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它只是搞清楚该人是否有害和他对苏维埃政权危害的程度，并以此决定把这个人是消灭掉还是把他与社会隔绝，使他不能为非作歹，并且防止他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活动。我们如同犹太人一样，是在不断地受敌人进攻的威胁，不断地受敌人狙击的情况下建立未来世界的。非常委员会是保障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人能从事和平劳动，在国内捍卫着苏维埃政权，使国家免遭一切公开和秘密的反革

命分子的侵害。"①

总的来说，全俄非常委员会的活动对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和巩固是必要和有益的。但是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和滥用职权的行为，这一点可以从上面引证过的马·拉齐斯写的小册子中看到。例如，拉齐斯对"反革命分子"概念的解释得太广泛了；拉齐斯写道："苏维埃政权的三年斗争史清楚地证实，现在存在的已经不仅仅是个别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整个阶级都成为反革命的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首先，整个大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是在小资产阶级中也隐藏了反革命分子，而且，主要是从这个阶层中雇用了从事积极活动的，活跃的反革命力量。军官学校的学生、旧军官、教员、大专学校的学生及知识青年——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敌人的战斗力，白俄军团是由他们组成的。"②

757

把所有的旧教员（见拉齐斯写的小册子第 24 页）都归到反革命分子的这一广义的反革命概念之中的解释，往往会导致滥用职权。拉齐斯本人在他写的小册子里第 11 页上写道：在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不仅会遇到"性格软弱的神经衰弱的人"，有时甚至有骗子、乃至于刑事犯，他们用非常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名义敲诈勒索、招摇撞骗，装满自己的腰包。"我们已经知道，正是在国内战争年代象贝利亚和巴吉罗夫这样的个别冒险家和个人野心家钻进了惩罚机构。

列宁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也不止一次地批评全俄非常委员会的错误。例如，他在《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一文中写道："所谓政治上不信任，就是不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重要职位，肃反委员会要细心地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卫匪帮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代表人物。（顺便说说，也不一定要谈到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拉齐斯同志在喀山《红色恐怖》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谬论；

① 马·扬·拉齐斯：《同反革命斗争的非常委员会》莫斯科 1921 年版第 8 页。

② 马·扬·拉齐斯：《同反革命斗争的非常委员会》莫斯科 1921 年版第 13 页。

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杂志第1期第2页上写道：'在处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力或用言论来反对苏维埃的罪证'。)"列宁继续写道："在政治上不信任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参加管理和建设工作，是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无穷祸害的极愚蠢的事情。谁想把孟什维克说成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谁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资本主义文明的、在大资本主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除了柯卢帕也夫和拉祖瓦也夫之流，也产生了许多善于利用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①

758

由捷尔任斯基和拉齐斯签署的1918年12月17日的指示信中，也提到有关全俄非常委员会活动的一些滥用权力和错误的性质，信中说道："第二个问题是专家。我们的大多数专家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圈子，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他们常常出身于贵族。这种人我们通常或作为人质逮捕或关在劳改营里让他们从事社会劳动。即便是对待专家也是如此，这种不加分析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们自己的专家很少，不得不雇佣资产阶级的头脑，让他们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所以只能在确认某一专家是为推翻苏维埃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67—368页。

759 政权而工作之后，才能逮捕他。如果他好好工作，只是因为他曾经是贵族、企业主和剥削者而逮捕他是不行的。应该估计一下怎样做更恰当一些，是逮捕他益处大一些？还是让他为苏维埃工作更有益处一些呢？

第三，非常委员会往往没有任何必要的时候也逮捕人。只是因为捕风捉影，怀疑以及那些往往是微不足道的犯罪行为，不应该把人逮捕起来。"①

然而，还必须指出，我们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人，过去和现在都把非常委员会机构的这些滥用权力行为，错误和过失极端夸大起来。根据马·拉齐斯写的小册子里的数字，非常委员会在三年国内战争期间内(1918—1920)在全国枪决了一万两千七百三十三人。拉齐斯写道："把这一数字同我们同志被白匪杀害的名单对比一下，你们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如果要埋怨非常委员会的话，那么不是埋怨他过分喜欢采用枪杀的办法，而是应该埋怨它使用极刑还不够多。"②

关到集中营里去的人就多得多了。但这种监禁措施当时被看成是临时性的措施，只适用于内战时期和用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全俄非常委员会的领导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立即采取了从监狱和集中营里释放犯人的运动，并且改变了自己工作的形式和方法。1921年1月8日非常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写道："现在和外敌作战的前线没有了，资产阶级政变的威胁没有了。内战的激烈时期过去了，但是它遗留下了沉重的负担——监狱有人满之患，坐牢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者。应该结束这种状况，释放犯人，并仔细观察，今后只应该把真正危害苏维埃政权的人关到监牢

760 中去。战时，甚至连小的投机活动以及越过前线都曾被看作是对红军可能造成威胁，但现在这类事情应该彻底取缔。将来，对付

① 马·扬·拉齐斯：《同反革命斗争的非常委员会》莫斯科1921年版第52页。

② 同上第9页。

土匪和惯盗是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因为小偷小摸和进行了一些小的投机倒把行为而把大批工人和农民关在监狱里的事情是不允许的。

……当然，公开的暴动应该毫不留情地镇压下去，匪帮应该消灭干净，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同那些进行策划和准备暴动或恐怖行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地下组织去作斗争，追捕政治和经济间谍的斗争要求更加细致地工作方法。如果在已改变了的形势下面，非常委员会还继续使用战时完全可以理解的旧方法，即大规模地逮捕和镇压，那么这只会使不满的范围扩大，给反革命分子火上加油。一切有可能积极参加反革命斗争的可疑分子，非党军官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马赫诺分子等都应该调查清楚，审查清楚。这是巨大的情报工作，应该把它摆在第一位，但是只因被我们怀疑就被关进预审监狱是不允许的。粗暴的按阶级(富农、旧军官、贵族等)来区分是自己人还是异己分子，只能是在苏维埃政权还很弱小、邓尼金进攻奥勒尔的情况下才曾被允许作的事，但到了1920年波兰进攻我们时，当大部分积极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过了前线，逃到敌方去了之后，这样的斗争方式已经无效。应该去了解某一个反革命分子、旧军官和地主具体在干什么事，如果逮捕他会有一定的意义，否则间谍、恐怖分子和暗中暴动的人会逍遥法外，而那些只是对苏维埃政权说些无所谓的怪话的人会充满监牢……应该知道谁是肇事者，仅仅主观上的怀疑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手中应该掌握确凿根据、具体材料，而这些事只有开展良好的情报工作才能做到。不这样做，就会有人起来大喊大叫，说什么非常委员会机构正在妨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经济恢复工作。"①

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在于改变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早在1919年初，菲·埃·捷尔任斯基本人就提出了取消县 761

---

① 马·扬·拉齐斯：《同反革命斗争的非常委员会》莫斯科1921年版第19—21页。

一级非常委员会的问题，他的根据是，只是在非常条件下才需要的全俄非常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现在它的部分职能已成为多余的了。不久，县一级非常委员会，除了生活还没有恢复正常渠道的乌克兰和前线地区外，都普遍地取消了。

国内战争结束后，有关彻底改革全俄非常委员会问题也被提出来了。这是因为非常委员会是国内战争的机构，战后这种以迅速的行动从事惩办的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已经逐渐消失了。当然，还需要发现和捕获间谍、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但为此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但是这个机构无权不经法院，即用行政手段去惩处犯人。审判的职能和惩处措施应该交给苏联法院的正常的机构。和平时期，应当把保障更多的个人权利和法制的任务提到首位，全俄非常委员会的许多优点这时成为它的缺点。因此，列宁于1921年提出了要限制全俄非常委员会的权限和职能。根据他的建议，1921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最短的期间内从改革全俄非常委员会、缩小其权限和加强革命法制的基础的角度出发，重新审查该委员会及其机构的条例。”① 依据这个决议，1922年2月6日通过了一项把全俄非常委员会改变为格勃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法令。格勃乌的任务，只是同最危险的国家罪犯和罪行：政治和经济反革命，间谍和土匪作斗争。这时格勃乌对大多数案件，已无权直接镇压犯罪的 762 人。决定一切重大案件的权力，其中包括由格勃乌担任侦查的案件，完全划归法院。列宁在1922年2月写道：“以前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机构主要是人民军事委员会和全俄非常委员会，现在特别的战斗任务已经落在人民法律委员会的肩上了。”②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同时仅保留有判处个别人流放或监禁三年以下徒刑的权利。

二十年代前半期连续几年对全俄非常委员会—格勃乌机构进

① 《消息报》1921年12月30日。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06页。

行了改革。但是在弗·伊·列宁去世以后，特别是在菲·埃·捷尔任斯基去世后，这一改革缓慢下来，然后就朝着完全另外的方向发展了。格勃乌机构逐渐回到自己原来的只适合于国内战争时期的职能，尽管苏维埃政权已克服了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阵地。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格勃乌又开始逐渐成为惩罚组织，它又得到如下的权力：监禁、关进集中营、流放到边缘地区，后来甚至得到不经法院，只用行政手段进行枪决的权利。

众所周知，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党的老干部维·鲁·明仁斯基成了格勃乌（后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遗憾的是，他在党内和国内没有菲·捷尔任斯基那么大的影响和威信。再说，明仁斯基到二十年代末期实际上已经不能领导格勃乌的工作了，他经常长时间地患病，因此很少干涉格勃乌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日常的实际工作。就在这些年代，格勃乌的实际领导人是明仁斯基的副职亨·亚哥达，亚哥达是受了斯大林很大影响的人。格勃乌的许多地方分局不挂捷尔任斯基和明仁斯基像，可是一定要挂亚哥达的像。在斯大林和亚哥达的压力下，在我国的惩罚机构活动里，从二十年代末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离开捷尔任斯基的传统已经很远很远了。正如我们所写的，正是格勃乌机构承担了强行剥夺耐普曼分子黄金和珍贵物品的任务，在完成此任务时，它使用了巨大规模的暴力和专横办法。正是这些机构承担了另一任务：把几十万富农家庭迁移到国家的东方地区，而被迁移的不仅有富农本人，还有他们的亲属和幼小的孩子。 763

斯大林镇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和军事专家时也依靠了格勃乌机构，这些镇压活动就其多数情况来说显然都是非法的。就在那个时候格勃乌的一些工作人员在上面的默许下也使用了伪造侦查材料的方法，强迫被告签署假审讯记录，炮制各种莫须有的阴谋和组织，允许对犯人进行非刑拷打。当一个受刑的犯人——米·彼·雅库波维奇（在 1930 年底）对侦查人员说：捷尔任斯基在世时这类侦查方法是不允许的，侦查人员笑着回答说：“把老祖宗

都搬出来了！捷尔任斯基时期在我们革命中已是过去的阶段了。”

还在三十年代初，随着镇压规模的扩大，格勃乌，后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我国及我党内部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惩罚机构的人员编制在此期间也大大扩大了。例如，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签署了关于扩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编制的指示。

虽然出现了这类危险倾向和蜕化变质分子，但是惩罚机构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还是继续忠实于捷尔任斯基的传统。然而在明仁斯基去世后，随着同时发生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加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事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斯大林把亚哥达这样没有原则的人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上，并通过这个办法一个人独揽了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大权，逐渐把一切他不称心的干部从这些机构中排挤了出去。

764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大大地扩大了。例如，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特种会议》的决议。这项决议中说：

1. 授权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被认定系社会危险分子者得使用如下的权力：a) 凡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之人员名单得流放至地方受群众公开监督，为期五年；b) 受为期五年公开监督的流放者，禁止在苏联的首都、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居住；c) 送进劳改营监禁，为期五年；d) 得将对社会有危险的外籍人员驱逐出苏联国境。

2. 为实现第一条中的措施，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在人民委员主持下成立特种会议，成员为：a)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b)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联邦的代表；c) 工农警察总管理局的局长；d) 发生案件的所在地区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

3. 苏联总检察长或他的副职必须出席特种会议。如果上述参加人不同意特种会议的决议或特种会议对案件审理过程，有权把

反对意见提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4.特种会议判处犯人流放、进劳改营监禁时，决议必须指出采取这种措施的根据，指定流放或监禁的地点和期限。①

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暗害后，特别是在1936年第一次"公开"政治审讯案之后，又一次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进行了清洗，其结果惩罚机构的多数领导岗位都被冒险家和野心家占领了。特别需要 765 指出的是，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薪金约增加到四倍。如果说1937年以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们的工资相对低的话，因此甚至形成了这些机构招收人员的障碍，那么1937年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工资则比其它一切党和国家组织的工资都高。与领取高工资的同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还有其它许多鼓励形式。最好的住宅、休养所和医院都交给这些机构使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在"顺利"完成任务后，获得奖章和奖牌。从三十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更加扩大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编制，使这些机构拥有自己的师团，几十万警卫干部，拥有几万名被授各种军衔的内务部军官的庞大的队伍。不仅一切的州中心，而且国内全部城市、乃至专区中心都建立了内务局。一切大企业和多数中型企业、火车站、各大机关和组织，高等学校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专门部门或分处科编制。公园、戏院、图书馆——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甚至包括吸烟室)都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的机动工作人员的经常观察所。国内几乎所有的组织和机关(包括监禁所)都建立了"群众义务性的"巨大的情报员和告密者组成的网。为几千万人建立了专门档案，他们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对他们进行的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除了包括管理立宪民主党人案件和保皇党人案件，孟什维克案件，社会革命党人案件及其他反革命政党案件各处之外，又建立了管理联共(布)案件处。该处还监督和观察党的一切组织，直至联共(布)中央。委派

① 《关于社会主义刑事法典史的材料文集》法律出版社莫斯科1938年版第311页。

一切区委、市委、州委书记都要先同内务部有关的处和代表进行协商。当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各个局内，也都建立了专门审查契卡人员自己的特务处，显然还有另一个特别处，他的任务是监督这些特务处。契卡人员被不厌其烦地灌输进这样的信念：即契卡纪律高于党的纪律。人们告诉他们："你首先是契卡人员，然后才是共产党员。"在训练契卡干部的计划中包括学习各种手艺的历史，其中对宗教裁判所的历史给予极大的注意。[①] 斯大林特别重视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政治局委员的活动的监督。一本古印度书中说："统治者的秘密工作人员应该注意一切执掌事务的大臣、统治者的近臣及亲属，而且也应该同样注意他的对手。"[②] 确实如此，斯大林掌握了他的亲密助手的每一步行为，为此借助于臭名昭著的《关于保护领袖的法令》。这一法令是在基洛夫被暗杀后通过的。当斯大林亲自选择自己警卫人员并完全控制着他们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受委托保卫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负责干部不通知他的保卫人员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如果不受警卫人员的监视他们不能接待他们所愿意接待的任何人。

尽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职权和权利在三十年代初已经非常大了，但是联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 1936 年夏天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一决议授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为期一年的全权，以便彻底摧毁"人民敌人"。联共(布)中央1937年的六月全会实际上把这些权利延长到无限期。根据这些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判职能和权利也大大扩大了。

上面已讲过，还在193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之下设立了所谓的

---

① 应该指出，未来的契卡人员主要学习实践严刑拷打的方法，但在理论上（口头上）这些方法是受到指责的。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区分局里的醒目的地方都挂着列宁的语录："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这是反革命分子钻到我们队伍里的洞口。"另一条标语上可以读到捷尔任斯基的语录："契卡人员是满腔热情、头脑冷静、手脚干净的人。"这些都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精神。

② 提鲁卡拉尔：《论道德、政治和爱情》东方书籍出版社莫斯科 1963 年版第 79 页。

特种会议。后来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星罗棋布的“三人小组”体系，它们是直属特种会议的。这些非法存在的机构同苏联宪法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有权独立地审理政治案件和有权作出判决，完全不必遵循诉讼程序。这样一来，惩罚机构就已经不受党和苏维埃、法院和检察院的约束了。不过，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人员向检察院和法院请求协助，那些机构也只能百依百顺地作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事先早已准备好了的那些决议和判决。检察长的批准手续纯粹是走形式。许多州的检察长是事后，即逮捕几个月后才去批准，或者甚至他们只签署空白表格，然后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随便填写名字。实际上全国只有一个人才能控制惩罚机构的活动，那就是斯大林本人。

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需要这个庞大的惩罚机器呢？这个机器按其人员数量，拥有的力量和职权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

理所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外来威胁和外国暗探的间谍活动都不能为这个巨大而有影响的惩罚机构的存在开脱责任。这架机器首先是反对“内部敌人”的，所以它为了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去寻找这些“敌人”。这个特权机构的绝大部分官吏和军官都自然不愿意自己失业，而他们的工作就在于寻找，审判和孤立“人民敌人”。

正如И.Р.格里古列维奇在他的文章《宗教裁判所在历史审判面前》中所写的那样，“当‘神圣的法庭’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确实 768 在根除异端时，它的那无限扩大的机器实际上却是无事可干。但是，尽管如此，它不仅没有停止进行恐怖活动，而且依据它曾经列出的名单继续为自己寻找新的工作，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这时，各种炮制出来的案件接踵而来，过去没有得到证实的老案子又恢复审理，已被释放了的人们又重新被投入监狱，为了指控完全无辜的人，使用了造谣诽谤和‘间接物证’。甚至对早已去世的人提起诉讼，这些人当然不能为自己辩护了。因为已经被开动了的

裁判所这架机器不能不工作。它正如永不满足贪婪无厌的莫洛赫[1]一样，不断地要求新的鲜血供应，供应鲜血的人就是自己搞出来的异教徒。其中有真的，也有的是他自己炮制出的假异教徒。”[2]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样，我们看到，无限膨胀了的惩罚机构不仅成为斯大林制度的坚固基础，而且自己也变成不断去镇压诚实苏联公民的根源。

在这方面还不能不指出，几乎在所有边缘地区建立起来的星罗棋布的劳改营网“要求”劳动力的供应。

根据老共产党员 Ю. 弗利德曼的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收到一个原政治犯的报告，这个人后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飞黄腾达。这一报告里很少谈论劳改的教育意义。然而作者指出，在劳改营里关押犯人比在监狱和政治隔离室关押犯人更为“经济”。此外作者建议，建立劳改营会使不容易招收“自由”劳动力的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起来。在这里他首先指的是欧洲的北方部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

769

这些思想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又得到政治局的赞同。集中营总管理局（古拉格）建立起来了，还建立了首批集中营区。随着国内工业建设的扩大，劳改营的数量也增加了。集中营总管理局的工作被纳入国家计划，并在其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还在三十年代末期，木材的开采，铜矿，黄金及煤炭的开采方面古拉格已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古拉格在边缘地区实现了运河开凿，战略公路和许多工业企业的建设。

在我国实行了如此广泛的强制劳动制度，这一措施自然带来了极为危险的恶果。第一，1937 年以后，劳改营里实行的严酷制度，使这里的“劳动力”很快就涸竭了，所以自然要求补充接替的人。第二，斯大林没有找到在边缘地区解决建设问题的合理方案，

---

① 古代腓尼基等国以活烧儿童为祭品的太阳神。——译者

② 《历史问题》杂志 1968 年第 11 期第 149—150 页。

因此，他不断增加古拉格所管理的项目。计划机关甚至为了完成某个建设项目，往往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国家把古拉格范围的工作发展计划进去，而且还把集中营劳动力的增长也计划进去。（甚至连集中营的死亡率也包括进计划里面，实践表明这些数字大大低于实际情况）在一些大工程开工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州的机构都收到提供需要的"劳动力"。这样一来，极为庞大的强制劳动体系一旦建立，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规模镇压的原因之一。

八、社会主义革命中目的和方法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伟大而人道的目的：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地球上消灭战争和暴力，全面和协调地发展人的个性。 770

然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无产阶级必然要走同剥削阶级，同社会主义一切敌人以及同自己的缺点进行斗争的、长期的、艰难的道路。这时在无产阶级革命者面前必然提出选择斗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甘地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否定革命斗争中采取暴力的措施。马克思不止一次重复，当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时，暴力是助产婆。列宁也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干出来的。我们知道，敌人把残忍和血腥的斗争强加给布尔什维克，而我们的党接受了这个挑战。正是同敌人斗争的坚定性和不可调和性，善于把说服同暴力结合起来，有时也借助于恐怖手段，才保证了列宁党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胜利。

列宁在谈到内战年代的红色恐怖时指出，这一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协约国的恐怖主义迫使我们实行了恐怖。因为称霸世界的大国不择手段，用大批军队压到我们头上。假

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恐怖，但是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所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任务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①

771 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永远没有也不可能认为，似乎为了革命的目的，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无可指责的。

“目的允许采取任何手段”的观点不是革命家提出来的。这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为了维护他们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即这些剥削阶级确实使用了任何一种手段和方法去进行斗争，因此才提出来这种观点。这一观点在中世纪的教会活动中得到更加彻底的贯彻。主教季特利希·冯·尼希姆于1411年写道：“如果教会受到严重威胁时，教会就不受道德的约束。统一作为最终目的，采取一切手段都是无可指责的：即教会职衔可以买卖，出卖变节，关进监狱以及谋杀等。这是因为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目的而存在，个人应该为社会福利而牺牲自己。”耶稣会也是以这些原理作为指导的，他们认为自己主要的任务是：为了反对宗教改革派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去进行斗争，为保持天主教教堂的一切特权和全部权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近代，法西斯反动派也提出了这一观点。戈倍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说，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取得胜利。这是唯一的道路，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必要性上都是正确的。当我们取得了胜利，谁会问我们用了什么方法？我们的良心已经积满了那么多的污垢，所以，我们必须胜利，不然，以我们为首的一切以及我们的人民都会被从地球上消灭掉。”②

遗憾的是，事情竟会这样，一个从革命敌人的武器库中搬出来的观点，往往落到一些革命者的武器库里，接受这个观点的首先是那些钻进革命队伍的无原则的野心家和无政府主义分子，还有那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96页。

② 叶·勒热夫斯卡娅：《柏林，1945年5月》莫斯科1965年版第73页。

些企图不管方向、只管前进的狂热分子和教条主义者。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许多参加者在使用方法上面，也不同程度地不择手段，不讲原则。法国于1792年发表的一个宣言说：“凡是本着革命精神办事的一切人，他们干什么都是允许的。对共和派来说，除了成为共和国法令的尾巴外，没有其它危险。谁超越出这些法令，谁似乎远远超出了目标，这个人往往离完成任务还很远。”① 772

众所周知，雅各宾专政帮助了法国革命，使革命的内外敌人遭到一系列决定性的失败。

在那些年代革命恐怖是一种严酷的必然性，这种恐怖保证了法国革命去实现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改革。

然而现在大家很了解，雅各宾恐怖不仅巩固了，而且也破坏了法国革命的力量，归根结蒂，正是这种恐怖导致雅各宾派人的垮台，因为他们失掉了大部分法国人民的支持。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这种恐怖的矛头不仅指向明显的保皇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也指向了那些观点比主要的雅各宾集团稍右或稍左的许多共和党人和革命者。随着这一恐怖而实行的简化诉讼法和取消辩护权都为滥用权力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不仅被那些暂时参加革命的奸诈的人所利用，就是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也利用了这一形势。根据罗伯斯庇尔提出的意见和由于他的坚持，对他的政敌提出了造谣诽谤、诬陷性的指控、并对假案进行了审理，使许多诚实的共和党人和革命者被送上了断头台。

当不满的工人和贫民提出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要求时，雅各宾派领袖也用恐怖回答了他们。 773

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恐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雅各宾主义的力量。关于这点现在被各派历史学家已经都一致承认了。

十九世纪也有不少革命者，当他们选择斗争方法时，也不承认

---

① 《茨威格选集》第2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172页。

应该有任何限制。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涅恰也夫和涅恰也夫主义。巴枯宁也长期宣传和涅恰也夫相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不仅可以当“吹鼓手”，而且“也可以当坏蛋”，并认为抢劫是革命性的表现。巴枯宁长期以来一直都认为：革命就是破坏一切，就是复仇行动，可以使用“毒气、尖刀、绞架”这样的武器。巴枯宁直至去世前才明白：诡谲和革命是互不相容的，“阴谋诡计上面建立不起任何有生命力的、巩固的事物，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革命活动不能去依靠低级的和下流的癖好，任何革命如果没有人类最高尚的理想的话，显然是不能取得胜利的。”①

巴黎公社于 1871 年 4 月通过的关于人质的法令是针对凡尔赛枪杀被俘的公社社员，这一法令曾引起欧洲进步民主人士的许多责难。大家知道，这些人质在公社存在的最后几天才被枪杀了的。

遗憾的是，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期间也发生过不必要的暴力行为，残忍手段，过份的多疑和滥用恐怖手段的现象。

例如：在十月武装起义后几个月里常发生革命士兵和工人私 774 设公堂、对一些“嫌疑犯”进行刑讯的事实。其中，原临时政府的部长安·伊·盛加略夫和费·科科什金都成为这种私刑的牺牲者。美国社会主义者约翰·里德也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差一点被枪杀，后来他写了描写十月革命的欢欣鼓舞的书。再举出下面两个例子也足以说明问题：红军第一批骑兵兵团的创建者、国内战争英雄波·莫·杜缅科被枪杀了，以及第二骑兵军菲·库·米罗诺夫在布蒂尔卡监狱里被杀害。众所周知，米罗诺夫和杜缅科在苏共二十大后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予以平反了。这类事实还可举出下面的例子：1919 年 2—3 月在顿河上游的村镇不经审判而大规模地枪杀了哥萨克人，其中包括老人和妇女，以及 1919 年初俄共（布）顿河局和南线国内战争局开展了“剥夺哥萨克”运动。

① 《历史问题》杂志 1961 年第 10 期第 85 页。

米·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一书中所描写的就是造成哥萨克反布尔什维克的维申斯克暴动的原因。

列·达·托洛茨基也时常滥用暴力手段，国内战争时期他是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例如，当东线的一个团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并拒绝服从东线司令员的命令时，当时托洛茨基在东线，他下达了命令枪决该团的团长和政治委员。他这时想起了好战的罗马人的传统，命令把该团按数目算是逢十的人都统统枪杀。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谢·古谢夫赞同了这一命令，并执行了这个命令。托洛茨基的命令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员的愤慨，团里的一位指挥员为了免遭枪决逃到莫斯科去了。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回想她当时怎样帮助这位指挥员躲藏起来。但是也有不少人是维护托洛茨基行为的，他们的理由是战时形成的紧张局面要求采取严峻的措施。

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В.К.普特纳与托洛茨基、古谢夫的做法大不一样。1921 年他被派到一个拒绝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 775 的师里去，普特纳没有枪杀任何人，但他说服了红军战士和个别动摇的指挥员返回前线。开始时，他先派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宣传员到情绪不稳定的团里去作工作，后来这些团成为首先进攻那些反对红军的暴乱分子的先头部队。

在我们看来，国内战争初期使用人质的方法显然是错误的。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把阶级异己分子和对苏维埃政权有危害的分子暂时隔离起来是必要的。然而，当时人质方法不仅是暂时的隔离手段，而且还使一些人因为另一些人的罪行而被从肉体上消灭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格·彼得罗夫斯基于 1918 年 9 月在他的一项命令中不加掩饰地谈到这一点。在这项用电报发给各级苏维埃的命令中写道："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被暗杀，敌人企图暗害和枪杀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芬兰、乌克兰，以及顿河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大规模杀害我们几万同志事件，在我们军队的后方我们经常揭露出敌人的阴

谋活动，此外，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它反革命匪帮都承认他们参加了这些阴谋活动，而与此同时，苏维埃方面对白匪及资产阶级的真正的镇压和大规模的杀害则是极小的，这说明我们虽然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白匪及资产阶级采取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但实际上恐怖行为并不存在。这种状况应该宣告结束。这种松懈和姑息的现象应该立即制止。凡地方苏维埃已掌握了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应该立即被逮捕。资产阶级和军官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应作为人质立即逮捕。当白匪帮有任何那怕是微小的反抗活动时，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使用大规模的枪杀方法。地方省执776 行委员会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掌握主动性……上述一切措施应立即付诸实施。关于地方苏维埃的这个或那个机构在这方面的行为有任何动摇，内务局局长应该立即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汇报……本电收到后，请复电……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①

格·彼得罗夫斯基这一命令确实导致大量人质被枪杀。例如，《非常委员会周报》第 5 期报道过，在彼得格勒就枪杀了五百个人质。就是在 1918 年那样的艰难环境中，也无法同意这样的残酷措施。因为这类的措施并不会根除反革命，而只能使斗争激化，双方都遭到更大的牺牲。

1920 年，在粉碎弗兰格尔进攻之后，克里米亚的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隐藏在克里米亚山区的原白卫军，只要他们出来自首，就赦免他们的罪行。然而，南线的地方党和军事机构违背了自己赦免的保证，对大部分前来自首的白卫军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枪杀，而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被强迫征进白匪军的。

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我党及苏维埃政府其他许多领导人当时坚决反对那些参加了革命的狂热分子的这类极端的、毫无根据的、残酷的作法。捷尔任斯基在给温什里希特的一张便笺中写道：“犯一千次自由主义的错误，也比把一个无辜的人送

---

① 《非常委员会周刊》第 1 期莫斯科 1918 年第 11 页。

到流放地好，因为这个人从流放地回来后还会是一个积极分子，那么对他的指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过失。”早在1918年底，国防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授权各人民委员部及省市一级的党委会派代表参加那些由非常委员会机构逮捕的公民的审理工作。非常委员会机构有权释放有两名人民委员部常委会成员或两名党委会委员提出书面担保的在押人犯。然而，连列宁和党中央的干涉也远不能在国内战争条件下制止那些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允许的，损害它的威信的方法。 777

内战的结束向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必须下决心采取加强和巩固革命法制措施的要求。甚至即使是过去有根据使用的那许多暴力形式，到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已经是不能允许的、和危险的了。但是，这一过渡是不容易的，因为苏维埃和党的许多活动家认为，实行法制等于“使革命解除武装”。①

正如米·伊·加里宁所证实的：“战争及内部斗争使我们出现了大批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法律就是相应地行使权力。管理——对他们来说就是完全独立的指挥，而不服从法律条文的规定。”②

甚至对弗·伊·列宁来说，在新的条件下过渡到革命斗争的新方法和手段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也不要隐讳这点）。列宁写给德·伊·库尔斯基的、谈论有关恐怖问题的信证实了这点。1922年春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司法人民委员部要制订该共和国的第一部刑法。1922年5月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给弗·伊·列宁送去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法典法律条文》草案，请他提意见。列宁看了该文件后，就在这个草案的边页上作了如下的批示：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该扩大使用枪决的范围（也可用驱逐出国境的办法代替）。见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第

① B·M·库利琴：《新经济政策和革命法制》见《历史问题》杂志1967年第9期。

② 米·伊·加里宁：《论社会主义法制》莫斯科1959年版第166页。

一条规定；想办法找出一个提法，把他们的活动同国际资产阶级及他们同我们的斗争联系起来（收买报刊和内奸，准备打仗等等）。请您提出您的看法，立即回信。　　5月15日。列宁。”

这一《法律条文》（草案）的第五条是："在建立能保障苏维埃政权不受反革命侵袭的条件之前，革命法庭有权对刑事法典第58、59、60、61、62、63各条所规定的罪行使用极刑。

列宁在这一条上加了批示：

“a.加上第64、65、66、67、68、69各条；

b.加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可以把极刑用驱逐出国境来代替（有限期规定和无限期规定）；

c.加上，如果未经允许从国外回国，就处以极刑。”

5月16日，列宁亲自同德·伊·库尔斯基面谈。其中，谈到关于规定什么叫“反革命行为”的条文草案。从社会主义法制的角度，给这一概念以正确的解释是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的。列宁亲自草拟了该条文草案，并于第二天又发了一封信给库尔斯基，其内容如下：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既然是草案，当然需要反复推敲和修改。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　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方案1：

凡进行宣传、鼓动或参加或协助一种组织来为不承认业已代

替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并图谋通过武装干涉、封锁、间谍活动、津贴报刊等手段以暴力为推翻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

一律处以极刑；其情节较轻者，剥夺自由或驱逐出境。

方案2：

（甲） 凡进行宣传或鼓动，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下同）。

（乙） 凡参加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组织或协助那些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之罪犯（其活动有上述性质者），都应受到同样惩罚。

方案2乙：凡进行宣传或鼓动，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或可能为其效力者（下同）。"[①]

列宁关于在刑法典中要把有关恐怖的问题"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的指示和他的方案2甲及方案2乙无疑是错误的，它们能为数不清的滥用权力的现象开了绿灯。列宁自己认为他的建议完全只是草稿，需要加以修正和加工。大概这些建议在中央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受到一定的批评，因为刑法典第57条的基础只是方案1，这一方案中没有"客观上效力者"和"可能效力者"的字眼。但不管怎样，列宁给库尔斯基的信（于1924年库尔斯基予以发表了），是不可能促进年轻苏维埃司法活动的改善的。 780

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大政论家德·伊·皮萨列夫不是没有根据地写道："在各民族的生活中，革命所占的地位正如同一个人生活中不得已不去从事杀害所占的地位一样。如果你不得不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不得不保护自己母亲、姊妹和妻子的生命和尊严，你就有可能去杀害那些攻击你的坏蛋……至于暴力政变，也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把它比做防御战争。每一次政变和每一场战争本身总是给人民带来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失。但如果战争或政变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20—321页。

是不得不进行的话，那么它所带来的损失和它可以避免的损失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①

今天，我党的一些老党员也是这样想的。一个老共产党员拉·波·列尔特告诉作者说："象俄国这样的国家，革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样的革命不能没有暴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恐怖，没有对军官和富农的暴力行动的话，那么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18年枪杀沙皇全家，包括幼小的继承者也许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他们不再成为君主专制的反革命的旗帜。发生的斗争确实是你死我活的。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取得胜利，他们就都会被白匪杀死。

但是我们做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却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革命暴力看成是可悲的必然，而把它看成我们的丰功伟绩。大规模的暴力，就是'红色'恐怖，不管怎样说，都是恶。即或这种恶暂时是必要的，它仍然是恶，然而不久，它却被说成是善。我们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而且说出这样话：这一切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对革命是有益的，这都是善，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但是，这是不对的。781 革命所带来的不仅有善，而且有恶。在革命时想避免暴力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懂得，在这里我们指的只是暂时允许恶进入我们的生活和实践。对暴力持浪漫主义的态度就是延长它的生命，甚至在暴力已成为完全多余的时候，当暴力已经成为绝对的恶时，我们还是保留了它。我们不仅把直接暴力，而且把对民主的暂时限制也说成是善，因此延长了它们的生命。我们有时需要采取极端的手段，当然这往往是不可免的，对恶采取百般饶恕和不抵抗的态度，这不是我们的哲学，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助长恶的发展。然而，在对革命的最活跃的敌人采取非常严酷的手段，直至采取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措施时，我们不应改变对这些暴力行为的道德评价，当我们应该说，这是'被迫采取的恶行'，我们却说革命的暴力是某种善良的行为。”

① 引自德·伊·皮萨列夫的文章《亨利希·海涅》1867年。

如果列宁在世时，各种滥用暴力行为都可能产生的话，那么在斯大林领导了党之后，可想而知这类离开革命法制的行为是多么迅速地增多起来。众所周知，斯大林不仅没有对革命的“极端的行为”进行任何认真的斗争，相反，他对中央和地方的许多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积极灌输了一种野蛮的观点，即革命采取各种手段时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限制和顾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后来篡夺政权及对我党和国家基本干部力量采取残酷的恐怖政策。

早在 1936—1938 年大镇压之前，斯大林就已经教会了许多苏维埃和党的干部对那些于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人进行斗争时，可以不择手段。对那些富裕的农民或者没有觉悟的农民实行大规模的恐怖政策，把几十万农户迁移到西伯利亚 782 去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进行了非法的镇压，对反对派和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则为所欲为——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论点在实践中的体现。我国许多地区在集体化时期对富农和所谓“富农的应声虫”难道没有使用酷刑和虐待，难道没有打骂富农，冬天往他们身上浇凉水吗？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那古里诺夫难道没有说过：“如果站在我面前的有几十名老人、小孩和妇女”，而有人告诉他，为了革命的需要把他们用机关枪扫掉，那么他就会“用机关枪把他们统统都扫掉”吗？然而，那古里诺夫的这些话只不过是斯大林同革命敌人斗争方法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当然，斯大林并不是在我们革命中实行野蛮方法的独一无二的人，无论在领导人中，还是在普通的革命参与者里面，他都有不少助手和志同道合的人。当然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群众的文化落后，运动中的某种自发情绪以及许多人不善于独立思考等等。这样，斯大林不仅给那些参加革命的人灌输了自己的思想，而且同时还巧妙的利用了人民中间及党内存在着的一切最落后的情绪和希望。

不管怎样，在许多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以及在惩罚机构中广泛散布的那种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允许使用任何手段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斯大林实现其冒险目的和个人野心。因为，斯大林只要把那些他不称心的人宣布为“人民敌人”，实际上，这些人马上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对他们采取任何残忍作法，使用任何酷刑和暴力，都是完全允许的，也都是能够解释得通的。

1930—1932年期间，远不是所有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都是心情愉快地参与了把几十万富农及农民家属驱逐到西伯利亚的行动的。我们知道，集体化时期被派往农村的许多积极分子，待他们从783 那里回来时，因为受了巨大的刺激而身患重病了。

1936—1938年期间，许多苏维埃和党的干部当他们批评自己党内的同志进行大规模逮捕时，心里是很难过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不少干部，当他们执行严刑拷打犯人的命令时，他们非常怀疑这样的作法，心情都十分沉重。

然而，这些干部所听到的是这样的话：革命的利益需要这样；因此，逐渐习惯的逻辑使他们的良心得到安慰，而他们的认识则模糊起来，使他们不能认清正在发生着的事件的实际情况。这样一来，原来还是诚实的革命者就比较容易地堕落下去了，以后就逐渐成为斯大林专横的盲目工具，后来又往往成为其牺牲品。

象尼·瓦·克雷连柯这样从主观上说，似乎非常诚实的革命者，从这方面看他的命运是很典型的。恰恰是司法人民委员尼·瓦·克雷连柯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不经过司法部门、非法镇压的特别热心的拥护者。克雷连柯在1930年写道：“资本主义的欧洲和广大的自由知识界对苏维埃政权不是一贯按法律程序惩罚那些暗害者，可能觉得离奇怪诞，不可思议。但是任何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正确作法。”[①] 克雷连柯也没有反对过违反宪法的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克雷连柯作为俄罗斯

① 尼·瓦·克雷连柯：《通过暗害活动进行的阶级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

联邦的司法人民委员，后来作为苏联的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他并没有去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1935、1936和1937年所进行的非法镇压。也许，克雷连柯很快就明白了自己言行是错误的。1938年他被撤了职并被诬陷从事反革命的暗害活动，后来他未经过任何法律审理被判决，而且被枪决了。

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Б.П.舍波尔达也夫的悲惨命运在这方面也是很典型的。 784

三十年代初，不仅卡冈诺维奇，而且舍波尔达也夫也积极赞同在库班推行大规模的镇压政策。当时，矛头所指不是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小组，而是整个市镇，整村整村居民不经过任何法院的手续就被驱逐到国家的边缘地区。1932年11月12日舍波尔达也夫在罗斯托夫讲话时说："我们直截了当地宣布，那些不愿种地的凶恶的怠工者，富农的走狗，他们都将被驱逐到北方地区。难道我们过去没有把库班的富农反革命分子驱逐出去吗？驱逐的数量是相当大的。现在，当富农的残渣余孽企图组织怠工时，当他们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要求时，更正确的办法是把肥沃的库班土地交给其它地区的土地又少又坏的集体农庄庄员去种……不愿意工作的，把那些糟踏我们土地的人驱逐到别处去。这是公正的。会有人对我们说：'怎么回事？过去只驱逐富农，现在要搬迁整个村镇了，村里还有集体农庄和勤劳的个体劳动者，怎么办？'是的，现在不得不提出搬迁整个村镇，因为在现在的形势下，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确实勤劳的个体劳动者应该替自己的邻居负责。如果在一个集体农庄旁边有另一个集体农庄或一批单干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措施，那么它还能是苏维埃政权的什么支柱呢？"①

事情刚过五年，舍波尔达也夫自己成为新的、残酷清洗"人民敌人"运动的牺牲者。

1936年老布尔什维克戈麦尔州委书记M.O.斯塔孔在积极分

① 见A.拉金和列·邵武勉：《波尔塔瓦镇的居民为什么从库班被迁移到北方边远区?》顿河罗斯托夫党的出版社1933年版第14页。

子会议上批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犯了“自由主义”，他要求逮捕一个因面包缺乏而骂苏维埃政权的老太太。一年后已经不犯“自由主义”的内务部的机构把斯塔孔本人也逮捕了。

十月革命英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二十年代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36 年他作为苏联特使被派到西班牙。他的任务之一是把西班牙共产党内的托派分子清洗出去。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参与下西班牙共产党的托派小组很快被“消灭了”，这些托派小组当时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反佛朗哥和法西斯的斗争。一年之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召回莫斯科，被宣布是托洛茨基分子，而且被处决了。

大家知道，文学家列·阿韦尔巴赫许多年来都异常激烈地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作家，诽谤他们并且赞同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暴力行为。1929 年阿韦尔巴赫《在文学的岗位上》杂志写了文章，他用粗暴的语言抨击了苏联著作家安·普拉托诺夫。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有人向我们进行人道主义的说教，似乎世界上还有比无产阶级的阶级义愤更加人道的什么东西。”可是，1938 年列·阿韦尔巴赫“为了革命的利益”被枪决了。

象 B.Φ.沙朗哥维奇这样的人我们已经不用说了。1936—1937年沙朗哥维奇作为白俄罗斯中央的第一书记在叶若夫和马林科夫领导下积极指挥了摧残白俄罗斯干部的工作。当沙朗哥维奇在一次讲话中要求撤掉契尔维亚科夫的职务时，契尔维亚科夫自杀了，这件事发生之后，沙朗哥维奇就在明斯克党代会上宣布说：“狗不得好死。”然而，一年以后，沙朗哥维奇本人也被处决了。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至今还继续在自己回忆录中断言，一切坏事都是从1937 年开始的。例如，B·巴兰钦科在他的回忆录《恢复尊严》中，当他描写二十——三十年代的事件时，一般都是一片赞扬，他说如果没有这倒霉的1937年，一切都会是很好的。但是，Я·И·德罗宾斯基的想法则不一样。他的回忆录中的主人翁安德烈·弗明在军事委员会受审之前，他这样想过：“人们！共产党员

们！你们怎么会坏到如此地步？是马上变坏了吗？……安德烈，问题就在这里，不是一下子变坏了的。都是慢慢地准备起来的，甚 786 至不是悄悄地准备起来的，而是公开策划的。是逐渐地，缓慢地，但是系统地，一步一步地把这种可耻的毒药一滴一滴地灌进他们机体之中，为大镇压行动准备好了干部队伍。这种毒药在他们的机体中积累起来，当人的抵抗力涸竭了，毒素就支配了整个机体。准备工作是这样开始的：他们去破坏农民家庭；破坏他们的安乐窝，把他们赶到边缘地区的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敢于说出剥夺他的邻居中农，即劳动者是不对的这样的话，于是给他们扣上了'富农应声虫'的帽子等等。毒素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他们知道年成歉收，却要强迫农民交纳亚麻，他们知道并没有发生任何怠工，也没有怠工者，却发出指示要镇压怠工，审判怠工者，因为确实没有亚麻，年成不好歉收了。当对这些'怠工者'进行审判时，把他们最后一头牛牵走了，可是检察长清楚地知道，没有发生任何怠工，但他还是批准逮捕他们。法官也知道，农民是诚实的，但他们仍然审判了他。可是现在仍然是那位检察长批准逮捕你，同样还是那位法官，他们审判了你。原则没有变，只不过运用得更广泛一些罢了。你当时不懂这一点。可是，那时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干部，他们不关心你是否有罪，他们只关心上面有指示，指示上说你是有罪的。你记得吗，当时你告诉吉加洛说：'尼古拉·费多罗维奇，亚麻欠收了。'吉加洛回答你说：'我也知道，可是国家需要亚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客观原因。'"

*　　*　　*

众所周知，关于布尔什维克为了达到自己革命的目的，似乎使用了不体面的手段，这是西方反苏文学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

1940年在伦敦出版的凯斯特列尔的小说《正午的暮色》中的一个主人翁伊万诺夫，他是一个侦查员，他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1937年的残酷的大镇压是正义的、有根据的。伊万诺夫说：陀斯绥也夫斯基著作中的年轻大学生拉斯科里尼柯夫因为想抢钱而杀死

787 了一个老太太。他是作得不对的。但是如果拉斯科里尼柯夫根据党的命令，例如，为了补充罢工基金或支持地下报纸而杀死一位老太太，那么他就变成正确的了。伊万诺夫继续这样想："人类的道德只有两个观念，而且是完全相反的两极。其一是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它宣布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数学定律不能用在人类的法律上。另一个概念是从基本原则出发的，即为了达到集体的目的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个人永远服从社会、并为社会作出牺牲，然而社会则可以象利用实验室的兔子和祭坛上的小羊一样，支配个人。"

遗憾的是，在一些苏联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判断。亚历山大·普特柯的小说《我的重荷》里，党的负责干部纳列托夫自言自语地说："好吧，让后代评价我们的事情吧。就让他们如同这个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仔细地去计算得失并加以比较吧！但是他们能否想象得出事情的实际情况如何呢？看书吗？听故事吗？……"许多事情后代是不会知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清楚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多。而不清楚的地方越多，猜想出来的东西也越多。纳列托夫继续想道："他们怎么会正确地估价我们的事情呢？他们的评价会正确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是否会明白另一出路是不可能的呢？当周围一切都在猛烈地燃烧着的时候，谁会去计算得失，权衡利益呢？谁会想到应该三思而行，估量一下：代价是否太大了？有没有不必要的牺牲？不，他——尼基塔·彼得罗维奇·纳列托夫有另一种哲学。正是这个哲学暂时使他能在土地上站稳脚跟，在困难时刻不动摇。你看到你的目标了吗？相信他吗？去为它冲锋陷阵，用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需要牺牲吗？牺牲吧。但不是斤斤计较，不要精打细算，必须是能有可靠的赢余和储备。吝啬会使你付出更高的代价。目标之伟大，使任何牺牲（当然，包788 括他自己的生命在内）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①] 看来，亚历山

① 《十月》杂志 1969 年第 6 期第 58 页。

夫·普特柯完全同意自己小说的主人翁的话。显然，伊万诺夫、纳列托夫和普特柯的哲学同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然而，也不得不指出，这些观点和许许多多斯大林分子的观点是不相上下的。

实际上，在方法和目的关系问题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不需要持这种诡谲的观点。正如尤·卡里亚金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所公正的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否认伪善者和反动派的这个欺骗性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在一种情况下承认阶级暴力，即当从事暴力行为的人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因此有必要使用暴力对付他们，但也只有对付他们才使用暴力。这是人道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绝大多数人摆脱极少数人加诸他们的奴役。如果不为这一解放进行斗争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个人的自由，任何个人进行自我改造以臻于完善的地步，那就只有个人的毁灭。在这一斗争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但这不是给后代的土地施肥，而是为未来本身播种；这不是给渺茫的神明的祭坛献上羔羊而是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奴役地位、并且相信自己力量和理想的群众的觉醒和激情；这是一个人真正已经成为人之后的越来越自由的选择。在这一斗争中，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不是个性的自我否定，而是个性的自我肯定。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具有的人道主义性质，决定其方法是人道主义的，而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的诡诈伎俩和野蛮行为只是对斗争方法和目的的歪曲。被这种方法所掩盖的就是最正确的思想，如果受到野蛮的方法的保护，它就不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野蛮的方法破坏了人和人之间关系中的最宝贵的东西——信任。如果挖一挖那些以‘共产主义名义’用野蛮方法的人的思想的话，那么会发现，他对共产主义目标本身的理解是受到歪曲的。”①

伊·爱伦堡公正地写道：“目的不是路标，而是某种完全实际的东西，这是现实，是今天的行为，而不是描写明天的图画；目的不 789

①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1963 年第 5 期第 36 页。

仅从政治上决定战略，而且决定道德面貌。如果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公正的行为，你却要去作，那么你就不可能树立正义；如果把人民变成‘小齿轮和小螺丝钉’，把自己变成神的偶像，就不可能为平等而斗争。方法永远反映到目的上面，方法可以把它的面貌提高也可以使它变形。”①

然而，革命有可能在巨大的方法的武器库里选择它需要的东西。这种或那种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因具体环境和形势而有所改变。我们国家的生活以及我们的革命都有过很艰难的时刻，那时不得不使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在叶喀德琳堡我们杀害了沙皇全家，② 我们沉没了黑海舰队以及 1918 年我们使用了赤色恐怖——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但是如果在事先我们没有能拒绝这种或那种斗争方法和手段时，我们也不能事先宣布一切方法都是允许的。真正的革命者和真正的革命政党应该在每一时期和每一具体局势下仔细研究和讨论——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付出最低代价、经过最短的途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我们应该在仔细和具体研究之后，作出决定——在某种形势下什么样的手段不能采用，以及什么样的方法在任何形势下都不能使用。哲学家 M·Г·马卡罗夫写道：“达到共产党人最后的目标，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民的一切美好的理想和精神上的要求。党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乃是为全人类的福利进行斗争的最高体现。目的本身排除了使用那些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方法。道德标准服从 790 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的观点，无论如何不等于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否认限制人们选择不正当手段的道德规范的稳定性……依据目标的大前提去行动，用合乎革命要求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

---

① 《新世界》杂志 1965 年第 4 期第 63 页。

② 毫无疑问，沙皇和皇后是应该被杀害。也许，革命的利益要求杀害沙皇家庭的所有成年成员，因为他们帮助了沙皇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沙皇全家，包括幼年成员在内，都被杀害，这是否恰当，还是值得怀疑的。大家知道，俄罗斯联邦的原内务人民委员别洛勃罗多夫领导了杀害沙皇家属，但 1937 年他本人“为革命的利益”被枪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依据道德规范的要求去行动。坚定地遵循这些规范的要求，在很大的程度上，会促使工人阶级达到他们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即它们暂时虽然能带来一些益处，但是却违犯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严格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最高标准的。对共产党人来说，最宝贵的是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人民的同情。”①

这些原理是完全公正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革命者或许会取得暂时的成功，但作为革命活动家，他早晚会被揭穿并遭到彻底失败。如果革命政党采取不应有的手段，那么它必然会失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这点又会限制人们的选择，使之能选择和使用那样的革命斗争的方法，这些方法能与劳动人民的行动，与人民的革命激情相适应。这样看来，那些不应有的手段不是证明这个或那个政治活动家有力量，而是证明他的软弱和虚弱，坏方法归根结蒂会使他的虚弱更加严重起来。此外，还应该指出，向我们目标——共产主义——前进的运动本身不应该培养厚颜无耻的人和暴徒，而应该培养那些符合我们共产主义理想的忠实于人民的诚实的人，实事求是的和人道主义的人。

遗憾的是，斯大林并不认为这些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中目的和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他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他从来不研究在某一个具体形势下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最恰当的。对他来说，一切手段永远在任何形势下都是可以使用的，其中包括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其结果，斯大林和那些相信野蛮逻辑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791

九、不明真象，仓皇失措和缺乏团结

正是因为大部分苏联人民相信党，相信党的领导和苏联惩罚

① M.Г.马卡罗夫:《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论目的范畴》列宁格勒1960年版第12页。

机构，使所有非法受到迫害的人们落到非常艰难和悲惨的境地。他们并没有犯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行，但是大部分人民已不相信他们了，而且抛弃了他们。只有少数亲友还继续保护他们。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十月革命英雄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1938年2月于布蒂尔卡监狱告诉他同牢房同志们的一些事情。在一次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审讯过程中，审讯人员的办公室里的收音机没有关上，审讯人员因为受审的人犯坚决拒绝在诬陷他的材料上签字而大发雷霆，于是他骂这位著名的革命家是人民敌人。

"你自己才是人民敌人，你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回答他说。

这时收音机里正播出一个集会的实况。

"您听着"，审讯员说，"您听着，人民是怎样赞同我们的？人民相信我们的一切，而你们将会被消灭掉完事。为了侦破您的案子，我获得了奖章。"①

然而，不但是一种孤独感使许多人丧失了反抗专横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更困难的是他们对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完全不清楚。

象米·叶·柯尔佐夫这样的，看来既了解真实情况，又是很聪

792 明的人，他对所发生的事件也丝毫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柯尔佐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面重复地说，"我们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敌人呢？他们都是我们多少年来非常了解的、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后就立即承认自己是人民敌人、间谍、外国密探呢？……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按我的地位来说，我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似乎应该向人们去解释清楚所发生的

① 《新世界》杂志1964年第11期第212页，Ю.托姆斯基的文章。

事件，去解释出现如此大量的揭发材料和人们遭到逮捕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我自己如同一个渺小的被吓破了胆的庸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完全糊涂了，在黑暗中瞎摸一气。①

许多被捕的人都在想：这里一定发生了误会，一切很快会被解释清楚，一切都仍会一如既往。"我明天会回来的"，加马尔尼克的助手军政委Г.А.奥谢彼扬在内务部一批工作人员半夜闯进他家时，是这样对自己的妻子说的。

原苏联计委主席瓦·伊·梅日拉乌克也有过类似对"宪法的幻想"。他在监狱里还继续考虑那些他被捕前关心的问题。梅日拉乌克在被枪决前夕写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计划工作及其改进措施》。② 安·布勃诺夫也一样，在一天之内，他得知自己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并被撤除了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他仍然振作精神，向新人民委员交待了工作之后，他就到国家公共图书馆工地去了，这是他一向密切关怀的一项工程。③ 布勃诺夫相信，在他的问题上的一切不公正的作法都会被纠正，真理会占上峰。然而，他当然没有想到，这只能是在他去世很多年之后才会实现的事！

党的专职干部，职业革命家С·П·皮萨列夫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被关进监狱时，并不是怕得要命，也不是愤怒不已，确切地说，我非常震惊；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无可指责的，经受过千百次考验的，一向工作积极的共产党员，而且斯大林、加里宁、波斯克列贝舍夫、维辛斯基和雅罗斯拉夫等都很熟悉我，我在党中央机构中几乎是自家人，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误，把我逮捕了呢？我认为，这是极大的疏忽，是十分荒唐的事，它一定会很快得到纠正。那时我认为，所有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逮捕的人都是从事地下活动的阴谋家，他们是法西斯分子。在实践中，我清醒地

① 《实实在在的米哈伊尔·柯尔佐夫》莫斯科1965年版第71页。

② 《消息报》1963年2月19日。

③ 《安德烈·布勃诺夫》莫斯科1964年版。

看到会犯有比例很小的错误，但这是对那些不知名的，不与人来往的，孤癖的人，他们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某些人的怀疑，被认为是敌人，这样的人就是在逮捕后也不容易很快搞清楚。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一向积极，是善于同许多人接触的党员，对一切人我都是光明磊落，我在党内及党领导机构内工作的每一阶段，中央、区委及几百名有威望的共产党员都是看得见的！……不，我一点没有害怕：逮捕时，当夜间搜查快要结束时，我和往常一样，早晨五点钟心情平静地进早餐，这使参加搜查人员吓呆了。我真如同一个孩子那样天真幼稚。逮捕以后，前一个星期我被关在塔干监狱第四层的单间小牢房里，这时小牢房里塞进了十二名刚被逮捕的人，在这里只有一半人能勉勉强强一个紧挨着一个地躺在地板上睡觉，所以我们轮流睡觉，不睡的人在旁边站着或卷缩着身子，蹲着。在这些日子里，我认为所有同牢房的人都是苏维埃政策的真正敌人，所以在一星期内我同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其他人的表现也和我一样……

为进行'积极的调查'，我被押到路比扬卡，即内务部监狱，此后我才恍然大悟。"

联共(布)一位老党员，列宁的亲密战友约·阿·皮亚特尼茨基号召他的朋友要镇静，要坚强，他没有要大家去进行反对专横的斗争。苏共党员C.彼得里科夫斯基手上有一本皮亚特尼茨基妻子的日记。从这本日记里可以读到这样的情节：皮亚特尼茨基在自己被捕的前夕，当他见到已被开除党籍的戚夫戚瓦泽同志时说道："为了党，我们什么都应该经得住，只要党能继续存在下去"，他是相信戚夫戚瓦泽的诚实本质和坚强的党性。

794

甚至在残酷的审讯，严刑拷打和虐待之后，许多被捕的人都继续相信法制，他们相信在调查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在法庭上一切都会搞清楚的。

反之，也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西伯利亚城市的市委全体成员在一夜之间被"撤掉"时，关在市监狱普通牢房的被捕的市委成员

还以为是他们城市里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当他们等待被立即执行处决时，他们唱起了《国际歌》。

*　　　*　　　*

不明真象和孤独感，使许多等待逮捕或已被监禁的人不知所措，产生消极甚至是屈从命运的情绪。B·沙拉莫夫在他写的一个故事中这样说："斯大林之所以能为非作歹和比较轻而易举地去镇压几百万人，正是因为这些人是完全无辜的。"多数人知道要被逮捕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去躲藏起来或想办法摆脱灭亡的命运。例如，我们知道，在雅基尔被枪决之后，基辅军区政治部主任M·П·阿麦林也被召回莫斯科。当时，他很清楚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什么。他告诉自己的亲属说："我不知道能否回来，但你们相信，我从来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政权和国家的敌人。"①

指挥白俄罗斯军区的军区司令员И·П·别洛夫在突然被召回莫斯科时已有不祥之感，和他同行的A·M·桑达洛夫说，别洛夫老是在公务车厢的走廊上走来走去或者长时间地站在黑漆漆的 795 窗口旁边。他几次向桑达洛夫提出问题，从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可以看得出，别洛夫总是在想自己的前任司令员伊·彼·乌波列维奇的事，后者也被突然召回莫斯科，就再也没有回来。别洛夫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到莫斯科后，马上被逮捕，不久他就牺牲了。②

远东边区党委会常务局委员巴·伊·沙巴尔金在内务部工作人员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拒绝执行逮捕命令，并且要求把自己问题提到州委常务局会议讨论。但是，州委书记虽然完全不明白怎么一回事，却叫沙巴尔金服从命令。沙巴尔金服从了并把武器交给了内务部工作人员③。就连被召回莫斯科的将遭逮捕的外交官，多数人明知事情不妙，或猜测到他们被召回国的原因，但他们几乎

① 《军事史杂志》1964 年第 7 期第 119 页。

② 《军事史杂志》1963 年第 6 期第 76 页。

③ 巴·伊·沙巴尔金向本书作者讲的故事。

都是服从了这些命令。①

甚至也有这种较少的情况，有一些人，他们长期痛苦地等待被逮捕，当他们被抓起来，终于被关进了监狱之后，他们心上反而出现了某种轻松的感觉。

老布尔什维克德沃列茨基被逮捕并被关进明斯克监狱之后，告诉同牢房的犯人说："好啦，同志们！今天我大概可以睡一个好觉。三个月以来第一次……三个月以来我都坐卧不安，总是等着来抓我。每天都在抓人，可是一直没有抓我。所有人民委员被抓走了，可是就不来抓我。精神上实在受不了。我总不能打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抓我？现在上帝保佑！……今天内务人民委员部来电话。我卧病不起几乎已有一年了，我的腿不能动了。这天有一个头头来了电话说：您能否到我们这里来一个小时？我们需要向您质疑。我回答说：好吧，我能去，请派一辆汽车来。"②

犯人的不知所措和不明真相的状态，当然对侦查人员有利。顿河罗斯托夫的一个区委书记告诉同牢房的人说："这样做是党需要的，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成为牺牲者。"③一些犯人甚至在自己同志面前为狱方使用酷刑辩解。巴·伊·沙巴尔金在一间普通牢房里遇见一批党的干部，他们说，既然苏维埃政权被迫使用如此残酷的措施，那么"这一定是需要的"。这些人在经受了最恶毒的摧残之后，他们还在监狱里继续唱这样的歌子："我不知还有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① 也有一些被召回莫斯科的外交官和我们派出的秘密侦察员（其中包括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拒绝返回苏联，他们留在国外了。现在有人为此而指责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其他的人，认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违犯了我国的某项法律。这是不公正的指责。是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违犯了我国的某项法律。但是他是在斯大林把苏联宪法象一张纸片一样撕碎了之后才这样做的。在斯大林把我国最起码的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定都废除了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指望在斯大林专横的条件下，他的事情可以得到细致公正的审理，不能指望对他的一切指控可以得到详细的调查。拉斯科尔尼科夫完全有权不回苏联，留在国外，因为斯大林已准备置他于死地了。

② 引自Я.И.德罗宾斯基未发表的回忆录。

③ 引自瓦·伊·沃尔金的未发表的回忆录。

1937年在明斯克"食品工业俱乐部"里，对粮食征购局一批"暗害者"进行了一次完全是耍阴谋的公开审判。有一个被告，他是白俄罗斯粮食征购局办公室主任，老布尔什维克，是顿河第一军的创建人，这位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武装粮食征购队队员丘德诺夫斯基被指控的罪名是：似乎他把壁虱放进粮食里了。在公开审讯前，同牢房的同志要他在审讯时讲实话：说自己受了刑，把手和背给人们看。可是同牢的难友听到他那哑了嗓子挤出来的几句话："朋友们，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审讯是公开的！审讯人员说，波兰领事还要出席。我怎么能在他面前丑化我自己的国家？"①

多数基层党组织对非法逮捕采取的消极态度，骤然看来令人费解。当我们看三十年代的报纸时，就可以看到，很多党组织当它的成员遭到不公正的诬陷指控时（这类指控在那时几乎每一个联共（布）党员都会遇到），也保护过他们。但是，他们去保护自己的党员，通常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还没有插手之前。而在某一党员已经遭到逮捕之后，党组织对他的态度一般都有很大的改变。事实是，几乎没有一个基层党组织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去保护自己被镇压的职员，担保他们是诚实的、是忠于党的党员。事实是，作为"人民敌人"党组织开除它的某些党员的党籍的决议，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致通过的，而且对这些党员遭到的指控并不进行任何讨论。

有人要问："在这样的条件下，普通党员，乃至许多领导者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基层党组织在那些年代没有能够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那么区委和市委就要去"纠正"它，就是说要狠狠打击一切对"人民敌人"提供保护的人。一位老苏共党员写信给本书作者说："那时，共产党员在会议上能说些什么呢？把新的揭发材料提供给告密的人吗？问题就在于任何人都不敢对另一个人去说斯大林的任何坏话，所以每个人就是在了解某些情况，知道和猜想到一些真

797

① 引自Я·И·德罗宾斯基的未发表的回忆录。

实情况，他也只应该去歌功颂德，你看，如果你是某一区的宣传员，你试试看，如果你不去歌颂一番，你试试看，如果你没有给'敌人的攻击'予以反击！这就是说每一个人不得不单独地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你的世界观和你周围所见所闻的那些认识应该无关。然而，任何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如果他不能在十年之中只说违心的话，如果他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思想，那么他就要被送进集中营了"。

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上述的这类逻辑，但正是这种观点在个人迷信年代广泛地流行。

798 1937—1938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了，他们被指控参加了各种反斯大林及斯大林的助手的阴谋，然而，今天我们只应该责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缺乏反抗恶劣势力的斗争精神，责备他们过分老实和信任人了。这些想法真是奇谈怪论。

* * *

共产党员们的不明真象和不知所措的状态，他们对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的信任，同时，当他们看到降临在党头上的恐怖时，他们又怕得要死，——这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感情、思想和苦闷在很大程度上使党瘫痪了，党的领导的团结和统一受到打击，这样一来，斯大林就有可能较容易地篡夺了国内的一切权力。

当然，斯大林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单单利用了党的队伍这种不知所措、不明真象和缺乏团结的状态，他还百般拨弄，造成分裂，他挑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利用部分中央委员反对另一部分，使他有可能将他不称心的人各个击破。在这里应该指出：在我们党内禁止了宗派和团体的存在，但并没有结束某些小组或一些党和国家著名领导人之间在某些原则和非原则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然而，又因为没有公开争论的可能，就使这一斗争往往采取了极不正常的和十分残酷的形式。斯大林在他的政治游戏中善于利用这些被伪装起来的争吵。他不仅不去把其他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相反，他不择手段地企图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扩大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着的裂痕和分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斯大林使用了一切手段:他利用了各种意见之间的斗争,某些干部的过分的自尊心,由于各种原因个别的党的领导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彼此的反感,以及各种争吵和互相猜疑。他在党的统一的口号下,使用了一切手段在党的领导层中保持他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斗争的气氛,挑拨一些人去反对另外一些人,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力图借别人的手达到自己的目的。斯大林利用了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最坏的品质,他挑拨下属反对领导,玩弄人民群众,使某些普通干部和某些领导人对立起来。作为耍阴谋、挑拨离间和进行蒙骗的巨大行家,甚至对在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中间发生的各种争吵和互相指责,他不仅不加制止,相反,却多方鼓励。众所周知,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这样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对立关系,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斯大林本人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看来,斯大林非常了解自己助手的个人品质,他认为,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和是他的权力重要保障因素之一。 739

党和国家机构其它一切环节中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团结。例如,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里斯大林极力鼓励李维诺夫和克列斯廷斯基之间的斗争,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鼓励伏罗希洛夫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斗争,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里鼓励奥尔忠尼启泽和皮达科夫之间的斗争,等等。这样的政策也帮助斯大林把他不称心的人各个击破,一层一层地消灭掉。

上面我们已谈到关于别洛夫、勃柳赫尔(加伦)、德宾科、阿尔科斯尼斯等这样的军事将领的悲惨遭遇,他们都是于1938年被捕和牺牲的。然而,就在一年前,无论是勃柳赫尔、别洛夫、阿尔科斯尼斯和德宾科,以及其他一些后来被捕和被处决的高级将领,都曾作为最高法院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波列维奇、普利马科夫和我军其他著名活动家,并且判处了他们死刑。他们都在判决书上签过字,他们的心情都是多么沉重。伊·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我们在迈耶尔赫里德家里度过的那可怕的一天。我们正坐在那里并安安静静地观看雷诺

阿[①]的作品，这时迈耶尔赫里德的一个朋友，军团司令员И·П·别洛夫进来了。他心情非常激动，他没有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迈耶尔赫里德还有柳巴和我，就说起如何对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人进行审判的情况来了。别洛夫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就在我们的对面坐着，乌波列维奇在盯着看我的眼睛……'我还记得别洛夫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把我放在他们位置上去的。'"[②]

1938年弗·斯米尔诺夫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那年最初几个月为了把"人民敌人"从海军中"清洗"出去，他专程去各舰队进行视察。新人民委员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到年底他本人就被逮捕并且被处决了。

难道埃赫作为西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在1936年没有批准在西伯利亚逮捕并处决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吗？后来这些原来的反对派又被逼供出关于埃赫的诬陷材料，于是埃赫作为西西伯利亚的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被处决了。联共(布)中央的部长，我党著名的活动家卡·雅·鲍曼和雅·阿·雅柯夫列夫难道没有在1936—1937年为了许许多多大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所犯的微不足道的过失和假造出来的错误而支持对他们进行迫害吗？然而，这些中央委员也没有幸免遭到同样命运。

众所周知，巴·波斯蒂舍夫作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为了消灭乌克兰的民族干部也卖过不小的力气。还在1932—1933年波斯蒂舍夫和斯大林一起组织了对斯克雷普尼克的迫害，直至把他逼得自杀身亡。1937年波斯蒂舍夫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乌克兰的代表弗·阿·巴利茨基写过几十个名单，其中有几百人都是完全无辜的人。诚然，当(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专政机构的名单中出现了和波斯蒂舍夫关系很密切的一些人时，他开始感到非常不安。波斯蒂舍夫于1937年2—3月在中央全

① 雷诺阿(1841—1919)是法国著名画家。——译者

② 《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3期第152—153页。

会上讲话时，曾对某些镇压活动是否正确和有根据表示了一定怀疑。但他的怀疑并没有使乌克兰的潮水般涌来的镇压巨浪得以停止，波斯蒂舍夫继续批准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逮捕。甚至在他的妻子于1937年被捕之后，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这些活动。不久，波斯蒂舍夫因“缺乏警惕性”被撤去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后被任命为古比雪夫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波斯蒂舍夫也并没有醒悟过来。正是在波斯蒂舍夫的领导下，古比雪夫边区(那时包括摩尔达维亚)于1938年以其它地区未曾有过的残酷程度“清洗”了“人民敌人”。难道不是波斯蒂舍夫批准摧毁古比雪夫边区的几乎全部组织和边区及城市所属的一百一十个区委组织吗？难道不是波斯蒂舍夫组织了对边区农业管理局的假的公开审讯，使边区农业机构的相当一部分干部被枪决了吗？难道不是波斯蒂舍夫批改了许多送交他批准的判决吗？本来检察长和侦查员提出可以判处八年或十年监禁的案子他却改成了处以枪决。然而，后来当边区已被“清洗”完毕，波斯蒂舍夫因“毁灭了干部”(这个带有嘲弄人味道的措词是出自斯大林之口)被撤了职，并遭逮捕和枪决。

甚至过去很巩固的家庭也于1937—1938年期间被分裂了。老党员M·Л·拜卡里斯基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敖德萨市的伏罗希洛夫区区委会常务局一个接一个找了许多男女共产党员谈话。常务局会议有时一开就是一通宵，他们忙于开除那些已经被逮捕了的人。对被捕者的共产党员的妻子严加追逼：为什么她没有及时揭发她的丈夫？他是敌人！

许多妻子回答说：‘是的，确实发现过他有些奇怪，但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的，承认自己有错……’

我很早就认识这些妇女，她们都是腰束皮带的我们的姑娘。她们被开除了党籍(如果谁能够提供出有关她丈夫的朋友的‘材料’，她就只得到警告处分)。当时，受到谴责的不是告密，而是不去告密。

802 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人们的行为自然是根据时代的要求。但有一个妇女，她名叫奥克萨娜·拉扎列娃。她的丈夫伊萨也夫已经被捕了。她也被逼问说：她为什么没有汇报？

奥克萨娜说：'我不相信我的丈夫可能是人民敌人。我知道，真理会被揭开，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坚信不移，我愿把自己的党证留在你们这里。总有一天，你们会叫我再来而且会把我的党证还给我。'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同意她的作法。所有的人都非常气愤——她怎么敢这样做呢？当时衡量人的行为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十八年后，奥克萨娜被恢复了名誉。然而，那些开除了她党籍的人不可能再把她叫到常务局去，因为在他们同意逮捕并枪决奥克萨娜的丈夫之后，他们也很快被枪决了……"

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下面的一桩事，1937—1938年期间，一些文学和科学流派和小组也利用了形势，为了诽谤以及从肉体上消灭自己近年来的反对论者，有些人费尽了心机。个别的科学家、作家、艺术活动家不仅没有保护自己的同事，而且相反，狠毒地、坚决地、千方百计地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把某些科学和文化领域里所谓钻进来的"人民敌人""清洗"出去。

* * *

上面我们所讲的是多数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不明真象和不知所措的状态。然而，就在当时，在监狱内外当然也有一些人基本上正确理解了所发生事态的主要内容。七十五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泥炭总管理局局长伊·伊·德琴柯在索里伊列茨克监狱里告诉已遭逮捕的原契卡人员苏·奥·加扎梁和原吉尔吉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M·别洛茨基说："你们的逻辑太幼稚了。你们对发生的一切一点都不懂。难道你们真的不明白今天发生的事件，列宁早在二十年以前就预见了吗？诚然，列宁的这些话被束之高阁了，一把大锁把它们锁了起来。广大的党员群众可能不会知道列宁说过的话，他说过，当一个很不客观的人把无限的权力集中

803

到自己之手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而现在，天才的列宁的话变成现实了。那些有可能在某种时候妨碍这个人实施他的无限权力，不允许他不同任何人商量就可以推行自己政策的人们，都已经从肉体上被他消灭了。我同你们是能够活下来的个别的幸存者。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消灭了，有一部分列宁时代的老干部保存下来了。他们很明白一切是非曲直，我可以设想，在这样的局势下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些老干部身上。要懂得，在党没有讲出自己应该讲的话以前，在党没有把这个人予以处置之前，在党没有回到列宁的各项指示的精神之前，我们总会被看成是苏维埃国家的凶恶的敌人。"①

甚至连青年人当中也有人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表示不满，这些人是从小时起就受到关于斯大林是非凡天才的思想教育。《涅曼》杂志于 1962 年发表了一个明斯克学生、共青团员米哈伊尔·莫洛奇柯的日记，他在 1935 年 2 月 3 日写道："读报很有趣，特别是《共青团员报》。(苏维埃)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很有意思。我读了作家 A·歌颂斯大林的很令人激动、措词华丽的讲话。老实说，我不喜欢总是不断地歌颂这位'伟大战略家'、'英明领袖'等等的作法。这已经是系统地、一刻不停地在腐蚀一个人。当然，可以说，可以写，可以给以奖励，可是现在没完没了地，用最好的形容词来歌颂个没完。大会上全部的讲话只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一切地方，一切方面都要安上斯大林的名字。我想象不到，也无法想象，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赞扬和热爱斯大林。我本人没有这种热爱的感情，甚至没有体会到有非常尊敬他的感情。"②

然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些诚实的苏维埃人已经开始有所了解，看到党及国内所形成的专横，亲眼看到他们的亲友怎样成为非法镇压活动的牺牲者，他们又坚信他们的

① 引自苏·奥·加扎梁未发表的回忆录。

② 《涅曼》杂志 1962 年第 4 期第 141 页。米·莫洛奇柯在同芬兰战争时自愿参加了红军，1940 年牺牲。

这些亲友是诚实的，是忠于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有一位著名诗人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写过一首诗：

“我们都是他的战友，
在我们的沉默中
人民的苦难倍增的时候，
我们默然垂首。

当他在我们的圈子里头，
物色刽子手的时候，
我们互相回避，
长夜难熬。

让万代千秋，
蔑视我们，
我们大家都一样，
并不隐讳自己的耻辱。”

写这首诗的人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他在个人迷信年代大概生活得很不错。那时，他所见所闻比别人多，了解许多不公正的和违法乱纪的事实。但是，他并没有沉默，相反，他拚命颂扬斯大林，甚至号召进行镇压。①现在他感到羞愧，然而，如果他想藏到他所

805

① 在1937年，就是这位诗人在自己的名为《仇恨》的诗中写道：
“仇恨，你要成为永久的栋梁，
找出更准确和辛辣的语言，
使我们在丑恶的东西面前，
不至于晕头转向。

你使艺术家顺利通过
审判和侦讯这一关，
并听信审讯记录的平凡真理，
及普通罪证的朴素语言……

谓“我们大家都一样，并不隐讳自己的耻辱”的斯大林时代的那些同代人背后，那是办不到的。

情况不是这样的，在个人迷信年代人们的行为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应负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许多因素都起了作用。首先，要看某一个人离开国内所发生的悲剧中心距离有多远，要看他们处于何种可能的条件。不能把人民委员或甚至作家同普通党员，普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行为和责任等同起来。不能把集中营或“政治犯”监狱的头头同普通看守牢房的战士的责任等同起来。第二，许多事情是以某人对当时形成局势的了解程度和他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辨别能力为转移的。最后，人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胆量和诚实程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有不少人当斯大林从事犯罪活动的时候积极帮助了他，并成为他的依靠力量。这些人自己也有不少非法行为，他们主动地诬告和迫害了诚实的苏联公民。对刽子手的这些助手和继承人不仅应该给他们打上耻辱的烙印，还应该依法惩办。

我们知道，许多还有“自由”的人，他们曾作为“证人”被叫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他们只因为怕遭到逮捕，在这里编造了任何一份材料，甚至是编造了最假的材料或在这种材料上签了字。

有不少人不仅仅保持了沉默，而且常常主动地、不遗余力地去

即使敌人悄悄走过，
或者贴墙站着，
甚至由于未被当场抓住，
未被当面揭发，
如今仍道貌岸然，
投票‘赞成’。

你使他象避开瘟疫那样，
拚命逃脱我们的诗歌，
最终羞辱地倒在地上，
无法再隐藏自己的绝望。”

奉承和歌颂了斯大林。

然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以某种形式起来反对专横。

这些反抗的性质各不相同。我们知道有这样几个例子，个别的苏维埃、党的或经济工作者在知道即将被捕时，离开他住的城市，有时甚至改名换姓转入地下。（Ю·鲍列夫在他写的剧本《一个活人的复活》中就描写了这类的事实。）

中央委员会，检察院和斯大林本人也收到了不少申诉和信件，806 这些信不仅是被捕者的亲属和亲密的朋友写的，还有许多文化和科学著名活动家，许多国家和党的干部写来的。我们已说过关于卡彼查要求释放物理学家兰道的事。Д·H·普利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也坚持要求释放尼·伊·瓦维洛夫。他去见过莫洛托夫、贝利亚，最后决定迈出非常冒险的一步——即提出给被捕的瓦维洛夫授予斯大林奖金。

玛·沙吉尼扬写的短篇文章《过去的一页》中讲述了许多著名的苏联作家和诗人如何团结起来勇敢地去维护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的苏联诗人达维德·维戈得斯基。尤里·登尼亚诺夫、鲍里斯·拉甫列涅夫、康斯坦丁·费定、米·斯洛尼姆斯基、米·左申柯和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不顾自己的处境和自己著作的命运，在怀疑一切和镇压活动最可怕的年代冒着危险写了申诉信和送上了担保书，请求释放自己的同志。然而，这一批列宁格勒作家的勇敢的行动并没有帮助他们想要保护的人。维戈得斯基没有被释放，他死于监禁之中了。曾介绍图哈切夫斯基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 H·H·库利亚勃柯，当他知道图哈切夫斯基被捕之后，马上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表示抗议的信。这封信当然不会丝毫影响图哈切夫斯基的命运，但不久以后，它导致库利亚勃柯本人的逮捕。①

当为物理科学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的天才的苏联理论物理学

---

①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回忆集）莫斯科 1965 年版第 30 页。

家M·П·布朗施坦于1937年被捕时，起来保护布朗施坦的有象C·И·瓦维洛夫及B·A·福克这样知名的物理学家。给苏联检察院写信反对逮捕布朗施坦的信上签字的还有萨·雅·马尔沙珂和科·伊·丘科夫斯基。当然，这一抗议没有被人理睬。[1] 其它几十万、几百万类似的抗议信也同样毫无下文，这就使许多人后来被迫缄默起来。

我们的机关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看到侦察材料，他们力图 807 更积极地和直接地去反抗那些加诸于诚实的苏联人们头上的非法暴行和迫害虐待。

哈萨克斯坦一个州委书记H·C·库兹涅佐夫在大规模镇压的前几个月里批准过逮捕州的许多共产党员。但后来库兹涅佐夫开始怀疑这些镇压是否公道，他亲自到州的监狱里去，审讯了一些自己的朋友，他确信他们是完全无辜的。这时库兹涅佐夫把州委的干部派到内务机关，亲自监督州的专政机关的活动。H·C·库兹涅佐夫争取到释放一些过去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禁止侦查人员对犯人使用非刑。H·C·库兹涅佐夫搜集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非法活动和混入这些机构的各种有问题的人（包括一些原白匪军官）的大量材料，他带着这些材料到了莫斯科并坚持要求斯大林接见他。然而，斯大林只听了库兹涅佐夫几分钟的汇报，然后就打断了他，建议他向马林科夫去汇报，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马林科夫也不愿意过问库兹涅佐夫的材料，建议他回哈萨克斯坦，用书面方式把自己的汇报通过信使送来。库兹涅佐夫回家后才知道他已被调到另一州去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应召去阿拉木图开会，就在旅馆里被逮捕了。库兹涅佐夫过去领导过的两个州委都同时遭到摧毁性的打击。不久前根据库兹涅佐夫的要求被释放出狱的全体共产党员又被逮捕了。[2]

吉尔吉斯共和国也出现过对抗内务人民委员部罪恶活动的企

---

① B·Я·弗伦克尔：《Я·И·弗伦克尔》莫斯科1966年版第13页。

②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馆中保存的H·库兹涅佐夫回忆录。

图。1937年吉尔吉斯共产党（布）中央也企图干涉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吉尔吉斯党中央了解到对犯人进行严刑拷打及折磨以后，为了检查共和国的检察及侦查机构的工作状况，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的活动的结局是悲惨的——它的全体成员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镇压了。①

808

根据原契卡人员B·A·孔杜什的证实，还在1936年，列宁格勒开了一次内务机关的积极分子会议，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И·P·科达茨基出席了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许多内务机关在深挖和消灭"人民敌人"方面的工作软弱无力。报告人是列宁格勒内务局的领导人沙皮罗。沙皮罗讲完话之后，州内务局的另一位领导者——德罗维亚尼科夫也上台讲了话。他说："同志们，我们不是在揭露阴谋，而是在炮制阴谋。我们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的党，就是说，我们正在根据诬陷的材料和错误的指控迫害和消灭人们。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但是我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干出来的一切，不能保持沉默。"

德罗维亚尼科夫讲话之后，科达茨基走上了讲台，他的讲话措词非常严厉，他号召大家同一切人民敌人展开无情的斗争。当时，科达茨基还宣称："德罗维亚尼科夫的讲话证明，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部也钻进了人民敌人，应该无情地把他们挖掘出来。"德罗维亚尼科夫当场被逮捕了，当天夜里他就被处决了。一年之后，科达茨基也被捕身亡了。德罗维亚尼科夫的讲话当然是勇敢的行动，但在那种条件下，不一定是和专横斗争的最好的方式。

1905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捷尔任斯基的战友，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之一毕克松也试图反对专横政治和非法行为。根据Я·И·德罗宾斯基的证实，1937年被任命为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毕克松拒绝审理许多假案。当毕克松了解到审讯时使用非刑以后，就去找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

① 《吉尔吉斯共产党的历史片断》伏龙芝市1966年版第289页。

央委员会。然而，中央书记沃尔科夫听取了毕克松的汇报之后，突然问道："你是在为那个侦查机构服务？是为波兰还是为英国的保 809 安警察局的密探局？说吧……"毕克松十分庄严地回答说："我是1905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是很了解你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沃尔科夫喊道，他抓起电话筒就扯着嗓门向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别尔曼喊道："我这里有一个老反革命，保安警察局的密探，你的干部毕克松。他替人民敌人辩护。"毕克松就在中央所在地被逮捕并送进了监狱，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几个月后，沃尔科夫被撤了职，降级使用，被派到唐波夫市，在那里的旅馆里自杀了。)

西西伯利亚军区的军事检察长M·M·伊绍夫也同样站出来试图抵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专横行为。例如，伊绍夫在托木斯克检查工作时发现，托木斯克内务局的侦查人员残酷折磨被捕者和完全无辜的人。犯人长期得不到饮食，审讯时非刑拷打。不仅如此，许多犯人一点也不清楚指控他们犯了什么罪。这些人一次也没有被审讯，谁也没有找过他们。侦查人员自己编造了审问记录，自己在上面签了字。档案被送到"三人小组"，在那里背着这些无辜的人把他们判处死刑。伊绍夫在证实这些事实之后，马上逮捕了托木斯克的内务局侦查员普奇金、瓦夫利什、斯维什尼科夫和其他一些人，下令把他们押送到新西伯利亚市。伊绍夫接着又收集了西西伯利亚区所属的四个内务局活动的大量材料，他开始系统地向苏联军事总检察长罗佐夫斯基、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和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汇报了关于这里发生的违法行为。他坚持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小范围的州委常务局会议。然而，伊绍夫虽然做到使一些非法逮捕的红军指挥员和地方干部免遭枪决，但总的说来，他反对专横政治的斗争并没有取得成效。他给莫斯科的报告通常是得不到回答的。州委常务局在听了他的报告 810 后，便把这一问题委托给那些非法镇压的主要组织者新西伯利亚内务局的局长去进行"纠正"。M·伊绍夫的姊姊和兄弟被捕了。

内务局机构给莫斯科送了一份这样的报告："军事检察长伊绍夫已经把自己摆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立的地位上，用拒绝批准逮捕的方法阻挠对人民敌人进行侦查，擅自逮捕内务局的工作人员。他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这些机构的威信。我们请求撤除他的职务并批准逮捕他。"

1938 年 3 月，伊绍夫搜集了有关内务局机构罪恶活动的补充材料之后，前往莫斯科。他把材料交给了军事总检察院以后就回到新西伯利亚，在那里又为实现社会主义法制进行了斗争。当他确信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时，伊绍夫于 1938 年 7 月又前往莫斯科，并坚持要求维辛斯基接见他。M·伊绍夫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进入维辛斯基的办公室，他指着自己办公桌旁边的座位让我坐下并问我为什么要找他？我把材料从皮包里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上，请求他听取我的意见……此外，我还请维辛斯基特别注意那些为取得假口供而使用的各种方法和手段：毒打、虐待、使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有的各种方法等等。维辛斯基听完我的话之后，向我讲了下面的话，这些话我这一辈子永远深深地留在脑子里了。他说：'伊绍夫同志，从什么时候起，布尔什维克通过了对人民敌人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决议呢？你，伊绍夫，是检察长，你丧失了党性和阶级感情。我们不准备姑息人民敌人。给人民敌人一记耳光有什么不好呢？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说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必须消灭他。我们不能怜悯阶级敌人。'"伊绍夫还是力图向维辛斯基说明，他在这里指的不是人民敌人，而是无辜的人们，内务部机构用毒打这些无辜人的办法逼他们诬告自己和别人。然而，维辛斯基冷淡地拒绝听取这些道理，只是表面上表示将委托在座的罗佐夫斯基去核对伊绍夫送来的材料。当然，任何核对也没有进行。几天后，回到新西伯利亚的伊绍夫被捕了，而批准逮捕他的正是维辛斯基本人。

811

* * *

上面讲到的三十年代下半期反对专横政治的斗争的各种尝试

都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的。

第一，所有这一切尝试都是分散的和个别的，是无组织的和互相没有联系的。

第二，应该做的许多事已经为时太晚了。二十年代末还可以制止斯大林，三十年代初也还存在某些用党的正常办法排除他的可能性。然而在1934年以后，要排除斯大林只能用暴力，但看来任何人由于惧怕将产生的恶果而不愿意走这一步，因为在实践中实现这一步是很困难的。此外，谁都几乎不明白，这些事情就是由斯大林本人组织的由他策划好的篡权行为。苏联人没有意识到这点，所以他们还继续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所惯用的那些原来的反抗形式——即给“有关的地方”写信，并指望“上面”给予帮助。

因此，重要的是不仅认识到反抗专横政治和非法行为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要找出进行这一斗争的恰当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可是这点谁也没有做到。当然，在这一问题上，很难去埋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也勤勤恳恳地进行了斗争。苏联人民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在个人迷信时代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粉碎了法西斯，并帮助了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摆脱法西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

必须估计到，那时我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都还没有取得必要的历史经验，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如 812 何反对那些来自领导人，即来自苏维埃国家和党的专横政治和非法行为的斗争道路和方法。苏联人是最先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为全人类开辟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的人民，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这条道路上等待他们的一切危险。因此，当党受到了打击，而此打击是来自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方面，他们就完全措手不及了。

我们的党已做好准备经受任何来自正面的危险，但是当它受

到了来自背后的打击时，他就丧失了保卫自己的能力了。

我们的党已做好准备同任何敌人做斗争，但党在来自自己领袖的打击面前就暂时丧失了保卫自己的能力了。

十、党和国家部分机构的官僚化和蜕化变质

如果我们把我国产生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仅仅归结为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或只归结为斯大林本人的个人缺点的话，那我们会犯很大错误。如果我们不去分析我国在革命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而其基础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包括无产阶级道德同小资产阶级道德，我们党内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及官僚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我们不可能懂得产生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真正原因。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因而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成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①

813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把小、中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下层职员和知识分子都归属于小资产阶级。俄国及其他许多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下层的大量游民也应归属于这个社会集团，他们是那些丧失了或甚至从来没有占有过小私有财产的人们，同时他们也不习惯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劳动，而是靠偶尔得到的工资过活。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和集团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当中每一个阶层或集团都具备某种独自的特征。然而，他们都在不同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50—351页。

程度上具有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具有一定程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小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的特点。

由于自己政治上不稳定性，小资产阶级依据客观情况和条件，可能成为革命或反动派的后备力量。例如，众所周知，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这一期间正是那些离开正常生活轨道和迷失了方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成了欧洲一些国家法西斯专政的依靠力量。

在腐败透顶和人人憎恶的沙皇制度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遭到破坏的条件下，俄国有着人数众多的不满现状的具有革命情绪的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使我党不仅把多数工业无产阶级，而且把沙皇俄国的相当一部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几百万无产者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党的周围团结了几千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都是同样遭受到沙皇和 814 资本家的残酷奴役，所以他们在斗争中成了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如果设想，这几千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几年的革命斗争中已改造好了，摆脱了自己的缺点和阶级局限性的话，那么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此外，如果把无产阶级理想化了，把他说成是各种善良品质的代表者，那么这也是不对的。不仅在俄国的条件下，就是在许多工业发达的国家里，相当部分无产阶级也沾染了各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和弱点。马克思早已写过，无产阶级只有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才能清除那些他沾染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固有的缺点和恶习。

这样看来，如果设想我们的党能够和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环境隔绝起来，设想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不会经过各种渠道对党施加很大的压力，设想这种小资产阶级环境不会给予革命干部以极大的影响，不会对我国的整个党和苏维埃机构给予极大的影响的话，那是非常幼稚的。

众所周知，组成我党骨干力量的多数职业革命家是知识分子、

小贵族和官吏家庭出身的人。这种出身并没有妨碍多数人同无产阶级心心相印，领导他并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党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改造过程。此外，革命本身和内战使不少新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走上了舞台，而他们并没有在此之前经受过政治和思想斗争的严格的锻炼。因此在列宁逝世以后，我党领导人当中有不少的人，今天我们不能称他们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事实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因为党缺乏预见或犯了错误的结果。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这种现象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规律性的必然结果。

815

列宁很明白，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困难的问题是怎样使我党的干部免受官僚主义蜕变，怎样克服威胁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来自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列宁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变为执政党之后，不仅使部分老党员的小资产阶级的和个人野心的趋势增强了许多倍，而且使党外各种小资产阶级和个人野心家想钻进党的队伍里的趋势也增加了许多倍。1919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必须避免会在实际上助长违法乱纪现象的一切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思想，毫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好的办法。"①

列宁在自己的几乎所有最后著作和信件中，最重视这一问题，即在我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化和蜕变。列宁在谈到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时说："到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80—181页。

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培养的人材，就不能建设也无从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象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 816 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①

列宁在1922年3月致党中央的信中说："如果不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分，而是决定于可以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的威信。只要这部分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这种威信即使不被完全破坏，也一定会降低到他们不能再作什么决定。"②

列宁在同一年（1922年）写道："这一个被我们称为自己的机构的东西，实际上还完全同我们格格不入，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海里，正如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③

理所当然，个人野心家和冒险家钻进我党这一事实不可能也不应该导致党和国家机构必然的蜕化变质和丧失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的时期里，小资产阶级加强了对无产阶级压力的同时，一种相反的运动过程也加强了几十倍，这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心理、思想及道德的坚决改造的过程，向他们灌输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心理和无产阶级道德的过程。我们的党不单单是经过不断地清洗自己队伍以保护自己，用以对付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首先以前所未见的巨大规模组织了对人民群众的 817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94—95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26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29页。

教育和再教育，包括对农民、手工业者、半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小商贩等基本群众的教育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后，使用了许多传动带继续带领劳动者，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精神，培养他们对不公正的现象的不调和精神，政治积极性和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应该指出，还在列宁在世时，党在这种教育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然而，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领导了党，在他的性格和观点中，表面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点和思想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野心家的蜕化变质倾向交织在一起。

斯大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神学校里受过初等教育，从来没有真正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做过工作，因此他并不具备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品质。这当然给为列宁党的纯洁性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造成困难。当然，事情不仅仅在于斯大林本人。

我们应该十分惋惜地指出，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十年代前半期，蜕化变质和官僚化过程在不同程度上也能触及到一部分列宁党的老干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就及极大的权力，使他们当中一些人冲昏了头脑。加上越来越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并没有从来自下层的普通劳动者和党员方面也相应加强的监督取得平衡，有关这方面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所以，毫不奇怪，一部分过去是坚强而谦逊的革命者开始摆官架子。同时，在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方面许多人也太脱离了人民。一些过去是谦逊的党的干部学会了说假话，学会了阿谀奉承。二十年代末期他们并没有去制止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对他们自己的过份颂扬。

在这方面米哈伊尔·拉祖莫夫的命运是很典型的，他是1912年入党的，先是鞑靼州委书记，后是伊尔库茨克州委书记。根据很熟悉他的叶·谢·金兹堡证实，这个忠实于党的老干部眼看着变成老爷了。1930年他在公共宿舍里占有一间房子。一年之后，他修建一座“鞑靼宫”，其中有为他自己修的一幢花园洋房住宅。1933

年糙靼共和国因集体农庄建设方面有成绩，荣获了列宁奖章，于是这位“糙靼斯坦第一个工作队队长”的像片在歌声中被抬着满城走，在农业展览会上展出了他的别致的像片，这像片是那些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们用各种粮食作物——从燕麦到小扁豆——制作出来的。

根据 M·Д·拜卡里斯基的证实，1936 年五·一节时，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 H·杰姆钦科下命令借他人之手，在各楼房的阳台上和机关门口挂上他的像片。他的像在节前早就印好了足够的数量。当时纸张不足，为印刷他的像，杰姆钦科允许动用冻结了的学生课本专用纸。

贝塔尔·卡尔梅柯夫也逐渐成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的一个小独裁者，在他自己被列进人民敌人名单之前，也非常卖劲地把他的共和国的“人民敌人”“清洗”了出去。卡累马集中营的头子 Э·别尔津在 1937 年以前已被他拥有的权力以及他在卡累马搞的对他的个人迷信而忘乎所以了。他已经在许多方面都蜕化变质了。叶若夫撤了他的职，与其说是因为他对犯人实行了“人道主义”，不如说是由于叶若夫想在卡累马安排一个完全是“自己”的人。根据革命博物馆职工们的反映，该博物馆的馆长加涅茨基也变成了真正的官僚主义者。“黄金总管理局”托拉斯的领导人谢烈布罗夫斯基也变成一个极端粗暴的人。我们还可以听到有关其他许多老党员的类似的反映。但是，过去完全有根据把他们列入列宁党的老干部的队伍里面的。

当然，出现这种令人伤心的现象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人们走上通向革命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革命思想对人们所走的道路的影响也不一样。例如，可以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于 1920 年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的孟什维克维辛斯基担任检察长职务时，他首先迫害的是他原来的同志——孟什维克，而后来又去迫害他的新战友——布尔什维克。维辛斯基是一向贪求权力的、无原则的、胆小如鼠的政客。难以理解的是，象雅罗斯拉夫斯基或加里宁这样的 *819*

人，看来他们过去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他们会屈服并以自己独特的那种方式去帮助斯大林。不管怎样，从一切方面来说，管理国家比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

这样，我们看到，对革命者真正的考验不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权，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的初期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的条件下的表现。

当然，这些或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者身上出现的官僚化蜕变是不一样的。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象波斯蒂舍夫和克雷连柯这些人的极严重的，道德上的堕落。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官僚化"并没有使某些干部发生很大的政治和道德的蜕变。无论是拉祖莫夫、加涅茨基、谢烈布罗夫斯基和成百上千的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基本上保持了他们对人民和党的忠诚。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逐渐丧失了作为列宁式的领导者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们染上了瞎指挥和命令主义的习惯，他们已经不去研究，也不去考虑群众的意见了。这些人因为脱离了群众，失去了批评斯大林的行为和个人迷信的能力，相反，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斯大林。我们还不能不看到，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远不是所有的领导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作风的改变引起了劳动者和普通党员的不满。结果，斯大820 林有可能较容易地消灭象拉祖莫夫和卡尔梅柯夫这样的人，因为这样，斯大林就有可能把他同他不称心的那些人的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反对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者的斗争，说成是从党内清洗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

虽然蜕化变质已触及了党的老干部队伍，但是在斯大林的"清洗"之后，党内上层的成分就更坏了。在这些年代，为数众多的无原则的小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在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下涌上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岗位。这些人不需要变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具备象忠于人民，愿意为劳动者服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性和原则性这样的品质。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斯大林个人专政的最坚固

的基础。

诚然，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个人野心家登上党的领导岗位之后，他们也不能公开地为非作歹。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本身的特性，他们只能或依附于资产阶级，或依附于无产阶级。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野心家必然（那怕是口头上）只能去追随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设法适应环境，他们学会掩盖自己的目的，掩盖自己的真正的道德面貌，他们很巧妙地用表面的革命性掩饰了自己真正的面目。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及我党出现了整整一个阶层——他们就是"苏维埃"的市侩和"党的"小市民，他们只掌握了某些完全是表面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道德特点，所以他们与"传统的"小市民和市侩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伪善和口是心非，按其程度来说更加严重就是了。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机构受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更加严重，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领导核心不太强，而革命的影响又大不如俄国基本地区那么深刻。

同样，不能不看到，在大镇压期间受到重用和上了台的那些 821 人，他们因为迫害和逮捕了诚实的苏联公民而飞黄腾达起来的，这些人根本不想实行民主，也不愿把重大问题向群众公开。这些"斯大林分子"完全满足于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政制度。因为只有在个人迷信和无限集中化的条件下，这些人才得以巩固和维持自己的宝座。对上面阿谀奉承和百依百顺是他们对付下级和人民的挡箭牌。这样一来，个人迷信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一种宗教现象，而且完全肯定地说，它有着阶级内容，它的基础就是部分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官僚及野心家广泛渗透进党和苏维埃领导机构。斯大林不单单是独裁者，他是站在整个比他小一点的独裁者组成的体系的顶峰上的领袖人物。他在几十万更小的官僚主义者中是最主要的官僚主义者。

*　　　*　　　*

现在，有些同志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列宁在世时在我们党内和国家机构里，在那些不断发生的，一下看不见的、但是十分残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能够逐渐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在列宁去世之后，似乎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它是以列宁党的核心被彻底粉碎，以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分子取得了胜利宣告结束。这当然是对列宁逝世后这一时期中苏联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的歪曲和简单化的解释。

在此期间内，所发生的社会进程是异常复杂的，在这方面还有待于对它们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这一过程表现在多方面。一方面，工业化导致了工人阶级非常迅速的增长。而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是从游离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补充的，其中还有几百万跑到城市里来的农民，还包括一部分富农和亲富农分子。1929—1935年间，新工人按其数量比过去形成的工人阶级核心多了好几倍。自然，这一切都影响了工人阶级的行动和心理。工人阶级的成分的迅速变化也影响了党的成分，而这又使党和国家机构的个别环节里更容易发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式的蜕变的过程。

822

老党员Б.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可以说最大的变化是工人阶级成分的改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大批的农民群众涌进了生产部门（起初是建设工程单位），他们之中包括被剥夺的富农，难道这样的事实不重要吗？"

俄国无产阶级从来都是由原来的农民进行补充，但那时他是以平稳的速度增长的，始终能够融化这些补充进来的农民队伍。而现在由于工业化过程，这是革命的急不可待的需要，因此，产生了另一个平行的过程：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自发性开始冲击无产阶级的内在实质，冲击无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冲击无产阶级对人、对所有制、对自己事业的态度。这个自发势力是来自内部，它穿着工作服，手持锉刀……一旦工厂缺乏一种能够使农民工人化的力量（在数量急速增长的情况下只能如此，另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么

马上就会出现使工人农民化的过程。工人成分的变化也改变着工人自己的灵魂。这一切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党内来。

然而，发生上述这些过程的同时，也不断产生，而且越来越加强着另一个相反的过程，这就是工人阶级也在坚决地改造着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和意识，向他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道德。就在这些年代，我们的社会内部及其经济中发生了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归根结蒂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工业建设、农业集体化、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这一切明显地改变了我国的政治气氛。无产阶级的影响经过出版物、军队、特别是学校，广泛传播给大量的非无产阶级群众。新的劳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代替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共青团和无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的大规模的工作也在进行。如果说，有许多人仅仅掌握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的纯粹表面特征，那么，当然，有更多得多的人已经把无产阶级思想和道德变成自己内在的信仰和行为的基础。正是这些过程才是主要的，它们决定着我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823

如果列宁在1922年公正地说过，我们的党按其基本成分已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我们的国家机构还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的混合体，那么十年以后，这方面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各种机构的工作大为改善了，它已经能够解决更复杂的任务了。然而，在党、社会和国家的不同水平和不同环节中，这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发展也是各不相同的。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传播是在苏联人民基本群众中，在苏维埃社会最低的基层里面进行得尤其积极。镇压的结果虽然使党和国家机构下层环节也有些损失，但是就下层环节的总的领导数量来说，这些损失和社会的上层相比是少得多了。所以即便是在个人迷信年代里，在基层党组织及下层党的机构的领导中，在多数车间 824

和企业，集体农庄和农场的领导中，多数人是无产阶级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这使地方组织及相当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中基本上保持了苏维埃的气氛。当然，同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各种歪曲和不正常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多数基层党组织。这些组织在三十年代残酷的"清洗"中不是袖手旁观的。许多错误的甚至按其实质说是罪恶的指示是通过基层党组织付诸实施的。但是，在这些下层党组织及普通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的言论行动中，那种出自诚实而走上歧途和出自"好心的"自我欺骗的因素，比起上层来，在程度上要多得多。事情就在于，发给下层党组织的多数决议和指示是按最"革命的"精神写成的，这些指示中满篇讲的都是如何同社会主义敌人进行斗争，讲的是对人民如何关怀、如何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必要性等等。下层党组织因不了解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所以在那些年代看不到这个人及其助手们的言行不一，这些基层组织努力遵守的政治和道德准则是斯大林及其他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遵守的。普通党员和党的下层组织都不遗余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各种口号，他们都是做出成绩了的。然而，这些口号对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野心家以及那些在党的领导层中占领了某些阵地的官僚主义者来说，只不过是一些不断重复的空话而已。

至于党和国家的上层，那么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占上风的是一种相反的过程——即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列宁分子却被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斯大林分子"的人所代替了。

825

当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在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中间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干部。那些会镇压诚实的人们的主要的斯大林分子，却并没有能力去实现对我国的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构的领导。因此，斯大林不可避免地不得不用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另一些人来领导国家和党。例如，在党的领导层中还有较年青的活动家，他们虽然在几乎一切方面都支持斯大林，执行他的建议和指示，但对他

的许多罪行却并不了解。他们虽然也有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所特有的那些缺点，但他们还是愿意忠诚地为党、为人民服务，然而他们由于政治经验不足，不能看清楚国内发生的悲惨事件的真象。这些年轻的党和国家活动家中，有些人后来也牺牲了。另一些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活了下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努力支持了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列宁主义准则的斗争。

十一、部分革命干部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

小资产阶级分子钻进我党和国家机构以及部分党和苏维埃干部的蜕化变质通常表现为：野心膨胀和贪得无厌，无原则及官僚主义，虚荣心和老爷作风，随声附和和个人主义。

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我们这里成为产生个人迷信思想和实践的主要吸取营养的环境。斯大林主义正是从这一小资产阶级的土壤中吸收了自己主要干部力量。

但同时不能不指出，党的基本无产阶级核心和党的领导中存在的一定的保守主义思潮和倾向也有利于斯大林主义在我国的产生和保持长期统治。 826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先进的阶级。然而单凭这一观点把无产阶级理想化是不对的。列宁曾经指出："甚至在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的条件下，甚至也在最先进的被置于一切精神力量处在最高涨地位的情况下，在每个阶级里也永远会存在着——在阶级还存在，无阶级社会还没有在自己基础上完全坚强和巩固地发展起来的条件下——而且必然会存在着一些不愿意去思索和没有能力思考问题的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果情形不是如此的话，资本主义就不会成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① 马克思列宁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原文缺页码——译者）。

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对现实和理论持创造性的态度。然而，片面强调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教条主义的缺点是不正确的。不能认为，教条主义始终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令人讨厌，相反，创造性地对待事物的态度就能吸引人们。遗憾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由于他们没有受到必要的教育和训练，因此，恰恰是教条主义更吸引他们，更能被接受。因为教条主义可以使这些人不用去思考问题，不必对工作独立处理，对自己的事业也不必要具有创造精神，也就用不着非学习不可。他们不是去认识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而认为只学会一些公式和原理也就足够了。无论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还是一切宗教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正是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具有巨大力量。具有创造性思想能力的人，各种革新者从来都比教条主义者们困难得多。827 任何革命，一般虽然是新的战胜旧的，新的革命思想战胜旧的生活方式和旧的教条，但同时几乎任何革命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产生了自己的教条。在沙皇俄国时期革命的许多参与者都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和训练，所以上述的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善于把许许多多复杂的原理极端简化这点在他步步高升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党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只是通过被斯大林简化了的和公式化了的形式去了解列宁主义。这些干部看不见，斯大林已经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得十分贫乏，把它庸俗化了，把本来应该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学说变成了某种宗教。

这样一来，如果把昨天的革命者所犯的任何错误和任何不正确的行为都统统解释成小资产阶级的蜕化，这是不对的。相反，革命者们的许多错误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原来思想体系，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相应地改变他们的原来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教条主义。

实际如此，我们从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无限忠于人民，不考虑个人得失，保持了真正共产党员的许多优秀的品质，但是他们却仍然没有能力继续领导无产阶

级革命，没有能力把它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没有能力运用新的工作和斗争方法。在这些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法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教条主义的特点和局限性，保守主义和不恰当的呆板、拘谨、严肃、思想僵化和宗派关门主义等等，这就是托马斯·曼在谈到叔本华的时候所称的"革命的保守主义"。

例如，在同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时期，在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在建设新社会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就大不如革命的前一时期了。 828

这些许多人们的特点是对待事物过份简单化，观点非常狭隘，他们习惯于思考一些简单的范畴，他们把前一时期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及活动方式和方法用在新的时期。

许多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习惯于用武力解决大部分矛盾和冲突，遗憾的是他们不善于进行复杂而艰巨的教育工作，然而这种方法都是长期内用以解决新矛盾和新方法时应该使用的主要方法。某些共产党员本来应该好好学习，但是他们甚至于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反而感到自豪。二十年代末期有一位知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当听众为他鼓掌时，他说："我们中学没有毕业，但是我们正在管理整个省。"所以当这些布尔什维克遇到困难，不能足够地了解周围的环境时，他们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往往成为来自上面命令的单纯的执行者，表现出盲目的纪律性和服从。思想和行动的这种僵化状态，不善于分析和独立地、创造性地思考问题——这一切都是个人迷信思想和实践的认识基础。因此，我们在看到那些接受和支持个人迷信的人们之中不仅有蜕化变质分子和个人野心家，还有许多"诚实地执行命令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为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也是对革命和人民有利的。他们相信了有关1936—1938年间政治案件的各种假话，相信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激化的观点，相信了大规模镇压的必要性，并有意无意地成为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他的牺牲品。

М·Л·拜卡里斯基的回忆录(手稿)中描写了一个这样的诚829挚而有原则的教条主义执行者的很精确和突出的例子。作者写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她名叫叶娃："……叶娃可以称之为群众工作干部的典范。她的文化水平不很高。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对自己工作中所必须知道的一切都熟悉，这些知识对她来说是固定不变的、成套的、是无可争辩的。她读报纸，更经常是学习指示。不过，后来她对这两种学习不认为有什么区别了……叶娃在中央服装厂工作期间一直是团支部书记……超团龄后，她成了妇女部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担任党的工作，任党组织的书记。这样几乎直到她去世为止……叶娃作为领导干部在自己的一生中并没有变成一个呆板的机关干部。相反，她一直是一位积极分子。真奇怪，她一生的变化是非常小的。她一开始就信仰革命，一直到死还是虔诚地信仰着革命。

她不能想象，自己离开革命队伍会怎样活下去。对她来说，革命和党是一回事，所以她也不能想象如果自己离开党会怎样生活下去，党在她的心目中永远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党，统一的、唯一的、神圣的、绝对正确的党。一旦党批准枪决那些过去党的领导人，党认为他们是间谍和杀人犯，那么，他们当然确实是间谍和杀人犯了。对叶娃来说，并不需要别的证据了，只要有党的多数人的决议就够了，而这些决议是很快就会成为全党一致同意的决议的。

……我们所说的那种党性渗透到叶娃的每个细胞。她考虑自己每一步行动时，她只想：党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样的动机在她身上成为下意识的了，因而从她的最庄严到最普通的行动都好象是按着命令进行的：如果穿上一双丝袜子——那么党会怎样认为呢？

叶娃是否很善良？是否热爱人们呢？这是一个我不敢用简单的'是'来回答的问题。按她的品质来说，她不能容忍残酷无情的行为，她不能给人们造成痛苦，而自己去欣赏他们的苦难。然而她那830善良的心被她的心灵中无限膨胀的另一感情代替了，这种感情就

是：她长期以来所学会的责任感。在叶娃的脑子里，善良和凶恶的概念是建立在共青团小组，省委党校，后来是党的决议这一系列政治学习的牢固的基础上面的。一个具有信仰的人应该准备好，当他的信仰要求他尽自己的义务时，能够不仅蔑视自己的痛苦，而且也蔑视别人的痛苦。如果信仰的对象是革命，就是说为人民而进行的事业，那么对信仰的毫无条件的迷信会使他去忧虑事业的成败，因而想不到去忧虑人民的利害，虽然我们事业正是为人民的。

叶娃有了这样的信仰，她就不要求把自己的思想也看得非常清楚，毫无疑问，她认为如果她有了这样的'清楚'的思想，那时她那光明的、无风无波的信仰是危险的。叶娃所需要的只是来自上面的清楚的指示：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信仰的教条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没有比决议、决定、指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

亚·别克未发表的小说《新任命》的主人公亚历山大·里昂蒂也维奇·奥尼西莫夫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大干部，人民委员，老布尔什维克，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我们上面指的那个时代的许多领导者的那种局限性、教条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奥尼西莫夫是一个主观上忠于社会主义，在工作上十分诚实，在生活上也很朴实的人，他从来没有为某种个人利益而利用职权，但同时，他被作者描写成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个盲目崇拜纪律性的人。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干部，他心中想的，只是怎样更好更快地去完成来自"上面"即"主人"那里的命令。在奥尼西莫夫办公室以外的一切事情，他都没有兴趣。他个人虽然是贝利亚的敌人，但同时他又是斯大林制度的栋梁之一。作者写道："不过当奥尼西莫夫向斯大林汇报东西伯利亚地区冶金生产的各种问题时，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时代有什么反常现象和矛盾问题。对于那些足以使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智和良心感到不安的问题，他用最简单的办法加以避开，溜掉，他的办法是：这不是我的事情，和我无关，不是我 831 应该判断的事。他心爱的弟弟在监狱里牺牲了，他心里哀悼瓦尼亚，但是，这时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作法：对不是我应该管的事不加

评论，对他来说，'党的战士'并不是一句空话。后来，当'斯大林的战士'一词广泛地通用起来，毫无疑问，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有权称之为这样的战士"。①

斯大林行政机关的原某负责干部在狱中写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无论什么力量和语言都不能摧毁我对领袖和人民的忠诚。"就是在经受了十分痛苦的许多天的严刑拷打之后（有时就在贝利亚办公室当着贝利亚的面对他进行这些折磨的），这个共产党员还是不断重复着自己对领袖忠诚的这一"誓言"。他在十七年的监狱和集中营生活之后又写道："一个有原则的无辜的人，一个被投进监狱的爱国者，当他发誓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无可非议的事。然而，斯大林制度腐蚀作用表现在，当一个有思想的人已经成为专横的牺牲品，当他知道斯大林的走狗消灭了成千的无辜的人之后，在他的心中在政治上他仍然对那不公正的、危害人民的斯大林制度持效忠的态度。我应该彻底地、准确地、自我批评地指出，我为自己无罪而坚决地辩护过，我坚决拒绝提供任何诬陷别人的假口供，我在'不公正'的侦查过程中的这些勇敢行为并不排斥一种情况，即如果我暂时能获得自由，我仍然会自愿地而不是强制地继续作这一制度的忠诚的公仆。后来，当我经过思考和严肃的思索之后，思想解放了一些，我才逐渐地摆脱了忠实的官吏和教条主义者的心理状态（这是我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832 在一次犯人转移中有人编了一首"人民敌人"妻子之歌，这首歌可以证明部分领导干部的妻子的思想达到了如何僵化和教条主义的程度，这首歌中有这样的内容：

按苏联严厉的法律，
我们要为自己的丈夫负责，
我们失掉了尊严和自由，

① 见亚·别克：《新任命》"播种"出版社 1971年版第53页。

失掉了可爱的儿女。

我们虽然非常难过，
但我们没有哭泣，
我们都有坚定的信念，
我们能克服千辛万苦，
我们把火热的干劲
带到广阔祖国的任何角落。

劳动会给我们带来自由的权利，
祖国如同母亲又会把我们拥抱。
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
我们将把劳动献给我们的祖国。①

瓦·伊·沃尔金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忘记了一切凌辱和气愤，申请把我们派到前线去。我们这些要求都被他们轻蔑又心怀恐惧地拒绝了。我们安慰着自己，我们想，开采黄金和锡矿，为供应开采黄金的电力站伐木也是前线，按其经济价值来说，也许不亚于大陆上的前线。我是队长，于是我要求大家超额完成任务。满肚子气忿的谢廖沙·波斯蒂舍夫经常什么也不干闲坐着，有一次我把他痛骂了一顿，我很生气地说：'你的父亲是教育人民的，②可是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寄生虫！'然而，我太不应该骂他了。这个青年人刚从叶伊斯克航空学校毕业，他父亲就被逮捕了，所以谢廖沙作为'家庭成员'被'特别三人小组'判了十五年集中营监禁。他为他父亲和自己的事而情绪很坏，气得要命，他经常连续几小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沉思，而我却把这种情况理解成怠工。"

---

① E·Г·韦列尔—古列维奇：《回忆1937年》(手稿)。

② 他的父亲是原教育人民委员——巴·彼·波斯蒂舍夫，1939年被枪决了。——译者

833 许多关在集中营的人和囚犯都是这样想的。我们从那些活了下来又回到自己家里的人们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集中营里，犯人之间对"劳改"营的劳动总是有几个观点在争论着。一种观点是最激烈的看法，认为在斯大林集中营里的劳动是奴隶劳动，为了抵制在苏联的这种强制劳动（和镇压）最正确的道路是降低这种劳动的生产率。为了证明这样可怕的集中营制度在经济上没有效果，犯人不仅不应该认真干活，而且还应该尽一切可能对各种劳动任务进行怠工，暗中破坏设备，甚至破坏暖室中的菜苗（可是暖室中的菜是供给犯人吃的）。这一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其结果会使集中营内部恐怖制度加强起来，使集中营的管理制度和伙食更加恶化，导致犯人更快地死亡。多数犯人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不愿意举行示威和罢工，不想去破坏设备，但在工作中也不卖力气，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活下来。然而，在集中营里都有不少这样的犯人，他们力图说服自己和别人：就是作为犯人，他们仍然是继续为社会主义，为苏联的福利而工作，所以任何任务应该更好地，更努力地去完成。正是这些犯人的这一立场得到《十月》杂志的特别赞扬，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苏共二十二大之后，这家杂志也不得不写一点关于斯大林镇压的材料了。例如，1964年《十月》杂志发表的B·菲尔索夫的长诗《从露珠到星光》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

"我们胜利了……
可是那些无辜的人们
当把他们和人民隔绝，
当诬陷和谎言一步不离地
　跟踪他们，
他们是怎样活过来的？
这真是无比的英勇和无畏
它不是从天上降给苏联人民的
它诞生在战斗中，劳动里。
然而，在这里，

在这苔原深处，
它却诞生了！
在冰天雪地里，
他们开采着金属
这英勇和无畏
给人以力量，
因为，这是为苏维埃俄罗斯而工作，
不是为诬陷他们的
　那些人们！
呵！这里见到过多少死亡！
他们的劳动是为了胜利！
　为了列宁思想的永生！
即或他们没有在前线拿起武器，
然而在那黑暗的日子里，
在他们的双手下，
为了祖国的永生，
一座座城市平地而起，
一座座工厂出现在
　苔原森林里……
他们不需要勋章和奖章，
他们不需要献得太迟了的花束，
只要祖国——
　从滴滴露珠到灿烂的星光
都蒙受着荣誉。①

834

当然，这种立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斯大林集中营的政治犯的强制劳动不是为社会主义，不是为祖国福利，不是“为列宁思想的永生”的劳动。这只能是极端教条主义者的想法。

---

① 《十月》杂志1964年第10期第8—9页。

我们已经说过，教条主义者不能为解决革命新时期的任务和问题找出新的解决方法。然而，事情还不在于此。教条主义者往往不能懂得，许多新问题和新任务都有多种而不是一种的解决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依据地点和时间，民族特点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条件而采取不同形式。教条主义者看不到这些，所以他把任何离开他所习惯的教条和公式的倾向都看成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相敌对的行为，因此都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和惩罚。

还必须指出，在个人迷信时期对现实状况持有的简单化的态度，公式化和样板化的工作方法不仅表现在某些领导者的行动上，而且许多极其幼稚的公式和教条通过宣传和教育系统地灌输给群众，把这些东西变成群众的行动指南。H·科尔扎文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写道：

"我以极大的兴趣翻开了
　《探照灯》画报，
呵！当年我曾卧在地板上，
　画那紧握步枪的铁拳。
我记得：
每当节日，我从不吝惜
　白粉和黑墨。
我将全世界谁红谁白
　分得清清楚楚。
我的个子长得很小，
人也瘦弱，然而我
满怀激情、兴高采烈
在队列中正步行进
我也曾怀疑每一个肥胖的人
　都是资产者。"

835

的确，在二十——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流行过一个教条主义的

和宗派主义的口号："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①

这样一来，一切站在中间立场的人，一切动摇的或者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但却不是完全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人都归于敌人之列了。结果，本来应该落在敌人头上的打击，却落到中间分子，甚至落在我们的同盟者和友人的头上了。

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实践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共产党变为执政的、管理国家的政党不仅为布尔什维克开辟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极大的可能性，而且同时也带来了党官僚主义蜕变的危险。我们认为，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家和国家政权问题，早在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文献中就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应该保存和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还是应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应该在旧的国家废墟上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还是它有可能完全不需要国家？无产阶级国家会存在多久，它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官吏集团呢？这一切问题都成为革命者之间展开的激烈争论的对象。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自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836

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学说里，是把社会和国家严格加以区别的。按照他们的学说，国家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主要的保守力量。按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见，国家是一个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的最严重的障碍。按他们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立即消灭任何国家，如果还存在着强大而发达的国家，那么

① 列宁也提过"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这样的口号。但这是在国内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当苏维埃政权暂时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提出来的。如果把这一口号搬到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条件下，那就只能是教条了。

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无国家的社会才可能实现自由和平等。这样一来，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过渡时期的问题，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了镇压被推翻阶级反抗的必要性，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必要性，按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群众的必要性，等等。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立即取消国家。无政府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米·亚·巴枯宁写道："由于任何国家权力和任何政府，按其实质及按其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地位来说，必然力图把人民所不欢迎的秩序和目的强加在人民头上，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任何国家制度的敌人。我们认为，人民只有当它自下而上通过自主和完全自由的联合方式组织起来时，在完全没有官方监护，但不排斥和他们一样自由的人物和党派的影响下建立自己生活时，才有可能取得幸福和自由。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观点，为此，人们称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反对这样的称呼，因为我们确实是任何权力的敌人，因为我们知道，权力对当权者和对那些被迫屈从于它的人们起的腐蚀作用是一样的。在权力的腐蚀作用之下，一些人变成野心勃勃的自私自利的独裁者，他们为了自己个人或整个阶层的利益而变成社会的剥削者，另一些人就成了奴隶。"①

837

从这一立场出发，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反对无产阶级国家。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任何无产阶级国家不可避免地蜕变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因此，只不过是成为奴役人民群众的新形式。巴枯宁写道："成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会成为管理国家的领导吗？……那样的话，就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家……对待这一非此即彼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把人民管理说成是人民通过少数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管理。……结果，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最后都要得到同样的最悲惨结论：特权的少

① 《巴枯宁全集》第2卷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166页。

数人管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说，这少数是工作人员。是的，也许是原来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一旦成为管理者或人民代表时，他们就不再是工作人员，他们会从国家的高度去看待整个从事粗活劳动的世界，他们不再代表人民，而只代表自己和他们对管理人民的要求。谁会怀疑这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质。”①

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描绘的这一暗淡的前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在一天之中就产生出来。这一社会的建立需要为在新基础上改造社会结构和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反抗而进行长期的斗争。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所以无产阶级不可能没有国家。无产阶级在摧毁和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后，必然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要给它以“革命的暂时的形式。”②

838

弗·恩格斯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反对无政府主义者。

他写道：“……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③

理所当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保护无产阶级国家，使它不发生蜕变，不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然而应该指出，这一问题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得到多少是满意的解决。这点当然有它的原因。

---

① 《巴枯宁全集》第2卷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56页。

③ 同上，第554页。

第一、在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经验时，很难制订有关这一国家活动的任何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才提出了有关国家的一些设想。

第二、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这一前提出发的。因此，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国家的存在虽然是必要的，但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毕竟还是短暂的阶段。

弗·恩格斯写道："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① 恩格斯在另一处指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一般关于国家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国家问题首先由列宁加以发挥了。1917年列宁为此问题写了他的一本主要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

自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夕的1917年，对列宁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发展和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的必要工具的这一学说。

众所周知，列宁那时就已经不同意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关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20—3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36页。

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那种原来的设想。列宁从自己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理论出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取得胜利。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之间最残酷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点又把建立强有力的和巩固的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摆到十分迫切的地位。

列宁写道："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① 然而，列宁同时也不排斥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家逐渐消亡的论点。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② 然而，列宁强调指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通过吸收劳动人民的群众团体经常和无条件地参加国家管理的办法，为任何国家化的完全消亡而做好准备。

至于无产阶级国家有可能蜕变问题，在 1917 年的时候这一问题还没有显得那么迫切。因此，列宁并没有太重视它，他只是基本上重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③

841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212 页。

② 同上，第 190 页。

③ 同上，第 266 页。

然而，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我国正在迅速建立和巩固强大而广泛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它面前提出了维护和继续发展革命成果的任务。正是由于全国各地产生了新的苏维埃政权机构，由于有了强大的红军，由于出现了象全俄非常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我国的无产阶级在残酷和血腥的斗争中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得多的敌人。

另一方面，就在刚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机构中同时出现了一些其它的使人不安的过程。由于缺乏有文化的和有训练的苏维埃工人，管理机构钻进了许多阶级异己分子，而他们并不准备也不愿意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工作。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了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

共产党作为执政的党，作为监督一切国家机关活动的党，用自己的影响在许多方面约束了这些过程，并不断关心无产阶级国家的不断健全和巩固的问题。实际上党开始监督新的苏维埃国家机器，党的最优秀的干部被分配到国家最关键的岗位，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向党组织及俄共(布)中央汇报工作，并执行党组织交给他们的指示。

842

然而，甚至连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

其次，也是特别值得指出的一点：我们的党，特别是他的领导部分，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不再仅仅是社会的政治组织，即志同道合者的联盟。革命以后的党的机构已经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系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党的机构，首先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在我国成为制定政策法令的机构，换句话说，它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系统中的真正的立法机构。当然，在苏维埃

国家里，党的这种影响是应该肯定的。因为正是经过两次革命锻炼的党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它把刚刚产生的新的社会机体的一切器官联结在一起，并把它们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党的上层这种国家化过程也存在一些不好的结果。由于党的机构中的许多工作人员现在掌握了比国家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更多的实权和影响，所以这使一些党的干部往往开始滥用自己的权力。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重要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 843 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某种独立性，他们身上出现了一些念头和心理状态：企图使不太坚强的党员屈从于自己。

另一方面，党的高级机构变成了制定政策法令的立法机构之后，这使一些革命前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体系中的代表机构（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削弱了。这些机构与其说是制订和从实质上讨论这些或那些法律，还不如说只是从形式上通过党中央所提出来的决议和指示。

弗·伊·列宁很仔细地观察了上述的一切肯定和否定的过程和趋势。我们知道，列宁本来准备在革命胜利之后写《国家与革命》的第二部分，他想在这一部分里总结一下建立年青的苏维埃国家及其活动的经验。然而，他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这一意图。

遗憾的是，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非常重要的和关键性的任务，在列宁去世之后也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是最不关心去完成这一任务的。相反，斯大林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和实践问题还不完善这一点，以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环节，特别是能够防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措施，所以斯大林才有可能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而且逐渐把国内及党的一切权力篡夺到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列宁时代建立的反对滥用权力和官僚主

义及蜕变的各个环节和各种保障不仅没有继续加以发展，而且逐渐并彻底地把它们的作用削弱了。我们在下面会看到，连党内最844 高工资限额的规定也逐渐被取消和完全不存在了。列宁去世以后，立即开始了广泛吸收新党员入党的运动。仅仅三年之内（1924—1927 年）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半，1927 年初，党员已达到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人。斯大林就连象为纪念列宁逝世征收党员（当时称之为“列宁召唤”入党）这样神圣的群众运动也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几十万文化水平不高和政治训练不够的工人在同时间里被吸收入党，这就大大加强了党的机构的影响和权力。一切领导干部定期更换的原则被斯大林广泛利用来更换他不称心的干部，同时，斯大林及他的一些亲信实际上则被宣布为终身任职。

对于列宁去世以后，我国发展着的这一切复杂而危险的过程和趋势，我们还需要进行最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下面我们将十分粗浅地分析一下这些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对管理机构人民监督的削弱。

十三、对管理机构人民监督的削弱

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大量的国家职员以及党、军、政工作人员，就不可能管理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整个官吏队伍是骑在人民头上并首先维护剥削者的利益（当然，除非劳动者自己建立的组织中的职员）。所以，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乃是不可缺少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在那里，管理是通过脱离群众的特权人物来实现的。

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官吏阶层是完全依存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当权的阶级通过许许多多的渠道对国家官吏和党内职员的活动实行自己的、有时是不公开的，但是845 相当彻底的和可靠的监督。此外，还应该指出，这些官僚的最高阶

层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依附于剥削阶级，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某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摧毁了国家机器之后，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新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首先是由这个国家的主要机构的成分以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分所决定的。然而，就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许多本来应该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却走上了滥用权力的道路并利用委托给他们的权力去危害人民。在个别情形下，正如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那样，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人也会走上滥用权力的道路。在这种情形下，对劳动者来说，异常艰难的岁月就来临了。过去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尚可在受到原来的统治者和外来敌人的欺凌时得到保护，可是在自己的领导者的专横政治面前他们实际上受不到任何保护了。这是因为这些领导者，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利用了劳动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组织和权力机构。

这样一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该是不仅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而且要建立来自劳动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有效监督，用以监督国家和党机构里面他们自己代表的活动。

应该指出，这一问题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被提到过去的革命者面前。罗伯斯庇尔说过："如果存在着由人民建立起来的代表机构，即最高权力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去监督所有的公职人员，并且不断地控制他们的权力。可是谁去控制这一机构本身 346 呢？……"① 罗伯斯庇尔对自己提出的这一完全正确的问题却给了错误的答案：按他的意见，代表机构只能由它本身的善行来进行控制。巴贝夫主义者对此问题的提法就比较深刻了。巴贝夫主义者"起义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中写道："如果国内产生了这样一个阶

---

① 马·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公正裁判》莫斯科1959年版第209页。

级，只有它了解社会的艺术、法律和管理的原则，那么这个阶级就会由于自己智力优势，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同胞的不明真象，很快会找到怎样为自己创造出差别和特权的秘密……这个阶级会借口社会福利把他们的大胆的尝试掩盖起来，同时向那些已经受到更加残酷奴役的、不明真象的公民继续宣扬自由和平等，使这一奴役在公民看起来是合法的和自愿的。"① 大家知道，巴贝夫主义者因为预见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制订了各种维护民意团体的草案，类似罗马人民会议，批评公职人员的会议，实行立法机关的分散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也同样提出了类似的需要人民监督的问题。

恩格斯早在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的序言中指出："……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②

列宁也多方研究人民监督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上就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847 在我们的国家里必须在不以某些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为根据的条件下，制订出并实行监督制度，以防止我们的国家、党和经济机构的蜕变和官僚化。必须找出人民群众和国家及党管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的形式，即要使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变成官僚主义者，不能脱离人民，不能丢掉自己是人民公仆的思想的形式。这尤其是由于无产阶级需要在自己的专政的机构中，长期地使用大批资产阶级专家和旧国家机构的官吏因而找到这样的形

① Ф. 班纳罗蒂：《为平等的密谋》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316—3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34页（重点为中文版所无——译者）。

式就更有必要了。

毫不奇怪，在我国十月革命之后，马上就开始建立人民监督的机构。早在1917年10月底，为了实现对国家的监督成立了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1918年5月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这个人民委员部同时存在的，国内在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还出现了很多工人及工农检查组织。1920年决定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委员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机构，即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在建立国家和苏维埃监察机构同时，党的监察机构也建立起来了。根据列宁的建议，第九次全俄党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专门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为了巩固党的统一和威信建立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同渗透进党内来的官僚主义、个人野心，党员滥用他在党内及苏维埃内的地位，同违犯党内同志关系规则，同散布没有根据和没有核实过的丑化党及其个别成员的谣言及诽谤以及其它类似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现象作斗争。"①

848

革命后建立的党和苏维埃的监督机构当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些机构的活动还是不够有效，所以理应受到列宁的批评。列宁批评得最尖锐的就是1919—1921年以斯大林为首的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列宁写道："说句老实话，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②

列宁特别重视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督机构，所以他在1922年又制订了人民和党新的监督制度。

列宁建议，第一，把党的和国家的检查机构合并起来，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扩大一下，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至一百

① 《苏共决议案……》第1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533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44页。

名新的监察委员作为补充，而他们必须经过极仔细的党的审查，因为他们将享受同中央委员同样的权利；第二，部分中央监察委员作为委员和领导机构成员派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去，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之间活的联系将由他们来承担。与此同时，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机构缩减到三四百人。列宁对新的检查机构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党中央出现分裂，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党的总书记的"无限权力"。列宁写道："我们中央委员会是一个849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还没有取得符合它威信的条件。我提出的改革办法必将有助于这种情况的改变。那些必须有一定人数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注意任何人的威信都不能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作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①

当然，任何一个甚至最完善的监察制度，在没有联共(布)中央，它的书记处及政治局积极帮助和支持的话，是不能发挥其效率的，这是因为在两次党代会之间书记处和政治局是党内最高的机构。遗憾的是，在列宁去世之后，当斯大林领导了我们全党的时候，党和国家监察机构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帮助和支持。根据列宁的意见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监察机构享有的那些巨大的权力和全权的职能，对斯大林来说，无论如何是不方便的。当时列宁愿意、并且努力争取实行保障劳动者的权力，而斯大林首先想的是自己去统治人民和党。因此他并没有去继承列宁所开始的建立和巩固人民和无产阶级监察机构的工作。还在二十年代，斯大林就明显地限制了党和国家监察机构的权力，这些机构主要是检查下层组织的活动，监督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对上层党和国家行政的活动并没有实现足够的和有效的监督。后来随着斯大林权力和影响的850强化，党和国家监察机构的权力和影响相应地越来越小了。1930年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39—440页。

12月，斯大林建议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下面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并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一系列监督政府决议执行情况的主要职能交给这个委员会。1931年2月，在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下面也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党的十七大开幕前夕，报刊发表了卡冈诺维奇关于党和苏维埃建设问题报告提纲，其中提出了关于取消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并用两个机构——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去代替它们。

斯大林在十七大上的报告里面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委员会已经不必要存在了，因为现在需要的是"这样的组织，它并不提出无所不包的监察一切的目的，而是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监督工作，即检查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这样一来，监察职权缩小了。象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改善国家机构，为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而斗争，同经营不善和贪污浪费作斗争等问题就根本说不上了。

在已形成的个人迷信的形势下，斯大林的建议实质上根本就不能去讨论。

就这样，列宁的党和国家监察体系被破坏了。

众所周知，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后来改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按其主要职能只不过是一个监督检查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检查与有关违法行为的汇报材料。至于联共(布)中央所属的党的监察委员会，那么它几乎什么监察职能都没有，基本上只能处理共产党员个人的事情和党员的申诉。广大人民群众，普通党员几乎完全被排斥于监督工作之外。过去建立起来的工农监察机构体系（工农监督促进小组和支部，工农监督分会，信访局，"轻骑兵"等）① 也逐渐被取消了。这一切都为加强国家和党的机构的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开了绿灯，帮助掩饰国家管理中存在的缺点，削弱

851

① 见《列宁的党和国家监察系统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17年—1932年》《思想》出版社1965年版第196—200页。

了同违法行为及滥用权力进行的斗争。这样一来，取消列宁的党和国家监察系统是斯大林篡夺国家及党全部权力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十四、劳动者缺乏教育和文化。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人民群众

我们很了解，在任何一个反对独裁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持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正是人民或早或迟终要推翻各式各样的暴君和独裁者，然而有的时候仍然是这些人民群众又成为独裁主义的最牢固的支柱。马克思说过："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是配得上自己的统治者。"十九世纪的阿拉伯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阿卜杜尔-拉赫曼·阿里-卡瓦西比写道："普通百姓是独裁者的食料和他的力量；他统治他们并借助他们的力量迫害别人。他俘虏了他们，可是他们还赞扬他的强大；他掠夺他们，可是他们却感谢他给他们留下了一条命。他侮辱他们，可是他们却颂扬他伟大；他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而他们却因为有了他的政治而感到自豪。如果独裁者挥霍了他们的财富，他们说他慷慨；不施严刑把他们杀了，他们认为他慈善；他逼他们去冒生命危险，他们因怕受惩罚，而服从了他；如果反抗（独裁主义）的人对暴君进行指责，那么人们会象同暴君进行斗争那样去和这些人战斗。总而言之，普通老百姓由于恐惧，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屠宰自己，这种恐惧是来自他们的愚昧无知。如果愚昧无知的状态被消灭了，恐惧也就消失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①

852

这些道理能不能用在三十——四十年代斯大林独裁主义奴役下的我们国家人民身上？也能，也不能。

我们在本书前几节里已经谈过，人民群众在树立和巩固斯大

① 阿卜杜尔-拉赫曼·阿里-卡瓦西比：《独裁主义的本性和奴役制度的毁灭性》莫斯科1964年版第25—26页。

林个人迷信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也谈过，人民受了蒙骗，而在这方面不仅反映了政治蛊惑家的极高的手腕和狡猾，而且也反映了我国人民历史经验之不足，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低下，民主传统的薄弱等等。

俄罗斯人民也和住在原俄罗斯帝国的其它各族人民一样，是在半封建的专制独裁制度下发展的，他们都在三重奴役下，即在地主、资产阶级、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下生活过。这一切决定沙皇俄国人民群众的极大的革命性。然而，也正是这些条件必然导致基本劳动群众的落后和文化水平的低下。著名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弗·柯罗连科在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一封信中写道："你们轻而易举地就带领了我们的人民群众跟你们前进，这不是说明我们已准备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相反，说明我们人民的不成熟。"这一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正的，列宁用不同的形式也不断地重复过它。恰恰是列宁不止一次提醒党说，在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把它进行到底，并且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人们的脑子中，在思想意识方面进行革命，就要困难得多。理所当然，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可能得到的文化必然主要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是（这点柯罗连科没有完全领会）一种两面的，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能够较容易一些，正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较容易一些一样，也正如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也容易一些一样。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通常伴随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个人主义心理等的扩散，这也是对的。而这种情况将来会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因素。 853

所以在革命之前，我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说过，俄罗斯人民是tabula rasa（一张白纸），这不是什么缺点，而是优点，因为这会使人民更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意见从一定程度上说也

是公正的。我们知道，我国的人民群众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就其多数来说，也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但是，也正是这些人民群众，由于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太低，不久之后，他们就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歪曲了的解释。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专政是寄生在革命俄国的人民群众尚未能克服的许多的缺点上面的。斯大林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我们人民的最优秀的品质，他们的革命干劲和对革命敌人的仇恨。斯大林当他有所行动时，也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群众的落后及低下的文化水平。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提出了一些简单化的十分机械的口号，如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尖锐化了，必须消灭“人民敌人”等——这些口号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当时的情绪的，这些口号落在合适的土壤上，就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斯大林就是利用了这种力量 854 用以巩固他的专政，用以实现他的那些远离劳动人民利益的计划和目标。M.Д.拜卡里斯基在他的未发表的手稿里在谈到此问题时公正地指出：“缺乏教育威胁着思想性本身的存在，有使思想性变成狂热性的危险。狂热性就是忠于学说的文字方面而不是忠于

大家知道，近年来有人力图把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出现首先同俄罗斯农民的特点连在一起，同他们还没有克服的对沙皇的幻想及宗教信仰连系起来。这同十八世纪末法国农民因为得到了地主土地而支持了拿破仑一样，他们在拿破仑身上看到封建地主不能再回来的保证。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俄国的农民在十月革命后也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就成为现在的斯大林专政。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阶级基础是农民的这种论点在1965年11月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也被提出来了。格·波梅朗茨在他的文章中也拥护这一理论。他写道："鞑靼统治和农奴制度 855 时期留下了足够的蛮横行为和奴隶主义的传统。革命动摇了这个传统，但另一方面，革命使农民群众走出了他们世代习惯的地方，使他们失去了旧的基础，然而他们还没有完全接受新的思想意识。这些群众根本没想到要取得更大的和巩固的自由，他们也不明白，要个人自由有什么用?! 他们要的是一个主人和一种秩序，这是给斯大林的第二号委任书。授予他的第三号委任书是没有首领的宗教。农民相信上帝，救世主和喀山教堂圣母的形象是他们热爱和无限崇拜的对象。……向农民解释没有上帝，但这并不能取消他们的宗教感情。所以斯大林把上帝，一个世俗上帝给了劳动人民，这个上帝当然不能说他不存在了。他存在着，就在克里姆林宫里，偶尔也出现在观礼台上，而且还向他们招手，他日以继夜地关怀着劳动者们，连他们的一根头发也不能让从头上落下来……"①

对斯大林迷信的这类解释显得太简单了。第一，活上帝的新的偶像根本没有在农民心上代替老的上帝。农村的宗教影响虽然削弱了，但是在三十年代，特别在四十年代，仍然是相当厉害的。在斯大林时代宗教并没有被砍下了头，因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很难认为这是俄国农民宗教感情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即对斯大林的迷信不是从农村扩大到城

① 《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见格·波梅朗茨《未发表的文章》（未载明出版处）第218页。

市的，而是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的。我们已经说过，斯大林迷信是三十年代初产生的，那时农村刚刚结束集体化、正经历着困难时期。几百万农户被驱逐到北方地区和西伯利亚。我国许多地区发生了饥荒。广大农民群众对按随意定的征购价格进行强制征购的政策是不满意的。个别地区甚至爆发了粮食战线上的罢工。这样一来，农村形势显然不利于促进斯大林迷信的形成。所以我们认为，856 夸大斯大林迷信在苏维埃农村，在劳动农民基本群众中的意义是不对的。我们认为，斯大林迷信以其经典形式在农村的环境中恰好传播得最少。

斯大林迷信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中也没有很大传播。三十年代初，城市小市民中也有不少不满情绪。但是在这里由于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疲惫和消极的情绪也很厉害。因此，这些不过问政治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不仅没有多少是真诚地颂扬斯大林、为他歌功颂德，而且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的宣传也是很反感的。

我们认为，三十年代，斯大林个人迷信是在工人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党员层及在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首先是年青的工农知识分子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特别是在1936—1938 年大镇压之后在我国所成立的那个机构即内务部中，这一迷信特别强。这样一来，在评价斯大林个人迷信对人民群众影响的时候，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总的评价，而是进行个别分析。当然，这些问题还需要有最深刻和具体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对人民群众缺乏文化和教育问题也不能持简单化态度。当然，愚昧无知，没有教养，粗野，缺乏精神财富和文明，以及那些潜在的争权夺利的人物的大批出现——这一切对树立斯大林专政起了很大的作用。年青的马克思早就写过：“不学无术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耽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9页。

马克思在他的成熟时期又警告说："我们已知道，愚蠢在革命中起什么作用、和坏蛋们会怎样善于去利用它。"① 然而，我们首先应该谈到的不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愚昧无知和粗暴，更应该谈的应该是对群众的愚昧无知的领导，以及在个人迷信年代我国掌权的许多人的愚昧无知，粗暴和没有文化。 857

众所周知，说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社会道德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理论。早在十九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在他反驳社会主义者时写道："社会主义的推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是错误的设想，这种设想正象实干的政治家的推测所依据的是错误的设想，因而导致了他们犯错误一样。他们曾设想，官方（国家机构）会按他们所期待地那样去行动，而这实际上从来都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机器如同现存的社会机器一样，都是不得不用那些已有的人类本质的各种特点提供的材料建造起来的，而它的本质的缺点将来同样会导致现在已经发生了的那些灾难。权力狂、自私自利、不公正、不诚实、不老实——这些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把私有制社会引向瓦解和破产的因素——当这些恶果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无比巨大和更无法纠正的灾难，因为掌握一切可能动用的手段和资料的政府组织，一旦得到发展和巩固，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最终结果是恢复独裁主义。遵守纪律的行政官吏的队伍正如由军人组成的队伍一样，会给自己的首领以最高的权力，然而享有这样的权力常常会导致篡权，正如中世纪的欧洲，以及还有更突出的例子——日本的情况那样……我们完全有根据设想，在社会主义组织里面取得权力的人会毫无羞愧地、千方百计地、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个人主义的目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同邻国的战争或者内部争夺这类为镇压敌人需要使用武力的事情，那么社会主义行政机构立即会成为可怕的暴政，类似古秘鲁那样的暴 858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0卷第226页。

政，在这样的暴政之下，人民群众就完全掌握在官吏阶层手里，那时他们在街道上和家庭里都要受到一刻不停的警觉的眼睛的监视，同时还要为养活统治者的政权而去工作，可是自己所能得到的则是只能勉强维持生命，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的饮食。那时，强制人们从事共同劳动的整个政府系统会以新形式出现，其实这就是正在消失的传统的老保守主义，现在又以新保守主义的另一形式力图回到我们的制度中来。……毫无疑问，一些热情分子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对这一点会提高警惕，并为制止这样的灾难采取措施。'这样讲不对，显然我们不能希望能够强迫人们去相信这样一个看来是非常明显的真理，即认为社会的幸福及社会的机关的公正态度，实质上是取决于社会的成员的性格，如果没有人的性格的完美化，这两者都不可能得到改善，而人们性格的完善必须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达到，即人们除了要求完美的生活之外，能够不受任何约束从事和平劳动。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如果我们有能力处理的话，就是发挥着很坏作用的人类，也有可能被放进发挥着好作用的机关模型里去。

然而，这不过是幻想。

公民所固有的那些缺点必然反映在任何社会结构的恶劣的行为之中……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政治上的炼金术——通过它，可以从锡的本能中得到金子。"①

859

当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同意对社会主义的这类看法，因为这样的论点认为社会结构形式直接产生于当时人类所具有的生理和社会本能。如果说多数人们的道德和思想面貌会影响社会结构，那么社会结构也在影响着道德和思想面貌。

然而，在十九世纪，斯宾塞提出来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得到相当有说服力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欧洲那些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前提出发的。

① 格·斯宾塞：《人和国家》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31—32页。

二十世纪初，由于革命运动转移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又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当时，不仅孟什维克，就是一些布尔什维克在回答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俄国取得胜利这一问题时，也是持否定态度的。根据他们的意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还不成熟。马·高尔基在1917年也持同样的态度，他提出了这样的忧虑，即革命会给数量还不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带来沉重的打击，使社会的发展受到阻挠。

我们知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决驳斥了这些疑虑。列宁写道："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① 860

当然，这一看法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党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马上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向前发展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然而，正当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和文明程度不断迅速地提高的时候（这完全证明了列宁预见的正确性），在党的领导层中以及国家管理的许多很重要的环节中却正在发生着完全相反的过程。我们在前面已讲过，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欧洲的一切政府中大概是"教育水平"最高的政府。但是党和国家许多高级，特别是中下级干部，非常缺乏文化和教育。这一点列宁也很明白。列宁在指出我们暂时没有建设真正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一定数量的人材时，写道："我们有哪些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的人材呢？只有两种。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很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33—435页。

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建立，建立不起来。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知识和文化。而作这个工作所必需的正是文化。……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这种人在我国，比在其他一切国家简直是少得可笑。”①

861 显然，斯大林领导全党之后，国家和党的领导总的水平，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就是从总的文化、精神和文明水平来看都下降了。在经济和国家管理部门的下层环节中，专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增加的同时，斯大林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却不仅粗鲁和蛮横，而且以其吓人听闻的愚昧无知而闻名。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叶若夫和贝利亚，就其本质来讲，都是愚昧无知的人。象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什基利亚托夫和布琼尼等人也都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斯大林周围的人，按其文化和所受教育水平都无法同列宁周围的人相比拟。就是斯大林本人直到最后也还不仅是个粗暴和残酷的人，而且是极没有教养的人，尽管他自命是天才的学者和科学的巨擘。三十年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是由极端无知的和鄙视知识分子的人们组成的。三十——四十年代在文学、科学和艺术占据很重要地位的新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也都很明显地具有缺乏文化的特点。

斯大林的高级行政人员的总的文化水平不够高，又加上了一种特殊的愚昧无知——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国家和党的建设特点的一无所知，完全不懂新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及克服这些矛盾的途径。这些人很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在新条件下去发展它。其结果，我国劳动群众的政治和文化发展都带着很大的片面性。工人阶级以及党员基本群众虽然在三十——四十年代保持了自己的革命性，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但是他们的革命性在斯大林专政年代并没有得到正确引导，使之从政治教育上入手而得到发展。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42页。

第 三 部 分

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斯大林专政的某些后果

1936—1938年的镇压，使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得以最后形成和巩固，凡限制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皆被抛弃，并且已不复存在了，凡他不喜欢的人都被撤职和消灭了。因此，可以说，自三十年代末起，斯大林的专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值得我们进行最认真、最详尽的研究。 865

本书第一部分分析了斯大林取得政权的途径以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与条件。现在自然还应该研究一下斯大林专政的主要后果，这些后果在他专政的最后十五年（1939—1953年）显得特别突出。

不言而喻，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那些年里，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正是在那些年里，苏联人民在粉碎法西斯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向为社会主义和独立而斗争的其他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正是在那些年里，由于我国的直接支援和影响，地球上产生并确立了社会主义阵营。正是在那些年里，苏联迅速地恢复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道路上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然而，如果仅仅记得和谈论苏联人民这些的确伟大的成就和功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人们往往强调说，对斯大林的迷信和他所实行的镇压措施，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造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全面。斯大林的为所欲为、目无法纪，是违背社会主义、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违背我国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的。 866

今天我们还常常听到有人说，对斯大林的迷信，并未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这种说法同样不能认为是全面的。由于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长期统治，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到了最严重的损害。社会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都遭到歪曲，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因此，我们认为，把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目无法纪仅仅比作健康人的微恙小病，是十分错误的。不，那是一场沉疴重病，其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在于有可能把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完全断送。下面我们将尽量说明斯大林个人迷信与为所欲为的某些后果。

第 十 二 章

867

斯大林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某些错误和失策

一、专断独行的片面性和错误

在当今世界上，大国的主要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复杂，五花八门的。现在，不要说外交舞台或军事策略上的失策，即使是对物理、数学、生物、化学领域中某一发现的评价发生错误，也可能影响国家的命运。今天任何一个领导人，那怕是最英明的领导人，也无法占有源源不断的军事、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情报资料，而为了决定复杂的国家大事，这些情报资料是非占有不可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十分需要在研究和讨论复杂问题时实行真正的集体领导原则，避免权力过分集中，提高专家学者的管理作用，全面发扬民主，把问题公开，保证发言和批评的自由。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有那种情况：一个人完全主宰一个大国的命运，在决定军事、政治、科学、经济上一切重大问题时他都作主要的裁决人，文学、艺术、绘画的问题都视此人的意见和好恶而定，一句话，个人独揽大权，从 868 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管理体制，同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背道而驰，是必然要导致最严重的错误的。

在三十年代初时，斯大林似乎还很懂得这个道理。他在同德国作家艾·路德维希谈话时说："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

片面的。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七十个委员……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人的个人意见和建议。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做决定，那末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① 这些话说得好，说得正确。然而只是说说而已。正是斯大林，在使人相信他绝对正确之后，建立了这样一种管理制度：决定重大问题时几乎完全排除了集体领导原则，只有斯大林个人的意见起决定作用。

自不待言，斯大林时常同他的助手们商讨问题，同某些党政、经济、军事干部商讨问题。有时，斯大林甚至能倾听并且考虑一些反对意见，自然那些意见说得极其谨慎（任何当真反对斯大林意见和决定的人，必然要划入"人民敌人"之列）。但是这些会议范围很窄，而且常常不在会议室举行，而是以秘密接见、用餐的方式举行，所以不能代替真正民主的、集体领导的管理体制。一位法国社会学家说得好，在个人专断和极权的条件下，即使最英明的统治者，869 过四、五年后，也必然要对周围发生的事件迷失方向。因为他从属下那里获得的，主要是他为了证明自己意见和决定正确而希望得到的情报资料。结果，任何独裁者都一半是生活在幻想世界之中，因而不能正确对待正在发生的事件。

不消说，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也作出过完全正确的决定。他的活动决不仅仅是由错误和失策构成的。在主观上，斯大林并不想在军事上或经济上削弱苏联，他为自己规定的是其它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采取了既定的步骤。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斯大林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篡夺了全部政权，践踏了党和国家的所有最高机关之后，便失去了完全正确地判断形势的可能性，因此在决定许多外交、政治、科学、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犯了大量的错误。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5—96页。

当然，任何政治家乃至任何集体，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错误不应该太大，而且应该迅速纠正。而斯大林所犯的那些错误则很大，并且照例得不到纠正，而且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斯大林所建立的国家和党的管理制度，使得严重错误无法避免，而且纠正起来极其困难。由此可以窥见个人迷信最危险的表现和后果的一斑。

下面我们只谈一些为我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错误。

二、斯大林在1939—1940年的对外政策

众所周知，1939—1940年，苏联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但在斯 *870* 大林这两年所主动采取的许多重要外交行动与军事行动中，后果最严重的，无疑是1939年8、9月同德国签订的条约和1939年末至1940年初同芬兰进行的战争。

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我国历史学上至今尚未完全澄清。

1939年苏联外交方针急剧变化的序幕，是李维诺夫的辞职。1939年4月16日，李维诺夫还接见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并向他提出正式建议，要签订一个英、法、苏三国互助条约。不言而喻，这项建议并非出自李维诺夫一人。五一节检阅时，李维诺夫站在斯大林身边，这是派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注意到了的。然而5月3日，各报上就刊出一条简讯，内称："应李维诺夫本人的要求，解除其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新任命的外交人民委员是莫洛托夫。与此同时，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旨在改变对德关系（苏联代办格·阿斯塔赫夫同德国外交部专家Ю·史努烈多次商谈，莫洛托夫同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多次商谈，等等）。

苏联采取这些外交步骤，是企图阻止英法两国最反动的阶层勾结法西斯德国。苏联一面以此向英法两国政府施加某种压力，

一面想在苏英法进行数月之久的互助条约谈判失败时能够自保。

871

在7月间和8月初，苏联和德国的外交接触加强了。德国显然想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催促他的外交官员加快步伐。对法西斯德国而言，发动战争的问题早在1939年初就决定了。但是希特勒担心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虽然没有放弃侵略东方的念头，但是毕竟想把同苏联的冲突推迟一下，而首先击溃西方的敌人和波兰。

当然，无论对苏联来说，还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都远远不是最好的办法。假如所有反法西斯的大国能够签订一个集体安全协定，那要可取得多。然而当时美国远离欧洲事务，而英国和法国显然在玩弄着虚伪、危险的政治把戏，它们仍然期望同德国达成协议，并且力图将德国的侵略引向东方。1939年夏季，这两个国家事实上是想使它们同苏联的谈判破裂。① 苏联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国政府除去同意德国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决定是斯大林8月19日作出的。8月20日和21日，斯大林和希特勒互致电报，决定派以里宾特洛甫为首的德国代表团立即动身赴莫斯科。此时，希特勒已经不向斯大林隐瞒德国决定侵犯波兰的事了。他在8月20日的来电中说："德国与波兰的紧张关系已经无法忍受。危机每日都可能爆发。德国自应考虑以其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来捍卫帝国的利益。"

8月23日，以里宾特洛甫为首的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日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872

大家知道，如今许多西方著作中叙述这些事件时都带有很深的偏见。按照那些著作的讲法，是苏联纵容了侵略者，协助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对苏联来说，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对

---

① 关于谈判的细节，见П.А.日林：《法西斯德国怎样准备进攻苏联》莫斯科1966年版。

集体安全谈判破裂应负主要责任的恰恰是英法两国政府（还有波兰政府）。1969年所公布的英国国家档案馆1939年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正是英法统治集团以及美国最反动的集团帮助德国建立起强大的战争机器，企图利用它来搞垮布尔什维克。正是英国和法国先是纵容德国占领奥地利，继而又同希特勒签订可耻的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帮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扼杀了西班牙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应当考虑它自身的安全问题，它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在1939年的具体条件下，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可能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

斯大林的错误倒不是签订这个条约。斯大林令人不能宽恕的大错误，是由于签订这个条约而在我国造成的那种特殊的心理气氛和政治气氛。最严重的错误是，斯大林过于相信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而没有看出法西斯德国的罪恶阴谋。康·西蒙诺夫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说："……我至今仍然觉得1939年的条约，在我们那一年夏季几乎处于绝境之际，是一个对国家有利的明智之举，因为当时西方列强唆使法西斯德国进攻我国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指日可待了。话虽如此，当你回顾往事时，你仍会感到，尽管条约是合乎逻辑、于国有利的明智之举，但是签约前后的许多事实，却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理上，有两年左右夺去了某一部分非常重要的自尊感，而那种自尊感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我们可贵的特点，并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联在一起……就是说，精神上感到很痛苦。"

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的秘密议定书，也需要专门谈谈。例如，这些议定书中规定，"一旦波兰境内发生领土变化和政治变化，则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的边界，将沿着纳雷夫河、维斯瓦河与桑河确定"。现在，有些苏联历史学家认为这些议定书是错误的，有时竟然说成"第四次瓜分波兰"。他们设想，即使不同德国事

先签订秘密议定书，苏联也能够解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9月初，英法已经对德宣战，因此德国势必容忍红军的行动。可是要知道，1939年8月末时，谁也无法断定，英法两国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将如何行动。它们可以象以前出卖奥地利和捷克一样，也出卖波兰。在那种形势下，如果德国军队在占领波兰全境后向波苏边界推进的话，那对我国将是极其严重的危险。倘若不事先同德国达成协议，苏联军队开入波兰境内同样是十分冒险的。所以只能同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是该条约的自然继续。当时苏联已无可能制止德国进攻波兰。因此，考虑到874德国将来可能侵略，就必须在这一地区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且巩固我们的阵地。更何况这里说的并不是波兰的固有领土，而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土，那里的居民早就为民族解放而进行斗争了。

然而，如果说我们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不得已的，必要的（有时不得不从诸害之中取其轻者），那么1939年9月29日同法西斯德国签订的新条约，即所谓《德苏友好和边界条约》，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大错误。这个条约完全是多余的。一个月之前斯大林还说得比较现实。当里宾特洛甫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中，建议在条约中增加一个关于苏德关系友好性质的序言时，正是斯大林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说："既然纳粹政府六年来一直在诬蔑苏联政府，那么苏联政府无法诚实地向苏联人民保证，我们同德国存在着友好关系。"①

对苏联和联共（布）来说，更大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错误是这个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例如，第二个议定书中明文规定了这样的内容："双方都不允许在自己领土上进行任何危及对方领土的宣传。任何一方一经发现自己境内有此种宣传，必将进行镇压，并将所采取的有关措施通知给对方。"

① 见П·A·日林：《法西斯德国怎样准备进攻苏联》莫斯科1966年版第61页。

大家知道，根据这个条约，我国完全停止了反法西斯宣传。不仅如此，苏联领导人从此以后几乎公开地为希特勒德国的所有行动进行辩护，似乎德国成了受英法侵略的国家。难道我们现在读 875
到莫洛托夫1939年秋季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能不感到愤慨吗？报告中竟有这样的"忏悔"："众所周知，近几个月来，象'侵略'、'侵略者'这样一些概念有了新的具体内容，改变了含义……现在，如果谈论欧洲大国的话，德国正处于渴望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国家的地位，而昨天还鼓吹反对侵略的英国和法国，则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缔结和约。大家看到，双方的地位变了。""对于希特勒主义的思想体系，也象对待任何思想体系一样，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这是政治观点问题。然而任何人都懂得，思想体系是不能用武力消灭的，是不能靠武力结束的。因此，打着为'民主'而斗争的幌子去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犯罪。"① (在莫洛托夫作过这一报告之后，贝利亚便向古拉格的头头们下达了一道密令，禁止集中营的保卫人员将政治犯称为"法西斯分子"。这一密令直到1941年6月才撤销。)

斯大林不只是在苏联国内停止了反法西斯宣传。他还完全违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事实上停止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指示中称主要的侵略势力是英法帝国主义，而共产主义宣传鼓动的主要锋芒也应该指向它。斯大林突然同希特勒言归于好，使西方各国共产党感到十分意外。例如，执行这个指示，使得罗马尼亚共产党实际上陷于瘫痪，因为它1939年5月以前便已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巴尔干半岛上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也茫然失措。

西方当时最大最强的法国共产党以及英国共产党，同样陷入 876
混乱。那时，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都应该服从整

① 见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第8—10页。

个共产国际的纪律。所以，共产国际一宣布英法是侵略者，而德国却希望和平，便使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倘若按照这种指示的逻辑行事，那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使本国失败的立场，无论如何不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行动。这种立场在英国倒没有多大影响，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员很少。可是在法国，共产党的反战立场，却明显地削弱了人民反抗德国侵略的力量，从而为资产阶级政府取缔共产党提供了方便条件。结果法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激化起来，这在那几个月中是符合希特勒的利益的。从 1939 年末至 1940 年初，法国共产党曾在某些地下出版物中，力主法国政府停止对德国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错，1940 年夏季，当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侵入法国并向巴黎迅速推进时，共产党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和口号。希特勒匪徒的侵略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在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共产党人提出了以坚决的人民战争反对侵略者的主张。当时处于地下的法共中央通知政府说，法共认为把巴黎拱手送给侵略者是卖国行为，共产党人号召武装人民，把巴黎变为固若金汤的堡垒。大家知道，在法国失败、贝当叛国之后，共产党号召人民抵抗占领军。不过，即使这时，仍有一些积极的共产党员以为，苏德两国的互不侵犯条约便是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所以 1940 年下半年，877 有些法国共产党员曾经诚心实意地期望能在敌占区获准公开进行活动，他们甚至准备在业已沦陷的巴黎公开出版《人道报》。直到1941年初敌人大批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时，这些幻想才告破灭，党才开始采取比较明确的反法西斯立场。至于抗击希特勒匪徒的武装斗争，那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才真正开展起来的。

左翼社会党人对苏德 1939—1940 年的“友好”也十分愤慨，因为他们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同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境内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们在自己报刊上直言不讳地说，苏联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当了逃兵，莫斯科破坏了正为反对希特勒主义而战的无产阶级的团结。

事实是苏德"友好"使我国的参战拖延了两年。但是还有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即德国对这次拖延的时机利用得远比苏联好。因为德国在1939—1940年间扩大战争机器和军工潜力的速度比苏联要快得多。德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西欧国家，这对苏联造成了日益危险的形势。

例如，1940年春，法西斯德国无缘无故侵略丹麦和挪威，并且占领了这两个国家。同年夏季，德国破坏了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撕毁同这两国的协议，发动进攻，占领了它们的国土。所有这些侵略罪行再一次证明，法西斯德国只要认为对它有利，就可以把任何国际条约当作废纸撕毁。

法西斯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比利时与荷兰两国的抵抗，闯入法国境内，迅速向前推进。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应该怎么办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应该对德国宣战，并且在1940年夏季组织一个反希特勒联盟。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至少应该声明废除同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且宣布全国动员。① 当已经晓得后来事件的发生时，上述意见是不难发表的。然而要知道，1940年时还很难料想，英法军队在法国境内会那么迅速地战败，法国会在德国开始进攻后几个星期就投降了。因此，比较合乎情理的是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878

所以我们不必责备斯大林，说他1940年让希特勒在西欧几乎横行霸道。恐怕这是无法制止的。可是斯大林应该懂得，希特勒击败西欧诸国，势必大大增加德苏冲突的危险。因此他应该加强一切国防措施，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战备。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差。

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我们应该谴责希特勒侵略丹麦、挪威、比

① 现在我们知道，在那几个月里，希特勒最怕的正是斯大林采取这样的行动。希特勒在后来的日记中直言不讳地说，1940年"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要使俄国尽可能推迟发动进攻的时间。我个人象怕恶梦一样，担心斯大林在我之前采取主动。"

利时与荷兰，占领法国。但是我们并没这样做。相反，我们报刊上，在法国战败之后，却偏偏强调德苏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说它有助于“在德国东方建立一个安定的后方”。而且《真理报》为了证实这个论点，竟然援引法西斯自己的报纸。例如，1940年8月26日，《真理报》上援引了《慕尼黑新闻报》的话：“自从签订这一条约后，德国为自己建立了自由的后方。这一次吸取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作战的教训。假如德苏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德国在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的胜利进军要困难得多……由于有了这个条约，德国在西方的进攻就顺利了……”

879

《丹麦前卫报》说：“德国有了自由的后方，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危险。”

这里还要指出，斯大林不单是同希特勒搞“友好”。现在得知，斯大林在1940年就英国战败后如何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问题开始同希特勒对话。那次对话是希特勒主动提议进行的，他企图使斯大林不去注意德国积极准备对苏战争的情况。而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上了希特勒的钩。他甚至同意让苏联在一定条件下参加三边同盟（即反共产国际的条约）。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所搞的关于苏联参加三边同盟的谈判中断了，但并不是斯大林主动中断的。因为希特勒干脆不再答复斯大林关于这一问题的函件了。

* * *

斯大林在1939—1940年间的另一个外交上的大错误是对芬兰的战争。

大家知道，在我国的某些历史著作中，至今仍在重复1939年小国芬兰曾向苏联“进攻”的谬论。当然，芬兰的统治阶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就奉行反苏政策了。芬兰的好战分子早就在酝酿“当条件有利时”夺取苏联的卡累利阿地区。所以苏联设法保障西北边界与列宁格勒安全的愿望是十分自然的。然而保障安全的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至少可以不使用战争的手段。何况，

880

苏联在关心自己安全的时候，也应当尊重其他国家为保障自己安全而采取合理措施的权利。可是从这个角度看，却不能认为我国所提出的以北卡累利阿一部分领土同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进行交换的建议是对等的。卡累利阿地峡对芬兰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而我们换给芬兰的领土是未开垦的荒地。此外，卡累利阿地峡还对保障芬兰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那里早已构筑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果失去地峡，芬兰的边界就变成不设防的了，这样的边界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是很难保卫的。那么芬兰的未来命运就取决于斯大林的良好愿望了，但芬兰人没有什么理由相信他的良好愿望。芬兰政府拒绝我国的建议，那是毫不奇怪的。芬兰本身不会威胁我国安全，1939 年时，芬兰领土上既无德国军队，又无英法军队。当时芬兰同情英法联盟，而我国同英法的关系则比同德国的关系糟。然而若说英法在同德国开战的条件下敢于同苏联交战，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见，我国西北边界受到的威胁并不大，没有理由对芬兰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只不过是斯大林想利用当时形成的局势来改善我国西部边界的现状，而且他相信打败芬兰是轻而易举的。作家亚·恰科夫斯基根据他自己所掌握的文件，在纪实小说《围困》中说，早在 1939 年仲秋，莫斯科就召开了最高军事委员会。这里指的是对芬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当时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领导下制定的最初方案，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沙波什尼科夫受到的指责是过低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芬兰军队的力量。旧方案被否定了。于是责成列宁格勒军区领导制定新方案，同时建议他们把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批评和意见作为新方案的基础。此后不久便制定好的列宁格勒军区的方案，是从“少流血”的原则出发的，即企图以有限的兵力迅速击败敌人，而无须集结必要的后备力量。[①] 的确，斯大林在对小小邻国开始军事行动时，指望这次战争只进行几天。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都以为有速胜的把握，以致连战争即将爆发的事都没有事先通知总参谋长波·

① 亚·恰科夫斯基：《围困》见《旗帜》杂志 1968 年第 10 期。

米·沙波什尼科夫，他那时正在度假，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才匆匆奔赴莫斯科。然而战争开始时我们打得不顺利。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未能冲破“曼纳尔海姆防线”。我军在蒙受巨大损失后，被阻于芬兰的第一道防线。于是不得不向前线增调几十个师的兵力，结果开始了艰苦的冬季攻势，为了打芬兰至少调集了三、四十个师。打死、打伤和冻坏的人甚多。最初的方案曾经设想占领芬兰全境，并更换其政府。因此，战争开始后不久，便宣布建立一个新的以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民主政府。我国报刊上公布了新政府的纲领。但是芬兰的持久抵抗在世界上引起了热烈的同情。也许是由于世界舆论的反对，也许还由于其他考虑，斯大林放弃了建立“苏维埃”芬兰的计划。库西宁政府宣告解散。在“曼纳尔海姆防线”突破之后，芬兰人被迫求和，斯大林同芬兰现政府签订了和约。

虽然苏芬战争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终，但是连这次胜利——既 882 遭受重大牺牲，又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才取得的胜利——实际上也被斯大林忽视了。从政治观点来看，对芬战争总的说来使我国产生了许多困难。即使从单纯军事战略观点来看，苏联在对芬战争中的巨大损失，也绝不是区区战果所能补偿的。虽然战争以苏联胜利而告终，但斯大林在签订和约时，却认为只提最初拟定的几项要求就够了，他表现得出奇地温和，而且没有获得任何可靠的保证，以防利用芬兰领土向苏联进攻，以防该国现在势必产生的复仇情绪占上风。使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斯大林那么漠视刚刚战败的芬兰又重建军队，那里的复仇情绪得到发展并且甚嚣尘上。斯大林漠然地观察着，芬兰放弃倒向英法的旧方针之后，却接受了法西斯德国的保护，而德国军队开进了芬兰境内，准备同芬兰军队一起进攻苏联（至1941年6月，德国已将五个师调到芬兰[1]）。显然，恰恰是1939—1940年的军事失败，把芬兰推入希特勒的怀抱。由此可见，本来有可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或者至少可以保持中立的芬兰，由于斯大林不明智的对外政策，却作

了希特勒德国的航道，十分积极地参加了希特勒匪徒对苏联的进攻。当然，我们丝毫无意为芬兰的军国主义分子辩护。但正是斯大林帮助了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使他们在芬兰的领导层和舆论界一度占了优势。此事后果如何，芬兰和苏联又付出多大牺牲，所有这些我们都已从历史上弄清楚了。

三、斯大林在1941年军事战略方面的失算

883

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最大、后果最严重的错误，是对1941年春夏形成的军事战略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

当然，无论斯大林还是苏联政府，总的说来都预见到了将来要同德国和日本作战的一般可能性，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里我们不去说那些一般的军事经济问题，诸如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建立空军、发展海军、全民进行军训，以便对可能的侵略进行反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

1939—1941年间，也采取了不少重要的巩固苏联国防的措施。这个期间，基于部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半。把相当多的部队和军事技术装备调到了我国西部地区。军事技术装备的产量增加了，许多企业转而生产武器、军事运输工具，各种军事学校的数量增加了。同芬兰作战以后，在军队的训练和改造方面做的工作尤其多。加紧研制了许多种武器。着手加强苏联西部边界的防御，当时有十多万人参加构筑国防工事的劳动。然而当我们总结这一的确巨大的工作时，却不能不得出结论：按照计划这一工作大概要到1942年末才能基本完成。①

① 连朱可夫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可以证明这个估计是对的。他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说："战争爆发时，我国正处在武装力量改组、换装武器和重新训练，建立必要的已装备好后备力量的阶段。苏联人民不想战争，要力避战争，因此把所有的力量用来实现和平的经济计划…… 从1939年至1941年中这段时间所进行的改造工作，旨在两三年后使苏联人民拥有一支杰出的军队。"

884 但是，对1941年形成的整个军事战略和政治形势的分析，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苏联因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获得的推迟战争的期限已经结束，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因而斯大林要把战争推迟到1942年或更晚时候的一切打算都是毫不现实的。

大家知道，早在1940年德国军队就格外加紧调往苏联边境了。从1941年初开始，军队和军事技术装备调往东方的数量剧增，同年3、4月间，载有德国军队、坦克、大炮和弹药的军车源源不断地开向我国边境。从5月25日起，德军司令部以每昼夜一百辆的最高速度向东部边界运输军车。[①] 1941年6月22日的前一天，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入侵准备活动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那时苏联边界已经集结了一百九十个整编师（包括德国军队和仆从国的军队）、三千五百辆坦克、近四千架飞机、五万门大炮和迫击炮。

虽然德军司令部对德军东调竭力保密，并以各种方式迷惑我国侦察人员，但是德国的许多军事准备措施自然不能不为人觉察。在希特勒已经批准进攻苏联的计划（"巴巴罗沙计划"）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奉命参加了东方战争的准备，关于此次备战的大量情报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边防军、外交使节、军事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苏联的国外友人、英美国务活动家等）源源送到苏联最885 高国家机关。譬如，苏联边防军司令部必须定期向苏共党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呈送苏德边界形势报告。根据这些报告不难得出结论，德国无意履行互不侵犯条约和苏德"友好"条约。1940年时，德国当局在苏德边界上的挑衅行动就已成为经常的、大规模的了。

德方故意破坏界标；不止一次企图掳走我国边防人员；不断向苏联境内、苏联边防人员与和平居民开枪射击；挑动大批波兰居民非法越过国境；还在边境的居民点中强迫当地居民去参加反苏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

① 见《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10期第33—39页。

德国法西斯一直向苏联境内派遣特务。早在德国进攻之前，我国边防人员就不得不同德国侦察人员进行真正的战争了。仅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12月，在我国西部边界就破获了五千多名敌特。战争越迫近，德国侦察人员的活动越频繁。1941年第一季度，边防部队活捉和消灭的敌特比1940年第一季度多至十五至二十倍，而1941年第二季度则比1940年第二季度多至二十五到三十倍。而且这些人全都是职业侦察兵。

自1941年4月起，敌人开始向我国境内派遣由有经验的反侦察军官率领的人数较多的侦察小组。这些小组都携带着搞特务破坏活动的装备和战争一旦爆发应如何行动的指示。为了达到伪装的目的，德国的侦察小组都穿了红军官兵的制服。①

886

为了进行侦察，德国军事当局还多次使用空军。随着战争的迫近，特别是1940年夏季以来，德国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次数日趋频繁，深入境内的距离日益增大。1939年体育飞机和教练机深入我国境内的距离只有几百米至二——四公里，而1940年末德国空军则动用军用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达四十五至一五〇——二百公里。例如，自1939年9月28日至1940年10月16日，有一百二十架飞机从德国方面越境，1941年头五个月内有一百五十二架飞机越境，而在6月20和21日两天内则有六十架德国飞机越境。

自1940年下半年起，西部边界形势的复杂性，还在于德国军队不断地在边境地区集结。从边防军区司令部的报告可以看出，1940年5月末、6月初便有大股部队（多至以团计算）陆续开到边境地区，而自1940年6月起调来的已是配备有坦克、大炮的集团军了。其中大部分都有在两线作战的经验。

自1941年1月起，德国武装力量的部队、技术装备、燃料和武器弹药就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边界，尤其在夜间。根据几个西部

---

① 这里的材料引自《苏联边防部队，1939年—1941年6月》一书的前言，莫斯科1970年版。主编是季里雅莫夫将军。本书中的大部分文件和资料都是初次发表。前言的作者是历史学家А.И.尤赫特，Е.В.齐布尔斯基和А.И.楚贡诺夫。

军区所属边防部队参谋部的资料看，1941年6月初苏联边境上集结了大约一百九十个师。通往苏联的主要干线都有野战军加强保卫。经常有军官监视苏联领土。铁路改由军队司令部调度。城市村镇的大中小各类学校纷纷关闭，校舍供驻扎军队之用。大批军务人员开始派到边境地区。自1941年4月起，德国当局多次拒绝接受我国的列车。在布列斯特地区，4月24日、26日、28日、29日和5月5日都发生过这类事情。有人故意在边境居民中散布谣言，说苏德两国即将爆发战争。最早的情报是1941年4月9日获得的。显然，法西斯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边防军区的报告中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说。例如，乌克兰边防军区1941年4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边防部队自4月10日至20日的情报十分清楚地证实，德国司令部和当局，不仅在毗邻苏联的德国边境地带，而且还在匈牙利领土上，加紧准备战争。"①

887

1941年5月初，法西斯帝国高级官员开始到边境地区视察德国军队。比如，5月5日至7日，希特勒由戈林和雷德尔陪同，在波罗的海观看了德国海军的演习，5月22日视察了东普鲁士的军队。

到1941年6月1日，陆军的动员和作战部署已经基本就绪。那时已在作最后的准备了。1941年6月1—5日，德军武装力量的所有休假的军人皆被召回。

1941年6月6日，德军司令部向北路集团军下达命令，要它在6月13日进入对苏作战的出发阵地。6月13日，又发出补充命令，将此期限推迟到1941年6月18日。

各边境军区司令的详细报告，也为外交使团的报告所证实。比如，苏联驻巴黎和柏林的陆军武官И·А·苏斯洛帕罗夫和图皮柯夫将军，以及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沃伦佐夫海军上将，都曾发来重要的

① 见《苏联边防部队。1939年—1941年6月》（文件汇编）莫斯科1970年版第360号文件。

情报。根据他们的报告，靠近前线的地带早在1941年5月底，就已部署了充足的兵员和技术装备。

苏联驻柏林使馆也经常把希特勒分子准备进攻苏联的情况报告给莫斯科，据苏联使馆工作人员B·别列日柯夫回忆，从3月以来，柏林全市即盛传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但所传的进攻日期却众说纷纭，似乎是有意乱我耳目：4月6日，4月20日，5月18日，最后说是6月22日——全都是星期日。所有这些警报信号，大使馆都及时报告给了莫斯科。到5月底，使馆为苏联政府编制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基本结论是：德国对苏战争的实际准备业已完成，德国集结的部队和技术装备的规模之大显然是在准备一场战争，而不是对我国施加一般的政治压力。所以，正如使馆指出的，必须随时准备应付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然而斯大林对这个报告根本不加理睬。① 888

苏联政府还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了有关战争准备的极其重要的情报。例如，罗斯福从其德国内部的间谍机关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德军发动进攻的日期、主攻方向以及"巴巴罗沙计划"的几乎全部细节。这些情报都转交给了苏联驻美大使K·乌曼斯基。②

1941年6月11日，国家安全机关向斯大林报告说，德国驻莫斯科使馆接到柏林的命令要他们准备在7天内撤离，并说使馆地下室里正在销毁档案文件。③

现在人们知道，当时苏联军事侦察员里查德·佐尔格也送来过十分重要的情报。他在1941年5月和6月都曾向莫斯科报告，既包括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还包括入侵军队的数量、法西斯司令部的战略行动计划和德军的主攻方向。这些十分重要的情报都立即送交给斯大林了。可是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的却是："归档"，"存档"，而不予理睬。 889

① B·别列日柯夫：《出使柏林》莫斯科1966年版。

② A·M·聂克里契：《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1965年版第121页。

③ 《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5期第27—28页。

1967年6月,《真理报》在一篇《她叫阿利塔》的文献性小说中,讲述了曾在德国境内进行活动的一个侦察小组,向莫斯科提供了有关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

1941年任红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元帅,在其《回忆与思考》①一书中证实,当时总参谋部和军事侦察机关是晓得希特勒的计划的。朱可夫说,1941年3月20日,侦察局局长Ф.И.戈里科夫将军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极端重要的情报,其中叙述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时可能采取的几种方案。后来查明,这些方案反映了德军司令部制造"巴巴罗沙计划"的情况,其中之一实质上正好是这份计划的基本内容。报告中说:"在各种可能的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种:……根据1941年2月……情报资料所定的方案三:'……为了入侵苏联,组成三路集团军:由包克元帅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攻向彼得格勒;由伦德斯元帅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攻向莫斯科;由李勃元帅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攻向基辅。入侵苏联的日期定为5月20日。'"朱可夫书中写道,戈里科夫的报告中指出:"对苏联的军事行动,预料将于194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之间开始"。② 根据朱可夫提供的资料,1941年5月6日,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上将向斯大林提出了类似的报告。

890

诚然,格·康·朱可夫想要肯定Ф.И.戈里科夫和Н.Г.库兹涅佐夫似乎不仅把正确的情报,而且也把假的情报送给了斯大林,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荒唐和不负责任的意见,从而否定了一些重要的消息。例如,戈里科夫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后面写道:"一,根据上述言论和今春可能的作战方案,我认为发动对苏战争最可能的时间,是在战胜英国以后,或在德国缔结光荣的对英和约以后。二,关于今春对苏战争的不可避免的传说和文件,必须看作是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情报机关散布的假情报。"库兹涅佐夫在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的结尾写道:"我认为这些情况是不真实的,

①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69年版。

② 同上第248页。

是专门用来试探苏联对此作出的反应的。"

可见，格·朱可夫企图使人觉得，戈里科夫和库兹涅佐夫欺骗了斯大林，而斯大林好象受骗了。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朱可夫本人曾写道，1941年春天，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对战争日益临近并没有任何怀疑，但是未能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战争即将爆发。戈里科夫和库兹涅佐夫清楚地知道，这几个月来，斯大林盲目地相信战争可以避免，因此对于任何不同意见都不予理睬。他只愿意听到同他的错误想法一致的意见，而对于凡是想要报告真相，使他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他都蛮横地予以批驳。从朱可夫引述的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戈里科夫和库兹涅佐夫认为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有重大价值，想要引起斯大林的重视，纠正他的偏见。至于朱可夫引述的报告末尾的意见，那不过是防备斯大林万一大发雷霆的一种微妙的方法而已。

891 现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证明，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秘密反对希特勒的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伯爵就决定警告苏联政府，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他拜会了贝利亚的密友、斯大林的心腹、当时正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德大使杰卡诺索夫，并邀请他到德国大使馆参加宴会，进行会谈。参加宴会的有德国大使馆参赞黑尔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巴甫洛夫，舒伦堡当他们的面要求杰卡诺索夫转告斯大林，希特勒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但是，斯大林同无视佐尔格、邱吉尔等人的警告一样，也不相信舒伦堡的警告。斯大林认为，德国大使的消息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种讹诈手段，想要苏联作出新的让步。

斯大林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不仅听不得一切不符合他的想法的事实，而且采取一系列行动，表明他并不相信战争即将发生的传闻和消息。日本外务相松冈洋右离开莫斯科时发生的一个插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在他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道："松冈洋右动身的时间耽搁了一个小时，后来举行了一个不寻常的仪式。看来，出乎日本人和俄国人意

料之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出现在车站上，以一种异常亲密的态度向松冈洋右和在场的日本人表示了友好，并祝他们旅途愉快。然后斯大林大声问我来了没有，找到我之后，向我走来，用手臂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必须继续做朋友，你现在必须千方百计维持我们的友谊。'不一会儿，斯大林转向德国代理武官克莱勃斯上校，在弄清楚他是德国人之后对他说：'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是朋友。'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向克莱勃斯和我表示友好，故意引起在场的各界人士注意。"

892 1941 年 4 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南斯拉夫期间，苏联政府的态度同样也是十分错误和不体面的。早在 1940 年末和 1941 年初，德军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各国政府完全同意下开进了这些国家。在这期间，希特勒对南斯拉夫进一步施加压力。1941 年 3 月，南斯拉夫首相斯维特科维奇在维也纳签字参加德、意、日三国条约。这一行动激怒了南斯拉夫人民。1941年 3 月 27 日，南斯拉夫爆发了群众起义，反对把南斯拉夫变为德国的附庸国。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一部分爱国军官推翻了亲德政府。

苏联不仅承认了南斯拉夫新政府，而且在 4 月 5 日同这个政府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但条约签字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德军就入侵南斯拉夫，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谴责德国入侵这个兄弟的斯拉夫国家的行径。德国对南斯拉夫宣战的消息也只登载在 1941 年 4 月 7 日《真理报》最后一版上，对德军狂轰滥炸贝尔格莱德的消息竟只字不提。此后苏联对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没有作出任何官方反应。后来事实表明，德南这场短促的战争只不过使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推迟了几个星期。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决定关闭南斯拉夫、土耳其、比利时驻苏大使馆和代表团。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德国的侵略行径表示认可和鼓励。

当然，大量德军群集我国边境，对西部边境各军区司令部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些军区的参谋部甚至知道驻扎在边境的德

国部队的番号。边境各军区的司令员曾请求允许把部队开进靠近边境的防御地域，进入战斗准备。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一请求。 893
国防人民委员部、各工业人民委员部、各级军事建设机关的全部活动，并没有考虑到很快可能发生战争。这样一来，我国军队、我国工业部门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物质上，在实际工作中都没有战争准备。我军大多数部队仍是和平时期的编制，人员不足，缺乏技术兵器。许多坦克部队的兵器和人员不全，零件短缺，检修缓慢。此外，就在战前几个月，西部各军区开始了对坦克部队进行大规模改组工作。大家知道，苏联是最早建立机械化兵团（旅和军）的国家，但是对这种兵团在西班牙作战的经验却没有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我军机械化兵团的编制被取消了。只是由于德军在西欧成功地使用了强大的坦克兵团，总参谋部才于1940年开始着手组建新的机械化军、机械化师。但是，正如格·康·朱可夫所说的，这一工作进展缓慢："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好象没有肯定的意见，摇摇摆摆。时间在流逝，直到1941年3月才决定组建我们所要求的二十个机械化军。"① 正如许多军事专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边境地区，而且又是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进行这样重大的改组，这是斯大林和军事领导机关的一个严重错误。结果，战争初期许多坦克部队没有坦克，甚至没有射击武器，许多坦克也没有车组成员。

1941年6月以前，部队的新式坦克还很少，大多数坦克制造厂继续生产旧式坦克。空军的情况也是如此。战争前夕我国空军中数量上占优势的还是旧式飞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 894
的飞机，就其飞行技术性能而言，不如法西斯德国的同类型飞机。朱可夫写道："新式飞机刚刚在生产，我们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一的空军部队重新装备了新式飞机……只有个别的兵团受过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训练，而受过夜间飞行训练的飞行人员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空军领导机关大力抓了训练飞行人员掌握新式飞机的工

①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13页。

作，而对于旧式飞机的战备工作则稍有放松。”①

空军主帅 A·诺维科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上述情况。他说：“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空军的作战艺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外国军事专家慕名而来参观我国空军的演习和联合演习，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我国的潜在敌人也没有虚度时光。我们知道他们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什么，对空军寄予什么希望。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相当明确而全面地谈到这个问题。很明显，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因此必须使我军（其中包括空军）对未来的战争有所准备。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三十年代后期苏联空军的战斗演习和新技术装备开始落后了。西班牙战争后期，由于希特勒把最新式的空军技术兵器投入战争，我军的这一缺点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落后现象呢？A.诺维科夫列举了一系列原因。他认为，对在西班牙作战经验的分析缺乏批判的态度。同时，我军在哈勒欣河打败日军后产生了乐观情绪，对装备国产歼击机航空兵的现代化工作放慢了速度（亚·谢·雅科夫列夫也持同样的看法）。1940年已开始安排新式飞机的生产，但是这一工作进展缓慢，以米·莫·卡冈诺维奇为首的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是有责任的。生产新式飞机的任务没有决定下来，而旧式飞机在速度、发动机功率、武器装备和坚固性方面，都不如德国飞机。制造新式的空中雷达设备和地面雷达设备的任务、制造在夜间和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导航设备的任务也没有决定下来。此外，对空军领导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也是使空军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朱可夫所说的，战争前夕我们没有修建足够数量的机场。直到1941年2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才批准修建机场的补充计划。计划规定在西部地区修建一百九十个新机场，同时开始重新装备旧机场，因为这些旧机场需要增加和加固供新

①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17—218页。

② 《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2期第145页。

式飞机起飞的跑道。这些工程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建筑单位承担，并且立即在几乎所有机场进行施工，直到秋后才竣工。战争前夕所有这些机场的工程进入紧张施工阶段。与此同时，大部分军用飞机调到为数不多的民用机场。这些机场靠近边境，而且难以防御敌人的轰炸。

炮兵的发展也同样落后。统帅部没有足够的炮兵预备队。战争前夕我们未能把十个已着手组建的反坦克旅全部装备起来。据朱可夫证实，Г·И·库利克元帅作为斯大林在炮兵方面的主要助手，却未能经常使斯大林正确了解某些火炮和迫击炮的性能。例如，战争前夕总军械部对 БМ-13（"喀秋莎"）这种威力强大的火箭武器估计不足，直到 1941 年 6 月才决定成批生产。朱可夫认为，迫击炮的生产本来可以更多一些。 896

战争前夕，就军用物资仓库的地点布局问题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大量军用物资储备不是部署在大后方，而是在受到战争威胁的地区。边境地区的公路网和土路网也很不够用。

靠近边境的筑垒地域问题也需要谈一下。众所周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三十年代都非常重视构筑强大的防线，例如"马奇诺防线"和"曼纳尔海姆防线"。苏联在三十年代也同样沿西部边境构筑了绵延不断的筑垒地域。这一工程耗费了我国人民不少资金。

苏联总参谋部认为，虽然西部边境的一些新地区合并到苏联，但是主要防线仍然应当设在旧边界，因为这些地方已构筑有坚固的工事，并且地形熟悉。总参谋长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建议把西部边境各军区主力部队部署在旧的国境线一带，而在新解放的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和波罗的海沿岸只派出掩护部队，以便在苏联遭到入侵时保障我军主力展开。①

鉴于敌军兵力庞大以及在决定性的战斗行动中具有机动性，

---

① 《历史问题》杂志 1972 年第 9 期第 210 页。

正如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当时必须准备构筑第三条预备防线，例如，要在沿德聂伯河地区构筑此种工事。这样，我军就可以在这条预备防线逐步展开战略预备队。但斯大林却采取与此相反的措施。还在 1940 年就通过了一个决定，要求立即把西部各军区的部队调往新地区。尽管这些新地区还没有作好应有的各项防御措

897 施，却部署了西部各军区的第一线部队，甚至包括尚在组建阶段的兵团。斯大林指示要在整个新边界构筑同旧边界一样强大的筑垒地域。工程虽然抓紧进行，但还没有建成战争就爆发了。据朱可夫证实，在新边界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两千五百个，其中一千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一千五百个只装备了机枪。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Г·И·库利克、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和安·亚·日丹诺夫建议从旧筑垒地域拆下一部分火炮来装备新建筑垒地域。格·康·朱可夫和谢·康·铁木辛柯不同意这一建议，认为旧筑垒地域还有用处。于是把争论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同意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和日丹诺夫的意见，下令从次要地段拆除部分火炮。只是由于再次向斯大林报告之后，旧国境线上拆除武器的地段才得以保留部分火炮。这样一来，旧筑垒地域的防御能力就大大地削弱了。据某些军事指挥官证实，旧筑垒地域的某些工事甚至交给了集体农庄用作菜窖。另一方面，新筑垒地域也没有建成。结果无论新的还是旧的筑垒地域，在战争初期都未能有效地阻止德军的入侵。

类似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例如，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总参谋部或是国防人民委员，或是各兵种的司令员，在1940—1941年都没有建立作战指挥所，以便对武装力量实施有效的指挥，能向部队下达司令部的指令，搜集和分析有关敌人的情报。战争爆发后，军事领导机关只能坐在和平时期的办公室进行指挥，这就使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遇到严重的困难。

898 虽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但事实是：配置在西部各军区的集团军，直到 1941 年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作战计划，防备德国可能对我

国发动入侵。前海军人民委员H·Г·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有一种追求无限的权力的欲望，他把军事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战争的情况下，即使个别人可能在极其关键的时刻伤亡，制度应当保证作战行动不能中断。但当时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制度。战争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是没有准备的。"库兹涅佐夫又说："……我国的防御能力不单是，而且主要也不是取决于现有的部队、坦克、飞机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能否在必要的时候立即将部队投入战斗，有效地使用部队。备战不仅是储备技术兵器。为了打退可能的入侵，必须预先制订作战计划，并下达给各级指挥员。即便如此，也只是事情的开始。各级指挥员应当制订自己的作战文件，而且主要是要学会根据作战计划行动。这样做最需要的是时间。要知道同谁打仗？什么时候打？怎样打？

这些都不是无所谓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战争的整个进程。斯大林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呢？要知道当时他不仅是党中央总书记，而且是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他当然考虑过这些问题。我认为他坚信战争不可避免，坚信战争一定在西部和东部爆发，所以边境到处都有筑垒地域，而且在1940年底到1941年初进行了高级军事将领的调动，这就说明在备战……做了许许多多工作。但到底还是忽视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对战争没有做到常备不懈，而只有常备不懈部队才能担负起自己的使命。斯大林对于如何进行面临的这一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当时有一种病态的怀疑心理，因而对将来要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保密。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可能发生冲突的时间，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作准备。当历史的进程加快之后，对未来战争的想法和考虑也就来不及变成明确的战略设想和具体计划了。而这样的计划——准确的和深思熟虑的——在1939年—1941年是完全需要的，应当根据这种计划训练陆海军。"①

① 《十月》杂志1965年第11期第162、147—148页。

毫无疑问，苏联对战争没有准备，这一点敌人是很清楚的，而且这只能鼓励侵略者。事情果然如此，1941 年 5 月，德国军事当局卑鄙无耻地开始行动了。向我国边境推进的德军炮兵部队甚至没有采取认真的伪装措施。1941 年 5 月和 6 月，希特勒匪徒每天明目张胆地试探我军防御体系。德国国防军和边防军的士兵几乎每天窜入苏联领土，向苏联边防军开火。据 И·巴格拉米扬元帅所知，法西斯匪徒竟然如此猖獗，5 月底德军飞机经常毫不受阻拦地飞临我国领土上空，拍摄边境沿线我方永备工事和作战工事体系。战争爆发前夕，事情发展到德军的一小队侦察机竟然在我方一个机场着陆。德军飞行员声称他们"迷失航向"，然后就被释放"回家"了。军区司令员 M·П·基尔波诺斯上将请求莫斯科统帅部允许他们用警告火力阻拦德军飞机的行动，但他的意见立即被制止了："你怎么啦，想要挑起战争吗？"1941 年担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员的空军主帅A·诺维科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说："德军飞机越来越频繁地侵犯苏联边境的领空，但我们不能制止他们的飞行，因为战争爆发前不久，军区参谋部作战处长 П. Г.吉霍米罗夫对我说过，不许把部队调到边境，甚至遇有德军飞机深入我方领空时，也不许对德军飞机开火。希特勒匪帮的飞行员可以不受惩罚，使我感到难堪。有一次，我的手伸向电话机，想要找歼击机飞行师师长，命令他立即把入侵者打下来，用以教训其他入侵的飞行员。但是纪律性很快就使我冷静下来了……

900

战争结束后，我曾有机会了解到一份有趣的文件。从文件中得知，我方许多机场，西部各州重要的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目标，其中包括基辅、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港、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城市的目标，德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和顿河的主要桥梁，都被希特勒匪徒拍摄了照片，编制成册。"①

1941 年 6 月 14 日苏联所有报纸登载的塔斯社消息，严重地影响了我军的战斗准备。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在这一天，希特勒同

① 《新世界》杂志 1970 年第 2 期第 136 页。

他的将军们举行了进攻苏联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而塔斯社的消息却说："据苏联所知，德国也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的条款，因此，苏联各军区认为，关于德国意图撕毁条约，进攻苏联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最近德国军队撤出巴尔干战役调到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行动，应当认为是另有原因的，与苏德关系无关。"塔斯社的这一声明更加松懈了我国人民和军队的警惕性。Л·М·桑达洛夫证实，6月中旬以前，日益忧虑不安的情绪不知怎的，一下子就被《真理报》上塔斯社的这一著名声明缓和下去了。一个有权威的国家机关的这种行动对军队的警惕性是不无影响的。这一声明使我军各级指挥员毫不怀疑，一定有某种自己尚不了解的原因才使得我国政府仍然确信苏联边境的安全。于是军官不再留宿军营，士兵不再和衣入睡了。①

901

在临战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星期里，斯大林和他的谋士们的昏愦简直是史无前例的。那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不断减少苏联境内德国公民的人数，几乎每天都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携带眷属离苏回国。尽管德国方面几乎完全中断执行贸易协定，但苏联的货物仍然继续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战争爆发前不久，所有德国船只甚至不等卸完货物就驶离苏联港口。例如，战争爆发前夕，里加港停泊有二十多艘德国船只，只有几艘开始卸货，其他船只还没有把货装满，但到了6月21日所有这些船只就急忙起锚离港了。里加港务局局长感到情况异常，冒着承担责任的风险，扣留了德国船只，立即向莫斯科报告，把当时的情况报告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后者立即把这一情况向斯大林报告。但是斯大林指示立即撤销不许德国船只出海的禁令。与此同时，苏联船只却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继续在德国港口卸货，到了1941年6月22日，这些船只就作为战利品被俘虏了。②

战争爆发前几天，国防人民委员又一次提醒斯大林德国可能

① Л·М·桑达洛夫：《痛苦的经历》莫斯科1961年版第78页。

② 见В·贝列什科夫：《去柏林的外交使命》莫斯科1966年版第61、116页。

发动入侵。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庸人自扰"。据И·巴格拉米扬元帅证实，到了6月19日下午，国防人民委员部警告基辅军区司令部说，希特勒可能在最近几天内不宣而战，入侵我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却一反常态，没有下令边境沿线的部队，特别是空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正如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一 902 篇文章中所说的，甚至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天内，边境地区的我军"继续按平时的方式进行训练：步兵师的火炮在炮兵的营地和靶场上，高射炮在靶场上，工兵器材在工兵的营地上。在战争威胁已经临近的情况下，这种严重错误等于犯罪。这是否可以避免的呢？可以避免，而且应该避免。"①

A·维尔特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1941年6月21日晚上，莫洛托夫召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探询德国对苏联"不满"的原因。但是舒伦堡并不了解希特勒的最新计划，无法回答莫洛托夫提出的令人忧虑的问题。舒伦堡回到大使馆之后，等待他的是里宾特洛甫的指令：去见莫洛托夫，向他宣读一个声明。声明充满了希特勒习以为常的对苏联的谩骂。这实际上等于宣战。舒伦堡说，莫洛托夫一声不响地听完了，然后伤心地说："这是战争。你认为我们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吗？"②

据P·马林诺夫斯基证实，各军区只是在21日夜间才收到密电，估计德国将于6月22日—23日对苏联发动进攻，要求各部队隐蔽地占领国境线上筑垒地域各发射点；将全部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军队应分散、伪装；防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以前，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至于如果敌人入侵我国领土，是否可以开火，对这个具体而明确的问题的回答是：不要理睬敌人的挑衅，也不要开火。这个指令还没有来得及下达到部队，因为6月22日拂晓法西斯军队就入侵了。③

903

① 《伟大卫国战争二十年》，载《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第6期。

② A·维尔特：《1941—1945年战争中的俄罗斯》1967年版第175页。

③ 《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第6期。

当然，战前最后的几个星期我军没有采取应变措施，对此要负责任的不仅是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重大责任的。我军指挥员常常想起他在战前吹嘘我军战斗力的一些言过其实的声明和讲话。国防人民委员谢·铁木辛柯、情报部长Ф·戈里科夫、1941年上半年曾任总参谋长的格·康·朱可夫也同样负有重大责任。但是斯大林无疑要负主要责任。康·西蒙诺夫在他未发表的关于战争初期的情况的札记中公正地指出："……如果说到战争的突然性和由此而使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那末这一切恰恰是从下面开始的：来自侦察员的情报和边防军的报告，作为各军区的战报和消息，又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报告，所有这些情况最后汇集到斯大林那里，然后应该由他、由他的坚定信心作出决定，只有他，只有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才能防止我国面临的灾难。反过来，又从上而下，由他发出指示，通过国防人民委员部，通过总参谋部，通过各军区司令部一直到下面，都受到一种压力，一种行政的和精神的压力，这种压力终于使战争比在任何其它的情况下都来得更为突然了。"

实际情况和斯大林的行动是如此大相径庭，以致现在有许多人就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提出疑问。

但是，为什么斯大林在1941年甚至连最简单的预防措施都不采取呢？Н·Г·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觉到，在一种无形事实的压力下，斯大林在1941年初已了解到希特勒入侵 *904*
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对战争不会马上发生的估计是错误的，而且看到我国武装力量和举国上下在战前的几个月对战争没有足够的准备之后，他就努力采取他认为可以推迟冲突发生的时间的一切措施，竭力使局势不让希特勒有任何借口发动进攻，挑起战争。"但是，库兹涅佐夫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库兹涅佐夫自己就在这段话的前面说过斯大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当然知道只有给侵略者以应

有的回答——以突击回敬突击，才能使侵略者清醒过来！侵略者如果举起拳头，这就是说，也要给他回敬以拳头。”①

当然，可以指出，除了关于德国准备对苏战争的消息外，莫斯科还得到不少其他各种消息。希特勒分子在 1941 年加紧散布流言，说什么德国军队在苏联边境集结，“这是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佯动，其目的是使人们不去注意德国正在对入侵英国作最后的准备。”② 希特勒利用全部宣传手段竭力给人以印象，他的主要目的是进攻英国。

E·勒热夫斯卡娅在她的《柏林，1945 年 5 月》一书中，列举了不少这种制造假情报的例子。比如，她指出这种活动是由戈培尔领导的。但是所有这些迷惑人的花招是不难识破的，尤其是有足够数量的其他材料和情报可以戳穿这些花招的。

许多军事领导人远不如斯大林消息灵通，但他们在战前的几个月也清楚地知道，苏联没有准备战争的时间了。他们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会在任何一天爆发。在这个问题上，格·康·朱可夫表示应该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事承担责任。他写道：“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事将领，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因此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付诸行动。”③

但是，朱可夫言犹未尽。他没有说，正是斯大林在军队和全国所建立的专制制度妨碍了人们让斯大林了解局势并说服斯大林采取措施。他也没有说，在军事领导人中间有一些人冒着极大风险想让斯大林知道真实情况。但是斯大林已经不想听取理智的声音了。正如康·西蒙诺夫在他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历史的教训和作家的责任》中公正地写出的那样：“斯大林不仅要对自己顽固地不愿意考虑侦察员的重要情报负有责任，他对全国人民所犯的

---

① 《十月》杂志 1965 年第11期第 163 页。

② 《历史问题》杂志 1966 年第 8 期第 79 页。

③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 247 页。

罪在于他造成一种极为有害的气氛，使得一些有权威的人掌握着确凿的材料，但却没有可能向国家元首证明局势危急的程度，没有权力去采取足够的措施，防止这种危险局势的出现。”

许多事实谈到，斯大林在战前几个月的行动表明，他不仅不会分析他所得到的情报，而且在希特勒德国进攻面前惊慌失措。斯大林当时非常害怕同德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他耽心苏联方面表现出来的任何警惕性，都会被希特勒分子利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但是他不明白，既然法西斯德国已决定对我国发动战争，那么它随时可以找到借口，或者无须任何借口。

但是，斯大林在1941年所犯的重大错误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说过，乃是专制和独裁政权的制度加上斯大林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的目光短浅。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他处理国事毫无深谋远虑，不善于预见未来，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不仅是个不高明的策略家，而且是个很不高明的战略家。斯大林在制定我国对外政策的时候，象任何一个暴君和独裁者一样，不是从现实的全部条件和事实出发，而是从想象出发。例如，斯大林没有看到我军的全部弱点，而这支军队只是由于斯大林的罪戾而丧失了一些优秀将领。斯大林也没有看到当时我国城市和农村存在的许多困难，尤其是没有看到，也不了解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和统帅身上存在的局限性。结果是斯大林夸大了苏联的力量，因而寄希望于希特勒不敢进攻苏联。 966

当然，对德国来说，进攻苏联是一种冒险行动。希特勒本想在几星期之内，至少在冬季到来之前取得胜利，这更是冒险的打算。因此希特勒统帅部的作战计划没有考虑到第二梯队和刚刚动员组建起来的部队的问题。现在我们从德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得知，当年德国军事工业的准备还不足以同苏联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希特勒的军队在一些战役中能够打败红军，但是不能征服整个苏联人民，同时也不能征服欧洲各国人民。既然法西斯德国甚至在1941年处于这样空前有利的情况下都吃了败仗，那末一旦苏

联政府的领导变得比较理智，并且采取必要措施动员全国进行反击，在我国等待着侵略者的会是什么命运，那是可想而知的事。希特勒同样是个独裁者和暴君，他的行动也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想象出发。希特勒由于在西欧取得了胜利而踌躇满志，他在1941年过高地估计了德军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对苏联人民的力量和苏联社会的巩固估计不足。希特勒认为苏联只不过是个泥足巨人，而且指望我国在战争初期失利之后就会象纸牌搭成的小房一样瓦解。希特勒是个典型的冒险家，我们在拟订对外政策时本应把希特勒的这种冒险主义作为最严重的因素加以考虑。可是斯大林在1941年没有充分考虑到希特勒的这种冒险主义。他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个冒险狂，不如说是个有理智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把自己的想象当作现实，因此他认为希特勒会是从分析实际的因素出发，而不会是从个人的幻想出发。[1] 这就是1941年斯大林和希特勒都失算的原因。斯大林有足够诡计在国内消灭他不喜欢的人，但是在我国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他却没有足够的智慧、知识和能力很好地和正确地领导我们的国家。

四、斯大林作为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统帅

1941年斯大林对战争的战略形势的估计明显地失算了。由于斯大林的过错使苏联遭到希特勒德国的突然进攻，而我国军队没有能力进行反击，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现在所有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是承认的。

现在人们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是在失去了一些优秀军事将领、有才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被斯大林杀害的)的

---

① 就是在今天，特别是在苏中关系目前的现状中，我们更不应该忘记1941年的教训。因为毛泽东也不是从分析实际因素行事的，而是从他自己对实际情况有时极其荒诞的想法行事的。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到来自毛泽东领导集团毫无理智的冒险行动。

情况下，进行人类历史上这场最艰苦的战争的。

某些历史学家和战争回忆录的作者虽然承认上述事实，但他们仍然力图证明，如果说斯大林在战前的表现不是那么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那末在战争期间他表明了自己是个能干的、有经 908 验的统帅。在这些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看来，斯大林仿佛是个最优秀的最高统帅，而且苏联军队取得了对法西斯德国的历史性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斯大林善于领导。类似这种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做法，比方说，恢复他作为一个统帅的名誉，在1967—1968年特别盛行（见安·格列奇科元帅、伊·科涅夫元帅、季·麦列兹科夫元帅、康·罗科索夫斯基元帅、C·M·什捷缅科大将的回忆录，H·库兹涅佐夫的第二本回忆录），历史学博士E·鲍尔京综述所有这些回忆录时写道：

“这些在军事领导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高级将领所写的书，必然会常常涉及到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工作情况……。有几位方面军的司令员和一位副总参谋长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谈到，最高统帅经常倾听下属的意见，并且重视可靠的和有根据的意见；还说斯大林具有深远的战略目光，善于抓住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明确地规定部队的作战目标和主要方向。总之，在一些苏联将领的回忆录中，斯大林尽管性格复杂而矛盾，但他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①

不难看出，E·鲍尔京的评论首先是同尼·谢·赫鲁晓夫论战的，他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极其公正而尖锐地揭露关于斯大林的军事“天才”的神话那一段讲话。然而赫鲁晓夫在1956年所列举的事实不仅驳不倒，而且近十年来已为成百上千的材料所证实，其中大量的证明材料已发表在我国报刊上。因此，如果鲍尔京之流现在企图重新评价斯大林是一位统帅，那末这是 909 难以如愿的。

---

① 《共产党人》杂志1969年第2期第127页。

目前历史科学所掌握的资料可以使我们甚至不用花很大力气，就可以彻底否定《共产党人》杂志评论员那套以假乱真的伎俩。

我们知道，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情况下，他的名字已成为我国人民意识中的一种象征，但是这一象征现在好象已和它的实际体现者毫无关系了。苏联人民在战争期间处于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斯大林的名字和人民对他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了苏联人民，是赢得胜利的希望。不仅如此，按照对任何人个人迷信的逻辑，军事上的一切失败，必然归咎于其他将领的行动和背叛，而斯大林的名字总是和胜利连在一起。因此，许多当年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去作战的我军士兵和军官，现在很难改变对上次战争中与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事件的态度。

但是无情的事实毕竟使得历史学家去反对那种以为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统帅的各种幼稚的说法：仿佛只是由于斯大林的精明能干才保证了我们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通过分析研究上次战争的资料、文件和回忆录，我们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实际上是个庸碌无能的统帅。当然，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作出了不少正确的决定，对下级发出过不少正确的指示，他也经常采纳（往往是经过争论和僵持之后）自己的军事助手们提出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好建议。但是斯大林个人的品质：态度粗暴、气量狭隘、对人傲慢、过分贪权、性好猜疑和官僚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会不在他作为统帅的工作中表现出来。因此，斯大林在整个战争期间犯了大量错误，而我们的国家和军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不错，指挥这样极其复杂的战争而要不犯任何错误是不可能的。错误有各种各样，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某些失算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斯大林所作的大量错误的决定是不可原谅的，不能不受到我国人民和历史的严厉谴责。

910

这里首先要谈一下苏联总参谋部拟订的总作战计划。对战争可能发生的时间不管国家领导人持什么意见，苏联总参谋部应该

有一个可能同德国发生战争的作战计划（也应该有可能同日本、土耳其、甚至同英国和法国作战的计划）。这些计划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而且要做到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付诸实施。

长期以来苏联历史学家根本不知道苏联总参谋部的对德作战计划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在我国的回忆录文献和战史文献中，不久前出版的格·康·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才第一次谈到了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

朱可夫写道："还在 1940 年秋天，就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过一次重大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一旦遭到进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存在有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由一个不正确的论点造成的。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而 1941 年 6 月，希特勒统帅部正是在白俄罗斯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结果不得不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就把原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十九集团军全部和第十六集团军的许多部队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制，边改编边投入作战。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这是因为1941年春天（2—4月）修改作战 911 计划时，我们没有完全纠正这个错误。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匪徒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矿区，以夺取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判断和他对形势的分析。斯大林的上述论断当然是有它的根据的，但是却没有估计到敌人对苏联发动闪击战的计划。"①

正如朱可夫后来证实的那样，无视欧洲战争的经验，我们的作

---

①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 227—228 页。

战计划是从旧的战争观念出发的。作战计划认为，战争将从规模不很大的边境交战开始，作战双方都不会使用主力投入战斗。只是几天之后（这是展开主力所需要的时间）才会开始决定性的交战。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德国人会立即将主力投入作战。朱可夫写道："1941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战争初期新的作战方法，实际上并没有加以充分考虑。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认为，象德国和苏联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还象从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之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在集中和展开主力所需的时间方面，法西斯德国的条件将和我们一样。事实上，兵力和条件相差都很悬殊。"① 可是，据朱可夫证实，甚至苏联总参谋部这个作战计划规定，一旦遭到战争威胁时必须：

——立即使全部武装力量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912 ——立即在全国进行军队动员；

——根据动员计划按战时编制扩充军队；等等。

这个计划只是在1941年6月21日夜间才由政府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当时我们已不是遭到战争威胁，而是战争开始了。

历史学家在研究斯大林作为统帅的活动时，不能无视战前在斯大林积极参与下制订的方案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一方案的主要依据是两条金科玉律："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给敌人"和"要在敌人领土上作战"。在这两条金科玉律的支配下，一些军事将领提出了在我国西部建立纵深防御的合理建议，但被斯大林否决了。针对可能发生战争而制定的战略计划，同斯大林提出过的一样，排除了敌人突破我方防御大举入侵苏联领土的可能性。因此在西部地区无论是工厂还是居民，都没有作可能要撤退的准备。作战阵地的前沿完全构筑在蜿蜒曲折的国境线上。这样就使我军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并且不利于我军利用天然屏障（涅曼河、阿弗古斯托夫运河等等）。因此，虽然我军用于保卫边境的兵力有十二个集团

---

①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32页。

军，但用以击退德军集中对某一方向的进攻却显得太少了。①

戈培尔在1941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俄国军队正好集中在边境上。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最好的情况。如果他们纵深配置，那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②

德国著名军事史学家K·蒂佩尔斯基尔希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写道："边境线向华沙方向成弧形状，造成对德军特别有利的条件。德军要在广阔的战线上展开进攻。这个集团军群应当以两翼的强大集团实施突击，消灭白俄罗斯境内的敌人，作为移动兵团突进至明斯克以南和以北，尽可能迅速地使用这些兵力去夺取斯摩棱斯克……"中央"集团军群遇到了铁木辛柯元帅指挥的兵力与我军大致相等的集群的抵抗。铁木辛柯的集群有三十六个步兵师，八个骑兵师，两个坦克师和九个摩托机械化旅的兵力，其中三分之二已调到比亚威斯托克边境地区。《中央》集团军群利用边境的地形，在我军两翼各部署一个野战集团军，每一个集团军都各有一个坦克联队群配合行动。"③

大家知道，还在三十年代初，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已预见到，战争初期在敌人压力下苏联军队可能要暂时撤离边境。因此，所有各边境军区在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布柳赫尔、扬·卡·别尔津的倡议和领导下，开始训练游击队和建立秘密游击队基地的工作，在培训干部和装备技术兵器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但是，1937—1938年许多苏联军事将领被捕以后，为可能进行游击战争而创造条件的准备工作受到了指控，认为是一种暗害活动。秘密游击队基地的组织者被指控为"怀疑苏维埃国家的实力"，甚至被说成是"在苏军后方准备暗害活动"。已训练好的游击队被解散，游击战基地被取消。不仅如此，和平时期在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工作的游击队和游击战基地的许多指挥员被作为"人

① 《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10期第33—39页。

② E·勒热夫斯卡娅：《柏林，1945年5月》莫斯科1965年版第71页。

③ 外国书籍出版社版莫斯科1956年版第177页。

民敌人"和"内奸"加以逮捕。[1]

在战争发生后的最初几小时和几天之内，斯大林的行动是极其矛盾、混乱和张惶失措的。

914 不出所料，战争开始时我国处境极为不利，因为无论是陆军还是空军，都没有及时进入战斗准备状态。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生动地描述了战争发生的第一天夜里的情景。6月21日晚上国防人民委员得到的消息是如此令人忧虑，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没有一个人去睡觉。从22日凌晨3时17分起，莫斯科就接到了各个方面军和舰队关于遭到德国飞机空袭的报告。而斯大林在凌晨1时左右就入睡了，连他的保卫人员在战争的第一天夜里也熟睡了。只是在凌晨4时，朱可夫和铁木辛柯才决定去惊动"领袖"。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我给斯大林打电话。"朱可夫回忆道。"电话打通了。但没有人接。我不断地要，终于听到了一位保卫部值班将军带着睡意的声音。我叫他请斯大林来接电话。三分钟以后，斯大林来到电话机旁。我向他报告了情况，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没有作声。我只听到他的呼吸声。

'您听懂了我的意思吗?'

仍然是沉默。最后，斯大林才问道：

'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

'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

'您同铁木辛柯到克里姆林宫来一趟。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一声，让他请全体政治局委员来。'

4时30分，全体政治局委员已到齐。我和国防人民委员被请去办公室。斯大林脸色苍白，坐在桌旁，手里握着装满了烟草的烟斗。他说：

'应当立即给德国大使馆打个电话。'

---

[1] 见И·Г·斯达里诺夫：《地雷到时爆炸》莫斯科1964年版。

使馆答复说，大使冯·舒伦堡勋爵要求接见，他带来紧急通知。接见大使的事，指定由维·米·莫洛托夫负责。这时，第一副总长尼·费·瓦图京转告我们，经过猛烈的炮击以后，德国陆军已在西部和西北方向许多地段向我进攻。过了不久，莫洛托夫匆匆走进办公室。

'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斯大林颓然坐下并且沉思起来。一阵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沉寂。我大胆地打破了这种长时间沉默的局面，建议立即用各边境军区所有兵力猛烈还击突入的敌军，制止其继续前进。

'不是制止，而是歼灭。'——铁木辛柯进一步明确说。

'下命令吧。'斯大林说。

6 月 22 日 7 时 15 分，给各军区发布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二号命令。"①

这个得到斯大林同意的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特别指出：

"1）各部队应当以全部兵力和兵器猛烈还击敌人，并将其消灭于我方边境地区。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之前，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境。

2）侦察机和战斗机应当查明敌空军和敌地面部队集群集结地点。轰炸机和强击机应以猛烈空袭消灭敌方机场上之飞机，轰炸敌人地面部队主要集群。空军应深入德国领土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实施突袭，轰炸肯尼格斯贝尔格和梅密尔。在没有接到特别指令之前，不得对芬兰和罗马尼亚领土进行空袭。"

1941年担任航空工业副人民委员的飞机总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之前'禁止越过边境？为什么空军只能在德国领土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之内进行突袭？战争已经开始，而统帅部却不知道敌军行动是怎么一回事：偶然入侵？德国人犯了过错？

①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 254—255 页。

还是挑衅?"①

6月22日白天，根据斯大林的坚决主张，又向各方面军发布了第三号命令，要求我军转入反攻，击溃敌军，并向敌国领土挺进。"可是，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以多少兵力对我实施突击。"朱可夫不以为然地对他的副总参谋长尼·瓦图京说："天亮以前先把前线发生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再作出必要的决定，是不是好一些?"瓦图京回答说："我同意您的观点，但事情是已经决定的了。"

据朱可夫证实，第三号命令引起了各方军司令员的激烈反对。这是完全有理由的。朱可夫写道："统帅部规定反攻任务时，并不了解6月22日这一天告终时的实际情况。各方面军同样也不了解情况。统帅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不是依据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和可靠的判断，而是从一种不问军队能力但求积极行动的直感和愿望出发的。这种作法在武装斗争的重要时刻，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允许的……已实施的反突击大多数组织得不好，因而没有达到目的。"②

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所作的内部报告中，向代表们谈到斯大林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据赫鲁晓夫证实，斯大林得悉我军遭受重创和溃败之后，认为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们已无可挽回地失去列宁所创建的一切了。后来实际上斯大林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而且根本不予过问，只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去找他时说，应当毫不迟延地采取措施扭转前线的局势之后，他才重新领导作战。不仅所有的苏联元帅，而且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都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但他们没有认为必须去更正赫鲁晓夫的讲话。

1966年春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举行的A·M·涅

① 亚·谢·雅科夫列夫:《生活的目的》莫斯科1966年版第241页。

②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73页。

克里奇的《6月，1941年》一书的讨论会上，有人也谈到了斯大林在战争最初几天临阵脱逃的情况。然而，后来某些历史学家企图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轰动一时的消息进行反驳，但没有能够举出任何例证或文件。1968年末，亚·恰科夫斯基在他的纪事小说《围困》 917 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斯大林在战争最初几天销声匿迹的一些情况。小说中所叙述的完全不是艺术构思。这一点读了小说之后就会知道。亚·恰科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是以铁木辛柯亲身目睹的事实以及一些无可辩驳的文件为依据的。同样明显的是，恰科夫斯基在发表这部小说之前，他是要把小说送交专门的军事检查机关审查的，而这个检查机关的职责也包括审查某些军事性的论点是否有根据。恰科夫斯基要告诉给自己的读者什么呢？他在描述战争的第一天时写道："深夜时分，斯大林和陪同他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忽然来到伏龙芝街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斯大林走进人民委员办公室时是镇静的，自信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在全国军事领导中心，他第一次具体感觉到现在面临的危险的规模。敌方坦克群企图以钳形攻势包围明斯克，看来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德军的前进，而同我方在敌人不断攻击下退却的部队的通讯联络，也受到了破坏……平常外表镇静、讲话和行动都很缓慢的斯大林这一次也忍不住了。他对人民委员部和总参的领导人作了愤怒的、无礼的斥责。然后，对谁也不看一眼，低着头，弓着背，走出大楼坐上汽车，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了。

……没有人知道斯大林在以后几十个小时在想什么。没有人看到过他。他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没有人在电话耳机里听到过他的声音。他任何人都没有召见。这几天里时刻等候他召见的那些人中间，也没有人敢不等召见就去见他……在那些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肩上，有关全国、有关前方的军事部署的实施的大大小小事情，立刻堆积了千万件。可是从早起一直到深夜忙着这些事的人，不只一次问自己，斯大林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他不说话？这个看来无所

918 不能、无所不知的人，在那长久而可怕的时间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想什么呢？这一点，只好猜测了……"①

接着，亚·恰科夫斯基企图想象在战争开始最初几天里处于孤独状态的斯大林会想些什么。这种猜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恰科夫斯基企图给人以印象，斯大林不在的时候，领导作战的工作进行得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斯大林严格集中权力的情况下，只有他一个人掌握领导国家和军队的许多最重要的纽带，以及拥有所需的情报和权力。无论是朱可夫、铁木辛柯、莫洛托夫，还是贝利亚，都没有必要的权力，也不能发布某些需要的命令。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战争开始后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离开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的岗位，是法西斯军队得以迅速地长驱直入苏联领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②

由于红军没有准备和缺乏应有的领导，希特勒匪徒向苏联发919 动进攻之后立即就取得了陆空主动权。蒂佩尔斯基尔希写道："各集团军的进攻一开始就大为得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惊惶失措。南面布格河的所有渡口都未加破坏就落在德军手里。我两个坦克集群顺利地突破苏军边境防御之后迅即继续向东推进。6月24日，我第二坦克集群进抵斯洛尼莫地区，第三坦克集群进抵维尔纽斯地区。紧随而来的是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别洛斯托克

① 《旗帜》杂志，1968年第11期，第49页。

② 格·康·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避而不谈在战争最初几天斯大林的行动。但是，朱可夫间接地企图否定赫鲁晓夫和恰科夫斯基提供的事实。朱可夫描述了6月22日晚到6月26日晚基辅和塔尔诺波尔的情况，企图给人以印象，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朱可夫还写道，6月26日斯大林亲自打电话到塔尔诺波尔叫他回莫斯科。据朱可夫说，从6月26日深夜到27日凌晨，斯大林同一部分军事将领在开会，6月29日两次去国防人民委员部。然而对比所有这些证明材料，我们可以认为，从6月22日晚到6月26日凌晨斯大林一直没有露面。可见，朱可夫的说法也丝毫不能证明斯大林不是销声匿迹。但是有根据认为，在6月底以前，斯大林实际上没有领导作战。在苏军中央档案馆的材料中，保存着战争最初几天发布命令的材料卷宗里，斯大林在6月23日到30日这一期间没有签署任何文件。这一期间国防人民委员部签署的命令和指令中，也没有引述过斯大林的任何命令的字样。

(比亚威斯托克)地区之敌企图向东撤退，冲出逐渐形成的包围圈。但担任进攻的我坦克集群在强大的空军支援下，在29日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在别洛斯托克以东地区合围之前，成功地阻止了苏军的后撤。在这两天的时间内，俄国人拚命向东和东南方向突围，企图冲出正在紧缩的包围圈。后来，俄国人的部队已精疲力竭，无力再战了。包围成功。7月1日这一地区的战斗已停止。同时，我军两个坦克集群则继续向东推进，对向东撤退并逃出别洛斯托克地区包围圈之敌实施包围。第二坦克集群于6月27日进抵明斯克南郊，与前一天攻克维尔纽斯后进抵北郊的第三坦克集群会合。这两个坦克集群形成新的包围圈，逐渐出现在明斯克以西和罗沃格鲁多克地区的俄国军队周围。德国步兵军从西面最后完成对俄国集团军群的包围。7月9日以前肃清了包围圈内之敌。7月1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战报说，敌我双方第一次在别洛斯托克和明斯克大战之后，我军俘虏了俄军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九十八人(其中有数名高级将领)，坦克三千三百三十二辆，大炮一千八百零九门和其他许多战利品。"①

现在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和将领都证明这是事实。苏联元帅 920 米·扎哈罗夫证实，在战争发生后的最初几小时之内，敌人的空军就对边境各军区的机场进行了密集袭击，我空军遭受重大损失，西部特别军区损失尤为严重。22日中午以前我空军损失了一千二百架飞机(其中八百多架是在地面被击毁的)。

安·格列奇科证实："在对我实施主要突击的狭长地段，敌人以其强大的第一梯队取得了在坦克、步兵和空军方面的绝对优势。这就使得德军得以利用优势兵力实施强大的首次突击，取得了主动权，然后随着部队从纵深开到之后对我实施逐个攻击。这种形势使我军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突击集群，只能逐步地、缓慢地展开兵力。结果敌人得以在战争最初的三个

---

① K·蒂佩尔斯基尔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77—178页。

星期使我军二十八个师失去作战能力，七十多个师的人员和技术兵器损失百分之五十以上。"①

И·В·丘列涅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战争的最初几天我军未能建立和进行任何有组织的防御。战斗是分散进行的。由于掩护部队不是有组织地进入战斗，以致未能建立一条绵密防线，只能代之以单个的基地。"②

尽管红军许多部队英勇地抵抗了侵略者，但仍然被迫向东退却，遭受重大损失。后来，斯大林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以后，对陆海军的领导虽然有所改进，但是我军面临的态势仍然是严重的。而且在1941年7月—8月这段时间，斯大林仍然张惶失措。

921 战争期间曾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和在几个方面军担任过最高统帅部代表的Н·Н·沃罗诺夫说："在战争初期，我很少看见斯大林。他情绪低沉，脾气急躁，喜怒无常。他每次提出任务，都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而毫不考虑实际情况。我认为，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对已经开始的战争的规模和需要多少兵力、兵器才能够在广阔的战场上（从东部海岸到西部海岸）阻止入侵之敌，斯大林的估计是错误的。他经常推测敌人很快就会被打败。斯大林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战争的规模，因而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对建立强大的预备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③

尽管法西斯军队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相当迅速地向前推进，但斯大林怎么也不愿意放弃要在敌人领土上作战的既定方针。因此之故，甚至当局势已发展到非实施退却不可的时候，斯大林也不允许实施退却作战。

比如，在西南方向强大的苏军集群之所以陷入包围，遭受重创，完全应由斯大林负责。

朱可夫证实，总参谋部分析了8月初各个方面军面临的态势

---

① 《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第6期第7—8页。

② И·В·丘列涅夫：《三次战争中的经历》莫斯科1962年版第147—148页。

③ Н·Н·沃罗诺夫：《在军事岗位上》莫斯科1963年版第179页。

后认为，我军战线最薄弱的环节是中央方面军。德军可能利用这一弱点向西南方面军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因此总参谋部建议从远东抽调十二至十五个师到中央方面军，把西南方面军撤过德聂伯河。这就意味着放弃基辅。从当时的战略形势看来，坚守基辅已不可能，而有组织地从基辅撤退则可以挽救军队和居民。斯大林听了这一建议之后大发雷霆。他说总参谋部的建议是胡说八道，并否决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和麦赫利斯商量了四十分钟之后，922 就解除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任命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但是，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的朱可夫仍然坚持自己的建议。后来决定建立布良斯克方面军，以掩护西南方向。但是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它所担负的任务。朱可夫通过高频电话再一次向斯大林建议把西南方面军所有部队撤过德聂伯河。可是这一建议毫无结果。

斯大林说，他深信即使布良斯克方面军不能击溃敌军，无论如何也可以阻止他们前进。①

大家知道，这种设想不是建立在深刻分析局势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是不切实际的。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后，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抵抗。西南方面军所有主力部队遭到了德军从西面和东北面夹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将军决定放弃基辅，在苏尔河地域组织防御。但斯大林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而且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坚守基辅和德聂伯河。

西南方向部队总司令谢·米·布琼尼元帅在9月这一段时间内也试图改变斯大林的决定。布琼尼在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强调指出："西南方面军的撤退如果延误，将会使部队和大量物资遭受损失……"但是斯大林对布琼尼的这一紧急请求不予理睬。

И.巴格拉米扬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清楚地记得，9月13日夜间，我军陷入包围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方面军参谋长В.И.图皮科

①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320页。

夫将军准备了一份给最高统帅部新的报告，客观地说明了我军极其险恶的处境，直率地谈到，如果最高统帅部这一次仍然不允许撤退，那么统帅部应对成百万人的死亡负责。方面军司令员不敢在923 这份报告上签字，于是方面军参谋长就自己签发了这份报告。我不知道统帅部是否向斯大林汇报了这份报告。但是在复电中总参谋长毫无理由地指责图皮科夫将军惊惶失措。其实第二天敌人就已切断了方面军同后方的最后的交通线了"①。

结果基尔波诺斯将军的所有部队都在德聂伯河西岸被击溃了，司令部也被摧毁了。我军在南方的防御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德军乘虚而入，占领了我国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州。

战争开始后最初几个月之所以出现乱作一团的局面，也是与这一期间缺乏有良好组织的军事领导体制有关。曾任海军人民委员的H.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只是在战争开始后才急急忙忙建立指挥作战的组织机构，其实这是早在和平时期就应建立的。1941 年 6 月 23 日成立了以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柯为首的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大本营，斯大林只是大本营的一个成员。7 月 10 日成立了最高统帅部，7 月 19 日，也就是战争开始后将近一个月，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只是到了 8 月 8 日，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大本营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斯大林从这时起担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②

1941 年 7 月一 9 月苏德战场上的战斗结局是人所共知的。苏军虽然在前线的某些地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仍然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向东撤退数百公里。红军光是战死和被俘就损失了三百多万人(到 1941 年 9 月 30 日为止，德军损失了五十五万人)。③

924 而且红军损失的都是正规部队，因此大伤元气。技术兵器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红军损失了大部分坦克、火炮、飞机。虽然德军

① 《文学报》1965 年 4 月 17 日。

② 《军事历史杂志》1965 年第 9 期第 66 页。

③ 《共产党人》杂志 1966 年第 17 期第 49,52 页。

也遭受重大损失，但是1941年初德军在各个战场上仍然占有兵力优势。例如，在西部战线开始进攻莫斯科之前，敌人的兵力比苏军多一半，技术兵器多一至二倍。

德军于1941年9月30日对莫斯科发起总攻之后，众所周知，他们在一些地域突破了我方防线，在维亚兹马地区包围了我若干个集团军。敌人的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占领了奥廖尔、布良斯克、加里宁、卡芦加、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和其他许多城市。

亚·华西列夫斯基证实，"当时局势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敌人突破莫斯科方向我军防御时，最高统帅部手中没有直接可供调动的战略预备队以掩护莫斯科。现有的预备队已用于加强西方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兵力，用于在西方方面军后方建立坚强的防御，最后还用于由于基辅附近西南战线我军处境困难而建立的所谓维亚兹马防线。而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不合理地组织了莫斯科方向的防御，使这一方向的态势变得更加复杂了。"①

这样一来，斯大林又惊慌失措了。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说明在1941年非常关键的时刻，斯大林如何给我军发布了内容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根本不可能执行的指令。在莫斯科保卫战最艰苦的日子里，П·А·贝洛夫上将见过斯大林一次。贝洛夫回忆说："在从前的岁月里，报纸上有许多关于斯大林的报道，说他是个坚定果断、洞察一切、无比英明的人。总之，不吝笔墨加以形容。1933年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从那时起他的变化很大。现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个身材不高，精神疲惫，面孔消瘦的人。这八年来他苍老多了，看上去老了二十岁。他的目光不象过去那样坚定果断，讲话的声音也缺乏信心。而更使我惊讶的是朱可夫的举动（他当时是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他讲话毫不客气，简直是命令的口吻，给人的印象仿佛朱可夫在这儿是首长，而斯大林却觉得理应如此。有的时候斯大林甚至还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②

925

① 《共产党人》杂志1966年第17期第52页。

② П·А·贝洛夫：《我们的背后是莫斯科》莫斯科1963年版第43页。

伊·斯·科涅夫元帅和朱可夫元帅也证实1941年10—11月斯大林指挥莫斯科战役时犯有严重错误。据他们说，德军的秋季攻势丝毫没有突然的因素。早在9月初，希特勒大本营就开始在莫斯科方向建立突击集群，准备发起进攻。9月15日，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被召往最高统帅部，斯大林要同他讨论军队建设的一般问题。后来讨论了设立库图佐夫勋章和苏瑕洛夫勋章的问题。但是，如同科涅夫在回忆录中说的："最高统帅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和我讨论过方面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提到要给方面军增加兵员和坦克，更没有谈到德军可能发动进攻的问题。总参谋部也没有提出今后的设想。"①

众所周知，德军发动进攻后不几天，我西部战线就被突破了。10月4日拂晓，德军的强大坦克集群可能推进到西方方面军部队后方的危险已经出现。科涅夫通过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西部战线的态势和若干个集团军有被包围的危险。斯大林听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一天，科涅夫又一次同总参谋长波·米·沙波什尼科夫通话，后者说要把情况向斯大林报告。但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没有接到允许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向格扎茨克防御地区退却的命令。结果第十九、二十、二十四、三十二集团军在维亚兹马地区被包围了(这些部队被包围后继续战斗，牵制了敌人进攻莫斯科的很大一部分兵力)。

10月底，德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虽然德军向东推进很远，但他们没有能够包围和占领莫斯科。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朱可夫)的部队进行了休整，补充了预备队。德国统帅部也急忙调动突击部队向前线集中，并加强其战斗力。1941年11月初，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德军突击集团的集结接近完成，看来很快就会转入进攻。这时，斯大林命令先行对敌实施反突击，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朱可夫试图证明此时不宜实施反突击，理由是没有预备队，

926

① 伊·斯·科涅夫：《莫斯科保卫战》莫斯科1966年版第33页。

战线太长等等。斯大林生气地说："关于反突击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晚就将计划下达。"[①]

不出所料，西方方面军的反突击未能取得最高统帅部所预期的效果。据朱可夫说，相反，实施这次反突击使西方方面军损失了急需的预备队，而且给击退德军11月15日发动的进攻增加了困难。

还必须指出，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陷入慌乱期间，斯大林却急忙离开莫斯科，这无疑会使得局势更加混乱。

谁都知道，苏联人民及其军队终于在莫斯科的大门口把德军阻止住了，我军从受挫中恢复了元气。斯大林从惊慌失措中恢复常态之后，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也应当对下述情况给予斯大林正确评价：他在莫斯科附近要冲紧张战斗期间调集了一定数量的预备队，用于后来转入进攻；虽然当时所有重要的政府机关仍然留在古比雪夫和高尔基城，但1941年11月—12月斯大林却在莫斯科，这在当时使部队对胜利增添了更大的信心。

927

苏联军队在莫斯科附近以及其他几个方向发起的冬季反攻，是红军战史上最英勇的篇章之一。

遗憾的是，在这期间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犯了不少极为严重的错误。斯大林显然过高估计了红军取得的初步胜利，而对德军抵抗的力量又估计不足。红军在数量上和技术兵器方面不如德军，但我军在莫斯科附近发起反攻后一个月，斯大林就指示红军在所有方向开始转入总攻。朱可夫1966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42年1月5日晚……我被召到莫斯科讨论今后的作战计划……原来最高统帅打算除了西线各方面军实施反攻外，苏军在其他所有方向也要转入进攻，它的目的是消灭列宁格勒附近、莫斯科以西和我国南部地区的敌军……总攻计划非常庞大，但当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所需的兵员和技术兵器。

---

① 伊·斯·科涅夫：《莫斯科保卫战》莫斯科1966年版第68—69页。

'谁还想发言?'斯大林在总参谋长讲解了整个计划之后问道。

我要求发言，我说，西线条件比较有利，敌人还没来得及恢复928其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西线各方面军应当继续进攻。但是，为此必须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增加预备队，首先是增加坦克部队，否则难以完成预定的任务。至于我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和在西南方向发起进攻的问题，我们将要突破敌人顽强的防御，而没有强大的炮兵支援，就不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结果将会使部队疲惫不堪，遭受无谓的重大损失……

从斯大林在我报告时的插话看来，我知道决定早已作出，不会更改了。但是，在我报告之后，尼·阿·沃兹涅先斯基也表示反对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以保证各个方面军同时进攻所需的物质条件。斯大林在他讲话之后说：我同铁木辛柯商量过，他主张进攻。应当尽快消灭德寇，使之不能在春季发起进攻。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支持斯大林的意见……没有人发言了。于是最高统帅用下面一句话结束了这次讨论：

'好吧，那末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①

不出所料，苏军在1942年1—2月发起的总攻以失败告终。

红军没能击溃德军任何一个主力集团。为了击溃德军主力集团而在主要方向进行的战役，没有达到目的。正如《伟大卫国战争简史》中所说的："由于在所有主要方向错误地同时发起进攻，这就使最高统帅部把战略预备队分散使用了。统帅部掌握的九个集团军平均地分到各个方面军。结果在要围歼敌中央集团的主力而需929要增加兵力时，统帅部手中却没有必要的预备队。"② 因此，即使西线红军完全有可能粉碎敌人的主力集团，但这一任务却因斯大林的错误决定而没能实现。

不仅如此，甚至当我军的冬季进攻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而必

① 《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第10期第79—80页。

② 《伟大卫国战争简史》莫斯科1965年版第138页。

须立即转入防御的时候，斯大林却仍然主张继续进攻。西线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不止一次地报告和建议必须立即停止进攻和巩固已夺得的地区，但都被拒绝了。

朱可夫说："1942 年 3 月 20 日，最高统帅部又发出指令，要求我们竭力去完成原定的任务。但是，西线各方面军虽然补充了少量的部队，但兵力仍感不足。3 月底到 4 月初，西线各方面军又一次试图完成要求粉碎尔热夫——奥列宁——维亚兹马集群的 3 月 20 日的指令，但这次又是毫无结果。春天的道路泥泞，使军队的行动和军队供应更加困难。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接受转向防御的建议。"①

苏联各军由于 1942 年 1—3 月几次不成功的进攻性战役，到 1942 年春夏已极为疲惫。不能不肯定，这就是我们部队在 1942 年夏季受挫的原因之一。

但事情还不仅如此。

在艰难的冬季战斗结束后，双方都开始积极准备进行 1942 年春夏攻势。《伟大卫国战争简史》在谈到此问题时写道："苏联领导毫不怀疑，希特勒军队在夏初要采取积极行动，以便使我们失去主动并对红军给予决定性的打击。在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及时地猜测敌人对 1942 年春夏攻势的打算并决定将要展开主要军事行动的战略方向……最高统帅部认为，夏季攻势开始后主要军事行动又会在莫斯科周围展开，正是在这个总方向上，法西斯将又一次企图给予决定性的打击……最高统帅部由于认为主要军事行动可能在西线展开，因此相应地把力量和战备集中起来。尽管我们的侦察机构（1942 年 3 月中旬）汇报说敌人春季攻势的重心将在南方，但是统帅部还是尽一切力量加强中心地区，而不顾对南方（西南和南方两方面军）的损失。"②

虽然斯大林在 1942 年春采纳了总参谋部认为 1942 年春季和

① 《军事历史杂志》1966 年第 10 期第 84 页。

② 《伟大卫国战争简史》第 153—154 页。

夏季的主要作战方式应是战略防御的建议，但他不愿意放弃要在1942年春季结束战争的想法，仍然指示同时在几个方向开始局部的进攻战役。例如，斯大林指示在哈尔科夫和克里木地区实施进攻，可是德军在这些方向也准备向我发起进攻，而我军在这些地区没有展开进攻所必需的优势。

这些考虑不周而又缺乏充分准备的进攻战役的结局如何，已尽人皆知了。我军在刻赤半岛的进攻也没有展开。不仅如此，德军在5月初就转入进攻，而且击溃了刻赤半岛上的我军集群。克里木方面军在一个月的作战中损失了二十万人，以及几乎所有作战兵器和重型武器。后来这些重型武器被德军用来对付塞瓦斯托波尔我方守军。

苏联著名作家康·西蒙诺夫认为，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指挥刻赤半岛的作战行动，但这些战斗对于评价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我想举一个战役为例。”西蒙诺夫在其未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的教训和作家的责任》中写道。“在这次战役中，进行战争的真正意义和由于军事上无知、而且出于1937年那种对人不信任的心理而提出的那些虚假的、口号式的观念有明显的矛盾。我现在说的是关于1941年冬季—1942年春季刻赤半岛事件可悲的回忆。七年以前，一位到过刻赤半岛前线的作家给我来信说：‘1942年我在刻赤半岛。我非常清楚这次可耻的失败的原因。这就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麦赫利斯根本不信任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员，他刚愎自用，独断专横……他禁止挖战壕，说是免得影响士兵们的进攻精神。他把重炮兵和各集团军的司令部推进到最前沿。三个集团军的兵力部署在十六公里长的战线上，一个师集结在只有六百至七百米长的战线上，我后来也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有这样密集的部队。结果是血肉横飞，葬身大海，全都毁灭了。这都是因为战线的指挥官是个疯子，而不是个统帅。’”

“写信人去过的这个地方，我也去过。”西蒙诺夫接着写道。“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他所用的形容词，但我同意他叙述的事情的实质。

我现在提起这件事情，绝不是要再次说麦赫利斯的坏话，况且，麦赫利斯个人的英勇精神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他所作的一切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他深信自己是对的，正因为如此，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在刻赤半岛上的活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当时对情况毫不了解，但却认为，凡是主张阵地距离敌人一百米最合适，而距离五十米就不合适的人，都是胆小鬼。

他认为，凡是想要使军队起码不打败仗的人，是对打败仗大惊小怪。他认为，实事求是地估计敌人兵力的人，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麦赫利斯本人虽然准备为祖国而献身，但他的表现却明显地说明他是37—38年那个时代的产物。 932

方面军的司令员（麦赫利斯作为统帅部代表派驻该方面军）虽说是个有学问和有经验的军人，但他也是37—38年那个时代的产物，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害怕承担全部责任，不敢用合理的决定反对'一味向前'的盲目强攻，不敢冒着风险把自己同麦赫利斯的争论提到统帅部去。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严峻的刻赤半岛事件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这些事件可以说是37—38年的两种后果造成的，一种表现在麦赫利斯身上，另一种表现在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身上。"

我军在哈尔科夫附近发起的进攻以完全失败告终。虽然苏军在进攻的最初几天成功地推进了几十公里，但未能巩固这一战果。非但如此，1942年5月17日德军转入进攻，苏军各集团军就面临被围的真正威胁。总参谋长A·M·华西列夫斯基向统帅部建议，立即停止哈尔科夫附近的进攻作战。但是斯大林同战线总司令谢·铁木辛柯商量以后，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命令继续进攻。5月18日晚，尼·谢·赫鲁晓夫又一次去见斯大林要求停止进攻。但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决定。只是在错过了时机很久以后，斯大林才下令停止进攻。但这时已不能扭转战争的态势了。两个多集团军的兵力被围，其中大部分被歼或被俘。南方方面军和

西南方面军本来已感兵力不足，现在更是削弱了，因而不能制止随即在整个南方战线转入了进攻的德军的前进。

后来，由于红军的英勇抵抗，终于制止住敌人的前进，但这时933 已是 1942 年秋，而且是在俄国中部——奥尔忠尼启泽市和斯大林格勒附近。我军经过浴血战斗消耗了敌人的大量兵力之后，于1942年 11 月转入进攻，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包围和消灭了几十万德军。这是卫国战争的伟大转折点。

但是，在苏军第二次冬季进攻期间，斯大林未能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条件和力量，未能及时停止进攻转入防御。只是 1943 年春我军打了一次大败仗之后，这才使斯大林能够较正确地了解苏德战场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

大家知道，敌人从北高加索和北顿河地区把部队调到顿巴斯纵深，在该地区组成了几个强大的集团军群，对红军进攻部队实施反击。但是斯大林错误地认为，德军已决定抽调主力渡过德聂伯河，就地加强防御。因此，尽管我军远离自己的补给基地和机场，燃料和弹药均感不足，斯大林却要求不能停止进攻，反而要求加紧进攻，不让敌人渡过德聂伯河。因此，强大的德国集团军群的进攻完全出乎我南方各个方面军意料之外。经过艰苦奋战之后，西南方面军的部队被迫渡过北顿涅茨河撤退，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队再次被迫放弃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统帅部于是把手中掌握的预备队调到战线南部地域。但是这样却影响了西部方向我军攻势的进程。

* * *

不用说，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研究整个战争进程和斯大林作934 为最高统帅的全部活动。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是由许多因素形成的。尽管红军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折，但是战争却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爱国主义的浪潮，千百万苏联人奋起保卫自己的祖国，共产党增加了数百万新党员。在战争的年代里每个党员对国家的命运的个人责任感空前提

高了。由于过去进行镇压活动而日渐下降的党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在战争的年代里又提高了。号召和团结人民去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是党。

在战争的环境下，许多党的、国家的和军事机关的干部在解决军事、经济和国家事务方面的问题时，有了更多的独立自主的权力。此外，党和军队从人民群众中间提拔了成千上万有才能的和忠于人民的领导者和将领。事件的进程本身迫使斯大林要依靠这一大批较年青和有才干的军事和政府干部。

尽管斯大林在战略上犯有错误，而且有许多时候不善于有效地指挥作战，但苏联人民及其军队伟大的爱国主义，苏军战士、军官、将领的丰富经验，乃是保证苏联取得对德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我们今天指出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绝不是要贬低苏联人民所建立的伟大功勋，不是的，这一伟大功勋只是在斯大林时期被贬低了，而现在，历史的真实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苏联人民的功勋显得更伟大了。

当然，斯大林在战争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些东西。他工作很多（但有关斯大林的神话"工作"做得更多）。1943—1945年他对军队所下的指示是比较深思熟虑和比较正确的。但是，斯大林的这一进步和他的大多数将领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斯大林身为最高统帅，但就统帅这个词尚未过时的意义来说，他不是一个统帅，因为统帅这个词意味着在作战过程中要具体指挥军队。据格·康·朱可夫证实，斯大林对战争的策略问题很不理解，对集团军以下兵团一级的作战指挥也一无所知。至于所谓斯大林的"组织天才"主要表现在镇压活动使人胆战心惊。这种镇压活动（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停止。不仅在苏军退却时期，就是在进攻时期，斯大林一直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作战，他不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没有下过部队，更不用说去作战部队了。 935

C·C·比留佐夫元帅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现在只要分析一下战争年代的事实，就会确信他（指斯大林——作者）是如何

远离军队的。

斯大林是最高统帅，但军队从来没有在前线见到过他，他自己一次也没有在战场上露过面。此外，在战争初期最艰苦的时候，作战部队甚至没有见过有斯大林签署的作战文件。当时几乎所有这类文件都是由沙波什尼科夫'受最高统帅委托'签署的。直到苏军开始不断取得胜利之后，才出现了有斯大林签字的命令。"①

比留佐夫元帅在谈到战争年代苏军指挥员如何活动时写道："不是斯大林给我们拿出现成的作战方法，指示我们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向敌人实施突击。这种突击计划是由许多人——高级和低级指挥员依靠集体的智慧制订的，由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激励下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英勇行动去执行的。"②

936 由于斯大林同作战部队没有联系，使得我军即使在反攻胜利的年代里也往往处于困境。斯大林有时企图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方面军的司令员，这些建议既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又与方面军参谋部的建议相矛盾。

有些方面军司令部在紧迫的形势下往往自主地采取某种决定，而这些决定后来又归功于斯大林的天才。库尔斯克战役开始时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③ 有许多决定后来都说成是斯大林作出的，其实是总参谋部采取和制订的，参加的人不仅有斯大林，而且还有各方面军和战线的司令员。

* * *

我在上面只是举了一些事实和例子，但足以对斯大林作为卫国战争的统帅的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不是一个好统帅，他热衷于作抽象的概括，对敌估计不足，对己估计过

---

① C·C·比留佐夫：《在巴尔干半岛的苏联士兵》莫斯科1963年版第247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③ 见回忆录文集《在战火的弧光中》莫斯科第107—120页（П.特罗扬诺夫斯基的文章）。

高。他远不是一个深谋远虑、行动果断的军事指挥员。他指挥作战从不考虑伤亡，不去设法而且不会尽量减少牺牲，对士兵的命运、普通苏联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我军在1941—1942年遭受严重失败的原因很多。1943—1944年我军取得许多辉煌胜利也有许多原因。战争初期斯大林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和统帅软弱无能、目光短浅，虽然不是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挫折的唯一主要原因，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斯大林的"英明"指示远不是我军取得胜利的首要因素。所以某些军事历史学家大错特错了，他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显然错误的三段论法出发的，这就是卫国战争既然胜利结束，那末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自然就是一个好统帅。不是的，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们的国家和我国军队要是换一个领导人，法西斯侵略者就不会是在列宁格勒和库尔斯克被击溃，而会是在这些地区以西更远的地方，战争也不会是在1945年结束，而会更早一些，几百个城市和几百万个村庄也不会毁于战争。 937

谁都知道，苏联付出了二千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取得了胜利，而德国在战场上和在国内的居民一共只损失了七百万人，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苏联的全国财富，即社会的物质财富，在战争中损失了约百分之三十。① 当然，在论及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时，上述数字也是不能不考虑的。

*　　　*　　　*

最后，必须谈一下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对军事指挥员的镇压活动。

例如，战争初期在莫斯科和直接在战场上逮捕了不少负责的军事指挥员，其中被逮捕和处决的有：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将军，西班牙国内战争的著名参加者、方面军参谋长

① 《共产党人》杂志1972年第17期第18页。1940年苏联的人口总数为一亿九千四百一十万人。虽然1946—49年的出生率超过历史最高记录，但1950年全国人口只有一亿七千八百五十万人。（《共产党人》杂志1972年第8期第41页。）

В·Е·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Н·А·克利奇将军，作战部长В·938 Я·谢茁诺夫。被逮捕的还有第十四机械化军军长С·И·奥伯宁少将，他的罪名是他指挥的部队没有进入战争准备状态。第四集团军司令员柯罗勃科夫也被逮捕。现在所有这些被逮捕和被处决的军事指挥员都已恢复了名誉。看来，斯大林想通过这种非法镇压把自己愚蠢的战略失算诿过于人。①

在战争发生的最初几个月中，许多在战场上牺牲的将领被宣布为叛国者，其中有В·Я·卡察洛夫中将、基里洛夫、波聂杰林将军等人。他们的家属被遣送出莫斯科。②

战争开始的时候，惊慌失措的斯大林一会儿下令进行新的逮捕，一会儿又下令释放根据他的指示刚被逮捕的人。我已经说过，国防工业部长万尼科夫一度被捕，后被释放。类似这种情况的航空工业部副部长В·П·巴兰金的命运更为典型。斯大林"默不作声地走进办公室。"亚·谢·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然后请沙胡林、杰明捷夫、日加列夫、彼得洛夫和我进去……大家对于从空中保卫莫斯科是否有把握没有信心，都在担心莫斯科的命运……斯大林在办公室里一再说：

'现在没人了，没人可派了……人手不够……'

当斯大林说到人手不够的时候，杰明捷夫低声地对我说：

'咱们替巴兰金说情吧。'

我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在谈话间歇的时候说：

'斯大林同志，负责飞机发动机的副人民委员巴兰金被捕已有一个多月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坐牢，但我们不能想象他会是个敌人。现在我们人民委员部需要他，因为现在发动机制造工业的领导很不得力。请您审查一下这件案子，我们对他是没有怀疑的。'

---

① 见《伟大卫国战争简史》1965年版第68页；И.Т.斯塔里诺夫：《地雷定时爆炸》1964年版等等。

② 《星火》杂志1964年第47期。

'是的，他已经被押四十来天了，什么供词也没有。也许他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非常可能的……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斯大林回答说。

第二天，面容削瘦，剃光了头的巴兰金已经坐在人民委员部他原先的办公室里继续工作了……"① 939

在战争的年代里，对突围归来的军人也进行了多次镇压和"清洗"。"锄奸"部门在作战部队以及在紧靠前线的后方所进行的镇压活动规模很大。当然，德国侦察部门和秘密警察向我国后方派遣了不少间谍，企图网罗和诱使我国人民背叛祖国。但是，"锄奸"部门有关破获敌方间谍机关、反苏分子的大量数字、有关消弭阴谋活动和背叛行为的大量事实的报告，始终使人觉得这些"揭发"中有许多都是臆造出来的。

镇压活动也在后方进行。例如，有一批哲学家（Ф·戈罗霍夫、И·М·库拉金等人）就是在战时被捕的，他们的罪名是"有失败情绪"。战争结束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分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党和苏维埃机关部分干部中间也进行了非法的镇压活动。有些人民委员部遭受了残酷的"清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44 年 3 月16 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指责，是得到卡冈诺维奇和斯大林认可的。②

应当特别谈一下斯大林对战俘的态度。看来，在战争的最初两年被德军俘虏的苏军指战员不下四百万人。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军被俘的大部分指战员只是在身陷重围，弹尽粮绝，身负重伤，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向敌人投降的。显然，红军许多大兵团被围和被俘的主要罪责首先应由斯大林本人承担。很有可能，正是 940 由于意识到（尽管是下意识的）自己的过错才使斯大林为此不公正

① 亚·谢·雅科夫列夫：《生活的目的》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268 页。

② 很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人民委员部被捕的干部只是在 1959 年，即揭露了反党集团（其中有卡冈诺维奇）之后，才恢复了名誉。

和残忍地对待战俘。大家知道，斯大林拒绝在关于俘虏的海牙公约上签字。因此，苏军战俘没能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任何帮助。许多苏军战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参加弗拉索夫的《俄国解放军团》。他们想用这种办法免于饿死，然后等待机会逃回苏军部队或游击队。

战争刚一结束，英美军队所在地区的战俘营来了几位负有特殊任务的军官，对苏军战俘宣读了一份正式文件，文件宣称，被俘指战员回国后不会受到迫害。但是这一诺言没有实现。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就在战俘中间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把他们看作祖国的叛徒。在苏联北部、乌克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集中营中，不少战争英雄，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布列斯特的英勇保卫者，曾经关在伊达内克、奥斯威辛、茅特奥森、达豪和德国的其他战俘营的游击队员、蒙难者和斗争者，现在却和真正的叛徒同牢共命了。[1] 作家C·C·斯米尔诺夫所描述的坦克兵少校H·C·特加丘克的命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多罗戈布日附近舍身突围时身负重伤，农庄庄员把他藏起来，给他治伤。健康刚一恢复，特加丘克就出发去东部战线找部队，被德军捉住后关在战俘营。1942年2月，他又一次逃跑，又被捉住。第三次逃跑成功，并和法国游击队取得联系。在以后的两年中他一直积极参加对德军作战。1945年1月，特加丘克又一次被俘，后来被英国从战俘营释放出来。他加入英国军队后，要求给他缝制一套苏军军服，在盟军部队中英勇作战。后来他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击溃了东线敌军的苏联军队。但是，特加丘克回到祖国在战俘甄别集中营度过一年

941

① 大家知道，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儿子雅柯夫·朱加什维里被德国人俘虏（在维亚兹马附近的战斗期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击溃后，法西斯德国统帅部建议以雅柯夫交换陆军元帅保罗斯。斯大林拒绝了。雅柯夫后来死于俘虏营。当人们向斯大林报告德国人的这一建议时，斯大林回答说："我没有儿子在德国当俘虏。"斯大林在影片《解放》中说的"用士兵换元帅，我不干。"这句话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来只是剧本作者的虚构。

之后，又被逮捕并判处徒刑，对他的指控都是诬蔑和荒谬的。①

有三个被俘的飞行员——A·卡拉彼扎恩、П·契库谢尔和 B·莫斯卡列茨的遭遇也是同样命舛运蹇。他们于 1944 年劫夺了三架德国飞机，飞到了白俄罗斯的纳卢博克斯克森林的游击队基地降落。白俄罗斯解放后，这三位英雄被捕了，并被判处十年徒刑。②

从俘虏营回国后于 1945 年被捕的还有：当年布列斯特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加弗里洛夫，挪威集中营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萨莫欣将军、诗人 И·Е·科瓦列夫斯基、В·А·诺沃勃拉涅茨等人。类似这类难以理解的残忍不仁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被俘后遭到希特勒匪徒杀害的鞑靼优秀诗人穆萨·扎利尔在战后初期也被宣布为"人民敌人"。

不但如此，在战后的年代里，就是从未被俘的军事指挥员也受到镇压和迫害。例如，战争英雄、空军元帅 С·А·胡贾科夫-汉费尼亚尼就是根据诬蔑不实的材料被捕的。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的还有：前海军副人民委员、海军工程学院院长、海军上将 Л·М·加尔列利，海军总参谋长 В·А·阿拉弗佐夫和他的副总参谋长 Г·А·斯捷潘诺夫（海军上将加尔列利死于狱中，阿拉弗佐夫和斯捷潘诺夫于 1953 年恢复名誉，释放出狱）。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三位诚实地工作的海军上将被诬陷泄露空投鱼雷的秘密。这种指控毫无道理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这一秘密早已公开，这种鱼雷的图纸早在书亭公开出售。③ 942

空军元帅 А·А·诺维科夫是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后被捕的。他是我国空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杰出组织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一批航空工业的干部和空军飞行员。他们被诬陷为缩减军用航空兵器的生产，把飞机制造厂转为大量生产日用消费品。

① 《真理报》1964 年 4 月 5 日。

② 《消息报》1964 年 7 月 9 日。

③ Н·К·库兹涅佐夫：《前夜》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212 页。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对这一"案件"也插了一手。瓦西里是个不学无术，行为粗野的酒鬼。战争开始时他才二十岁，大尉军衔，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已获得了与他的功绩毫不相称的中将军衔，而且在战后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

格·康·朱可夫元帅失宠被黜，调离莫斯科。卫国战争的许多优秀将领的名字，比如，托尔布欣，罗科索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沃罗诺夫，瓦杜丁，契尔尼亚霍夫斯基，巴格拉米扬，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在报刊上几乎完全看不见了。斯大林不愿意同他们分享自己的荣誉。

我在前几章里说过斯大林的极其卑劣的虚荣心，又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五、1944—1953 年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

关于战前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斯大林逝世前十年的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也需要分析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十年明确地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1944 年到 943 1947—48 年和这以后到 1953 年。第一个时期仍然是战争期间形成的反希特勒同盟（尽管到了末期这一同盟已徒具形式了）。第二个时期这一同盟实际上已告瓦解，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二者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进行着所谓的冷战。自然，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每一个时期都要解决不同的任务。

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确定作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和中心的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东方和西方各国的革命运动的态度。

其次，必须在新的条件下确定苏联对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态度，即首先要确定对美国和英国领导集团的态度。

无庸赘言，这些相互关系的发展当时往往背道而驰，因为符合

世界革命运动过程的利益的东西，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　　　*　　　*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前，我国的政治书籍中经常有这样的论断：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欧洲大多数国家和亚洲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这不是毫无根据的断言。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过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胜利的现实可能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后来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很明显，例如，如果苏德战场上 1941 年和 1942 年夏的战事不是苏联严重受挫的话，德国就不会在 1941 年 12 月对美国宣战。要是 1942 年苏联红军在英国还没有从受挫中恢复元气的时候就进入西欧，红军就不会只是解放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而且还会解放希腊和整个奥地利、整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毫无疑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今天欧洲的形势就迥然不同了。 944

然而事实却相反。苏军只是在 1944 年才越过苏联国境进入邻国境内，把这些国家从希特勒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这时英国已从受挫中恢复元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美国也参加了对德、日作战，而且，在 1944 年以前，美国已建立了一部庞大而有良好装备的军事机器。英美军队早在 1943 年就已进入意大利境内，1944 年 6 月在法国登陆。同年英国在德国境内登陆。这样一来，对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来说，欧洲的形势比只在苏德战场上发生战事的情况更为复杂了。

大家知道，在苏军解放的国家，经过长期进行不同程度的革命改革，社会主义已取得了胜利。这些国家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英美军队首先接替德国军队的西欧各国，进步运动和社会

主义运动的处境变得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945 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是非常强大的。在意大利这一运动至少比匈牙利强大，在法国比波兰强大，在希腊比罗马尼亚强大。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领导运动的都是共产党人。

1944年8月德军已开始从法国撤退，有秩序地把军队调回德国本土。因此占领区的实际政权已转到民族抵抗运动组织的手中。8月下旬巴黎胜利地举行了武装起义之后，法国出现了有利于民族抵抗阵线掌握全国政权的形势，但是民族阵线不去组织而且也不打算在这短暂几天有利的形势下组织自已的政府。这一有利的机会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戴高乐的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很快就进入巴黎，于是已被全体同盟国承认为法国人民合法政府的戴高乐流亡政府取得了全国政权。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反对这些事件的进程，它支持戴高乐，并且帮助他迅速建立起联合政府，所有反法西斯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都参加了政府。参加戴高乐政府的还有共产党。

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抵抗运动的力量企图在1944年8月夺取政权，法国形势的发展是否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呢？这一问题在194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战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过。与会的某些发言者，例如哥穆尔卡，指责了法国共产党当时犹豫不决。1952年对法共提出类似指责的有法共领导人之一安德烈·马尔蒂，他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和山·狄昂一起在德国占领区领导"马基游击队"。①

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也提出了这种指责，而且也指责了斯大林，因为据说斯大林在1944年没有向法共表示应当举行起义，相946 反，还不许法共把起义引向社会主义革命，以免在苏联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上，其中包括在波兰问题上，增添麻烦。

---

① 在193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占领时期（1940—44年），法国反抗希特勒侵略者游击队的名称之一，因常隐蔽在叫做马基的常绿灌木林中而得名。——译者

现在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来支持这一指责。但问题很清楚，民族抵抗运动阵线坐失了取得政权的机会，这与斯大林的态度不无关系。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了好几天。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当时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正如苏联记者恩·亨利在其未发表的札记《战后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公正地写的那样，1944 年 8 月，无论是美国人或是英国人都不可能阻挠在巴黎成立民族阵线的政府，戴高乐当时也不敢在作战部队的后方法国本土上挑起内战。当时法国边境上还有强大的德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愿意在自己的后方出现任何混乱的局面。

但是，尽管今天我们应当承认，1944年 8 月在法国错过了某些有利于革命的时机，但也难以同意这样一种论断：当时似乎失去了可以完全改变西欧战后历史唯一的和空前绝后的机会。应当坦率地说，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意大利最可能的机会，不是在 1944 年 8 月错过了的，而是在 1941 年和 1942 年德苏战场上进行夏季战役时就已错过了。

至于谈到 1944 年 8 月的情况，即使政权转到民族阵线手中，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转变也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在 1944 年的形势下只能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法国的民族阵线是几个政党的联盟，参加这一联盟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还有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天主教派、戴高乐派，当时民族阵线委员会主席是天主教派皮杜尔。虽然共产党人在全国阵线的许多地方组织和武装力量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在全国阵线的各种中央机构中并没有占多数。因此全国阵线的政府就只能是个联合政府，而这个政府也就不可能不包括戴高乐政府的成员，因为后者已迁回法国，并且得到盟国的正式承认。这样一个联合政府的主席自然不可能是共产党人，而且只能邀请戴高乐担任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当然，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全国阵线的政府中的影响比在后来成立的戴高乐政府中会大得多。但

947

是这种影响在当时也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如果1944年成立了全国阵线的政府，那末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作用会逐渐扩大，而最终会成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过，在当时法国的形势下，更有可能的是出现另一种演变。不要忘记，当时法国国内驻有一支庞大的英美军队，还有一支受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法国军队也在不断扩充。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里资产阶级的政党、资产阶级的报纸和组织很快就恢复了活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大的工业企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实施国有化，共产党人不可能破坏战争年代形成的联盟和把政权的关键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战后的法国任何一个政府之能取得政权都不是依靠起义，而只是依靠全国普选。因此，很难指望法国大多数选民在1945和1946年会投票赞成共产党人执政。

948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斯大林和多列士在1944年8月在对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法共党员的指示是错误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这一错误看作是造成战后欧洲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错误。

1944—1945年，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更小。大家知道，意大利早在1943年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之后，就在王室的默许下，建立了一个由巴多里奥元帅领导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对德宣战，并同在意大利南方登陆的英美军队协同作战。共产党的力量尚未壮大到能够取得政权的地步，它只能考虑参加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正是这样作的。我们觉得，他们在大战即将结束的复杂形势下，找到了一条最正确的斗争道路。意大利共产党同社会党人一起，在法西斯专制国家的废墟上，取得了建立民主共和国、通过民主宪法的成果。在那些年代里，争取更大的成果要比丧失已有成果困难得多，因此没有理由去冒险。

希腊的形势更加复杂。在德军占领期间，那里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无论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中，还是在人民民族解放军的领导中，共产党的影响都占压倒的优势。

另一方面，流亡的希腊君主政府，实际上根本没有参加反法西斯斗争。那是一个卖国的政客集团，他们指望主要依靠英美军队的帮助重返希腊。

苏军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胜利进军，迫使希特勒的司令部迅速撤走了驻守希腊的数师兵力。结果，很大一部分国土为解放军和解放阵线所控制。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虽然在雅典、比雷埃夫斯和帕特雷登陆，然而他们力量有限，只能控制所占城市附近的某些地区。当时成立的帕潘德里欧临时政府也有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然而，希腊不同于法国，那里不可能有民族抵抗委员会与戴高乐流亡政府之间那样的妥协（如同南斯拉夫不可能有那样的妥协一样）。无论英国人还是希腊反动派，都认为他们在希腊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除人民的武装，并且建立一支能成为资产阶级独裁制度支柱的"国民军"。在这种形势下，抵抗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必然要发生十分尖锐的冲突。1944年12月1日，解放阵线的代表退出帕潘德里欧政府，雅典全市举行了总罢工。英国的斯科比将军命令解放军部队撤出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而解放军则拒不执行英国人的命令，于是丘吉尔下令开枪。1944年12月5日，丘吉尔电斯科比将军称："你应负责维持雅典的秩序，并且排除或歼灭迫近雅典的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民族解放军的一切部队……你可酌情制定任何条例，以便严格管制街道或者围捕暴徒，有多少捉多少……在雅典，凡抗拒英国当局命令的武装暴徒，你皆应坚决向其开枪。当然，最好是你的指挥部能得到希腊当局的授权，从而加强权威性……但是，无论如何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立即行动起来，如同你处在一个已被征服但仍有局部叛乱的城市里一样。"①

然而希腊共产党在全面展开的武装斗争中，却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实际援助。斯大林从希腊召回了苏联军事使节。他过于拘泥地、并且在复杂条件下规规矩矩地遵守着他同丘吉尔的秘密口头协定：将希腊划入英国利益范围。当全世界都对英国人在希腊

949

950

① 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278页。

的行动表示愤慨时，苏联甚至没有给予希腊反法西斯人士以必要的道义上的支持。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英王陛下政府，尤其是为首的我，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当时大多数美国报纸都猛烈地谴责我们的行动，说这种行动违背了他们为之参战的事业。……由斯退丁纽斯先生负责的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显然含有批评性的声明……英国也举国哗然。《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反动的，并加以谴责。然而斯大林却严格和忠实地遵守我们的十月协定，在雅典对共产党进行巷战的数星期中，《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始终不曾有一字的谴责。"① 丘吉尔在给其亲密助手艾登的信中也写了这样的话。1944 年 12 月 11 日，正当希腊境内大肆兴师讨伐时，丘吉尔写道："如今，我对斯大林有一种日益加深的好印象，就是他虽然受到很大的引诱，甚至很可能还感到压力，但仍能信守他和我们的协议，而不曾出来干涉希腊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对他的影响将会加强，而且让苏联知道我们如何考虑问题，可以巩固他们的温和政策。"②

解放阵线和解放军由于孤立无援，而且毫无得到援助的希望，不得已停止了武装斗争。双方订立了停战协定。于是希腊便成立了一个将解放阵线排除在外的反动政府。但这个政府奉行的政策激起希腊全国人民的愤慨，结果在数年之后再次导致起义乃至全面内战。这一次，希腊共产党人仍然没有从斯大林和苏联那里得到必要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951

关于 1944—1947 年苏联与亚洲人民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现在还研究得不够。苏联在卫国战争中赢得胜利这一事实本身，对亚洲和非洲那些为摆脱殖民压迫而斗争的国家来说，便是一个巨大的支援。苏联人在粉碎法西斯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法西斯的垮台则为帝国主义整个殖民体系的覆灭创造了条件。

除去巨大的间接援助之外，苏联还向若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

① 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6 卷莫斯科 1955 年版 第 282 页。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参看中译本第 1037 页。——译者

动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和物质援助。苏联军队不仅帮助北朝鲜赶走日本占领军，而且帮助北方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胜利。在中国东北解放之后，苏联军队将被击溃的日本关东军的主要武器，全部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全境几乎都建立起人民政权。于是中国东北各省便成了最可靠的前哨和基地，使人民解放军得以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这对于中国推进民族民主革命和土地革命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与此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斯大林在1945—1946年显然低估了中国人民解放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潜力。如今人们已经知道（根据英国、南斯拉夫以及中国的书刊），大战后不久，斯大林曾邀请中共代表到莫斯科，劝他们同蒋介石寻求某种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斯大林认为，人民解放军如果转而进攻蒋介石，则会促使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那就不能使共产党获得成功，反而使国际形势复杂起来。然而中共并没有同意斯大林的观点，没有听从他的劝阻。此后不久，在1948年，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之际，斯大林承认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潜力和前途估计错了。 952

*　　*　　*

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十年的第二阶段，大致是从1947—1948年开始的。这时，地球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继续迅速地开展着。在一些国家里，由于斗争是共产党领导的，终于产生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民主国家。亚非的另一些国家，因为民族解放运动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爱国的党派领导的，一般都建立了在国际政局中处于中间地位的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些“不结盟”国家中，在1948—1953年间，有印度、印度尼西亚、锡兰、缅甸和埃及等。至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此期间都团结在美国周围，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阵营。根据当时世界上几大势力的分野，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按照三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苏联同欧亚两洲的年轻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另一条是苏联

同亚非两洲新独立的国家的关系。第三条是苏联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来逐一地探讨这三种关系。

*　　*　　*

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最好是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例来说明。

953 我们都很清楚，在1947—1948—1953年间，苏联曾向东欧的年轻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在苏联人民的帮助下，这些国家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所有工厂交给了工人阶级。这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强大的、所向披靡的群众运动。斯大林为这一运动的必然趋势所陶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不对东欧各国发生的革命变革给予支援。然而斯大林不光是帮了忙，他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国家中真正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斯大林对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作了许多歪曲，某些后果我们至今还能感到。用恩斯特·亨利恰当的定义来说，斯大林对欧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政策，不妨称作"社会主义的"沙皇制。斯大林认为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他的仆从，应该在国内外政策上绝对服从他。斯大林如同一个有统治权的邦君，认为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扩大他个人的领地。如果斯大林主观上觉得某一国家的利益，甚至苏联的国家利益，同他的虚荣心发生矛盾的话，那么他毫不迟疑地要满足个人的欲望。斯大林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全权主人和最高裁判自命，粗暴地干涉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把完全错误的、墨守陈规的决定强加于人。斯大林常常不考虑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不考虑

954 它们的特殊利益和需要。这样一来，他的作法就不是使这些国家变成独立的友好的同盟国，而是把它们当成了苏联的保护国。

斯大林这一错误的、有害的政策，势必在人民民主国家各阶层中引起某种不满情绪。产生这种不满情绪的，不仅有对民族限制

极其敏感的广大小资产阶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中，有许多人不愿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重大问题上，都盲目服从莫斯科的命令。在所有共产党都大搞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条件下，东欧国家某些领导人的这种立场，必然同斯大林发生冲突。

在斯大林同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这种冲突发展得最尖锐，最严重。最说明问题的是，1945—1947年间，即"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以前，南斯拉夫曾被视为最先进的人民民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斗争开展得最广泛，共产党在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也最为明显。南斯拉夫一解放，便立即实行了在当时说来最深刻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工业企业国有化、肃清反革命、取缔崇拜帝国主义的集团和组织。可见，南斯拉夫一解放就建立起以人民民主国家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南斯拉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在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以南斯拉夫领导人，无论在本国人民群众中，还是在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

不言而喻，我们完全无意在这里断言，铁托对国内外政策的所有意见和措施，无一例外，全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即关于南斯拉夫国内外政策的性质问题，很大，很复杂，已经超出了本书所研究的范围。但是应该说，最使斯大林恼怒，使他无法忍受的，并不是铁托及其战友确实犯过的或者纯属子虚的那些错误。使斯大林怒不可遏的是，铁托威信日高，而且他对斯大林就南斯拉夫政治经济建设问题所提的建议和意见，不愿意俯首贴耳地一律照办。南斯拉夫领导人这种尽量独立解决内政外交许多问题的努力——而且不总是以苏联为样版——终于导致苏南关系的破裂，这是应由斯大林负主要责任的破裂。

于是铁托政府和南共领导，被宣称为"托洛茨基-布哈林暗杀集团"、"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此后数年内，世界各国共产党报刊，

都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对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肆无忌惮的诬蔑。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被宣称实行法西斯专政，被视为英美侦探机关和反共宣传的中心。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全部断绝了。苏联军队推进到南斯拉夫边界。苏联报刊上竟然直接号召南斯拉夫进行国内战争。

在同南斯拉夫破裂之后，几乎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推行了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政策。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忽视某一具体国家对实行改造的条件是否成熟，也不顾各国发展的具体条件和特点。许多人民民主国家不是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经验，而是生搬硬套。结果，有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下降，无论人民群众还是党员，不满情绪都有所增长。然而斯大林及唯其马首是瞻的人，如拉科西、贝鲁特、契尔文科夫、霍查，却在 1948—1952 年间以大规模镇压来答复批评。当时又重新提出斯大林的一个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随着社会主义日益巩固和发展，阶级斗争也日益激烈。还根据这一理论杜撰了一种说法，认为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中，都产生了由贝尔格莱德、华盛顿和伦敦领导的亲铁托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在 1948 年以及此后数年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和阿尔巴尼亚各国，显然是在苏联侦察机关的领导和“技术”指导下，都逮捕了一批“人民敌人”，据说是在共产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层中发现的。然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表演了一场对“人民敌人”的“公开的”政治审讯案，这显然是袭用了我国 1936—1938 年搞的那些非法的政治审讯案件。

人民民主国家的大多数被告，由于受过刑讯，出庭时都乖乖地“承认”犯了那些他们根本就没犯过的极其严重的、耸人听闻的罪行。① 例如拉伊克·拉斯洛，原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和内务部

① 如今人们已经知道，人民民主国家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都被解到苏联去“受审查”，并在那里服刑。据曾在五十年代初坐过弗拉季米尔监狱的B·B·祖拉波夫说，这个监狱囚禁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员非常之多。

部长、工人运动的老资格的著名活动家、匈牙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他“招认”自己是霍尔梯法西斯侦探局派的奸细，说他自1931年以来向警察局出卖过二百多个共产党员，说他同时为南斯拉夫和英国两国的侦探局服务，还说他根本不是匈牙利籍犹太人，而是德国人，等等。人们从这些供词中感到，此案有斯大林侦察机关中经验丰富的暴虐狂插手。 957

保加利亚在挑衅性的诉讼案中，也搞了这种假供词。值得一提的是保加利亚主要被告人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他完全否认了向他提出的指控。检察长见无法迫使科斯托夫“承认”自己有罪，便要求中断审讯，而开始宣读科斯托夫预审时招的供词，据说那是他亲手签字的。这些伪造的材料宣读了三个小时，然后法庭便转而审问其他被告人，虽然科斯托夫在回答问题时拒不承认所读口供是真实可靠的。科斯托夫不管审讯案组织者施展什么诡计，在最后答辩时仍然尽力揭穿此案侦讯的内幕和这出可耻的审讯丑剧。

波兰则对一起“间谍破坏组织”案，搞了一次公开的政治审讯，说该组织是在波兰军队中进行活动的。以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为首的波兰人民军的一些要人都受审了。(在斯彼哈尔斯基解职之后，苏联元帅康·罗科索夫斯基却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陆军部长。)

1949—1952年间，捷克逮捕了捷共和人民政府中的许多要人。象弗·克列门蒂斯、古斯塔夫·胡萨克、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埃·戈尔德斯图克、玛丽亚·什维尔莫娃、约瑟夫·戈尔德曼、埃·列勃尔、A·伦敦等重要干部全都身陷囹圄。捷克人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斯沃博达将军，被解除一切国家职务，下放农村去担任农业劳动组合主席。

这些镇压措施，有许多都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在克·哥特瓦尔德知情的情况下搞的。捷共中央领导干部之一安东宁·诺沃提尼和捷共中央总书记卢道夫·斯兰斯基，都曾多次积极参加镇压

958 的准备工作。但是到五十年代初，连斯兰斯基本人也被捕了，于是捷克又就“斯兰斯基案件”搞了一次挑衅性的审讯案。

1968年捷克报刊发表了许多材料，相当全面地揭露了这一审讯案划策和进行的内幕，从而也使人明白了其他同类审讯的内幕。譬如，1968年春，布拉格发表了捷克前外贸部副部长埃夫任·列勃尔的几篇文章，此人于1949年被捕，是斯兰斯基一案的被告人（埃·列勃尔在1931年加入捷共，已于1963年彻底平反）。

另一位幸存的涉案人员A·伦敦，在其著作（《坦白》，1969年巴黎版）中，特别详尽地叙述了“斯兰斯基审讯案”是如何在苏联保安机关协助下准备和进行的。据A·伦敦证实，苏联保安机关在准备斯兰斯基诉讼案过程中，还收集了“备用性的”材料，都是污蔑雅克·杜克洛、雷基·隆哥和莱蒙德·居奥等西方共产党著名活动家的、有损于他们威信的材料。

同我国一样，各人民民主国家搞的“公开的”政治审讯案，造成一种普遍的变态心理，掀起了一股肃清间谍的狂热，致使这些国家的许多党内外人士无辜被捕。比如，1953年时，匈牙利的监狱和集中营囚禁着十五万多政治犯，其中有许多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工会干部。

据捷克报刊1968年披露，自1948年至1952年底，捷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两万五千多人被枪决或者瘐死狱中，其中多数是无辜的。

那时捷克政治犯的总数超过十万人，几乎全是由于被诬告而入狱的。当时坐牢的有许多是人民民主国家的著名国务活动家，959 如波兰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弗·哥穆尔卡、波兰工人党著名活动家泽·克利什科、匈牙利劳动党中央书记扬·卡达尔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其他著名活动家。在罗马尼亚，被捕并牺牲的有共产党秘密活动时期的总书记和颠覆行动组织者安东内斯库·帕特拉什卡努、部长会议副主席瓦·卢加、外交部长及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安娜·波克等。在阿尔巴尼亚，枪决了中央书记科奇·佐泽。

人民民主国家这些违反法制的行为，只对帝国主义有利，举例来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 * *

在战后年代里，斯大林不仅是对人民民主国家努力推行“社会主义沙皇制”的政策。他还想重新完全支配欧洲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证实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赋予工人运动的那股革新的巨大推动力……在大战以后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种企图在伪装下恢复集中领导的国际组织的作法是错误的，那样的组织过去之所以解散，正是为了确认每个党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都有独立发展的必要。那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时期，假如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给予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决定性打击，假如会上没去探讨那些不能再拖延、再掩饰的重大问题并且以新的方式予以正确解决的话，那么停滞不前就会变成顽固不化了。”①

Б·М·莱勃松和К·К·什利尼指出，大战结束后不久，我们 960 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报刊上，一提起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袖来，就说他们是美帝国主义的奴仆，似乎是把自己的党变成了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工具。

* * *

斯大林在评价亚非1945—1952年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的性质和本质的问题上，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些国家与中国、北朝鲜不同，不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党领导，而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个党派领导的。

斯大林根本不去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附属国的资产阶级，就宣称资产阶级如今已经抛弃民族独立的旗帜，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这面旗帜前进了。斯大林不承认不结盟的，中立的国家。他认为不结盟国家的章程是虚伪的，骗人的。亚非各国人民第二

① 引自Б·М·莱勃松和К·К·什利尼：《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转折》莫斯科1965年版第339—340页。

次大战后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所取得的许多实际成就，都被说成骗局，说成当地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结果。至于经过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独立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等，我国报刊上把它们列入傀儡国家、徒有其名的主权国家一类。亚非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几乎全被我国报刊斥为帝国主义的买办和代理人。比如，说苏加诺是竭力想同帝国主义勾结的人物。我们报刊上称尼赫鲁不过是个“帝国主义的走狗”。关于印度国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莫·甘地，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卷里介绍说：“甘地在发展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反映了印度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卖国立场。他们这些 961 人同帝国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把本国人民视为主要的敌人……等等。”由这些话得出的结论是：甘地“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拥护印度独立、反对英国的人”。这里几乎是只字不提甘地积极参加印度的独立斗争，不提他同群众的联系，不提他在英国监狱里度过了漫长岁月，也不提斗争终于使印度赢得了独立，而国大党在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

斯大林在评价亚非国家的民族领袖和民族资产阶级时所犯的严重错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的条件下，使得许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也在策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斯大林一直认为许多亚洲国家的独立是虚假的，其民族资产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代理人，所以他同毛泽东一起（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也开始在亚洲各国共产党制定斗争策略中起积极的作用），把举行武装起义和按照中国方式开展农民武装游击斗争这种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强加于亚洲的许多共产党。

譬如，在刚刚获得独立的缅甸，便开始搞反政府的起义，并且建立了解放区。但起义失败了。1948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穆索主张停止同民族资产阶级和苏加诺合作。在爪哇岛上举行了起义，结果失败，致使以穆索和沙里佛丁为首的二百多个党的领导人被处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武装游击斗争也失败了。连日本也在

1950年宣称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并且采取了建立军事行动队和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由于采取这一冒险主义方针，日本共产党的影响大大削弱，失去了大多数选票。只有越南的武装游击斗争得到顺利的发展，终于击溃了法帝国主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这不仅是因为它离中国近，而且因为越南在1945年之后依旧是法国的殖民地，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徒有其表的主权国家，傀儡国家。 962

*　　*　　*

至于苏联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斯大林从1947—1948年起奉行了一条十分生硬的方针，那时和平共处还不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斯大林的对德政策，可以说是这一生硬政策在西方最突出的例子，尤其是把欧洲形势搞得极为紧张的所谓柏林危机。在东方，持续数年之久的残酷流血的朝鲜战争也把形势弄得十分紧张。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及其盟国都不得不退到原来的阵地。从形式上看，斗争的结果是"平局"，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结局对苏联的敌人更为有利。恩·亨利在其随笔中说得对："倘以为朝鲜战争的结局是未分胜负，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是这场战争在当时帮了杜鲁门的忙，使他得以挑动全世界摇摆不定的人都来反对我们，并且大大损害了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赢得的道义上的威信。"

当然，外交政策上的某些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很难事先就预见到敌人的一切行动。无论柏林危机，还是朝鲜战争，都是斯大林搞的一种战斗侦察。这些事件向两大阵营显示了一条界线，不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就不能逾越的一条界线，但全面战争是苏美两方都认为不可取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侦察是必要的，有利的。不过只有当历史学家掌握大量文件资料时，才能比较确切地回答：1948—1952年间搞战斗侦察是否明智，那个时期有没有可能采用比较安全、牺牲较小的侦察方式。 963

965

第十三章

斯大林在内政方面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一、战后时期的非法镇压

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在全国唤起了巨大的政治热情，尽管这一胜利是以极大的困苦和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苏联人民全力以赴尽快治愈战争创伤，他们希望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人们流的鲜血染遍了我们整个的国土，因此对于任何新的死亡的想法都是不能忍受的。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战争刚刚结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公布了关于取消死刑的命令，即使是最严重的罪行。战前在人民中灌输的到处是间谍和怀疑一切的情绪也消失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勇敢精神，——这一切都用祖国优秀儿女的鲜血作了证明。

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苏联摆脱了国际上孤立的状态。在世界各洲都爆发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仿效苏联的榜样并在苏联的支持下，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全世界的视线都转到苏维埃国家，无论是我们的外国友人还是敌人都在密切地注意着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事件，966 并各自体验到苏联的成就和失败。

不言而喻，所有这一切都为斯大林及其一些助手们的专横设置了一定的限制。

尽管如此，战后时期对苏联公民、对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对苏

联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的非法镇压还是发生了，虽然其范围要比战前稍小一些。例如：在1949—1951年间，某些州的党组织受到了残酷的打击。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留下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当时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并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积极参与下，根据诬告材料，撤换并逮捕了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П·С·波普科夫以及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其他许多著名人士（前教育人民委员及《冰上干线》政委П·А·邱尔金等人）。

波普科夫被捕后不久，列宁格勒州党委几乎全体成员都遭到了镇压。随后又对共青团州委干部、州执委会干部、党和共青团区委干部、各企业和机关的经理、科学工作者以及高校的师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完全无辜的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囚禁中牺牲了。斯大林和贝利亚还准备对莫斯科的党组织进行同样的打击。

挑衅性的“列宁格勒案件”成为逮捕党和国家一些大活动家的借口，如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和联共（布）中央书记、保卫列宁格勒的领导人之一阿·亚·库兹涅佐夫等人。另外还逮捕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И·罗吉奥诺夫、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А·А·沃兹涅先斯基及其他许多负责干部。

尼·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同1949—1951年期间死在惩罚机关的打击下的党的许多其他知名人士一样，是党的领导人中新一代的代表，他们都是在革命以后，基本上是在1936—1937年以后提拔上来的。 967

这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老一代。一般说来，这些人对斯大林的迷信是完全接受并支持的。他们之中许多人随着自己官职的高升，沾染了斯大林主义者所特有的习气，如：对下属人员毫无道理的蛮横，独裁者的派头和沽名钓誉。但是党和国家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未见到过斯大

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也很少知道斯大林所干的非法行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诚实的人，他们对于交付给他们的工作富于创造精神并尽力作得好些。在这方面关于尼·阿·沃兹涅先斯基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从B·B·科洛托夫手稿中把它抄录下来[1]："有一天深夜"，B·B·科洛托夫回忆说，"我收到了贝利亚给沃兹涅先斯基的一包文件。我同往常一样，打开信封，抽出了厚厚一扎捆在一起的文件。文件第一页上印着'将被执行处决……的名单'。我手里拿的是要被枪决的人的一个很长的名单……，在名单结尾的斜下方是贝利亚、什基里亚托夫和马林科夫的亲笔签字。这份名单是送来让沃兹涅先斯基签署的。这是我在克里姆林宫多年工作中第一次碰到这种事。在此之前沃兹涅先斯基从未收到过任何这类信件。我立即到了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办公室，把这份使我心神不安的名单交给了他。沃兹涅先斯基认真地看了起来，看完了一页又一页，然后停下来，思索了一下，再把看过的一页翻回来，又接着看了下去。他看完名单之后，又看了看名单下面的几个签字，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气愤地说：

'你把这份名单交回送信的人，让他退回去，然后打个电话告诉该告诉的人，就说这种名单我永远也不会签署。我不是法官，因此也不知道名单上这些人是否应该枪毙。今后永远也不要给我送这类名单'。

968

沃兹涅先斯基断然拒绝签署对'人民敌人'的判决这件事，贝利亚是不可能不耿耿于怀的。"

然而不能不指出，在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出色的这些年青干部的影响和作用，在战后最初年代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明显地加强了。例如，沃兹涅先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就连伏洛希罗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库兹涅佐

① B·B·科洛托夫：《展望未来》（未发表的手稿）。

夫也被提拔到党中央机关任职，他作为中央书记受命负责监督安全机构的工作。这一切引起了斯大林以前的心腹们的极端不满。

不过，等待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奥诺夫等人的危险还来自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僵死的框框，对于这些比较有才能的干部来说是过于狭窄了。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迟早要成为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因为这些人会以自己的威信和影响贬低斯大林的吹捧起来的威望和虚假的伟大。正是这种情况发生在尼·阿·沃兹涅先斯基身上，他不仅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而且从 1937 年 12 月起，在十一年间领导了苏联国家计委。

如众所知，斯大林同沃兹涅先斯基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同 1947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苏联战时经济的书有关。这本书是根据大量的在当时是很新的事实材料写成的，书中揭示并详细分析了苏联战争年代的经济情况。沃兹涅先斯基的这本书尽管有个别错误，但很快在经济学家中普遍受到欢迎，书中的个别原理竟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的原理一起被并列引用。虽然该书的手稿斯大林早在 1947 年就亲自过目，甚至还签字付印，但沃兹涅先斯基的这本书却突然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被取缔。1949 年初，斯大林解除了沃兹涅先斯基的一切职务，并把他赶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斯大林拒绝同自己的这位亲密助手会见和听取他的意见。

965

沃兹涅先斯基“失宠”后的几个月内仍然还是自由的，看来不存在任何理由来逮捕他。为了制造逮捕尼·阿·沃兹涅先斯基的借口并粉碎国家计委的领导班子，据 B·科洛托夫证实，贝利亚捏造了一个关于国家计委“丢失”了某些机密文件的阴谋案件。司法程序是给人看的，目的是为了掩饰对沃兹涅先斯基的预谋陷害。同计委主席一起受到法律追究的还有他的第一副主席 A·Д·潘诺夫、副主席 A·B·库普佐夫和其他一些同志。但是沃兹涅先斯基在法庭上第一次发言中就坚决驳斥了对他提出的指控并揭穿了

法庭审讯的明显挑衅性质。贝利亚害怕进一步被揭穿，于是下命令不让沃兹涅先斯基再出席法庭审讯，而对其他被告作出判决。①

但是对沃兹涅先斯基来说这只不过是延缓期限而已。受贝利亚迫害而被解除工作的沃兹涅先斯基，仍未改变对斯大林的信任，这一点是很有代表性的。据沃兹涅先斯基的妻子M·A·沃兹涅先斯卡娅证明，她的丈夫不止一次打电话给波斯克列贝舍夫，请求他派一个信使来，他让信使带去事先准备好的短笺，要求斯大林给他分配工作，并向斯大林保证他是忠诚的，为人是老实的。但是回信却一直没等到。据B·科洛托夫说，沃兹涅先斯基自己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可能是某种误会造成的。他对自己家庭成员说："在斯大林未弄清楚情况以前，不必浪费时间。"所以他继续写作一本新的书——《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是他从1948年就开始写的。但是这部著作最后还是没有完成。1950年，尼·阿·沃兹涅先斯基被逮捕并被枪决②。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阿·亚·沃兹涅先斯基、M·И·罗吉奥诺夫、阿·亚·库兹涅佐夫以及他们"集团"里的其他成员被枪毙之前，在贝利亚的亲自监视下，还遭受了特别凶残的折磨。

970

*　　*　　*

战后年代，苏联从事创作的知识界遭受了尤其沉重的打击。

众所周知，战后不管对这些或那些苏联作家、作曲家、戏剧工作者的成就或是个别错误，本应进行平心静气的分析研究，但在我们国家，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领导下却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了几次大喊大叫的别有用心的纲领性运动，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我国在国外的威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对作家、作曲家和戏剧评论家的迫害，早在1946—1947年日丹诺夫作了几次讲话之后就开始了。著名苏联作家米·左琴柯和安娜·阿赫马托娃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象波·帕斯杰尔纳克、

① 《文学报》1963年11月30日。

② 《文学报》1963年11月30日；《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6期第98页。

德·德·肖斯塔科维奇、В·И·穆拉杰里、С·А·普罗科菲耶夫、А·И·哈恰图良、С·爱金什坦因、В·普多夫金、В·Я·舍巴林、А·梅雅斯科夫斯基、Н·波果金、И·谢利文斯基、В·吉尔桑诺夫、瓦·格罗斯曼、奥·别尔戈利茨、А·格拉德科夫等这样一些苏联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都遭到了带有偏见的批判。

不久，就开始了逮捕行动。1948—1950 年间，在许多文化界人士中逮捕了下列作家和诗人：别列茨·马尔基什、达·别尔格里松、А·格拉德科夫、Б·Д·切特维利科夫、С·加尔金、Д·果伏什泰因、И.菲菲尔、Л·克维特科、鲍·嘉科夫、Я·斯缅良科夫。象И·М·穆西诺夫和 А·伊斯巴赫这样著名的苏联文学研究人员也遭到了迫害，苏联文学的大研究家Г·А·古科夫斯基教授在狱中身亡。犹太剧院实际上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捣毁，该剧院的许多主要演员，包括祖斯金这样杰出的演员被逮捕了。[①]

371

犹太剧院的领导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卓越的演员索·米·米霍埃尔斯也在明斯克被害。1964 年法国出版的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关于斯大林的一本书中谈到，还是在 1946 年，斯大林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建议，邀请米霍埃尔斯到他那儿去作客，并请他扮演里拉王的角色。后来这位著名的演员还不止一次地被请到斯大林家里，并为他一个人演了莎士比亚剧中的片断。斯大林每次都对米霍埃尔斯表示感谢，并对他的演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 1948 年，米霍埃尔斯却在明斯克被打死，而斯大林在事前并不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年，这位演员在死后被毫无证据地宣布为英美和以色列侦探机关的间谍。

战后最初年代，乌克兰领导干部和从事创作的知识界人士也面临着被镇压的严重危险。1947 年拉·莫·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一岗位上只呆了九个

① 见《简明文学百科辞典》中的“犹太文学”条；《文学问题》杂志 1966 年第 8 期第75页；伊·爱伦堡回忆录，《新世界》杂志1965年第 2 期；鲍·嘉科夫回忆录，《十月》杂志1964 年第 7 期，以及其它。

月，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一段时间在许多方面都是“乌云遮日的日子”。卡冈诺维奇滥用权力、专横霸道、阿谀奉承、巴结逢迎，大树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时把自己打扮成乌克兰人民的“领袖”，树立对自己的迷信。卡冈诺维奇对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任意辱骂，毫无道理地严厉斥责，对他们进行恐吓，目的是使他们威信扫地，并进一步迫害他们。他毫无根据地指控乌克兰苏维埃文化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以及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具有民族主义倾向。①

这几年中进行的反对“世界主义”和“崇洋媚外”的运动也采取了极端反常的形式。伴随这一运动而来的是毫无道理地成十成百地逮捕和成千成万地开除有才能的忠实的干部。在这些年里，就连引用外国资料也成为一件有危险的事情，而同外国学者通信和保持联系就更不待言了。在这些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批评并被解除工作的有这样一些著名的苏联知识界人士，如 И·И·尤佐夫斯基——戏剧界著名评论家、И·С·兹瓦维奇——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政论家、以及 И·Л·阿里特曼、А·С·古尔维奇、Б·戴列德日耶夫、С·М·莫库里斯基等许多人。

972

1948 年和 1950 年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的会议之后，几乎我国全体医学生物科学界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数十名著名学者被镇压，成百成千的人被解职或被降职，在遭受不公正的迫害的人中，有这样一些大科学家、院士，如：Л·А·奥尔别利、В·В·巴林、Н·П·杜比宁、М·М·扎沃多夫斯基、И·И·什马里加乌津、康斯坦丁诺夫、П·К·阿诺欣、И·С·别利达什维里等人。由于多年的迫害，苏联自然科学界的大科学家，我国最大的植物生理学专家 Д·А·萨比宁自杀身死。

由于大肆宣扬日丹诺夫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讲话，他在党内和全国的威信大大提高了。这种情况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和妒

① 《乌克兰共产党的历史片断》1964 年基辅版第 574—575 页。

忌。日丹诺夫曾建议解除特·杰·李森科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斯大林以日丹诺夫在对待李森科活动的问题上似乎是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为借口，实际上解除了日丹诺夫的职务。此后不久，日丹诺夫就在自己的别墅里逝世，被宣称是由于心机梗塞去世的（后来斯大林指控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一个医生小组害死了日丹诺夫）。

没有任何根据的镇压也波及许多其它科学部门。例如，在战后年代，逮捕了技术科学博士、炮兵将军П·А·格里维赫、医学科学著名人士、许多新奇手术的独创者С·尤金教授、历史学教授Е·Л·什泰因别尔格等人。

在四十年代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制造了一个挑拨性的说法，宣称在苏联存在着一个“犹太人亲美阴谋集团”。因此，在我国开始逮捕著名犹太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例如，党的最老的党员之一、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索·阿·洛佐夫斯基(德利卓)被逮捕，之后不久就被枪毙，在处决前不久，他已满七十四岁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捕，其中大部分人（除科学院院士什得恩被流放之外）都被枪决了。1952年夏天，又枪决了以前所逮捕的全部犹太作家和诗人。

973

1949年，根据诽谤性的材料逮捕了中国革命的英雄、孙中山的私人朋友米哈·包罗廷。二十年代初期，米哈·包罗廷在中国担当孙中山和中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治总顾问。正是包罗廷从孙中山手中接受了他逝世前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件和这位伟大中国革命家的政治遗嘱。战后，包罗廷任《莫斯科新闻》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在情报局任职。同包罗廷一起受到镇压的几乎是《莫斯科新闻》报社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在其他人中被捕和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被驱逐出苏联的有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直到1955年，对《莫斯科新闻》报工作人员的指控才被撤销。[1]

---

[1] 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斯大林时代》一书，1964年6月30日《莫斯科真理报》及其它材料。

在这些年中，对全国最大的莫斯科汽车制造厂的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苏联人和对忠于党的干部毫无道理的打击。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48—1949年间对原政治犯的逮捕。

974 如众所知，战争期间，那些在1942—1943年已经刑满的政治犯，没有把他们从监狱和集中营中释放，这些人一直在集中营呆到“战争结束”。

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似乎应当使得战前由于镇压而在我国形成的那种紧张局面有所缓和。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大赦。盼望大赦的不仅是那些到1945年已经服满五年和八年刑的囚犯，期待大赦的还有其他“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几百万的亲友。大赦确实宣布了，但却不是对于“人民敌人”的。相反，正是战后最初年代，恐怖的浪潮遍及了各个集中营。大量囚犯受到“加刑”，对这些人的囚禁期，又被非法地延长了五年、八年或者十年。许多“政治犯”被从普通集中营转移到特殊的“强制”集中营里去。

一部分政治犯在刑满后又被改为流放，他们仍要“永久居住”在北部地区、在克累马河地区、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禁止他们进入苏联的欧洲地区。但是某些过去的集中营囚犯还是被允许进入我国的欧洲地区，不过通常不准他们在大城市居住。尽管这些人是很少数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48—1949年间又重新被捕。而且常常是不对他们提出任何控告就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的（即所谓的预防监禁）。

不过，就是那些由于“疏忽”而在1948—1949年间没有被第二次逮捕的为数不多的前政治犯，他们的处境也是极端困难的。几乎任何地方都不接受他们去工作，不给他们居住签证，他们常常成年累月地在全国游荡，无处安身。其中某些人由于感到绝望而自杀，一些人以乞讨为生，也有的人又回到了“自己的”集中营，期待着在那里被收容为自由就业人员。

上面我们谈了对无辜的人们、对苏维埃和党的机关的活动家以及苏联从事创作的知识界人士的逮捕和处决情况。 975

但是需要指出，战后发生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在青年中产生了一些人数不多的地下小组，它们的任务就是以某种形式来进行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反对他的专制。这些小组大多产生在大学生中。

这些小组的思想行动纲领通常都是一样的：他们把斯大林的专制看作是拿破仑主义的专制，是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把苏联社会看作是一个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已经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有时，这些小组的参加者为自己提出理论课题——撰写党的真实历史，批判斯大林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在某些场合，甚至讨论过可否暗杀斯大林或贝利亚的问题。

这种大学生的小组在列宁格勒有过一个，它的成员就争论过斯大林的某些哲学论点，不承认斯大林是“伟大哲学家”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格鲁吉亚有过一个青年小组讨论了暗杀贝利亚的问题。在莫斯科，大学生中有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小组，名叫“为革命事业斗争联盟”（革命联盟）。

在实行群众性的恐怖手段、全面监视和普遍迷信斯大林的情况下，这些小组很快就被破获了，它们的成员也都被捕。同时，克格勃机构对真正的（而不是侦察人员虚构的）反斯大林的地下组织是极端残酷的。这些被破获的小组中，任何一个都只不过议论一番而已，谈不上作了什么事，但秘密法庭对它们的判决却是非常严厉的。例如，莫斯科“革命联盟”小组的三个领导人Б·В·斯卢茨基、В·Л·富尔曼和Е·З·古列维奇（他们的年龄都是十九至二十岁），1951年1月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枪决了。其他男女青年均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革命联盟”的成员由于被减刑期而得到释放，但并未给他们恢复名誉，尽管他们反对斯大林的专制应得到的不是谴责而是尊敬。） 976

反对斯大林的专制和歪曲真理的还有一些作家和老共产党员

(当然都是秘密的)。例如,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早在1940年就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反对1937--1938年的大规模镇压。老共产党员亚·彼·斯蓬德,曾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后来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38年被开除出党,战后在莫斯科贸易公司当会计,他在1947—1949年间写了一部回忆录,力图写出我们党的真实历史并戳穿斯大林宣传中的许多神话。斯蓬德在回忆录中描绘了许多和蔼可亲的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在1947—1949年间被宣布是"人民敌人"。斯蓬德对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给予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斯蓬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现在正在为以斯大林的形式描绘的党史而扬扬得意,《简明教程》就是这一形式的体现。我怀疑这本书能有多长寿命,因为它太露骨太粗暴地歪曲了事实,这本书的目的是过于明显了,它同对过去事件的真正分析毫无共同之处。它的成功就在于它的确以最简明的形式保证比较快和比较简单地回答那些必须通过的测验和考试。书中满篇被歪曲了的无数事实定将真相大白,这样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但是对于革命事件的发展完全彻底地抛弃了辩证态度的这本书的精神,把领袖和群众相对立的精神,可能还要存在很久……这种精神同我们这一代充满活力的革命运动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它与列宁最明确表达的这一运动的目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①

977 一些共产党员在监狱和集中营里也进行了反对斯大林的某种政治斗争。例如,一位被镇压的党员Б·А·格良兹内赫在1940年就写过一本名之为《从列宁主义观点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该书在远东建设公司南方管理局的金矿里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正如后来作者自己承认的②,在这本小册子中有不少错误的判断和言过其实的地方,因为格良兹内赫对苏联社会生活仅仅看到了其比较丑恶的一面,这完全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但是在

① 亚·彼·斯蓬德:《回忆录》第175—176页,未发表的手稿。

② Б·А·格良兹内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声明,1956年8月12日于马加丹州,AB信箱261/169。

这本小册子中也有不少对斯大林及其全部行政体系的公正控诉。

格良兹内赫自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他认为斯大林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拿破仑主义者和专制君主，因此，他曾企图研究在苏联条件下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形式问题。他认为贝利亚的体系，一方面继承了沙皇暗探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充分吸收了布尔什维克地下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一体系是在政治垄断的情况下活动的，因此几乎不能使用阶级斗争的老方法。必须找到新的斗争方法。Б·格良兹内赫确信，一大批免遭逮捕的列宁主义者，可以利用专制制度本身来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他相信，对于专制制度本身，官方宣称的一致不仅在人民中不存在，就是在党内、在国家机关、甚至在保安机关内部也是不存在的。Б·格良兹内赫在他的一篇声明中写道："对形势的这种理解，给予了我以及同我一样的人们以忍受斯大林苦役中的一切非人的条件的力量，并使我有力量同这种苦役对其他同志的腐蚀影响进行斗争，我并不感到自己孤立，而是感到自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参加者。"在集中营中，Б·格良兹内赫也同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一样，尽力阻止那些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判断社会主义的集中营管理人员背离社会主义思想。"如果数百万人的斯大林劳改营"，Б·格良兹内赫于1956年写道，"没有成为使数百万人否定社会主义的学校，那么这应该直接归功于那些身处劳改中的用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干部（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我们身遭贝利亚制度的迫害，受着周围人们的嘲笑，而有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不懈地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捍卫着共产主义思想，细心和耐心地使人们相信列宁主义原则的最终胜利……当我们被从党内抛出、受着诽谤并被列入人民敌人的行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却仍然是共产党人，是布尔什维克传统的优秀捍卫者……将来历史会这样记载我们。" 978

很显然，对于全面和科学地分析三十——四十年代苏联社会所有弊病来说，劳改营远不是最适宜的地方。许多落入劳改营的

共产党员，仍企图用旧的方式思考问题。Б·格良兹内赫在探索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纲领时，宣称苏联的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认为是富人和穷人、新型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立场，虽然不能不承认，斯大林时代的环境提供了不少根据使他使用这一类的术语。

列宁格勒的女共产党员E.Л.弗拉基米罗娃在劳改营中写的《克累马》长诗中以及在许多其它诗篇中，对残无人道的斯大林劳改营和镇压制度表示了强烈抗议。年青诗人曼德里(科尔热文)在莫斯科也写下了反斯大林的诗篇。叶·叶甫图申科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否能在俄罗斯诗歌中留存，但是他将会在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中永存。他是斯大林在世时，写了并公开朗诵了反斯大林的诗的唯一的一个诗人。看来正是因为曼德里朗读了这些诗，他才得了救，因为他们大概以为这个诗人是神经失常的，所以至多是把他流放了。"

但是，所有这一切孤立的零散的反抗，在那时是丝毫也动摇不了斯大林专制制度的大厦的。

979

二、工农联盟的削弱

我们已经写过，战前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大大落后于计划指标。尽管1937年粮食产量公布为七十三亿普特，但实际上，1937年的粮食总产量是五十九亿普特，而五年中，粮食平均年产量仅为四十四亿五千万普特。其它大部分农作物以及畜牧业产品也都没有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计划增长为百分之一百，而1937年的农产品比1932年实际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虽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取消了配给制，但距农产品的富足还相差很远。

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批准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令。指令中规定，要保证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37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二。规定每公顷粮食的平均产量为十三公担，并保证每年收获

八十亿普特粮食的任务。预计大大增加甜菜、棉花和其它作物的生产和收获量。计划大量增加各种牲口的头数。同时还规定矿物肥料的生产要增加到五倍。遗憾的是，五年计划的前三年(1938—1940)，农业的成果是不大令人快慰的。1938 年和 1939 年的农业产值不仅没有迅速增长，相反，农业的总产值比 1937 年还减少了，只是到 1940 年才比1937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六。1938—1940年间，实际的粮食平均年产量仅为四十七亿五千六百万普特。1940 年矿物肥料的产量不仅未能提高几倍，相反比 1937 年还减少了。

到三十年代末，在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极端缓慢发展的农业之间形成了严重的脱节，它妨碍了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确定正确的相互关系。 980

我们已经谈到，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是二十年代后半期，我们国家的部分资金就通过各种渠道从农村流进了城市。那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是由农业提供的，工业还很薄弱，提供的积累还很少。所以，把农业中的部分积累用于工业化的需要的作法，在当时还是完全必要的和合理的。

所以，那时在中央全会上，在同反对派的辩论中，都毫不隐讳地谈到这种“流入”，谈到“剪刀差”，谈到超额税，这是毫不奇怪的。例如，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迅速发展的速度，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我们用‘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字眼来称呼这种额外税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用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们的同志：征收这种额外税是令人不愉快的，不是出于本愿的，把它长期保留下去是不能容许的。我们这样称呼加于农民的额外税，是想指出我们征收这种税并不是出于本愿，而是由于需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一有

可能就尽快取消这种额外税。"[①]（重点是我们加的。——作者）

我们看到，斯大林在1929年谈到一有可能、尽快地、在最近几年就取消对农民的额外税，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所有这些诺言都没有兑现。

由于在农业政策方面的许多严重错误（其中一些我们已在第三章中分析过了），因而苏维埃政府一直未能取消声名狼藉的"剪刀差"。国家的征收和收购价格直到三十年代末还是很低的，所以不能保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必要的积累。同时，集体农庄还不得不对工业商品、对拖拉机站的服务等等多付钱。这样一来，资金从农业向工业中的过多"流入"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末。

*　　*　　*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以后，我国的农业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中，正是农业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在战争年代，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都急剧缩减了。1945年的农业总产值仅等于1913年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六。农业机械修配厂减少到几分之一，农村缺少劳动力，在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只有妇女、老人和少年在劳动。换句话说，提高和发展农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从头作起。

1946年全国开始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规定的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战前几个五年计划中的速度。预计不仅很快要达到1940年的水平，而且到1950年还要超过1940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七。到1950年，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一亿两千七百万吨（约七十七亿普特），皮棉三百一十万吨，制糖甜菜两千六百万吨。牛的头数到1950年预计达到六千五百三十万头，山羊和绵羊达到一亿两千一百五十万只，猪的头数达到三千一百二十万只。遗憾的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指标，一项也没有完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5—46页。

成。1950年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九。1950年粮食产量仅为八千五百万吨（原计划是一亿两千七百万吨）。牛的头数虽然超过了1940年的水平，但远远落后于原计划的指标。1950年，在农业的各个领域，牛的头数是五千八百一十万头（这比1916年和1928年全国的头数要少）。猪的头数全国仅达到了两千二百二十万头，也就是说，比1938—1941年时还要少。山羊和绵羊的头数的增长也明显地落后于五年计划的任务。

1951年我国开始实行新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如果以这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来说（1951—1953），那么在农业方面一项指标也未完成。1953年的农业总产值仅超过1940年水平的百分之四。1949—1953年间粮食平均年产量大约为八千一百万吨。至于说以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那么1953年比1913年还要低百分之十九。所以毫不奇怪，用于饲料用粮和出口的粮食实际上没有了。牲畜产量很低，多数农作物的单位产量都未增加。几乎所有主要农作物，1939—1953年间的平均产量都低于1913年。

就连大肆宣传的公有畜牧业三年（1949—1951）发展计划也没有完成。

战后农业多年停滞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斯大林粗暴地破坏了农业劳动者在发展公有经济中的个人物质刺激原则。

我国的工业在战后虽然很快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而且本身已能提供很多的积累，但是，资金从农村往城市的“流入”，在斯 983 大林生前的最后几年不仅没有减少，相反更为增加了。战后货币的实际币值虽然有明显的贬值，但农产品的征收和收购价格却几乎没有提高。因此，集体农庄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产品以比农产品的实际成本还要低得很多的、少得可怜的价格交售出去。1953年，上交的每公担甜菜付给一个卢布（新的价格标准），——这差不多是国内甜菜平均实际成本的一半。义务征购和收购的每公担粮食付给九十戈比，——这要比国内粮食平均成本低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交售给国家的土豆价格，甚至连把土豆运到收购站去的

运费都不够。集体农庄把大部分的商品肉作为实物报酬交给机器拖拉机站，或是以仅为1949年肉类零售价格百分之几的象征性收购价格交售给它们。（而在美国，农场主所得的份额为产品零售价格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与此同时，工业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却增长了好几倍。结果在这些价格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剪刀差。为了得到能买一辆"吉斯—5"型汽车的钱，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需要卖给国家九十九吨小麦，在1948年就必须卖出一百二十四吨，而在1949年就要卖出二百三十八吨小麦。①

尤为甚者，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在我国形成了一种分派国家征购计划的不良制度，集体农庄所负担的交售义务和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数额，既超过了全国的计划，也超出了许多集体农庄的实际能力。这样一来，几年之后，许多集体农庄都拖欠了大量的税款，而粮食收购变成了余粮征集制的性质。如果说以前在二十年代从农村拿走的仅仅是部分积累的话，那么在战后，在许多州和经济区（特别是在非黑土地带），从农村拿走的实际上是全部积累，甚至还有部分必需品。如果说，这些州和区的集体农庄的经济在这种恶劣的政策下仍没有崩溃，而有时甚至还缓慢地发展了，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亿万庄员实际上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不是为钱或产品而劳动，而是为在劳动册上"写工分"而劳动。至于生活资料，他们不是靠在集体农庄的劳动来取得，而是不得不靠基本上是个人副业劳动所得，因为副业纳的税和义务交售的数量要比集体农庄公有经济为少。没有个人副业，集体农庄庄员简直就不能维持生活，因为靠劳动日所得，他们就连满足一个庄员家庭最起码的需要都办不到。在许多情况下，正是想保有个人副业的愿望迫使农民到公有的田地上去干活，因为只有集体农庄庄员才有搞个人副业的权利。因而在公有土地上实际上无报酬的劳动，变成了农民对自己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的一种特殊形式

① 见《共产党人》杂志1968年第4期第68页。

的报偿。换句话说，在农村本应发展真正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但却保持和巩固了私有的和个体的经济倾向。（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一个集体农庄中，庄员在农庄的土地上和饲养场劳动而几乎分文不得，他们只能靠个人副业收入为生，这样的集体农庄经济能够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吗？）

但是，就连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副业，在战后年代也越来越受到斯大林考虑不周的、缺乏远见的政策的危害。问题在于，这些年里尽管竭力增加公有经济的农产品的采购和收购，但是粮食和畜牧产品的缺乏在全国仍然越来越厉害。斯大林由于找不到好的办 985 法，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对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副业征收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庄员们一方面为了极为微薄的报酬要在农庄的土地上和饲养场干活，同时还必须从个人副业中交纳税款和交售征购的产品。他们必须为每一头牲口纳税和交售，农村中的每一棵果树都要上税，丰收的年成要上税，不结果实和水果的年成也要上税。这样一来，农民不仅丧失了发展公有经济的积极性，就连发展自己的个人副业的劲头也减少了。许多农民家庭因此而放弃了自己饲养牲畜的权利，有的甚至砍掉自己庭园中的果树。这种个人副业的缩减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并没有以相应地发展公有经济作为补偿。对于相当多的农民家庭来说，真正地面临着绝境，因为他们无论是从公有经济还是从个人副业中都不能得到足够数量的产品。贫困成了这些家庭的经常伴侣。许多农民不仅不能保证自己家庭所需的必需食品（就更谈不上其它东西了），而且也不能弃农入城，因为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公民证制不允许这样作，当时相当多的一部分庄员没有公民证，而且不经许可不准离开自己的家乡。与此同时，集体农庄又开始想方设法减少和禁止传统的副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民本来就很困难的境况更加恶化了，特别是在非黑土地带更是这样。[1] 因此，斯大林对于实现自己在三十年代中期 986 提出的“使所有庄员富裕起来”的口号是不关痛痒的。虽然许多农村的生活水平比革命前有所改善，但是农村中很大一部分农民的

生活还依然难以言状的困难，距过富裕生活还差得很远很远。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经营农业的制度是完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而首先是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矛盾的。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的农业建立在不是依靠个人物质福利的基础上，甚至也不依靠庄员的干劲，而是首先依靠命令，依靠强制。这一切就必然要削弱工农联盟，并成为农业生产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停滞现象是整个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一个特征。

同时不能不指出，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虽然使发展工业的资金得到一点好处，但很快就不能再补偿由于农业发展速度的缓慢、由于国家缺少粮食和轻工业缺少原料、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劳动生产率很低而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集体农庄和农民的贫穷最终导致了职工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他们不能买到他们必需的食品。由于缺少劳动力(农业人口减少得很慢)使得987 工业的发展和增长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社会为了生产小麦、牲畜等等化费的时间越少，它就为其它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获得的时间越多"。②

三、斯大林在工业建设中的一些错误

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了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

① 据Ю.切尔尼钦科证明(见《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8期第154—155页)，取消农村许多副业的文件是安·亚·维辛斯基签署的。他发现有一个集体农庄在废矿井里采煤，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斯大林。于是1938年10月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就通过了一项《关于集体农庄非法组织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工业企业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宣布集体农庄庄员的副业活动为非法，并责成检察机关负责监督。发展许多极为重要的传统的农村副业被宣布为反国家活动，要由检察机关调查事实并追究犯罪人的责任。不久就出现了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指令，规定将那些"与农业无关的，私人出卖产品的"农庄企业移交给国家机关。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4卷1935年版第119页。

时期在工业化事业中所犯的那些严重错误。

按主要指标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没有完成，这对斯大林起了清醒的作用。

诚然，斯大林就是后来也不善于充分正确地估计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他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并提出了降低我国工业化发展速度的方针。斯大林在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指出："能不能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必须实行……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呢？不，不能这样说。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初两三年内，即使我们想要实行，也不能实行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的工业产值必须采取较慢的增长速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平均每年至少必须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①

但是，我国工业干部、普通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并没有接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降低速度的口号。正因为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已不是那些技术熟练的旧工厂，而是使用新技术的新工厂，同时 938 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我国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发展速度急剧地加快了。从产品数量的观点来看，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虽然这几年斯大林已大大减少了对我国经济工作者的督促，也未给他们提出任何额外的任务(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工业的发展速度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明显地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相应指标。例如，1934年，全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九，1935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由于这样快的增长，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指标的确是提前完成了，同时还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8—169页。

许多未完成的工作。这里还需要考虑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的每个百分数，都意味着在产品量方面都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每个百分数有更大的增长。

只是到1937年，由于在我国工业系统开始了最大规模地清除“破坏分子”的活动，生产的发展速度才明显地慢了下来。1937年工业产值总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1938年为百分之十二，1939年为百分之十六，1940年为百分之十二。在三十年代的条件下，这样的增长率是与我国的能力不相符合的。

在这方面不能不指出，在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得增长实际上停了下来，并导致了停滞不前。例如，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对于国防来说极端重要的冶金部门。尽管直接参与镇压冶金工作者的卡冈诺维奇宣称：“积极而坚决地清除日、德的间谍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破坏分子的破坏后果，是工厂和整个黑色冶金工业新高涨的基础”，[①] 然而，冶金部门的实际情况丝毫也未说明这种断言是对的。由于非法地和大规模地镇压专家，1938—1939年黑色冶金的全部生产指标都下降了。炼钢、炼铁和轧钢生产，1939年比1938年减少了。1938—1940年不仅黑色冶金的发展实际上停了下来，化学工业的发展也停了下来。1938—1940年的矿物肥料和碳酸钠的产量停在1937年的水平上，汽车外胎和鞋子的产量明显地减少了。1940年生产的涡轮机的功率等于1937年生产的涡轮机的功率。汽车生产1937年差不多已达到年产二十万辆，1940年又缩减到年产十四万五千三百九十辆。拖拉机的产量从1937年的五万一千台减少到1940年的三万一千六百台。轴承的产量实际上也停止了增长，木材的运出也没有增加，纸张和纸板的生产也减少了。在三年中（1938—1940），水泥的产量只增加了二十万吨，而石灰和石膏的产量减少了。屋顶用材料的产量减少了，玻璃产量减了一半。布匹产量的增长额急剧降了下来，

989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4年第11期第72页。

1938—1940年布匹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三年期间，糖以及其它许多种食品的产量也明显地减少了。在这一期间，国防工业的许多重要部门发展得也相当缓慢。①

当我们谈到我们国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正准备同法西斯国家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当然应当考虑到这一切。

在战后年代，我国工业是发展得相当快的。到1947年，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指标都已经达到和超过战前水平。

在这些年代里，陶醉在自己的荣誉和势力之中的斯大林，对经济生活中的"琐事"在多数情况下已不加细问，而这却对工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工业部门，新的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经济工作者在战争期间逐渐成长起来。斯大林逝世前最后几年，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了许多君主所特有的那种玩忽政事的态度。在这方面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这件事在1963年六月中央全会上曾谈到。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部长会议开会批准年度计划，斯大林来参加了会。往常他不主持部长会议，但这次他坐在主席的位置上，拿起了一卷计划草案，说道："这就是计划。谁反对？"部长们面面相觑，不发一言。"那我们就通过了"，——斯大林宣布说。会议就到此结束了。走出会场之后斯大林说："走，去看个电影"。到了电影厅，他说："我们把他们（指部长们）骗得够呛！"

990

由于斯大林这样脱离苏联人民日常关心的事，结果他对全国情况十分闭塞，以致于斯大林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每一次干预都导致了严重的错误。

"伟大的"工程、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计划、莫斯科高楼大厦的建设、土库曼运河的开凿、在莫斯科建造数十座豪华的造价极端昂贵的全苏农展馆的展览厅——这些都是斯大林错误决定的少数几个例子。所有这些建筑和设计都是非常庞大的，按照斯大林的想法，这些建筑都应当是他的时代的纪念性的建筑物。然而所有这

① 见中央统计局相应各年的年鉴《苏联的国民经济》。

些建筑都丝毫不符合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我国的要求、可能和现实需要。另外还不能不提到1949年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秋明州北部开始兴修的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它本来是想要仿效伟大的北方航道的。在数百公里荒无人烟的北方边区铺设铁轨、修建工人居住区、车站和桥梁。而当为了修筑这条铁路业已耗资几十亿卢布的时候，却“由于此路无用”而中止了这项工程。（值991 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上面列举的“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用囚犯的劳动来建筑的。）

同时我们知道，斯大林对石油和煤气工业的发展是重视不够的。所以这些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是十分缓慢的。斯大林首先抓紧了煤、泥炭的开采和木材的采伐。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无穷无尽的石油和煤气蕴藏的国家，在四十年代的燃料计划表上占居首位的一直还是煤、木材和泥炭，这是毫不足奇的。正因为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基础，阻碍了技术的进步。

在个人迷信时期，工业职工的物质状况改善得很慢，住房建筑，如果我们说的是新的住房建筑的话，那么，这些工程几乎没有进展，尽管城市居民在明显地增加。斯大林实行了显然是错误的工人政策，在对待工人问题上，他大规模地采用了强制办法，不允许职工转换企业，限制了调转的自由。由于很小的过失、由于迟到（更不用说旷工了），职工都要受到严厉的不适当的处罚。没有发展工人自治，工会的作用也被削弱。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发展速度。①

---

① 在《莫斯科》杂志上（1968年第2期）在B.契维利欣的《大地在受难》一文中，可以读到下述论点：“大家知道，斯大林不是农业和林业专家。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国务活动家，从许多口述的和书面的回忆来看，他善于爱护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财政并倾听专家的意见。”（第175页）我们希望，我们上面列举的斯大林领导工农业的实例，可以使读者有可能来评价契维利欣的这种看法。

四、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和反常作法

992

斯大林在其生前最后十年中，在民族政策方面极为反常，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斯大林自认精通民族问题，但他对待居住在我国的各民族的立场，却不是一视同仁的和欠客观的。在对某些少数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强制迁移的罪恶政策。例如，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加尔梅克人、切禅人、印古什人、卡腊查耶夫人、库尔德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都受到了镇压并从本民族居住区强制迁走。由于这些民族被强行迁走，相应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也被撤销了。与此同时，住在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一些共和国以及克里米亚的全部日尔曼人、大部分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也都被强行迁走。在战争最初几年，从卡累利阿强行迁走了全部芬兰族人。

在许多历史书中，甚至在百科全书中，都不再提这些被贬弃的民族，就如同这些民族根本未存在过似的。几十万无辜的人们，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也被逮捕并被强行迁往我国的某些边缘地区。这些人的财产都被没收，只准他们携带很少的物品。例如，1944 年 5 月 18 日夜到 19 日凌晨，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都被强行迁走。仅给他们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收拾东西，只准许他们携带手里能拿的物品，而有时连这些东西也不准带。丹吉列·伊勃拉吉莫娃回忆说："半夜三点钟，孩子们正在睡觉，士兵们走了进来。他们命令在五分钟内收拾好东西并走出家门。不许带东西，也不许带食品。我们以为是要把我们带去枪毙呢。"在切禅印古什共和国里，这类残酷的行动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著名领导干部谢罗夫指挥的，在那里甚至还有杀害那些拒绝离开自己家园的老人和妇女的情况。被迁走的人塞满了货车车厢，一连许多天，有时是几个星期地被运往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不少老人和儿童死在途中。本书作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梯比里斯看到了一列载有从

993

格鲁吉亚被强制迁移的游牧民族库尔德人的列车。肮脏的货车车厢满装着妇女和儿童，几乎满得不能再满，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祈祷和哭泣。

被强制迁移的不合斯大林心意的民族的总人数已超过了五百万人。由于押解途中的恶劣条件、缺少医疗照顾和由于传染病，死去了有几十万人。还有几十万人，在战争条件下，在人烟稀少和无人住过的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死于冻饿和疾病。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丧失了大约本民族的一半人口，他们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儿童。丹吉列·伊勃拉吉莫娃回忆说："从我们村子里迁走了三十家，其中还幸存的不满五家。……我的侄女麦奴别·沙依西斯拉莫娃带着八个孩子同我们一起被迁走，她的丈夫从战争一开始就在苏联军队里，后来牺牲了。而他的一家饿死在乌兹别克斯坦。只有一个小女孩名叫贝拉还活着，但是由于惊吓和饥饿也成了一个残疾人……我们的男人都在前线，所以死的人都没有人埋，尸体常常一连几昼夜就停放在活人呆的地方。"

从卡累利阿被强制迁走的芬兰族人大部分都死了。

所有上述民族的人民，不管他们是否受过嘉奖和有过功勋，也都从现役军队中赶走。同时，被迁往新的地区的民族常常不让他们聚居，而是把他们分散到各州，彼此相距很远。正常的民族生活和文化都被破坏了，并且形成了这些民族及其全部习俗和文化完全被消灭的威胁。在流放地区，他们全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在特殊居民营里实行了残酷的管制制度，全部成年居民必须每月登记两次，包括从苏联军队中退役的军人以及保留了党证（这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反常现象）但必须经特殊居民营管理主任许

934 可才能去参加党的会议的共产党员。

实质上，这是一种真正的危害种族的罪行，除了在人员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感受着的巨大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损害之外，也给原来是被迁移出去民族的那些居住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如众所知，镇压某些民族的借口是说有部分切禅人、印古什人、卡腊查耶夫人有叛变行为，说他们投向了法西斯一边。不能不指出，叛徒无疑在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我国其它民族中也有。例如，在法西斯德国组建了一个“俄罗斯解放军”，由伏拉索夫将军指挥；白党哥萨克师也同苏军作过战。在乌克兰，宾杰罗夫和麦里尼柯夫分子也都反对过苏联游击队。在法西斯军队中也有过“加利契纳”特种师团，以及许多其它民族军团，其中包括格鲁吉亚人军团、拉脱维亚人军团、立陶宛人军团等。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把高加索、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流域的个别民族作任何等级区分，更没有理由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所有这些民族都已完全被恢复了名誉。①

在战后最初年代，大规模的镇压指向了住在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西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居民。苏军解放了这些地区以后，阶级敌对分子（富农、贵族、官吏、各种犯罪分子、警察）组成了不少地下的反革命集团和匪帮，他们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当时必须坚决消灭这些匪帮。但是对匪首和偶然被拉入地下集团以及迷途的人应当有所区分。遗憾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所有这些参加民族主义集团的人以及成千上万参加匪帮的成员的家属都毫无例外地进行了打击。

995

镇压也落在几千的农民、贫农和中农头上，因为匪徒们曾用武器逼着他们交出粮食。

对居住在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也进行了很大的限制，他们被剥夺了每个苏联公民都应享有的许多权利，一大批亚美尼亚的

---

① 不能不指出，不知什么原因，为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恢复名誉比其它民族晚了很长时间。直到1964年8月24日才通过了撤消对苏联日尔曼人一切不公正的指控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67年9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才为克里米亚鞑靼人恢复名誉。与其它被贬弃的民族不同，对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平反没有同时恢复他们的民族自治，甚至直到最近都不准许他们迁回以前的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共和国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区去。

不管以什么样的经济的和其它的考虑来解释，这种歧视都是没有道理的。

家庭被强行迁走。阿布哈兹人的民族权利也同样受到了限制。1949年，贝利亚捏造谎言诡称在亚美尼亚有一个达什纳克反革命地下集团，他经斯大林许可，把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家庭从亚美尼亚各区，特别是从埃里温强行迁走。这次迁移，预先并未通知，是在一天之内进行的。为此不仅动员了内务部的军队，而且还动员了许多党员。大多数亚美尼亚人被迁往阿尔泰地区。同时，有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亚美尼亚人也受到了镇压，他们是在战后经苏联政府同意而返回亚美尼亚的。

总之，在个人迷信时期，一个人的民族属性也受到了令人特别难以理解的注意。在公民证和档案中，总是有民族属性这一栏，即使这一栏是完全不必要的。

战后时期，在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上，越来越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成分。过分地强调了俄罗斯民族在我国的主导作用，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对俄罗斯族的迷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讲坛上称它为“组成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俄罗斯人民向来被称为“领导的人民”、“在各平等的民族中的第一个民族”、“老大哥民族”等等）。

996

由于斯大林始终怀着大俄罗斯的偏见，并以此来判断是非方向，因此，他越来越多地用国家民族主义世界观来代替国际主义。① 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也越来越少。作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也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蜕变，在苏联各民族共和国的部分地方干部中重新产生了于三十年代初期就接近消失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某些民族的相互关系中，特别是在高加索，民族不和的现象又重新显露出来。

斯大林及其周围一伙人所推行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在世界舆

---

① 在这方面能说明问题的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在莫斯科没有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纪念碑。但是在战后这儿却修筑了一座尤利·多尔果卢基——一个十二世纪的有封邑的愚笨而残酷的公爵——的纪念碑。为了在苏维埃广场修建这座纪念碑而拆掉了根据列宁建议而修建的自由方尖碑。

论方面使我国遭受了特别巨大的损失，因此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应当更为详尽地谈一谈。

早在1931年，斯大林在回答美国犹太电讯社的问题时就宣布，作为种族沙文主义极端形式的反犹太主义，是野蛮恶习的最危险的残余。斯大林当时说："反犹太主义对于劳动者是危险的，因为它是使劳动者离开正路而走入丛莽密林的歧途。因此，作为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是反犹太主义的势不两立的死敌。"① 我们可以看到，话是说的很坚决的。但是斯大林很快就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还在战争年代他就坚持推行一系列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措施。997 很典型的一点是，苏军总政治部每月都要给军队的政治机关下达政治课、政治演讲和政治报告的题目，但是在四年战争期间，关于反犹太主义、关于反犹太主义在纳粹政策中的作用、关于纳粹分子几乎杀害了欧洲全部犹太居民等问题，却没有讲过一次课，没有组织过一次演讲，也没有开过一次政治座谈会。

战后时期，斯大林以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为借口（仿佛国外不存在许多俄国白卫军组织或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其它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似的），采取了把全部犹太人逐步从我们党和苏维埃机构中排挤出去的方针。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1948年，根据诬告材料和明显的挑衅目的，逮捕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几乎全部成员，而这个委员会是在战争时期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倡议成立的。不言而喻，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必然要同国外的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发生各种接触。但是在这些接触中不存在任何违法的地方，因为正是为了保证这些接触才成立了这一委员会。

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被捕后，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扩大了。作为"预防"措施，大学的许多系、许多高等学校都限制或停止了招收犹太族的学生；外交工作也不吸收犹太人，他们还逐渐被从法院和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8页。

检察机关排挤出去(律师界除外)。

在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甚至在许多企业中，对犹太人都实行了一种非公开的比例数制度，就如同昔日沙皇政府根据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要求所规定的那种比例数。甚至学术论文答辩，在俄罗斯和其它民族的学者中，犹太人也只被准许占一定的比例。

犹太人在革命和内战年代的巨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1917—1919 年间全苏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有很多人是犹太人。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甚至在党的区委书记中，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犹太人。

938

反“世界主义”的斗争也带有明显的反犹性质。不能不顺便指出，在同世界主义斗争的叫喊声中，1949—1952 年间搞了一个消灭犹太人文化机构的运动。犹太人学校、剧院、报刊和杂志全都被封闭。

当然，绝大部分反犹太人的限制并未大肆声张，而是以口头指示的方式向下贯彻的。但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包括卡冈诺维奇的反犹情绪，对任何人都已不是秘密。对这种政策和这种情绪，首先是犹太人自己感觉到了。其实，斯大林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几乎抛弃了一切思想意识的外衣，而把反犹太主义公然当成了国家的政策措施。一切情况都说明，斯大林已开始准备把犹太人大规模地强行迁往我国的边远地区。斯大林企图以此办法把犹太人变成他的错误和过失的另一只“替罪羊”；众所周知，经常寻找这种“替罪羊”是斯大林式专制的一个重要手法。

为了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所不允许的这种种族主义政策找到理由，1952 年底斯大林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干部一起又搞了一起新的阴谋，即所谓的“医生案件”。这次阴谋是这样搞起来的：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工作人员丽吉娅·吉玛舒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具有明显挑唆性的信件说，据她的观察，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许多有名的医生，

似乎采用了不正确的医疗方法。[①] 吉玛舒克的信在国家安全部部分领导人中引起了惊慌和恐惧，因为他们可能被怪罪缺乏警觉性。999 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命令侦缉处处长柳明不要调查这封信，接着还逮捕了柳明。但是斯大林命令把柳明释放，并撤换了阿巴库莫夫和任命了 С·Д·伊格纳吉耶夫为国家安全部的新部长。同时，斯大林亲自领导对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的调查，亲自传唤和指示侦察人员。斯大林对伊格纳吉耶夫宣布说："您若不能使医生们服罪，我就拿掉您的脑袋"。

在受到这种警告之后，国家安全部机关就拚命从在押的医生口中获取一切"需要的"口供。1953 年 1 月 13 日中央报纸还就此事件发表了一个关于保安机关"破获了"医生破坏分子组织的公告。据公告上说，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诸如沃弗西、В·Н·维诺格拉多夫、[②] М·柯岗、Б·克林、耶果罗夫、А·费里德曼、А·格林施坦、Я·爱金格尔、Г·马约罗夫等这样一些最有名的医生。据安全机关的公告称，这些医生当年害死了日丹诺夫，使在那里就医的谢尔巴科夫未得终年，还企图使一大批在那里治病的苏军的陆海军元帅丧失工作能力。公告中还声称，医生破坏分子集团的成员，据说是受雇于外国谍报机关，而该集团的大多数成员还与国际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准特"(Джойнт)有联系。作为医生集团和外国间谍机关的联系人被点名的有包特金医院的主治医生希梅里奥维奇和 1948 年在明斯克被打死的著名演员和社会活动家索·米·米霍埃尔斯。

这项诽谤性的公告成为在我国条件下史无前例的反犹运动的开端。不仅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而且作为"预防措施"还从 1000

---

① 丽吉娅·吉玛舒克由于自己的"功劳"而被授予列宁勋章。斯大林逝世后，甚至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丽·吉玛舒克仍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当爱克司光医生。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拒绝去照爱克司光。但是，丽·吉玛舒克的列宁勋章被收了回去。

② 斯大林女儿证明，维诺格拉多夫给斯大林本人看了二十多年病。——译者

其它许多科学研究院和高等院校中赶走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许多教研室、医院、实验室都减少了近半数的人员。从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撤掉了许多犹太作者所写的书。甚至由被捕的医生研制出来的药品也遭到了禁止，虽然这些药品早已得到公认。在某些城市和工人村，一些流氓分子还殴打了犹太人。

整个这次仇恨异族的反犹运动引起了外国非常强烈的抗议，而且也使我们的国外朋友感到不安。据说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弗·若·居里和保罗·罗伯逊曾乘飞机来会见斯大林，但是斯大林拒绝接见这两位社会活动家。

如众所知，某些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在否认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企图否认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的还有尼·谢·赫鲁晓夫。但是，千百件事实证明正好相反。在老布尔什维克Е·П·弗罗洛夫的所保存的文献中我们找到了一份不长的文献资料，名为《斯大林反犹太主义的实践》。在这份文献中，Е·П·弗罗洛夫列举了斯大林反犹太主义的某些最明显的表现。下面就是他列举的事实：

“不止一次地宣称，在反对派集团的成员中有很多犹太人。曾企图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联合反对派’作为‘三个心怀不满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反党阴谋集团看待。

女儿斯维特兰娜同她的犹太丈夫格里高利·莫罗兹夫和儿子瓦西里同他的犹太妻子都离了婚。

在战争初期不受理提交批准的前线和军队报纸编辑人员的名单，理由是在这些候选人中有很多犹太人。

停办莫斯科唯一用犹太文出版的杂志。

停办犹太人报纸《埃梅斯》（1948年底）。

停办比罗比詹市的犹太人报纸。

关闭犹太人剧院。

1001 撤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8年底）。

逮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

逮捕用现代犹太文写作的诗人和散文作家别列茨·马尔基

什、克维特柯、菲菲尔、别尔格里松等人。

杀害米霍埃尔斯并禁止进行调查。

制造洛佐夫斯基'案件'并逮捕了他。

搞反世界主义的斗争。

制造医生杀人犯'案件'。

准备把犹太人迁往犹太人区：修建木棚、准备告犹太人民书(И·Л·明茨)、征集在告人民书上签名(Я·С·哈维松)、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召开群众大会并通过迁出犹太人的决议。

对从(波兰)逃离法西斯区的犹太人关闭苏波边界，因而造成犹太人在华沙犹太人区的死亡。

逮捕'吉纳莫'工厂的犹太族领导干部，指控他们参加了犹太人的反革命组织。

逮捕李哈乔夫工厂[1]一批犹太族的领导干部。

逮捕地下铁道管理局的犹太族领导干部。

从中央机关、从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会、区委会、从《真理报》社、内务部机关、检察院、法院、军事单位、外交部及其它机关中清除犹太人。

在苏联新闻局、广播委员会、各部和其它组织中进行反犹太人的清洗运动。

在战争后半期把大多数犹太族政工干部开除出军队。

逮捕申请回以色列的犹太人。

伪造斯兰斯基'案件'，指控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有联系。

《文化与生活》报上刊登反犹文章。

《医务工作者》报上刊登反犹文章。

《真理报》、《消息报》及其它中央报纸上刊登反犹文章。

《鳄鱼》画报的反犹封面(罗姆看纪德的书)。 1002

揭露隐姓埋名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

---

① 即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后改为现名。——译者

康·西蒙诺夫的文章——反对开始的运动和肖洛霍夫的文章——拥护运动。

伪造戏剧评论家反党集团的'案件'（A·古尔维奇、尤佐夫斯基及其他人，——于1949年1月）。

伪造犹太诗人'案件'和犹太电影导演'案件'。

规定高等院校在招生时的犹太人的比例数。

限制犹太人在大城市领取居住证。

招工时不收犹太人。

在乌克兰组织反犹暴行。"

这些当然远非全部。由此我们看到，斯大林自己走上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能把他引入丛莽密林的歧途。

第十四章

1003

斯大林个人迷信对于苏联科学和文化的严重后果

斯大林的专横和对他的迷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不仅仅是使苏联创作知识界成百成千有才华的代表人物丧生的问题。我国领导科学文化的合理的方式方法也受到了歪曲，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在社会生活的这些领域确立了独断专行、官僚主义和唯官是从的恶习。科学、文化中许多最重要的领域的内容也受到了歪曲。

实际上，所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及文学与艺术的所有形式，都毫无例外地无一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个人迷信的消极影响。但是，在本书中我们只能举出这方面的某些例证。

一、关于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专横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正如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社会科学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十九世纪的阿拉伯思想家阿卜杜尔－拉赫曼·阿里－卡瓦西比写道："是的，专制君王的两腿是发抖的，但是（仅仅）是由于对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科学的恐惧，例如理论思维、纯理性哲学、关于人民权利的科学、公民政治、历史的详细研究、演讲艺术以及其它科学……专制君王在比他博学的人的面前总是感到自己是不幸的。因此他不能容忍有天才的学者在他身边，如果他不得不有求于学

1004

者的帮助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胆小的阿谀逢承的人。”[1]

的确，尽管斯大林在口头上也承认：“没有意见争论，没有批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并取得大的成就”，尽管他也谈过，在科学中不准许建立阿拉克车耶夫[2]式的军警统治制度，但是，事实上正是由于斯大林自己的干预，才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了阿拉克车耶夫式的军警统治制度，实际上禁止了对科学问题的自由讨论。在个人迷信时期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没有一次是同志式的讨论问题的性质，所有这些讨论会通常都是以“粉碎”意见不同的人而告终的。

在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斯大林垄断了“发明”权和作出结论的权利，而所有其他人只能是推广普及和进行注释。由此而来的是教条主义的统治、死啃书本、停滞僵化和惰性。歌功颂德和注释性的书籍成为了苏共党史著作的基本类型。仅在1946—1952年期间，论述斯大林个别讲话和文章的书和小册子就出版了不下六百种。

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被认为是真理的不是那些符合实际和经过实验的东西，而是那些经过“斯大林同志”所肯定的东西才是真理。同马列主义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引证，而首先是对也被它称为这一学说的经典作家的斯大林著作的引证，在科学中成了对这一或那一原理的主要证据。所有这一切就必然导致了产生无数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和忽视真实情况的现象。

1005 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历史、特别是苏共党史所处的那种严重情况。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苏联历史科学健康而迅速的发展就已经明显地缓慢下来，在历史著作中，政治空话和揭露越来越多地代替

---

① 《独裁主义的本性和奴役制度的毁灭性》莫斯科1964年版第24—25页。

② 阿·安·阿拉克车耶夫（1769—1834）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推行警察专制制度的极端反动的人。——译者

了创作和研究工作，斯大林的功劳被捧上了天。正如在一本未发表的史料研究著作里公正地指出的："到三十年代中期，对现代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可能性已降到最低点。所公布的资料的局限范围愈来愈小，它已不能提供一幅工农业发展的科学图景。以批判态度对这些材料进行检验也成为不可能。研究人员被剥夺了有关城乡物质状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政治生活许多方面的资料。能够得到的档案材料也急剧地减少了。① 同时，同'庸俗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波克罗夫斯基的'反历史主义学派'的斗争，使得研究人员不敢再进行独立的理论研究工作。理论认识和概括被一个人，即约·维·斯大林所垄断……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是苏联社会历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最大事件。这本书极端片面和公式化的论点，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崇和颂扬斯大林这一任务的，为他的所有行动提供论据并证明其正确……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成就、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剥削阶级的消灭、革新者运动和1936年通过宪法——全都记在了一个人的名下。苏联人民和共产党的这些真正卓越的胜利和成就，是以歌功颂德的精神写出来的，真是一片凯歌声，几乎不存在困难、错误和缺点。《简明教程》中关于历史进程的叙述本身就是借助引证斯大林的著作或是 *1006* 转述他的著作而写出来的……粉饰和抹黑、颂扬和诽谤吓人听闻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简明教程》最后几章的内容，这些章节完全反映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思想体系的特点。这本书没有把科学阐述和解释历史进程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它是以叙述定理的形式写成的，而这些定理不需要证明，也不要求理解，而只要求牢记和背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问世，就被宣布为'马列主义领域中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提高政治警惕性的工具'。这本书被看作是唯一的和正式的'党史指南'，'不准作任何随意的解释'……历史科学实际上被剥夺了独立地去思考社会生活现象和

① 全部主要档案从1938年起划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公布有关苏联社会历史的文献的工作实际上中止了。

创造性地去分析事实的可能性。"①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期苏联历史科学的几乎全部成绩，在后来一个时期中被完全抹煞了。对史料的科学价值产生了怀疑，对史料学放弃了研究。斯大林和顺从他的历史学家，在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中公开提倡唯意志论，任意勾消不合心意的人名并歪曲事实。

所有那些在三十年代成为非法镇压的牺牲品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在《简明教程》中都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说他们潜伏"二十年"，阴谋反党和反苏维埃国家。在这里代替证据和理由的是给戴上一大堆政治帽子和谩骂的话："托洛茨基布哈林恶棍"、"杀人犯和间谍匪帮"、"白匪的小爬虫"、"无用的垃圾"、"法西斯走狗"、"人类的败类"等等。

1007

在历史和党史的著作中，粗劣的和蓄意的伪造已不是例外而是成为了准则。

这种伪造的样本首先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例如，《简明教程》硬说，1933年斯大林提出来的"让所有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的口号，在1937年以前已经实现。书中说："集体农庄已成为生活丰裕的了。建筑新谷仓和储藏室的工作已成为集体农户所注意的主要问题，因为原先那些每年只预定容纳少量产品的贮藏所，已经不能满足集体农民所增需求的十分之一了。"

战后时期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也是伪造历史的同样显明的例证。就是把这本篇幅不多的书中所有的歪曲事实之处简单地罗列一下都是办不到的。我们仅举一个"安排"资料的例子，它对《传略》的编纂者(格·费·亚历山大罗夫、马·鲍·米丁、彼·尼·波

① 如众所知，在这本书"诞生"后的十年期间，也就是说至1947年，出版了三千万册《简明教程》(见格·马林科夫1947年在波兰几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7年版第27页)。而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四年战争，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纸张缺乏。

斯佩洛夫等人）是很有代表性的。

《传略》中说："从1911年下半年起，便开始了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的革命活动时期，1911年9月6日，斯大林同志从沃洛格达秘密地来到彼得堡。在彼得堡，斯大林同志同彼得堡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领导并组织反对取消派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团结并巩固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组织。1911年9月9日，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被捕，随后又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第48—49页）。很明显，斯大林9月6日离开沃洛格达，他不可能早于9月7日到达彼得堡，而在9月9日就已经被捕。就在这两天时间中，按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他不仅来得及同彼得堡的某些同志建立了联系，而且还能"领导、巩固、团结"他们！

在战后年代，受到贬黜的那些民族的整个历史也受到了粗暴的篡改。十九世纪高加索人民为自己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的真正性质受到了歪曲。不但如此，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批判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时候声称，切禅人和印古什人在内战时期就是北高加索各民族友谊的主要障碍，说当时正是这些民族传播了民族仇恨。 1008

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是如何无耻和卑鄙地伪造了我国和我党的历史。我们已经写了斯大林是怎样被宣称为有名的巴库地下印刷厂的创建人的，虽然那时他还未曾去过巴库。斯大林生活中的某些照片是低劣的剪贴。在其它一些历史性照片上，由于经过精心地修描，使得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都消失了，而有时仅仅剩下了列宁和斯大林（某些人像甚至从底板上洗掉了）。

斯大林在1917年3月份的政治立场也被我们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严重地歪曲和粉饰了。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当时所犯的一切错误都记在了加米涅夫一个人的头上。在筹备和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斯大林的活动也被渲染了。斯大林的所有其它错误，例如他的错误的"自治化"方案，也被掩饰了。

相反，与事实情况大相迳庭的却是斯大林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被粗暴地篡改了。与事实相反，斯大林不仅成了列宁最好的和最亲近的学生，而且还是列宁最亲密的朋友。正如C·彼得罗夫在《真理报》上所写的，不仅是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而且还有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都"超过了古代关于人类友情的最感人的传说。"① 这些例子还可以列出许多许多。

1009 墨西哥古代一个民族——马雅人在被判处死刑的罪行中有这样一种罪：背离事实的历史学家要处死。斯大林时期实行的是另一种办法：说真话的要被处死。

正当顺从于斯大林的历史学家厚颜无耻地、粗暴地篡改历史的时候，斯大林却当众口说笔写地反对把历史庸俗化、简单化和涂脂抹粉而且不能把历史变坏或者变好。在我们的报刊上这几年里严厉地批判了归咎于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历史是转向过去的政治"这一论点。

在个人迷信年代，在经济科学中也造成了严重的局面。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经济科学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几乎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都必须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自二十年代初期，经济科学在苏联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进行了有意义的和有成果的讨论，出版了许许多多学术论文和杂志。但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这一发展越来越受到了阻碍，而后来则完全变成了向后倒退。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全盛时期，经济科学问题而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几乎没有进行研究。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的经济规律也没有研究。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部门经济问题的书籍的出版急剧地缩减、许多以前的经济科学研究所被撤销、科学争鸣的停止，都是毫不足奇的。在长达二十年的时期中全国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斯大林时期，部门经济尤其受到轻视。农业经济倒退得特别严重。这一科学的基

① 《真理报》1950年4月24日。

本范畴：成本和价格、经济核算和利润率、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问题、劳动报酬问题、级差地租问题等等——几乎完全没有得到研究。

象国民经济组织和管理学这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科学领域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结果使得国民经济的管理形式具有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性质。在苏联的经济管理中到处都出现了过分的集中，这种集中同经济发展水平相矛盾并阻碍着经济向前发展。对劳动者的各种鼓励和物质刺激制度也未好好研究。 1010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为了研究科学的劳动组织的各种问题，建立了苏联的第一批科学研究中心。列宁亲自关注着这一科学领域的发展，关心着合理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在该领域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当中央劳动研究所建立时，列宁热情地支持了这一创议。他写信给财政人民委员部说："我想帮助一下劳动研究所所长卡斯杰夫同志……请你们考虑一下，了解得更确切些并尽力设法帮他弄到一定数量的资金。这样的机关，即使我们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也还是应当给以支持的。"① 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对科学的劳动组织的所有重要研究工作都停止了，中央劳动研究所也被撤销。

在个人迷信时期，科学工作的恶劣方法也同渗入到历史学中一样，进入了经济科学中。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经济科学脱离了统计学、脱离了自然科学、脱离了计划工作的具体实践。大部分统计材料都被保了密，因而不能在科学领域中得到使用。所以经济科学同生产的联系是十分不够的，经济理论不能发展，常常是完全被指示和命令所代替。同时，非常多的经济生活部门完全停止了搜集统计资料，因此作为经济的一个部分的统计学完全被破坏了。

在斯大林时期，在法学科学中也形成了极不正常的情况。在法学中维辛斯基成了权力无限的独裁者和立法者，他提出并确立了法学中一系列最有害的论点。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维辛斯基 1011

---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244—245页。

提出了关于法庭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只要有某种程度的概然性就够了）的论点、关于判断仅仅基于内心信念的证据的论点、关于法律就如同几何定理，其运用要由法官来掌握的论点等。维辛斯基甚至提出如果法律“落后”于生活就不使用它。1937年3月维辛斯基在苏联检察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说：“应当记住斯大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中，包括我国的生活，有时会有这样的时期、这样的时刻，即法律变成过时的东西，因而就应当把它们丢到一边去。”①

正是维辛斯基坚决主张，同伙必须对集团的全部活动负责，尽管他与犯罪行为无关也未表示过同意。对于国事罪行的案件，维辛斯基认为足够的证据不是各种罪证的总和而是被告一般的招供。维辛斯基厚颜无耻地主张，否认自己有罪的被告必须证明自己无罪。维辛斯基完全抛开了法制的教育和组织作用，他把它仅仅归结为强制。这样也就可以“科学”地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全面改变监狱、集中营及其它囚禁所的制度和条件的作法是有根据的和有道理的了。

这样一来，本应捍卫法制和革命秩序的科学，被维辛斯基变成了披着科学外衣的斯大林专横的卫护者。不能不指出，在个人迷信年代，在我们国家还不仅仅是践踏了几乎全部苏联法律和苏联宪法，在那些年里立法制度本身在许多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只要斯大林一提议，我们的立法人员就会立即起草和批准任何一项法律，即或这项法律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准则相矛盾的。

1012 在个人迷信年代，在象哲学这样的科学中也可看到明显的退步。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普及小册子被宣布为哲学思想的顶峰。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很快地被吹捧为最伟大的和经典性的著作，尽管书中包含着错误，它使真正的哲学研究延滞了许多年。确实，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的哲学家们对唯物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4年第2期第19页。

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思维规律和科学方法等问题都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在哲学史的许多方面也可看到明显的退步，几乎停止了诸如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研究。对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全部丰富材料也没有真正地领会。列宁的这部著作甚至都未编入他的全集中去。①

在个人迷信时期，几乎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规律性。中断了各种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而代之以陈述一般化的理论公式。哲学家不分析也不研究活生生的现象和科学资料，而常常是只摘那些现成的刻板公式中准备好的实例和例证。这样一来哲学就变成了烦琐哲学。

在这一时期，还严重地破坏了列宁所谆谆嘱咐的辩证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许多哲学家完全歪曲了这种结合的基本含意，他们任意宣布某些不合他们心意或仅仅是他们所不理解的自然科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在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才能解决的问题和争论时，他们硬要充当不受欢迎的仲裁者的角色。这种对具体的自然科学流派乱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标签的"方法"，不仅给哲学本身而且也给自然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许多自然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不自觉地成了反动的思想体系的捍卫者和说教者，成为辩证唯物论的敌人（在个人迷信的条件下这不仅导致了许多大科学家被从科学界赶走，而且导致了大批科学界的知名人士被从肉体上消灭）。例如，一些当年是领头的哲学家把相对论、关于遗传的物理化学基础的学说和谐振论这样一些现代的自然科学理论统统宣布为唯心主义的。控制论、数学逻辑学也被宣布为假科学。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之间的明显的脱节，这一情况的严重后果直到

1013

① 据T·巴切莉斯作证，1952年B·克鲁什科夫向斯大林报告关于完成第4版《列宁全集》的出版计划。斯大林在计划中一见到《哲学笔记》及其它许多著作就生气地说："不要搞的太长，不要把列宁的遗著搞得篇幅太长。"克鲁什科夫领会了暗示并从出版计划中取掉了列宁的一系列重要的著作。

今天仍未完全克服。

在个人迷信期间，象教育学这样的科学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家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我国为了建立新的苏维埃学校和新的苏维埃教育学作了大量的工作。在确立苏维埃教育学方面二十年代这一时期具有尤为重大的意义。这一时期是制订共产主义教育基本原则的一个时期，是建立技工劳动学校、苏联学龄前教育体系、形成新型学校和国民教育新体系以及建立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时期。这是在教师中进行大量的政治和教育工作的一个时期，是吸收旧社会的专家（教学法专家和理论家）参加建设新学校的一个时期，是他们同苏维埃政权和党接近的一个时期，是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认识自己的思想、丢掉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的沉重包袱的

1014 一个时期。正如前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秘书П·В·卢德涅夫在自己的评论中公正地指出的："这是勇敢地进行创造性的寻找、实验、探索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新的教学工作方法的途径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也有其严重的错误和迷误，这对于当事人来说不是一下就能看清楚的。由此才产生了当时所进行的激烈的争论和辩论。这是苏联教育学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一个时期，是苏联教育科学和教师界中所有优秀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日益更加团结的一个时期，是在培养新的年青的教育干部、大胆提拔教师中的优秀代表到组织和教学领导工作岗位上去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党把它的优秀人物，如卢那察尔斯基、克鲁普斯卡娅、波克罗夫斯基、布勃诺夫、斯克雷普尼克及党的其他许多重要干部派到了国民教育战线。同时这一时期也创建了大批的教育和教学杂志，不仅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而且也在全国各地（诺沃西比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城、罗斯托夫、伊万诺沃及其它一切地方），同时还出版了许多科学教学法书籍"。[1]

---

① 引自未发表的手稿。

但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同“过火现象”斗争的借口下，联共(布)中央某些很有影响的人士实际上一笔勾销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苏联学校和教育学所取得的成就。在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苏联教育学的现状作了片面的和错误的评价。

不能不指出，在关于在国民教育领域纠正“过火现象”的叫喊声中，开始实行了缩减学生们的技工和劳动教育的政策，实际上放弃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原则。在实践中，中学的工作甚至没有完成关于学校要实现基本技工教育化的最起码的要求，这是1931—1932年联共(布)中央关于学校的决议中所包含的内容。尽管如此，联共(布)中央直到1937年3月一次都未再讨论过基本技工教育制度和劳动教育问题，实际上取消了学校技工化的口号。与此同时，在制订1933—1934年的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和地理的标准大纲中，极端削弱了科学基础知识同其在生活和工农业中的实际运用之间的结合。同时劳动教育也越来越局限于学校的车间和实验田，急剧地缩减了学校同企业和集体农庄的结合，放弃了在生产条件下组织学生的生产劳动的尝试。

1015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对这一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她在1937年给中央组织局写信说：“马克思和列宁谈到了学校要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谈到只有在未来的学校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原则才能真正实现，指出这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唯一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进行过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同轻视劳动的过去的中学教师进行过斗争……近几年来，学校的劳动教育已化为乌有。教什么手工业式的(学手艺的)‘劳动工序’，劳动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脱离了学习……最近关于撤销学校的劳动教育和关闭学校工厂问题将在中央进行表决。不是改组劳动而是取消劳动。这个问题没有吸收工程师、农艺学家、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青年参加讨论。只吸收了旧的教师——各

学科的教员参加……

……在通过新宪法的时刻，在社会主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胜利的时刻，当为了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学校要实现劳动技工教育化的遗嘱而创造了一切前提的时刻，不能通过这种决定。我们无须给反对过这一事业的人以口实，说学校需要的是学习而不是劳动，说是中央决定了废除学校中的劳动教育。

1016 当然，我们的学校最终将会成为劳动化的和技工教育化的，但是现在对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①

然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日丹诺夫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这封信都未予置理并把它送进了档案柜。在他们的领导下，苏维埃的学校逐渐地变成了"苏维埃式的旧中学"，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完全取消了劳动教育，而且还渐渐恢复了三十年代初期许多已经被人遗忘的旧中学的一些特征，例如男女学生分开学习以及在部分学校教授拉丁文等。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地导致了对青年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思想和原则的歪曲。

二、贬低列宁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

在谈到个人迷信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的时候，不能不讲一讲关于贬低列宁在我党历史上和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这种对列宁的作用和功绩的贬低一般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它是以对列宁的各种赞扬为掩护的，但同时这种贬低是多种多样的并具有全面的性质。

斯大林在同德国作家刘第维赫的谈话中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②

这种声明对斯大林来说是惯用的假仁假义。实际上，斯大林妒嫉列宁，妒嫉列宁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妒嫉他在历史上

① 见《教师报》1962年2月21日。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4页。

的地位。他还不仅是妒嫉，他还千方百计企图贬低列宁抬高自己，不仅要高于党，而且要高于列宁。

早在1920年，斯大林在庆祝列宁诞辰五十周年讲话时，突然谈起了“还没有人谈到的”问题，即关于“列宁同志在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曾承认过自己缺点的事情”。斯大林把列宁描绘成是一个不大了解国内情况的理论家，他在十月革命前夕最重要的时刻向党作了不正确的指示。斯大林混淆历史事实，硬说他，斯大林，要比列宁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道路上的小沟、泥坑和坎坷”。如果相信斯大林的话，那么1917年秋处于秘密状态的列宁，实际上对由“实际工作者”、而首先显然是斯大林所指导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和进行没有起什么作用。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列宁到了斯莫尔尼宫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是的，你是对的”，似乎列宁在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上有过什么错误似的。

1017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二十六年以后，1946年，斯大林准备在自己《全集》中重印这篇讲话时所大力加强的正是讲话的这一部分——即臆造列宁的错误的这一部分。据Б·В·雅科夫列夫统计，斯大林在这篇讲话稿中改动了一百多处！[①] 斯大林毫不掩饰地歪曲历史真相，在讲话稿中添上了例如这样的词句：“……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

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列宁反对巩固苏维埃，似乎不是列宁而是斯大林及其一派（正是这个词在1920年的讲话中曾两次使用了）使党准备好进行武装起义。

贬低列宁还必须有关于十月革命的两个领袖的骗人理论为其效劳，同时在某些地方斯大林甚至被摆到了第一位。例如，在1937年《真理报》上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口号中，硬说彼得堡的武装起义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准备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7页。斯大林的原稿见《列宁五十周年》文集莫斯科1920年版。

1937年迎接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时出版了《历史杂志》的专号。在专号中发表的文章中，只是一般地谈到了党、列宁、工人群众。而斯大林却被摆到十月革命所有历史事件的核心地位。例如在A·福赫特的文章中说，斯大林"直接领导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使列宁随时了解所有军事准备情况"，"积极地准备了起义"。文章中说，1917年10月24日，"斯大林同志整天都在斯莫尔尼宫领导着开始了的起义"。照A·福赫特的说法，列宁在这一天是"闷在他的秘密住所里。傍晚他给斯大林送去了自己著名的'致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信'……"

1018

M·卢里耶写的文章也是贯穿这种精神的。[1]以后，斯大林以极端歪曲的形式描绘了列宁在内战时期的作用。根据斯大林骗人的说法，似乎这个时期列宁未曾过问军事。斯大林在给拉金上校的信中公开地否定了列宁在发展军事理论和军事艺术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用尽一切手段制造和强调这样的印象，即红军在内战前线上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正是斯大林。在斯大林传略中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在察里津近郊，在皮尔姆一带，在彼得堡附近，在反对邓尼金战役中，在同波兰贵族厮杀的西方战线上，在与弗兰格尔交锋的南方战线上，都是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和战略天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善于识破并粉碎敌人最狡诈最阴险的战略计划，推翻他们的全部军事'科学'，军事'艺术'和'技巧'。"[2]

在战后时期，这种骗人的革命有"两个领袖"的理论，实际上开始适用到从准备和进行1905年革命时期起的党的各个历史时期。[3]

在一系列著作中都强调，正是斯大林同列宁一起创建了我们

① 见《历史杂志》1937年第10期第24—26、66页。

② 《斯大林传略》中文版第63—64页。

③ 例如，见И·梁勃采夫的小册子《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1902—1905年)》莫斯科1951年版。

的党并一直在领导着党，声称列宁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仿佛是处 *1019*
于斯大林的强烈影响之下。例如，米·伊·加里宁这样写道：

"……斯大林同志同列宁一起创立、建设和培育了我们党。他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党，领导了革命运动和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

如果谈到历史上的类似情况的话，那么斯大林同志对列宁的态度很象列宁对马克思的态度，只是有一点修正，即斯大林同志直接同列宁同志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我是想以此来说明他同列宁的关系更为接近、更为亲切……毫无疑问，斯大林同志对列宁有不小的影响。"①

列宁提出来的许多看法和原理，斯大林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修改。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斯大林任意决定发表列宁的什么著作或不发表什么著作。列宁的非常多的"新的"文献、书信和文章，现在在他的《全集》中公布了，这些是无须费很长时间去寻找的：这些文献就放在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保险柜里，而有的是放在斯大林私人的档案材料中。

某些在《列宁全集》第2版或第3版中已经发表的著作，在第4版中被任意抽掉。例如，按语气和性质来说写的最有意思的列宁的一篇文章《纪念普罗什扬同志》②就遭到了这种命运，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篇文章。斯大林明显地贬低了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而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学说。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学说的主要功劳，被记在了斯大林身上。

战后时期几乎所有论述列宁的著作，其中多一半的文字不是分析列宁的著作而是谈的斯大林的著作。

在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停止了为科学和艺术领域中卓越的成就而授予列宁奖金的作法。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列宁奖金被换成 *1020*
了斯大林奖金。

---

① 米·伊·加里宁：《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莫斯科1939年版第89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版第23卷第438—439页。

在国内渐渐停止了发表回忆列宁的文章。在个人迷信时期，由于无数人为的障碍，使列宁的科学传记未能写出来。

大家知道，1938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就通过了关于玛·沙金扬的长篇小说《历史试卷》一书(第一部：《乌里扬诺夫的一家》)的决议，而在1947年8月26日中央书记处又通过了C·吉里的《跟随列宁六年》一书的决议。这些决议中规定的出版有关列宁的书籍的手续不仅妨碍了出版有关列宁的回忆录、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些书被禁止出版。(C·吉里和玛·沙金扬的书只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才出版的，那时，中央的上述决议已被撤销)。①

三十年代后半期和四十年代，从图书馆中被取缔的不仅是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弗·伊·涅夫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A·洛莫夫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写的关于回忆列宁的书，而且还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及其他人所写的回忆。

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逐步变成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在五十年代初期，《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首长诗，里面把关于制订著名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的倡议也说成是斯大林提出来的。

在阿谀奉承方面卡冈诺维奇特殊卖劲。有一次他在斯大林的别墅时说："我们都在说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早就不在人世了。斯大林所作的事情比列宁还多，因此应当说'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就不要再提了"。

在个人迷信时期，出版的斯大林的书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多九倍，比列宁的书多一倍半。

1021 象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　　*　　*

① 《党的工作者手册》莫斯科 1957 年版第 364 页。

战后时期，随着日益明显地贬低列宁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的同时，对斯大林的迷信却继续增大并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同时，斯大林自己也越来越多地鼓励不适当地吹捧自己。

我们知道，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坚决反对为自己写传记，驳回了由高尔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发起的写传记的倡议。“现在还不到写这种传记的时候”，——当时斯大林这样意味深长地表示。

1937年，那时对斯大林的迷信已达到了不适当的程度，儿童出版社编了一本儿童读物，书名叫《斯大林童年的故事》。这本书送交斯大林征求意见。斯大林看完清样之后给儿童出版社写了下面的信：

“1938年2月16日。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的故事》一书。书中很多事实不确，有很多错误、夸大之处和不应有的颂扬。作者被爱说故事、爱说瞎话的人（可能是好心肠的说瞎话的人）和拍马屁的人引入了迷途。我可怜作者，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但这一点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本书有意向苏联人民（以及所有的人）的意识中灌输对领袖和永不犯错误的英雄的个人迷信。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人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英雄造人民，把他们由群氓变成人民’——社会革命党人这样说。‘人民造英雄’——这是布尔什维克这样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这本书助长社会革命党人的声势，将会危害我们共同的布尔什维克事业。我建议烧掉这本书。约·斯大林。”①

但是在战后时期，斯大林甚至连这些虚伪的托词也抛得一干二净了。在四十年代末，斯大林不仅支持出版他的传记，而且很关心 1022 这本书的写作情况，在原稿上亲笔添上许多词句和评价，特别是在对他的功劳似乎还颂扬得不够的地方。下面我们举出斯大林亲笔加在《传略》中的几个句子，这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

① 《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期第21页。

的。“斯大林同志是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和引路人”，“斯大林巧妙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职责，博得全体苏联人民的一致拥护，但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丝毫也没有表现过自满、自骄、自夸的心理”。“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者象我们党内常说的，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描写自己说：“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规定了关于经常因素能决定战争命运的原理，关于积极防御与反攻进攻法则，现代战争中各个兵种与作战技术配合动作，大量坦克飞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炮兵是最强大兵种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斯大林凭靠他的天才始终都能找到充分考虑到战局特点的正确办法。”……“斯大林同志凭靠他的天才洞察力始终都能识破敌人计谋，并击破之。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军队进行的历次战斗，都表现出作战艺术的典范”等等。

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活动空前隆重。1949年 12 月，我国的一位大作家在《真理报》上写道，未来的人们将会把斯大林时代称为“正义的时代”，而在可能成为新纪元起始的日期中，这些人们可能要选定斯大林的寿辰之日，把这一天命名为“感恩日”。①

几个月以后，另一位作家也在该报上著文：

1023

“……如果你在斗争中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一下子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怀疑，——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立即就会获得必要的信心。你假如在不该疲劳的时候感到了疲劳，——那么你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可以顺利地完成工作。假如你想找到一个正确的决定，——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找到这一决定……斯大林说什么，就意味着人民在想什么。人民说的，就意味着是斯大林想过的”。②

正如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谈到的，斯大林本人认为最好的那个苏联国歌歌词中，一字未提共产党，但却对斯大林有下面这样

① 见《真理报》1949 年 12 月 18 日。

② 见同上1950年 2 月 17 日。

史无前例的颂扬："斯大林培育了我们，让我们忠于人民，热爱劳动，鼓舞我们去建树功勋"。大家知道，莫斯科革命博物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成了展出斯大林礼品的博物馆（后来这些礼品被移到伏尔洪克造型艺术博物馆）。

还在斯大林生前，就在全国各地陆续地建立起了新的斯大林纪念像。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1951年7月2日，斯大林自己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其中决定在伏尔加一顿河运河上建造一座宏伟的斯大林塑像，同年9月4日，为修筑这座宏伟塑像，他下令调拨三十三吨铜。

随着斯大林的权力和对他的颂扬的增长，他的伟人狂也在膨胀。一个在三十年代整天故作姿态地穿着普通战士大衣的人，现在却身不离元帅服了。战后，他还被授予了大元帅的称号，有这种称号的大概在我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人：亚·缅施科夫、A·勃劳恩格什维格斯基和亚·瓦·苏沃罗夫。（在斯大林生前，在国外能够自吹有大元帅称号的只有蒋介石和佛朗哥。）

三、关于斯大林的理论遗产和理论错误问题

1924

斯大林不准许任何人（甚至是其它共产党内的人）发展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警惕地把持着解释和发展这一学说的垄断权，觊觎着马列主义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经典作家的角色，但作为列宁逝世后在三十年的期间中领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对于历史赋予他的理论使命是明显不能胜任的。

今天，当我们批判性地评价斯大林的理论遗产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份遗产是极其微不足道的。由斯大林解决的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发展了的理论问题的名单是很长的。但另一方面，那些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解决但在"斯大林时代"未能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是数不胜数的。

斯大林在他整个一生中都未能写出一部著作是能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著作那怕是稍稍可以相比的。

斯大林的全部理论著作，我们认为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可以包括例如《论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这样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基本上是在普及马克思主义，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众所共知的真理作了通俗叙述。

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自己的独创的思想很少，其中大部分篇幅是对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一些话进行注释。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思想被斯大林给简化了、公式化了。斯大林抽掉了这些思想的精华并阉割了它们。① 更为甚者，斯大林在注释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思想和原理时，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求助于从他同时代的作品和小册子中广泛地抄用（自然是没有引证原始资料）。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斯大林在1913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在个人迷信时期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中最重要的奠基性的著作，而斯大林本人则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始人。

1025

我们知道列宁对斯大林的这篇文章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913

---

① 一位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1965年6月在基辅的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他仍然认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经典性范例。是的，初看起来斯大林是一个不错的通俗化作者。但是，斯大林在他的通俗化著作中没有真正尽力把群众提高到领会理论的高度，他常常是把这一理论极端简单化和标本化。斯大林是制作各种简单化公式的能手，他经常提出最简单的、群众易懂的口号和公式，而很少关心这些口号和公式是否符合复杂的实际。在这方面，斯大林很象一个有经验的蛊惑家，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成就和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理论和政治领域，过去许多其他蛊惑家也采用了这种手法。正如希特勒在一次同记者谈话中说："我……把它们简化了，并把它们归纳成一个最简单的术语，群众理解了，所以才跟着我走。"（Ю·А·列瓦达：《宗教的社会本性》第235页）

年2月25日列宁通报说："特罗扬诺夫斯基由于科巴给《教育》杂志的文章挑起了一场类似无原则纠纷的争吵……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具有战斗性，因为我们在反对崩得匪帮的原则立场方面是丝毫也不能退让的。"① 这一评价是与1913年斯大林是最先对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文化自治派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的一个人有关。在这一时期，列宁对其它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和小 1026 册子，譬如O·H·洛拉（斯切潘纽克）和彼·伊·斯图奇卡（维切尔纳）所写的文章也给予了同样肯定的评价。然而，列宁从未给人任何借口来吹捧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

现在苏联历史科学已经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在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占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方面还揭露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和不准确的论点。斯大林从其他作者那里抄录来的许多东西包括"民族"这一概念的定义在内也逐渐清楚了。②

Ю·И·谢苗诺夫写道："列宁在从理论上论证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纲领的时候，从来不是从研究民族本身而只是从研究民族运动开始。他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唯一正确的……但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态度。斯大林在着手研究民族问题时，不是从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情况入手，而是试图以列举民族特征的办法来首先确定民族本身。所有这些特征以及差异在民族问题的文献中早就研究过了。考茨基在其著作中就指出作为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征首先是语言的共同性，其次是地域的共同性，同时强调指出，民族产生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在以前独立的生产业务领域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并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民族的特征也完全是这样叙述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最后是共同的 1027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169页。

② 见Ю·И·谢苗诺夫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史札记》，手稿。

经济生活……上面列举了构成民族的三个特征，斯大林增加了第四个特征，这次是从奥·鲍威尔著作中抄袭来的，即共同的民族性格，他喜欢称之为在共同文化中表现出的民族心理素质。斯大林在分别研究了民族的每个特征之后，就以下述形式形成了它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

在这方面更为典型的是斯大林写作象《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样的讲义的历史，在随后的年代中这本书被宣布为经典性著作。

我们知道，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是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里讲的。在4—5月份，这些讲义被刊登在《真理报》上。正好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手上有一份符·克谢诺丰托夫的送审手稿《列宁关于革命的学说》，其中也研究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特点的问题。斯大林在看过克谢诺丰托夫这本书的原稿之后不久，这位在理论问题上帮助过斯大林的克谢诺丰托夫就被流放到塔什干去工作。曾有传闻，说克谢诺丰托夫抗议斯大林使用了他在自己原稿中首次表达的许多思想和定义。

这些传闻很快被证实了。1925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没有标明出版社）符·克谢诺丰托夫的《列宁关于革命的学说》一书。在此

1028

书的前言中说："作者着手写这本书时早在1923年的10月到11月份还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时候。这本书之所以出版的比较晚，是因为原稿最初在马·尼·利亚多夫同志处审阅，而后来又在斯大林同志处（4—6月）作最后审阅……"（重点是我们加的。——罗·麦·）

这篇前言是1925年1月写的。但是为了强调书中没有采用

---

① 我们知道，斯大林于1946年准备出版他的全集第2卷的时候，改变了上面列举的民族的定义。实际上他对民族重新下了定义，但就是这个定义，也正如Ю·И·谢苗诺夫公正地指出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仅仅列举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来说的特征的任何定义，都不可能是恰当的。

斯大林的意见，而是按作者原来的思想写的，作者在书后写上了完成本书的日期——1924年3月13日。

把克谢诺丰托夫的书和斯大林的书作一简单的对照，就可以看明白，这两本书无论是在结构方面、在基本材料的讲述方面、还是在主要定义方面，都极为相似。

例如，克谢诺丰托夫写道："列宁不是同马克思对立的。列宁主义不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是'48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因素的复活'，列宁主义不是'俄国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定义都仅仅谈到了列宁主义的个别方面。这些定义都包括不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政策的科学，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①

请看斯大林在其关于列宁主义的书中是怎么写的："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②

请看克谢诺丰托夫关于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是怎么写的："民族问题在列宁看来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能是通过解决总的问题、根本问题，即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和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的办法才能得到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问题列宁是这样解决的：不仅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本国的农民战争结合起来，而且要和东方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战争及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宗主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盟和统一战线。"③ 1029

① 符·克谢诺丰托夫：《列宁关于革命的学说》第16页。

② 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64页。

③ 符·克谢诺丰托夫：《列宁关于革命的学说》第82—83页。

我们再看斯大林写的关于列宁如何理解民族问题的一段话："列宁主义已经证明……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①

斯大林和克谢诺丰托夫的书中，在叙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叙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国家形式的苏维埃政权问题上以及其它问题上都可发现有极大的相似之处。1924 年 7 月，斯大林在给克谢诺丰托夫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部分地承认了在他写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克谢诺丰托夫对他有过帮助。但是，1926年底当克谢诺丰托夫要求斯大林允许他在同沙茨金的论战中引用这封信时，斯大林却禁止他这样作。②

同样不能不指出的是，克谢诺丰托夫同斯大林在对列宁主义的许多方面和特点的定义上谁具有优先权的问题上的争论，是以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办法而结束的——1937 年克谢诺丰托夫被捕，还未等到出庭受审，就在审讯中被打死了。

斯大林的第二部分著作应当包括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某些理论问题所写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论述了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遇到过的一些问题。但是即使在这些文章中，斯大林的大部分论点和讲述也都未显出有独创性。斯大林的许多论点后来被个人迷信的宣传家们冒充为伟大的发现，其实是最陈腐的真理。然而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人能比斯大林更善于把这些陈腐的真理当作某种重要的和特殊的东西拿出来。斯大林在其第二部分著作中所谈到的许多似乎是独创的思想，实际上又是他从同时代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借用

1030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124、127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37 页。

来的，这些思想在斯大林之前早就有许多理论家论述过了。斯大林只不过是在他的书中在同样的情况下重复了他人的论点而已，但是在后来引用这些思想时只能说是引证斯大林的“著作”。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主义阶段的提出和解决以及批判苏联某些哲学家的机械论和唯心主义观点，在一个长时期内都一直归功于斯大林。但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在讲话中提出极简单的批评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理论辩论之后，在辩论中，我们某些哲学家的机械论的和半唯心主义的理论早已在哲学刊物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例如，我们知道，斯大林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著名的六条，他基本上只不过是概括了经济工作者座谈会上讨论的结果。所有这六条，不管是全部在一起还是其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经济工作者在座谈会上和一系列文件中阐述过了（例如在中央一个视察了莫斯科郊区的工业企业的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中就谈了这些问题）。

关于由斯大林所“发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也是这种情况。正如Ю·波列夫在他著的书中写道，探索一个新的科学术语确实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十年代初期，许多苏联文化界人士都投入了这一事业。某些作家建议把我们文学的创作方法定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马雅科夫斯基建议把我们的基本创作方法看作是“倾向性现实主义”……在三十年代，作家们越来越趋向一致，把创作方法定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方法。早在斯大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著名谈话半年以前，1932年5月29日的《文学报》上就发表了一篇《开始工作！》的社论，其中谈到：“群众要求艺术家在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时，要有诚实性、真实性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许多民族共和国的作家们也同样表述了类似的思想（如И·库利克等人）。 1031

Ю·波列夫继续说，阿·马·高尔基召开的座谈会上（1932年10月26日）出席了大约四十五人。会上，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还在

斯大林的讲话之前就谈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具体存在着的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只是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表现手法。因此，斯大林在座谈会的结束语中重复地把我们的文学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并不是这一方法的"首创者"，因为这一美学范畴是巨大的理论探索和热烈的辩论所产生的结果，这些活动是许多苏联作家和评论家都参加了的。①

斯大林对科学院院士马尔的庸俗观点的批判显然也不是新颖的而是过了时的。斯大林在他关于语言学的文章中所谈的大部分思想（而且这些思想远不是在各方面都正确的），早就在马尔的论敌、一些苏联语言学家的讲话和文章中说过和写过。同时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在准备发表象《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样的斯大林著作的过程中，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是给了斯大林以很大的帮助的。我们还可以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虽然是由一个专门班子写成的，但后来谈到这本书时都说是斯大林的著作。在这方面，下面的一段插曲是颇耐人寻味的。1938 年，革命博物馆馆长老布尔什维克 M·萨莫依洛夫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寄给他那怕是几页《简明教程》的手稿，以便在博物馆展出。斯大林就在萨莫依洛夫的这封信上斜着写了下面的回答："萨莫依洛夫同志。没想到，你在晚年还要搞这些琐事。既然这本书已出版了几百万册，你还要手稿作什么呢？为了让你别再操心，我已把全部手稿烧掉了。约·斯大林"。这就是说，斯大林宣布烧掉了不存在的手稿。

1032

被宣布为"斯大林宪法"的 1936 年宪法的起草人也不是斯大林。制订宪法的条文的是一个很大的集体，同时在宪法最后定稿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是后来被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了的布哈林和雅科夫列夫。制订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的是一个人数很多的委员会，但这个章程后来也毫无例外地被称为"斯大林章程"。

---

① Ю·波列夫：《美学概论》莫斯科 1965 年版第 231—232 页。

据B·诺沃勃兰茨作证，被竭力吹捧为最伟大的发现的斯大林关于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和暂时起作用的因素的理论，是同萨莫欣将军的论断极为相似的，后者在战争初期在大本营工作，并受斯大林委托，对德国和苏联的军事政治潜力进行过比较分析。萨莫欣把自己的作品定名为《经常起作用的战争因素》。类似的事例我们还可以举不胜举。

最后，斯大林的第三部分著作中应包括这样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毕竟说了一些其他理论家从前从未说过的独创的思想。斯大林这一类的作品是很少的，要比列宁其他著名的战友少得多。同时，大多数这类作品都是三十年代以前一个时期的。当然，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作品是斯大林写的而否定这些理论文章和论点，那是不对的。（同样也不能否定布哈林和反对派其他前领导人的许多宝贵的理论著作。）但是必须记住，斯大林在其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思想的著作中不仅说了一些正确的论点，而且还说了更多的不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论观点。因此现在我们看到，如果说，说明斯大林理论成就的清单是极其微不足道的话，那么说明这个人的理论错误的清单却是洋洋可观的。

1033

斯大林的理论错误是由于许多原因产生的。这些错误常常是由于他的基础差、理论修养不够又孤陋寡闻以及斯大林所特有的喜欢公式化、机械化和简单化地对待实际等原因所致。在许多情况下，斯大林错误地把列宁的某些原理绝对化，这些原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是正确的，但在另一种政治、历史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实际上，斯大林对待理论的态度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斯大林主要地不是从现实情况中引伸出某一原理，而是强使理论迎合主观愿望，让理论去服从另外的情况，把理论政治化。此外，斯大林既在党的干部中，也在科学工作者中培植了一种奴隶主义的对待理论的态度。除了斯大林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任何理论观点提出异议或进行修正，尤为甚者，对待斯大林本人提出的原理也要这样对待。对这些原理只能奴隶式地遵

循，而不许偏离半步。这样一来，在个人迷信条件下，斯大林的许多不正确的论点也很快被宣布是英明的和不许任何人批评的，这些理论被变成了教条，并成了我们前进的阻力。

1034 下面我们仅就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理论观点举几个例子，这些观点无疑值得更加详细地专门地加以探讨。

例如，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期限和速度的问题，斯大林没有弄清楚。早在1936年，还在苏联开始在经济方面追赶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很久，斯大林就宣称在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剩下需要完成的已是“大为容易的任务”——完成这一经济基础的相应的上层建筑。然而我们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主义道德这样的上层建筑，是一项非常艰巨和长期的任务，甚至比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地主的土地还要艰巨。过了三年，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在我国已完全建成了社会主义。显然，在1938—1939年的条件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这种冒进的提法是危险的。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硬说，正是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是苏联的文化革命时期，这一说法也是不对的。正如Л.М.札克在自己的学位论文中所公正地指出的，文化革命时期的范围的缩小，这本身就具有某种倾向性：把对我国的基本文化改造的领导归功于斯大林个人。

斯大林歪曲了列宁关于苏联的阶级斗争的许多原理。一方面，斯大林在1934年提出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在我国消灭阶级的任务。关于在我国消灭阶级的问题，斯大林于1936年在同美国记者罗依·格瓦尔特谈话中也宣布过。另一方面，斯大林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将随着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日益尖锐化的完全错误的论点。实际上，以前所理解的那种阶级斗争，在我国应当逐渐走向熄灭，那怕是仅仅因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就意味着在苏联完全消灭剥削阶级。

1035 斯大林同样也混淆了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职能的问题。

按照斯大林制订的简单化的公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维埃国家经济一组织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在我们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似乎没有得到重要的发展，而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职能，一般说仅仅是在第二阶段才出现。实际上所有这些职能就是在苏维埃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基本的职能。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苏维埃国家的对外职能仅仅是在军事上保卫国家，防止外来的进犯。斯大林没有指出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对外职能，如争取和平、平等和主权、巩固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等。

斯大林不正确地解释和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论点。

列宁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永远记着）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了胜利的政权都只有实行专政。"①

严格说来，列宁的这些论点，如果不同他的其它论述联系起来看，就不是恰当的和完美无缺的。当然，对社会主义敌人直接使用暴力对于这一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有不小的作用的。但是，关于这一专政"绝对不受任何规定的限制"的提法是错误的，所以列宁自己首先就没有按照这一提法去作。这一口号同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的口号，也即"目的可以允许任何手段"的口号是一样的。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已经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接受这种口号，同时也拒绝革命的极端主义。大家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最复杂的情况下，列宁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都从来没有使自己绝对不受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所有规则的约束，特别是执行我党所规定的党内生活的准则。 1036

还必须指出，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不受限制的、依靠暴力而不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18、311页。

依靠法律的时候，通常强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和规则而言，不破坏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写道："使用资产阶级制订的法制的时代，被最伟大的革命大决战的时代所代替，同时，这种决战，就其实质而论，是要破坏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制，破坏整个资产阶级的制度的……"① 同时列宁经常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新的、苏维埃的法律，无产阶级专政在其同敌人的斗争中正是应当依靠这些法律。例如，十月革命一年之后，列宁为第六届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决议写了一份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在列宁起草的提纲的第一款中写道："必须提高法制观念（或者说要得到最严格地遵守），因为俄罗斯联邦的基本法业已确立"。② 列宁还说："必须遵守最严格的革命秩序，必须遵守苏维埃政权的神圣法令，而且要监督所有人加以执行……些微的违法行为，对苏维埃秩序的丝毫破坏，都已经是劳动人民的敌人要立即加以利用的漏洞"。③

当然，在内战的条件下，对于苏维埃政权所通过的新法律，在个别情况下也不得不有所偏离，对此列宁是很了解的。但是列宁强调，这只能是在个别情况下和仅仅是在公开的内战条件下。列宁写道："同反革命进行战争的紧急措施是不应当受法律限制的。"同时列宁还指出，允许采取越出法律界限的非常措施只能是在下列条件下："（1）有关的苏维埃机构或负责人的认真的和正式的声明，说明内战和同反革命斗争的紧急条件要求越出法律界限；（2）立即将这种声明用书面形式通知人民委员会，并抄报地方政府和有关当局"。④

1037

斯大林违背列宁这些明确的指示，随心所欲地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这一论点扩展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

---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6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2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第156页。

④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29页。

主义的整个时期，扩展到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一来，按照斯大林的看法，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典型的特征不是革命的法制，而是无法无天。而我们也知道，斯大林确实未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拒绝执行的正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支柱的那些苏维埃的法律。

斯大林使得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大为减色，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一理论的内容主要地可归纳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胜的原理被斯大林宣布为是一项新的"完整的"革命理论，并用这一观点把列宁同马克思割裂开来，为这一理论的发展设置了极限。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谈的论点也是错误的，他说，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说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提出过"。

斯大林由于提出了强制植造集体农庄的理论，因而他不是把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向前发展了，而是歪曲和曲解了。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党史方面，斯大林也发表了大量不正确 1038 的论点。例如，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轻藐的态度。斯大林根本怀疑在马克思之前是否有过共产主义理想。(从这种忽视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中产生了斯大林或多或少地忽视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斯大林不正确地评价了民粹派和民粹主义的作用。在《联共(布)党史》中，所有民粹派分子都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尽管第一批民粹分子活动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没有出现。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评价完全相反，《简明教程》中对俄国的革命民粹主义的评价，仅仅去挑剔这一政治思潮的错误和缺陷。斯大林以一种极端庸俗和歪曲的形式叙述了民粹派对恐怖手段和个人同群众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斯大林激烈地批评"民意党"时在《简明教程》中说，这个组织的活动给我国革命运动带

来的只是危害，因此实际上所有民粹派都被看成是与革命事业相敌对的。斯大林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遗产的评价也是极端片面的和有偏见的。

正如K·Л·谢列兹涅夫公正地指出的，斯大林在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方面也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在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遗产时，斯大林没有谈到这一理论的某些重要部分（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工人阶级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的理论），几乎没有谈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实质、对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以及对共产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等的论述。那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遗产仅仅是一些“基本的概述”的评价也是不完全公正的。在斯大林的某些著作中还可以看到，1039 他对恩格斯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作用估计不足以及对恩格斯的许多论述的无根据的批评。①

斯大林说我们党在1917年以前主要是、而且仅仅是对俄国有影响的一种民族力量是完全不正确的。斯大林说布尔什维主义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只是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的事，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正如列宁不止一次写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从1903年起就已经存在了。

对于斯大林说农业集体化按其后果而言是同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说法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

在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的评价上，斯大林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正如В·А·杜纳耶夫斯基公正地指出的那样，② 这些错误中最重要的是，企图把列宁说成是从

① 见K·Л·谢列兹涅夫：《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苏联文献概述）。《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原书未注明某期。——译者）第111—112页。

② 见В·А·杜纳耶夫斯基：《在国际舞台上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左派》。载《近代和现代的欧洲》文集莫斯科1966年版。

布尔什维克开始从事自己的活动时起，就有意在国际舞台上分裂社会主义运动。然而事实上，直到1915年中期列宁还不同意在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前，布尔什维克就脱离第二国际的那种想法。斯大林在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评价中，同列宁对他们的评价大相径庭。大家知道，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把托洛茨基和巴尔乌斯创立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卢森堡首创的。正如历史学家B·B·契斯加科夫所说明的那样，在这一时期的罗沙·卢森堡的著作中，不仅丝毫没有谈到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而且恰恰相反，她所发挥的正是同"不断革命"明显相反的思想。①

斯大林对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评是完全片面的，他几乎只字未谈他们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功绩。实际上，他们的一切成就都被一笔抹煞了。B·A·杜纳耶夫斯基写道："斯大林特别注意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的和似是而非的错误、并把机会主义完全控制了第二国际这一说法当作定理，因而他对第二国际的全部活动都作了错误的理解，并从而贬低了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特别是这些党的左翼）。② 这种态度是同列宁的立场相违背的，列宁认为第二国际在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最初期准备把最分散的社会主义力量组织起来，在这方面完成了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③ 1040

关于联共（布）党史中斯大林的观点的一般特征还需要说几句（虽然有许多作者参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但该书的主要精神毫无疑问是属于斯大林的）。我们已经谈到了在这本《党史》书中包含着许多有意的伪造。可是它的另一个特点，却是同该书的伪造本质紧密相联系的，即教条主义和公式化。

正如苏联历史学家M·格弗切尔在他的一次发言中所公正地

① 见B·B·契斯加科夫：《列宁论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载《乌克兰历史杂志》1965年第9期。

② 见B·A·杜纳耶夫斯基的文章，载《近代和现代的欧洲》文集。

③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03页。

指出的那样，对于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正是而且仅仅是结果，是能够把某项原则变成构思的出发点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不言自明这一特点对于《简明教程》来说是多么的典型。活的事实只是为了说明某些思想论点（早已预先规定好了的）是真理而另外某些思想论点（也是事先早规定好了的）是谬误的例证；在事情的开头就已提出了结局，因而历史发展被披上了各种已经预先被规定好了的特点：即只能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M·格弗切尔继续说："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它关于历史是有规律运动的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辩证思想）变成了斯大林'铁的'官僚主义化了的观点，这是一个特殊的题目。显而易见的是：这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对被称之为蜕变形式的这一理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给理论本身以及接受这一理论的新一代所带来的危害作出估价。人们对真正创造性的新事物逐渐丧失了感受力和理解力，而这种新事物感乃是列宁思想和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在它诞生时所固有的东西，试比较一下机会主义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前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就清楚了（前一时期不光是弱点，同时也有一定的成就）。这样，思想政治斗争规律性的研究就受到了损害，因为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思想斗争的增长又会变为各社会力量的冲突、对这些进行科学分析，都被一个极端的公式所取代：即所有的分歧和思想的每一细小差异都同阶级利益直接相联系。历史失去了生动的内容，从而减少了我们用革命经验培养共产主义干部的可能性。的确如此，假如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可以未卜先知，假如对斗争各方的各种立场可以预先了如指掌，假如所有政党、集团和个别人都不会发生变化，而只是在斗争过程中来进行自我表现和自我暴露，那么布尔什维克在制订自己的政治路线而特别是把亿万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方面来的斗争中所必须克服的那些巨大困难就是无法解释的了。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内容，远远不是全部。《简明教程》的先验

论的具体形式和作用，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也并非是不重要的。党的历史是由于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才扬眉吐气了的呢？不言而喻，是因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种结果（这一论点的'秘密'正在于此）被说成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它同另外一个东西合长在一起了：即粉碎和消灭'内部敌人'、'布哈林—托洛茨基间谍、破坏分子、卖国贼'（见《简明教程》第十二章第四节的题目）。我们所走过的全部道路都要从这一决定性的角度来加以观察。所以，党内斗争在《简明教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同时《教程》中十月革命以后的部分比十月革命前的部分还多得多。与此相适应的是，党的有成效的活动和政策的实际情况却整个阶段整个阶段地被砍掉了。一些事件仅仅剩下了斗争的表面的原因，而现实的历史规律性和推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部矛盾被公式所代替，它实际上已不再发展，并导致人物之间发生不断反复的冲突，这些人物中一些人必然是忠于列宁的，而另一些人生下来就是同列宁主义作对的，因此按逻辑推理，这些人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①

1042

正如Я·С·德拉勃金在同一会议上公正地指出的，联共（布）党史中斯大林观点的另一特点是民族主义，而在某些情况下它已变成了沙文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几乎完全忽略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说明我们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是在谈到"劳动解放"小组的活动时才提到。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则仅仅是在揭露国际修正主义时才谈到它。对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只是说他们"埋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简明教程》中，关于西欧工人阶级对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反应也只字未提。在关于世界大战的一章中，非常轻藐地谈到了其它社会民主党中的国际主义

① 见1966年4月29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科学史小组和历史方法论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讨论Н·Н·马斯洛夫的报告：《1935—1955年党的历史科学的状况和发展》，速记稿。

者。书中把受过列宁批评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称为“不是始终一贯的国际主义者”。《简明教程》的作者们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

1043 谈了几句之后，对于共产国际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六次代表会议、对于共产国际的纲领都只字未提。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样重要的列宁的著作也未置一语。关于十月革命后在西方和东方兴起的革命运动也几乎什么也没有说。甚至对于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转折点的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简明教程》中也只字未提，虽然这次代表会议是在这本书问世的前几年召开的。《简明教程》中，无论是关于统一战线还是关于人民战线，也都只字未写。

Я·С·德拉勃金指出：“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简明教程》中没有谈到什么，而是里面说了些什么。全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贯穿着一个思想，即全部社会民主党(说的就是全部而不仅仅是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是一切进步事业最凶恶的敌人，同它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结成任何同盟，即使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同盟。如果在概括全部历史经验的《结束语》中这样写着：‘党史教导说，假如不把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活动，想把工人阶级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因而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不把这些政党克服，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便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那么对于统一战线还有什么可言呢！这样，斯大林把我国在历史某一片断上的经验变成了武断的定理，因而修正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的方针和决定。”①

在俄国历史方面，斯大林不仅完全为伊凡雷帝及其禁卫军开脱，甚至还认为马柳塔·斯库拉托夫是一位进步的大国务活动家。斯大林完全宽恕了伊凡雷帝及其禁卫军的残酷暴行。按照斯大林

① 见1966年4月29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科学史小组和历史方法论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讨论Н·Н·马斯洛夫的报告：《1935—1955年党的历史科学的状况和发展》，速记稿。

的说法，雷帝唯一的错误是，每当他消灭了一个封建氏族之后，他过分地受到良心的谴责，并过于长久地祈祷宽恕他的罪过。所以他未能把所有贵族家族全部消灭掉。（历史在重演，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也在为成吉思汗这样的暴君"恢复名誉"。） 1044

斯大林对于我国的历史不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一些艺术作品中许多沙皇和王公贵族也开始受到颂扬。在这些作品中对他们的活动作了极端歪曲的叙述。例如，大家知道有一个关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传说，说是历代沙皇和东正教会都认为涅夫斯基是天赐的王位庇护人。但却避口不谈他在诺沃格罗德曾号召鞑靼人镇压人民起义一事。

在我国历史科学中开始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包括尼古拉一世在高加索的侵略战争辩解，这也不是没有斯大林的影响的。与此同时，高加索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沙米里却被描绘成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受雇于英帝国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的代理人。

在通史方面，斯大林同样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和不精确的论点。他关于封建主对土地所有制的独占形式的论点就是这样的，他没有考虑封建制度下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形式实际上的多样性。斯大林关于封建主对待农民的小部分土地所有制的论点也是非常笼统的。斯大林错误地把封建社会结构仅仅同它的一种形式——农奴制混为一谈。斯大林说奴隶革命似乎给予奴隶社会结构以致命打击这样的论点也是不正确的。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系列错误论点。应当直率地说，斯大林至多也不过是哲学中一个略识门径者。他没有受过任何系统的哲学教育，也从未深入地自修过哲学。斯大林从来没有真正地研究过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其他古典哲学家的著作。此外，从斯大林的一些哲学论述来看，他从来也没有稍稍认真地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遗产。斯大林自己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无一例外地犯有极端粗浅、简单化、表面化和教条主义公式化的毛病。 1045

斯大林在其第一部哲学小册子《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就对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特征（“一切为了个人”，“个人解放是群众集体解放的主要条件”）作了公式化的错误定义。谁都知道，这种把群众、集体同个人对立起来的提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根本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而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就在斯大林这本实质上是学生教科书的小册子中还包含了其它大量的错误论点。例如，就在这本书中已经人为地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截然分开。斯大林硬说马克思似乎是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他的全部辩证法，从费尔巴哈那里取来了唯物主义，他把它们加以改进并投入使用。斯大林对感应性、感觉、新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以及其它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是极端肤浅的。

斯大林在其后来的哲学著作中把辩证唯物主义简单化了，贫乏化了，他不善于把他同时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反映在自己的著作中。他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机械地加以分割，声称辩证法只不过是方法，而唯物主义是理论。这种论点当然是大错而特错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把方法和理论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学说。斯大林始终也未能理解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他取消了对立 1046 统一的一面，而只强调斗争。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都搞得混乱不堪。斯大林关于全部旧的上层建筑将会随着旧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提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并没有把过去几个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作为旧基础的上层建筑都消灭掉。我们也知道，斯大林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最重要来源的德意志古典哲学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正是斯大林错误地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对法国革命的贵族式的反动。

斯大林在经济理论方面也犯了特别多的错误。

例如，斯大林显然对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法则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他不承认苏联的生产具有商品性，认为生产资料不受价

值法则的影响。所以在补偿企业的生产费用时等价原则被破坏了，因而也就难以实现物质刺激原则。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法则仅仅在流通领域起作用，因而它仅仅是“影响”生产。斯大林完全忽视了农业生产中的级差地租。

斯大林关于居民购买力的增长先于生产的增长的论点也是错误的。由于这一论点，使得国内产品奇缺和到处排长龙的现象合法化了。他甚至否定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剩余产品，并且轻视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

斯大林认为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已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因而似乎应当以产品直接交换制度来尽快取代商品流通的办法，把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论点 1047 也是错误的。

斯大林对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定义也是错误的，他认为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是这种所有制的唯一目标。这就是说，斯大林从集体农庄所有制中排除了基本的生产资料。

斯大林反对把农业机器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意见也是完全不对的，他错误地认为，出售农机给集体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因而不是使集体农庄接近共产主义而是使它远离共产主义。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保持最低限度利润，甚至是完全没有利润也都能过得去，这种论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众所周知，无利润收入的国营农场是靠国家预算支出来抵消自己的亏损的，尽管这阻碍了农场的发展，但的确是可以不要利润而能长期维持下去。至于集体农庄，它们没有这种财政来源，所以只好把自己的财政困难转嫁在集体农庄庄员的身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所臆想的“最高收益率”原则对集体农庄和庄员是无所裨益的。根据这一原则，所有集体农庄庄员按这个词的最高两字的含义来说，应该是都有收益的，尽管实际上有明显的亏损。总的说来，斯大林所有的基本论述主要关心的是完成

征购和收购，而对提高集体农庄生产的生产率和增加它们的收益则根本未予以注意。

斯大林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看法也是完全混乱的和肤浅的。斯大林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理解得非常之差。他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上不参与经济生活。例如，1934年斯大林在同威尔斯谈话中曾这样评价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不能忘记资产阶级世界中国家的作用。它是组织国防的机关、维护'秩序'和征收捐税的机关。经济按其本意来说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是牵连不多的。"斯大林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论断是同列宁不止一次指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正日益增加的观点相对立的。斯大林的定义同众所周知的1934年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事实，例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等是完全矛盾的，因为这一新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调整经济生活中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还可以提一下希特勒为了建立战争经济而宣布实行的把国家经济生活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的事例。我们就更不屑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国家的定义早已被这类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推翻这一事实了，因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扩大了庞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作用，同时还不仅是在调整经济生活方面，而且还采取了直接参与的形式（如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建立庞大的国有经济成分和军事工业等）。

1048

斯大林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曾试图考虑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新发展，但他在这样作的时候，却又犯了性质相反的严重错误。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当谈到"垄断组织同国家机关相结合"的问题时，斯大林写道："结合一词不恰当。这个词只是表面地和相对地指出了垄断组织同国家的接近，但是没有揭示这一接近的经济含义。问题在于，在这一接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单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从属于垄断组织。"然而，这种判断不符合列宁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同时与许多事实也相违背。在大垄

断组织的政治经济影响全面增长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并非直接从属于垄断组织，国家同一些垄断组织的相互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性质，同时还因国因时而异。 1049

斯大林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将会危机重重，一蹶不振，他继续维护劳动者绝对贫困化的理论，虽然事实并不象这一理论所说的那样。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三十——四十年代生产能力开工不足这一特有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外市场的紧张，特别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丧失了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其实，这一开工不足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国外市场而是因为国内市场的相对缩小。

斯大林在苏联法学领域中也提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和错误的论点。正是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法制的实质和任务作了歪曲的解释。斯大林把革命法制的任务仅仅归结于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而加强革命法制的措施则仅仅局限于一味号召强化镇压措施。象保障国家和社会纪律、发展文化、教育苏联人民、而尤其重要的是维护苏联公民的正当权益这样一些苏联法制和法律的任务，统统都被排除在斯大林的公式之外。斯大林赋予苏联法制以片面的镇压性质是完全错误的。

斯大林在军事科学方面也犯了不少错误，在个人迷信时期，他被称为军事科学中最好的经典作家。例如，斯大林在答苏联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叶·安·拉金上校的信中，武断地否认十九世纪最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有任何价值。①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斯大林过分突出自己在发展苏联军事科学中的作用，竭力贬低列宁以及其他许多苏联军事科学界的军事将领和活动家的军事活动和军事理论遗产的意义。正如《军事战略》一书中指出的，斯大林为了替自己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错误和失算辩解，有意歪曲军事战略中一系列问题的概念。例如，斯大 1050

① 见《布尔什维克》杂志 1947 年第 3 期第 6 — 8 页。

林说"被侵略的民族对战争缺乏准备是一种规律，他把我军败退到内地、广大地区丢给敌人辩解为一种积极的防御、他说反攻似乎是战争中战略行动的必然形式，他的这些论点以及其它一系列论点，都被上升为原则。"①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我国的军事历史科学不去分析战争的教训，而是一切都为了开脱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失算，为了掩饰他的错误。

在战后时期，斯大林对核武器的意义和使用的可能性作了主观估计，它阻碍了对这一武器的在军事上的使用和防御上的研究。

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犯了很多错误。大家知道，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他把二十年代初各民族国家建设的多种形式，包括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用条约形式建立起来的联邦关系，都归结为各种形式的自治。

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已不是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迫切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才仍有它的意义，这种论点也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在欧洲也同样不仅采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式，而且也采取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形式。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资产

1051

阶级已经丢掉了民族独立的旗帜，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这一旗帜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于亚洲、非洲国家来说是不正确的，近十年来的政治现实表明，民族独立的口号同样也在欧洲国家中（例如在法国）和在美洲一些国家中（如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国）被一些资产阶级所使用。

斯大林对于象技工教育这样的问题的提法也是不正确的和片面的。斯大林在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把技工教育的必要性仅仅和自由选择职业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没有把技工教育的原则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紧密地联系起来。

有必要指出，斯大林在估计中国革命的前景和道路问题上犯

---

① 《军事战略》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5 页。

了不少错误。在1929—1935年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内（正如他的领导人现在也承认的）为反对斯大林的错误意见和估计进行了严重的斗争。不错，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从未点过斯大林的名，批评是针对那些同斯大林持一样观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　　*　　*

这些只是斯大林的某些理论错误，这些错误在我国报刊上已被揭露并受到了批判。斯大林没有根据新的条件重新研究和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观点相比，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总的说来不是前进了一步而是后退了一步。因此，假如可以说在理论方面有个“斯大林”阶段的话，那么只能说这是理论思想的暂时消沉阶段，停滞阶段，而迅速克服这种停滞现象，正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其它领域代表的最重要的任务。

1052

四、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自然科学

全部自然科学部门都无一例外地切身感受到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种：直接的和间接的。第一，斯大林常常亲自干预某些科学任务，常常发表讲话，充当不受欢迎的裁判员，并时常对科学界人士作一些十分外行的指示。斯大林给地质人员作过指示说：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寻找石油，他给予医生有关他们专业方面的指示，① 他还就遗传问题对生物学家发号施令。斯大林周围的党的某些领导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也都效法这种恶劣作风行事。

第二，许多科学机关中盛行的官僚制度也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科学讨论中粗暴的非同志式的态度，时刻想把科学政治化的企图以及把自然科学划分为苏联的和资产阶级的诸如此类的反常

① 见《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8期第282页。

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中养成了一种乱扣帽子的习惯，遗憾的是，干这种勾当的不仅是哲学家，而且还有自然科学界中许多相互争鸣的科学派别。

在这种条件下，科学界必然地要出现各类冒险家和追求个人名位的人，他们得到有权势的、但是外行的行政干部的支持，他们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诚实的科学家排挤出去。

大家知道，在个人迷信时期，生物科学曾处于特别困难的境地，斯大林几乎认为自己是生物学界的一位专家了。① 若·亚·麦德维杰夫② 在《农业生物学论战史概述》一书中，相当详细地和有根有据地叙述了农业生物学悲剧性的历史，首先是回顾了三十年代农业生物学论战的历史，现在我们向我们的读者引证这本书。在我写的本书中，我们仅想指出一点，即正是斯大林的支持使得李森科能够在1948年8月组织召开了一次破坏性很大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使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在一个长时期内停滞不前。正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在我国文献中形成了关于存在两种生物学即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这种不正确的提法，而且把大多数比较有发展前途的生物学派都划入了资产阶级生物学中。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随意把大多数外国和苏联生物学家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了（正如有个时期在日尔曼曾形成了“阿利安人和非阿利安人”物理的概念）。

在迷信斯大林和迷信李森科的影响下，在我国生物科学界开始忽视一些明显的事实和大自然界经过验证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某种神秘的遗传特性的无知假想却得到了散布和官

---

① 亚·波斯克列贝舍夫在一篇纪念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文章中声称，斯大林是农业中一些狭隘范围的专家。斯大林似乎不仅组织了柑橘的栽植工作，而且还研究了在黑海沿岸移植柑橘的可能性。斯大林还研究了在莫斯科郊区栽植桉树的可能性，他还帮助培养出了多穗小麦等等。

② 若·亚·麦德维杰夫是作者的孪生兄弟，苏联生物学家，持不同政见者，现住英国。——译者

方的承认，据说这种遗传特性没有固定的物质体但充满着生物体的所有细胞。得到扩散和官方承认的还有关于似乎可以解释生物体的成长和发展的十分神秘的生命属性的假想、关于有生物体自动的自我淘汰的那种神秘的特性的假想。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开始否定达尔文的种内竞争的理论，但同时又肯定了由一种植物突变为另一种植物的可能性：小麦变成黑麦、松树变成云杉、燕麦变成燕麦草等等，并且认为直接的和遗传的完全相同的变异性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李森科的这些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在个人迷信时期，都立即被宣布为是绝对正确的，对它不准许有任何批评性的意见。其结果是使我国的农业和生物科学遭受了巨大 *1054* 的损失。

正是斯大林的支持，使得威廉斯的草田制在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上还魂，并把它变成我国农业科学中的统治学派。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之后和根据斯大林的创议而通过的政府的专门决议之后，威廉斯的草田农作制被千篇一律地在全国各个农业地区硬性推广普及。

正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使得奥·鲍·列别森斯卡娅的反科学的理论在科学界存在了很长的时间。正是斯大林坚持授予列别森斯卡娅以斯大林奖金，而且不经过任何手续也不按期限的规定。

在李森科"经验"的影响下，在医学科学中也采用了一种苏联科学的不应该使用的、不适当的工作方法。不能不提一下与此有关的于1950年召开的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的一次联席会议。在这次联席会议上，从伟大的俄国科学家伊·彼·巴甫洛夫全部宝贵遗产中只把高级神经活动的一部分提到首要地位，同时正如C·莫尔塔舍夫指出的那样，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在学术界"被一些自认为是巴甫洛夫学说绝对正确的解释者和这一学说的唯一的和直接的继承人作了武断的解释。生理学的所有其它学派（研究神经系统的其它各种观点、进化生理学、细胞生理学、分泌器官生理学等等），凡不是用那种独家的教条主义的解

释来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学派，都在被禁之列。几乎全部正常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以及我国神经科和精神病科医院全部都只能是从事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只能教条主义地照搬巴甫洛夫已经作过的各种方法，而不是创造性地去发展他的学说。甚至连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巴甫洛夫关于消化系统生理现象的那些著作，也没有能充分加以发展，其结果是对人的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诊断和治疗工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巴甫洛夫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关于生理学未来发展的想法、假说、推论和设想，这些都是巨大的财富，本应创造性地加以发展并创建新的学派，而我们的某些生理学家却只在教条主义的圈子中转来转去。他们更多地是在浪费而不是在增加巴甫洛夫留下的遗产。"①

1055

在医学科学特别是医学生物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许多领域里也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 * *

在个人迷信时期，在销毁大量有益的和有用的但不合斯大林及其亲信心意的图书及其它出版物的问题上，十分明显地表现了一切宗教裁判所特有的那种不可调和的精神。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在我国恢复了中世纪焚书的恶习。如同教皇的禁书目录(清单)一样，在苏联也给各图书馆发了大批要清除和销毁的书籍的清单。

斯大林发动了反对我们党最著名的人士的恐怖运动，把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投入了监狱和集中营，他还要求销毁这些人的全部著作，尽管这些著作一般同对他们的诽谤性控告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诽谤性的控告是逮捕一个国务活动家和科学家的根据。

"人民敌人"的成百万册图书从各个国家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很少的苏联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存了这些书籍。甚至陈年的杂志和报纸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或者被交出去"专门保存"，这就是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使用。在科学书籍中也以同样方法

1056

① 见《真理报》1965年6月11日。

取缔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著作，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科学思想发展的继承性被破坏了。在被禁的书中不仅有涅夫斯基、布勃诺夫、波克罗夫斯基、斯切克洛夫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和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样有名的政论家的著作，而且还有瓦维洛夫、迈依斯切尔、柯尔佐夫、巴舒卡尼斯、加斯帖夫这样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的著作。图哈切夫斯基、叶哥罗夫、雅基尔等这样一些军事科学界著名人士的著作也被宣布为破坏分子的书籍。不仅"人民敌人"写的书在销毁之列，就是在书中提到了这些"人民敌人"的名字、或对这些人说了什么好话的书也都得销毁。

在个人迷信时期，对科学发明优先权这样的重要问题也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解决的，作法是很荒谬的。正如波·米·克德罗夫在1962年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公正地指出的，这个问题不是以国际主义观点来看待的，没有考虑到各国人民都实际参加了发展和丰富世界文明的事业，而是用各国人民相互竞争的观点来看待的；竟说这个或那个国家为其国家代表争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优先权是非法的。在个人迷信时期，有些人专好把别国科学家的任何一项发明窃取过来写在我国科学家的名下。在这样作时还使用了各种牵强附会的和不可信的论据。

在个人迷信时期，各科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的社会活动以及苏联科学家的社会积极性都明显地下降了。

苏联科学界在许多方面都与世界科学界处于隔绝状态，因而妨碍了利用世界科学的成果来为苏联人民谋福利。列宁曾及时指出："……无论如何要把欧洲和美洲科学中全部真有价值的东西吸收过来，这是我们最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① 但是，斯大林却丝毫也未听从这一建议。苏联科学家同其它国家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大多数都中断了。苏联科学家几乎不再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讨论会，文献资料的交流也减少到只有几十分之一。在我国已不再举

1057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6页。

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苏联科学家同其外国同事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首先是给苏联科学本身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当然，就是在个人迷信时期我国科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假如在三十——四十年代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这种毫无道理的、愚蠢的不必要的专制的话，那么这些成就无疑是会更大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又一严重的和危险的后果。

五、斯大林个人迷信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斯大林个人迷信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错误作法，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非常大。

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前半期，苏联的文学艺术尽管有某些缺点，但发展得还是比较快的。那个时期的许多"幼稚病"已在顺利地克服，苏联作家、艺术家、戏剧工作者、电影工作者、作曲家的队伍在迅速成长，艺术技巧也日益成熟。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可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那次会议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乐观主义精神。我国文艺的许多严重缺点，在会上受到了一致的尖锐批评。本来，在大会以后，文学艺术应该得到前进的新动力。1058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言而喻，苏联文艺界最大的不幸，是文艺工作者遭到大规模镇压，许多人从肉体上被消灭。不只是人牺牲了，连他们创作的全部作品也被抛出文化的宝库。政治恐怖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社会赖以发展的一切条件。

自然，即使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我国也曾创作出许多文学巨著和艺术名作，这些作品对苏联人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青年，使他们培养了真正的共产主义道德。举例来说，只要回忆一下《夏伯阳》、《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波罗的海的代表》、《列宁在十月》等影片以及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安·马卡连柯、亚·法捷耶夫、米·肖洛霍夫等人的小说和

其他著作对苏联人的影响，就足以说明问题。然而，如果仅仅列举个人迷信时期名作，而不同时指出苏联文化在那些年里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那是不正确的。那时苏联的文学艺术发展得十分缓慢，极其片面；只在某些方面有发展，而在其他方面却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个人迷信在苏联文化领域中的流毒是多方面的。

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内容极为贫乏的观点，正是在三十——四十年代在我国占了上风，从而排除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人士。无论文艺作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种种毫无道理的限制。

列宁提出并论证过的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也受到严重的歪曲。实际上，党性原则只有一个含义：要求作家和艺术家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同妨碍新社会制度建立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真实地、忠实地反映现实。然而，在个人迷信时期，往往把文艺的党性解释成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服从某一级党组织的决议。按照某些思想战线领导人的意见，艺术家、诗人、作家、作曲家、导演、演员只能是货真价实的“党的士兵”，他们不能去发掘和研究现实，不仅创作什么，而且怎样创作，都必须遵命而行。关于意识形态斗争，无论科学界和文艺界都没少谈论，但事实上却都回避这种斗争。结果，在那些年代里，许多有意义、有价值而无法用“党的”公式套的作品，都未能问世。这可以举米·布尔加科夫、安·普拉托诺夫等许多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作品为例来说明。

1059

我们的报刊时常断言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因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须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自己的缺点。这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就整体而言，无产阶级和人民决不希望掩盖或者歪曲真理。但是，不能不看到，党内在个人迷信时期形成的某些集团阶层乃至一些个别人物，尤其是那些大权在握并且篡夺了代表党和人民发言的权利的人物，却常常希望掩盖真理，掩饰缺点。因此，这

些人就没有任何客观性，对他们来说，口出谎言和蛊惑宣传恰恰是维持宝座与特权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他们便以侈谈人民利益和幸福的虚伪言词为掩饰开始歪曲客观性和党性。这些人的“党1060性”只是挂在口头上的，实际上支配他们的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是真理。

个人迷信时期的典型作法是，让那些不懂专业然而权力很大的外行人对文艺进行肆无忌惮、粗暴无礼的干涉。大家知道，早在1925年6月，联共（布）中央便在关于文学问题的特别决议中指出，处理文学事务时必须“极有分寸，慎重，耐心”，“抛弃发号施令的作风，抛弃一切自命不凡、一知半解而又盲目自满的共产主义傲慢态度”。决议中说：“党应该竭力根除那些对文学事务进行自以为是的、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作法。”[1]

可是，这个决议并没有执行。党的“上层人物”对文学事物表现得毫无分寸，毫不慎重，毫无耐心。为了审批文艺作品，建立了一层层的十分复杂的官僚机构。一部作品在送到斯大林那里以前，先要经过很多人的手，而这些人大都是外行、检查员和行政领导。斯大林本人也对文艺进行了粗暴无礼的干涉。

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其所著《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中说，斯大林不只爱读俄罗斯和西方的文艺作品，他自己在青年时代还写过“一些很好的诗”，用“索谢洛”的笔名发表在《伊维利亚报》上。不错，人们还不曾把斯大林象毛泽东那样，奉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在我国文学中留下的“痕迹”是很深的。

斯大林的意见常常能决定一部作品乃至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1061命运。例如，亚·阿菲诺根诺夫的话剧《谎言》，有三百家剧院正在排演，斯大林却下令禁演。斯大林不喜欢剧中女主角的台词，因为女主角很尖锐地指出，谎言已经深入我们生活，许多共产党员的信仰不坚定。[2]大家知道，高尔基对米·布尔加科夫的话剧《逃亡》评

① 见《论党和苏维埃的报刊》（文件汇编）莫斯科1954年版第346—347页。

② 见《旗帜》杂志1963年第1期第211页。

价很高。但是斯大林对《逃亡》和《殷红色的岛》则持否定态度，而且在写给弗·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信中发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奇怪论点，说《图尔滨一家人的日子》的作者对其剧作的获得成功"没有任何责任"。结果，布尔加科夫的《逃亡》以及大多数剧作都遭到禁演。① 同样是由于斯大林本人的干涉，德·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卡捷琳娜·伊兹麦洛瓦》(《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也被禁演，而在此以前，这出歌剧已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剧院中上演过两年，并获得成功。可是不知为什么斯大林不喜欢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于是就把这个歌剧从上演的剧目中给撤掉了。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有许多古典作品也被迫停演，或者禁止再版。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赴巴黎演出之前，接到了不准上演《波里斯·戈都诺夫》的禁令。后来，被撤职的剧院经理 M·阿尔卡季耶夫，在 1937 年 7 月呈给斯大林的"悔过书"中，列举了"上级"向他指出的普希金这一悲剧的"疑点"：不得将地主阶级统治的波兰同贫困的俄国对立起来，此外，"普希金(!?)笔下的季米特里并非他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外国入侵者的间谍"。"悔过书"中说："在排练《波里斯》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贯彻执行这些指示……，以便能给政府演出，而且如果获准的话，也可以巡回演出。"②

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政治检查机构攫取了很大的权力，起着很大的作用；几乎在任何出版社里，最后成就都属于政治检查机构，它获得巨大的影响和权力。 106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曾在二十年代写道："我们需要广阔、多样、繁荣的文学。自然，检查机关不应放过公然的反革命作品。然而，除此之外，一切有才华的创作，都应能尽量自由地在书市上销售。有了这样广阔的文学创作，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喉舌，通过它反映出我们这个大国各个阶层和思潮、流派的心声，只有这样，

① 《布尔加科夫选集》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29—30 页。

② 引自文化史学家 Л·M·扎克的资料。

我们才能掌握足够的资料，既包括代表各流派的作家们的主观意见，又包括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现实进行的客观观察。"①

在斯大林时代的书刊检查机关中，当然没有人去遵照卢那察尔斯基这些高明、正确的意见行事。不过，除检查机关而外，在各种出版社、编辑部、艺术理事会的负责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但求无过的人，而这些人恰恰最容易当上领导。于是动辄数十种书籍、影片和剧本不准出版，禁止上演。譬如，仅在1936—1937年那一个演出季节，各共和国所属剧院上演的19个新剧中，便撤掉了10个，其中包括由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芭蕾舞剧《晶莹的溪水》、米·斯维特洛夫的话剧《边远的省份》、由杰·别德内依作词的喜歌剧《勇士们》、苏霍沃-科贝林的喜剧《塔列尔金之死》、亚·阿菲诺根诺夫的话剧《向你致敬，西班牙》等等。在那些年月里仅莫斯科就关闭和并掉了10个剧院。列宁格勒也关了10来个剧院。

根据文化史学家П·М·扎克的资料，仅在1937年便有56个剧从剧目中撤掉，禁止上演，其中包括弗·基尔松、布·雅先斯基和伊·米基坚科等被捕作家和戏剧家的全部剧作。

电影界同样受到肆意干涉。1935年停拍报废的影片有34部，1936年有55部。1937年，虽然拍片数量锐减，但还是又停拍了13部。在那几年里，有20部影片是在上映后被禁止的。这样，尽管我国有许多制片厂，但电影界在战后时期每年拍出的故事片还不到10部。那时斯大林特别鼓励拍摄传记片，不是革命家的传记，而是俄国沙皇、帝王、大公和军事将领的传记。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曾准备拍摄关于彼得大帝、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苏沃罗夫、伊凡雷帝、库图佐夫和乌沙科夫等人的新的彩色影片。而且斯大林亲自审阅脚本，甚至指定导演。

1063

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米·罗姆后来回忆此事时正确地指出："我国的传记影片弄得声誉扫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出了不少按

① 见《文学遗产》杂志第74期莫斯科1965年第31页。

照一个公式摄制的官方的影片，而这个公式是在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上危害极大的个人迷信时期形成的。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许多战后摄制的历史传记片的统一标准是什么吧。英雄人物一定高踞于人民之上，必须是脱离时间空间的特殊人物。人民在影片中只是由先知先觉英雄率领的天真的'群氓'。这样处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好反映出由个人迷信引起的错误和谬见。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影片《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实际上没有人民，只有毫无个性的群众。这一使法西斯军队遭受致命打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战役，被描绘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个人之间的决斗。而亲身参加了空前残酷、长达数月之久的战役的苏联士兵，在这部影片中却被人遗忘了。由于这样处理，高踞人民之上的英雄，无论是将领、学者或者艺术家，不言而喻，就都应当描绘成为某种理想人物，没有任何普通人的缺点，因而也没有性格 1064 特征，因为性格是在各种矛盾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电影中的传记体，尽是冠冕堂皇、平淡无味、死死板板、实际上歪曲历史发展的不真实的影片。里面的主人公彼此相似得令人难堪，这些人物都经过一番乔装打扮，都是脱离自己时代，被置于远离真实生活的人为的条件之中。"①

亚·多夫任科的作品也受到怀有偏见的责骂。大家知道，他在战后写了一部电影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斯大林看了之后，既不准许出版，也不准许拍片。根据现在保存的文件看来，当时在"最上层"和他有过一次如下的谈话：

"'您写的是退却。可是我并没退却过，'斯大林说。

'您是民族主义者，'贝利亚说。

'对，'斯大林表示赞同，而且补充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您侮辱了波格丹·赫米利尼茨基，歪曲了现实。'

'您没有表现出主要的东西，'贝利亚一语道破。

---

① 《真理报》1962年4月17日。

'应该惩罚您!'斯大林下了结论。"①

尽管碰到这种可怕的指责和更加可怕的威胁，多夫任科的观点丝毫也没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即使您是神，我也不会相信您的话，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受到谴责和冷遇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一个人对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对它的命运、幸福、尊严和福利，都没有势不两立的仇恨，没有蔑视和恶意的话，那么他对本民族的爱难道能算是民族主义吗？

也许这种民族主义就表现在不肯容忍官僚干部和冷漠的事务主义者的愚昧无知，或者表现在艺术家不能在人民悲痛时忍住自己的泪水吧？……

1065

然而我可以原谅您。因为我是人民的一部分。我毕竟比您的份量大。

我十分渺小，所以也原谅您的渺小和罪过，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向您顶礼膜拜，您也不是完美无缺的。"②

由此可见，И·祖扎涅克说得有道理："也不问人们的意见如何，就事先替他们作出决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懂得什么……在个人迷信时期，为了适应广大读者需要而提倡的那种'群众性的'文化，往往使群众思想中创造性的积极因素失去锋芒，使健康的批判精神化为乌有，而一旦没有这种精神，社会主义便不能发展。说来奇怪，但就作用而言，这却是一种'上层社会的'文化，目的在于使人坚信，似乎人们就是官吏或评论家的官僚头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而这些官吏或评论家们常常脱离问题百出的真实生活甚远，却有着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现成的、刻板的公式和药方。"③

让外行人，而且常常是同艺术毫不相干的人干涉我们的文学

---

① С. 普拉钦达：《亚历山大·多夫任科》基辅 1964 版第 238 页。

② Ю. 巴拉巴什：《可贵的真理》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124—125 页。

③ И. 祖扎涅克：《文化与群众》，见《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1965 年第 7 期第 44 页。

艺术，这是造成种种不幸的根源。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的美学水平也不高，美学本来应该促使作家和艺术工作者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悉心帮助培养优秀人才，对文艺作品进行内行的、有说服力的评论。苏联美学思想在个人迷信时代的衰落，可以用文学理论和文艺评论的例子来说明。A·麦特钦科在1956年就曾说过，我们的评论界把马列主义美学的所有成就完全归功于一人，因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作了不正确的阐述，结果不久就把这些原则变成了一堆指示和僵死的教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如何如何”这种表达方式已为人们司空见惯。这些作法的必然结果就是硬说社会主义美学具有一种规范的性质。只准表现好与优秀之间矛盾的“无冲突论”、提倡描写并非来自生活然而合乎某些理性准则的人物的“理想人物论”，这些都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达方式：要把生活和艺术中同斯大林名字有联系的一切都奉为“永恒的真理”，而加以绝对化。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受到重大的损失，使它遭到墨守陈规、停滞不前的危险。①

1066

十月革命后最初10年在我国文艺学中产生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艺术观，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得到发展的。结果，许多有才华的苏联作家的创作被一概骂倒（例如谢·叶赛宁的作品）。象“拉普”、“铁匠炉”、“文艺左翼战线”、“谢拉皮翁兄弟”、“山峰派”这些二十年代文艺团体的创作活动，都被全盘否定。提起这些团体和流派时照例是只讲错误，不准讲成就的。

从三十年代起，文艺界一个接一个地开展了大张旗鼓的批判运动。在那些年月里谁没受过批判！曾经无情地批判过“迈耶尔赫里德思潮”，批判过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形式主义”。1936年2月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大反艺术家冯维辛，一个月之后又发表了《论拙劣的画家》一文，大反儿童读物的插图画家。即便这些文章中有一些正确的意见，那也是用令人无法忍受的侮辱性词句表达

---

① 《新世界》杂志1956年第12期第233页。

的。

这种批判运动在战后时期开展得更加广泛。上文曾经提到《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安·亚·日丹诺夫报告。苏联的主要作曲家都遭到了不加分析、怀有偏见的批判。1948年开展的运动，后果尤为严重，那次运动起初只是批判几个戏剧评论家，后来却一转而为迫害"世界主义者"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康·西蒙诺夫谈及此次运动开始的一段话，1948—1949年他自己在这次运动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1067

"由于个人迷信盛行，评论界照例总是呼吁粉饰生活，缓和生活中矛盾的尖锐性，这就使我国戏剧界（以及电影界）的处境特别困难。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多数戏剧家未能采取坚定的思想立场，未能在自己的剧中提出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而又毫不回避其严肃性、尖锐性和复杂性。正因如此，剧院舞台上才接连上演那些意义肤浅、一帆风顺的话剧。

……不错，有些评论家也曾小心翼翼地批评过我们话剧的弱点，对这种弱点我们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会几乎一致地提出尖锐得多的批评……那些评论家谈到话剧的实际缺陷和弱点，说那些话剧表面上写的是当代重大题材，但实质上却无视人民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冲突的尖锐性和各种困难的现实性。在那种条件下应该怎么办呢？……不言而喻，要把其中一切绝对正确的东西也检查一番，要彻底解剖我国戏剧弱点产生的原因，并在严肃批评缺点的基础上把它扶起来。然而，我们感到羞愧的是，当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1948年底举行的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那些指出我国戏剧实际弱点的评论家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会上使用的是自欺欺人、蛊惑煽动的手法，以便给人造成一种某些评论家站'错'立场的印象。而主要的手法则是把对某个剧中人物的批评，统统说成针对整个苏联社会的。那次会议的开法本身就对我国戏剧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事隔不久，《真理报》上刊

登了《一个卖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集团》一文，使情况更加恶化了。 1068
这篇文章主要是片面地强调了苏联文学的任务，说它主要并且首先是应该歌颂我们的成就和成绩。在列举苏联文学应该对什么感到鼓舞、应该写什么时，责备它连'斗争'的字眼儿都没有使用过。

……这篇文章中发表的关于文艺批评的观点，势必使文学回避对生活阴暗面的批评，而使评论回避对文学里面的弱点的批评。还有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遗害无穷的错误），凡批评我国戏剧不完美的人都被斥为卖国主义，几乎被指控为自觉地、有预谋地进行危害苏联文学的集团活动。这篇文章所发表的观点和见解给文学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而主张发表这篇文章的，文艺界都很清楚，正是斯大林本人。"①

我国各种创作协会的成员在个人迷信时代所受到的巨大压力，不能不影响到文艺作品的内容。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作品题材的片面性。大家知道，三十年代产生的优秀作品大部分是以内战为题材的，广而言之，是写苏维埃政权头十年的。四十年代的优秀文艺作品是写伟大祖国战争题材的。我国生活中许许多多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全都处于文艺之外。

许多文艺作品都故意精选特别美好的事例，或者粉饰现实，讳言缺点。常常把理想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 1069

这种粉饰现实的作法，特别明显地出现在描写集体农庄的作品中。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得对："那时小说是在天真地（不必说得太尖锐）粉饰集体农庄的生活，是在设计一些比较简单、早已一再证明没有问题的情节结构，以使把排除复杂性、矛盾性和实际（而非虚构的）困难的现实生活牵强附会地安排进去。"② 这类作品中最典型的是曾获一等斯大林奖金的谢·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金星英雄》。那个时期的绘画、戏剧和电影（如《库班之歌》等）也都是从事粉饰苏联农村生活的事。

---

① 《新世界》杂志1956年第12期第249—251页。

② 同上第1期第6页。

为斯大林个人歌功颂德的作品也出现了。在斯大林六十岁寿辰和七十岁寿辰时，我国报刊上以“民间创作”为名，发表了许多长篇的冒牌的民间诗歌。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产生了追求美观、豪华、冰冷的庄严的倾向。徒有其表的富丽堂皇、毫不实用的装饰，在建筑上也占了上风。

有许多一向反映现代题材的作家和艺术家，为形势所迫转而去发掘历史题材，而且往往是很古的历史题材。有些作家丢下现代的苏联生活，转而去写国际问题，但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缺乏专门知识。西蒙诺夫回忆道："不能说我们的文学对我国战后生活的描写完全不真实，但是它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半真实的，而半真实是艺术所反对的……我们许多人太容易同意在自己作品中把战后生活写得轻松些，我们许多人过于轻率地服从于要使文学高于生活的‘善良愿望’，以为这样作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利益的。我们许多人太无原则地同意了浮光掠影地反映生活，似乎是没有写谎言，但是回避了真正的、严酷的真实。在多数情况下，这倒不是作家不诚实的表现，因为归根到底，许多作家都真心实意地相信过：在严酷的环境中抒写艰难困苦的真实情况是不合时宜的，将来，当这些真实情况成为过去时，还可以回过头来抒写它，可以事后去补记它。"①

1070

遗憾的是，这些话只说对了一部分。而事实毕竟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同历史一样）不只限于反映一半真实情况，而且常常简直是歪曲和伪造事实，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的。比如，只要回忆一下 O·马利采夫那本轰动一时的书《南斯拉夫的悲剧》就够了，书中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描写成了间谍和叛徒。历史小说也经常歪曲和伪造事实。例如，B·科斯蒂廖夫的三部曲《伊凡雷帝》中所描绘的伊凡四世，不仅是个公正贤明的国君，而且对百姓也和蔼可亲。作者写到这位沙皇处死犯人和滥施淫威时，不但为

① 《新世界》杂志1956年第12期第241—242页。

他的一切行为辩护，甚至还寄予同情："……圣上很为难哪！"同样，科斯蒂廖夫认为马柳塔·斯库拉托夫那个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为人"稳重，干练，是处理国事不徇私情的臣仆，热烈支持中小贵族的人"。还说马柳塔怀着"一颗人的心，俄罗斯的心"，"格里戈里·卢基亚内奇用自己的生和死，作出了热爱祖国的典范"。这种伪造历史事实的作法，还见于В·亚兹维茨基的五卷小说《伊凡三世——全俄罗斯的君主》以及许多其他写历史题材的书中、话剧中和影片中。

在写革命史的作品中，为了表现对斯大林的迷信而伪造事实的例子尤其多（譬如阿·托尔斯泰的小说《粮食》①、影片《宣誓》、《难忘的一九一九年》等等，等等）。 1071

影片《伟大的公民》里的事件也是按照1936—1938年诉讼案的精神来叙述的。连《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这样的影片，也未能避免极其严重地歪曲历史事实。演员Б·舒金和导演米·罗姆在这些影片中成功地表现了列宁的形象。然而列宁每到一处，身边总是跟着斯大林，作为他的第一顾问和战友。至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列宁那时的其他战友，即使在1918年的条件下，也被描写成资产阶级侦察机关的特务，妄图勾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列宁。

连瓦·阿扎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的书也有不少歪曲事实之处。阿扎耶夫在其作品中故意不提那些向库页岛铺设输油管的工人肯定几乎全是囚犯。可见，工地上的所有领导人同时又是各远东集中营的领导人。同样，在所有写共青城的书里，也只字不提参加建城劳动的几万名囚犯，而他们负担的常常是最繁重的劳动。

还必须指出的是，文艺领域中这些不健康的、危险的现象，有许多还传到了人民民主国家。那里的文艺风格也日益贫乏、单一，

① 亦译《面包》，据以改编的电影叫作《保卫察里津》。——译者

出现了大量灰色的枯燥无味的作品。有些评论家以通俗易懂相号召，开始践踏和诽谤优秀的作品。譬如，德国伟大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到严厉的不公正的批判。文化战线上某些目光短浅、孤陋寡闻的领导人，不去提高人民的文化修养，不去培养人民鉴赏艺术的能力，而是极力用一些简单化的标准去套艺术创作。

1072

在战后年代里，国际上更加孤立苏联文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苏联人则很少了解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期的发展情况。在反对世界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借口下，我国文学界鄙夷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譬如，1949年我国报刊上，把伟大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海明威说成"丧失良心的势利小人"，把著名的反法西斯作家里昂·费赫特凡格尔称为"文学贩子"，把辛克莱斥为"肮脏的灵魂"。

还要指出的是，在个人迷信时期，各种创作协会和社团的工作也把民主原则抛在一边了。比如，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不再召开，作协理事会不再进行改选。因此毫不奇怪，在此期间，无论文学，还是绘画、建筑、电影、戏剧和音乐，都日益明显地出现垄断艺术的倾向，使那些不讲原则的立法者与管理者集团受到重用和提拔。

第十五章

1073

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一、关于违犯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民主及强化官僚主义制度的问题

我们已经谈过关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半期在我们党和国家机构的许多环节中已发生的那些蜕变的危险过程。当然，三十年代的大镇压丝毫也没有削弱这些过程，相反，它们却给予已经是很有限的苏维埃民主制以新的十分沉重的打击。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苏联社会生活中削弱民主制原则的事实。例如，工会的作用急剧降低了，而按列宁的思想，工会是为了对付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保护劳动人民的。列宁在反对工会国家化的论点时写到："我们现实的国家是这样的，整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保卫自己必须反对它。"同时，列宁还指出："从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来说，从采取这一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说，""工会不能失去非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一个基础。"① 列宁设想，在十五至二十年内工会将肩负管理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责任。然 1074 而，这一设想并没有实现。斯大林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采用工人自治的办法；在个人迷信时期，工会实际上被国家化了，它变成为党和经济部门的简单附属品。工会几乎不去在实际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91页。

中研究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去研究我国生活的实际工资，不制订最低生活费，没有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而进行认真的斗争。工会几乎不参与决定重大的国家问题，只是解决细小的生活问题，而按列宁的思想，这本是这些群众组织的基本任务，因为它们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在这方面最说明问题的，是从 1932 年到 1947 年的十五年期间内，全苏工会代表大会甚至没有召开过。

必须特别提及的是：在个人迷信年代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削弱问题，苏维埃政权是列宁发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尽管斯大林把作为国家政权机构的苏维埃保存下来，然而这些组织实际上陷于昏睡状态或者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① 确实如此，尽管斯大林多次谈到要求苏维埃的工作活跃起来，但是在二十年代后半期，苏维埃机关在中央和地方的影响已经不断在削弱。苏维埃由人民政权机关逐渐变为党委会的简单附属品，变为实现党机关指示的默默的执行者。

1936 年的宪法丝毫没有使已经被削弱的苏维埃机构作用和职权范围的过程缓和下来。诚然，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选举从形式上似乎更加民主了。如果说过去选举地方苏维埃代表是采用公开投票方式，直接根据工人、职员和军人的人数在他们所在的企业、机关、学校和部队进行的话，那么现在是在地区和地段进行了。本地区或地段的所有成年人本着秘密投票的原则参加选举。如果说从前选民直接选举的只是地方苏维埃代表，而地方代表顺次选举高一级苏维埃代表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多层选举办法被直接选举所代替。这个或那个选区或选段的居民直接选举地方苏维埃代表、市苏维埃、州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然而在我们现实的条件下，这种选举制实际上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进步只是表现在从公开选举过渡到秘密投票。）

1075

①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1963 年第 5 期第 60 页。

新选举制削弱了苏维埃机构同企业、学校和机关的相互联系。企业和机关失掉了对苏维埃机构成员和工作的有效地影响和监督其工作的可能性。选民和代表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明显地削弱了。选民对这个或那个代表的活动进行监督、并且在必要时把他从苏维埃政权机关撤回，现在是更加困难了。如果说从前当选举公开地在实现这种权利的企业和机关里进行时，选民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了解去讨论这个或那个苏维埃代表的优缺点，并能够选出确实有能力的优秀分子的话，那么现在选民们参加选举时实际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选票上总是只有一个候选人。

所有这一切降低了代表们在自己选民面前的责任心。同时，也降低了选民们的责任心，因为许多选民在选举之后，很快就忘记了他们投了谁的票。各级苏维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赖也削弱了。如果说从前地方苏维埃通过选举更高一级苏维埃可以监督后者的工作，那么现在下级苏维埃丧失了监督更高一级苏维埃工作的任何可能性，现在只是下级依赖于上级。 *1076*

虽然在新选举制度下，有不少代表，其中有工农代表被选到苏维埃机构中去，但是这些苏维埃机构的活动逐渐被它们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所代替，而执委会基本上只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很少考虑到地方的主动精神。定期召开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制度也被破坏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基本上只是为了批准它的主席团提出来的预算和指令才召开会议。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讨论和批准预算通常是在预算年度开始几个月之后，因此，在多数情形下这只是走走形式罢了。立法的各种提案都是来自执行机构或往往出自联共(布)中央，而不是来自最高苏维埃代表。提供给最高苏维埃讨论的法律草案，几乎从来没有经过实质性的讨论，代表们从来没有批评过这些法律草案，尽管许多法律也只是根据执行结构的建议，不久又被废除了。

其实，在这些年代里，最严重的破坏民主制之事不仅触及了整个苏维埃机构系统，而且也触及了整个党机构系统。

上面我们已谈到斯大林对作为集体领导机构的联共（布）中央的权力和特权的藐视。

在地方、州、加盟共和国、区也都同时停止召开相应的党委会的代表会议。一切问题都由政治局或第一书记和其他干部独自解决。除了党的基层组织外，其它各级党组织在进行某个党机构选1077 举时，对候选人不进行任何讨论。州委和区委执行局的书记和成员实际上是被任命的，是从“上面”委派的，此时，谁也不会想到去征求普通党员的意见。所以，毫不奇怪，任何被任命的党的领导人都认为，他只是对上边负责，而用不着对下面负责。他们中间许多人逐渐变成了单纯地执行上级指示的官僚。

这样，在形式上保持党和国家领导的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我国产生了某种官僚主义制度，它与宗教的教阶制度或共济会的分会制度相类似。这种教阶制度的每一等级不仅有着复杂的特权变化，而且享有得到更多的情报的特权。政权机构和整个国家的全部情报严格分成各个等级：报纸得到的数量很少，地区委员会书记能知道的数量多得多，而州委书记、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等所知道的就更多了。上层工作人员比下层工作人员的区别与其说是在才能和水平方面，还不如说是在他们了解秘密的程度和情报的数量方面。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对斯大林的“主要的”个人迷信同对某一个州委书记的个人迷信有巨大的原则区别：即“上帝”只是斯大林一个人。

弗·哥穆尔卡于1956年10月20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里公正的指出：“个人迷信不能单纯只归结为对斯大林个人。个人迷信是统治苏联的一定的制度，可以说这个制度也被移至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土壤上……其实质在于建立了各种迷信的教阶制度。每一种迷信都控制了一定的活动领域。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站在这个迷信教阶顶峰的是斯大林。站在下层的全体人民都俯首于斯大林之前。俯首贴耳地站在1078 他面前的不仅包括苏联党的领导人和苏联国家领导人，而且也包

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在个人迷信阶梯中占第二位。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披上绝对正确和英明的僧侣外衣。但是对他们的迷信仅仅在自己国家领土上起作用，在这里他们是站在个人迷信制度的民族阶梯的顶峰。这一迷信也许可以称为借用发光天体的反光，就象月亮发出的光一样。尽管如此，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是万能的。就是这样，在每个国家里从上到下建立了个人迷信的教阶制度。被迷信的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在自己活动的领土上决定一切，领导一切。不管他个人的知识、才能和品质如何，他一定是最有智慧的人。

如果迷信外衣披在具有理智和谦逊的人的身上，那么还不是大灾大祸。这样的人穿上这套衣服通常感到很不舒服。可以说，他感到羞愧、而且并不愿意穿它，但却不能完全摆脱它。这是因为党组织的任何领导人不可能按正常秩序进行工作，即使他想和整个领导机关一起实行集体领导，因为在个人迷信的政治制度下没有可能创造这样工作的条件。

当个人迷信大权被一个愚蠢的，笨拙的执行者或彻头彻尾的个人野心家所篡夺，事情就更糟，甚至会发展到极坏的程度。这些人是无意识地但却是很准确无误地在埋葬社会主义。在个人迷信制度条件下全党只能在服从那个主要迷信的范围内进行独立活动。如果有人试图超越出这个范围，那么他会遭到他的同志们的诅咒。如果事情牵涉到全党，那么这个党会遭到其它共产党的诅咒……

个人迷信制度也形成了人们的思想，党的活动家和普通党员的思想方法……这一制度践踏了民主原则和法制。在这个制度下，人的性格和良心遭到破坏，人们受到践踏，他们的人格受到唾弃。诽谤、流言、两面三刀，甚至挑拨离间都成为篡权的工具…… 1079 恐惧和道德堕落泛滥起来。在个人迷信的土壤上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它们破坏了人民政权的最深刻的含义，直至把它一笔勾销为止。"①

弗·伊·列宁说过："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自觉性。""当群众一切都了解，对一切都有判断能力并自觉地行动"时，国家才有力量。当然，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性不是本来固有的，它只能是对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有目的的教育的结果。正是共产党和他的领袖们必须对群众进行自主精神、责任心、自觉纪律、民主主义和爱好自由，憎恶不公正和专断的教育。而我们的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包括三十——四十年代时期。如果认为我们的宣传在这些年代只是颂扬斯大林并掩盖他的罪行，那么这是不正确的。不是这样，情况是复杂得多、矛盾也多得多。党不可能揭露和斯大林的违法行为及专横有关的事实真相，但是它用另一种事例和方法对苏联人民和苏联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为实现这一目的，它利用了国内外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教育是以斯大林的形象，确切些说是以虚构的斯大林的神话为例的。这是因为宣传机关给苏联人民描写的斯大林形象，不是他的实实在在的形象，不是描写他实际具有的那些品质。它们虚构了一个具备无产阶级领袖的各种优点的人的理想化形象。党告诉我们：斯大林不仅是才智过人、无所不知，而且说他如何热爱人民，热爱一切被压迫者。斯大林被描写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保卫者，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不倦的战士，诸如此类。列宁主义思想，虽然是以简单化形式，但已深入到我国的各个角落。人民的总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从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提高。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对小资产阶级群众发生了影响，共产党的威信和影响也增长了。因此在个人迷信的年代里，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积极性在一定的限度上和在某些方面有所提高，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苏联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里，在基本上是健康的过程中对人民群众的另外一种非无产阶级教育的过程也同时在积极地进行着，这就是用盲目崇拜领袖的权威，而首先是盲目崇拜斯

1080

① 弗·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华沙1956年版第39—41页。

大林的权威的精神进行教育人民。在人民中培植盲目的纪律和无条件服从最高当局的精神。

斯大林不相信群众并蔑视人民。他是工人政党的成员，但是他不尊重工人。当谈及来自工人阶层的人时，他蔑视地说：这人是"从机床低下爬出来的！"意思是说：他来这里凑合什么？！

在个人迷信年代，无论人民，还是党都没有真正被吸收参加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制和制订工作，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甚至连党和国家机构的多数工作人员也不能参与。这样一来，个人迷信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在劳动人民和党员当中培植和灌输了政治上的消极情绪。

对党的领袖的活动，首先对斯大林本人的任何批评无论在哪一级都是完全不允许的。从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一切指示都永远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必不可少的。斯大林多次谈到来自下面的批评的必要性及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他也谈过：批评和威信这两个概念是并行不悖的。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根据这些言论来行动。因此，当事情涉及多数领导干部，首先是斯大林本人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从来没有付诸实施。这种使"领袖们"和批评隔绝起来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和党内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局面。不过，对这种局面的危险性斯大林本人也作了很恰当地描述，但是他在这时也同往常一样，言论和行动是背道而驰的。 1081

斯大林在1928年说："领袖上升的时候逐渐离开群众，而群众开始从下面向上望他们，不敢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领袖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袖的某种危险。这种危险会使领袖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显然，除了党遭到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①

* *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9页。

我们在上面已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无产阶级国家发生官僚主义蜕化的可能，并设想用两种相当有效的方法防止这一蜕变。正如恩格斯所写的，“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规定权限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①

1082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个人迷信年代里无论是自由民主选举权力，无论是召回一切当权派的权力都变成为虚假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事实上，这一权利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结构里没有任何方式、任何组织、任何政治制度能够为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力提供可靠的保证。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推荐的限制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当权人物薪俸的方法也只是防止蜕变的很微弱的保证。

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宣布自己在工资方面的观点和政策。根据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盲目抄袭巴黎公社在这方面的一切措施。人民委员会议命令规定，辅助工人的最低工资每月120卢布，而1917年规定的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每月工资为600卢布。这样一来，工人的最低工资与领导人的最高工资之间的比例被定为1∶5。

当然，在残酷的内战条件下，在战后的破坏和饥饿及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职工的名义工资或实际工资在1917年后变化极大。由于物价大幅度上涨和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大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28页。

都明显下降到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平之下。职工不得不长期地忍受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他们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但是他们懂得这种牺牲是必须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自觉的经受了这一牺牲。

另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里存在着吸收大量专家，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服务的问题。要实现这一点只用强制手段是不够的。因此，无产阶级政权不得不同意为这些专家规定按当时条件是相当高的工资待遇。 1083

但是，不久这一问题也涉及共产党党员及担任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的干部，这时列宁提出照顾他们的健康、饮食、生活方面的安排，但也提出要求不能过分。党员的工资一直受到一定限制，列宁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党的领导人都不允许有任何多余的享受和任何奢侈生活。

列宁对劳动人民和领导者在苏维埃国家条件下的工资比例问题总是给予很充分注意的。列宁早在 1918 年 3 月在《党纲草案草稿》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不断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为了过渡到使用最高的技术，为了节约劳动和产品，为了把工作日逐渐缩短到每昼夜六小时，为了逐步拉平各行业间的一切报酬，必须在国内各个不同的（所有的）生产消费公社之间组织竞赛。"①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公开宣布，对部分专家的高额"酬劳"金是暂时的现象，这是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原则后退一步的表现。列宁承认，"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要影响到苏维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143—144 页。

② 同上第 227 页。

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①

总的来说，在我们分析列宁关于工资问题的全部论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始终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过高的报酬，特别是对于党员。当然，列宁也赞成不断地和不懈地去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列宁的这一政策后来在所谓的最高限额中得到了体现——即对全体共产党员规定了固定的工资最高限额。可以例举列宁在世时，党关于党员物质供应问题的一些决议。

1084

例如，1920 年 9 月 22—25 日举行的俄共（布）全俄第九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指出：“由于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初期处境极端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在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建立若干‘重点’（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集团。这是必然的，因为当时如果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主管部门和这些工作人员集团，就不能拯救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不这样，全世界的联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者就无疑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但是，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难以克服的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习惯和情绪，上述情况就使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进一步实现平等——首先是在党内，其次是在无产阶级内部以及一切劳动群众内部，最后是在各个主管部门和各个工作人员集团之间，特别是在‘专家’和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党只能按党员的觉悟、忠诚、坚定、政治上的成熟、革命的经验和自我牺牲的决心的程度来区别党员，而根本反对按任何其他标志（上级和下级、知识分子和工人、民族标志，等等）来区别党员。”②本决议中还有这样的条款：“18. 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生活条件方面、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些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为此应成立一个专

1085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229 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 分册第 37—38 页。

门委员会，由俄共莫斯科组织、俄共彼得格勒组织、粮食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各派代表一人组成。”①

1922年春季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又重提这一问题并认为急需“坚决制止不同级别的党员间发生的工资上的巨大差距”，并同时指出“由于试图利用新经济政策而在党内培植资产阶级习性”是危险的。

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全党组织及全体党员发出专门通报，声明将同党员的非份内享受及有罪的滥用职权进行斗争。通报中指出：

“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必须注意到有人把国家资金用来布置自己的住宅……相当部分国家资金花费在布置机关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这使我们的苏维埃机关脱离了工农群众……非预算内的国家资金花费在布置个别干部的别墅上面……各种实物供应应该缩减，并应力求完全取消这种供给，党更应严格禁止给党员发所谓的奖金，这些奖金现在由粮食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会和其它组织发放。负责干部的必要生活水平应由较高的工资来保证，并应受到适当的财会监督……这一斗争必须击退和谴责拉私人关系和包庇自家人等不正之风。这一斗争必须把党从新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带来的不良影响及各种自私目的里面洗刷干净。”②

1086

众所周知，在几乎整个二十年代期间，规定党员最高工资额制度基本上坚持下来了。但是在二十年代末期及三十年代初期，这一制度从两个方面开始受到破坏。第一，由于农业和工业中的困难，大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开始显著降低。有名无实工资的微小的增加赶不上当时的物价和生活费用飞快增长。对大多数职工来说，实际工资不能保证正常的最低生活水平。但是一小部分高级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分册第43页。

② 通报第58号1923年10月19日。

国家干部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生活费用和物价上涨对他们的实际工资没有多大影响。这是因为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整套各级内部商店、配售站和内部餐厅，在这里用正常价格可以买到全部主要食品和商品。高级干部享有的其它各种特权的制度也逐渐出现了——如内部医院、免费休养所、别墅等等。所以毫不奇怪，对这部分干部来说，名义工资提高，和多数劳动者不同也意味着实际工资的提高。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用某种形式收买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现象的萌芽。我们指的是节日、代表大会和会议期间赠送贵重礼品和包裹的制度。1932 年 2 月 8 日，党员工资最高限额被正式废除了，这就使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进一步增加了。

这种不健康的趋势后来还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国内经济形势虽然开始稳定，使配给制度在 1935 年被取消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逐渐提高了，但是这并未引起高级职员各种特权的减缩。相反，随着国家条件的改善，赠送礼品和特权的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市苏维埃以上的所有领导人制订了代表补助金制度。其实，国家和党高级干部的工资本身已经比职工的工资提得快得多。许多负责干部通过兼职制度找到更快地增加工资的可能性，此制度规定：允许一个人兼任几个领取全报酬的职务。这样一来，列宁所规定的普通工人和最高职员之间工资的最佳比例为 1∶5，实际上在战前就被破坏了。在战时和战后，工人的中等工资和负责干部工资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了。在这期间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又缩减了，与此同时比较负责的干部的工资还在继续增长。正是在这一期间，在我们最高的国家和党的机关里开始实行起可耻的“大信封”制度，这实际上是斯大林规定的收买负责干部的制度。这就是几乎所有负责干部每月都要收到装有许多钞票的大信封，这些钞票的数量往往大大超过这个或那个干部每月的工资。特别突出的是这些钱是通过特殊的财政渠道发到各个机关，不必向国家纳税，在大多数情况下发放这笔钱对机关普通工作人员是保密的。此时，

最高和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达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完全不能允许的规模。如果不只是计算直接的货币收入，而且把这些或那些 1088 干部的全部工作领取的报酬计算在内，那么对许多最高级的干部来说，这比例是 1∶40，1∶50，某些人甚至达到 1∶100。

至于政治局委员和斯大林本人，那么花在斯大林及这些人身上的费用在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中达到完全无法进行核算的程度。为了维持如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无产阶级领袖”的生活，维持他们大量的别墅和这些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大量服务人员，维持其办事机构及警卫人员，每年的开支达数百万卢布之多。而维持斯大林生活的费用每年达到几千万卢布。

在二十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国家领导人中间，是以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闻名的。这种禁欲主义的残余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到斯大林去世为止。例如，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俱，这里只有一个衣柜，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数量不多的书籍（主要是《列宁全集》和《百科全书》），普普通通的灯没有灯罩，还有一张床，斯大林就在这里休息和睡觉。但是斯大林的这个别墅就其整个规模来说是座巨大而复杂的单位，它具有数量众多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警卫的头头是伏拉西克将军。这不是斯大林的唯一别墅。在莫斯科郊区他还有一处别墅，但很少去那里，然而这个别墅里的服务和警卫工作如同斯大林常住这里一样地保持着。在索赤、苏胡米、新阿芬、利察湖畔以及更高的山上也花了大量金钱为斯大林盖了别墅。斯大林在克里木也有别墅，在古老的克里木宫殿中也为斯大林准备好了房屋。在四十年代末，诺弗格尔德附近的瓦尔戴湖旁也为斯大林建造了别墅。所有这些别墅整年都有大批高工资的人是在那里守护着。

据说，有一次斯大林要他的警卫长请伏拉西克将军计算一下，每年用于他个人的服务费用要花多少钱？伏拉西克很认真地对待 1089 交给他的这一委托，他在专家的帮助下经过精细的计算得出天文

学上使用的数字。甚至连斯大林本人不仅感到惊奇，而且大发雷霆。他对伏拉西克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说谎。"当时在场的贝利亚向斯大林证明伏拉西克的计算纯属胡言乱语，于是伏拉西克被解除了职务。我们不知道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但是如果这是属实的，我们敢肯定地说，熟知真实情况的不是贝利亚，而是伏拉西克。我们国家所承担的斯大林的服务费用比美国人民供给他们总统的费用要高得多。我们没有把握说，当年俄国人花在尼古拉二世身上的费用是否比花在斯大林身上的费用要高多少。

* * *

群众在政治上的消极情绪，国内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风气，党内及苏维埃机构体系中严重破坏民主制的现象，高工资和"大信封"——所有这一切在个人迷信年代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官僚主义者不单单是坐在办公室里从事某一工作的某一个国家官吏。官僚主义者是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脱离普通人利益和需要的特权官员。他们是对事物本质不感兴趣的心肠冷酷的形式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只是遵循某些已成为自我目的的形式。官僚主义者把自己命运和自己的乌纱帽总是置于事业利益之上的官吏。官僚主义者为了保持自己所长期占有的高工资的职务和地位，不仅去干那些明知是没有用处的事情，而且去干那些甚至对人民对国家有害的事情。个人野心、阿谀奉承、因循守旧及文牍主义——这是官僚主义不可避免的伙伴。不学无术，对文化成就的一无所知，感情上的迟钝和知识的局限性——根据叶·格涅金的公正的评价，这都是官僚主义者所具备的典型特征。①

1090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正是官僚主义成为滋养个人迷信的最肥沃的土壤。卡·马克思写道："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

---

① 叶·格涅金：《二十世纪的官僚主义》《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2期第199页。

终目的。……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事物总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持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①

缺乏有效监督，群众的消极情绪和官僚主义——这一切必然导致营私舞弊，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最可怕的形式。在个人迷信年代党的许多干部，经济和苏维埃机构的许多干部的受贿行为达到如此广泛的规模，并渗透进我们机构如此之深，以至于使党在斯大林去世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教育和强制措施都无助于解决问题。所以不得不采取反贪污斗争的极端措施，在1962年通过了一项命令，允许在个别情况下对受贿者判处死刑。

大家知道，列宁曾要求的惩处受贿者"不少于十年的监禁，外加十年强制劳动。"②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同受贿现象必须斗争并判处极刑。"③ 1091

在个人迷信年代，官僚主义和贪污不仅引起劳动者的不满，而且不能使群众觉悟到：即正是他们这些苏维埃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才是自己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工人和农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务的责任感减退了，然而人民的责任感是我们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精神因素。这样一来，对我们人民进行共产主义劳动教育，进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方面就发生了困难和形成了阻力。

另一方面，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要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01—302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81页。

③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441页。

道，官僚主义者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官僚主义者的地位和晋升完全取决于"上层"，取决于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一个州可能不喜欢也不尊重自己的第一书记，可是当他在"上层"面前还得宠时，这个州就得容忍他的"领导"。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没有多少远见的干部完全不考虑普通党员和人民的意见和情绪，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习惯于命令"下层"，而在自己领导面前却去阿谀奉承。评论家И·维诺格拉多夫在评论E·多罗什和B·奥维奇金的农村笔记时，公正地指出："任何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个人野心、犯罪的管理不善状态等等的根源就在于离开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这是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很自然，这两位作家对'波尔佐夫思想'①的坏习性和它的破坏活动的全部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真理。……如果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②知道，而且确实知道，今天他强迫把种子扔到泥地里的那些集体农庄庄员明天告诉他：'你滚蛋'，而他又确实不得不滚开的话，那么，我们想，他决不会想到用他自己的双手如此稳妥地给自己挖墓穴。"③

*　　*　　*

当然，在个人迷信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不全是官僚主义者和蜕化变质分子。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在1936—1938年间以及在后来的时期，我国的领导机构补充了不少新的有真才实学的、有献身精神的年轻的领导干部。到三十年代中期，我国已培养出一整代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积极、诚实和忠实的工作人员。我们党就从这些工作人员中补充了许多新干部。然而在个人迷信的变态的气氛中仍然没有必要的条件能够把那些我党最优秀的、最有才能的，最忠实于人民事业的工作人员提拔起来去领导我们的国家。在这艰难的时代，在许多情况下，领导的岗位是被那些残

① 指他们写的《农村笔记》中的主人公波尔佐夫的思想。——译者

② 波尔佐夫的名和父名。——译者

③ 《新世界》杂志1965年第7期第244页。

酷无情和毫无原则的人，被个人野心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所篡夺，因为他们更容易适应我国所形成的不正常的局面。正是在斯大林专政时期，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类型的领导干部，——他们遵守纪律和喜好权势；对人民及其疾苦漠不关心，但十分注意领导的意图；他们粗暴，不能容忍来自下面的批评；言行不一。这些人是没有感情的，远离群众的，他们甚至不善于和人民谈话，处理事情时首先用的不是说服方法，而是强迫、恐吓，专横等方法。

我们知道，列宁鼓励自己的战友具有独立思考，敢做敢为，敢于寻求真理的思想。所以他在自己周围培养了一批卓著的党的领导人。

现在我们称之为斯大林分子的人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A·美特钦科公正地指出："个人迷信歪曲了列宁的领导原则——唤醒和培养人民的创造精神，个人迷信压制了那些试图独立思考的人们的思想和意志。在捧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的同时，个人迷信阻挠了个性的真正发展，怂恿粗暴、蛮横不讲理、个人野心和多疑心理的泛滥。"[1] 确实如此，斯大林分子通常是个人野心家，骄傲自满和妄自尊大的人，这些品质在他们身上往往和政治上的动摇性及两面性结合起来。许多斯大林分子不仅追求表面上的宏伟和权力，而且在个人生活上追求表面上的奢侈豪华。这样，我们看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具备了很明显的小资产阶级蜕变的特点，这些"共产党员"无论从其生活方式还是物质待遇方面都已完全脱离了人民。

1093

一些西方理论家在观察了这些脱离人民的，身居高位的官僚化的斯大林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后，提出了一种理论，即我国在个人迷信年代产生了一个新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官员阶级。当然，这一理论是不正确的。尽管部分党和国家干部的蜕变程度已经很深了，但在我国，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出现一个新阶级的

① 《共产党人》杂志1964年第12期。

程度，但是造成这样的后果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到。这是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大林分子这不单单是个人迷信时代的经济的和党的领导人的一种类型，在斯大林专政和专横政治长期统治时期，在我国党政领导的上、中层，已经开始出现很明显的官僚寡头和等级的因素，一定部分的人已经开始认为自己享有的特权和领导的地位乃是他的权利，因此应该用一切方式去保护它。

斯大林去世之后，在我们的各种文艺作品中从多方面彻底揭露了这种斯大林式领导者的不光彩的面貌。大家知道，首先写这个主题的是作家弗·德·杜金采夫，他写了一本小说《不是单靠面包》。毫不奇怪，这是一本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问世的、并对我国舆论界产生极大影响的小说，而各种类型的斯大林分子对这本书是很仇视的。

1094

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评论杜金采夫小说时，公正地指出："小说《不是单靠面包》写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德罗兹多夫[①]式的庸人组成的新等级制度还存在着……他们这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近来我曾乘内燃机船'胜利号'到欧洲去旅行。坐二、三等舱的都是工人、工程师、演员、音乐家、作家，坐一等舱的则都是德罗兹多夫式的人物。毫无疑问，他们同二、三等舱的乘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接触。他们除了对自己的地位，对其它任何事情都抱敌对情绪，他们的愚昧无知是惊人的。他们对我国的威望和尊严的看法同我们是背道而驰的。德罗兹多夫式的人物之一站在名画'最后的审判'前面说：'这是对穆索里尼的审判吗？'他们中的另一个人，当他看到雅典古城堡时说：'无产阶级怎么能允许修建这样的城堡？'第三人在听谈论地中海水的独特的美丽色彩时说：'我们的海水难道比它不如吗？'这些凶恶的强盗、这些利欲熏心的人、无耻之徒和黑暗势力完全公开地，不知惧怕和羞耻地发表反犹太的

① 德罗兹多夫·列昂尼德·伊凡诺维奇是杜金采夫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的主人公，某联合工厂的厂长，后为某部技术管理局局长，被称之为斯大林式的领导干部，官僚主义者，专门会整人的阴谋家。——译者

讲话，象一些真正的希特勒分子那样。这是一批对一切都持无所谓态度的小经纪人……这些自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讲话的卑躬屈膝之徒和叛逆是从那里来的呢？是怎么会出现的呢？这是个人迷信的产物，客观形势培养出来的、教育了他们把人民看成是培育自己升官发财的肥料。他们的斗争方法是搞阴谋，造谣诽谤、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去消灭人，其结果是：今天，我们的会议大厅里已经没有了迈耶尔赫里德、巴别里和阿尔焦姆·维肖雷这样的人。他们是被德罗兹多夫分子消灭了。促使他们干出这些行为的原因是为了自己想过舒适的日子。杜金采夫是唯一揭露这些可怕行为的人……应该打击经纪主义，因为它可能导致亡国。这些德罗兹多夫分子的举止行为已变为日常生活中模式，他们发表敢于冒渎神圣事物的言论，说什么他们是为人民的福利而这样作的。谁给他们代表人民的权利？杜金采夫仅仅才开始他的战斗，而我们文学的任务是把这一战斗进行到底。” 1095

我们大家知道并且看到：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带来的新潮流把这些斯大林分子，德罗兹多夫式的人物和鲍尔佐夫式的人物被抛进了我们的政治和党的生活的垃圾堆。但是他们“还在自己的别墅里修剪着玫瑰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适应了新形势和新的条件。

一方面是官僚主义者的统治，另一方面是群众的政治上的消极性，这两者大概是个人迷信的最可怕的后果。当贝利亚在1953年准备进行政变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在莫斯科市内和已经向莫斯科市逼进的内务部的部队，而是多数人们的政治上的消极态度和已习惯于不干涉克里姆林宫事务的“遵守纪律”的官僚主义者们。

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

如果说在个人迷信年代思想和科学生活中牢固地培植了教条主义和食古不化精神，那么在党和国家生活中最可怕和最有害的

宗派主义在这些年代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

众所周知，宗派主义一向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常见、最危险的病症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就已开始同一些革命组织和个别革命者的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倾向作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列宁也坚决反对革命运动中的宗派关门主义和狭隘性。列宁在准备进行革命，准备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时，力图在我们党周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列宁这一明智的政策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正是列宁倡议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军事专家）为苏维埃国家服务。列宁从来没有追究过那些犯过错误，而后来公开承认了自己错误的同志。不仅如此，列宁尽力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清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对列宁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最后的政治立场问题。

1096

列宁在批评某些同志错误时，从来不忘记他们对革命的贡献。例如，列宁在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动摇性时，同时指出："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①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写信给普列汉诺夫说，俄国无产阶级记得他的巨大贡献并尊重他。在普列汉诺夫去世之后，列宁认为有必要指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②

甚至在同考茨基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时，列宁还没有忘记给考茨基早期著作以肯定的评价，说它们属于"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③。列宁写的悼念左派立宪党人П·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59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8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63页。

П·彼罗什扬的《悼念彼罗什扬同志》一文是一篇杰出的文献，按列宁的话，彼罗什扬“在 1918 年 7 月前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所做的事情比此后为破坏它所做的事情多得多。”①当时，列宁很了解，当他写悼念文章的时候，彼罗什扬因参加左派立宪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而被判处三年徒刑，他表示接受对他的惩罚，而他拿着假证件躲藏了起来，不久，病死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医院里。② 1097

列宁对党的干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尼·尼·纳科里亚科夫(又名纳扎尔·乌拉尔斯基)的态度也很说明问题。原来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纳科里亚科夫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及在国外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但是他在 1916 年转到护国主义立场上去了，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了俄国，开始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1919—1920 年期间纳科里亚科夫在邓尼金军队服务。但是他对白俄运动失望之后脱离了他们，后来在苏联的一个出版社工作。弗·伊·列宁特别注意纳科里亚科夫的政治上的变化，认为他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人员，1921年 11 月列宁委托自己的秘书约·纳科里亚科夫同他谈了话。在这次谈话之后，弗拉吉米尔·伊里奇还继续关切这位原布尔什维克的命运。1922 年 1 月 4 日列宁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写道："请您给我写几个字谈谈纳扎尔·乌拉尔斯基的情况。他安置好了没有？怎么安置的？安排在什么地方？他现在的政治情绪如何？总的说来最近是有所改变，还是依然如故"？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列宁说：弗拉吉米尔·伊里奇同纳科里亚科夫的谈话虽然对后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他的政治变化是相当缓慢的，纳科里亚科夫现在在中央供销合作社担任一个不大的职务。1922 年由于列宁的干与纳科里亚科夫被任命为文学出版社的社长。1925年他又重新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37卷第 384—385 页。

② 见《劳役和流放》杂志 1924 年第 2 期第 222—223 页。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54 卷第 107 页。

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和对待人们的态度则完全不同。

还在早期活动时，斯大林就表现出宗派主义的一些特征，他对人采取一概不相信的态度。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讲的那样，在内战年代他就违背了党明确规定的政策，不愿意去相信任何一个军事专家，轻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对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专家都持有对军事专家同样的态度，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这时都无辜地被镇压了。

斯大林从来不会忘记这些或那些党内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他不断地提起这些错误，迫使犯过错误或过失的人们多次在党面前表示悔改。斯大林不喜欢的许多同志从历史上被一笔勾销了或被他夺去了生命，这时他完全不去考虑他们的任何贡献。这时，这些人的全部活动被看成是由一连串的罪行和错误组成的。

不仅如此，三十年代末斯大林就限制了许许多多苏联人的权利，不管他们的具体表现如何，只凭完全随心所欲提出的和主观的标准。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的专制已经不受任何控制，使宗派主义成为党和国家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斯大林从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了的观点出发，用所谓"预防措施"的胡说伪装起来，实际上他把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完全不允许的原则付诸实施，这原则是：把全体苏联人民分为政治上可靠和不可靠的两种人。他只是口头上说什么儿子不能为父亲承担责任，党不能混淆警惕性和怀疑一切之间的界限，而在行动上则远离这些正确的原则。相当部分所谓"不可靠的人"不管其才能如何，实际上已被排斥在任何领导和负责岗位之外。这些人只能被分配到普通的工作岗位。正如一个聪明才力有限的州委书记声称的那样"党不需要什么有才干的人，它所需要的是忠实的人们"。

什么人被算成"不可靠的人"呢？（我们在这里且不谈原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国家里他们的数量相对地说已经不多了，对他们来说，一定的预防措施当然是必要的。）

归到这一范畴去的首先是1936—1938年及后来的年月被镇压了的“人民敌人”之子女及近亲，这些人的数目以百万计。其次，还有原富农和其它剥削阶级的子女，甚至孙辈，这些人的数目也以百万计。第三，那些国外有亲属关系的几百万苏联人也被归进不可靠的人的范畴之内。

战后，几乎所有曾被俘虏或遣散回国的人及其子女，近亲也都被归进政治上不能享有平等权利的人之类，他们的数目又是几百万人。在战争年代留在德占区的多数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享用各种机会的条件也受到了限制。这批人的数量又是有几千万。

与此同时，不能不指出，无论对斯大林或对他的亲信来说，这种宗派主义的作法并不是因为出自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纯洁性的关心。因为斯大林及其亲信把自己和他们称心的无数的人都作为不受限制的例外。在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我们可发现“人民敌人”的亲属，原反对派和原孟什维克等等。当时在挑选干部方面没有比内务人民委员部更为严格的机构。可是正是在这些机构里人民的异己分子最多，他们是些从前被开除过党籍，被判过刑和政治历史很成问题的人。这样，对斯大林分子来说，宗派主义只不过是他们篡权，保持自己权利及特权的手段之一罢了。

三、言行不一

个人迷信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最典型的和最可怕的特征之一就是言行不一。它是马列主义理论和斯大林实践发生明显矛盾的产物。 *1100*

屠格涅夫早就描写过一个老骗子，这个骗子提出过这样的所谓“英明”建议：他说“当你在干一件卑鄙的事情时，你要比谁都更大声地喊叫，说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是多么卑鄙。当你盗窃国库时，你要比谁都要大喊大叫说盗窃国库是多么卑贱。”

尼·马基雅弗利[①]也给统治者提过类似的建议，他说："公爵应该特别注意使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充满品德高尚的思想，使人们听见公爵说话和见到他的时候，都把公爵看成是贤明、忠诚、人道、直爽、笃信宗教的化身……每人都会看到你的外表，只有少数会感觉到你的真正的面貌，但这少数人不敢反对群众的意见，因为尊严的国家在保护他们。"

我们不知道，斯大林是否读过屠格涅夫和马基雅弗利这些话，但是他们所描写的这些恬不知耻的原则，他则是牢牢地掌握了的。

我们在本书的前几个章节里已谈过有关斯大林的厚颜无耻地玩弄两面派行为的大量事实，他几千次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完全是另一套。例如，他在讲集体领导的时候，往往是个人决定一切问题。他在讲巩固工农联盟的时候，自己却一向在破坏这个联盟。他在谈集体化自愿原则的时候，自己却往往批准违犯这原则的决定。正是斯大林在1932年批准了把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的整个集体农庄和甚至整个村镇迁到北方的决定。可是同时他又声称："不应该在农民中间寻找粮食收购工作发生困难的原因，而应该在我们自己中间，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间去寻找。因为我们执掌着政权，我们拥有国家的资财，我们负有领导集体农庄的使命，我们应当对农村工作负完全责任。"[②]正是斯大林宣称，人们可能使历史变善或变坏。可是与此同时，他却毫不客气地篡改了历史。斯大林曾无数次欺骗人民和党，可是他又假仁假义地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们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不怕真理，不怕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令人痛苦。"[③]斯大林拚命贬低列宁的时候，却说什么"我怎么能和列宁相比呢。"[④]斯大

1101

① Niccolo Mac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作家。——译者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08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页。

④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33页。

林在指控几万诚实的苏联人从事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的时候，自己却炮制并实行了反对我党和国家列宁领导核心的恶毒的阴谋。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单就这样一件事来说，即当通过按其正式规定的条文是更加民主的苏联新宪法的时候，苏联国内却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违法活动，是言行不一的最鲜明的例子。

斯大林在迫害知识分子的时候，说什么他在反对"马哈也夫思想"① 并称知识分子为苏维埃土地上的最优秀的人。斯大林在一次同作家的谈话中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务时说："写真实吧。"可是与此同时他却鼓励文学作品说谎话和美化现实。

斯大林在批准逮捕和枪杀成千上万的诚实的苏联公民的时候，在不动声色地看着全国被大规模恐怖席卷时，厚颜无耻地大讲要关心人才。他说："总归，要明白，世界上最珍贵的资本，最珍贵和决定性的是人，是干部。""要保护每一个有才干和明白事理的工作者，要保护和培养他。人才要百般精心地培育，正如园丁培育自己所喜爱的果树一样。" *1102*

口头上斯大林连"个人迷信"都反对。1932年当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请示他办一个反映斯大林生活和活动的文件展览时，他拒绝了。斯大林写道："我反对，是因为这样的事会导致'个人迷信'，而这是有害的和同党的精神格格不入的。"② 但几年之后，有几十个这类的展览在颂扬"现代最伟大的天才"的生活和活动。

斯大林在给沙土诺夫斯基的信中训斥道："您在谈自己对我的'忠诚'，这也许偶尔脱口而出的句子，也许……　但这如果不是偶尔脱口而出的句子，那么我建议您抛弃这种对个人忠诚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您要对工人阶级，它的党和它的国家忠诚，不要同对个人忠诚混淆起来，这是知识分子的空洞而无用的玩

---

① 马哈也夫思想是十九世纪末期，在俄国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波兰社会党人马哈伊斯基得名，这一思想的表现是：诽谤和咒骂革命知识分子，挑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关系。——译者

② 党中央档案馆马列研究院，资料（第558—1室第4572号文件第1页）。

意儿。"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1951年《斯大林全集》中。众所周知，正在是这个时期，每家报纸，每篇讲话中都正在讲对斯大林个人的忠诚，而且讲得多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斯大林深知人们的短处，最了解官僚主义者的心理特点，但他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部都始终坚持培植等级服从的作风。正是在个人迷信年代制订了各种有关等级的规定，而且升官每次都不仅伴随着权利的扩大和工资的提高，还有严格规定了的每一个等级的特权范围。在斯大林时代，不仅军队，而且铁路系统，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外交系统都有各自的制服和等级标志。大家知道，斯大林为自己发明了一种特殊官衔——"大元帅"。与此同时，他还声称："我根本就不喜欢崇拜名位等级的人。"①

1103

斯大林关于全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也发出过无数好的号召。例如，在1928年，他说："自我批评口号不能看做是一种暂时的、瞬息即逝的东西。自我批评是一种以革命发展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特殊方法，布尔什维克的方法。…… 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维主义执掌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揭露并消灭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自我批评只能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②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03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11—113页。

这显然是很漂亮的词句，在个人迷信时代这些话经常被引为经典，但谁也没有遵循过它，因为首先斯大林本人没有遵循它。

斯大林在反对砍杀的方法，反对党内的命令主义专横时，措辞又是多么激烈呀！斯大林给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信中写道："我坚决反对对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同志采取排斥政策。我反对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我怜惜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这种政策会在党内造成恐吓制度、威胁制度以及窒杀自我批评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制度。……如果对党的领袖害怕……，这并不好。"①

现在斯大林这类的言论已经不必要加什么注释，因为我们很了解——是谁在我们党内使用了砍杀方法和恐吓手段。 *1104*

在个人迷信时代言行不一的作风渗透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几乎所有的领域。老布尔什维克阿·弗·斯涅戈夫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公正地指出："斯大林学校是令人痛心的学校。他不仅消灭了诚实的人，而且带坏了活下来的人。他迫使人们完成阴暗的使命，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教会人们去扯谎。"② 确实如此，官方的宣传、出版、广播、文学、艺术都一起来美化现实，对我们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和矛盾，不公正和专横现象却避而不谈。各级领导都通过了不少好的决议，但谁也不想去实施它。言行不一不仅表现在做的和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也还表现在对我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收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讲。

斯大林自己说过："在言行不一的地方，在领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地方，工人不可能相信领袖。"确实如此，我国的劳动人民现在完全丧失了对斯大林的信任。只能认为遗憾的是：对斯大林的这个谴责和他得到的恶报来得太晚了，这些都发生在斯大林逝世之后。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0 页。

② 《全苏历史学家会议速记稿》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270 页。

1105

四、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意味着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公有制所代替。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改变人们同机器的关系，而且必须改变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正如过去最优秀的人物所设想的那样，社会主义应该是极人道的社会制度，它是为人们，为劳动者的幸福而建立的。

恩格斯早在1845年2月在谈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时指出："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①

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定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这样说，不仅没有剥削，而且对人、对人民的始终如一的关心和爱护，关怀他们的日常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真正民主，秩序和法制——这一切不能不成为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力图建立的正是这种社会。必须指出，苏联几百万人民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做出了不少的努力。革命后国家政权转到劳动者手里，工厂和制造厂交给了工人阶级，土地交给了农民。这是发展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牢固的经济基础。我国人民得到广泛的社会权力和自由，妇女得到同男人一样的权力，广大的群众获得受教育和提高文化的可能性，获得克服阶级和民族对抗矛盾的可能性。如果借口斯大林时代的畸形现象而否定十月革命的这些主要社会成就的话，这是不对的。我们很了解，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3页。

在越来越多的苏联的人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已经不是敌对、竞争和剥削关系，而是友谊和合作的关系。许多苏联人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无论在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期间都保持下来而且发展了。在战胜德日法西斯之后，人民民主国家也出现了真正社会主义关系的各种形式。这一事实是不能否定的。 1106

然而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至今为止在评价我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问题时，是站在极端片面的立场上的。他们讲的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其它前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的残余之间的斗争。而这虽然是重要方面，但并不是问题的唯一方面。

正如历史经验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远不是每一次都以自己公开和传统的外表出现的，就是在从前，它们也往往力图用某种漂亮的外表掩盖自己的真正内容。

这种社会变态的典型例子是1610年在巴拉圭由耶稣会建立的“基督教共和国”，后来这个共和国存在了150多年。众所周知，巴拉圭的耶稣会传教士把几万印第安人赶到为他们专门建立的村庄，并强迫他们在这里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他们在一切都被细致规定了的条件下，在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条件下，维持半饥饿状态的生存。印第安人在自己的村庄中如同兔子关在圈内一样。神父的意志对他们来说就是法律。一星期内四、五天是为“上帝”工作，只有两天是为自己工作。但是根据耶稣会的说法，他们所建立的这种监狱营房式的制度是“瓜拉尼人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共和国”，在那里似乎实现了平等幸福的理想。

大家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同公开反社会主义的论点和观点的经常斗争中发展自己的学说，而且他们的学说是同各种伪社会主义和伪共产主义学说和理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107

尤·费·卡里亚金在他的未发表的著作《同‘营房共产主义’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书中精辟地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伪共产主义论点。

卡里亚金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粗野的'、'原始的'、'本能的'、'平均主义的'、'未经考虑的'、'禁欲主义的'、'营房式的' 伪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不仅是以宗派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策略，而且是一整套观点的体系，这是特殊的世界观，其主要象征是 '关于某种最低限度的观点'，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尺度'。这种尺度把自己狭隘世界观作为创立世界的规律强加给世界，把自己最低限度这个天花板当成天。然后在这'天'上安插上自己的'太阳'，然后自己的上帝再爬到'天'上去，幸亏不需要爬得太高……这是把社会进步标准，把包括经济、政治、思想和道德标准总的共产主义标准极大降低下来。这是用主观的随心所欲的标准代替客观标准。否定个性——这是 '营房式共产主义' 的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点。这就是他的真正信条，这是他的目标和方法，这是他的理想和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

卡里亚金继续说道："……伪共产主义的典型特征——否定个性，产生着嫉妒心理和力图消灭差异，千篇一律和中庸之道，好战而愚昧无知和对'有教养的人'持愚蠢的愤恨态度，把平等的伟大民主要求变成为按最低水平和中等水平向所有'普通人'看齐，专横代替科学政策，某种世俗宗教去代替'纯粹'的宗教，这时，给与信徒的'真理'只是上级的发现，是对他们的美好的恩赐，但是他们更经常得到的是要求无条件服从的命令。民主主义的词句被组织对真理即命令的热烈赞许包装起来。"①

1108

虽然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各国工人阶级中得到发展和传播，虽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伪社会主义和伪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伪社会主义是一种很难拔干净的杂草，它同真社会主义一起在全世界传播，但不断改变自己的外形。远不是一切实质

①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俄文版第5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485页；第34卷第280页；第35卷第220页；第21卷第244—250页；第27卷第239—240，361—362页以及其它著作。

上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都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力图利用人民群众熟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口号，常常使用社会主义的术语，甚至采取社会主义形式，但同时保留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自己思想的内容及政治和经济制度。至于许多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的领导人就更是如此。例如，连德国法西斯都用“民族社会主义”掩盖它那极其反动的实质。

无论是巴拉圭的“基督教共和国”还是希特勒建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法西斯国家，显然都是连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都没有。然而不能不看到，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出现了不少社会制度和国家，在那里真假社会主义以一定比例混在一起。在斯大林迷信时期，我国也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它同共产主义社会的更发达的阶段和时期有实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社会从它一开始就出现了共产主义因素，产生了 *1109*
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开展了共产主义的教育，产生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可是社会主义还保留着资本主义的一些“天生的污迹”也就是说这时程度较弱，并以经过处理的形式还存在资本主义固有的那些现象和关系：例如，货币、商品、买卖关系、分配和消费中的不平等，而它又使不同的人有不同发展的可能性，还有国家和政权，等等。

这一切现象和关系是在多少世纪的过程中形成的，可以改变它们，使之为人民服务，但是在几年或甚至几十年期间内不可能摆脱它们。这一切只有到共产主义完全取得胜利的时候才会被消亡。上述一切因素不是共产主义的，但也不是假社会主义或伪社会主义的。这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正是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有别于共产主义。

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这样的现象和毛病，它们和社会主义一点也不沾边，是原来剥削制度的残余和遗毒，它们仍然以原

来极恶劣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盗窃、贿赂、各种寄生的生活方式——这都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社会的“污迹”。这一切现象中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社会把这一切现象当作格格不入的敌对的现象，并同它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可是，也不能不看到，原来社会型态的许多弊病和畸形状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不是用原来的面貌保存下来的，它们已换上了另一副面貌。这些现象和关系就其实质来说是和社会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但是它们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具有这种弊病和畸形状态的人拚命用社会主义的术语把自己装扮起来，并口谈社会主义建设，而实际上他们正在毁灭社会主义，破坏他的基础。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假社会主义。这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污

1110 迹”，但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并没有象白桌布上的污点一样表现得那么明显。这些“污迹”从它的颜色上看同周围的社会主义现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更加深入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析才能揭露出这些弊病和畸形现象的实质。

遗憾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革命胜利之后，许多伪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不是被那些已推翻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推行起来，而是由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昨天的革命者推行起来的……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奇怪。众所周知，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就已经辩论过教育和客观环境在形成一个人的思想方面的作用。

一些人说：应该改造人们，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才能改变。

另一些人说：应该改变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人们本身才能改变。

马克思主义把这两种相反的意见结合起来，并加以分析。马克思说：“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77页。

近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并给予教育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问题以相当明确的答案。例如，十月革命坚决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几乎一切经济和政治形式。原来的各阶层的和财产的界限完全扫除了。同时，许多参加革命的人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不能不指出，人们的本质和性格方面的变化比起经济和政治变化要缓慢得多。所以毫不奇怪，在新的环境和新的条件下出现了旧社会无数的弊病，但这些弊病往往是以另一种面貌表现出来的。

为了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本质，对这些过程的分析是很重要的。这是由于今天当我们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生和发展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不指出，在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的积极促使下，真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即那个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营房式社会主义）同时进入我们苏联的现实中来了。

那么，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属于假社会主义呢？

显而易见，斯大林营房式假社会主义的主要的显著特点是粗暴地和全面地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基本原则。

大规模逮捕和枪杀完全无辜的人，建立完全没有法律约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这样的进行残酷镇压和恐怖的机器——这些方面当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因素。

显然，除了使用犯人监狱和集中营半奴隶劳动的可怕制度外，也存在着社会主义的许多畸形现象。

在集体农庄中我们也看到假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在那里，许多集体农民在公家的田地里从事艰苦的劳动，但似乎什么报酬都得不到，他只能靠自己家庭副业过日子。

不关心人，粗野和蛮横不讲理，无视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都是属于假社会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

法律过分严酷，十五、十六岁的少年因迟到或擅自离开工作岗

位也要交付法庭审判，作了人工流产的妇女也受到审判，女集体农庄庄员因捡拾点麦穗或由于其它许多原因就被捕或长年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一切都是斯大林假社会主义的例子。

1112 斯大林时期规定的对选择工作地点和居住自由的那些限制难道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吗？

在斯大林时期，几乎所有的企业里当职工离开企业时都实行了侮辱性的搜查制度。众所周知，这样的搜查工人的制度曾在1905年以前的沙皇俄国实行过，所以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口号不仅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还要求废除搜查工人的制度。

苏联经济学家 Л·爱尔科宁在他未发表的手稿里面准确地描写了斯大林的假社会主义制度。他写道："从整个历史来看，斯大林的制度可以看成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离开社会主义的曲折……但是斯大林的制度不单纯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曲折，不单纯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没有成功的方案——这些政策在许多实质性的方面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最实质的东西。斯大林的制度从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恐怖手段那里学会了一套愚昧无知、官僚主义和反人道的方法，并用这些方法控制十月革命后几代苏联人民为社会主义用自己的劳动，才能和英雄行为而争得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不让这些成就去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制度用这种方法把一个经济和文化上正在向上发展的国家，把一个增长着各种可能性和需要也日益增长着的国家引向远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他又同时告诉人民说：他们不仅在建设，甚至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信念，即构成斯大林领导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基础的一切因素都是社会主义的，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些因素乃是：国家的神圣化等级服从，当权派的专横和人民的无权，各种等级的特权和宗教式的伪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营房制，压制个性和根除独立思考，恐惧和怀疑一切的环境，人们互

不来往以及所谓的'警惕性'，不受监督的强制行为，还有受法律 1113
保护的惨无人道的行为。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编造的许多诽谤社会主义社会的文章不正是写的这些内容吗？……斯大林制度把敌人对社会主义的诬陷诽谤变成了现实。当斯大林的制度能够寄生在被十月革命发动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国人民的伟大劳动的上面，寄生在我国人民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最终能取得胜利的伟大信念和为实现这一胜利而准备做出最大牺牲的忍耐力上面的时候，它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点的。……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来败坏和践踏社会主义的名誉，而且是在人类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在那个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它应该成为后来其他国家的榜样的国家里发生的，同时它还利用了列宁的名字（用这个名字作为它的外衣），当时全世界人民把这一名字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理想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对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及马克思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背叛，是真正地败坏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式的社会主义的名誉。这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效劳，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任何敌人都没有能够为世界资本主义做出的效劳行为，是斯大林和他所建立的整个制度对我国各民族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最严重的罪行。"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在我国个人迷信年代社会主义的关系和在社会主义外衣下面隐藏着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关系确实是同时存在着，这里实际上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谈的也包括当时的集中营的话，那么，我国甚至还有国家奴隶主义的关系。

对这些各种各样交织在一起的关系，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要加以研究。在研究的时候，当然不能夸大或 1114
缩小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假社会主义的规模和作用。

我们的思想上的敌人当中有不少人是非常准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很公正地指出了我国假社会主义的各种表现。但是这些人通常把各种形式的假社会主义归结成为苏联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结果，他们就不可能懂得我们的社会制度的真正本质，他们就不可能懂得我国的发展前途及我们国家的力量的源泉。一个战前从苏联集中营里逃到芬兰去的人，他后来在白俄刊物上写了文章，描写了集中营里的毫无人性的状况及斯大林时代农村政策的许多弊病，他从自己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为了举行起义而期待着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民群众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问题。相反，不管同谁进行战争和战争的破坏会造成什么后果，——所有的刺刀和农民的木杈只能杈到红军的背上，而且一定会杈到他们背上的……每个农夫知道，只要响了第一枪，战争一打起来他就首先去砍死离他最近的那个村苏维埃主席，集体农庄主席等等，而且这些主席也完全明白，他们在战争头几天里会被砍死……”希特勒德国的领导者们也许相信了这种预言并叫喊什么俄国是泥腿巨人，红军一打败仗，俄国就象一座小纸房子一样立即会坍塌下来。但实际生活给予了这类的预言家以极大的讽刺。

然而在苏联人中间以及在我们国外的朋友当中，常常可以看到相反的错误认识。这些人在公正地指出苏联的许多成就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许多因素之后，却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我国假社会主义的许多表现。结果这就使他们也不能理解苏联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的真正本质，所以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也使这些人慌张失措了。

1115

由于斯大林及斯大林分子全力以赴的努力，兵营式假社会主义在我国，更加巩固起来，这些假社会主义本来就已存在了。如果在我们苏联社会制度中只看到这种假社会主义的特点，那么就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然而如果我们只指出那些在十月革命后在我国确立起来的真正社会主义关系的特点，那么也同样不能了解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和性质。

在个人迷信时代和在以后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显著特点是：不仅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公开形式和表现之间的斗争，而且还存在着真正社会主义同兵营式假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

显然，任何的过渡性的社会大概都必然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但是就这一斗争的规模，其残酷性以及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许多领域和许多方面，假社会主义得以暂时取得优势——这些则并不是必然应该发生的事。在另一种领导下，我们会得到完全另外一个结果。

五、关于斯大林的专横政治和个人迷信后果的总评价

在我们看来上面我们所谈到的就是斯大林个人迷信和他的专横政治后果的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我们已经看见，这些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们涉及到社会和民族关系，也涉及道德精神领域。我们社会的许多政治组织形式，国家领导的形式和方法，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经济管理形式都引起了变化。科学、文学、艺术和苏联人的日常生活也都引起了一定的变化。尽管如此，不管这些后果如何危险，它们并不象一些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已引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正是这样，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才能够立即着手去消灭这些后果。这些后果是畸形的具有病态增生性质，然而它们并没有消灭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这个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1116

尽管某些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非常之大，但他们不能消除历史进程基本规律所起的作用。斯大林并不是我国的唯一的"活动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还有许多其它力量。人民和党是为社会主义而工作的，他们冲破了许多国内外的阻力，去实现社会主义。

是的，斯大林企图贬低列宁。但是列宁主义并没有被消灭，列

宁主义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都继续对意识形态和社会觉悟起着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的罪行给我国的国防带来了巨大损失，但是苏联人民冲破了一切困难，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并粉碎了法西斯。

斯大林主义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苏联人的心理状态和道德面貌，但是它不能阻止在苏联人中间传播真正社会主义道德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心理。

我国在个人迷信年代又出现了民族不和的一些因素。但同时苏联各民族和共和国之间的友谊继续存在并日益巩固。

斯大林削弱了我国的工农联盟，但是没有消灭这一联盟的主要基础。

斯大林歪曲了我国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领导方式。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考虑苏联人民的意见和意志。所以说，我们的人民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么也是间接地对国家大事的方向和进程起着很大的影响。

斯大林阻挠了我国科学和文学的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能够停止这些领域的发展。

1117 斯大林用自己的罪恶行径帮助了帝国主义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但是这只是阻止了，而不是停滞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对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罪行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向我们提出如下问题：斯大林时代是否保留了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的权力？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我国已经不存在工人阶级专政，只有个别人物，个别领袖的专政。

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断言，苏联在个人迷信时代产生了新的统治阶级，而苏维埃国家成了这一新阶级的工具，是这个阶级利益的保护者。

早在二十年代党内斗争时期，一些反对派断言，我们的国家已成了某种超阶级的机构，它已经脱离了建立了它的那个阶级——

无产阶级，但同时又不代表任何另外一个阶级的利益，它已成为在几个阶级之间活动的力量，是以哪个阶级对它压力更大为转移。此时，人们往往提出恩格斯关于波拿巴类型的国家权力的话：它"有时会在两个阶级之间获得一定自主权力，似乎是它们之间的媒介。"

我们认为，这些答案都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因此是不正确的。

当然，斯大林经常把国家权力作为自己的个人工具，作为解决党内思想辩论的手段，作为建立个人权力和消灭一切他不称心的人们的工具。显然，我们国家在这样强加给它的职能方面已不是，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变成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政。

同样必须指出，在个人迷信时代我国的官僚主义极端强化了，它特别是在国家机构内扎下了根。尽管在我们的条件下官僚主义者没有成为新当权阶级，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压倒一切的作用，并企图利用国家机构作为自己的工具。 1118

但是，当斯大林把国家变得如此畸形时，他和他周围的官僚主义者们并未能完全改变苏维埃政权的本质和性质。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从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得到了权力的委任书。我们知道，斯大林极不象样子地执行了无产阶级和党所交给他的历史使命。但是他还不能完全拒绝执行委托给他的任务，不管在二十年代，甚至在三十——四十年代时期都是如此。所以斯大林和由他领导的国家在此时期继续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职能（反帝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同投机者的斗争等等）。

列宁早已说过，我们的国家是带有一些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阶级国家。列宁在党十一大上承认"权力机构有可能走到不该去的地方。"在三十——四十年代权力机构确实走到它不应该去的地方，国家领导的各部门中官僚主义弊病更加严重和危险了。但是，不能把我们的整个国家和政治领导体系都仅仅归结成只有弊病的方面。

但不管怎样，危险已经发展到致命的程度。在个人迷信最后几年里苏联只是从最表面上看能给人们以比较健康机体的印象。稍微仔细一看，就是在当时也可以猜得出那些正在消耗苏维埃社会和国家力量的疾病的个别症状。然而这种重病的主要根子被小心地、深深地隐藏起来了。仅仅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坚决地被揭露之后，仅仅在大胆而又痛苦地进行了外科手术之后，才使苏联人民比较清楚地看见和明白了这一病患是多么严重和多么要命的危险。

结 束 语

1120

一、斯大林的最后几年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隆重庆祝的斯大林七十寿辰后的几年，对斯大林本人来说，标志着他的没落和颓废。

老态龙钟的暴君越来越多疑了。几乎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此时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自己的某一个别墅里。别墅周围的森林中设置了陷阱和安上地雷。只服从斯大林个人命令的警卫队的编制越来越膨胀起来。一切将受到斯大林接见的人都被仔细搜身。前来见他的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谁都不知道接见的结果会怎么样：回家还是被逮捕。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住宅和别墅里，通常是单独一人过日子。由于孤独，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习惯。例如，他从杂志和报纸中剪下来各种画，把它们编成集锦，然后钉在自己住房和办公室的墙上。

同斯大林进行辩论，反驳他的某一建议，等于是自杀，人们只能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被请来同斯大林下棋的人也被通知说——不能赢他。

在这些年月里，斯大林连对自己看来是很忠实的助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波斯克列贝舍夫也产生怀疑。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逐渐失宠，不允许他们参与决定重要的国家大事。政治局会议也不叫他们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不久，斯大林公开称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称米高扬是土耳其间谍。根据 A·法捷耶夫的好朋友 H·K·伊柳赫夫的证实，斯大林在一次法捷耶夫被邀请参 1121

加的午宴上，称阿·托尔斯泰，伊·爱伦堡和彼·巴甫连科是国际间谍。但他们都没有被逮捕。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在苏共十九大上被选进苏共中央主席团，诚然，也还选进了大量的新成员。（也许，斯大林在这时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消灭掉他们，而是吓唬住一些过去曾和他关系亲密的人，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在斯大林身边工作了十五年的私人秘书和助手亚·波斯克列贝舍夫从克里姆林宫被赶了出去。在斯大林逝世前最后几个月里，波斯克列贝舍夫住在自己别墅里，时刻等待被逮捕。

"医生事件"和所谓的"米格列尔人事件"（后者导致许多贝利亚的亲信和许多诚实的工作人员在格鲁吉亚被捕），[①] 使斯大林也疏远了贝利亚本人。贝利亚的走卒，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逮捕。侦查人员在审问阿巴库莫夫和接近他的工作人员时，企图逼他们供出贝利亚和外国侦探机构有关系。

报刊上又提出了在我国随着苏维埃社会向前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的论点。《真理报》在自己的社论中写道："一些人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暗害和间谍活动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右倾机会主义者才可能这样想和这样议论，因为他们站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我们的成绩不是导致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斗争的尖锐化，我们推向前进的运动越顺利，人民敌人的斗争就越激烈"。[②]《真理报》1953年1月31日社论也有类似的论点。报刊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说在苏联又建立起新的反革命组织网，甚至指出什么样的人会加入这些组织。1953年2月6日《真理报》发表的《谈革命警惕性问题》的文章写道："一些地方至今还有被粉碎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被粉碎了的反苏组织——孟什维克、革命立宪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伪装起来的余孽。再加上各种蜕化变质分子——崇洋媚外的人、社会主义财产的盗

1122

① 《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历史片断》梯比里斯1963年版第248页。

② 《真理报》1953年1月13日。

窃者……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现在就寄希望于这样的人。”

所有征兆表明，新的1937年即将到来。只是因为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了，才防止了新的严重的大规模镇压的威胁。

大家知道，斯大林是因脑溢血在他的莫斯科的别墅里去世的。我们的报刊暂时还没有详细报道过有关斯大林去世的许多情况。有人说，每天晚上都一个人孤独度过的斯大林，这天没有按时要晚饭。这使斯大林的警卫人员着急了，但是他们不敢打开斯大林房间的那扇用铁皮包起来的门。他的房间只是在几小时以后才被打开，这时被叫来的政治局委员们已经来到斯大林别墅。只到这时人们才去叫医生。斯大林死的很痛苦。在阿利卢耶娃的那本并未以诚相见的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还是有几页写得真实，特别描写斯大林死时的那几页。阿利卢耶娃写道：“父亲死得很困难，很可怕……在最后十二小时缺氧现象已经明显地在发展，脸色变暗，面容也变了，逐渐地变得不能认识，嘴唇发黑了。最后的一两小时简直就是缓缓地被憋死的。濒死的痛苦十分怕人。大家眼看着这种苦楚把他闷死了。有这么一瞬间，我不知道是否实际是这样，我觉得显然是在最后一分钟，他忽然睁开眼睛，目光扫过站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那目光十分可怕，显示出好象是疯狂，也许是愤怒和充满对死亡以及俯身在他脸前的医生的陌生面孔的恐惧。这一瞬间，这一目光扫过了每一个人。然后一种无法理解的可怕的情景出现了，至今我也不明白，但也不能忘记，他突然举起左手(是那只能动弹的手)，不知是指向上空某处，还是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那手势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充满威胁，没有人谈得出他指的是什么和指向谁……”。 1123

斯大林的死成为另一个可怕的悲剧的间接原因。在悼唁的日子里，几百万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都涌向莫斯科中心，以便能向他们长期以来所信赖的，但是很少了解的这个人告别。由于政府指挥不善和对群众的人流没有好好进行组织，发生了人挤人的现象。结果有几百，也许是几千苏联人被另外一些被斯大林迷信

变得盲目的苏联人踩死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莫斯科就逮捕了几百人，诚然，是短期被抓了起来的。原来，人民委员部就已经有一个“动员计划”即在战时或在其它一些国内外形势严重的时刻进行预防性逮捕的计划。这时，这个计划部分地实行了。但这是和斯大林名字有关系的最后的几场悲剧。从此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专门去研究和分析。

二、关于斯大林活动的总的评价问题

最后，本书必须对斯大林活动的总评价问题谈几句。

对斯大林活动的评价，现在吸引了许许多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苏联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斯大林最典型的评价说：他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的和最后的领导人，他是用自己的活动改变了俄国和全世界面貌的人。他们承认并在一定程度上指责斯大林的罪行，但同时他们力图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避免这些罪行，不可能不出现破坏法制的现象，不可能没有粗暴野蛮的作风，不可能不建立集权主义的专制的国家。资产阶级历史学把斯大林的活动看成是列宁活动的必然结果，斯大林的名字和事业并没有脱离共产党及其纲领和总的社会主义的方法。写过斯大林传的非常著名的传记家伊萨阿克·捷依奇尔在评价斯大林活动时就是持这种立场的。捷依奇尔在他的书中谈到我国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候写道，斯大林几乎是自古以来一切民族中最伟大的改革家。根据捷依奇尔的说法，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了十月革命，而且把社会主义思想交给了苏联人民，但只有斯大林才实现了这些思想。捷依奇尔宣称，为了取得胜利，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只能说明他所实现的任务的艰巨性。①

① 伊·捷依奇尔：《斯大林的政治传略》什图特加特 1962 年版。

西德资产阶级报纸《世界报》在总结斯大林的活动时也写道："在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开始一步一步地篡夺全部领导权时，俄国还和沙皇时代一样是一个农业国家。当他在三十年后去世的时候，苏联已成为在世界上占第二位的工业强国。他在达到此目的时并不是没有过错和失败。几百万人长期来被迫处于饥饿状态；无数公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被破坏了，个人的小小的幸福被消灭了，他们在劳改营里苟延残喘地活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了饥寒和无出路的劳改营生活的牺牲品。但是最后目的终于达到了。西方几乎花了二百年的时光才做到的事情……在俄国几十年不长的时间里用残酷方法、坚定的意志实现了，总而言之，这是现代史中的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果考虑到世界和人类是怎样形成的时候，那么在这一改造过程的牺牲者逐渐会被人所忘记，正如现在已经快忘掉了一大半那样。但是政治家们不能忽视的是苏联的经济势力……斯大林把俄国改造成工业强国，把俄国建设得如此强大，使它能够对付德国，而且和前一辈过去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他阻止了德国人的前进，然后不但用数量极大的坦克和武器，而且还有一整代懂得技术的，斯大林从技术上装备出来的俄国人，逼使德国人撤退了。俄国的坦克狙击手和驾驶员，他们少年时可能还和他们的父亲一起在田里跟在马后面耕地，斯大林教会了他们写字、看书、驾驶拖拉机和修理发动机……只有厚颜无耻的人和圣徒才会从内心中承认斯大林是为挽救俄国才实行了暴政的。如果谁不是属于这类人的话，他每次会因为碰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情况而感到痛心。几百万人的苦难和牺牲，难道确实是为保卫俄国的自由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吗？黑格尔的狡猾思想在这里帮不上他的忙，所以很难把斯大林看作是世界精神的体现。这样一来，斯大林挽救俄国的命题仍然是历史交给我们，但又是我们凡人的智慧所不能解释的一个谜。"①

1125

---

① 《世界报》1963年3月5日。

这类的看法，如同捷依奇尔的看法一样，应该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推翻。不是斯大林教会我们人民看书和写字，而是十月革命给我们人民开辟了通向教育和文化的道路。如果斯大林不消灭几十万旧的和新的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在这条路上可以走得更快一些。当然，犯人的劳动在我国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如果几百万无辜的人们，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工人和工程师，技术员和职员，如果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不是在劳改营里工作，难道我们的工业不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吗？我们在第三章里谈到对农民采取的暴力行为，难道是为更快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所必需的吗？不对，斯大林在农村的专横大大缓慢了农业的发展速度，农业的落后至今还极大地影响着整个苏联经济的发展。这样，在许许多多可以通向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中，斯大林选择的远远不是最正确的捷径，他不是加速了，而是缓慢了我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的步伐。

许多右派社会主义者评价斯大林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也站在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立场上。例如，过去是在左派、现在是右派社会主义者彼特罗·南尼写道："对我们，斯大林的同代人，最艰难的问题还不是弄清楚斯大林取得胜利的艺术，而是要弄明白，他为什么会取得胜利？也就是说，他为了保证自己取得胜利和战胜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利用了什么样的客观条件？因为这些对手和敌人往往按其文化水平和政治训练程度，按其思想的细腻和甚至就革命经验来说，他们都比斯大林高明得多。在我们看来，他利用了的这些条件是：斯大林和任何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比较起来，他是从'俄国现实'中吸取了营养而成长起来的。"①

南尼强调指出："这样一来，我们不能同意'个人迷信'这一术语，因为它把当代的缔造者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切恶果的唯一负责人。我们曾促进现在称为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的形成。我们指的是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逝世三十年的共产主义。"②

---

① 彼·南尼：《非斯大林化后的社会主义前景》莫斯科1963年版第16页。

米·吉拉斯在自己的小册子《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中，更加公开地阐明了这一思想。吉拉斯写道："对斯大林来说，没有不能犯的罪，也没他未曾犯过的罪。不管用什么尺度去衡量他，他是已经过去的这个时代、希望他也是将来一切时代的最大的罪人……理所当然，在评价一切人类的现象时，要看你所选择的角度。如果从人道主义和自由的角度去看，那么历史不知道有比斯大林更厚颜无耻和残酷的暴君……但是如果我们想评价斯大林在共产主义历史实际中的作用时，那么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承认他是仅次于列宁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甚少，但是他为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在社会和国家范围内把它实现了。他并没有建立理想的社会——这点根据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他把落后的俄国变成帝国主义工业强国，这个强国越来越坚定和无可阻挡地追求世界霸权。如果从他那政治锐敏而取得的成功来观察他，那么，斯大林是当代最完美的国家活动家……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个奇怪的人物，是一个忠实于抽象的、绝对的乌托邦思想的人，他在实践上除了成功不知道另外一个标准，而这意味着暴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消灭。但是我们不应该不公正地对待斯大林。他想实现的一切和甚至他已经实现了的一切，他都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实现它们。那些把他推到前面并让他成为领导人的势力，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领袖，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俄国和俄国以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不可能使用另一种方法。"

这类看法的主要目的非常明显：如果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可能不在最吓人听闻的罪行上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今后我们不应该再重复这样的试验，那就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者们在断定斯大林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是来自社会主义，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的时候，他们是企图在人民群众面前使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

② 彼·南尼：《非斯大林化后的社会主义前景》莫斯科 1963 年版第 5 页。

级革命的威信扫地。修正主义者企图把那些由于人们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而产生的失望和愤怒情绪转移到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身上来。

今天各种教条主义者们和斯大林分子在评价斯大林的活动时所持的立场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宣扬和捍卫两个基本观点，即两个理论。我们首先指的是把斯大林的罪行和残暴行为说成是他的错误，这些错误虽然是严重的，但还是局部性质的。莫洛托夫写道："至于个人迷信时期的罪行和违法行为，我们知道他有个别错误，这些错误有时是严重的，然而在完成如此伟大而重要的历史任务时则又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无论谁也不可能打保票。"① 中国的《人民日报》在1956，1957年发表的文章中，对斯大林所犯政治和刑事的罪行进行评价时，也说得很温和。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② 中国在1963—1965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对斯大林罪行的评价更加温和了。例如，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在列举了斯大林一些"错误"之后，按他们的"辩证法"得出了奇特的结论。他们说关于斯大林"错误"有一定的教益。报纸写道："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列宁曾经不

1129

① 《真理报》1957年4月22日；见《苏共二十二大速记稿》第2卷第224页。

② 《人民中国》1957年第2期。《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22页。

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①

没有必要和这类"辩证"论点的作者进行争论，今天他们自己已经走上反对自己的党和人民，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

我们分析的《人民日报》文章的基本论点首先证明，它的作者在有关斯大林活动的实际事实方面是完全无知的。

1936—1938年大镇压的基本和主要目标不是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而是消灭那些忠诚地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1130

当然，在1936—1938年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在某些地方也镇压了一些真正的反革命、间谍和暗害者分子。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这些人在那被关在监狱和流放到集中营里的苏联人民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老布尔什维克、九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A·B·斯涅戈夫在他《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斯大林监狱和集中营里待了十七年，在此期间我在那里没有看到反革命分子。"

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原市委书记Я·И·德罗宾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明斯克市立监狱他住的那间牢房里突然被关进来一个真正的波兰间谍——波兰总参谋部侦探局的军官。这个监狱里关的是明斯克和一些其它党组织的许多积极分子以及边防地

①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7页。

区的一些指挥员。那个间谍在监狱里看到这些共产党员，觉得非常奇怪。牢房中所有的人，都对波兰间谍持轻视的态度，特别是来自苏联军队的那些共产党员对他更持敌对态度。有一次那个波兰人发火了，问诺特曼少校道："你们要我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蔑视我？归根结蒂，我是波兰公民，波兰民族主义者，军官和爱国者，现在关在苏联监狱里。这是正常的现象，是绝对正常的现象。可是你们是苏联爱国者和共产党员，为什么也关在苏联监狱里？这点我就完全不明白了，我看这是完全不正常的现象。你们能给我解释这一切吗？"显然，谁也不能向波兰人解释什么。后来，这个波兰军官用我们的一个侦察员给换回去了，他被送回了波兰，而同牢房的多数苏联指挥员却被枪决了。

在我们说了上面许多情况之后，还能把我们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和列宁对待倍倍尔及罗莎·卢森堡或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相比较吗？在这种情况下，更恰当的是和另一些历史事件作对比。

遗憾的是，在有关党史的许多讲话、文章和书籍中，看来那些已被二十二大推翻的，说斯大林只有个别"错误"和缺点的论点，现在又开始抬头了。同意这类观点等于反对真理，反对事实，也是反对我们党的未来。这是因为斯大林所推行的消灭列宁党大部分老干部，枪杀我们最优秀的党、国家和军事干部，涉及几百万户各阶层人民的大规模的镇压——这一切已经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可怕的和惨无人道的暴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能为它们辩护。

1131

现在许多教条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提出来的第二个理论，我们暂且可称之为"权衡论"。

教条主义者断言，是的，斯大林犯了一些错误，甚至罪行，或者往往说成是"违犯了革命法制"。但是斯大林的这一切不正确的行为不是出自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建设并不需要它们。然而，斯大林为革命和共产主义立下了不少功勋，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论家和实践家。如果我们把斯大林的一切罪行和错误放在天平的一头，把成绩和功

劳放在天平的另一头，那么后边那一头毫无疑问会比前一头重。一个教条主义者甚至宣称，斯大林的罪行和错误占30%，成就和功劳占70%。1956年的《人民日报》写道："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① 中国在后来发表的文章对斯大林的活动也包含着类似的评价。《人民日报》在1963年写道："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 1132 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切错误。……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②

苏联的报刊中，特别是在党的二十二大以前，对斯大林的活动也有不少类似的评价。例如，1960年11月付排的为纪念斯大林而写的大百科全书的词条里写道："他（斯大林）的名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把斯大林在其最后几年中所犯的错误说成是贯穿其全部长期的党和国家活动的话，这是对历史真实情况的粗暴歪曲。"

当然，不能同意对斯大林活动的这类评价，它们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们是不正确的。

第一，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不能这样提出问题："斯大林对人类和苏联人民来说，是功绩多还是罪行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

②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6页。

多?”因为这样提问题就隐藏着这样的设想：即伟大的功绩给某些人以犯这种或那种罪行的权利。如果认为一个人在挽救了一千个同胞之后，就能得到历史的宽恕而毫不受到惩罚的去杀害一、二百无辜的人们的话，那么，这是极为不道德的。

第二，完全不能根据苏联在斯大林当权时期取得巨大发展这一事实，认为，斯大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坏统帅的领导下好的军队也能取得胜利。在评价斯大林活动时，绝不允许把这个人的暴行和违法行为放在天平的一头，而另一头却放上全部胜利，即全党和全体人民在反抗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和吓人听闻的暴行的情况下做出的贡献。这类“上天平”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1133

是的，在艰难的岁月里斯大林是我们的领导者。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许多年来，斯大林受到多数党员和人民的信任。我们党和人民在不了解斯大林犯罪真相的时候，支持了斯大林和他最亲近的助手。但如果国内不发生大规模的违法镇压，如果几十万，几百万诚实的苏联人民不被无辜杀害的话，难道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团结不会更加牢固吗？如果三十年代中期在我们党、苏维埃、经济和军事机构里不把最优秀分子消灭掉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不会更加信任联共(布)中央吗？如果斯大林不消灭几千位最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教员、医生和作家的话，难道我们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不会更大得多吗？如果战前不枪杀我们最优秀的将领，如果斯大林更加聪明一些去执行苏联的军事和对外政策的话，难道我们不能更早得多结束卫国战争，而且付出更小的代价吗？如果斯大林不是经常而粗暴的违犯列宁的合作化计划，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关系间制造许多困难的话，难道我们的农业不能达到大得多的成就吗？

那么，今天我们面对这三十年来一直领导我们的斯大林，应该感谢他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他还没有彻底搞垮我们的党、军队、苏维埃民主、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吗？为了他还没有彻底歪曲列宁主

义和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没有消灭全部诚实的苏联人，没有把我国引到完全的毁灭吗？

是的，斯大林三十年来是我党和我国的领袖和领导人。在狂风暴雨中，他作为我们这条船的"伟大的领导人"和"伟大的舵手"死死地把紧了舵轮没有放手。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斯大林是很好的领导人和很好的舵手。由于斯大林的过错，我们的船曾几十次触礁和搁浅，迷途或失掉正确方向，甚至差一点沉了船。只是由于那些别的舵手和船长训练出来的全体船员的行动，只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炮声和培养了新干部的共产主义思想，挽救了我们的船。那么，我们应该感谢斯大林这样的"伟大舵手"的什么呢？只是为了他还没有使我们的苏联这条船沉没吗？ 1134

斯大林作为我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继承了列宁，这是事实。但他是这样的一个继承人，如其说他增加了列宁遗给他的财产，还不如说消耗了列宁的遗产。那么，我们应该感谢斯大林的什么呢？感谢他还没有把留给他的遗产全部荡尽吗？

过去我们许多人给予斯大林的活动以极高的评价，可是那时我们并不了解他的罪行。但是，现在斯大林的大部分罪行已经被党揭穿了，所以现在当列举这些罪行可以编写成许多卷书，每卷中的每一行的犯下的罪行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判决的时候，这时，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企图为斯大林辩解并把这个刽子手和国家罪人捧为英雄，那么，这已经是无法理解的了。现在对斯大林的任何平反本身就是对党的严重的犯罪，是对党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厚颜无耻的污辱。正如哲学家格·波梅朗茨所公正地指出那样："在了解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还要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树立一种新东西，即树立对告密、非刑及极刑的尊敬。这是连斯大林都没有想要去做的事。他宁可去选择伪善的办法。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旗帜旁边树起一个精神的怪物。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过。卑鄙无耻的行为曾经发生过，但我们的旗帜仍然是纯洁的。在这旗帜上写着：'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1135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旗帜旁边站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都是有人类弱点的人，但是他们都是人。关于他们可以用马克思所喜爱的谚语来形容：'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斯大林如果要再和他并列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玷污我们的旗帜。"①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近三十年的共产主义那样评价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给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带来的那些曲解，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是假共产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人类所引以自豪的过去的许多伟大人物都有不少缺点和弱点。当代人有时把这些缺点看得很重，但是我们已忘记了它们，在我们的记忆里只留下了基本的和主要的东西。

斯大林的专横和违法行为却永远不会被忘记。斯大林做出来的事情是历史，他的名字永远会在历史上保留下来。但他的名字永远会从人类引以自豪的名单中勾掉。

斯大林本人对历史评价是很敏感的。但是斯大林正如许多暴君那样，以其惨酷和对无限权力的渴望，企图驾驭历史。然而任何人都无权左右历史的裁判。历史严厉地审判了斯大林，也会审判所有企图走向违法行为和专横道路的人们。东方谚语说："凶恶的当权者在坟墓里也不会找到避难所。后代会追究他们，就是二十个已经流逝了的世纪也不会洗刷掉他们的耻辱。"

历史学如果还继续成为科学，就不能掩盖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说出有关个人迷信时代的许多使人痛心的真理。然而我们还应该告诉人们：为了将来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并不是象我们的敌人所企图断定的那样：是社会主义产生了违法行为。但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本身并不能保证不犯违

1136

① 格·波梅朗茨：《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参见格·波梅朗茨《未发表的著作》（没有出版社等说明）。

法的过失行为和滥用职权的错误。

一些人现在问——如果我党的领导人不是斯大林的话，1937年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认为，这一悲剧不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它是可以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的书中所描写的时代又一次证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当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存在各种派别和各种社会政治倾向。但是这个或那个倾向及派别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当时成为党领导人的个人为转移的。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也向我们证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正是被社会主义革命唤醒的人民群众能够限制，而且在许多方面阻止那些和斯大林个人迷信相联系的极端严重的和有害的后果。

我们的国家经受了严重而十分危险的病患，它失去了许多最优秀的儿女。在揭露了斯大林之后，我们为恢复元气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然而远不是所有和斯大林个人迷信及斯大林主义有关的事情都已成为陈迹。

把个人迷信的所有附加的东西和污泥从我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掉的过程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1962年8月—1973年3月



主要人名索引

(条目后数字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A

B

Д

Ж

З

И

К

P

С

Э

Ю

Я